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6)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六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出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编译、苏随意国家政治书籍出生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六卷说明 XIII-XXXI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

柏林的危机	5—6
昔日的公国	7—8
新的代表机构。——瑞士运动的成绩	9—13
柏林的反革命	14—23
一	14
二	18
三	21
卡芬雅克和六月革命	23
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	24
内阁在被告席上	25—26
声明	27
良心的忏悔	28—34
“科伦日报”	35
打倒捐税!!!	36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编者注

艾希曼的命令	37—38
呼吁书	39
联邦法院的选举	40—42
市政府	43
呼吁书	44
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就拒绝纳税问题发布的 公告	45
检察长和“新莱茵报”	46—47
柏林和科伦的检察机关	48
法兰克福议会	49—50
* 到处戒严	51
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	52—62
曼托伊费尔和中央政权	63
德利加爾斯基——立法者、公民和共产主义者	64—69
* 对“新莱茵报”提出的三个诉讼案	70—71
联邦委员会委员剪影	72—77
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报告	78—84
新闻数则	85—86
曼托伊费尔的机关报和约翰。——莱茵省和普鲁士国王	87—88
意大利的革命运动	89—93
德国教授们的可耻行径	94—95
十二月	
劳麦先生还活着	96
* 反革命的第二阶段	97

国民院	98—116
反革命政变	117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118—146
一	118
二	123
三	128
四	134
反革命的新同盟者	147—149
“新莱茵报”的诽谤	150
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	151—161
一	151
二	157
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	162—169
辟谣	170
新“神圣同盟”	171—172

一八四九年一月

革命运动	173—175
资产阶级的文件	176—180
合众国的预算和基督教德意志的预算	181—185
新年贺词	186—192
匈牙利的斗争	193—207
瑞士报刊	208—213
孟德斯鸠第五十六	214—231
一	214

二	225
普鲁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	232—233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234—246
一	234
二	241
巴黎状况	247—250
* 巴黎局势	251—252

二 月

“科伦日报”论选举	253—257
康普豪森	258—261
“新莱茵报”审判案	262—285
马克思的发言	262
恩格斯的发言	279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	286—306
马克思的发言	286
拒绝纳税案	307—308
政治案件	309
* “科伦日报”的分工	310—315
拉萨尔	316—321
一	316
二	319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322—342
一	322
二	334
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治理下的普鲁士财政	343—354

施泰因·····	355—356
“科伦日报”驻维也纳记者·····	357—358
泽特·····	359—361
“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	362—368
罗马宣布成立共和国·····	369
再论旧普鲁士的财政·····	370—372
告密·····	373—374

三 月

御前演说·····	375—381
一·····	375
二·····	376
卢格·····	382—384
经济状况·····	385—390
英国士兵的誓言·····	391—393
三月同盟·····	394—396
维也纳和法兰克福·····	397—400
* 三个新法案·····	401—406
政府的挑衅·····	407—409
霍亨索伦王朝的总改革计划·····	410—415
书报检查·····	416—418
十亿·····	419—423
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	424—425
* 第二议院的奏折草案·····	426—429
* 三月十八日·····	430

* “新普鲁士报”论三月十八日	431
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	432—440
一	432
二	437
柏林关于奏折问题的辩论	441—452
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	453—457
皮蒙特军队的失败	458—460
一	458

四 月

皮蒙特军队的失败	461—468
一	461
二	465
法兰西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469—470
* 皇冠喜剧	471—472
雇佣劳动与资本	473—506
一	473
二	480
三	486
四	492
五	499
* 政治流亡者的引渡	507—508
声明	509
柏林第二议院四月十三日会议	510—514
俄国人	515—517

关于招贴法的辩论·····	518—530
一·····	518
二·····	524
拉萨尔·····	531—538
* 第二议院的解散·····	534—535
* 波兹南·····	536—539

五 月

柏林的反革命策划·····	540—542
拉萨尔·····	543—548
普鲁士给法兰克福诸君的耳光·····	549—551
* 解散·····	552
拉萨尔·····	553—558
莱茵省市政委员会代表大会被禁·····	559
莱茵各城市代表大会·····	560—561
* 同盟中的第三者·····	562—563
他们要戒严·····	564—565
* 普鲁士军队和人民革命起义·····	566—567
* 问工人·····	568
沙皇和他的藩臣们·····	569—570
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	571—575
* 反革命的进攻和革命的发展·····	576—577
普鲁士新宪法·····	578—579
杜塞尔多夫的血腥法律·····	580—581
贝尔格区的起义·····	582—583

* “科伦日报”卖身求荣	584
“十字报”	585
* 普鲁士给法兰克福诸君的又一记耳光	586—587
新的军法宪章	588—595
一	588
二	592
* 爱北斐特	596—599
* “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	600—603
* 匈牙利	604—615
* “告我的人民”	616—618
致科伦工人	61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文章和文件

致“法兰克福报”编辑部	623
弗·恩格斯。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	624—626
卡·马克思。六月十三日	627—629
卡·马克思。致“新闻报”编辑	63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卡·马克思。工资	635—660
[A]	635
[B] 补充	636
I. 阿特金森	636
II. 卡莱尔	636

III. 麦克库洛赫	637
IV. 约翰·威德	637
V. 拜比吉	639
VI. 安得鲁·尤尔	639
VII. 罗西	639
[VIII.] 舍尔比利埃	640
[IX.] 布雷。储蓄银行	641
[C]	641
I. 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资有什么影响?	641
II. 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竞争	643
III. 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	643
IV. 工资的波动	644
V. 最低工资	645
VI. 改善生活状况的建议	646
VII. 工人联合会	658
VIII. 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	659
弗·恩格斯。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	661—667
弗·恩格斯。蒲鲁东	668—672

附 录

卡尔·马克思	675
弗·恩格斯请求准许他居留伯尔尼的申请书	676—677
代表团晋见检察长茨魏费尔	678
关于法院侦查员侦讯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的通告	679
“新莱茵报”审判案	680
洛桑工人联合会给弗·恩格斯的委托书	681—682

“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	683—684
对“新莱茵报”的审判延期举行	685
德利加爾斯基对“新莱茵报”的控告	686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 1849年1月15日会议记录摘要	687—688
“新莱茵报”被宣判无罪	689—690
对“新莱茵报”的两次审讯	691
民主宴会	692
二月二十四日的宴会	693—694
居尔岑尼希的宴会	695—696
科伦工人联合会 1849年4月16日全体会议的决议	697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 1849年4月17日会议记录摘要	698
科伦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的决议	699—701
科伦工人联合会 1849年4月23日全体会议的决议	702
关于召开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通知	703—704
“新莱茵报”编辑们的命运	705
卡尔·马克思离开科伦	706
“新莱茵报”审判案	707
通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	708
注释	711—77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71—786
人名索引	787—818
期刊索引	819—823
译后记	824

插 图

载有“内阁在被告席上”一文的“新莱茵报”号外的一页·····	26—27
载有卡·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的“新莱茵报” 的一页·····	128—129
载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科伦受审时发言全文 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的扉页·····	263
1848—1849年的匈牙利地图·····	604—605
“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的一页·····	620—621
卡·马克思的手稿“工资”的第一页·····	633

第六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收集了他们在 1848 年 11 月至 1849 年 7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同第五卷一样,第六卷所包括的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民主运动中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唯一报纸——“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了当时发生的事件,揭示了政治冲突的实质,认为它是尖锐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判定了政治舞台上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对比,并据此拟定出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不同阶段上的策略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概括了群众在革命时期的丰富经验,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进一步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的几篇文章是马克思在普鲁士发生尖锐的政治危机和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情况下写成的。马克思分析了逐渐低落的欧洲革命的进程,指出了反革命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把普鲁士所策划的政变看作是欧洲悲剧的第三幕;第一幕是法国无产阶级在六月的日子里的失败,第二幕是 1848 年 11 月 1 日革命维也纳的陷落。

马克思力求通过“新莱茵报”向人民群众预告即将来临的决战,并教导他们准备回击反革命的进攻。在“柏林的危机”、“柏林的

反革命”以及其他文章中，马克思阐明了 1848 年 11 月普鲁士的政局，并证明王权和普鲁士国民议会之间业已成熟的冲突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马克思要求普鲁士国民议会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把大臣们作为国事犯加以逮捕，革除一切不服从国民议会决议的官员的职务，并宣布他们不受法律的保护。他提出拒绝纳税的口号，以便剥夺反革命政府反对人民的手段之一。马克思认为，由于拒绝纳税而必然展开的运动，是激发群众革命毅力的手段，是革命新阶段的开始，在顺利的情况下这个阶段的结局应当是推翻王权和人民取得彻底的胜利。

马克思在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见本卷第 24 页）中号召各民主团体举行民众大会来鼓励居民拒绝纳税。在区域委员会的第一个呼吁书中，马克思警告说不要用暴力手段抗拒纳税，以免在莱茵省发生孤立的和分散的起义。当普鲁士国民议会本身通过了拒绝纳税的决议后，这一运动已开始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质的时候，马克思在第二个呼吁书（见本卷第 39 页）中号召用一切办法来反抗征税，号召组织武装的民团以反击敌人，并成立安全委员会。马克思认为安全委员会是临时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它所颁布的命令应当看作是唯一合法的命令。这种革命政权机关应当代替三月革命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反动官僚机构。同仅仅号召消极反抗征税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完全相反，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号召“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见本卷第 38 页）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和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

域委员会的呼吁书中，为全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拟定了坚决大胆的行动纲领。这些文件对于研究马克思在德国革命危机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有巨大的意义。

但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仅限于号召消极反抗；莱茵省所掀起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普鲁士其他省份没有得到积极的支持。结果反革命获得了新的胜利：1848年12月5日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马克思在“反革命政变”一文中写道：“国民议会长期以来软弱怯懦，现在它自食其果了。它曾听任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在好几个月中从容地策划、加强和巩固，而现在它成了这种阴谋活动的第一个牺牲品。”（见本卷第117页）

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孟德斯鸠第五十六”、“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康普豪森”等一系列文章，以及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讯中的发言，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了普鲁士反革命获胜的原因；他揭示了德国三月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指出它与自己历史上的先驱者——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建立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政治制度，而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见本卷第278页）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确实领导了革命运动，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却不想通过革命而是想通过同王权达成和平协议的办法来取得政权。马克思指出，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在革命中采取的立场不能用这些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而应该用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来解释。普鲁士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觉醒起来的无产阶级，不惜向旧社会势力作任何妥协。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要保存“法制基础”，因此拒绝向封建社会

势力作坚决斗争，而把稍加改头换面的旧的地主官僚国家保存下来。由于害怕资产阶级所有制受到侵害，普鲁士资产阶级力求保存封建所有制，从而抛弃了它在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必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这样它便预决了自己的必然失败，而为反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讯中的发言，揭露了声名狼藉的“法制基础”的真实含义，那就是企图把旧法律强加于通过革命来确立自己的法律的新社会。马克思发展了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他证明说：与法学家的幻想相反，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的法律，就会造成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只有政治革命才能解决。

马克思总结了半途而废的三月革命，证明坚持“法制基础”和臭名昭彰的“协商论”的必然结果，一定是尖锐的政治冲突。这个冲突果然于1848年11月在普鲁士爆发，而以12月5日的政变告终。

马克思把王权同国民议会之间的这个冲突看作是两个国家政权的斗争，两个元首的斗争。但是，两个自主的政权不能同时并肩地在同一个国家里行使权力。它们之间的斗争必须由物质力量来解决。马克思揭示了这一斗争的深刻的阶级根源。他指出，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议会党团的政治冲突，而是两个社会的冲突，是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王权——旧的封建贵族社会的代表和国民议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驳斥了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控告，证明拒绝纳税是人民自然的和合法的自卫手段，人民有权用暴力还击暴力。马克思始终不渝地坚决捍卫人民的主权，捍卫人民进行革命的权利以及人民积极干预历史进程的权利：“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利用革命来回答它。”（见本卷第 305 页）

马克思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讯中的发言，以及他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审讯中的发言，都是利用法庭来宣传革命观点，控告当局和揭露反革命计划的光辉范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审讯中的发言，捍卫了革命报刊的权利，他们认为革命报刊的首要任务是破坏现存反动政治制度的全部基础。

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欧洲革命的命运不决定于经济落后的德国，只能决定于当时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

马克思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考察了 1848 年欧洲革命和反革命所经历的道路。马克思一再回顾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失败，这次失败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法国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失败，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则引起了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失败，并使曾经以争取独立的斗争来响应二月革命的各被压迫民族遭到了新的奴役。所以马克思强调指出，欧洲革命的命运同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在总结欧洲革命时得出结论说：“1848 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见本卷第 162 页）富于遐想、良好愿望和华丽辞藻的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所有一切幻想，都被急剧的历史进程和残

酷的反革命无情地践踏无遗了。马克思号召人民要吸取反革命所提供的教训，以便在将来的战斗中及时而大胆地运用这些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所写的全部文章，都对胜利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临近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次革命会推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革命高潮的出现。这个新的高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应当导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序幕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根据 1848—1849 年革命经验所制定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中得到了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英国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敌人，因为资产阶级英国“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当时马克思认为，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而这次大战会给英国无产阶级政党——宪章派的胜利起义创造条件。总结了 1848 年的欧洲革命的“革命运动”一文的结尾这样写道：“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 1849 年的前景。”（见本卷第 175 页）

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1848—1849 年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对欧洲革命前景的判断中，对欧洲大陆各国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作了某些过高的估计，由此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即将来临的论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上，同时也密切注意欧洲其他国家的斗争进程。他们热烈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里捍卫波兰的独立，对波兰人民进行的解放斗争对欧洲民主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罗马宣布成立共和

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皮蒙特军队的失败”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深切的同情论述了意大利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皮蒙特王权的背叛政策。恩格斯写道：“对付政府的叛变和怯懦，只有一种手段：革命。”（见本卷第457页）恩格斯说：意大利人民不应该只用正规军来抵抗奥军和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而应该掀起群众起义，开展革命战争、游击战争、真正的民族战争，以便永远消灭奥地利的压迫。

本卷有许多文章（“匈牙利的斗争”、“‘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等）是论述匈牙利革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同情关注匈牙利人民反对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斗争。恩格斯分析了匈牙利的军事行动的进程，认为匈牙利革命领导人善于采取许多措施以保证农民支持革命的作法具有特殊意义。他还强调了匈牙利战争的人民性质和游击性质，并对科苏特政府所采取的坚决的革命的对敌斗争方法给以很高的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问题看作是欧洲革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依据民族运动为谁的利益服务，以及它在客观上成为谁的工具，把民族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他们把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归为革命的民族，因为这些民族的斗争削弱了当时欧洲几个主要的反动国家——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1848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热烈关怀捷克的民族运动，特别是布拉格的起义。但是，在这次起义被镇压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分子在奥地利境内的斯拉夫民族的运动中占了上风；结果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沙皇政府便利用了这些民族来镇压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

由于这些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内容和客观性质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民族看作是反革命的民族。

列宁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对待民族问题的立场后，写道：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 1848 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 1848 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144 页）

在“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既反对泛日耳曼主义，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在恩格斯的文章中，一方面对奥地利境内的许多斯拉夫民族的运动给予了正确的历史评价，把它看作是违反当时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利益的运动，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却作出了某些错误的论断。恩格斯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似乎这些民族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不能起进步作用，似乎这些民族注定要遭到灭亡，而不能作为独立的民族存在。在这些文章中，还片面地把德国人征服许多斯拉夫民族的过程描绘成进步的，传播文化和文明的过程。这种说法是同恩格斯自己在其他文章（见第 5 卷“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和本卷“波兹南”等文）中描绘的德国诸邦对东欧实行抢劫掠夺政策的情景相矛盾的。恩格斯关于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前途的观点，是和他关于小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分不开的。恩格斯认为，以后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向是集中，这种发展进程会使这些弱小民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被大的、具有更

强的生命力的民族所并吞。恩格斯列举了苏格兰的盖尔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作为例子。对于美国侵占墨西哥的部分领土，恩格斯也是从这个观点来评价的。但是恩格斯在估计弱小民族的命运时，并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除了集中的趋向外，还有另外一种趋向——弱小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它们建立自己国家的要求。恩格斯关于某些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作用的错误观点，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1848—1849年间还处于开始阶段，弱小民族的民族运动的经验还比较少。同时还应当指出恩格斯文章中关于这些斯拉夫民族的命运的一些保留意见。“如果斯拉夫人在他们受压迫的某一个时期开始**新的革命历史**，那末他们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有力量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们求得解放，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局部利益就会在欧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见本卷第334页）奥地利境内各斯拉夫民族在恩格斯写作这些文章之后的百年来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民族的生命力和坚强性，他们已经争得了自由和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且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欧洲各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同时也极其重视对普鲁士反革命政变后的事件进程的分析。他们认为德国民众派的主要任务，是一步一步地捍卫自己在报刊、人民集会和议会中保留下来的阵地。

“三个新法案”、“霍亨索伦王朝的总改革计划”、“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等三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曼托伊费尔政府提出的各种法案，这些法案堪称为对1848年12月5日国王钦赐的畸形

宪法的补充，它们必然把国家引回到旧普鲁士立法的宗法式野蛮状态。

恩格斯的“第二议院的奏折草案”、“柏林关于奏折问题的辩论”、“柏林第二议院四月十三日会议”、“关于招贴法的辩论”等文章，是为了批评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活动而写的。恩格斯分析了第二议院的辩论，愤慨地指出，第二议院的议员们，其中包括极左派的代表，不但没有公开捍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而迎合议会的妥协迁就行为，节节让步。恩格斯谴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这些“议会讲台上的初出茅庐的骑士们”，说他们希图用议会的方法来达到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即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的东西。本卷中收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并拟定了革命的议员在议会中的策略，其主要特点就是要把议会内的活动同议会外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 1848—1849 年的活动是同群众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848 年春天，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时，无产阶级分离涣散，政治觉悟不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松懈，人数又少。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并站在民主运动的极左翼。根据这一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参加了民主团体，他们在民主团体中坚决地捍卫了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任何原则性的让步，指出了他们的不彻底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活动场所，除了“新莱茵报”和科伦民主协会而外，还有科伦工人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力求通过工人联合会来提高科伦和全莱茵省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组织

性。

在革命进程中，德国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提高了，他们日益深刻地了解到本阶级的目的，并摆脱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斗争的经验证明，在同反革命的决战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不可能是可靠的同盟者。由于情况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虽然在许多一般的政治问题（如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选举）上仍旧同民主派一起行动，但实际上他们在着手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组和加强科伦工人联合会。这些措施是在反对哥特沙克及其拥护者的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的激烈斗争中得到贯彻的。（见本卷附录“科伦工人联合会分会的决议”，第 699—701 页）

1849 年春天，由于德国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匈牙利进行着革命战争，法国革命运动开始进入高潮，因而更加迫切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1849 年 4 月 14 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在德国工人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的支持下，退出了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从而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断绝了关系。（见本卷第 509 页）接着，他们所领导的科伦工人联合会通过了退出莱茵省各民主团体联合会以及同全德工人联合会总会建立联系的决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关系，但是以后在和共同敌人作斗争时并没有拒绝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行动。

三月革命发生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了策略，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这个时期中德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德国工人意识中的变化。德国工人意识中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莱茵报”促成的。“新莱茵报”愈来愈明显地表明它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机

关报。

在“资产阶级的文件”、“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科伦日报’论选举”等文章中，马克思用具体事实说明普鲁士资产阶级对待工人是极端残酷无情的，揭露了他们假意讨好无产阶级的企图，揭露他们在选举前许下的要一举解决“社会问题”的蛊惑性诺言。马克思反对“科伦日报”关于“社会问题”的混乱论点时，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具体的阶级性。他证明，虽然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投票拥护国王赏赐的宪法，但与资产阶级的愿望相反，这些阶级所关心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这种国家形式能使他们有更大可能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全社会最激进、最民主的阶级不正是这些阶级吗？特别革命的阶级不正是无产阶级吗？”（见本卷第25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的争取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不仅意味着要消灭腐朽的政治制度形式和反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时也要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即结束妨碍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长期的分散状态。

像在以前所写的许多论文中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封建君主国之一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计划（见“法兰克福议会”一文）。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也反对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想把德国变为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企图。

恩格斯在被迫居留瑞士期间所写的文章中（“昔日的公国”、“新的代表机构。——瑞士运动的成绩”、“联邦法院的选举”、“联邦委员会委员剪影”、“国民院”、“瑞士报刊”等）描绘出了瑞士政治生活的真实图景，当时瑞士以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的典范闻名，就

像比利时以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典范著称一样。恩格斯强调指出了当时小市民的瑞士的政治生活中地方的、州的局限性，指出了瑞士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的特点：满怀偏见、目光短浅、打小算盘和专重小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批驳了把德国变成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小资产阶级计划，证明德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特点坚决要求消除国家的分散状态、割据现象和小邦林立的局面，要求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强调，革命的德国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不仅要反对内部敌人，而且还要反对外部敌人，首先是反对欧洲反革命的基本力量，即资产阶级的英国和封建专制的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俄国沙皇制度，把它看作是欧洲封建君主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不摧毁这个支柱，欧洲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德国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用革命方法统一德国的主要内部障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反动普鲁士君主制度，这是旧的、封建社会腐朽力量的堡垒。“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普鲁士新宪法”、“新的军法宪章”、“告我的人民”及其他文章，以鲜明的笔调描述了执政的普鲁士王朝靠掠夺、欺诈、暴力起家的历史，指出了它在窒息人民解放运动中所起的卑鄙作用。

统一德国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是封建专制的奥地利。只要哈布斯堡帝国存在，就根本谈不上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谈不上在整个德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批评了全德国民议会，因为它不仅不坚决消灭德国反革命势力，反而包庇纵容它。“法兰克福蛤蟆坑”的议

员们一味以庸俗教授的腔调空谈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却放弃人民历来的基本权利——起义的权利（见“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报告”、“维也纳和法兰克福”、“普鲁士给法兰克福诸君的耳光”等文）。后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总算制定了德意志帝国宪法，但这个宪法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德国各邦君主不愿意承认它。

1849年春天，在莱茵省和德国西部其他地区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人民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觉得这个运动的目的有局限性，但还是给以支持。他们说明，这一运动之所以具有群众性，是因为“每向统一德国迈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在人民看来，都是朝着消灭小邦割据局面和免除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迈进一步”。（见本卷第55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欢迎人民群众的日益壮阔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工人起了显著的作用。恩格斯积极参与了爱北斐特的起义。（见“爱北斐特”一文）

指导群众革命斗争的“新莱茵报”的刚毅勇敢和毫不调和的立场一开始就引起普鲁士政府和司法当局的残酷迫害。他们对报纸编辑进行了一连串的审讯。但是，1848年2月7日“新莱茵报”的审讯和1849年2月8日对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讯，结果都违反了普鲁士政府的初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揭露性的发言赢得了旁听的公众的热烈欢迎，使得陪审法庭只好宣判他们无罪，也使“新莱茵报”编辑的声誉大大提高。

普鲁士政府并没有放弃用各种方法迫使“新莱茵报”沉默的计划。1849年5月莱茵省零散的起义失败后，普鲁士当局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普鲁士。警察当局对马克思及该报其他编辑的迫害，使“新莱茵报”在1849年5月19日停刊。

在用红色油墨印的最后一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该报为革命事业而进行的光荣斗争，他们着力指出该报所特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难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吗？”（见本卷第 602 页）在“新莱茵报”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保卫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的事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该报编辑部完全有权说：“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

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称：“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见本卷第 619 页）

马克思的两篇经济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与这一著作有密切关系的手稿“工资”，在本卷中占特殊地位。

“雇佣劳动与资本”以社论的形式连续发表在 1849 年 4 月的“新莱茵报”上，它是根据 1847 年 12 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所作的演讲写成的。马克思发表这一著作的目的，是为了论述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他力求给无产阶级一个理论武器，使它能深刻而科学地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工人的雇佣奴隶地位的基础是什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用论战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经济观点，与“哲学的贫困”一书不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的经济观点是用系统的、通俗的、每一个工人都能懂得的形式阐述出来的。同“哲学的贫困”相比，“雇佣劳动与资本”表明马克思在制定经济学说方面前进了一步。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揭露了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马克思证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是互相制约的，同时他尽力强调指出这

两种关系的对抗性。同劳资协调的鼓吹者截然相反，马克思揭露出二者利益的根本对立性。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所有的经济范畴，给资本下了一个定义，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见本卷第487页）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继续发挥了为制定剩余价值理论而提出的基本原理。他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增长、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机器的广泛使用，——所有这一切，结果都只会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使物质财富的生产者——雇佣工人阶级更加贫困。因此，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已经大体表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的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在本版中，“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是按其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原样刊印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当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没有作彻底的批判。彻底的批判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完成。因此，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有些用语和整个句子，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的观点来看，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正确的。1891年为广大读者出版这一著作时，恩格斯做了许多更改，这些更改在本版中都以脚注说明。恩格斯指出，这些更改归纳起来只有一点：凡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原来是说工人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的地方，恩格斯都改为出卖劳动力。恩格斯在说明这些更改的意义时写道，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词句，而在于经济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论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因为不了解这一点而陷入绝境。马克思从这个绝境中找到了出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写道，马克思证明，“劳动并没有价值，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同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

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劳动力的价值也就要由体现在劳动力这种社会产品中的劳动来决定。这个价值就等于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参看马克思“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3—24页）劳动力这一商品具有一个特性，即它能创造价值，成为价值的泉源，而且是大于本身价值的价值的泉源。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攫为己有。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末制定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并在“资本论”中作了经典性的论证，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同“雇佣劳动与资本”密切相关的手稿“工资”，大概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所做的最后几次演讲的提纲。这篇手稿虽然不完整，而且马克思不准备发表，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在很多地方补充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内容。同时，恩格斯在1891年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写的序言中所做的说明，也完全适用于这篇手稿。

在这篇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资的影响，并且得出结论说：资本中用于机器和原料的份额的增长，要比用于工人生活费的份额的增长快得多。在这篇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提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但已经非常接近他以后所制定的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原理。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成为反对工人的武器。

马克思批判了目的在于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的各种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例如：建立储蓄银行，实行生产教育以及马尔萨斯人口论等，这些批判都有很大意义。马尔萨斯硬说，按照自然规律，人口比生活资料增长得快，因此他主张实行节育，以减少工人之间

的竞争。马克思异常重视揭露“十分愚蠢、卑鄙和虚伪”的马尔萨斯学说，因为它把社会现象变成自然现象，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过，并主张因此惩罚它。

在关于工人联合会这一节中，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的这种联合看作是为推翻旧社会、彻底解决其阶级矛盾而训练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揭露了对工人的剥削，同时也强调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没有这些就不会创造出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物质资料，无产阶级本身也就不会发展到有能力在旧社会中实行革命卷末尾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停刊后于1849年5月到7月间所写的一些材料和文件。其中有两个给报纸编辑部的声明，以及恩格斯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一文和马克思论述巴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失败的文章——“六月十三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这部分中，除马克思的手稿“工资”以外，还刊载了恩格斯当时没有发表的关于法国1848年12月总统选举前夕情况的两篇论文，即“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和“蒲鲁东”。

在本卷附录中刊载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际革命活动和对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领导。在这些文件中，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伦工人联合会中的活动的材料，也有关于他们所参加的民主宴会的报道。附录中还包括关于司法当局和警察当局迫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材料，这些材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编辑“新莱茵报”的时候，在组织人民群众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的时候的处境是艰苦而紧张的。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阐明在 1848—1849 年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原理提供了大量资料。

* * *

在全集第五卷说明中已经指出,要确定“新莱茵报”上哪一篇文章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文章既没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佐证又很少,同时手稿也找不到。此外,许多文章又有两人合写的迹象。当不能确定某篇文章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时,在篇末就不注明作者是谁。

当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时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本卷中收入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五十六篇文章。其中有几篇的俄译文曾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过。其余文章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文章后面的编辑说明中都注明了。刊载在附录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8年11月—1849年7月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11月9日—1849年5月19日

柏林的危机

柏林的危机¹

科伦 11 月 8 日。情况看起来很混乱，其实很简单。

正如“新普鲁士报”² 正确指出的，国王有“继承的天赋”权利的“雄厚基础”。

而国民议会却没有任何基础。它唯有建立基础才行。

两个元首！

他们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康普豪森，是协商论³。

只要两个元首不能或者不想协商，他们就会变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元首。国王有权向国民议会挑战，国民议会也有权向国王挑战。谁的力量大，谁的权利就大。力量要受到斗争的考验。斗争要受到胜利的考验。两种势力只有用胜利才能证明自己的权利，失败只能说明自己没有权利。

国王直到现在还不是宪制国王。他是一个专制君主，要不要立宪制度，由他决定。

国民议会直到现在还不是宪制议会，而是制宪议会。它一直在努力建立宪制。放弃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由它决定。

两方面，国王方面和国民议会方面，暂时还只是容忍立宪的仪式。

国王不顾议会的大多数而要求成立合他心意的勃兰登堡内阁，这个要求是专制国王的要求。

议会要求**直接**通过代表团禁止国王成立勃兰登堡内阁,这个要求是**专制议会**的要求。

不论是国王还是国民议会,都违背了立宪协议。

不论是国王还是国民议会,都回到了自己最初的立场,不过国王是有意识的,而议会是无意识的。

优势在国王方面。

权利在力量方面。

没有力量的方面只是空谈权利。

洛贝尔图斯内阁会等于零,因为一正一负正好抵销。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9 日“新莱茵报”
第 138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昔日的公国⁴

纽沙特尔共和国 11 月 7 日。你们一定也很喜欢听听有关一个小国的某些事情。这个国家直到不久以前还在享受普鲁士统治的恩惠，但在普鲁士国王所统治的一切国家中，它却是第一个高举革命旗帜并赶走家长式的普鲁士政府的国家。我所谈的就是昔日的“诺恩堡-瓦连迪斯公国”⁵。在这里，现任内阁首相普富尔先生曾以省长的身分开始了自己最初的政治活动，而在今年 5 月，当他还没有在波兹南荣获桂冠，还没有在柏林的首相宝座上得到不信任投票的时候，就被人民革职了。现在，这个小国家享有《République et Canton de Neuchâtel》（“纽沙特尔共和国和纽沙特尔州”）的光荣称号，看来最后一个纽沙特尔近卫兵在柏林洗刷自己绿军装的时候已经快到了。应当承认，使我感到有趣而愉快的是，在我逃出普鲁士神圣的埃尔曼达德⁶ 五个星期以后，我又可以在一个 de jure（按法律来说）还属于普鲁士的领土上漫游无阻了。

纽沙特尔共和国和纽沙特尔州的情况无疑比已经寿终正寝的诺恩堡-瓦连迪斯公国要好得多。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不久以前举行的瑞士国民院的选举中，共和党的候选人得了六千多张选票，而保皇党，或者像此地称之为“贝都英”^①的候选人只得了约九百张选票。被选入大会议的人几乎全都是共和党人，只有一

① 贝都英——原意是沙漠中的阿拉伯游牧人，转意是在沙漠中巡回传教的教士。——译者注

个由贵族统治的小山村勒庞才把昔日普鲁士国王属下的诺恩堡公国的国家枢密官卡拉姆作为自己的代表派到纽沙特尔去，这位卡拉姆在几天以前不得不在纽沙特尔宣誓效忠于共和国。在这个州的工业最发达、共和情绪最浓的第一大城市——拉绍德封，旧的王国的“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报”如今已被“纽沙特尔共和主义者报”⁷取而代之；后面这家报纸很不坏，虽然它是用瑞士汝拉山脉一带使用的极端蹩脚的法文出版的。

汝拉山脉的钟表工业和特拉韦尔斯塔尔区^①的花边业是这个小国家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两种行业的情况现在也日益好转。尽管这里的皑皑白雪达一英尺之厚，山中居民往日的欢乐和活力却逐渐苏醒。而“贝都英”现在则神色忧郁，四处流浪，徒劳无益地在自己的裤子、衬衫和帽子上标示出普鲁士的颜色，感慨万千地幻想着可敬的普富尔回来，盼望着开头写着《Nous Frédéric-Guillaume par la grâce de Dieu》（“朕，弗里德里希-威廉，受命于天”）字样的法令重现。在这里，在汝拉山脉，在海拔三千五百英尺的高地上，就像在我们莱茵河地区一样，普鲁士的颜色、白边黑帽给人一种忧郁的感觉，引起猥亵的嘲笑；如果不是瑞士的国旗和写着《République et Canton de Neuchâtel》的巨幅招贴，你一定会以为是在自己家里。此外，我高兴地告诉你们：德国工人在纽沙特尔的革命中也像在 1848 年的各次革命中一样，起了决定性的、非常光荣的作用。因此贵族才那样切齿痛恨他们。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1 月 7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1 日“新莱茵报”
第 14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法国称作：瓦尔·德·特拉韦尔。——编者注

新的代表机构。—— 瑞士运动的成绩

伯尔尼 11 月 9 日。前天，联邦的新立法机关—— 瑞士的国民院和联邦院 [Ständerat] 在这里聚会。伯尔尼城尽一切力量最隆重、最殷勤地迎接会议的召开。载歌载舞、庆祝游行、鸣钟放炮、张灯结彩，一切庆贺的仪式应有尽有。会议在同一天，即前天开幕。按人口比例 (伯尔尼选派二十名议员，苏黎世选派十二名议员，最小的州选派两至三名议员) 普选产生的国民院，绝大部分是由带有激进色彩的自由党人组成的。坚决的激进党拥有大量的当选证，而保守党在总共一百多张票中只占有六七票。联邦院 (其中每个州有两名议员，每个半州有一名议员)，按其成员和性质看来，它与最后一届联邦代表会议 [Tagsatzung]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各旧州 [Urkantöni] 又选派了宗得崩德⁸ 的一些忠实信徒，同时由于间接选举的结果，反动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在联邦院的代表仍然比在国民院多。一般说来，联邦院是由于废除了绝对当选证⁹ 和承认半州有表决权而革新了的联邦代表会议；它被新组成的国民院排挤到次要地位。联邦院扮演着忘恩负义的上议院或贵族院的角色，扮演着同力求革新的 (如所预料的那样) 国民院相对抗的角色，扮演着自己祖先卖弄聪明和谨小慎微的才能的继承人的角色。这个可敬的庄严的机关现在就已分担了它的伙伴的命运，它的伙伴中有两上目前依然健在，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而第三个已

经在法国寿终正寝。联邦院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自己生命的标志，报刊就已经瞧不起它，而只报道国民院的情况。几乎没有一个人谈论联邦院，如果它使人们谈论它，那对它更加不妙。

国民院本来应该代表瑞士的全体“国民”，可是它的第一次会议就表明，如果说它不是狭隘的州精神的榜样，那无论如何也是地道的瑞士人争吵和打小算盘的典型。选举国民院的议长需要投三次票，尽管只有三个候选人有真正当选的机会，而且三个都是伯尔尼人。这就是奥克辛本、丰克和诺伊豪斯三位先生；前两位是伯尔尼老激进党人的代表，第三位则是半保守的老自由党的代表。最后，在九十三票中奥克辛本先生获得了五十票，以极微弱的多数当选。苏黎世人和其他的 moderados (温和派)¹⁰ 推举精明老练的诺伊豪斯来与奥克辛本先生相抗衡，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但是，同奥克辛本属于同一派别的丰克先生却被提出来作为奥克辛本的竞选者，并且两次参加投票，这种情况说明他们的党是多么松弛涣散。不管怎样，由于奥克辛本的当选，激进党人在党派竞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取得了胜利。在以后的副议长的选举中，直到第五次投票才获得了绝对的多数票！与此相反，庄严的、经验丰富的联邦院在第一次投票中就几乎一致地选出苏黎世的 moderado 富勒尔为议长。这些选举已经充分地证明，两个议院的精神多么不一致，不久以后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分歧和冲突。

争论的另一个有趣的对象，将是关于联邦的首都问题。瑞士人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物质利益上同这个问题有关；而外国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是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最能说明陈旧的乡土观念和各州的局限性消除到什么程度。伯尔尼、苏黎世和琉森竞争得最为激烈。伯尔尼想极力证明（虽然徒

劳无益), 苏黎世有了联邦大学就应当满足, 琉森有了联邦法院 [Bundesgericht] 就应当甘心。无论如何伯尔尼是唯一合适的城市, 因为它是由瑞士德语区进入瑞士法语区的要道, 因为它是最大州的首府, 因为它正在成为整个瑞士运动的中心。显然, 为了能起某种影响, 伯尔尼也应当有大学和联邦法院。但您试一试向瑞士人讲清这个道理, 您就会知道, 每一个瑞士人都是本州首府的狂热的拥护者! 很可能是这样: 较激进的国民院将投票赞成激进的伯尔尼, 而庄严的联邦院则投票赞成庄严而贤明的苏黎世。这样一来, 的确不容易找到出路。

三个星期以来, 日内瓦群情激昂。在国民院的选举中, 那些因为拥有讲究的别墅而使日内瓦周围的村庄几乎全都处于封建依附关系下的反动贵族和资产者, 在他们的农民的帮助下选出了所有三个候选人。但委员会宣布这次选举无效, 因为收回的选票比发出的选票多。只有这样宣布选举无效才使圣约尔维的革命工人安静下来, 他们本来已经成群结队地在街头游行, 并且高呼: 《Aux armes!》 (“拿起武器来!”) 工人在后来八天中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威胁性, 使得资产者宁肯完全不参加投票, 也不愿挑起他们认为必然会带来灾祸的革命; 不仅如此, 政府也威胁说, 如果反动的候选人再次当选, 它就辞职。与此同时, 激进党人更动了自己的竞选名单, 提出了几个比较温和的候选人, 弥补了原来宣传鼓动方面的缺点, 所以在新的选举中获得了五千到五千五百张选票, 几乎比反动派在前次选举中所得的票数多一千票。反动派的三个候选人几乎完全没有得到选票。得票最多的是杜福尔将军, 他获得了一千五百票。八天之后, 举行了大会议的选举。城市选出了四十四名激进党人, 应当选出四十六名大会议议员的乡村选出的几乎全是反动分

子。“日内瓦评论”¹¹还在继续同资产阶级报纸争论下面这个问题：当选的这四十六名议员全都是反动分子呢还是其中一部分将投票赞成激进党政府。这一点不久就会见分晓。日内瓦的情况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如果这里由人民直接选出的政府被迫辞职，那末在重新选举时就很容易发生像在重新选举国民院议员时发生过的那种情况，即将有一个激进党政府与大会议中反动派的多数相对峙。但是不容置疑，日内瓦的工人正在等待着有利时机，以使用新的革命来巩固目前已受到威胁的 1847 年的成果¹²。

总的说来，瑞士比四十年代初迈进了很大的一步。但是，任何一个阶级的变化都不像工人阶级那样显著。在资产阶级中间，特别是在古老的贵族家庭中，几乎仍然完全笼罩着旧的狭隘的地方精神，最多只是采取了比较现代的形式，而瑞士的工人却有了巨大的进步。过去他们同德国人不相往来，荒谬地炫耀自己“自由瑞士”的民族傲慢，怨恨“外国坏蛋”，并且不参加当前的运动。现在，一切都变了。自从劳动条件恶化以来，自从瑞士民主化以来，特别是自从像巴黎六月战斗和维也纳十月战斗这样的欧洲革命和搏斗代替了微小的骚动以来，瑞士工人愈来愈多地参加了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开始把外国工人，特别是德国工人看作自己的弟兄，再不以自己的“自由瑞士精神”而妄自尊大了。在瑞士法语区以及在瑞士德语区的许多地方，德国人和操德语的瑞士人亲密无间地组成统一的工人联合会，同时，瑞士人占绝大多数的一些联合会决定同还在筹备中的以及一部分已经成立起来的德意志民主联合会的组织合并。官方瑞士的激进党人中最激进的分子最多只是在幻想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海尔维第共和国，而从瑞士工人那里却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见：欧洲大风暴即将来临，小小瑞士的全部独

立自主精神很快就会见鬼！这些无产者在谈这些“叛变”思想的时候，非常冷静、淡漠，毫不惋惜！我所遇见的所有瑞士人都非常同情维也纳的战士，而工人的这种同情则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关于国民院、联邦院、夫赖堡教会人士的骚动¹³，根本无人提起，可是关于维也纳，人们从早到晚都在谈论。人们会以为，像退尔¹⁴时代以前一样，维也纳又成了瑞士人的首都，瑞士人又变成奥地利人了。传说纷纭，人们对这些传说争论不休，怀疑它们，相信它们，再次驳斥它们，推测各种各样的可能，最后，当英雄的维也纳工人和大学生在文迪施格雷茨的优势力量和野蛮进攻下遭到失败的消息被证实时，在瑞士工人中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似乎在维也纳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好像他们祖国的事业在那里遭到了失败。当然，这种情绪还不能认为是普遍的，但它在瑞士无产阶级中间已经日渐扩大。这种情绪在许多地方已占优势，对于像瑞士这样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1 月 9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新莱茵报”
第 14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的反革命

—

科伦 11 月 11 日。普富尔内阁是一个“误会”；它的真正涵义是勃兰登堡内阁。普富尔内阁仅仅是内容介绍，而勃兰登堡内阁才是内容本身。

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¹⁵

这就是勃兰登堡家族的墓志铭！¹⁶

查理五世皇帝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还在活着的时候就下令埋葬自己。¹⁷但是，在自己墓碑上写上恶作剧的笑话，这比查理五世及其刑律¹⁸要更胜一筹。

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

有一次，普鲁士的某个国王莅临议会。他不是真正的勃兰登堡。但是，两天以前出席议会的勃兰登堡侯爵，却是真正的普鲁士国王。

警备部在议会，议会在警备部！这就是说，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

也许勃兰登堡中的议会（大家知道柏林是在勃兰登堡省内）会战胜……议会中的勃兰登堡吧？勃兰登堡会不会像从前卡佩特在另一个议会中寻求保护那样，也在议会中寻求保护呢？¹⁹

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这是一个寓义多么深长、包含着多少事件的语涉双关的公式啊！

大家知道，人民对付国王比对付立法议会要容易得多。历史上有过许多次人民反对国民议会的毫无结果的行动。其中只有两次重大事件是例外。英国人民通过克伦威尔驱散了长期国会，而法国人民通过波拿巴驱散了立法团。但是，长期国会长期以来就已是仆从，立法团则早已是僵尸。

在反对立法议会的叛乱中，或许国王比人民取得了更多的胜利？

在这方面，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路易十六和查理十世都是前辈中很少令人欣慰的人物。

不过，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倒有比较令人慰藉的先例。而不久前在维也纳呢？

不应忘记，在维也纳召开过民族代表大会，除波兰人而外，斯拉夫民族的代表都公开投入皇帝的阵营²⁰。

维也纳权奸与国会之间的战争同时也就是斯拉夫国会反对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战争。相反地，柏林议会中的分裂并不是斯拉夫人引起的，而是奴隶^①引起的，而奴隶并不是政党，最多不过是政党的仆从。临阵脱逃的柏林右派²¹并没有使敌人的阵营更为强大，反而使它染上了背叛这种不治之症。

在奥地利，斯拉夫党同权奸一起赢得了胜利，现在它将同权奸争夺胜利的果实。如果柏林权奸取得胜利，它就用不着同右派分享胜利或者为保卫胜利而反对右派了；它将先给右派一点甜头，然后

① 俏皮话：《Slaven》——“斯拉夫人”，《Sklaiven》——“奴隶”。——编者注

再踢他们一脚。

普鲁士国王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理直气壮地以专制国王的身分与议会相对抗。但是议会却没有理直气壮地进行活动，没有以专制议会的身分来与国王相对抗。本来议会首先应当通过逮捕大臣们的决定，因为他们是国事犯——出卖人民主权的国事犯。本来议会应当驱逐一切违抗议会命令而服从其他命令的官吏，并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

然而，国民议会在柏林表现出来的政治软弱性在各省里可能会变成它的市民力量。

资产阶级是很愿意通过友好的协商把封建王国变成资产阶级王国的。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封建党派的有辱资产阶级尊严的徽志和封号以及和封建所有制相关联的、破坏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收入之后，它是很愿意同封建党派结成联盟并同它一起奴役人民的。但是旧官僚不甘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封建党派不愿为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最后，国王把旧的封建社会（他作为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异己的、人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只能凋萎。

资产阶级把“受命于天”的非凡的权利变成以文件作根据的平凡的权利，把贵族血统的统治变成一纸公文 的统治，把王国的太阳变成资产阶级的星灯。

因此，王权没有接受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的劝说。国王用彻底的反革命回答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革命。他把资产阶级推回革命的怀抱，推回人民的怀抱，因为他宣布说：

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

我们承认，我们不期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符合形势要求的答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指出，国王在起而反对国民议会时也采取了伪善的、不彻底的态度，就在他试图抛弃宪法这个累赘的外罩的同时，又把自己的脑袋藏到这个外罩下面去了。

勃兰登堡在设法使德意志中央政权给他发出实行政变的命令。近卫军团已遵照中央政权的命令开进了柏林。柏林的反革命是按照德意志中央政权的命令行动的。勃兰登堡命令法兰克福议会给他发出这样的命令。议会在正想确立自主权的时候放弃了自主权。不言而喻，巴塞爾曼先生便双手抓住这个机会，以主人的身分扮演奴仆的角色。而且他竟因为主人扮演奴仆的角色而感到愉快。

不管柏林将遭遇到怎样的命运，二者必居其一：国王或者人民，而人民高呼着“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这个口号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也许我们还要经历一场艰苦的锻炼，但这场锻炼将是彻底革命的准备。

二

科伦 11 月 11 日。欧洲革命在完成自己的循环过程。它开始于意大利，在巴黎具有了全欧性质，在维也纳，我们听到了二月革命的第一个反响，在柏林，我们又听到了维也纳革命的反响。在意大利，在那不勒斯，欧洲反革命实行了它的第一次打击，在巴黎——在六月的日子里——它具有了全欧性质，在维也纳，我们听到了六月反革命的第一个反响，在柏林，它正在完成，并丢自己的脸。高卢雄鸡将会再一次从巴黎用自己的叫声唤醒欧洲。²²

但是在柏林，反革命在丢自己的脸。在柏林，一切都是丢脸的，甚至连反革命也不例外。

在那不勒斯，流浪汉同王权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

在巴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极其伟大的历史战斗。资产阶级同流浪汉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

在维也纳，有许多民族期望从反革命那里获得自己的解放。除此而外，还有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和大学生军团^①的阴谋诡计，市民自卫团内部的倾轧。最后，人民方面的攻击给宫廷方面的攻击提供了借口。

在柏林完全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和人民站在一边，下级军官站在另一边。

^① 大学生军团由维也纳大学学生组成，是市民军事组织中最激进的一个组织。——译者注

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两个没有头脑、没有心肝、没有主见的人物，不折不扣的丘八——这就是怨天尤人、自作聪明和犹豫不决的国民议会的对立面。

意志——哪怕是驴的、牛的、丘八的意志！意志——这就是同三月革命中那些意志消沉的抱怨派对抗的唯一法宝。像国民议会一样没有意志的普鲁士宫廷，在君主国中找到了两个最愚蠢的人，并对这两只狮子说：你们作意志的代表吧。普富尔还稍微有一点头脑。但是，在绝对愚蠢面前，三月胜利的清谈家们终于惶恐地退却了。

“对付愚蠢，连诸神也束手无策”²³，——

惊愕的国民议会这样感叹道。

这些弗兰格尔，这些勃兰登堡，这些笨蛋只会希望，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们总希望别人给他们下命令，他们实在太愚蠢了，毫不怀疑别人用颤抖的声音和发抖的嘴唇给他们下的命令，——他们也使自己大为丢脸，因为他们没有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而这是这些攻城槌所能干的唯一的事情。

弗兰格尔只会声明他仅仅承认服从命令的国民议会！勃兰登堡正在学习议会的风度。他用粗野的令人厌恶的下级军官的行话触怒了议会之后，对于“比暴君还暴虐的行为”听之任之，并且服从国民议会的命令，卑躬屈膝地请求允许他发表他刚刚想要发表的演说。

“我情愿做羊身上的一只虱子，
不愿做这种没有头脑的勇士！”²⁴

柏林的沉着使我们感到高兴，使普鲁士下级军官的理想遭到

了破灭。

可是国民议会呢？为什么它不主张 *mise hors la loi*（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呢？为什么它不宣布弗兰格尔之流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呢？为什么没有一个议员在弗兰格尔的刺刀从中挺身而出，要求驱逐弗兰格尔，并向士兵们发表演说呢？

让柏林国民议会浏览一下“通报”²⁵——1789—1795年的“通报”吧！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或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因为这些英雄好汉正在向黑格兰人²⁶学习阿拉伯语，——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知道了。

要战胜王权只有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只有在即将于12月发生的反对巴黎六月革命的事件到来之前才存在²⁷。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王权呢？

应当用饥饿来制服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只有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三

科伦 11 月 13 日。正像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有一次发现官方指定的开会场所被封闭了而不得不到**体育馆**去继续开会一样，普鲁士国民议会也被迫迁到**靶场**开会去了。²⁸

本报今天早晨出版的号外上，刊载了一篇以●为代号的本报驻柏林记者所写的关于在靶场通过的决议的报道。根据这个决议，勃兰登堡已被宣布为国事犯。“科伦日报”²⁹在报道中对这一点只字未提。

同时，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国民议会议员的一封信。现将信中的一段照抄如下：

国民议会一致（二百四十二票）宣布：由于这一措施（解散市民自卫团），勃兰登堡已把自己置于国事犯的地位，同时，每一个积极地或消极地促使上述措施付诸实现的人，都应视为国事犯。

杜蒙的报道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是众所周知的。

由于国民议会宣布勃兰登堡为国事犯，纳税的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谁也没有义务向叛国政府纳税。明天，我们将详细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在最古老的立宪国家——英国，在发生类似冲突时人们是如何拒绝纳税的³⁰。其实，叛国政府本身向人民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它已立即停止向国民议会纳税（停发议员的薪俸等等），以便用饥饿来制服它。

上述那位议员继续写道：

“市民自卫团决不交出武器。”

因此，斗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莱茵省的职责就是赶快用人员和武器支援柏林国民议会。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11、13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2 日和 14 日

“新莱茵报”第 141 号、第 141 号

增刊和第 14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这组连载文章中的第三篇
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芬雅克和六月革命³¹

艾·日拉丹为专制帝王中的白痴、“小警察”³²路易-拿破仑辩护得很拙劣，但是对卡芬雅克，对马拉斯特先生的这把利剑却攻击得很不错。从11月7日起，日拉丹先生在报上连续刊载了一系列痛骂这位**欧洲资产阶级的英雄**的文章。欧洲资产阶级爱上了这位英雄的阿拉伯睡帽³³，但是为了欧洲小店主当今的偶像——“西彼赫萨拉尔”^①耶拉契奇，他们照例背信弃义地牺牲了自己的英雄。

我们现在把“新闻报”³⁴的这份 *acte d'accusation* (起诉书) 全文介绍给读者。我们与欧洲所有的大小报纸不同，我们对六月革命的评价已为历史所证实。我们认为有时回顾一下**六月革命**的主要关键和主要人物是必要的，因为六月革命是欧洲革命和反革命所围绕着旋转的轴心。正如我们在六月革命爆发时所说的，离开六月革命，就是向要波及全欧洲的反革命的顶点靠近。回到六月革命去——这才是欧洲革命的真正开端。那末，我们就来看一下**戒严的发明者卡芬雅克**！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1月13日
载于1848年11月14日“新莱茵报”
第142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① 即总司令。——编者注

莱茵省民主主义者 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³⁵

呼 呼 书

科伦 11 月 14 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号召莱茵省各民主团体立即召开会议，并在附近各个地区举行民众大会，发动莱茵省全体居民拒绝纳税；这是反抗政府以暴力对待普鲁士人民代表会议的最好办法。

必须劝告居民，叫他们不要用任何暴力反抗可能按行政方式进行的征税；同时应该建议居民在强制出售财产的情况下不要进行交易。

为了讨论今后必须采取的措施，区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召开各民主团体代表会议，请各位代表于本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九时出席（地点：科米迪安街埃塞尔大厅）。

区域委员会代表：

卡尔·马克思 施奈德尔第二

1848 年 11 月 14 日于科伦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
“新莱茵报”第 14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内阁在被告席上

勃兰登堡城根本不知道勃兰登堡内阁，它向国民议会发出一封致谢书。

全国各地在自己的致意书中都只承认国民议会的权力。

内阁在犯新的叛国罪行，它破坏 Habeas Corpus Act³⁶，未经国民议会同意即擅自宣布戒严，并用武力从靶场驱散国民议会。

国民议会的会址是在人民群众中，而不是在什么由大块石头砌成的建筑物中。如果它被赶出柏林，它将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开会，在布勒斯劳^①，科伦或者它认为适当的其他城市。它在 13 日的会议上已经通过了这样的决议。

柏林人嘲笑戒严，他们根本不打算服从它。没有一个人会放下武器。

武装起来的人们从各个地方赶来援助国民议会。

近卫军拒绝服从命令。士兵们愈来愈经常地同人民举行联欢。

起义已席卷了西里西亚和图林根。

公民们，我们号召你们捐款给柏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相反地，不要向反革命政府缴纳任何赋税。国民议会曾经声明，拒绝纳税是有法律根据的。只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作出相应的决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议,因为它顾全官吏们的利益。**饥饿疗法**将教会这些官吏尊重公民的力量,将使们成为好公民。

迫使敌人挨饿吧,不要纳税!向叛国政府提供各种反人民的手段是最愚蠢不过的了,而一切手段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金钱**。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新莱茵报”

第 143 号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声 明

科伦 11 月 16 日。11 月 16 日“科伦日报”把“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和似乎由普鲁士国民议会极左派在各省散发的关于拒绝纳税的“保证性的声明”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对于极左派散布的国民议会已作出拒绝纳税的决定的消息毫无所闻，特此声明。

卡·马克思 施奈德尔第二

写于 1848 年 11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145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良心的忏悔³⁷

科伦 11 月 16 日。我们曾向右派预言，如果权奸获胜，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先给他们一点甜头，然后再踢他们一脚^①。

我们弄错了。斗争的胜负还未见分晓，他们就已经挨到了自己的主子的脚踢，而什么甜头都没有尝到。

“新普鲁士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后备军十字骑士”³⁸，目前当权者的官方机关报——在最近几天的某一号上，把议员茨魏费尔（科伦检察长）和议员施林克（科伦上诉法院参事）称为——读者，你猜猜看称为什么？——“革命之腹[Magen]”（在“新普鲁士报”上写的是：《ägen》）。它谈到了这两位先生的“难以形容的思想贫乏和言行轻率”。它发现甚至“罗伯斯比尔的呓语”也比这两位“中央机构的先生们”的幻想高超得多。A vis à Mess. Zweifel et Schlink!（特此通知茨魏费尔和施林克两位先生！）

在该报的同一号上，品托-汉泽曼³⁹被宣布为“极左派的领袖”，而这家报纸知道，对付极左派的领袖只有一种手段——战地法庭、绞索。A vis à M. Pinto-Hanse mann（特此通知品托-汉泽曼先生），前任行动和警察大臣⁴⁰！

① 见本卷第 15—16 页。——编者注

作为政府通报，“新普鲁士报”实在太天真、太坦率了。它过于响亮地向各种党派泄露了 *santa casa*⁴¹的记录簿中秘而不宣的东西。

在中世纪，人们想要预见未来，就向味吉尔^①请教。在1848年普鲁士雾月期间，人们为了不致因预见未来而绞尽脑汁，就向“新普鲁士报”请教。我们不妨举几个新的例子。权奸给天主教徒准备了些什么东西呢？

请听吧！

在“新普鲁士报”第115号上这样写道：

“认为国家（即普鲁士王国，三月时期以前的后备军十字国家）^②仿佛具有狭隘的教会性质，并从这种片面观点出发来领导宗教事务，这同样是不正确的。的确，这种指责如果是公正的话，那无疑会是一种赞扬。但它是不公正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政府已明确表示放弃旧的合乎福音的管理方式的良好立场。”

大家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曾把宗教变成军纪的一个部门，并用警棍来开导非国教徒。大家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作为十二小先知之一，想通过艾希霍恩—博德尔施文克—拉登堡内阁用暴力使人民和科学皈依本生的宗教。大家知道，甚至在康普豪森内阁时期，波兰人还是照样被掠夺、被烧死、被鞭笞，不只因为他们波兰人，同时还因为他们天主教徒。波美拉尼亚人总是认为，应当用军刀刺穿波兰的圣母像并且绞死天主教神甫。

① 味吉尔是古罗马诗人，他的诗歌中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智慧，人们用他的诗来测定吉凶。——译者注

②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期，迫害反对国教的新教徒的事实也是尽人皆知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把那些拒不接受他本人所发明的祈祷仪式和教义的新教牧师关进要塞。这位大人物是军装和祈祷仪式的伟大发明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呢？艾希霍恩内阁呢？只要提一下艾希霍恩内阁就够了。

但是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我们政府已明确表示放弃旧的合乎福音的管理方式的良好立场。”

那末，莱茵省、威斯特伐里亚和西里西亚的天主教徒们，等着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复辟吧！过去别人用树条抽打你们，今后将用蝎尾鞭抽打你们。你们将“明确地”认识到“旧的合乎福音的管理方式的良好立场”！

我们更不用说犹太人了，从他们的教派解放以来，他们，至少是他们的上层人物，到处都成了反革命的急先锋。他们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等不到胜利，就会把他们扔回犹太人区去的。

在勃罗姆堡^①，政府对犹太人恢复了限制迁徙自由的旧规章，从而剥夺了犹太人享受 1789 年宣布的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从一个地方自由迁往另一个地方的权利。

这就是在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拉登堡庇护下的饶舌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绩的“一个”方面。

11 月 11 日的“新普鲁士报”侈谈物质福利，以诱惑“自由立宪

^① 波兰称作：贝德哥什。——编者注

党”。然而就在当时，在谈到立宪主义者的时候，它已经忧心忡忡地摇头不已。

“直到现在，我们的立宪主义者还非常害怕在他们的俱乐部和公众机关公开承认自己是反动派。”

但是，该报又立即以安慰的口气中肯地补充说：

“每一个人（自由立宪主义者）私下就不再隐瞒：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合法的反动”，——

也就是把法律变成反动的，或者把反动派变成合法的，以便把反动奉为法律。

11月15日的“新普鲁士报”对“立宪主义者”已经不再讲什么客气了，因为他们已打算把反动奉为法律，但是他们不肯接受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因为后者想 sans phrase（露骨地）进行反革命。

该报写道：“应当让普通立宪主义者听任自己命运的摆布！”

一同被捕，也一同上绞架！

特此通知普通立宪主义者！

在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拉登堡庇护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特殊立宪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官方的政府机关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后备军十字骑士”一语道破了特殊立宪主义的奥秘。

“最简单、最直接、最保险的特效药”，当然是“把议会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从首都迁到兵营里去，从柏林迁到勃兰登堡去。

但是，正像“新普鲁士报”无意中透露的那样，这种迁移会址的作法只不过是一种“试验”。

“新普鲁士报”说：“应当试验一下，议会在迁到另一个地方以后，是否不仅可以恢复外在的行动自由，而且还可以恢复内在的自由。”

在勃兰登堡，议会将有外在的自由。在那里，它不再受工作服的影响，而只是受大胡子长佩刀的影响^①。

而内在的自由呢？

议会在勃兰登堡是否能摆脱十九世纪的偏见和有害的革命情绪而自由呢？它的心灵是否会变得如此自由，以致可以把封建的狩猎权和其他一大堆腐朽的封建义务、等级差别、书报检查、捐税不均、贵族特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热中的专制王权和死刑，以及把

“那些外表上像有着
慈爱、希望和信仰的苍白的恶汉”⁴²，——

即贪得无厌的容克地主、近卫军中尉和钻营奔走之徒对国民劳动的盗窃和挥霍等等，——把所有这些旧时耻辱的标志重新宣布为正式的信仰象征，即使在勃兰登堡，国民议会是否有足够的内在的自由来做到这一点呢？

大家知道，反革命政党曾宣布过一个宪政口号：“完成制宪工作！”

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拉登堡内阁的机关报不愿意再戴这个假面具了！

这家官方的机关报承认：“事态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现在即使是如此殷切期待完成的制宪工作，对我们说来也无济于事了。因为谁也不能再隐瞒：授意人民代表提出的，并且在拷问台和绞刑架的威胁下由这些代表用强

^① 工作服指穿工作服的劳工，同时也指革命者；大胡子长佩刀指警察。——译者注

力逐条逐款地从国王那里夺来的文件，只有当它得到最粗野的暴力的保护的时候，才能被认为是具有约束力的。”

于是，重新逐条逐款地取消柏林国民议会所争得的一点点人民的权利，就成了勃兰登堡国民议会的任务！

如果它不能逐条逐款地彻底恢复全部旧的废物，那末这就证明：即使它在勃兰登堡获得了“外在的行动自由”，它也还是没有恢复波茨坦所期望的内在的自由。

政府究竟应当怎样来反对灵魂上的痼疾，反对迁到勃兰登堡去的议会的内在的不自由呢？

“应当解散它！”——“新普鲁士报”这样喊道。

但是，人民——它忽然想到，——也许比议会更没有内在的自由吧！

它耸了耸肩说：“令人担心的是，新的初选是否会产生比上次选举更悲惨的结果呢？”

人民在初选中享有外在的行动自由。但是内在的自由怎么样呢？

That is the question! (问题就在这儿!)^①

要知道，新的初选产生的议会制定的条款可能比旧的条款更富有叛乱性。

那末，怎样着手反对“旧的”条款呢？

“后备军十字骑士”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拳头产生了它们(3月19日以后制订的旧条款)，拳头也将以上帝和法律的名义消灭它们。”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编者注

拳头将恢复“旧的良好管理方式”。

拳头是国王的最后论据，拳头也将是人民的最后论据。

让人民首先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受到贪得无厌的拳头的打击，这种拳头正从人民的口袋里掏出皇室费和……大炮。只要人民不再喂养这种耀武扬威的拳头，它马上就会干瘪。让人民首先拒绝纳税，然后再来数一数，看哪一边的拳头多。

一切所谓三月的成果，只有在能够得到最粗野的暴力的保护的时候，才能被认为是具有约束力的。拳头产生了它们，拳头也将消灭它们。

“新普鲁士报”就是这样说的，“新普鲁士报”所说的话也就是波茨坦所说的话。因此，丢掉幻想！人民应当肃清三月的妥协，否则，国王就要肃清人民。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145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科伦日报”

科伦 11 月 16 日。“科伦日报”编辑部在 11 月 16 日的该报上登了一段绝妙的自白：

“我们今天害怕无政府状态，明天又害怕反动派，在这种经常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使人不禁想起了路德的一句话：‘人就像喝醉了的农夫，从这边爬上马背，又从那边摔下去。’”

恐惧——这就是“科伦日报”的激情。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16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14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打倒捐税!!!

科伦 11 月 16 日。今天除了“普鲁士国家通报”、“福斯报”⁴³和“新普鲁士报”以外，柏林的其他报纸都没有收到。

市民自卫团在“枢密官区”⁴⁴被解除了武装，但只是在这一个区。这里指的是 10 月 31 日阴险地枪杀机器制造工人的那一个营⁴⁵。解除这个营的武装是有利于人民事业的。

国民议会又被用武力赶出科恩市政厅⁴⁶。在这以后，议员们都转移到了米连茨旅馆，在那里，他们终于以二百二十六票一致通过一项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本决议自 11 月 17 日起生效。

国民议会，11 月 15 日”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16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145 号特别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艾希曼的命令

科伦 11 月 18 日。

众所周知的拒绝纳税的号召，使我有责任为此向我受委托管辖的莱茵省提出严重警告。

在国王正式阐明了把国民议会迁出柏林的有力理由以后，在大部分议员都承认了国王的权力，而德意志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中央政权也都同意了这种承认以后，我不打算赞同莱茵省居民对政府这一行动所表示的意见。

我的职责要求我必须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反对任何侵犯法律和阻挠其实施的行为，因为不如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我认为拒绝维持秩序和法制所必需的捐税的号召就是这种侵犯行为，因为这种捐税是由法律规定的，因此也只能由法律来改变。

根据个人的切身经验，我知道我省居民是很尊重法律的，因此我不能设想，他们竟会走上势必招致严重后果的破坏法律的道路；相反地，我确信他们将坚定不移地击退这种侵犯他们的荣誉和公共福利的行为。如果出乎所料，我的这种信心丧失了，那末我盼望所有省级和地方权力机关使用法律所授予它们的一切权力来迫使居民纳税，并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莱茵省总督

(签名)艾希曼

1848 年 11 月 17 日于科伦

这就是前任大臣和现任总督艾希曼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①的答复。

当艾希曼先生给帖撒罗尼迦人发出这个文告的时候，他是否知道国民议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呢？

过去艾希曼曾经在普富尔政府里代表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

^① 见本卷第 24 页。——编者注

派。现在他又以莱茵省首脑的身分代表他们。艾希曼——这是**执政派反革命势力**在莱茵省的化身。

因此，艾希曼先生的命令与勃兰登堡先生的命令具有同等的价值。艾希曼先生这条好汉在青年时代就毫不倦怠地热心于把“国事犯”关进要塞，他迟早总会由于**叛国罪被交付法庭审判**，从而罪有应得地结束他的官场生涯。

和著名的君主主义者西里西亚总督**品德尔**先生完全相反，艾希曼总督先生在上述命令中宣布他是国民议会的公开敌人。因此，艾希曼先生已不再是总督了，就像他的顶头上司勃兰登堡已不再是大臣一样。艾希曼先生自己解除了自己的职务。执行他的反革命命令的官员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果莱茵省居民想要对国民议会给予比较实际的支持，而不单是呈递致意书，如果他们不愿意俯首帖耳地向鞭子屈服，他们就应当强迫所有负责官员，特别是**行政区长官、县长、市长和市政官员正式声明**：他们是否承认国民议会，是否打算执行它的决议？Oui ou non? (是或不是?) 如果他们拒绝发表这种声明，或者直接违抗国民议会的决议，那末，首先就应当把这些官员**革职**，然后，宣布他们是**国事犯**；应当任命各种临时**安全委员会**来代行他们的职务，这些委员会的命令应当看成是唯一合法的命令。凡是反革命当局用暴力手段阻挠这些安全委员会成立和活动的地方，都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1月18日
载于1848年11月19日“新莱茵报”
第14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呼 吁 书⁴⁷

科伦 11 月 18 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号召莱茵省各民主团体通过并实施下列措施：

(1) 在普鲁士国民议会本身已经作出拒绝纳税的决定以后，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税。

(2) 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给贫民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

(3) 各地都应该要求地方当局正式声明，它是否承认并愿意执行国民议会的决定。在遭到拒绝时，应该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镇委员会取得协议。市镇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会议，则应由该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代表

卡尔·马克思 卡尔·沙佩尔 施奈德尔第二

11 月 18 日于科伦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9 日
“新莱茵报”第 147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呼 吁 书⁴⁷

科伦 11 月 18 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号召莱茵省各民主团体通过并实施下列措施：

(1) 在普鲁士国民议会本身已经作出拒绝纳税的决定以后，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税。

(2) 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给贫民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

(3) 各地都应该要求地方当局正式声明，它是否承认并愿意执行国民议会的决定。在遭到拒绝时，应该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镇委员会取得协议。市镇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会议，则应由该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代表

卡尔·马克思 卡尔·沙佩尔 施奈德尔第二

11 月 18 日于科伦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9 日
“新莱茵报”第 147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呼 吁 书⁴⁷

科伦 11 月 18 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号召莱茵省各民主团体通过并实施下列措施：

(1) 在普鲁士国民议会本身已经作出拒绝纳税的决定以后，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税。

(2) 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给贫民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

(3) 各地都应该要求地方当局正式声明，它是否承认并愿意执行国民议会的决定。在遭到拒绝时，应该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镇委员会取得协议。市镇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会议，则应由该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代表

卡尔·马克思 卡尔·沙佩尔 施奈德尔第二

11 月 18 日于科伦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9 日
“新莱茵报”第 147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议关于夫赖堡州主教的决定(这个决定你们大概早就知道了⁵³),但是附有一些由于政府过去同罗马教皇所签订的条约而产生的不大的保留条件。教区的其他各州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该报接着说,只要各州关于批准的决议一送到,马利耶主教就会获释,因为夫赖堡州声明,它打算停止已经开始的就主教不久以前参加暴动一事对他进行的刑事侦查。

人们焦急地等着关于瑞士联邦首都的投票结果。如果伯尔尼没有选上(从联邦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中没有一个是伯尔尼人这一情况就可以觉察出这种预兆),这里就会发生运动,其结果将是奥克辛本下台,政权转入激进党多数派(施坦普弗利、尼格勒尔、施托克马尔等人)手中,并且修改刚刚通过的瑞士联邦宪法。问题在于:根据宪法,如果有五万名享有选举权的瑞士公民要求修改宪法,那就应当解散两院,重新选举新的议员。单是伯尔尼本身就能够毫无困难地征集这样多的签名,还不算那些可能从先进的罗曼区各个州来的、醉心于建立一院制和更大程度的中央集权的远景的广大群众。但是,关于瑞士两院投票结果的任何预测都是徒劳无益的。无穷分散性(这是联邦共和国的必然的历史产物)、难以描述的利益的互相交错,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奉为指南的各种动机的不可思议的混乱,——所有这一切使得有关可能性的任何猜测都变得毫无意义。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1 月 18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3 日“新莱茵报”
第 15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市 政 府

科伦 11 月 20 日。科伦市委员会向柏林呈递了一份请愿书，泪汪汪地哀求国王解散内阁，以便拯救王权。

科伦市政府，resp. (或者) 杜蒙先生之流面向国王，可是整个莱茵省都背向国王，面向制宪议会。杜蒙先生，resp. 市政府想拯救国王，而莱茵省只想拯救自己。好像拯救国王和拯救莱茵省是并行不悖的！当帝王们依靠戒严和炮轰来拯救自己的时候，市政府却想拯救国王。谁授权市政府去拯救国王，并向他呈递表现了科伦寄生虫们十足奴才式的摇尾乞怜行为的请愿书呢？在国王和科伦市政府之间发生了种种事件之后，科伦市政府却只是哀求再挨一顿脚踢。

如果科伦市政府关心柏林议员们的决议甚于关心国王的专制野心和拯救国王，它早就应该下令占领科伦市各个城门，以便阻止征税和执行国民议会的意志。因此，应当立即解散科伦市政府。司法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官吏，凡是不竭力阻止征税者，应一律当作国事犯看待。

如果科伦市不撤销它的市政府并立即派两名新的议员到柏林去接替逃跑的议员的席位，它就应当挨鞭子。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0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1 日“新莱茵报”
第 14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呼 吁 书

科伦 11 月 20 日。

莱茵省的民主主义者们！

著名的检察长**茨魏费尔**不对艾希曼总督发出法庭的传票，反而通过法院侦查员**洛伊特豪斯**对你们的委员会发出传票，指控它公开号召叛乱，要它明日出庭受审。

他们指望发生骚动。科伦卫戍司令部业已准备就绪。根据叛国内阁发布的命令，科伦将宣布戒严。

你们要粉碎这种企图。不管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都要保持镇静。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代表大会都要举行⁵⁴。

莱茵省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决不向军刀统治屈服。

卡尔·马克思 卡尔·沙佩尔 施奈德尔第二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1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48 号增刊

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 就拒绝纳税问题发布的公告

科伦 11 月 21 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已向王国各行政区政府发出了强行征税的命令。

建立在违法基础上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建议对拒绝纳税的人采取暴力手段，而对无力纳税的人予以宽大处理。

这样一来，内阁就把不纳税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种人不纳税，是因为执行国民议会的意志；另一种人不纳税，是因为纳不起税。内阁的意图昭然若揭：它想分裂民主派，它想唆使农民和工人把自己算做是无力纳税的人，以便把他们同那些根据法律拒绝纳税的人分开，从而使后者失去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但是这个计划是一定要破产的。人民懂得，他们对拒绝纳税负有连带责任，正如过去他们对纳税负有连带责任一样。

两种力量——纳税力量和征税力量之间的斗争将进入决战阶段。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1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新莱茵报”
第 14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检察长和“新莱茵报”

科伦 11 月 21 日。谁站在法律基础上，是艾希曼总督还是“新莱茵报”编辑？应当把谁关进监狱，是“新莱茵报”编辑还是艾希曼总督？这个问题现在要由以茨魏费尔为代表的检察机关来解决。以茨魏费尔为代表的检察机关将站在勃兰登堡内阁这一边呢？还是检察长茨魏费尔这个“新莱茵报”的老撰稿人⁵⁵将站在他的同事这一边呢？这个问题现在要由公众来解决。

早在国民议会通过决议以前，“新莱茵报”就坚决主张停止纳税了；早在立法机关维护法制以前，“新莱茵报”就已维护了法制。如果这种预先维护法制的行为是不合法的，那末“新莱茵报”编辑部在整整六天中就都是站在非法的基础上，茨魏费尔先生就应该在六天之内对我们进行侦讯，到了第七天他则应当抑制一下他的审讯狂了。

但是到了第七天，当世界已经创造完毕，茨魏费尔先生已在庆祝安息日，国民议会已明令颁布了拒绝纳税的法律的时候，艾希曼总督建议茨魏费尔先生开始审讯那些煽动拒绝纳税的人。谁煽动拒绝纳税？是“新莱茵报”编辑部还是柏林国民议会？茨魏费尔先生应当逮捕谁？——应当逮捕他的那些老伙伴柏林议员，还是他的老同事“新莱茵报”编辑，还是地方行政长官艾希曼先生？直到现在茨魏费尔先生还没有逮捕任何人。

因此,我们建议由另外一个茨魏费尔来逮捕茨魏费尔先生,因为他在安息日以前没有逮捕“新莱茵报”编辑,在安息日以后又没有逮捕艾希曼先生。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1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新莱茵报”
第 14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释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和科伦的检察机关

科伦 11 月 21 日。柏林检察机关在**国事犯**面前放下了武器。首席检察官泽泰先生没有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来对付国事犯勃兰登堡，却提出辞职。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力图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国民议会的合法决议，并号召粉碎**国事犯**的计划，竟被科伦检察官控告为参加**叛乱**(?!).

“强权即公理”。——公理的代表到处都站在**强权**那一边。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1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新莱茵报”
第 14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法兰克福议会

科伦 11 月 22 日。法兰克福议会宣布，柏林议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是违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这样，法兰克福议会就站到勃兰登堡那边，站到弗兰格尔那边，站到独特的普鲁士主义那边去了。法兰克福迁到了柏林，柏林则迁到了法兰克福。现在德意志议会在柏林，普鲁士议会则在法兰克福。普鲁士议会已变成了德意志议会，德意志议会则变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议会。普鲁士本应溶化于德意志，而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议会现在却希望德意志溶化于普鲁士！

德意志议会呵！在柏林和维也纳的严重事件以后，谁还会想到什么德意志议会呢？自从罗伯特·勃鲁姆被害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对高贵的加格恩的生平感到兴趣了。自从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组成以后，就连鬼也不再对什么施梅林感到兴趣了。以“创造历史”为乐趣的教授先生们只好容许了对维也纳的炮轰、对罗伯特·勃鲁姆的杀害以及文迪施格雷茨的野蛮行为！关怀德意志文化史的先生们竟听任某个耶拉契奇和他的克罗地亚人去实际运用文化！当教授们创造历史理论的时候，历史本身却继续急遽向前奔驰，根本不顾教授先生们的历史。

前天通过的决议断送了法兰克福议会。这个决议把法兰克福议会抛入了国事犯勃兰登堡的怀抱。法兰克福议会犯了叛国罪，应

当交付法庭审判。全体人民一致起来抗议国王的专横暴虐行为，这种抗议是用绝对合法的方法，即用拒绝纳税的方法实现的。而教授议会竟无理地宣布这种拒绝纳税、这种全民反抗为非法，既然如此，这个议会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就犯了叛国罪。

法兰克福议会中所有已投票反对这种决议的议员的责任，就是退出这个“已经寿终正寝的联邦议会”。全体民主主义者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退出议会的“普鲁士人”选为柏林德意志国民议会的议员，以代替离职的“德国人”。柏林国民议会不是一个“部分”，它是一个整体，因为它有权通过决议。而法兰克福的勃兰登堡议会将变成一个“部分”，因为无疑还会有许多其他不愿参与建立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议员赞成一百五十名议员（他们的退出议会已是必不可免）的举动。法兰克福议会呵！它害怕红色共和国，下令建立**红色君主国**！我们不要**红色君主国**，我们不希望涂上鲜红色彩的奥地利王冠把他的权力扩展到普鲁士领土上来，因此我们宣布：德意志议会犯了叛国罪！其实，我们给予议会的荣誉太多了，我们赋予它的政治意义它早就丧失了。对法兰克福议会已作了最严峻的判决：不理睬它的决议并——忘掉它。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3 日“新莱茵报”

第 15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到处戒严

科伦 11 月 22 日。我们曾经向科伦市政府预言，它向国王呈递请愿书，得到的回答将是一顿脚踢^①。我们搞错了。市政府的确遭到了脚踢，但不是遭到国王的脚踢，而是遭到曼托伊费尔—勃兰登堡的脚踢。Tant pis!（更糟！）其次，我们还说过，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通过以后，左派的责任就是退出议会^②。据我们了解，退出议会的不仅有左派，而且还有中间派左翼，以便成立一个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Tant mieux!（更好！）

到处戒严——这就是三月革命的成果。杜塞尔多夫宣布戒严了！宣布城市戒严，是为了占领它！普鲁士所有的城市都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戒严了，为的是重新占领它们。整个普鲁士都应当重新占领，因为整个普鲁士都愤怒地反对普鲁士。怎样实行戒严呢？用解除市民武装的办法。像科伦这样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城市，怎样才能再次宣布戒严呢？先把武器还给它。再次宣布科伦戒严——这就是说给科伦武器。戒严万岁！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3 日，“新莱茵报”
第 150 号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 43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50 页，——编者注

德意志中央政权⁵⁶和瑞士

科伦 11 月 24 日。在上一世纪的喜剧中，特别是在法国的喜剧中，总有一个奴仆无时无刻不在挨耳光，在效果最好的几场戏里，甚至被拳打脚踢，好让观众开心。扮演这个奴仆角色自然是费力不讨好的，但是，和我们法兰克福帝国剧院舞台上出现的角色，和帝国外交大臣的角色比较起来，却令人羡慕不已。因为喜剧中的奴仆至少还有一种报复手段——俏皮，而帝国大臣呢？

我们从公论断。1848 年没有一个外交大臣功成名遂。帕麦斯顿和涅谢尔罗迭因为没有人打扰他们而至今感到满意。以自己的宣言甚至赢得了德国老处女和寡妇的眼泪的夸夸其谈的拉马丁，也不得不带着他那铩羽折毛的两翼羞愧地退出了舞台。他的继承者巴斯蒂德，仅仅一年前作为正式战争宣告人还在“国民报”上和不太出名的“国民评论”⁵⁷上对基佐的懦怯政策表示义愤，可是现在，每当夜晚阅读自己的 *oeuvres complètes de la veille* (往日论著全集) 和痛苦地想到自己也一天天沦落到正直共和国的基佐的地步时，也默默地落泪了。但是，这些大臣们毕竟还有一桩事可以告慰自己：如果在大的方面他们不能夸功自诩，那末在小的方面，在丹麦、西西里岛、阿根廷、瓦拉几亚以及其他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他们却可以吹嘘一番。甚至普鲁士的外交大臣阿尔宁先生同丹麦缔结了一项不光彩的休战协定，也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觉得不仅

自己受了骗，而且他也骗了别人，——这个受骗者原来就是……帝国大臣！

事实上，帝国外交大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起着消极作用的人物。他承受打击，但是决不打击任何人。自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充当他所爱当的替罪羊，所有他的邻邦的同僚都向他发泄私愤，他们每个人在外交生活中遇到了这种或那种小小的不愉快时也要迁怒于他。即使被殴打、被撕裂，他也会像一头被牵去屠宰的羔羊一样默不作声。有谁能说帝国大臣曾经用指头戳过他一下呢？的确，德意志民族决不会忘记施梅林先生那样坚决一贯地恢复昔日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的勇敢行为。

我们是否还需要列举冯·施梅林先生的外交成就来证明他的顽强的耐性呢？我们是否需要重谈马克西·加格恩先生从法兰克福到什列斯维希的旅行，重谈这值得重复的已经仙逝的索菲娅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⁵⁸呢？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搬出同丹麦休战的大有教益的历史来呢？我们是否需要叙述一下在皮蒙特进行调解失败的建议和黑克舍尔先生为增长见识由帝国出钱而作的外交旅行呢？这样做没有必要。这些事实记忆犹新，而且极有说服力，因此根本用不着提起。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甚至最有耐性的人总有一天也会表明他是有牙齿的，——一个德国庸人这样说。忠实于这一阶级（我们可敬的国家伟人们称这一阶级为德意志人口中善良的绝对多数）准则的冯·施梅林先生终于也感到需要表明，他也是牙齿的。命定要做牺牲的羔羊开始寻找替罪羊了，而且认为它终于找到了这个替罪羊，这就是瑞士。瑞士是一个大约有二百五十万居民而且都是共和主义者的国家，是一个避难所，黑克尔和司徒卢威从这

里侵犯过德意志⁵⁹，扰乱过新的神圣罗马帝国——难道还能找到更好的同时又是更保险的机会来证明“大德意志”的牙齿是锋利的吗？

关于流亡者的阴谋活动的“强硬”照会立即送到了首府州⁶⁰伯尔尼。但是首府州伯尔尼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便用“小瑞士”的名义，以同样强硬的口吻回答了“大德意志”。这丝毫没有吓倒施梅林先生。他的牙齿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锋利了。10月23日他便写好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照会，并于11月2日送到了伯尔尼。这一次施梅林先生已用鞭策来威胁秉性乖张的瑞士了。伯尔尼的行动比帝国大臣更为迅速，仅仅过了两天就作了答复，口吻和过去一样沉着而坚定。因而，施梅林先生现在应当采取“命令和措施”来对付瑞士了。正如他在法兰克福议会上所宣布的，他正在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这种威胁是我们今年多次看到过的帝国所玩弄的最寻常的无耻把戏，我们便根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浪费笔墨了。但是，由于我们帝国的唐·吉诃德们，或者更确切些说，帝国的桑科们，在处理他们的巴拉塔利亚^①上的外交事务中行为轻率到了没法再轻率的地步，所以与瑞士发生的这次冲突自然也就给我们增添了各种新的麻烦。Quidquid delirant reges 等等。⁶¹

因此，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帝国给瑞士的照会。

大家知道，瑞士人的德语说得很糟，写得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和帝国内阁的学究气十足的、拙劣的词不达意的德语相比，从文体方面来看，首府州的复照简直可以说是出自歌德之手的完美无瑕

① 巴拉塔利亚是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中的一个幻想的岛屿的名称，桑科·判扎被委任为该岛的总督。——编者注

的杰作。瑞士外交官(据说是联邦总理席斯)好像故意要写得特别简洁、流畅和精练,以便在这方面也和帝国摄政王的照会形成一个讽刺性的对比,而帝国摄政王的照会即使由耶拉契奇的某个红斗篷^①来写,一定也不会写得更坏。在帝国照会中常常碰到许多根本无法理解的词句,此外,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还有许多极端拙劣的词句。难道这些词句不正是用“光明磊落(帝国摄政王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将始终把这种态度当做自己的义务)的语言”写成的吗?

就内容而言,施梅林先生的照会也不见得更好些。在第一段中他提到了

“这一事实,即在对本年6月30日的德意志照会提出答复之前,在持续数星期之久的联邦代表会议的会议上,对这个照会进行了辩论,辩论的语调使得德意志的代表当时无法继续留在瑞士(你们看这就是文体的典范!)⁶²。”

首府州是相当宽宏大量的,它根据联邦代表会议的记录向“帝国摄政王政府”证明,“持续数星期之久的”辩论仅仅是在唯一的一天中举行了唯一的一次小会。我们看到,我们的帝国大臣宁愿相信他的糊涂的记忆力,也不愿意查考文件。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找到不少例证。

其实,帝国摄政王政府可以把首府州的这种客气表示和帮助帝国摄政王政府纠正记性坏这个缺点的意愿,看作是瑞士的“睦邻态度”的证明。事实上,如果帝国摄政王政府在照会中敢于用同样的方式谈论英国议会中的辩论的话,冷酷高傲的帕斯斯顿马上便会请它滚蛋!普鲁士和奥地利驻伦敦公使可以告诉它,关于他们的国家和照会公开谈了些什么,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公使因此便

^① 红斗篷指奥地利边防军马队的兵士,他们身披红色斗篷,头戴红色鸭舌帽。——编者注

不可能留在伦敦。这些学究甚至自己也不懂得，在独立自主的议会的辩论中，与他们有关的只是做出的决定，而根本不是在那里所讲的话，可是他们却想给瑞士上国际法课！这些逻辑学大师在同一个照会中武断地说，“瑞士应当知道，对出版自由的攻击不可能来自德意志方面”（只要把这句话转载在“新莱茵报”上，就会成为一种辛辣的讽刺！），——他们竟敢侵犯一个国家机关（同时还是瑞士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辩论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原则是没有任何争论的。这里不牵涉到避难权和出版自由问题。瑞士应当知道，对这些权利的攻击不可能来自德意志方面。德意志不止一次地声明过，它不能容忍滥用这些权利。它断然认为，避难权不应当变成瑞士的行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变成对德意志的战争状态（避难权是战争状态，——这是什么话！）。被迫害者的栖身所和强盗们的巢穴之间应该有所区别。”

“强盗们的巢穴”！难道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以及哥特弗里德·巴塞在克韦德林堡出版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所有匪首，都率领他们的喽罗下了亚不路息山，来到莱茵河畔，要伺机抢劫上巴登了吗？或者卡尔·穆尔已从波希米亚森林开始出击了？是不是施因德汉斯⁶³还留下一个侄子，他想以“自己伯父的侄子”⁶⁴的身分从瑞士宣布要继承他的王朝的要求呢？完全不是这回事！被关在巴登监狱里的司徒卢威、司徒卢威夫人和几个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越境的工人——这就是在瑞士曾经有自己“巢穴”或者好像至今在那里还有这类巢穴的“强盗”。帝国当局并不满足于抓到了可以用来发泄它的忿怒的俘虏，它还恬不知耻地隔着莱茵河破口大骂那些幸而逃脱它的魔掌的人。

“瑞士知道，我们决不是要求它迫害出版物。问题不在于报纸和传单，而

在于它们的作者，这些人在国境线上日日夜夜地对德意志进行卑鄙的走私战，大批偷运煽动性著作。”

“偷运”！“煽动性著作”！“卑鄙的走私战”！用词愈来愈雅致了，愈来愈带外交口吻了，——但是帝国摄政王政府不是“把使用光明磊落的语言当作自己的义务”吗？

的确，政府的语言是极其“光明磊落”的！它决不是要求瑞士迫害出版物，它所说的不是“报纸和传单”，而只是“它们的作者”。应当制止这些作者的活动。但是，正直的“帝国摄政王政府”，当在德意志对某家报纸，例如对“新莱茵报”，提起诉讼的时候，问题牵涉到谁呢——是已经送到大家手中而且已经无法收回的报纸呢，还是那些被关进监狱并交付法庭审判的“作者”呢？这个高贵的政府决不是要求迫害出版物，它只是要求迫害为出版机关撰稿的作者。好正直的人们！绝妙的“光明磊落的语言”！

这些作者“对德意志进行卑鄙的走私战，大批偷运煽动性著作”。“强盗们”的这种罪行确实是不可饶恕的，何况他们“日日夜夜”都在犯这种罪行，而瑞士竟对此不闻不问，这是对国际法的不可容忍的破坏。

有人从直布罗陀整船整船地把英国货偷运入西班牙，西班牙的神甫们却声明说，英国人对天主教会进行着卑鄙的走私战，因为他们“偷运煽动性的福音书”，例如圣经会出版的西班牙文的圣经。巴塞罗纳的厂主们也在诅咒用从直布罗陀秘密输入英国棉布的办法对西班牙工业进行的卑鄙的走私战。但是，只要西班牙公使对此稍微表示不满，帕麦斯顿就会回答他说：thou blockhead（你这个蠢货），要知道，我们正是为了这一点才占领直布罗陀的呀！直到现在，其他各国政府都相当机敏、识趣和谨慎，没有在照会中埋怨走

私。但是，天真的帝国摄政王政府却用如此“光明磊落的语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说，如果巴登的海关官吏没有很好地执行他们的职责，就是瑞士破坏了国际法。

“最后，瑞士不会不知道，其他国家反对这一丑恶行径的权利，不可能以瑞士当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或愿望来阻止这种行径为转移。”

看来，帝国摄政王政府肯定“不会不知道”，瑞士不惊动那些即使用偷运等等办法进行过走私战，但遵守国家法律的人的“权利，不可能以德意志当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或愿望来阻止”这种走私“为转移”。帝国摄政王政府不妨深思一下海涅给那个老是埋怨发生大火灾因而使他感到讨厌的汉堡人的回答：

你们应当把自己的法律
和自己的消火唧筒改进⁶⁵，——

那时它就再也不会因自己磊落的语言而使自己充当别人的笑料了。

“争论的只是一些事实”，——照会中继续说。可见除了卑鄙的走私战而外，我们最后还会听到其他一些重要的事实。真想马上就听到。

“崇高的首府州政府以不了解情况为理由，要求向它提供能够证实对瑞士当局提出的控告的真凭实据。”

每个人都很清楚，崇高的首府州政府的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或许帝国摄政王政府会乐于满足这一正当的要求吧？

绝无此事！你们只消听一听：

“但是，在各国政府就众所周知的事情的谈判中，采用辩论程序是不合各国人民的习惯的。”

这就是给妄自尊大的、小小的瑞士上的一堂严峻的国际法课。

瑞士以为它也可以对大德意志帝国摄政王政府采取傲慢的态度，像过去小小的丹麦所做的那样。它不妨回忆一下同丹麦的休战并放得更谦逊一些，否则它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向邻国要求引渡刑事犯，自然要诉诸辩论程序，尽管该犯的罪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辩论程序，或者更确切些说，瑞士在采取措施（不是对付逃到这个国家来的刑事犯的措施，不是反对付流亡者的措施，不，这只是对付它本国的在民主选举权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官吏的措施）以前要求得到的简单罪证，难道“不合各国人民的习惯”！真的，“光明磊落的语言”一点也不阴险狡猾！这是**最坦率地**供认没有任何证据。

接着便提出了一大堆列举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的问题。

“难道有谁会怀疑德国煽动者在瑞士所做的事情吗？”

当然没有人，正像谁也不怀疑施梅林先生在法兰克福所做的事情一样。非常清楚，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大部分都有“事情”做。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做的**什么事情**，这一点显然施梅林先生本人是不知道的，否则他就会说出来。

“难道有谁怀疑流亡者刊物的存在吗？”

当然没有人。但是，要知道施梅林先生本人曾经宣布，对出版自由的攻击不可能来自德意志方面。要是发生了这种攻击，瑞士也一定会击退它。既然如此，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它从“光明磊落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那就只能有一个意思：瑞士应该取消流亡者的出版自由。A un autre Monsieur de Schmerling!（不是这样吗？冯·施梅林先生！）

“难道德意志应该向欧洲证明到穆坦茨朝圣的事实吗？”

当然不应该，机智的“帝国摄政王政府”！但是，证明这些朝圣是司徒卢威入侵的原因或者是使帝国政府有更多根据向瑞士提出控诉的其他举动的原因，对帝国摄政王政府说来，丝毫也不是丢脸的事情，可惜也决不是容易的事情。

首府州这一次也非常客气。它的作法超出了“各国人民的习惯”。它提醒施梅林先生说，到穆坦茨朝圣⁶⁶恰好与黑克尔有关，黑克尔是反对第二次入侵的，他甚至到美国去了，为的是消除对他的意图的一切怀疑。在朝圣者中还有德意志国民议会的一些著名的议员。首府州真够有礼貌，甚至面对着施梅林先生的蛮横无礼的照会，它也没有提到第二个同时也是有决定意义的理由。这就是“朝圣者”重又回到德意志去了，在那里帝国摄政王政府随时都可以根据任何一个应受惩罚的行为或他们在穆坦茨所搞的一切“阴谋”来对他们进行审讯。可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这个事实最有力地证明，帝国摄政王政府没有任何材料来控告朝圣者，因此它也就更没有理由在这方面责难瑞士当局了。

“或者是在比尔斯费尔德举行的会议？”

“光明磊落的语言”是件美妙的东西。谁如果像帝国摄政王政府一样，把“在国际交往中”严格使用这种语言“当作自己的义务”，那末他只需要证明一下，在比尔斯费尔德举行了一般的会议或者是流亡者的会议，就有充分理由来谴责瑞士当局粗暴地破坏国际法了。当然，一般的常人首先应该证明在这些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违反国际法的事情。但是，要知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众所周知到如此程度，以致我敢打赌，在“新莱茵报”的读者中，知道施梅林先生究竟谈的是什么会议的人，甚至连三个也找不到。

“而那些有可能在国境线附近，在莱茵斐尔顿、苏尔查赫、哥特利宾和劳芬等地搞阴谋活动的歹徒们的武装呢？”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些关于流亡者所干的“事情”的比较确定的说法！起初我们猜想冯·施梅林先生不知道流亡者在干什么事情，这对他是不公道的。他不仅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事情，而且还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干这些事情。他们在什么地方干这些事情呢？在莱茵斐尔顿、苏尔查赫、哥特利宾和劳芬——在国境线附近。他们在干什么事情呢？“搞阴谋活动！”

“他们在搞阴谋活动！”他们的这些阴谋是对整个国际法的骇人听闻的蹂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际法不致遭到蹂躏，帝国摄政王政府在干什么呢？该不是在“横行霸道”^①吧？

但是冯·施梅林先生谈的是“武装”。由于流亡者搞阴谋活动（这使整个帝国胆战心惊）的许多城市都属于阿劳州，所以首府州便效法阿劳州。首府州又做得过分了，超出了“各国人民的习惯”。它要通过“辩论程序”来证明，当时在阿劳州只有二十五个流亡者，其中只有十个人参加了司徒卢威的第二次自愿远征，而且他们还是没有携带武器越境进入德国的。这就是全部的“武装”。难道这有什么意义吗？留下来的其余十五个人恰好是最危险的人物。他们留下来显然只是为了以后能毫无阻碍地继续“搞阴谋活动”。

这就是“帝国摄政王政府”对瑞士的郑重其事的控告。此外它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它也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不合各国人民的习惯”等等。如果瑞士竟恬不知耻地认为自己并没有被这些控告所吓倒，那末帝国摄政王政府的“决定”和“措施”

① 俏皮话：《ihr Wesen treiben》——“搞阴谋活动”，《ihr Unwesen treiben》——“横行霸道”。——编者注

就会立即产生毁灭性的效果。全世界的人都希望知道，这些决定和措施将具有什么性质，尤其是因为施梅林先生在筹划这些决定和措施时做得非常秘密，甚至对法兰克福议会也不愿意透露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细节。然而瑞士报刊已经证明，施梅林先生所能采取的一切压制措施使德意志受到的损害将比瑞士大得多。根据各种消息看来，瑞士人正以最大的沉着态度等待着帝国摄政王政府的“措施和决定”。法兰克福的大臣先生们是否能够保持这样沉着的态度呢，特别是如果这时收到了英国和法国的照会的话。这我们倒要看一看。只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所有这一切必将像对丹麦的战争那样，以新的耻辱而结束，不过这一次耻辱将只能由官方德意志来承受。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6 日“新莱茵报”
第 15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曼托伊费尔和中央政权

科伦 11 月 24 日。曼托伊费尔大臣昨天向在柏林的帝国专员们宣布：普鲁士政府不服从法兰克福议会关于组织一个有声望的内阁的决议⁶⁷，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对内政策。

这样一来，曼托伊费尔就同意这样一种看法：法兰克福议会关于拒绝纳税^①的决议没有任何意义和效力，因为它只是同国家的对内政策有关。

不过，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可能帮助把莱茵省变成普鲁士的对外政策问题。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6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53 号

① 见本卷第 49 页。——编者注

德利加爾斯基——立法者、 公民和共產主義者⁶⁸

科倫 11 月 24 日。杜塞爾多夫宣布戒嚴。勃蘭登堡—弗蘭格爾內閣找到施皮格爾先生和德利加爾斯基先生作代表算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前者是一個普通的行政區長官，後者則集各種不同的品質於一身：他不僅在官銜上是中將師長、杜塞爾多夫市區和整個行政區的“最高”立法者，而且他還是一個作家，據他自己說，他還是一個“公民”和——共產主義者，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天佑吾王，天佑吾國”。這兩位先生，不管身分是單色的還是多色的，都覺得在杜塞爾多夫，法定秩序只有用非常手段才能維持。因此他們認為，“為了維護法定秩序”他們“不得不”宣布整個杜塞爾多夫地區戒嚴。

我們早就知道，勃蘭登堡政府只有靠非常手段才能維持；我們知道，如果國內不實行戒嚴，勃蘭登堡政府早就喪失了自己的地位。因此，戒嚴狀態也就是勃蘭登堡政府的合法狀態。

馮·普富爾首相在 9 月 29 日的協商議會上宣稱：“先生們，戒嚴狀態就是戰爭狀態。”當時指的是科倫城和科倫要塞，指的是暴動，司法機關的決定無法執行，合法當局——市民自衛團已不能維持安寧，街壘已經修築起來；力量只能用力量來對付。至少戒嚴的擁護者們曾經是這樣斷言的，至少他們力圖用似乎是查明了的事

實來掩飾外表。現在這件事做起來要簡單得多了；杜塞爾多夫沒有發生暴動，法院的活動絲毫沒有遭受破壞，市民自衛團時刻準備執行合法的命令，甚至無須引證當時曾被當做主要依據的過了時的1809年條例，因為杜塞爾多夫不是要塞。但是，杜塞爾多夫以少有的毅力表示贊成拒絕納稅，僅僅根據這一點，兩個勃蘭登堡就可以恢復法定秩序，即宣布該城不受法律保護了。

我們用不着去詳細研究作為宣布戒嚴借口的罪狀；我們要向司法當局指出，這些罪狀純系捏造，因為根本提不出法律上所要求的證據來證實它們。這是誣告，應按刑法典第三六七條及以下各條加以懲處。為了維護法定秩序，我們想在這裡指出施皮格爾先生和德利加爾斯基先生的一些違法行為。

在這兩位先生宣布戒嚴“從而使最高權力轉歸軍事當局掌握”之後，“共產主義者和公民”德利加爾斯基發布了如下的命令：

(1) 各個合法存在的權力機關繼續保留其職能，它們所採取的措施將得到最堅決的支持。

這就是說，既然各個合法存在的權力機關是依法存在的，那末就應該取消，但是要保留它們的職能，以便支持馮·德利加爾斯基先生。

德利加爾斯基在給他的“同胞們”的呼喚書中說：“我希望所有正直的居民都會幫助我執行法律，各個權力機關都會堅決地支持我這樣做。”

德利加爾斯基先生不僅制定法律，而且還根據自己的裁奪運用法律。各個合法存在的權力機關就是他的近衛軍。而杜塞爾多夫地方法院的“獨立”的法官們、檢察長先生及其同僚們竟對這一切聽之任之！他們被解除了職務，却毫不覺得這是違法。他們對立法者德利加爾斯基稱頌備至，並且還因為付出這種代價而能夠照

旧领薪感到高兴。诸位先生，难道在军刀制度下发布逮捕令，进行审讯，你们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也许，逮捕拉萨尔先生（可惜他过于坚信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司法机关的保护，不愿意躲避戒严）只不过是德利加斯基先生的私人报复行为？也许已经根据第一一四、一二三、一二四各条悄悄地对这个人和他的同谋者提起诉讼并进行侦查了？

德利加斯基先生的**第二条法律**是：

“解散一切追求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团体。”

4月6日法令的第四节与德利加斯基先生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这一节规定：“所有普鲁士人都享有不经警察局事先许可进行结社的权利，只要不是追求违背现行法律的目的”，这就是说，这显然是那些应当尽速收回的、与德利加斯基的法律不相容的“成果”之一。

第三条和第四条法律。冯·德利加斯基先生控制市内交通和饭店营业时间。他颁布禁止集会的法令，仿佛杜塞尔多夫已变成了巴黎。但是，德利加斯基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警察，而且还因为他表现出一个夜巡逻的毋庸置疑的天才：他还控制着工余休息时间。

第五条法律。

“市民自卫团在改组以前应予解散，并且必须在今天交出武器。”

这条法律在许多方面都是违法的。我们来分析一下：

(a)市民自卫团**应予解散**。根据一般法律，即根据10月17日的市民自卫团法，市民自卫团只有根据国王的命令才能解散。也许冯·德利加斯基先生持有别人不知道的秘密的敕令？那末，他为

什么不像公布邮政总局局长毛伦布勒歇尔的声明⁶⁹那样把它公布出来呢？诚然，这个捏造的声明立刻就遭到了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的驳斥。但是冯·德利加斯基先生并没有什么敕令，他是凭借自己的最高权力行事，擅自攫取国王的职权，他不过是一个僭望王权的“公民和共产主义者”。

(b) 市民自卫团**不仅被解除职务**。冯·德利加斯基先生并不满足于仅仅攫取行政区长官的职权。如果说违法，那末仅仅解除自卫团的职务一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10月17日法律的第四节规定：

如果某个市镇或区的市民自卫团拒绝遵守当局的命令，或者干涉市镇、行政或司法当局的活动，那末行政区长官在说明理由后可以暂时解除它的职务。

因此，只有行政区长官才能解除市民自卫团的职务，不管中将、师长、公民、以至共产主义者，即使是“普鲁士皇家共产主义者”都绝不能解除市民自卫团的职务。

可是，德利加斯基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无视级别，以专制君主的身分来独断独行。即使他只是以行政区长官的身分来对待市民自卫团，他也不能解除后者的**武装**。但是

(c) “市民自卫团必须在今天交出武器。”仅仅解除职务还绝不等于说有权没收武器。不然被暂时解职的军官也应交出**自己的佩刀**。但是德利加斯基先生是对的。如果允许市民自卫团保留武器，也许它就不会让德利加斯基解除它的职务，它就会按法律第一节的规定去执行它的使命。

(d) 冯·德利加斯基先生要求把武器交给他。因为他已经感到他的使命就是要当专制君主，所以，关于实施建立市民自卫团

的法律的敕令也不能制止他这样做，敕令的第三节规定：

“国家交给市镇的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由市镇支配，直到上述时间为止”。

杜塞尔多夫的“市政管理局和市镇委员会”并没有反对德利加爾斯基先生的命令。它们不是抗议这种违法行为和维护市镇的权利，而是号召市民们对他们的新的独裁者要“奉公守法”。

第六条法律。

“凡被揭露公开以武力反抗合法当局的命令或实行叛变致使军队遭到危险或使军队遭到危害者，交军事法庭惩处。”

按照人身保护法⁷⁰的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交由依法成立的法庭以外的法庭去审理。军事法庭和非常委员会都是非法的。以惩罚相威胁或使用法律规定的惩罚以外的惩罚都是不容许的。根据这条法律，这项规定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或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战争或暴动的情况下，都不能停止生效。因为根据第八节规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暂时取消第一节和第六节，而且只有根据内阁的决定并由内阁负责才能这样做。虽然如此，但是冯·德利加爾斯基先生还要设立军事法庭来对付平民。因此他下令捕人，为了捕人而破坏住宅的不可侵犯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说这些决定也能暂时停止执行，那末无论如何它们不是由冯·德利加爾斯基先生停止的。“杜塞尔多夫日报”断言逮捕拉薩尔没有遵照规定的手续，“科伦日报”则肯定这次逮捕是按照法院侦查员的指示进行的，究竟哪种说法值得相信，反正都是一样。“科伦日报”当然是站在警备司令方面，侮辱法院侦查员。不管怎样，这次逮捕是非法的，因为在非法的制度下不可能有合法的行动。在战时状态下，民事审判权就得失效。如果法院侦查员要继续执行他的职务，他就得

登上**軍法官**的寶座，**軍事條令**就會成為他的法典。杜塞爾多夫檢察人員很了解他們的這個新地位；事實上如果他們還承認他們享有萊茵刑事訴訟程序規定的職權，那末即使根據 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護法) 第九節，他們也早就應該起來干涉了。

第九節規定：

“對超越職權破壞上述各項決定的文武官員，不需事先征得當局的同意即可起訴。”

要完全認清我們萊茵各機關的力量，還要看總檢察官**尼科洛維烏斯**先生是否同意杜塞爾多夫檢察人員的做法，因為所有法警官員，甚至法院偵查員都在他的監督之下。為了促使**尼科洛維烏斯**先生行使他的職權，處理杜塞爾多夫事件，昨天曾派一個代表團去見他，他似乎回答說：他手裡沒有能夠據以進行干涉的法律條文。雖然這些話我們都是從最可靠的方面得知的，但是，我們仍然說：“**尼科洛維烏斯**先生似乎回答說”。我們還不敢相信這件事，因為否則我們就要認為，**尼科洛維烏斯**先生把 Code pénal⁷¹及今年 3 月以來頒布的一切法律都忘得一干二淨了。

卡·馬克思寫於 1848 年 11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48 年 11 月 26 日“新萊茵報”
第 153 號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 对“新莱茵报”提出的三个诉讼案

科伦 11 月 24 日。目前对“新莱茵报”提出的诉讼案就有三起，还不算根据莫须有的“与新闻业活动不相容的”政治罪行对恩格斯、德朗克、沃尔弗和马克思进行的审讯。——据灵通的消息说，除了上述审讯以外，法庭对“下流报纸”——这是 *ci-devant* (前任) 检察官和现任检察长黑克尔 (*c' est du Hecker tout pur* (这是真正的黑克尔))⁷² 对本报的官方称呼——至少还准备提出一打审讯。

第一个罪行。粗暴地触犯六名普鲁士皇家宪兵和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异邦的) 人民代表——科伦检察机关之王、检察长茨魏费尔先生⁷³ 的少女般贞洁的“礼貌”。这位人民代表目前既不在柏林开会，也不在勃兰登堡开会，而在莱茵河畔的科伦开会。“莱茵河畔啊！在莱茵河畔我们的葡萄正在成长！”⁷⁴ 从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也认为莱茵河比施普累河好，迪什旅馆比米连茨旅馆好⁷⁵。

Va pour la délicatesse des gendarmes! (就算讲礼貌是宪兵的特性吧!) 至于茨魏费尔先生的“礼貌”，对我们来说就是 *«noli me tangere!»* (“别碰我!”) 对于复选人的无礼貌的不信任投票 (据传闻，复选人迫使茨魏费尔先生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我们曾表示道义上的愤慨。我们作为茨魏费尔先生少女般贞洁的“礼貌”的忠实的保护者，请求他公开驳斥克列维的魏茵哈根先生的声明。魏茵哈根先生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个由他本人署名的声明。他

在声明中断言，他可以把有损茨魏费尔先生的“荣誉和礼貌”的事实公诸于世，他甚至可以证明这些事实。但是，由于茨魏费尔先生用 Code pénal (刑法典) 的条文作掩护，所以魏茵哈根先生不敢公布这些事实。根据这一条文，任何揭发，即使有真凭实据，如果不可能由法庭的判决或确凿的文件来加以证实，一律都要被控告为诬蔑。因此，我们向茨魏费尔先生的“荣誉和礼貌”呼吁！

第二个罪行。 索性的黑克尔和二重化的黑克尔。

第三个罪行。 这是在 1848 年犯下的罪行。根据帝国内阁的要求对这个罪行提出了控诉，罪行——施纳普汉斯基！罪犯便是小品文！⁷⁶

据说，帝国内阁在其起诉书中把“新莱茵报”称为一切“坏报刊”中最坏的报纸。我们则认为帝国政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权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权。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6 日“新莱茵报”
第 153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联邦委员会委员剪影

伯尔尼 11 月 24 日。让“新莱茵报”的读者了解一些关于现在已经确定在两院监督下管理瑞士并且刚刚开始其活动的人物的详情细节，也许是不无兴趣的。联邦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已无保留地同意自己当选，只是富勒尔先生一人同意在春天以前暂时担任这一职务，而第七个人（蒙钦格尔）毫无疑问也会表示同意。

联邦委员会主席富勒尔先生是典型的苏黎世人。如果是在法国，人们会说他具有 l'air éminemment bourgeois（高度的资产阶级外表）。服装、举止、容貌——所有这一切，一直到银边眼镜，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自由的帝国城市的公民”。他作为首府州的主席以及联邦代表会议的议长，的确变得有点文明气了，但毕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省人”。“瑞士的雅典”（苏黎世的小市民喜欢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只有一万居民的小城市）的最有才学的律师之一——富勒尔先生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温和的自由主义导致了苏黎世九月政府的垮台⁷⁷，使进步党重新担负州的领导。作为联邦代表会议的议长，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在内部事务上温和和进步，在对外问题上严守中立——这就是他所奉行的政策。他现在之所以当了联邦委员会的主席，与其说是由于一定的意图，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偶然情况。人们本来乐意选举一个伯尔尼人来担负这个职务；不过那就只能在奥克辛本和诺伊豪斯

这两个人之间进行选择。奥克辛本是大多数人所厌恶的，诺伊豪斯到现在即 1848 年还是采取五六年前的保守立场，因而根本没有被选入联邦委员会。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就不得不选举一个苏黎世人。要选苏黎世人，富勒尔无疑是最适当不过的候选人了。因此，不能认为富勒尔确实代表联邦议会的多数派，但他至少是瑞士德语区的多数派的代表。

副主席**德律埃**在各方面都同富勒尔相反，他是瑞士法语区所能选出的最好的代表。富勒尔对于多数派，尤其对于激进的少数派来说是过于温和，德律埃对多数派来说则太激进。富勒尔是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德律埃则是红色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德律埃在自己州里最近发生的各次革命事件中所起的卓越作用是尽人皆知的。他在各方面对自己的州（瓦得州）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虽然人们不大晓得。德律埃是路易·勃朗型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第一流的国家法专家，全瑞士最有毅力和最勤勉的活动家。他是联邦委员会中能够逐渐获得越来越大影响和产生最良好作用的人物。

奥克辛本是反对琉森的志愿军的首领，是通过了对宗得崩德作战的决议的联邦代表会议的议长。在这次战役中他是伯尔尼后备军的上校。由于他过去的活动，不仅在瑞士，而且在整个欧洲他都是遐迩皆闻的。但是，从二月革命以来，他的活动不大为人所知。二月革命的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法国临时政府的措施以及法国无产阶级的一切运动——所有这一切几乎吓倒了这位会被法国人列入“国民报”派的 *démocrate pur*（纯粹的民主党人）。他渐渐地接近温和派。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日益倾向于所谓严守中立的、实际上不过是对反动派采取保守和纵容政策的旧制度，而

在对宗得崩德的战争以前以及在这次战争期间，他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曾经表现得坚强有力。担任首府州主席的奥克辛本，便迟迟不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在意大利问题上至少是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此外，由于他在担任联邦代表会议议长期间非常感情用事，结果往往对激进派抱有成见。这样一来，他便在激进派中间，特别在瑞士法语区的激进派中间为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如果在选举伯尔尼州的联邦委员会委员时不是仅仅限于在奥克辛本和诺伊豪斯之间进行选择，那末奥克辛本得的票就会少得多。

阿尔高的**弗雷-埃罗泽**上校被认为是瑞士最有才干的军事活动家之一。在反对宗得崩德的战役中，他是总参谋长。如同瑞士的大多数参谋人员一样，他长期以来参加本州的政治生活，因而非常熟悉民政管理机关的事务。他在新的岗位上无疑会卓有成效地从事军事部门的工作。按政治观点来说，他属于本州的彻底的自由派。

德森的国务参事**弗兰西尼**，无疑是全瑞士最受尊敬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多年来他一直在本州孜孜不倦地工作。1830年，还在六月革命以前，受蔑视的、在政治上被认为是落后的德森首先在全瑞士（而且没有通过革命）用民主宪法代替了寡头政治的旧宪法，这主要是他的功绩。同时他还领导了再度推翻窃据政权的僧侣和寡头政治家的1840年革命。这位弗兰西尼在这次革命后还改组了被反动派弄得混乱不堪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反盗窃、欺诈、贿赂和贪污的斗争，最后，还在贫瘠多山的地区许可的条件下，重新举办在僧侣统治时期完全衰落了的教育。这样，他就剥夺了神甫们赖以影响人民的主要手段。结果，德森人对自己政府的信任便一年年不断地提高。此外，弗兰西尼还是瑞士最有学识的经济学家之一，

是瑞士统计学界的优秀著作（“瑞士统计学”1827年罗迦诺版；“瑞士新统计学”，1848年版）⁷⁸的作者。他是个彻底的激进派，在联邦委员会中，与其说他接近奥克辛本和富勒尔，不如说他接近德律埃。德森人对自己政府的这位多年的领导者评价很高，特别是因为他那种“光荣的贫困”。

左洛图恩的政府参事**蒙钦格尔**是本州最有威望的活动家。从1830年起，他几乎一直是这个州出席联邦代表会议的代表，多年来实际上领导着这个州。用瑞士法语区的半激进报纸“洛桑日报”⁷⁹的话来说，他善于 *cacher sous les apparences de la bonhomie un esprit fin et pénétrant*（用温厚来掩盖乖巧而锐敏的智慧）。就是说，他善于在温厚的老实人的外表掩盖下玩弄一些小诡计，而这种小诡计在帝国城市中被认为是一种外交才能。此外，他是一个富勒尔类型的温和的进步派。他要求瑞士只关心自己本身的事务，把大的欧洲政治交给上帝和帕麦斯顿勋爵去管。因此，他对至今只给瑞士带来麻烦的外国流亡者的态度是相当不怀好意的。他同“瑞士的雅典人”埃歇尔博士一起，最近在德森再一次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般说来，富勒尔和蒙钦格尔在联邦委员会中最典型地代表了瑞士德语区“有教养的”居民的偏见和局限性。

最后是圣加伦的**奈弗**先生，关于他我知道的非常有限。据说，奈弗对本州的管理工作的改善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在他方面的工作也成绩卓著。根据瑞士报纸来判断，一般说来，在圣加伦州居住的都是最富裕和最有才学的人。可是这些有才学的人的不幸就在于：人们很少知道他们，不管怎样，他们显然都缺乏主动性。不过作为行政活动家的奈弗先生，在他活动范围内看来是不无功绩的。按其政治观点来说，他介于富勒尔和奥克辛本之间；他比

前者较为坚决,但是按照后者过去的活动来看,他又不如后者。

从联邦委员会的这些成员无疑可以看出,瑞士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执行怎样的政策。它将继续执行旧联邦代表会议和首府州伯尔尼在奥克辛本,后来在丰克(如果没有奥克辛本他就等于零)的领导下所执行过的政策。在对内政策方面——严格遵守瑞士联邦的新宪法,这个宪法对各州的主权范围仍然规定得过于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严守中立,当然究竟保持比较严格的中立还是比较温和的中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譬如对奥地利就保持特别严格的中立。温和派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奥克辛本先生很可能在大多数问题上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德律埃和弗兰西尼作为少数派,而且还有永远当少数派的美妙前景,如何能同意被选入联邦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如何能协同一致地进行管理,只有瑞士人,或者熟悉瑞士是怎样进行管理的人,才能了解这一切。在这个一切行政机关都是集体讨论问题的国家,人们都信守这样一个原则:各守己职。即使你今天是少数派,你仍然有可能做些有益的事情;也许经过一两年,由于死亡、辞职等等原因,你会变成多数派。这是执政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这一事实的自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政党都力图(就像在立法议会中一样)选派一个或几个候选人,以便至少在委员会中站稳脚跟,在不能获得多数以前保证自己的少数地位。如果候选人不同意被选举,政党也不反对这种在比较大的国家里必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联邦委员会绝不像 *Commission du pouvoir exécutif*⁶⁰, 德律埃的地位和赖德律-洛兰的地位也有巨大的差别。

瑞士的报刊一致断言:联邦委员会是由有才能的第一流的人组成的。虽然如此,我怀疑:除了德律埃和弗兰西尼以外,这个委员

会的哪一个委员能够在比较大的国家里起杰出的作用；除了弗雷-埃罗泽和奥克辛本以外，其余的三个委员是否能够在比较大的国家里被提拔担任稍微重要的，即使是**第二流**的角色。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新莱茵报”
第 155 号

原文是德文俄文译自
“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 奥地利事件的报告

科伦 11 月 27 日。四十年前，曾有过描写“深受屈辱的德国”⁸¹的人物。好在这些人物都已 *ad patres* (见老祖宗) 去了。要是现在，他们便写不出这样的书了，因为他们会连书名都想不出来，而如果又重弹老调，选用旧的书名，那他们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要知道，德国永远具有——用英国诗人的话来说，《beneath the lowest deep a lower still》[“在最深度下面的更深度”]。^①

原来我们以为，同丹麦签订那样的休战协定已经是空前的奇耻大辱了。原来我们觉得，在帝国大使劳麦在巴黎、黑克舍尔在意大利、专员施泰德曼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发表演说以后，在给瑞士发出两个照会以后，德国的屈辱已经到了尽头。但是，两个帝国专员关于奥地利问题的演说证明，我们是想错了。德意志帝国专员们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礼行为来对待德意志的荣誉，旧自由派先生们是多么昏庸无能、胆小怕事、背叛成性，这从刚出版的“奥地利事件调查委员会报告及其他”⁸²中，特别是从其中的二十个文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0 月 13 日，韦尔凯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受中央政权的委托，

① 弥尔顿“失乐园”。——编者注

离开法兰克福去“调停**维也纳**事件”。不了解中央新外交手腕的人，这几天都在等待这两位先生到达**维也纳**的消息。当时还不知道帝国专员们有他们自己的旅行路线。帝国摄政王使者艾塞勒和柏塞勒⁸³取捷径，经过**慕尼黑**前往**维也纳**。他们以“约卜西之歌”⁸⁴中的道路图为指南，于10月15日晚上抵达**维也纳**。一直到10月17日中午，他们同巴伐利亚的大臣们和奥地利的代办在感人的团结气氛中研究了**维也纳**事件。在给施梅林先生的第一封信中，他们汇报了他们初步调查的结果。在**慕尼黑**，他们两位忽有所悟。他们殷切企望“第三位同事”（尽可能是一位普鲁士人）的光临，“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更出色地完成伟大使命”。但是“同事”先生并没有来。三人同行的希望破灭了。这可怜的一对只得独自登场。现在“伟大使命”怎么样了呢？伟大使命装在韦尔凯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的口袋里，到巴骚旅行去了。还在作出奥地利之行的重大决定以前，“伟大使命”就有言在先了。“在那里，在那边非常可怕！”⁸⁵

韦尔凯尔给施梅林写道：“这里，在奥地利边境，居民也绝不是没有革命情绪和恐怖情绪的，（不仅如此，）甚至克累姆斯的国民自卫军也不可靠，仅仅由于守护桥梁的军队的干涉，才使这座桥梁在皇帝经过之前没有被国民自卫军破坏，皇帝才幸未被俘。”

哪一位读者的心肠竟坚如铁石，竟不充分尊重高尚的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心灵 [Staats-Lexikon-Seele]⁸⁶的这种感情呢？这两位先生从18日中午至20日早晨在巴骚稍事歇息，便动身往林茨去了。

10月13日，他们离开法兰克福，20日晚上，他们已到达林茨。

这种令人难以想像的迅速行动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伟大使命”的重要性吗？也许有特别的指令要他们这样匆忙吧？恰好

七天以后，这两位先生到达了林茨，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于这个城市有“受过维也纳密使们的感化的为数众多的工厂居民”，所以韦尔凯尔先生在逗留巴骚期间产生了一种诚惶诚恐的预感；但是如今在这里连他和他的同事先生所想像的绞架的影子也根本没有发现。相反地：

“在军官之率领下，全体国民自卫军，及其乐队……庄严隆重地排列成队，手持迎风飘扬之德国国旗，同围拢来之人民一道欢迎吾等，并不停地欢呼。”

这样一来，林茨——革命的索多玛——就变成了一个善良的城市，它十分纯朴，用隆重的方式接待了我们卓越的帝国专员们。可是，在韦尔凯尔—莫斯累给施梅林先生的报告中，维也纳却被描绘得非常阴森可怕，简直像是罪孽深重的哥摩拉^①，像是混乱的火焰地狱等等。

21日，这两位先生乘轮船去克累姆斯。途中他们向法兰克福报告说，在林茨，曾为他们安排了仪仗队，警备队在他们前面列队欢迎，还有类似的隆重措施。与此同时，他们还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文迪施格雷茨、克劳斯大臣和帝国国会主席团。

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帝国专员们八天多的活动不完全满意，那末他最好立刻在10月21日夜同他们一起到施塔姆美尔斯多夫去，到文迪施格雷茨的司令部去看看。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自己的专员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全部丑态。韦尔凯尔—莫斯累说，“文迪施格雷茨颇为粗暴地拒绝了我们的任何干涉。”换句话说，他们挨了一顿闷棍，不得不马上滚蛋。“不仅如此，他甚至连我们的全

^① 索多玛和哥摩拉是两座城市的名称，据圣经传说，这两座城市由于居民罪孽深重而被地震和“火雨”所毁灭。——译者注

权证书也不愿意看”—— 韦尔凯尔向他的大臣施梅林这样抱怨道。除了这些不快以外，文迪施格雷茨连一滴葡萄酒，甚至连一小杯烧酒也不肯给站在她面前的中央政权的化身赏光。

于是，我们的专员们又乘上马车，悲哀地哼着：“啊，你，德意志，等等”⁸⁷，动身……到维也纳去？—— 上帝保佑！—— 到奥里缪茨^①去，到“宫廷”去。他们做得真妙。要没有这一着，整出帝国的滑稽剧就会不完而散，调停的滑稽剧就会缺少最后一幕。如果说文迪施格雷茨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学生那样来对待他们，那末在奥里缪茨他们却受到了“皇帝和皇族的殷勤得多的接待”（见报告第 11 页，第六封信）。他们被邀请出席了宴会，“吾等”—— 他们接着给施梅林先生写道—— “承蒙陛下的恩惠，受到盛情的接待”。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德国式的奴隶性格，—— 绝对不是—— 这是出自肺腑的感激，这种感激之情在下面这首歌的歌词中得到了适当的表现：“在经受了如此的苦难之后，等等。”⁸⁸

但是，在享受了各种款待以后，毕竟还得去完成声名狼藉的“伟大使命”。我们这两位专员写信给大臣韦森堡男爵说：

“阁下（10 月 25 日的信就是这样开头的），我们恭请您仁慈地给吾等指定一个对您方便之时间，以领吾等对您感激之情，感激陛下和阁下对本使团及吾等之厚意接待，并将您对您完成吾等之使命有关的下列各项事情之意见及决定示知吾等。”

“下列各项事情”只是噜噜嗦嗦地说明，专员们希望允许他们到维也纳去进行调停。

这一封信，像给韦森堡的第二封信一样，是用上一世纪的竞尚

① 捷克称作：奥洛摩茨。—— 编者注

词藻的公文体裁写成的，其中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简直使人想马上读一下韦森堡的回信。在通信中，这两位专员和奥地利大臣比较起来，就像是两个粗野的庄稼汉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一样，他们跪在光滑的镶木地板上，对后者行可笑的屈膝礼，并力求使用文雅的词句。

在给上述那封信的回信中，韦森堡写道：

“二位尊贵的先生：迟复今日来函，敬希鉴谅……至于二位欲再次消除维也纳纠纷的善良愿望，敝人首先必须将彼处近况告知二位。今之事态非与某党派商谈所能解决，唯一之办法乃镇压叛乱”等等。（参看报告第 16 页）

随后他退还了他们的全权证书。

在 10 月 27 日的信中，他们再次提出自己的要求：

他们说：“吾等认为有刻不容缓之责，再次敬请阁下，并通过阁下敬请帝国政府，在可靠之保护下，连派吾等携善意及调停之委托与建议，前往维也纳，以期在此可怕之危机中，使用体现于吾等及本使团身上之安抚作用与个人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安抚作用与个人影响”在他们离开法兰克福大门以后的十四天中发生了怎样的效力。

这种作用和影响给了韦森堡以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他在自己的复信中对他们的请求避而不答。他告知了他们一些来自维也纳的，有一半还是不真实的消息，并讥讽地指出：

“况且，类似维也纳无产者之叛乱，非用强制手段实难镇压下去之事实，已为不久前法兰克福事件所再度证实！”

韦尔凯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根本无法反驳这种论点。因此，他们只得放弃进一步的尝试，只好带着他们的“安抚作用与个人影响”坐待事态的发展。

10月28日，他们又向施梅林作了关于他们的“伟大使命”的报告。根据韦森堡的建议，他们把紧急报告交给韦森堡派到法兰克福去的一个信使。信使动身了，但紧急报告却没有发出。直到11月6日，紧急报告才送到法兰克福。如果他们没有出席御宴，如果皇族，特别是卡尔大公没有和他们作友好的谈话，专员们必然会因这样多的失利而失去理智了。

接着，沉默了两天。在经过这样多的辛劳之后，“安抚作用”终于沉溺于礼拜六的休息中了。

可是，10月30日，韦森堡把关于维也纳投降的官方消息通知他们。他们的决定被采纳了。诚然，在10月28日，他们还认为（报告第14页），“看来，他（文迪施格雷茨）正像这里（奥里缪茨）有势力的人物一样，过分热衷于不仅要镇压维也纳，而且要对迄今所发生的非法行为进行报复性的惩罚。”可是，后来韦森堡向他们保证说，——在这以后帝国专员还敢再有丝毫怀疑！——“奥地利政府将根据能保证它得到它的臣民的好感的原则来利用这个胜利”。

充满了帝国精神的韦尔凯尔—莫斯累感叹道：“由此看来，可以预料，吾等之建议毕竟产生了一定之影响！”毕竟产生了影响？呵，那当然。在八天当中，你们用绝妙的方法来供韦森堡、卡尔大公以及索菲娅之流开心。你们成了帮助陛下肠胃消化的工具，**韦尔凯尔—莫斯累啊！**

“于是，在大臣做出了这种保证之后，吾等认为，吾等之使命业已完成，明日（10月31日）吾等将取道布拉格归国。”

这就是韦尔凯尔—莫斯累先生的最后一次报告的结束语！

事实上，你们是对的，你们的和解与调停的“伟大使命”确实已经完成了。你们为什么现在到维也纳去呢？难道人道主义的圣徒

——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不是这个城市的主宰吗？难道红斗篷和帝国军队不是在用掠夺、纵火、杀人和暴力等等每一个人都懂得的语言宣传和平与宪法自由的福音吗？

你们的“安抚作用”究竟有多么大，你们的任务究竟完成得多么出色，被枪杀者临死前的呻吟、暴力受害者绝望的惨叫可以证明这一点，在监牢里被摧残受折磨的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罗伯特·勃鲁姆**的斑斑血迹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你们的任务在于：为了弥补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和韦森堡演出的三部曲之不足，在奥里缪茨帮助再演一出滑稽剧。这一任务已被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你们以极娴熟的技巧从头到尾扮演了“**愚弄的舅舅**”这一角色，如果不是某种更坏的角色说的话。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8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54 号

新闻数则

科伦 11 月 28 日。“新莱茵报”在 11 月 17 日曾经写道：

“我们更不用说犹太人了，从他们的教派解放以来，他们，至少是他们的上层人物，到处都成了反革命的急先锋。——他们会有什么好结果呢？等不到胜利，就会把他们扔回犹太人区去的。”^①

当时我们曾引证了勃罗姆堡^②政府的命令。今天我们认为有必要报道一个更为确凿的事实。共济会柏林“三君主”总分会（大家知道，普鲁士亲王是普鲁士共济会的最高首脑，就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普鲁士教会的最高首脑一样）宣布停止共济会科伦“密纳发”分会的活动。为什么？因为这个分会吸收了犹太人入会。特此通知犹太人！

勃兰登堡内阁给各个行政区政府的通告偶然落到了我们的手里。该通告要求各个行政区政府大规模搜捕各个俱乐部的领导人。

据可靠消息透露，科伦、杜塞尔多去、亚琛等地将收到我们皇恩浩荡的君主的圣诞节礼物——由奥地利人组成的帝国军队。看来，这将是克罗地亚人、奥地利边防军马队、捷克人、拉斯人、塞尔维亚人等，其目的是为了像在维也纳一样，在莱茵省也建立“秩序

^① 见本卷第 30 页。——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贝德哥什。——编者注

和安宁”。可是,据说莱茵省并不是同俄国接壤,而是同法国接壤。
特此通知皇恩浩荡的君主!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55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曼托伊费尔的机关报和约翰。 ——莱茵省和普鲁士国王

科伦。“新普鲁士报”证实了由我们转述过的曼托伊费尔关于法兰克福中央政权和法兰克福议会的声明^①。曼托伊费尔的机关报写道：

“帝国摄政王的宣言可能是出于最美好的愿望。可是我们普鲁士人应当坚决拒绝它——普鲁士人民在做这件事时应当跟国王一样坚决。”

曼托伊费尔的机关报说出了我们衷心希望的话。

关于如何对待法兰克福议会决议的约束力，这家官方报纸这样教导我们：

“除了我们的国王以外，我们普鲁士人不知道有别的主人。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中，只有国王也赞同的决议对我们才有约束力，仅仅是因为陛下（普鲁士的风格！）赞同了这些决议，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

我们“普鲁士人”!!!我们莱茵省居民很幸运，在维也纳买卖人口的大市场上得到了一位莱茵河下游的“大公”，不过他后来并没有履行他在被宣布为“大公”时所许下的那些条件⁸⁹。对于我们来

^① 见本卷第 63 页。——编者注

说，“普鲁士国王”只是由于柏林国民议会的决议才存在，可是对我们这位莱茵河下游的“大公”来说，柏林国民议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任何“普鲁士国王”都不存在。我们所以落到了莱茵河下游的大公的手里，是因为贩卖人民的结果！当我们成长到能够不承认贩卖人口的生意的时候，我们将要求“莱茵河下游的大公”拿出他的“领地所有证”来！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30 日
“新莱茵报”第 156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意大利的革命运动

科伦 17 月 29 日。在民主派半年来几乎接连不断地遭到失败之后，在反革命获得一连串空前的胜利之后，终于又出现了革命政党即将胜利的征兆。意大利的起义曾经是 1848 年欧洲起义的序幕，意大利的失败曾经是维也纳陷落的前奏。现在，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意大利第二次站起来了。托斯卡纳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府，罗马也刚刚给自己争得了这样的政府。

伦敦的 4 月 10 日，巴黎的 5 月 15 日和 6 月 25 日，米兰的 8 月 6 日，维也纳的 11 月 1 日⁹⁰——这就是欧洲反革命的几个重要日期，是标志着欧洲反革命不久以前胜利进军所迅速经过的几个阶段的几个里程碑。

在伦敦，在 4 月 10 日，不仅宪章派的革命实力被摧毁，而且二月胜利的革命影响也受到第一次打击。那些正确评价英国和它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的人，决不会因为大陆的革命暂时对英国还毫无影响而感到惊奇。英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通过工业和贸易控制着大陆上那些正处于革命动荡中的人民，同时，由于它控制着亚洲、美洲和澳洲的市场而不太依靠同这些国家的贸易；英国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充分发展和极端尖锐的国家。和其他任何国家比较起来，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通过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的。先于其他任何国家解

决问题和消灭矛盾是**英国**的使命。但英国不必像大陆上各国临时政府一样，要经过摸索方能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不向大陆抄袭革命——时机一到，它自己会把**革命教给大陆**。

这就是英国的状况，这就是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因此，4月10日“秩序”的胜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谁不记得，这个“秩序”的胜利，这个对二月和三月冲击的第一次回击，在各地给了反革命以新的支持，煽起了所谓保守派的奢望！谁不记得，伦敦特别警察的这种行动马上在德国各地为所有市民自卫团所仿效！谁不记得，这个表明爆发的运动并不是不可抗拒的第一个证明，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巴黎在5月15日随即补充了英国保守政党的胜利。4月10日筑起的堤坝挡住了达到了最高点的革命巨流的进路，5月15日从发源地摧毁了巨流的力量。4月10日证明二月运动并不是不可抑制的；5月15日证明巴黎的起义运动是可以阻止的。革命的心脏受到破坏，它的外围自然要遭到失败。普鲁士的情况和德意志各个小邦的情况愈来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革命运动还保存着相当的力量，使得人民能够在维也纳取得两次胜利：第一次也是在5月15日，第二次是在5月26日。专制制度在那不勒斯取得的胜利（也是在5月15日），由于它的过火行为，反倒对巴黎秩序的胜利起了对抗作用。毕竟还是少了一些什么；不仅应该使革命运动在巴黎遭到失败，而且还应该使巴黎本身的武装起义失去它所享有的不可战胜的荣誉。只有那时反革命才能得到安宁。

这种事情果然在**巴黎**6月23日到26日的四天战斗中发生了。整整四天的炮击结束了街垒不可攻克、武装的人民不可战胜的

局面。难道卡芬雅克不是用自己的胜利证明,无论在大街或隘路,无论是攻击街垒或摧毁鹿砦与棱堡,作战规律大体上是一样的吗?难道他不是证明,四万名未经训练、没有大炮和曲射炮、缺乏弹药供应的武装工人,抵抗一支由十二万老兵和十五万国民自卫军组成的、拥有很多精良的大炮并且得到充分的弹药供应的有组织的军队,最多只能坚持四天吗?卡芬雅克的胜利是七倍以上的优势兵力对少数战士的最粗暴的镇压,是历史上最可耻的胜利,而且为这个胜利流的血愈多(尽管他拥有巨大的优势力量),这个胜利就愈可耻。然而,全世界却把这个胜利叹为奇迹,因为这个优势力量所取得的胜利夺去了巴黎人民和巴黎街垒不可战胜的荣誉。卡芬雅克的三十万士兵对这四万工人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战胜了四万工人,实际上他们是战胜了欧洲的革命,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从这一天起涌现了多么难以遏止的反动急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阻难的因素了。保守力量用榴弹和霰弹战胜了巴黎的人民,而且在巴黎能够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重演。民主派在遭到这次彻底失败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可能完成从容的退却,并且尽力保卫自己在出版方面,在民众大会上以及在议会里的阵地,保卫这些已经不能扼守的阵地。

下一个重大的打击便是**米兰的陷落**。拉德茨基重新占领米兰,的确是巴黎六月胜利之后第一个具有欧洲意义的事件。米兰大教堂圆顶上的双头鹰不仅象征着整个意大利的失败,它还意味着欧洲反革命重心的恢复,即**奥地利的复活**。意大利被击溃了,奥地利复活了,——反革命还能奢望比这更大的胜利吗!事实正是这样,随着米兰的陷落,意大利的革命活动顿时减弱了,马米阿尼在罗马垮台了,皮蒙特的民主派被压倒了。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反动派也

重新抬头，加紧进行活动，从中心（拉德茨基的司令部）出发，把阴谋活动扩展到各省。只是在现在，耶拉契奇才转入了进攻，只是在现在，反革命与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大联盟才完全实现。

我不谈反革命曾经取得某些地方性的胜利和占领个别省份这些小插曲，也不谈法兰克福的失败等等事件。这一切都具有地方性的，也许是一国的意义，但是绝对没有欧洲的意义。

在库斯托查那一天创始的业绩⁹¹，终于在 11 月 1 日便完成了：正如拉德茨基进入了米兰一样，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现在也进入了维也纳。卡芬雅克的办法被用来对付德国最大和最活跃的革命策源地，而且很有成效。和巴黎的革命一样，维也纳的革命也淹没在血泊中，埋葬在遍地硝烟的废墟里了。

但是，很有可能，11 月 1 日的胜利同时就是反方向运动的开始和危机迫近的契机。使维也纳的功绩在普鲁士完全再现的企图已经遭到了失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甚至当国家不再支持制宪会议的时候，国王也只能指望得到不彻底的非决定性的胜利。不管怎样，维也纳的失败最初给人的沮丧印象，被这种想依样画葫芦的笨拙企图冲淡了。

现在，正当欧洲北部不是已经像 1847 年时那样再度受到奴役，就是在为捍卫最初几个月的胜利成果而同反革命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意大利突然又行动起来了。利伏诺这个在米兰陷落的推动下走向胜利的革命的唯一的意大利城市，终于以自己的民主高潮席卷了整个托斯卡纳，并且建立了一个具有鲜明的民主性质的政府。这个政府比君主政体下存在过的一切政府都要民主得多，就是在共和国里，这样民主的政府也是少有的。这个政府号召建立意大利制宪国民议会以此来回答维也纳的陷落和奥地利的复活。这

个民主政府投给意大利人民的革命火花燃起了燎原大火：罗马的民众、国民自卫军与军队团结一致举行起义，推翻了看风转舵的反革命政府，建立了民主政府，由于他们的努力而获得通过的各项要求中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建立以意大利民族原则为基础的政府，也就是通过了圭拉奇所提出的关于派遣代表参加意大利制宪议会的建议。

皮蒙特与西西里岛会跟着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它们会像去年那样跟着起来。

往后将会怎样？意大利的第二次觉醒会不会和过去一样，在三年之内成为欧洲民主力量新高涨的曙光？看来大有可能。反革命已经恶贯满盈了。法国准备投入冒险家的怀抱，只要能够摆脱卡芬雅克和马拉斯特的羁绊。德国处于空前的分裂状态，奥地利被击溃了，普鲁士正处于内战的前夕——二月和三月的所有一切幻想，都被急剧的历史进程无情地践踏无遗了。

的确，从反革命的新胜利的经验中再也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但愿人民在即将来临的事变中，**及时地、大胆地**运用最近六个月来的教训。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30 日“新莱茵报”

第 15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德国教授们的可耻行径

科伦 11 月 29 日。德国教授们的奴才本性在柏林和哈雷的学者先生们身上得到了它的理想表现。甚至俄国的农奴也会为这种奴才的思想方式感到羞耻。一个恭而敬之地吞食达赖喇嘛粪便的虔诚的佛教徒听到关于柏林和哈雷佛教徒的消息时会大为惊讶；他会觉得这些佛教徒在“天赋”王权面前表现出这种出卖节操的行为是难以置信的；只有把柏林和哈雷的教授们亲笔签名的 11 月 24 日和 21 日给普鲁士国王的奏折拿给他看时，他才会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讨论的自由被消灭了，议员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议会的身价和民族的荣誉遭到了蹂躏，目的在于终止这种恐怖统治的最善意和最正义的建议被那些需要恐怖的人的反抗粉碎了。”

柏林的八十名教授，其中包括亨格施坦堡、雪恩来因、埃林堡、伯克、格林兄弟等等，就是用制造这种无耻谎言的手段，来显示他们这些天生的奴才对主子的忠诚的。他们给国王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里，这些驴了学者们对勃兰登堡内阁的暴力行为表示赞成。

哈雷的十九名教授的奏折的内容也是如此，不过他们还极其可笑地谈什么“自己职业的重要性”。

这两个奏折的实质就是对**拒绝纳税**表示异常疯狂的愤恨。这是可以理解的！捐税一消失——享受特权的学问也就要破产。只

要这些贪得无厌的坏蛋教授们的钱袋稍微受到一点威胁，整个科学就要大发雷霆。他们的垄断的基础是“天赋”王权。他们给国王上奏折保证他们的忠诚，其实这意味着：他们要终身矢志于自己的垄断。如果人民将来取得了最后胜利，那末，不管“他们的科学职业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这些先生很快就会站到被他们百般诅咒的人民主权方面来。可是，到那时人民会向他们喊道：“太晚了！”——并迅速消除享受特权的学者们的一切卑鄙行为。

写于 1848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30 日
“新莱茵报”第 156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劳麦先生还活着

科伦 12 月 6 日。不久前,我们曾提到过哈雷和柏林的教授们向国王表示忠顺的奏折。今天,我们可以向大家报道:冯·劳麦先生,即驻 in partibus (外国)的帝国大使、此刻正在巴斯蒂德和卡芬雅克的会客厅里等待接见的人,声明他赞同上述奏折,因而完全参与了教授们的可耻行径。对于劳麦先生之流的帝国大使,实际上也不可能期待别的东西。不过,他之所以发表这种声明,看来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在德国,好几个月以来劳麦先生被人置诸脑后。为了摆脱这种被人忘却的境况,他不择手段,于是贪婪地抓住了他的柏林的同党们给他的机会,急忙发表了仓卒草就的声明。劳麦的这一杰作登载在最近一号“普鲁士国家通报”上。

写于 1848 年 12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2 月 7 日
“新莱茵报”第 162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反革命的第二阶段

科伦 12 月 6 日。反革命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国民议会被解散了。“陛下”已直截了当地宣布了钦定宪法。

5 月间开始的伪善的“协商”把戏已被戳穿了，现在最后一块遮羞布已经撕掉了。

三月革命被宣布为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天赋”王权在庆祝自己的胜利。

权奸、容克地主、官僚以及一切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反动派，都由于愚笨的人民最终又被驱入“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畜栏里去而一致欢呼。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6 日

载于 1848 年 12 月 7 日“新莱茵报”
第 162 号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国民院

伯尔尼 12 月 6 日。在这个欧洲暴风雨时期，谁还去注意瑞士呢？大概除了那个觉得在莱茵河左岸，从康斯坦察到巴塞尔的每一个丛林后面都埋伏有志愿兵的帝国政府以外，谁也不会去注意。但是，瑞士是我们的重要邻邦。今天，立宪制的比利时是正式的模范国家⁹²，可是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暴风雨时代，谁又能保证，明天瑞士不会变成这种正式的模范国家呢？现在我已经知道，有不少一本正经的共和主义者总在幻想从莱茵河彼岸把具有大大小小的联邦委员会、国民院、联邦院等等的瑞士的政治制度通盘搬来，就是说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幅员广大的瑞士，这样他们就可以当上大会议的议员，或者巴登、黑森、拿骚的州议会的议员，温文尔雅地过和平而安静的生活了。

所以，我们德国人无论如何要关心瑞士。瑞士人现在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最近就有可能拿来作为我们效法的典范。因此，我们不妨预先稍微熟悉一下，瑞士联邦的二十二个州在自己联邦和国内究竟倡导了些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培育了些什么样的人物。

自然，我们首先应该熟悉一下瑞士社会的精华，即那些被瑞士人民选为代表的人物；我指的是正在伯尔尼市政厅开会的国民院。

无论谁，只要他走上国民院的讲台，都会对瑞士人民派到伯尔尼来讨论全民性共同事务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感到惊讶。没有在瑞

士大部分地区呆过的人，未必会了解，为什么在这个幅员只有几百平方英里，人口不过二百五十万的小国能有这样一个五花八门的议会。但是，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瑞士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们说着四种不同的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伦巴第语）和罗曼语，在这里，同时存在着文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从最先进的机器工业直到地地道道的畜牧生活。瑞士国民院集所有为些民族和各个文明发展阶段的精华于一身，所以完全不像是一个国家的议院。

在这个半宗法制的议院中，根本谈不上有固定座位和独立政党。激进派曾经作过一次小小的尝试，想占据最左面的座位，但是，看来他们没有成功。谁想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并且往往在一次会议期间更换三四次座位。但是，大部分议员都有自己喜欢的经常座位，因此，议会终究还是相当明显地分成了彼此不同的两部分。坐在前面三条半圆形议席上的人们，个个脸部轮廓突出，大多蓄有髯须，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巴黎时装，这是瑞士法语区和瑞士意大利语区的代表，或者，如当地人所称呼的那样，是“罗曼人”，坐在这些议席上的人几乎全都说法语。坐在罗曼人后面的是一些五光十色得出奇的人物。的确，那里看不见穿瑞士民族服装的农民，相反地，这些人物都穿着带有某种文明象征的服装；有时，甚至还可以看到多少有些时髦的燕尾服，穿这种服装的人的外貌多半文质彬彬。再后面是半打彼此极为相像的、穿便服的瑞士军官，他们都有一副与其说是威武，不如说是庄重的仪表。他们的打扮和穿着都显得有些过时，而且，一般地说，他们都同“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的哀杰克斯⁸³有些相像。最后是基本群众，他们的面孔和服装难以描绘，都是些多少上了岁数的旧派先生；他们彼此极不相

像，各有特点，大多数都可以上漫画。这些人代表着各种小资产者、campagnard endimanché（穿节日服装的农民）和各州的寡头政治。他们个个都仪容可恭，人人都严肃得可怕，一律戴着笨重的银边眼镜。这是瑞士德语区的代表，他们来自较小的州和大州边远地区，是议院的基本群众。

坐在议院主席席位上的是疏森的著名博士罗伯特·施泰格尔。几年前，在济格瓦特-弥勒政府时期，他曾被判处死刑。现在他是瑞士联邦议会的议长。施泰格尔个子不高，矮小而结实，独特的脸形在银发黑须的烘托下给人以一种快感，虽然他老戴着银边眼镜。他很沉着地，也许有些过于矜持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辩论。只有“罗曼人”（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罗曼人）说话十分文雅，具有演说家的风度。在瑞士德语区的居民中，伯尔尼人最喜欢模仿罗曼人的气派，他们也最接近罗曼人。在他们身上还能感到一些激昂热情的气质。瑞士雅典人的后裔苏黎世人说话庄重有力，半似教授，半似行会制度时期的师傅，但总带“知识分子腔”。军官们发言郑重而缓慢，不太熟练，而且内容贫乏，可是，声音坚决果断，就像是他们的全副武装的营队正在他们后面待命而立。最后，这个议院的基本群众推出的发言人都多少善于思考，小心谨慎，能仔细地权衡所有论据的利弊，而归根到底总是维护本州的利益；他们差不多个个发言都很不连贯，常常用他们自己的语法规则造句。当辩论涉及经费问题时，倡议多半是由他们，特别是由那些旧州的代表提出的。在这方面，乌利州在两院中已经获得了完全应得的声誉。

因此，一般说来辩论是贫乏、沉静、平庸无奇的。在国民院中，有才干的、在更大的会议上也能受到欢迎的演说家寥寥无几。我只

知道两位——鲁维尼和杜福尔。爱特尔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位。诚然，几位具有更大影响的议员的发言我还没有听到，但是不管从他们在议会中的成就或者是从报上关于他们演说的报道来看，都无法使我们对之寄予过多的希望。据说只有诺伊豪斯是个卓越的演说家。其实，在这至多只代表几十万人，并且只能讨论最琐碎的地方性问题的会议上，演说才能怎么能够得到发挥呢？已经寿终正寝的联邦代表会议，与其说是个立法会议，倒不如说是个外交会议。从这个会议上可以学到怎样发混乱的指示和怎样摆脱窘境的本领，但是引导和掌握会议的办法是学不到的。因此，国民院议员们的发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局限于论证表决的根据，并且每个人都要阐述一番自己赞成或反对的主要理由，每个人都毫不害羞地重复前面发言人早已重复得令人作呕的老调。特别是大部分议员的发言都带有宗法式的坦率的特点。如果这些先生中谁得到了发言机会，那他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去瞎扯一通，对于辩论中涉及的所有事件都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那怕关于这些事件的辩论早已结束。几位主要发言人极力想从这些头脑简单的人的胡说八道中掌握住辩论的线索，可是在会议结束后，你只会觉得，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无聊的演说。小市民 *physique* (在外表上) 给会议带来了某些新东西，因为很少见到他们打扮得这样古雅，但 *au moral* (在精神上)，他们在这里，和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都是枯燥乏味，毫无热情，更谈不到聪明机智了。只有一位鲁维尼的发言具有感人的然情的力量；杜福尔是能以清晰准确的法语发言而使人敬佩的唯一的一个人。巴塞尔州弗雷的发言是风格幽默的范例。贝诺特上校有时也颇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幽默风格。瑞士法语区的居民丝毫没有一点法国人的风趣。自从阿尔卑斯山脉和汝

拉山脉存在以来,在他们这一边从未创造出一个差强人意的双语,从未有过一次流畅而中肯的反驳性发言。瑞士法语区的居民不仅 sérieux (严肃),而且 grave (严峻)。

这里我想较详细地描述一下关于德森事件和居住在德森的意大利流亡者的辩论。这一事件发生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居住在德森的意大利流亡者的所谓阴谋,成了拉德茨基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措施的一种借口;首府州伯尔尼往德森派去了享有广泛权限的联邦政府全权代表,而且还派去了一队士兵;由于在维尔特林^①和瓦列·因泰尔维爆发了起义,有些流亡者就想回到伦巴第去,尽管瑞士边防岗哨戒备森严,他们还是成功了;他们越过了国境,但是并没有携带武器,他们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又没有携带武器从瓦列·因泰尔维返回德森地区。在这里他们被德森州政府驱逐出境。这时,拉德茨基在边境地带加强了镇压,并对联邦政府全权代表加倍地施加压力。

联邦政府全权代表要求无例外地驱逐所有流亡者出境,德森州政府拒绝这样做,首府州批准了全权代表的命令;于是,德森州政府便向当时正在开会的联邦议会提出申诉。国民院有责任讨论这个申诉,并研究双方所提出的,主要是关于德森人如何对待全权代表和瑞士军队的实际材料。

被委托处理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建议把所有意大利流亡者驱逐出德森,把他们集中在瑞士内地的一个地区,禁止新的流亡者进入德森,并且批准首府州的命令,延长其有效期限。委员会报告人是疏森的卡济米尔·普菲弗尔先生。可是,当我穿过

^① 意大利称作:瓦尔特林纳。——编者注

密密麻麻的听众，挤到旁听席时，普菲弗尔先生已经结束了他那十分枯燥无味的报告，接着发言的是皮奥达先生。

德森国务秘书皮奥达先生是委员会中少数派的唯一代表。他建议只驱逐那些参加了最近这次起义的流亡者出境，因为对他们问罪有名。这位反“宗得崩德”⁹⁴战争时期的少校营长皮奥达先生，别看他金发碧眼、外貌温和，当日在艾罗洛附近表现得英勇非凡，在敌军人数从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作战地势优越的情况下，坚守了阵地一个星期。皮奥达的发言和他的外貌一样，温和文雅、富于感情。他精通法语，而且说得非常流利，不带任何土音。最先我以为他是瑞士法语区的居民，后来才晓得他是意大利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当他谈到那些对德森人的非难时，当他为了反驳这些非难，描述瑞士军队在德森的行动就像在敌国境内的所作所为一样时，当他开始激动时，他就表现出一种如果说不是激情，那也是活灵活现的纯粹意大利人的能言善辩的特点。他时而使用了古代文句，时而又流露出独特的、不免过于夸张的现代演说家的慷慨激昂的风度。应该承认，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他善于适可而止，因此他的发言的这些部分就更显得绘声绘色。然而，整个说来，他的发言未免过于冗长和过于激动。瑞士德语区的居民们穿着贺雷西的 *aes triplex* (三层青铜盔甲)^①，所以，善良的皮奥达的所有精辟警句、所有高尚感情都被他们又宽又硬的胸膛顶回去了，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继皮奥达之后，苏黎世的阿尔弗勃德·埃歇尔博士先生走上了讲台。A la bonne heure (大家注意)——这正是 *comme il en*

① 贺雷西“颂歌”。——编者注

faut pour la Suisse (瑞士所需要的) 人物！埃歇尔博士先生是联邦政府驻德森的全权代表，国民院副议长。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是著名的机械专家埃歇尔工程师的儿子。他父亲开凿了林特运河，并且在苏黎世附近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厂。埃歇尔博士先生与其说是苏黎世人，不如说是“瑞士的雅典人”。他的燕尾服和坎肩是由苏黎世最好的 marchand tailleur (裁缝) 缝制的，使人感到他具有一种模仿巴黎时装杂志上的服装式样的可嘉的、有时是不无成效的意图，但是终究仍能觉察到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地方局限性的影响，这种地方局限性迫使裁缝们不得不遵循这里习惯的服装式样。真是凭衣识人。他的淡色头发剪得很细致，可是小市民的味道十足，髯须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瑞士的阿基比阿德当然也要留髯须——这是想装得酷似阿基比阿德第一的、出身“名门”的苏黎世人的一种怪癖。当埃歇尔博士先生代替施泰格尔几分钟，坐上主席席位时，他便竭力显示他那种既威严又文雅冷漠的风度，这时，恐怕马拉斯特先生都要羡慕他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尽力利用这几分钟，让自己那在硬梆梆的长凳上坐酸了的脊背在这软绵绵的圈椅上休息一下。一句话，埃歇尔先生像一般瑞士雅典人所能够作的那样，举止非常文雅，同时，他还富有、漂亮、健壮，年纪不超过三十三岁。——对伯尔尼的太太们来说，这位苏黎世的阿基比阿德真是一种莫大的危险。

此外，埃歇尔先生还说一口又流利、又漂亮的德语，这对一个在瑞士本土出生的雅典人说来，一般是不很容易的。他会说一些诙谐的成语，虽然带有多立斯口音，但是不出语法错误，这就更不是瑞士德语区选出的任何一个国民院议员都能做到的了。像所有瑞士人一样，他说起话来，神气十足。要是埃歇尔先生已经七十岁，他

的讲话就不会像前天的发言那么神气了。但是，他是这个议院中最年轻的议员之一。此外，他还有一种瑞士人所没有的品质。瑞士德语区的每个居民，不管讲什么话，不分任何场合，终生都是使用一种手势。例如，凯伦博士先生是右手侧平举，成直角。军官们也是这种手势，只有一点不同，军官们的手是前平举，而不是侧平举；阿劳的唐纳先生每说三个字就一鞠躬；富勒尔先生也这样鞠躬，时而向前，时而转身半面向左或向右。总之，如果把所有说德语的国民院议员集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电报密码体系。埃歇尔先生的手势是，一只手前平举，俨然像抽水机上的杠杆一样，不断地伸缩。

至于说到埃歇尔博士先生发言的内容，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赘述他发言后全权代表们的抱怨了，何况这些抱怨几乎全都由大多数德国报纸从“新苏黎世报”上转载了。这篇发言没有丝毫新东西。

意大利式的热情代替了苏黎世式的庄重神气；继埃歇尔博士先生之后发言的是鲁维尼上校。鲁维尼是个出色的军人，德森州一切军事组织的业绩都应当归功于他。1840年革命时期，他曾指挥军队作战；1841年8月，由于他的机智和毅力，在一天内就粉碎了那些已被推翻的政治寡头们和神甫们企图从皮蒙特进犯并实行反革命政变的企图。在反宗得崩德的战争中，他由于被宾登人遗弃而成了唯一的俘虏。鲁维尼从座位上跳起来，为自己州的同胞辩护，反驳埃歇尔的攻击。埃歇尔先生的责难虽然言过其词，但表面上语调却很平静，好像小学教师讲话一样，然而不能说它不尖酸刻薄，相反地，每个人都明白，空谈家深奥难懂的发言本身就是颇令人难于忍受和感到侮辱的了。

鲁维尼以老兵和德森人的全部热情反驳了埃歇尔。德森人作为瑞士人只是由于偶然性，而作为意大利人则是由于天性。

“难道这里不是有人直接责难德森人，说他们‘同情意大利的自由’吗？是的，这个责难是对的。德森人同情意大利，我为此而骄傲，并且将日日夜夜不停地祷告上帝，祝这个国家从它的压迫者之下解放出来。是的，与埃歇尔先生所说的相反，德森人是安静而和平的人民。但是，如果他们每日每时都不得不看到瑞士士兵同奥地利人，同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不能不使我的内心深为痛苦的那个人的警察队伍，同拉德茨基的雇佣兵在那里亲密交往，称兄道弟的话——他们怎能保持安静呢？要知道，在他们看来，克罗地亚人干的尽是丑恶不堪、残酷无情的勾当。是的，德森人是安静而和平的人民。但是，当有人把那些与奥地利一鼻孔出气的、有时也像克罗地亚人一样横行霸道的瑞士士兵派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当然不能再安静和平下去了！（随后他列举了许多说明瑞士军队在德森的所作所为的事实。）处在外国人束缚与奴役之下已够沉痛、够悲伤了，但是，当你身受这种屈辱的时候，总还可以盼望有一天会把外国人赶走。然而，当你的弟兄和同盟者奴役你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们把绞索套到你脖子上的时候，这就实在……”

主席的铃声打断了发言人的讲话。这是在提醒鲁维尼注意秩序。他又讲了几句话，便气冲冲地断然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热情洋溢的鲁维尼之后，格劳宾登的米歇尔上校走上讲台。宾登人，除了说意大利语的米佐克斯^①居民以外，自古以来，对待自己的邻居——德森人，就不怀好感。米歇尔先生也忠实于自己故乡的这种传统。他以极其庄重和慈善的口吻说话，企图诋毁德森人的声明，对德森的人民群众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甚至根本不近人情地非难德森人，说他们（完全公正地）把他们在艾罗洛的失败归咎于米歇尔的同胞——宾登人。在发言结束时，他客气地提议要德

^① 意大利称作：梅佐科。——编者注

森政府负担一部分边防费用。

根据施泰格爾的提议，辩论到此暂时停止。

第二天早晨，最先发言的是苏黎世的贝尔格上校先生。贝尔格上校先生（用不着我描写他的外貌了，因为前面我已经说过，在瑞士德语区，所有军官彼此外貌非常相似）是驻德森的苏黎世营营长，并于这个营的凶暴横蛮，鲁维尼先生已引了许多例子加以说明。自然，贝尔格先生有责任替自己的营辩护。但是，由于他很快就为此而收集的所有事实和理由说完了，于是，他便转而对鲁维尼进行异常激烈的人身攻击。

他说：“鲁维尼在这里谈到军队的纪律，并使最优秀、最坚强的一个营的纪律受到怀疑，他应该感到惭愧。因为我若是发生了像鲁维尼先生发生过的那种事情的话，我早就提出辞职了。在反宗得崩德战争中，鲁维尼先生和他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在接到进攻命令时，他却说什么不可能，因为他的军队士气不振等等。其实，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打算在这里，而是在别的场合同鲁维尼先生谈的。我喜欢和论敌当面交锋。”

贝尔格先生在发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挑衅性的声明和侮辱性的言论时，有时口吻非常自信，神气十足，有时语调激昂，愤愤不平。显然，他想模仿鲁维尼的慷慨陈辞的风度，结果却大丢其脸。

由于在我的报道中曾两次提到艾罗洛事件，而现在又碰到它，那我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简略地谈一谈。杜福尔对宗得崩德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在主力军进攻夫赖堡和琉森的同时，德森人应该穿过圣哥达，而宾登人则应该经上阿尔卑斯进入乌泽恩山谷，解放并武装当地热爱自由的居民，用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切断瓦里斯与诸旧州的联系，截断宗得崩德的琉森主力军。这个计划没有

实现,第一是由于在军事行者开始之前,乌利人和瓦里斯人就已占领了圣哥达,第二是由于宾登人行动迟缓。宾登人根本没有把天主教自卫团动员起来,而已动员起来的部队又受天主教居民的影响,他们在迪先提斯最高法院会议上表示拒绝继续进攻。这样一来,德森便不得不孤军作战。然而,要却道,这个州的武装组织还很年轻,全德森的军队总共只有三千人左右。与宗得崩德相比,德森势孤力薄便是显而易见的事了。与此同时,乌利、瓦里斯和温特瓦尔顿各州得到了装备有大炮的两千人的部队的增援,这些州的军队于1847年11月17日突破圣哥达,冲进了德森。德森的军队正列成梯阵,驻扎在比林索那与艾罗洛之间的勒文蒂纳河谷一带,后备队伍则驻在罗迦诺。宗得崩德的军队在浓雾掩蔽下占领了艾罗洛周围的所有高地。雾散天晴时,鲁维尼才发现,没响一枪一炮,他的阵地已完全丧失。但是,他还准备反攻,经数小时的搏斗(在搏斗中,德森人表现得无比英勇),他的军队由于寡不敌众,被迫退却。起初,有几支部队掩护撤退。但是,由于被敌人左右包抄和受到居高临下的炮击,德森的新兵很快就仓皇逃散,溃不成军,只是过了八个小时,直到莫埃沙附近,才算压住了阵脚。熟悉圣哥达道路的人一定清楚,从山上往下冲锋的军队占有多么大的优势,特别是在有炮兵的时候;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从山上往下退却的军队,在那区区狭谷中,既无立足之地,又无法展开自己的队伍,何况实际参加这一战斗的德森人,在数量上不仅不比宗得崩德的军队多,而且恰恰相反。这一次其实并没有产生深远后果的失败,自然不能归咎于鲁维尼,而是由于:第一,他的军队人数不多,缺乏训练;第二,地势不利;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宾登人没有及时支援,他们没有到阿尔卑斯去,却在迪先提斯安闲无事地大饮特饮维尔特林葡萄酒,

直到后来，才 post festum (放马后炮)^①，派了两个营经圣伯纳德山口去支援德森人。可是那些在紧要关头见死不救的人，那些在夫赖堡和琉森战役中以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取得了小小胜利的人，却因为宗得崩德以优势兵力取得了唯一的一次胜利而责难德森人！

你们知道，贝尔格这次对鲁维尼的攻击导致了决斗，在决斗中，罗曼人向苏黎世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还是言归正传，继续谈辩论的情况吧。土尔高州的凯伦先生登上讲台，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提议。凯伦先生是典型的瑞士人，高个子，宽肩膀，一张愉快而富有表情的面孔，头发梳得有些矫揉造作——老实的瑞士人会以想像中的奥林帕斯山的丘必特就是这个样子。论服装，他有点像学者，他的眼神、语调和举止都显示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果断精神。凯伦先生被认为是瑞士最有才干、最有洞察力的律师之一。这位联邦法院院长用“他所特有的逻辑”，用他那故弄玄虚的言辞，开始详细地叙述自己对德森问题的看法。但他很快就使我感到非常无聊，于是，我觉得倒不如到“意大利咖啡馆”去喝一杯瓦里斯酒。

当我回来时，在凯伦之后，日内瓦的阿尔梅拉斯，瓦得州^②的洪贝格尔，布朗施奈以及日内瓦的卡斯托蒂都已相继发了言。他们都是地方上的或多或少有权势的人物，他们在瑞士才初露头角。正在讲台上发言的是瓦得州的爱特尔。

瑞士人的个子比一般人高大，就像瑞士的牛比一般牛粗壮一样。所以在瑞士，爱特尔先生的个子不算高，虽然在法国可能算

① 直译：在节日之后。——编者注

② 法国称作：窝州。——编者注

得，上是个 jeune homme fort robuste（非常魁梧的青年人）。他面目清秀，浅色的胡须，浅色的卷发；他和瓦得州所有居民一样，比瑞士罗曼语区的其他居民要更像法国人。我没有必要补充说，他是瓦得州极端激进的红色共和派的最知名的代表之一。而且他还年轻——绝不比埃歇尔大。爱特尔先生很激烈地反对联邦政府的全权代表：

“他们在德森作威作福，似乎德森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只是一个省份，而他们是管辖这个省份的总督。如果这些先生们在法语州里的行为也是这样的话，那早就请他们滚蛋了！但是，这些先生们对于德森人心平气和地忍受他们那种以胜利者自居的派头和狂妄，不仅不知感谢上帝，反而埋怨接待不周！”

爱特尔先生发言很精彩，但有些冗长。他像所有瑞士法语区的人一样，缺乏机智。

老施泰格尔也从主席的席位上替多数派的提议说了几句话，接着，我们的阿基比阿德-埃歇尔又上台重复他以前讲过的那些话。而且，这次他还想卖弄演说技巧。然而，就是隔三里远也听得出，这是小学生在学习朗读：

“或者我们保持中立，或者我们不保持中立。但是，不管中立不中立，我们都应该一贯到底。瑞士固有的忠诚要求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哪怕这诺言是对专制暴君许下的。”

埃歇尔先生不知疲倦的手就像抽水机一样，从这新颖而令人信服的思想中，滔滔不绝地抽出了一大堆庄严的豪言壮语。在这之后，阿基比阿德洋洋自得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随后走上讲台的是最高法院院长，阿劳的唐纳先生。他身体瘦削，中等个子，发言时高喉咙大嗓子，讲的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

他的发言不外是千百次地重复同一个语法错误。

下一位发言人是法语州瓦里斯的莫里斯·巴尔曼先生。从外表看来,谁也不敢相信,在1844年,以卡贝马顿、里德马顿和其他的马顿们^①为首的上瓦里斯人在该州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他在庞-德-特里延特附近会那样勇敢地战斗。巴尔曼先生外貌显得沉静,像小市民,但是丝毫不令人感到不快;他说话缓慢,断断续续。他反对贝尔格对鲁维尼的人身攻击,表示赞成皮奥达的提议。

德森的巴塔里尼先生外貌有点像小市民,嘴巴刻薄的人会把 he 比作“费加罗”中的巴尔托洛医生⁹⁵。为了维护本州的利益,他用法语对中立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其中包含着许多完全正确的原则,但是没有引起听众的特别注意。

突然,会场鸦雀无声,谈话和走动顿时停止。出现了一种庄严的静寂。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注视着—位没有髯须、秃头、鹰鼻的老头,他用法语开始了自己的发言。这个小老头身穿普通的黑西装,文人打扮,极像学者。他那富于表情的面孔,锐利的炯炯目光很引人注目。这正是**杜福尔**将军,就是那位靠自己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几乎没有流血就把宗得崩德镇压下去了的杜福尔。他和会场里瑞士德语区的军官多么不相像啊!所有这些米歇尔、齐格勒、贝尔格等等,这些有勇无谋的莽汉,这些愚蠢的丘八,同这位矮小的、貌不惊人的杜福尔相比,简直给人一种迥然不同的特殊印象。一眼就可以看出,杜福尔是对宗得崩德进行的全部军事行动的决策人,而那些自命不凡的哀杰克斯只不过是完成他的决定的简单工具而已。真的,联邦代表会议做了正确的选择,找

① 俏皮话:《Matten》(马顿)是前面两个人名的组成部分,同时有“高山上的草地”的意思。——编者注

到了合适的人材。

可是，当你听杜福尔发言时，你才会真正感到惊讶呢。这位一生中只从事建立炮兵学校、起草操作规程、视察炮台，从未参与议会辩论，而且从未当众作过演说的工程部队的老军官，在这里发言时却表现了惊人的镇定、轻松，用语精辟、确切、明了。在瑞士国民院中，没有人能和他匹敌。杜福尔这篇关于德森问题的 maiden-speech (初次议会演说)，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论，即使在法国议会中也一定会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篇发言在各方面都大大胜过卡芬雅克^①那篇给他带来巴黎最优秀律师声誉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根据“通报”发表的发言全文可以做这样的论断。至于谈到语言的优美，这篇发言就更值得加倍赞扬，因为它是出自日内瓦人之口。日内瓦的民族语言，是根据加尔文教精神改革了的法语，发音拖得很长，而且很粗硬，词汇贫乏，单调一律，平淡无力。而杜福尔发言，用的不是日内瓦人的语言，而是真正的最纯洁的法语。此外，他的观点具有军人（在这个字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高尚气度。所以，瑞士德语区的军官们的职业妒忌心，勾心斗角的竞争，拘泥小节的州的局限性就更加相形见绌了。

杜福尔说：“人人言必谈中立，这使我非常高兴。但什么是中立呢？中立就是我们不做或者不容许做能给瑞士与其邻国的和睦关系带来威胁的事。不能少于这一点，但也不能多于这一点。所以，我们有权利让流亡者避难，并且我们以这种权利而自豪。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对那些遭受不幸的人应尽的义务。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流亡者必须服从我们的法律，他们不能从事危害我们国内外安全的活动。我完全了解，遭专制暴政驱逐的爱国者，在我国领土上也力求为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斗争。我并不因此责难他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① 高德弗鲁阿·卡芬雅克。——编者注

我们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行动。所以，如果流亡者用笔或者用枪进行斗争，去反对邻国政府的话，我们并不因此就驱逐他们，那样做是不公正的；我们只是叫他们远离国境地区，让他们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这是由于顾及到我们自己的安全和尊重邻邦。必须这样做，但是也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如果我们不仅反对潜入别国领土的志愿兵，而且也反对志愿兵的父老兄弟，反对那些安分守己的人，那我们就是做得过分了，我们就不是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别国政府那边，站在专制制度那边去反对这个制度的牺牲者了。（从所有议席上发出喝彩声：“讲得对！”）正是现在，当拉德茨基，这位所有与会者中间未必会有人同情的拉德茨基，要求我们不公正地叫所有流亡者远离边境地带时，当他想采取威胁手段，甚至采取敌对的措施来实现自己的要求时，我们更不应该满足比较强大的对方的不合理要求，因为这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向占优势的力量让步，似乎我们采取这种决定，只是因为此较强大的对方要求我们这样做。（喝彩声：讲得对！）”

可惜，我不能更详尽、更准确地复述这篇发言。这里没有速记员，我只能凭记忆来写。只要补充一点就够了：杜福尔的演说天才，他发言的平易近人以及他所引用的确凿论据，使所有到会的人都惊讶不已。随后，他宣布支持皮奥达的提议，便在全场一致的掌声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在国民院辩论中，我从未听说过有人鼓掌。这样，就事成定局。在杜福尔发言之后，便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于是皮奥达的提议被通过了。

但是，这并没有使那些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小州的骑士们满意。当表决是否停止辩论时，他们有四十八票要求继续辩论。投票赞成停止辩论的只有四十二人，于是辩论继续进行。瓦得的维昂先生提议，把这件事提交联邦委员会解决。瓦得的皮泰先生表示赞成皮奥达的提议。皮泰先生是个美男子，典型的法国人，讲话流利，冗长，好高谈阔论。当联邦主席富勒尔先生登上讲台时，看来，辩论已接近尾声了。

富勒尔先生年华正茂，他可以补阿基比阿德-埃歇尔的不足。埃歇尔代表瑞士的雅典人，富勒尔先生则代表苏黎世；埃歇尔像一位教授，富勒尔则更像是行会制度时期的师傅。他们两位合在一起，便使人们对苏黎世有了完整的概念。

富勒尔先生当然是位主张绝对中立的人。因此，在杜福尔发言之后，他感到自己的体系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便拿出最后一着来，以保证赢得大多数。虽然富勒尔先生只是在三天以前才当上了联邦主席，但是他却证明，他把辩论归结为对政府信任问题的本事并不亚于杜沙特和汉泽曼。他声明说，联邦委员会迫不及待地等候国民院做出决定，因为这一决定会使瑞士的整个政策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等等。他稍微粉饰了一下这种 *captatio benevolentiae* (哗众取宠的企图)，就逐渐把话题转到叙述自己和联邦委员会多数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上面去。他说，中立政策是不容动摇的，处理这一问题的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也就是联邦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他说这些话时，威风凛凛、斩钉截铁，使人感到每一个字都贯串着对政府信任的问题。这里有必要提一句，在瑞士，与君主立宪政体和新的法兰西宪法不同，执行机关不是与立法机关平行而独立的，它只不过是立法机关的表现者和工具。应该注意到，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惯例，即当立法会议的决定与执行机关的意图有分歧时，执行机关便提出辞职；相反地，通常它只能唯命是从地执行这种决定，坐待好时光的到来。由于执行机关也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它的成员也是形形色色的，所以，即使执行委员会的少数派在某些问题上获得立法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况且在这里，至少有两名联邦委员会的委员支持皮奥达，反对富勒尔，这就是德律埃和弗兰西尼；所以，富勒尔向议会发出的呼吁，从

瑞士的习惯和观点看来，是完全不符合议会制度的精神的。但是，横竖还不是一样！联邦主席先生的举足轻重的讲话，重新给了小州的骑士们以勇气，当他回到座位上去时，他们甚至发出了瞬息即逝的“叫好声”，并要求停止辩论。

但是，老施泰格尔做得非常公正，预先给了少数派的报告人皮奥达先生以发言机会。皮奥达像以前一样，说话沉着、彬彬有礼。他再次驳斥了所有的非难，给辩论做了扼要的总结。他满腔热情地替他的朋友鲁维尼辩护。他那充满热情的娓娓动听的言辞，也许使得鲁维尼悠然神往。但是，绝不应该忘记，鲁维尼为瑞士保住了自己的州。最后，他谈到了艾罗洛事件，并且对于在这里曾提起这件事，而且是最出乎他的意料的那些人提起这件事，表示遗憾。

他说：“我们的确在艾罗洛打了败仗，但是，我们是如何失败的呢？我们是孤军作战，而诸旧州和瓦里斯是倾全力突然袭击我们人口稀少的小州的。虽然我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还是把我们打败了。我们的确是被击溃了。但是，难道你们（面向米歇尔）有资格因此责备我们吗？先生们，我们之所以被击溃是由于你们的过错。你们本来应该到上阿尔卑斯去，从侧翼袭击宗得崩德军队，正是因为你们没有到那里去，正是因为你们把我们弃而不顾，所以我们才被击溃了。是的，你们去了，先生们，但是，当你们终于到达时，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已经完了！”

米歇尔上校愤怒地跳了起来，面红耳赤地说，这完全是撒谎和诬蔑。场内发出激怒的呼声，主席也摇了铃，要求他遵守秩序，他这才比较冷静地讲下去。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应当到上阿尔卑斯去，他只知道，接到命令后，他第一个去支援了德森人。

皮奥达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回答他说，他并不想责难米歇尔先生本人，他只是般地谈到格劳宾登人，而格劳宾登人有责任从上阿尔卑斯方面支援德森人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如果米

歇尔先生不清楚这件事情,那很可能是由于他那时只指挥一个营,所以总的作战计划他可能不知道。

这段小插曲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先生们在会外作了各种各样的私人解释,最后发表了双方满意的声明,才算收场,辩论也就此结束了。表决是按有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的。法语区的议员和四五位德语区的议员投票赞成德森人,大多数德语区的议员则投票反对德森人。德森允许别人避难的权利被剥夺了,拉德茨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议会宣布不惜任何代价严守中立,富勒尔先生可以沾沾自喜,并对国民院感到满意了。

使瑞士国家精华聚于一堂的瑞士国民院就是这个样子。我认为,他们与其他立法者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他们具有一种美德:更大的耐心。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2 月 6 日
载于 1848 年 12 月 10 日“新莱茵报”
第 165 号和第 165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反 革 命 政 变

科伦 12 月 7 日。国民议会被解散了。人民代表“奉天命”被驱散了。

内阁不仅厚颜无耻地举行了政变，而且在说明采取这种暴力行为的理由时还发出了恶毒的嘲笑⁹⁶。

国民议会长期以来软弱怯懦，现在它自食其果了。它曾听任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在好几个月中从容地策划、加强和巩固，而现在它成了这种阴谋活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同时，人民也在赎取他们在 3 月间以及后来在 4 月和 5 月间由于宽大，更确切些说，由于糊涂所犯下的罪过，赎取他们进行所谓“消极反抗”所犯下的罪过。现在，他们获得了教训，可以预料，这种教训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他们下一次的胜利将会结束“协商”政策及一切空话和伪善。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7 日
载于 1848 年 12 月 8 日“新莱茵报”
第 16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

科伦 12 月 9 日。我们从不隐瞒这一点。我们的基础不是法制的**基础**，而是**革命的基础**。现在，政府方面抛弃了法制的伪善面目。它站到了革命的基础上，因为现在**反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的基础**。

1848 年 4 月 6 日颁布的法律的第六者规定：

“颁布一切法律时的表决权，以及确定国家预算和批准**税收权**，无论如何都应属于未来的人民代表。”

1848 年 4 月 8 日颁布的法律的第十三节规定：

“根据本法律召开的议会，其使命是通过同国王协商的办法制定**未来的宪法**；议会在其存在期间享有原先各个国家等级的权利，特别是批准税收的权利。”

现在，政府驱散了协商议会⁹⁷，擅自强迫国家接受 *soi-disant*（所谓）**宪法**⁹⁸，并且自己给自己批准人民代表拒绝给它批准的捐税。

普鲁士政府用沉重的一击消灭了康普豪森之歌，一种庄严的**法制的约卜西之歌**⁹⁹。为了复仇，这部史诗的创造者——伟大的**康普豪森**，以这个普鲁士政府的使者的资格继续安闲地留在法兰克福，并且为了这个普鲁士政府的利益继续同巴塞尔曼之流进行阴

谋活动。发明了协商论的康普豪森，为了拯救法制基础，即为了首先用欺骗手段使革命失去其应享的荣誉，同时还发明了以后必然要把法制基础连同协商论一起炸毁的地雷。

这个人推行了**间接选举制**，而这种选举制产生了这样一个议会，当这个议会突然发怒的时候，政府就可以声色俱厉地对它说：Trop tard! (太晚了!) 这个人召回了反革命的首领普鲁士亲王，并且不惜用官方的欺骗手腕把亲王的逃跑说成是增长见识的旅行¹⁰⁰。他使旧普鲁士关于政治罪行的立法和旧普鲁士法院继续有效。在康普豪森执政时期，旧官僚机构和旧军队赢得了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时间。旧制度的一切主要活动家仍然盘踞着原来的位置，凛然不可侵犯。在康普豪森执政时期，权奸们在波兹南进行了战争，而他本人则在丹麦进行了战争。对丹麦的战争无非是分散德国青年们的“过分的爱国激情”¹⁰¹的避雷针，此外，这些青年在回国以后还受到了警察的应有的感化；这场战争应当给弗兰格尔将军和他那臭名远扬的近卫军团带来某种声望，而且一般地还应当恢复普鲁士军阀的名誉。这个目的刚一达到，就不惜任何代价，即通过可耻的停战来结束这场装模作样的战争，这种停战是同一个康普豪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的同意下实行的。对丹麦战争的结果是：任命了“**两个马尔克的总司令**”¹⁰²，3月间从柏林被赶出去的近卫军团又回到了柏林。

而波茨坦的权奸在康普豪森的庇护下进行的**波兹南战争**怎样呢！

波兹南战争是一个比反对普鲁士革命的战争更大的事件。这是维也纳的陷落、意大利的失败、六月英雄们的失败。这是俄国沙皇对欧洲革命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而这一切都是在有思考力的

历史之友¹⁰³、大辩论的骑士、协商主义的英雄、伟大的**康普豪森**的庇护下发生的。

因此，在**康普豪森**执政时期，在他的帮助下，反革命占领了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在协商派议会进行辩论的时候，反革命为自己组织了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军队；在行动大臣**汉泽曼-品托**¹⁰⁴执政时期，旧警察领到了新的制服，进行了资产阶级反对人民的既残酷又小气的斗争。在**勃兰登堡**执政时期，根据这些前提作出了结论。为此，只需要一种东西——胡子和军刀，而不是脑袋。

当**康普豪森**辞职的时候，我们说过：

“他根据资产阶级的精神播下了反动的种子，将根据贵族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收获反动的果实。”¹⁰⁵

我们并不怀疑：普鲁士大使**康普豪森**阁下现在已把自己列入封建主之中，他将心平气和地容忍对他所产生的“误会”。

可是不应当产生错觉；不应当把世界历史的首创精神加在某一个**康普豪森**、某一个**汉泽曼**身上，这是一些平庸的人物。他们只不过是阶级的传声筒。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动，只不过是把他们推向前台的那个阶级的官方回声。他们只不过是在前台上代表了大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的代表在那已经安然长眠、只是由于**康普豪森**才暂时苏醒过来的**联合议会**¹⁰⁶中形成了**自由主义反对派**。

有人责难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先生们，说他们在三月革命以后背叛了自己的原则。这是一种误会。

联合议会所唯一代表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一句话，那些有钱的人，都发了财，并成了比较有学识的人。一方面，随着普鲁士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即随着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旧的等级差别

失去了自己的物质基础。

贵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抛弃了信义、爱情和信仰，大都开始贩卖甜菜、烧酒和羊毛。羊毛市场成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场所。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专制国家的旧社会基础已经消失，它已成了束缚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改变了的生产方式和改变了的需求的桎梏。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手中把照管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因为它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官僚对所谓教育的垄断权以后，在意识到它在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做“结社自由权”。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普鲁士资产阶级在1848年3月前夕曾走上了实现自己全部愿望的正确道路。

普鲁士国家遇到了财政困难。它的信贷已经枯竭。这就是召开“联合议会”的秘密。诚然，政府曾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过反抗，无情地解散了“联合议会”，但是，缺少金钱和信贷归根到底必然要把它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正像封建贵族一样，天赋国王们也早已把他们的特权兑换成了硬币。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各个邦中，解放农奴是这种历史交易的头一桩大生意，君主立宪则是这种历史交易的第二桩大生意。《L' argent n' a pas de maître（金钱没有

主人)，但是，只要 démonétisés（失去了金钱），maitres 就不再是 maitres 了。

由此可见，“联合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只不过是一种反对不再适合资产阶级利益和需求的那种政体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为了反对宫廷，它就必须讨好^①人民。

也许，自由主义反对派真的以为，它是为了人民而当反对派的。

因此很自然，只有在为人民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幌子下，它才能从政府手中为自己争得权利和自由。

如前所说，当二月风暴袭来的时候，这个反对派曾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① 双关语：《Ho》——“宫廷”，《den Hof machen》——“讨好”。——编者注

二

科伦 12 月 11 日。当三月革命的洪水——en miniature (缩小规模的) 洪水——泛滥过去后，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么庞然大物，不是什么革命巨人，而是一些旧型生物，一些低矮的资产阶级人物——“联合议会”的自由派，觉悟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最发达的省份，即莱茵省和西里西亚，提出了新内阁的基本人选。尾随其后的有莱茵省的大群律师。随着资产阶级被封建主排挤到次要地位，莱茵省和西里西亚在内阁里也向旧普鲁士各省让位了。勃兰登堡内阁只是通过一个爱北斐特的托利党人，才与莱茵省保持了一点联系。汉泽曼和海特男爵！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看来，这两个名字体现着 1848 年三月和十二月之间的全部差别！

普鲁士资产阶级被抛上了国家政权的高峰，但并不是像它所希望的那样，是由于同王权成立和平协定的结果，而是由于发生了革命的结果。它应该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王权，即反对自己，因为人民运动替它扫清了道路。但是在它看来，王权只是它用来掩盖自身的尘世利益的一种神明屏障。它自身的利益和与这些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形态的不可侵犯性，译成宪法的语言应该是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就朝夕盼望君主立宪政体。所以，虽然二月革命及其在德国的回声是对普鲁士资产阶级有利的，因为这个

革命使普鲁士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政柄，但同时这个革命也打碎了它的如意算盘，因为此时它的统治已受到它所不愿意并且也不能履行的那些条件的束缚了。

资产阶级只是袖手旁观，让人民为它作战。因此，转交给它的权力，也就不是一个统帅在战胜自己的敌人后掌握的权力，而是一个受胜利了的人民委托来保护人民利益的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

康普豪森还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种种不便，并且他的内阁的全部软弱性都是从这种感觉和引起这种感觉的那些情况中产生的。因此，他的政府的那些最无耻的行径好像还带有几分羞愧的色彩。汉泽曼的特权却就是肆无忌惮的无耻和横蛮了。色调上的差别就是这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唯一差别。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既不应该和 1648 年的英国革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 1789 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

在 1648 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占统治的教会。

在 1789 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贵族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

1789 年的革命只有 1648 年的革命来做它的原型（至少就欧洲来说），而 1648 年的革命则只有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来做它的原型。这两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比自己的原型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是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

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 1793 年和 1794 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未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1648 年的革命和 1789 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风气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 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 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

二月革命在事实上**消灭了君主立宪政体**，在思想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政权**。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要在思想上**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在事实上**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世纪以上。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继发性的现象**，大家都知道，继发性病症比原发性疾病更难医治，并且对机体更加有害。当时的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

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范围的、德意志范围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维也纳起义、加塞尔起义、慕尼黑起义——总之任何省区发生的起义，都是同它并驾齐驱的，都同它争夺首位。

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因其完成了创造工作而充满了无限的自豪感；1848年的柏林革命却以它落后于时代而自夸。这次革命的光芒好像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逝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们地球上居民的眼中。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对于欧洲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星球，不过是缩小了规模的表现——一般说来，它在一切方面的表现都是缩小了规模的。它的光芒是一个早已腐朽了的社会所发出的光芒。

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它不仅看见，在它后面有一个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看见，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视态度。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代表旧社会的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脱离国王又远离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对于每一方的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更新了的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

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不满情绪；它是旧国家的一个底层，这个底层并没有为自己打通道路，而是被地震的力量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

三

科伦 12 月 15 日。获得了政权即建立了**康豪森**内阁的资产阶级，立即把**协商论**宣布为普鲁士的 *contrat social* (社会契约) 的“最广泛的”基础，这种理论绝不是空洞的理论，相反地，它是在“**黄金**”生活之树上生长出来的。

三月革命绝没有使天赋君主屈服于人民的主权。这次革命只是迫使王权，迫使专制国家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同自己的老对手**进行协商**。

王权为了资产阶级而牺牲贵族，资产阶级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制将变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制，而资产阶级将变成君主制的资产阶级。

在三月以后，只存在两种力量。它们彼此互为防备革命的避雷针。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的。

这就是**协商论的秘密**。

组成三月革命后第一届内阁的那些经营油类和羊毛生意的商人¹⁰⁷，喜欢扮演用自己的平民服的衣襟去掩盖赤裸裸的王权的角色。当他们一想到下面这些事情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他们将有可能进入宫廷，他们将本着自己的纯洁宽大精神，忍心抛弃自己那副严峻的罗马姿态——联合议会的罗马姿态，为了填平威胁要吞没王权的深渊而牺牲自己以往的声誉。**康普豪森**大臣俨然以充当宪制国王的**产婆**而自诩！这位好汉显然已深为他本身和他自己的宽大

精神所感动。国王及其党羽硬着头皮忍受这种屈辱性的保护，*bonne mine à mauvais jeu* (强颜欢笑)，等待好日子的到来。

半瓦解的军队、担心失去职位和薪俸的官僚、驯服了的封建等级(它的首领作了一次增长见识的宪政旅行)，只用几句甜言蜜语和几个屈膝礼就轻而易举地愚弄了 *bourgeois gentilhomme* (醉心贵族的小市民)。

普鲁士资产阶级徒有其名地拉掌了政权；它丝毫不怀疑：旧国家的各种力量都已毫无二心地情愿受它支配了，所有这些力量统统都死心踏地地迷信资产阶级本身的万能了。

资产阶级不仅在内阁中，而且在整个君主国范围内，都为上面这种痴心妄想所陶醉。

三月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唯一英雄功绩就是让市民自卫团进攻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而且往往是血腥地进攻；这种功绩难道没有在军队、官僚以至封建主中间找到自愿而忠实的帮凶吗？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表、**市镇委员会**（它们的那种讨厌而卑劣的奴才本性后来受到了文迪施格雷茨之流、耶拉契奇之流和韦尔登之流的皮靴的践踏，这可以说是罪有应得）所能作到的唯一努力，这些市镇委员会在三月革命以后所立下的唯一英雄功绩，就是它们对人民提出的宗法式严厉警告；难道它们没有使那些默不作声的行政区长官们和沉思不语的师长们惊叹佩服吗？在这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能够怀疑军队、官僚和封建主的旧恨已经溶化在它们对资产阶级——这个抑制自己和无政府状态的宽宏大量的胜利者——所表示的必恭必敬的忠诚中了吗？

事情是很明显的。现在摆在普鲁士资产阶级面前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统治，消灭碍事的无政府主义者，

重新恢复“安宁和秩序”，重新征收在三月风暴时期没有征收的捐税。此外还应该做的只有一点，这就是把资产阶级政权和决定这个政权的三月革命的**生产费用**缩减到最低限度。普鲁士资产阶级在其反对封建社会和王权的斗争中，被迫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要求了一种武器——结社权、出版自由等等，现在，当受骗的人民已不再利用这种武器去**拥护**资产阶级而流露出要利用它去**反对**资产阶级这种危险意图的时候，难道不应当把人民手中的这种武器摧毁吗？

资产阶级确信：在它同王权进行**协商**的道路上，在它同屈从自己命运的旧国家成立协定的道路上，显然只有一个障碍，一个唯一的障碍，这就是人民——*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¹⁰⁸，就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人民和革命！**

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人民根据革命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革命是人民转在资产阶级名下的一张期票。资产阶级由于革命而取得了政权。在它取得政权的那一天，这张期票的支付期限就满了。资产阶级必然要**拒付**这张期票。

革命——它在人民的口里的意思是：你们资产阶级在组织 *Comité du salut public*，公安委员会，我们把权力交给这个委员会并不是为了让你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同王权**达成协议**，而是为了要你们**违背**王权的意志来捍卫我们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革命是人民对资产阶级同王权达成协议的抗议。因此，同王权达成协议的资产阶级**必然要抗议革命**。

这就是在伟大的**康普豪森**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三月革命没有得到承认**。柏林国民代议机关否决了关于承认三月革命的提案，从而确认自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议机关，是协商派议会。

这个议会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宣布为没有发生。它在普鲁士人民面前大声宣布：人民并不是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实行革命去反对王权，人民实行革命是为了使王权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人民自己！这样，革命人民的**权利的法律根据**便被消灭，而为保守的资产阶级找到了**法制基础**。

法制基础！

勃律盖曼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科伦日报”曾为“法制基础”不知费了多少唇舌，进行了多少捏造，作了多少诉苦和埋怨，多少次失去了它，又把它重新找到，破坏了它，又把它修补好，把它从柏林迁到法兰克福，又把它从法兰克福迁到柏林，把它缩小，又把它扩大，并把它从普通的基础变为镶木地板，又从镶木地板变为双层底（大家知道，这是游艺场上魔术家的主要工具），再从双层变为无底陷阱，以致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法制基础归根到底合法地变成了“科伦日报”的基础。读者们可能把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箴言同约瑟夫·杜蒙先生的箴言混为一谈，可能把普鲁士世界历史的必然观念同“科伦日报”的专横的固执观念混为一谈，并且可能把法制基础仅仅看作是“科伦日报”所赖以成长的基础。

法制基础，而且是普鲁士的法制基础！

但是三月以后，大辩论的骑士康普豪森、联合议会的被复活了的幽灵以及协商派议会所赖以立足的**法制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是1815年的宪法呢，还是1820年的省议会法？或者是1847年的敕令？抑或是1848年4月8日的选举法和协商法？¹⁰⁹

都不是。

“法制基础”只不过意味着：革命并没有获得自己的基础，旧社会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基础，三月革命只不过是“推动”在旧普鲁士

国家内部早就在酝酿的王权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的一个“事故”，国王本人在以往颁发的敕令中早就承认了这种勾结的需要，只是认为这种勾结在三月以前并不是“刻不容缓”的。总之，“法制基础”意味着：资产阶级在三月以后，仍然企图像在三月以前那样的基础上同国王进行谈判，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革命，好象联合议会未经革命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法制基础”意味着：人民权利的合法根据——革命，在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所缔结的 *contrat social* (社会契约) 中并不存在。资产阶级从旧普鲁士的立法中引伸出自己的要求，为的是不让人民从新普鲁士的革命中引伸出任何要求。

不言而喻，资产阶级的思想白痴们，资产阶级报纸的下流作家及其同流们，把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点缀物冒充为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并以此自欺欺人。在勃律盖曼这种人的头脑中，关于法制基础的词句已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实体。

康普豪森内阁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即中介和过渡的任务。它是踩在人民的肩上爬上去了的资产阶级和已经不再需要人民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介人；它是貌似保卫人民反对王权的资产阶级和真正保卫王权反对人民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介人；它是已脱离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已形成反革命核心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介人。

按照其作用来说，康普豪森内阁由于它那种少女般的羞怯心理的缘故，而仅限于消极反抗革命。

诚然，它在理论上否认了革命，但在实践上它只是反抗了革命的要求，只是对旧国家政权的恢复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决定：它已经到了应当由消极反抗变为积

极进攻的转折关头。**康普豪森**内阁的辞职并不是因为它犯了这种或那种错误，而仅仅因为它是三月革命后的**第一届**内阁，因为它是**三月革命的内阁**，由于它的来历的关系，它还必须用人民独裁者的假面具来遮盖它的资产阶级代表的真面目。它的这种二重来历和暧昧性质还使得它有义务对自主的人民保持一定的客气、拘谨和慎重的态度，而这一套已成了资产阶级的累赘，由协商派议会直接产生的第二届内阁就不需要考虑这一套了。

因此，康普豪森内阁的辞职对于下流政客们来说是一个谜。继之而来的是**行动内阁**，即**汉泽曼**内阁，因为资产阶级打算从**消极地**把人民出卖给国王的时期，过渡到**积极地**使人民屈服于通过同国王协商而实现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时期。**行动内阁**是三月革命以后的**第二届**内阁。这就是它的全部秘密。

四

科伦 12 月 29 日。

“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¹¹⁰

汉泽曼用寥寥数语便概括了联合议会的全部自由主义。这个人是协商派议会本身所产生的内阁的必不可缺的首领，就是说，他是应当把消极反抗人民变成积极进攻人民的内阁即行动内阁的必不可缺的首领。

任何一届普鲁士内阁中都没有过这样多的资产者的名字！汉泽曼、米尔德、梅尔克尔、屈韦特尔、吉尔克！甚至这个内阁的宫廷标记冯·奥尔斯瓦特也属于自由派的，即迎合资产阶级的科尼斯堡反对派的贵族。只有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在这帮可鄙的家伙中间代表旧的、官僚化的普鲁士封建贵族。好一个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呵！这是已经仙逝的希尔德布兰特所写的一部已被遗忘的盗侠小说的早已过时的书名！¹¹¹可是，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这块钻石上所镶的一副封建框子。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罗特·冯·施莱根施坦，就像是用大字写下的题词：“普鲁士封建贵族、军队、官僚追随于普鲁士资产阶级这颗刚刚兴起的明星之后。”这些强大的力量让普鲁士资产阶级来支配自己，资产阶级便把它们安置在自己的宝座前面，正像旧纹章上面在君主的宝座前安置一只狗熊一样。罗特·冯·施莱根施坦正就是资产阶级内阁的这样一只狗熊。

6月26日，汉泽曼内阁向国民议会作了自我介绍。从七月起它才开始真正存在。六月革命是行动内阁的背景，就像二月革命是中介内阁的背景一样。

普鲁士资产阶级利用巴黎资产阶级对巴黎无产阶级的血腥胜利来反对人民，而普鲁士国王则利用克罗地亚人在维也纳的血腥胜利来反对资产阶级。普鲁士资产阶级为奥地利的十一月而悲痛，是普鲁士人民为法国的六月而悲痛的报应。德国庸人们没有远见，目光短浅，竟把自己同法国的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他们没有摧毁任何宝座，他们没有消灭封建社会，更不要说肃清封建社会的残余了；他们无须保存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在六月以后，就像在二月以后一样，就像在十六世纪初一样，也就像在十八世纪一样，他们按照自己固有的那种老奸巨滑和投机取巧的习惯，打算从别人的劳动中攫取四分之三的收益。他们没有意料到：在法国的六月后面，有奥地利的十一月在窥伺着他们，而在奥地利的十一月后面，又有普鲁士的十二月在窥伺着他们。他们也没有意料到：在法国，推翻了王位的资产阶级看到自己面前只有一个敌人——无产阶级，而同王权斗争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却只有一个唯一的同盟者——人民。这并不是说他们二者之间没有对立的敌对利益，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即反对同时压迫他们二者的第三种势力的需要，还把二者结合在一起。

汉泽曼内阁把自己看作是六月革命的内阁。在普鲁士的每一个城市里，庸人们为了对抗“红色强盗”，都把自己装扮成“正直的共和党人”，——然而，他们仍然是真诚的保皇党人，并且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所谓“红色强盗”却带着黑白色¹¹²的帽徽。

汉泽曼在其6月26日的就职演说中，轻易地摆脱了康普豪森

的那种神秘而模糊的“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君主制”。

“在两院制基础上的君主立宪以及由两院和国王共同行使立法权”——他把自己的有鼓舞力的前辈的神秘莫测的口号变为这样一个冷酷的公式。

“改革同新的国家宪法相抵触的最必要的关系，解除在君主国大部分地区阻碍有利地利用财产的束缚，改革诉讼程序，改革税务立法，特别是取消免税权等等”，并且首先要“加强国家权力，这是为了保卫所争得的（公民所争得的）自由不受反动派的侵害（即利用自由为封建主服务）和不受无政府状态的侵害（即利用自由为人民服务）所必需的，是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所必需的”，——

这就是内阁的纲领，这就是成立了自己的内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纲领，这个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汉泽曼。

在“联合议会”中，汉泽曼是一个最激烈和恬不知耻地反对信任的人，因为“在金钱问题上，先生们，是没有温情可言的！”但是在内阁中，汉泽曼却宣布“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这一次他是向人民说话，正像过去是向王位说话一样：“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问题在于，过去指的是给钱的信任，而现在指的是造钱的信任；过去指的是封建的信任，是对上帝、国王和祖国的百依百顺的信任，而现在指的是资产阶级的信任，即对企业家的活动、对资本产生利润的能力以及对实业家的支付能力的信任，对商业的信任。这里说的不是信仰、爱情和希望，而是信用。

“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汉泽曼在这句话中表明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固执思想。

信用是建立在对下列事实的确信上的：资本将继续剥削雇佣劳动，资产阶级将继续剥削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将继续剥削小资

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任何政治运动，不管它的性质如何，即使它是直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都在动摇着信任、信用。因此，“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在汉泽曼口中就意味着：

镇压无产阶级中和一切社会阶层中的一切政治运动，因为这一阶级和这些阶层的利益并不是直接同自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

因此，汉泽曼在主张“恢气被破坏了的信任”的同时，还提出要**“加强国家权力”**。不过他把这种“国家权力”的本质搞错了。他本来想要加强为信用服务即为资产阶级的信任服务的国家权力，而实际上他只是加强了由于不享有任何信用因而要求信任，并且在特别困难的场合下诉诸霰弹的国家权力。他本来想要节省资产阶级权力的生产费用，结果反而使资产阶级为普鲁士封建权力的复辟付出了亿万的重重代价。

对于工人们，汉泽曼言简意赅地说，在他的口袋里有一种能包治他们百病的万应灵丹。但是，在他从口袋里掏出这种万应灵丹以前，首先要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要恢复信任，工人阶级就应当放弃他们对政治的迷恋和对国家事务的干涉，回到自己习惯的旧生活方式中去。如果工人阶级听从这一劝告，使信任得到恢复，那末这种神秘的万应灵丹马上就会见效，其所以会见效，只是因为不再需要它了，不必应用它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疾病本身——破坏资产阶级的秩序的行为将被消除。什么病也没有了，还要药干什么呢？要是人民固执己见，——那有什么了不起，汉泽曼会**“加强国家权力”**即警察、军队、法院、官僚制度，他会唆使自己的熊去咬人民，因为“信任”会变成“金钱问题”，而

“在金钱问题上，先生们，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汉泽曼可能觉得这是可笑的——但是他的纲领却是一个**真诚的、充满善意的**纲领。

他想加强国家权力，不仅是为了反对无政府状态，即反对人民，而且还为了反对反动派，即反对王权和封建利益，因为后两者可能企图同资产阶级的钱袋以及资产阶级**“最必需的”**即最起码的政治要求对立起来。

行动内阁的组成情况本身就是对这个“反动派”的一个抗议。

行动内阁同普鲁士以往的一切内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真正**首相是财政大臣**。几百年来，普鲁士国家对下面这一事笑谑莫如深：军事、对内对外政策、教会和学校，甚至宫廷事务部以及信仰、希望和爱情，都是受平凡的财政支配的。行动内阁把这个不愉快的资产阶级真理奉为金科玉律，让汉泽曼先生来当自己的首领，而汉泽曼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全部内阁纲领，正像他的在野时的纲领一样，可以概括为下面一句话：

“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普鲁士的君主制变成了“金钱问题”。

现在，我们放下行动内阁的纲领，进而来谈谈它所采取的行动。

说什么要**“加强国家权力”**以反对**“无政府状态”**即反对工人阶级和所有不满意汉泽曼先生纲领的城市居民阶层，这种威胁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除去提高甜菜糖税和烧酒税不谈，行动内阁所采取的唯一重大的行动就是，实行反对所谓**无政府状态**即反对革命运动的**反动政策**。

根据普鲁士法，或者，在该法律不适用时根据 Code pénal (刑法典)对报刊案件进行的无数审讯，根据同样“充分的理由”（这是奥尔斯瓦特的公式）所实行的无数逮捕，在柏林实行警察制度¹¹³，

而且每两幢住宅就有一个警察监管，警察对结社自由的侵犯，唆使兵痞殴打不顺从的公民，唆使市民自卫团殴打不顺从的无产者，实行戒严以示恫吓，——汉泽曼时代的所有这些丰功伟绩至今记忆犹新。因此没有必要详细叙述它们了。

屈韦特尔把行动内阁这一方面的活动概括如下：

“一个真正想要自由的国家，必须有相当数量的警察人员作为执行权力”，

对于这件事，汉泽曼本人也嘟哝了一番他那套固定不变的解释：

“这也将大大地促进信任的恢复，促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商业活动活跃起来。”

因此，在行动内阁执政时期，旧普鲁士警察机构、检察机关、官僚制度、军队等都“加强了”——都是像汉泽曼所想像的那样，在资产阶级供养下，也就是说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情况下加强了。总之，它们都“加强了”。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情绪，可以由下面一件事来说明。为了回击一些反动分子对沙洛顿堡的一些民主分子的殴打，人民在柏林冲击了首相官邸。行动内阁已经变得如此家喻户晓了。第二天，汉泽曼就提出了一项惩办暴徒和禁止露天集会的法律。他就是这要狡猾地阴谋策划反对反动派的。

因此，行动内阁的真正的、明显的和人所共知的活动具有纯粹的警察性质。在无产阶级和城市民主派看来，这个内阁和协商派议会（它的多数是由内阁代表的）以及普鲁士资产阶级（它的多数构成了协商议会的多数），无非是代表旧的、稍微刷新了的警察和官僚的国家而已。此外，还加上对资产阶级的愤慨，因为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而且通过市民自卫团变成了警察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民心目中的“三月的成果”就是如此。这些成果就在于自由派资产者老爷们也担负了**警察**的职能。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双重警察！

不是在行动内阁的行动中，而只是在行动内阁所制定的构成法案中，才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行动内阁仅仅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加强警察**”这一旧国家的最完备的表现，并使之行动起来。

在汉泽曼内阁所提出的**市政条例、陪审法庭和市民自卫团法**的各种草案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财产**，始终是那些**依法享有权利的人**和那些**不享有权利的人**之间的分界线。诚然，所有这些法案都向王权作了极其奴颜婢膝的让步，因为资产阶级内阁指望王权成为无害的同盟者，可是这样一来，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就更加残酷无情了。

由协商议会批准的市民自卫团法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并且必然为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提供法律根据。诚然，资产阶级以为这个法律只有在市政条例公布和宪法颁布以后，即在它的统治巩固以后才会生效。普鲁士资产阶级从市民自卫团法所获得的经验，应当使它学会一些东西；它应当懂得：直到现在它所做的自以为**是反对人民的一切，完全是反对它自己的**。

这样，在人民看来，汉泽曼内阁的实质在**实践上**是实行旧普鲁士的警察专权，而在**理论上**则是按比利时的样式¹¹⁴来对资产者和非资产者进行侮辱性的区分。

现在我们来谈谈内阁纲领的另一个方面，即**反对反动派的斗争**。

在这方面，内阁所表现出的善良愿望多于行动。

属于资产阶级善良愿望的有：把封建主的私有领地分成小块卖给私有者，使银行机关服从自由竞争的原则，把 Seehandlung¹¹⁵变成私人机构等等。

行动内阁的不幸在于：它在经济上对封建党派的一切攻击，都是在**强制公债**的庇护下进行的，而它的一般改良企图在人民看来，只是为了必须充实加强了“国家权力”的国库而采取的纯财政措施。结果，汉泽曼招致了一派人的憎恨，同时又得不到另一派人的承认。实际上，不能否认，只是当对于财政大臣来说是最亲切的“**金钱问题**”，即**财政部**所理解的**金钱问题**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才敢于认真地攻击封建特权。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他向封建主说：

“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因此，甚至他的反对封建主的肯定的资产阶级意向，也像他的为“**活跃商业活动**”所采取的否定的措施一样，带有警察的色彩。要知道，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警察就是国库**。汉泽曼向国民议会建议提高甜菜糖税和烧酒税，并通过了一项甜菜糖税和烧酒税的法律，这种做法，激怒了西里西亚、各个马尔克、萨克森以及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等地的大财主，即激怒了“上帝、国王和祖国”的拥护者们。这种措施不仅在旧普鲁士各省激起了同工业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的愤怒，而且也引起了莱茵省酿酒厂的资产阶级厂主们同样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同旧普鲁士各省比较起来，他们被置于更为不利的竞争条件之下。除此以外，这一措施也引起了旧普鲁士各省的工人阶级的反对，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一措施意味着，而且也只能意味着一种**生活必需品的涨价**。这样，实行这一措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充实“加强了的国家权力”的国库！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这是行动内阁所采取的反对封建主的

唯一的一件真正见诸实行的行动，是这方面唯一的真正变成了法律的法案。

汉泽曼的关于取消等级税和土地税免纳权的“法案”¹¹⁶，正像他的所得税法案一样，引起了地主——“上帝、国王和祖国”的崇拜者的拚命叫嚣。他们骂他是共产主义者，而且直到今天，普鲁士的“十字骑士”一提到汉泽曼的名字还要给自己画三次十字。在十字骑士听来，这个名字就像弗拉·迪亚沃洛¹¹⁷的名字一样。取消土地税免纳权这个由普鲁士大臣在协商派议会的光辉时期所提出来的唯一重要措施，由于左派的原则局限性而遭到了失败。然而，正是汉泽曼先生本人使这种局限性成为正当的。难道在制订宪法和举行效忠宪法的宣誓以前，左派应当开辟新的财源来支持“加强了的国家权力”的内阁吗？

par excellence (主要是) 资产阶级性质的内阁竟是这样不走运，以致连它的最激进的措施都受到协商派议会中的激进议员的阻挠。它竟是这样贫弱，以致它向封建制度举行的整个十字军征讨，仅表现为受到一切阶级同样憎恨的提高税收，而它的在深思熟虑之后制订出来的全部财政政策的成熟的果实只是强制公债。这两种措施归根到底仅仅为反革命向资产阶级本身的进攻提供了补助金。但是，封建主已经肯定资产阶级内阁是“居心叵测”的。因此，甚至普鲁士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财政斗争也表明了，资产阶级由于威信扫地和软弱无力，甚至募集金钱也只有为了反对自己本身才能亦到，而在金钱问题上，先生们，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资产阶级内阁不仅使城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封建主都来反对它，它还推开了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农民阶级，并使这一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在这方面，协商派议会热心地帮了它的

忙。总之，不应当忘记，这一议会在其存在的一半时间内，把汉泽曼内阁看作它的真正代表；今天的资产阶级受难者曾是汉泽曼昨天的童仆。

在汉泽曼执政期间由帕托夫所提出的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方案（参看我们过去对这个法案的批评¹¹⁸），是资产阶级想废除封建特权，废除这些“同新的国家宪法相抵触的关系”的极其软弱的意图的可怜果实，是资产阶级在任何一种财产遭到革命的侵害时所流露出的恐惧。可怜的、胆怯的和狭隘的利己主义使得普鲁士资产阶级瞎了眼睛，以致它竟抛开了自己必要的同盟者——农民。

6月3日，议员哈诺夫提出一个提案：

“一切正在进行的有关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赎买义务等方面的谈判，在以正当原则为基础的有关这方面的新法律颁布以前，根据一方面的要求，立即予以停止。”

只是在9月底，也就是在四个月以后，在普富尔内阁时期，协商议会才通过了停止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谈判的法案，而且否决了所有自由派的修正案，并决定：“原定的现行义务暂时仍然有效”和“有争执的付款和欠税予以征收”。

在8月间（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协商派议会认为南施蒂尔关于“立即废除徭役”的提案“并不是刻不容缓的”；既然如此，既然协商派议会要农民放弃他们在三月以后争得的那种实际地位而往后退，农民还能认为这个议会而战是刻不容缓的吗？

法国资产阶级是靠解放农民起家的。它在农民的帮助下征服了欧洲。普鲁士资产阶级完全沉溺于它的最狭窄的眼前利益，甚至轻率地丢掉了农民这个同盟者，并把他变成了封建反革命手中的武器。

资产阶级内阁倒台的官方历史是尽人皆知的。

在这个内阁的保护下，“国家权力”极度地“加强了”，人民的力量极度地瘫痪了，以致屈韦特—汉泽曼这一对孪生子在7月15日不得不向君主国的所有行政区长官呼吁，反对官僚们特别是地方官员们的反动阴谋；以致后来除了协商派议会以外，“贵族和大地主会议”¹¹⁹也在柏林开会以保护本身的特权；以致最后为了同所谓的柏林国民议会相对抗，于9月4日在上劳西兹^①举行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市镇代表会议，保护受威胁的地主所有权”。

政府和所谓国民议会在这些反革命抬头的日益明显的征兆面前表现出来的毅力，仅仅在一纸宣言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映。资产阶级内阁拥有刺刀、枪弹、监狱和警察，仅仅是为了对付人民，“为了恢复被破坏了的信任和活跃商业活动”。

在施魏德尼茨，兵痞们叛变性地动用武器直接反对市民自卫团中的资产阶级，这一事件¹²⁰终于使国民议会从冷漠的态度中苏醒过来。8月9日，国民议会决定采取英勇的行动，即采取施泰因—舒尔茨军令，作为激发普鲁士军官们的礼仪感的最后强制手段。¹²¹多好的强制手段呵！但是，难道保皇党的荣誉不是禁止军官们遵循资产阶级荣誉的要求吗？

9月7日，即在协商派议会通过了施泰因—舒尔茨军令一个月以后，议会再次决定：它的决议是有效的决议，应由大臣们付诸实施。汉泽曼先生回避了这件事，并于9月11日提出辞职，他事先任命自己为年俸六千塔勒的银行经理，因为——在金钱问题上，先生们，是没有温情可言的！最后，在9月25日，协商派议会怀着感激之情听到了普富尔用温和的措词承认施泰因—舒尔茨军令，然

^① 波兰称作：上鲁日伊察。——编者注

而由于弗兰格尔的平行的军令和军队向柏林的集结，施泰因—舒尔茨军令这时已成了笑柄。

只要对照一下上述日期和了解一下施泰因—舒尔茨军令的历史，就足以断定：这个军令并不是汉泽曼辞职的**真正**原因。不害怕承认革命的汉泽曼难道还害怕什么纸上宣言吗？过去汉泽曼每当公事包从他的手里掉了的时候，他总是重新把它捡起来，难道这一次汉泽曼由于庸人的刺激而把它放在大臣席位上让任何一个想拿的人去拿吗？不，我们的汉泽曼不是空想家！汉泽曼不过是受了骗，就像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受了骗一样。有人使他相信了一点，在任何条件下，王权都是不会让他下台的。有人强迫他丢掉了最后一点声望，好最终把他用作供容克地主们发泄怒火的牺牲品，并摆脱资产阶级的保护。此外，同俄国和奥地利商定的作战计划要求：内阁首脑应当由权奸撇开协商派议会而自行任命的将军担任。在资产阶级内阁时期，旧“国家权力”已经“加强”到足以采取这个 coup（坚决行动）的地步了。

普富尔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克罗地亚人在维也纳的胜利甚至使勃兰登堡这样的人也变成了有用的工具。

在勃兰登堡内阁时期，可耻的协商派议会驱散了，它遭到了嘲笑、奚落、侮辱和迫害，而人民在决定性的时刻仍然漠不关心。议会的失败意味着普鲁士资产阶级、立宪主义者的失败，就是说，意味着民主派的胜利，不管后者为这种胜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而钦定宪法呢？

好像过去曾经说过：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绝不应有“一块纸片”¹²²。现在换了一种说法：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只能有一块纸片。普鲁士的**真正**宪法就是**戒严**。法国的钦定宪法只包含有一条

废除了这个宪法本身的条文，即第十四条¹²³。而普鲁士钦定宪法的每一条都仿佛是它的第十四条。

国王用这个宪法给自己钦定了新的特权。

他授权自己可以 in indefinitum (无限期地)解散议会。他授权大臣们在议会休会期间颁布任何法律(包括关于所有权等等的法律)。他准许议员可以控告大臣们的这种行动，但是在戒严的情况下，控告者有成为“内部敌人”的危险。最后，他授权自己，如果春天反革命的势力扩大了，就用一种从中世纪等级差别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基督教德意志的 Magna Charta¹²⁴去代替这块悬在空中的“纸片”，或者干脆结束玩弄宪法的把戏。甚至在后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也会无动于衷，而只是祷告：

“主给的，主又拿去了，主的圣名遐你传扬！”

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

可是，有生命力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必将从他们的淡漠态度中苏醒过来——首先，来年春天反革命将要提出来的会使这部分资产阶级感到惊愕的骇人听闻的账目，就是这方面的保证。要知道，汉泽曼说得有道理：

先生们！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9、11、15 和 29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载于 1848 年 12 月 10、15、16
和 31 日“新莱茵报”第 165、
169、170 和 183 号

反革命的新同盟者

科伦 12 月 11 日。反革命势力获得了新的同盟者——瑞士联邦政府。

还在五天以前，我们就从可靠方面获悉，最近流行的一些关于德国流亡者准备侵入巴登、国境上已有军队出现、在廖拉赫附近志愿兵和帝国军队之间发生了荒诞无稽的所谓会战等等奇怪的传闻，是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统治党，即富勒尔—奥克辛本—蒙钦格尔党和德意志帝国政权之间“商量好的”，目的是为了给这个统治党采取对付流亡者的措施制造借口，从而促进同帝国政权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们没有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读者，因为我们当时还不能马上相信这种阴谋的可能性。我们等待着证实，而没有等多久也就证实了。

引人注意的是：散播这些传闻的是法兰克福的报纸，而不是巴登的报纸。其实，巴登的报纸应该最先和最清楚地知道本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报”¹²⁵在 12 月 1 日就已从伯尔尼得到消息，说联邦委员会就流亡者问题发出了通令，并且派出了一个全权代表，可是伯尔尼的报纸，其中有一些（如“宪法之友”和“瑞士”）是和联邦委员会的成员有直接联系的，却到 12 月 3 日

才刊登了这个消息。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瑞士”报上发表的给各州政府的通令。如果说过去我们对瑞士加入新神圣同盟^①这一点还可以采取怀疑态度，那末现在一切疑问都消除了。

通令首先提到关于政治流亡者最近已经武装起来，准备再度侵入巴登领土的**传闻**。全瑞士和全巴登都知道这些传闻是捏造的，而通令却以这些传闻为**根据**来对流亡者采取新的非常措施。联邦议会关于德森的决议之所以被提及，只是为了论证联邦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不是责成它采取这些措施；相反地，**肯定地承认了德森和北部各州的状况有重大的差异**。

其次作了如下指示：

(1) 凡参加过司徒卢威进军或根本不能提出安分守己的个人保证的流亡者，应解离国境各州。

(2) 所有流亡者都必须受到严密的监视。

(3) 属于第一条情况的流亡者名单，应呈报联邦委员会和国境各州。

(4) 执行一般拘留规程时可能发生的例外问题，由联邦政府代表施泰格尔博士解决，并且应该遵行他的一切指示。

此外还要求“**严格**”执行这些指示，不然的话，一旦需要调动军队，经费将由有关的国境州负担。

整个通令措辞尖刻，极尽侮辱流亡者之能事，并且以下面这些话作结束：

“瑞士不应该成为外国政党的集合点，这些政党对于它们在中立地区的

① 新神圣同盟——指1848—1849年期间欧洲反革命势力企图在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恢复1815年的神圣同盟，但是这次并没有缔结新的盟约。——译者注

地位抱着极为错误的观念，并且常常粗暴地破坏殷勤接待它们的国家的利益。”

只要把这些尖刻的辞句和 11 月 4 日的照会的措辞比较一下；只要注意到通令所根据的那些传闻显系**故意捏造**；只要注意到，根据今天从国境给我们的来信，联邦政府的代表施泰格尔博士**已经结束了**对于使帝国政权最伤脑筋的阿尔高州的视察，并且发现了所说的流亡者早已被拘留起来，在这里他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已来到利斯塔尔）；此外，只要注意到，根据 11 月 4 日的照会，所有国境各州早已克尽了自己的职责，瑞士报刊（例如“瑞士信使”、“巴塞州人民报”¹²⁶、“国民报”等等）早就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只要回想一下，在长期不明情况和听到关于封镇国境的矛盾百出的消息之后，现在我们在两三天内获得的瑞士报纸和信件都一致断定，对瑞士不会采取**任何强制**的办法，并且发布给某些国境岗哨的对越过国境的人加强监视的命令经过二十四小时后已被取消；——只要把所有这一切加以对照，就足以判断事实是不是完全证实了我们上面的报道。

本来大家就知道，富勒尔、奥克辛本、蒙钦格尔等先生早已渴望一劳永逸地粉碎“流亡者的阴谋”。

我们祝贺施梅林先生交上了这些新朋友。万一某个时候他在瑞士以流亡者的身分出现（要知道，在本届联邦委员会三年任期满以前，这种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但愿他的这些朋友不把他列入“不能提出个人保证”的流亡者之中。

写于 1848 年 12 月 1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2 月 1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66 号

“新莱茵报”的诽谤

科伦 12 月 13 日。“新莱茵报”在 7 月 4 日发表的文章，成了定于本月 20 日在陪审法庭对本报发行负责人科尔夫、总编辑马克思和编辑恩格斯进行审讯的理由，这篇文章的末尾是这样写的：

“总之，行动内阁所采取的行动，中间派左翼内阁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汉泽曼先生一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

“但是，柏林的左派应该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它是能够放心地让左派在议会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议会外解除了 3 月 13 日革命的武装，它是会在议会里大胆地承认这一革命的。”

“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德国的发展或许也需要这种对比吧。行动内阁在原则上承认革命，是为了在实际上实行反革命。”¹²⁷

事变证明：“新莱茵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诽谤了普鲁士政府和它的忠实仆从。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13 日

载于 1848 年 12 月 14 日“新莱茵报”
第 16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

—

科伦 12 月 21 日。本地陪审法庭非常审判庭今晨开始对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进行审判。

被告们带着镣铐，像最普通的刑事犯一样，从新监狱被押送到戒备森严的法庭。

我们的读者都知道，像现在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我们绝不能把它看做是某种保障。资格限制使一定的阶级享有从自己的人当中挑选陪审员的特权。编制陪审员名单的方式使政府有权操纵垄断，从特权阶级中挑选出自己惬意的人。这就是说，行政区长官先生从全区的陪审员名单中挑选出一些人，编制成清册；然后政府的司法代表再加以清刷，把这个名单缩减到三十六人（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最后，当陪审法庭真正组成的时候，检察机关有权第三次对最后的名单，对这个经政府两次蒸馏过的阶级特权的产物进行清刷，只留下最后所需要的十二个人，而把其余的都删除。

在这样组织起来的陪审法庭上，那些公开反对特权阶级和现存国家政权的被告要是不直接落到自己死敌的手中，那简直是奇迹了。

人们会反驳我们：但是陪审员们是有良心的呀！还可以要求比

良心更多的保障吗？啊哈，mon dieu（我的天啊）！良心是由人的知识^①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一个除了资格以外没有别的本事的陪审员，他的良心也是受资格限制的。

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

因此，在我们看来，现今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是维护某些人的特权的机关，而绝不是保障一切人的权利的机关，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最广泛地运用它的权利，从最后的名单中把它所不中意的最后十二个人的名字也删掉，——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丝毫不怀疑被告们将被**宣告无罪**。我们的保障就是**起诉书**。读了起诉书，你就会以为这是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用讥讽的口吻发表的辩护词。

我们就来简要地评述一下这份只有对梅利奈及其同志们的起诉书（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里斯康士审判案）¹²⁸才能与之媲美的**起诉书**吧！

在科伦有个工人联合会¹²⁹。哥特沙克曾是这个联合会的主席，安内克和埃塞尔曾是这个联合会的委员会的委员。起诉书告诉我们，工人联合会

“有自己专门的由哥特沙克主编的机关报——‘工人报’；没有亲自出席联合会会议的人，可以从这份报纸上了解到联合会的那种以讨好无产阶级为目的、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和引向推翻现存制度的危险倾向”。

① 俏皮话：《Gewissen》——“良心”，《Wissen》——“知识”。——编者注

可见,可以了解到的是**倾向**,而不是**违法行为**。**证明就是**:在逮捕哥特沙克等人之前,检察机关并没有对“工人报”提起诉讼,而在逮捕了哥特沙克以后,这份报纸也只是由于本地检察机关所导演的骇人听闻的审判被定了一次罪;本地检察机关控告该报破坏了它的名誉¹³⁰。

然而起诉书也承认:“‘工人报’本身在它关于此事(即关于工人联合会及其委员会和分会的会议)的报道中似乎丝毫也没有设法掩盖什么东西。”

如此说来,既然不能因为“工人报”“报道”了工人联合会会议的情况而对该报进行审讯,那末也就不能因为工人联合会举行了这些会议而对该会本身进行审讯了。

加于“工人联合会”的罪名也只不过是加于“工人报”的罪名——**这个联合会有不良倾向**。难道对不外是一种倾向进行**倾向性的审判**也算是三月的成果吗?直到现在,我们的**九月法令**¹³¹,还没有颁布。哥特沙克等人的被捕和坐上被告席,决不是因为“工人报”的违法报道或工人联合会的违法集会。起诉书没有隐瞒:使法庭机器开动起来的不是工人联合会过去的活动,而是——请听吧:

“在德国成立的许多民主团体的代表们今年6月14日至17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代表大会。哥特沙克和安内克以科伦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大家知道,代表大会曾**公开表示赞成民主共和国**,当6月25日(星期日)又决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的时候,**本地当局在等待这个运动的回声**”。

本地当局在等待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但在法兰克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运动呢?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公开表示**赞成民主共和国这种不良倾向**。就是说,在等待这种“倾向”的“回声”并准备和这种回声作斗争。

大家知道，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和为执行其决定而选出的柏林中央委员会¹³²，在举行会议时并没有受到过政府方面的任何阻挠。

可见，尽管有不良倾向，德意志各邦政府还是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以及大会所推选的民主派组织的合法性。

但是，科伦当局“依然等待”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他们等待机会来揭露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违法行为。为了制造这个机会，警察局于6月25日派遣“警官鲁特尔和休涅曼”去参加工人联合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的全体大会，并且“特别责成他们注视那里将要发生的一切”。“订书匠约翰·马尔泰泽”也偶然地出席了这次全体大会。正如起诉书深为遗憾地指出的，他“假如没有在警察局任职的话，就可以是主要的见证人”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假如他不是雇佣警察的话，他就是主要的见证人。最后，也许是出于爱国狂热的最纯洁的动机，“见习法官冯·格罗特”也光临了这次大会。他转述安内克在全体大会上的演说“比谁都详细，因为他在开会时当场把安内克的演说记了下来”。

这样，很明显，科伦当局曾等待：6月25日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将要犯罪。于是采取了各种警察手段，以便在这种罪行发生时加以证实。既然当局有所“等待”，那它也就不喜欢白等。

“根据”被派去证实等待中的罪行的警官们的“秘密报告”和根据其他助手的报告，

“当局于7月2日对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在这个公开大会上发表的（读为：被等待到的）叛乱性的演说提起诉讼。7月3日他们被逮捕，他们的文件也被没收了。

7月5日，在传讯了许多证人和收到了一些新材料以后，审讯扩大到工

人联合会领导者们以前的全部活动，因此工人联合会的某些会员，如箍桶匠埃塞尔及其他一些人，也受到了法庭的审讯。对被告的审讯所提供的结果，一部分牵涉到被告在工人联合会中的言论，一部分牵涉到他们的文件和他们所散发的印刷品。”

审讯所真正提供的结果是——这一点我们将在明天根据起诉书本身来加以证明——等待于6月25日发生的运动只是当局的运动（这是法兰克福运动的一种回声），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由于辜负当局6月25日的等待必须受到六个月严格的审前羁押。没有比辜负当局获得救国奖章的希望更危险的事了。谁也不愿意自己的等待落空，而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

如果说，表演6月25日的罪行的整个方式证明当局是这幕刑法学戏剧的唯一编舞者，那末，了解一下审讯的材料，我们就能够恰如其分地评价使这个序幕拖延六个月之久的那种狡黠的伎俩。

现在我们从“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倾向性的政治审判”（玛·弗·安内克发表，“新科伦报”发行）¹³³这本书中逐字逐句地摘引几段如下：

“在侦查开始以后五六个月，接替盖格尔先生（这位先生已高升为警察厅长）的法院侦查员洛伊特豪斯宣布侦讯结束。可是，检察官黑克尔在了解了案情以后，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侦查员也曾表示赞同。经过了十四天，侦查再度结束。黑克尔先生在再一次从容不迫地研究了案件以后，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但是，法院侦查员以及高等法院都拒绝满足这些要求。于是黑克尔先生便向检察院上诉，这一级审理机关下令满足他的一部分要求，而对另一些要求则加以拒绝。例如，他提出的只根据从安内克的文书夹中找到的德国各地的人名单来对这三四十个人进行审讯。这一要求就遭到了拒绝……

当审讯的规模顺利地扩展到这样大而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延下去的时候，高等法院便在9月28日下令把案件转交检察院审理。10月10日检察院批

准起诉,10月28日总检察官签署了起诉书。

于是,这个案件就这样顺利地滑过了10月9日开审的陪审法庭例行季度审判庭。

11月27日指定成立非常审判庭。但就连这次审判庭的审判也竭力想滑过去:侦查文件被送交司法部同时还呈请将案件移交别的陪审法庭。可是,司法部没有找到这样做的充分根据,11月底,被告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的案件就最后被移交给12月21日成立的本地陪审法庭非常审判庭审理。”

在表演这个冗长的序幕的期间,首席法院侦查员盖格尔已受命代理警察厅长的职务,而检察官黑克尔也荣升为检察长。既然黑克尔先生由于他的这个新职务,已于非常审判庭开始前不久由科伦调往爱北斐特,那末他就不会和被告同时出席陪审法庭了。

二

科伦 12 月 22 日。据以证实“等待的”罪行的居尔岑尼希全体大会是在哪一天举行的呢？是在 6 月 25 日举行的。6 月 25 日是巴黎的六月起义者彻底失败的日子。当局是在哪一天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提起诉讼的呢？是在 7 月 2 日，也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它当时的同盟者——政府——怀着复仇的狂热庆祝惩治自己的政敌的时刻到来的时候。7 月 3 日，哥特沙克和他的同志们被捕。7 月 4 日，以拉登堡为代表的当今的反革命内阁加入了汉泽曼内阁。在同一天，柏林协商派议会的右翼决定举行政变：它利用部分左翼人士逃走的机会，就在那次会议上干脆取消了多数票通过的关于波兰的决定。¹³⁴

把这些日期对照一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我们大概可以根据证人的证词来断定，“某”人在 7 月 3 日曾经宣称：“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被捕，给公众造成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只要翻阅一下上述日期的“科伦日报”、“德意志报”和“卡尔斯卢厄日报”¹³⁵就会深信，这些天在德国，特别是在科伦，接连不断听到的并不是莫须有的“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而是“卡芬雅克运动”的“回声”。

我们的读者还记得，6 月 25 日当工人联合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全体大会的时候科伦当局曾“等待”过“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他们还记得，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讯不是根据哥特沙克等人在 6 月 25 日以前所犯的某种真正罪行，而完全是根据当局等待

他们在 6 月 25 日**必将**犯下的某种可感触到的罪行。

对 6 月 25 日所寄与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于是 1848 年的 6 月 25 日就突然变成了 1848 年。因此就把 1848 年的运动归罪于被告人。哥特沙克、安内克、埃塞尔被控的罪名是：

“在 1848 年间（注意这种说法的伸缩性），他们在科伦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改变和推翻现存政府，并且用煽动公民们互相残杀的办法来挑起国内战争，或者是（注意！）通过在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说、刊印著作和张贴标语等手段煽动人们从事暗害活动和追求类似的目的。”

这么说来，究竟是进行了阴谋活动“或者是”任何阴谋活动都没有“进行”。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煽动人们“从事暗害活动和追求类似的目的”，也就是说，从事暗害活动和类似的事情！这是多么美妙的法律文体啊！

检察院关于起诉的决定就是这样写的。

在起诉书的最后一段中，没有提到阴谋活动的字眼，“这样一来”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就被控为：

“在 1848 年间，他们通过在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说和刊印著作的手段公然煽动自己的同胞用暴力改变宪制，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然而这些煽动都没有获得成功。这种罪行在刑法典第一〇二条及第八十七和九十一条中已有规定。”

那末，当局在 1848 年间的 7 月 2 日以前为什么不告发他们呢？

而且，在谈到“用暴力改变宪制”以前，这些老爷似乎应该先证明确实存在着某种宪制。王权驱散了协商派的议会，这恰恰证明了宪制已不存在。如果协商派比王权强大的话，他们也许会用相反的方法证明同样的事情。

至于煽动“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起诉书援引的证据是：

- (1) 被告们在 1848 年间的一些演说，
- (2) 未刊印的文件和
- (3) 已刊印的文件。

关于第一点。演说给起诉书提供了下述 *corpus delicti* (罪状)：

在 5 月 29 日的会议上，埃塞尔宣称“共和国”是“使工人摆脱穷困的手段”。这就是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哥特沙克曾宣称：“反动派将导致共和国的建立。”有些工人诉苦说他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哥特沙克回答他们道：“你们必须学会**团结**，学会区别自己的朋友和隐蔽的敌人，必须学会**独立地进行自己的事业**。”

这就是公然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起诉书用下面几句话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论据：

“证人，即为了了解以前各次大会情况而被传讯的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和非会员，对于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特别是对于哥特沙克，一般都只是加以赞扬。照他们的说法，哥特沙克始终谨防过火行动，力求平息众怒，而不是煽动群众。固然，他同时也指出，共和国是他追求的最终目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街头骚乱是不行的，只有靠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除了共和国之外就没有生路。这样，非常明显，为了逐步摧毁现存制度的基础，他当然就不得不再抑制粗野的民众的急躁情绪。”

被告平息众怒，而不是煽动群众，正是这一点清楚地证明了他们想逐步摧毁现存制度的基础的恶毒倾向，即按照不利于当局的方向来合法地利用出版自由和结社权的恶毒倾向，而起诉书竟把

这叫做“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然而,当局“等待中的”6月25日的全体大会终于来临了。起诉书说,关于这次大会,“有证人的详细的证词”。但是这些详细的证词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说哥特沙克做了一个关于法兰克福事件的报告,讨论了科伦三个民主团体的合并问题¹³⁶,说哥特沙克致了“闭幕词”,这个闭幕词引起了马尔泰泽和见习法官冯·格罗特的特别注意,讲话的结尾达到了“高潮”,他说:“等待时机比轻举妄动需要更多的勇气。在反动派采取能够推动共和国成立的步骤以前,必须等待。”这就是公然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至于安内克,起诉书加给他的罪名“没有别的,只是在讨论三个团体(科伦的三个民主团体)的合并问题时他十分热烈地主张合并,并且称出席大会的人为‘共和主义者公民’”。

主张科伦的三个民主团体“合并”就是公然“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而“共和主义者公民”这一称呼啊!马尔泰泽和冯·格罗特两位先生可能感到这样的称呼对他们是个侮辱。可是,难道冯·德利加爾斯基将军不是称他自己和杜塞尔多夫的公民为“共产主义者公民”吗?

如果这就是从“等待中的”6月25日全体大会上所能挑剔出的一切,那就难怪当局要使用“在1848年间”这个公式了。当局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了竭力搜罗有关这一年的运动的情报,就扣留了许多信件和印刷品,没收了三期“工人报”,可是这三期报纸每期只要花四个分尼就可以在任何一条街上买到。

然而，当局从他们所没收的信件中可以看出，1848年在德国笼罩着多么厉害的“政治狂热”。在他们看来，卡尔·亨克尔教授从玛尔堡寄给哥特沙克的一封信是特别“狂热”的。他们向黑森选帝侯国政府检举了这封信，并且欣然获悉目前正在对一位教授提起诉讼。

最后，从信件和印刷品中还可以看出，1848年在头脑中和在纸面上都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狂热，并且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简直就是“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总之，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曾进行了这一切活动，可是当局只是用没收被告们的印刷品和信件的办法才探悉了这个惊人的运动的“回声”！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2月21和2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12月22和23日“新莱茵报”
第175和176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

科伦。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

1848年的六月、十一月、十二月是欧洲各国人民的意识在失望和觉醒的历程上的几个巨大的里程碑。

在束缚着德国人民的最后一些幻想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他们对法官的迷信般的尊敬。

普鲁士反革命的毫无诗意的北风，也把这朵人民幻想之花摧残了；这朵花的真正的祖国是意大利——永恒的罗马。

莱茵上诉法院、柏林高级法庭和闵斯德、勃罗姆堡、拉提博尔^①等地的地方法院对埃塞尔、瓦尔德克、泰梅、基尔希曼、吉尔克等人所采取的行动和有关的声明，再一次证明了法国国民公会一直是各个革命时代的灯塔。法国国民公会用一纸法令解除一切官吏的职务，从而奠定了革命的始基。上面提到的那些法院向全欧洲证明，法官们也不过是一些官吏。土耳其的僧侣裁判官和中国满清的吏部可以大胆地签署不久前这些“高贵的”法院所发布的反对自己同事的指令了。

我们的读者都已知道柏林高级法庭和拉提博尔地方法院的指

^① 波兰称作：贝德哥什、拉威布日。——编者注

令。今天我们且来看看**闵斯德地方法院**的指令¹³⁷。

但是我们先要简单地谈一谈在柏林设有办事处的**莱茵上诉法院**这个莱茵法学界的 *summus pontifex* (泰斗)。

大家都知道,莱茵的法学家们(少数可嘉者例外)认为普鲁士协商派议会的当务之急不外乎是帮助政府祛除它那陈腐的偏见和根深蒂固的仇恨。他们用事实向协商派议会证明,他们以往的反对派立场和 1789 年以前的法国议会的反对派立场未必有多少区别:两者都只是以自由主义的词句为掩饰来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狭隘利益**。无论是 1789 年法国国民议会中的自由派议员,或是 1848 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莱茵省自由派法学家,都是一群奴颜婢膝的**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莱茵普鲁士的检察官员因自己的“政治狂热”**“而比旧普鲁士的侦查员高出一筹**。自然,在协商派议会解散**以后**,莱茵的法学家们也应该保持自己的声誉。莱茵普鲁士上诉法院没有让旧普鲁士高级法庭专美于前。高级法庭的庭长米勒曾寄给高级法庭枢密顾问**瓦尔德克**一份谥文,于是莱茵普鲁士上诉法院院长**泽泰**也把这样的谥文送给了首席监察顾问**埃塞尔**(不要和科伦那两位“心地善良的埃塞尔”^①混淆起来)一份。但是,莱茵普鲁士的法院究竟要比旧普鲁士的法院高明。莱茵上诉法院院长比他的对手高超的地方,就在于他犯了一个非常笨拙的**错误**,他还在把信寄给埃塞尔先生本人之前,就已通过“德意志改良报”¹³⁸向柏林的公众披露了这封信。我们深信,全莱茵省将会给我们白发苍苍的**可尊敬的同乡埃塞尔先生**写一封洋洋大观的致意书作为对泽泰先生这封信的回答。

① 指科伦的律师埃塞尔第一和埃塞尔第二。——编者注

在“丹麦王国”¹³⁹里不是有些乌七八糟，而是一切都是乌七八糟！

现在来看看**闵斯德**的情形。

我们的读者已经听说**闵斯德**地方法院抗议该院院长**泰梅**回院供职的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反革命内阁曾经直接或间接地授意高等枢密法庭、莱茵上诉法院和勃罗姆堡、拉提博尔、**闵斯德**等地的地方法院说，国王不愿意让**瓦尔德克**、**埃塞尔**、**吉尔克**、**基尔希曼**和**泰梅**回到他们的高等法官的职位上去，因为他们还继续在柏林开会并参与通过了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因此，上述各机关应当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抗议。

各高等法院（起初莱茵上诉法院曾犹豫不决，因为大演员获得成功的秘诀是最后出场，而不是最先出场）都毫无例外地一致遵从这种授意，纷纷把抗议书由柏林寄往柏林。**闵斯德**地方法院真是愚蠢之至，它竟把对**泰梅**的抗议书直接送给了国王（所谓的立宪国王），这份抗议书公然宣称：

“他参加国民议会（该议会这时业已停止活动）非法的党派会议，就等于公开反对陛下的政府，而投票赞成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就等于站到革命立场并企图在我们祖国燃起无政府状态的烽火。”

随后又说道：

“在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上面所说的**泰梅**如果仍在本地法院供职，那是违背我们的法律意识，违背公众所提出的地方审判庭庭长应当毫无瑕疵这一要求的，也是和他在教导初等司法官员方面的职责，和他对下级司法官员的地位不相称的。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良心上的义务就是忠心耿耿地向陛下表达我们的殷切愿望，即不愿再与**泰梅**院长保持共事关系。”

在奏折上签名的是法院全体官员，只有法院的唯一顾问，司法

在“丹麦王国”¹³⁹里不是有些乌七八糟，而是一切都是乌七八糟！

现在来看看**闵斯德**的情形。

我们的读者已经听说**闵斯德**地方法院抗议该院院长**泰梅**回院供职的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反革命内阁曾经直接或间接地授意高等枢密法庭、莱茵上诉法院和勃罗姆堡、拉提博尔、**闵斯德**等地的地方法院说，国王不愿意让**瓦尔德克**、**埃塞尔**、**吉尔克**、**基尔希曼**和**泰梅**回到他们的高等法官的职位上去，因为他们还继续在柏林开会并参与通过了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因此，上述各机关应当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抗议。

各高等法院（起初莱茵上诉法院曾犹豫不决，因为大演员获得成功的秘诀是最后出场，而不是最先出场）都毫无例外地一致遵从这种授意，纷纷把抗议书由柏林寄往柏林。**闵斯德**地方法院真是愚蠢之至，它竟把对**泰梅**的抗议书直接送给了国王（所谓的立宪国王），这份抗议书公然宣称：

“他参加国民议会（该议会这时业已停止活动）非法的党派会议，就等于公开反对陛下的政府，而投票赞成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就等于站到革命立场并企图在我们祖国燃起无政府状态的烽火。”

随后又说道：

“在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上面所说的**泰梅**如果仍在本地法院供职，那是违背我们的法律意识，违背公众所提出的地方审判庭庭长应当毫无瑕疵这一要求的，也是和他在教导初等司法官员方面的职责，和他对下级司法官员的地位不相称的。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良心上的义务就是忠心耿耿地向陛下表达我们的殷切愿望，即不愿再与**泰梅**院长保持共事关系。”

在奏折上签名的是法院全体官员，只有法院的唯一顾问，司法

发表了声明,而且是直接在御前发表的,它就以一方的身分出现,在审理案件之前说出了**偏见**,因而对于他方决不能起公断人的作用。

大家知道,似乎是由于柏林的普通人民对普鲁士国民议会施加了压力,勃兰登堡内阁才举行了第一次政变¹⁴⁰。为了不对议员们施加任何压力,甚至在议员们回到自己的固定住所以后,内阁还有加无已地对他们继续进行那在柏林时就开始了的“野蛮的狩猎”¹⁴¹!

司法大臣林泰伦在他的指令(这个指令我们将在下面发表)中说:

“许多人故意散布一种谬见,说什么以往施行的各种刑律,特别是制裁叛国罪的刑律,从今年3月起已经失去效力;这种谬见大大促进了无政府状态的扩大,而且可能已对个别法院发生了有害影响。”

林泰伦先生和**完全受制**于他的各高等法院的大部分活动,再一次证明:自从强行解散国民议会以后,在普鲁士起作用的只有一条法律,就是**柏林权奸的专横**。

1844年3月30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臭名远扬的法官纪律法。根据这条法律,只要内阁的一纸法令就可以撤换法官或免除法官的职务。最后一届“**联合议会**”废除了这条法律,并重新确定了以下的原则:只有根据法庭的判决,才能撤换法官或免除法官的职务。钦定宪法确认了这个原则。而一些法院按照司法大臣林泰伦的方法行事,想用**道德压力**来迫使自己的一些政治上受到损害的同行辞职,它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在肆意践踏上述那些法律吗?这些法院把每个政治观点不合乎它们的普鲁士王国的“**荣誉**”标准的人都从自己的队伍中排挤出去,它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在把自己变为

军官联合会吗？

难道规定人民代表不受法庭审讯和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权的法律，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吗？

真是有名无实！

如果说普鲁士宪法由于它特有的条款和产生的方式而没有把自己废弃，那末柏林高级法庭是它的最后保障这一简单的情況却会把它废弃的。宪法由大臣们的责任心来保障，而大臣们的无责任心则由为他们钦定的法院即柏林高级法庭来保障，这个高级法庭的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就是米勒先生。

因此，高级法庭的最近几个指令正好是公然废除钦定宪法。

在奥地利，政府要洗劫银行这一直接威胁¹⁴²（维也纳人民在大义凛然地痛击金融封建主义的时刻并没有触动银行）使资产阶级相信，由于它背叛无产阶级，遭受打击的恰恰就是它在背叛时打算加以保障的东西，即资产阶级的财产。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看到，由于它怯懦地对政府采取信赖态度，对人民背叛地采取不信赖态度，资产阶级财产的**必要保障——资产阶级的司法在受到威胁。**

由于法官处于依附地位，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司法，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La bourgeoisie sera punie par où elle a peché——资产阶级将受到它用来为非作歹的工具即政府的惩罚。普鲁士各高等法院的谄媚的声明不过是这些法院即将按专制精神进行改造的最初征兆，——关于这一点，司法部不久前发布的下述指令就是证明：

“在今年 10 月 8 日的通令中，我的前任大臣已经提醒，司法机关的首要任务在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使人遵守法律，它们为国家服务的最好行动就是执行这项任务，因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法律的基础上才能确立。遗憾的是，从

那时以来,许多地主都发现了极为严重的嘲弄法律和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在国内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用暴力反抗政府当局的举动,而这种举动并不是在各处都遭到了坚决有力的回击。鉴于这种可悲情况,现在当国王陛下政府已经采取坚决措施来拯救危在旦夕的国家的时候,我再度向全国司法机关和检察官先生们呼吁,号召他们恪尽职守,毫不容情。无论谁犯了罪,都应立即受到法律惩治。

无论根据地方当局的个别通知还是根据官方报纸的报道,我都不得不深为遗憾地指出,个别司法官员把他们的职业要求于他们的特殊义务置之不顾,他们有的放任自己去干一些显然是非法的活动,有的则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而这种勇气和大无畏精神是跟恐怖主义顺利进行斗争所特别不可缺少的。我认为对这种人也要定罪,必要时还应毫不松懈、毫不迟疑地提起诉讼,因为保卫司法的官员是受托维护法律的尊严的。他们自己违法,那就是犯下了双重的罪行;而对于他们的诉讼特别需要加速进行,因为执行司法的权能不应再留在这类官员手中。按照现行的规章,在未征得上级机关同意之前,对于某些犯罪官员不得进行正式审讯或采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的暂时解除职务的措施;因此,在罪犯中有这些官员的情况下,不必等待特殊的许可,而应该立即着手查明事实,作为审讯的根据,然后再尽快地取得所要求的批准。对于见习法官和编制外的官员则不应忘记,解除他们的国家职务是要遵循特殊的规章的。

许多人故意散布一种谬论,

说什么以往施行的各种刑律,特别是制裁叛国罪的刑律,从今年3月起已经失去效力;

这种谬论大大促进了无政府状态的扩大,而且可能已对个别法院发生了有害的影响。鉴于普鲁士司法官员现在一般说来还保留着优良的精神,只要指出法律在没有经过立法途径废除或改变以前一直有效这个著名的法律原则,以及指出本月5日颁布的宪政法令第一〇八条的条文,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认为,可敬的普鲁士司法部门的官员们,只要完全忠实于真正合乎道义的和国家的自由,是会把尊重法律和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

只要遵循这些原则,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前进,确信我们能战胜犯罪行为、战胜无政府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大力促使显赫一时的普鲁士国家恢复自己的道义力量,并且在我们当中杜绝——用法兰克福一位刚毅果敢的议员的话来说——寡廉鲜耻的事情和粗野的暴行。

各法院院长先生以及科伦的总检察官先生应当对自己属下的官员发出相应指示，并通知我因什么过失对哪些官员给予了免取处分并开始审讯。”

司法大臣**林泰伦**

1848年12月8日于柏林

将来当革命终于在普鲁士取得胜利的时候，它不需要像二月革命那样用特殊的法令来废除旧法官的终身制。它将在莱茵上诉法院、柏林高级法庭和勃罗姆堡、拉提博尔、闵斯德等地的地方法院的真实可靠的声明中发现这个等级放弃自己特权的举动。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

12月23日左右

载于1848年12月24日

“新莱茵报”第17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辟谣

杜蒙先生的文化流氓无产阶级以最动人的消极抵抗态度对待“新莱茵报”给它的所有闷棍，以“新莱茵报”编辑所没有写过的文章为凭向警察告发他们，企图以此来进行报复。于是，根据 12 月 25 日的“科伦日报”，弗莱里格拉特便成了纽约出版的“德意志快邮报”上那篇科伦通讯的作者，因此他也就参加了 11 月 3 日为祝贺“科伦日报”老板们而举办的虚器乐会。“科伦日报”的编辑显然是不甘心让“马尔泰泽”专美于前的^①。

写于 1848 年 12 月 2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2 月 27 日
“新莱茵报”第 179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 154 页。——编者注

新“神圣同盟”

科伦 12 月 30 日。还在几个月以前，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就结成了新的“神圣同盟”，这件事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条约最近就要公诸于世。依靠“上帝和鞭子的恩典”的君主们的这个同盟的灵魂是俄国。但同时俄国的全部政治和外交活动，除少数例外，都是由德国人或俄籍的德国人进行的。的确，凡是有专制政体和反革命进行活动的地方，我们总会遇见德国人。但我们在任何地方所遇见的德国人，都没有在不断反革命的中枢——俄国的外交界所遇见的那样多。在这里占头把交椅的涅谢尔罗迭伯爵是德国的犹太人；其次，驻柏林的公使冯·美延多尔夫男爵，是从爱斯兰来的，而他的助手，皇帝的侍卫官，卞肯多尔夫伯爵上校，也是爱斯兰人。在奥地利工作的库尔兰人麦迭姆伯爵以及他的几个助手，其中包括冯·方通先生，都是德国人。俄国驻伦敦公使冯·布隆诺夫男爵也是库尔兰人，他是梅特涅和帕麦斯顿的中间环节和中介。最后，以俄国代办身分在法兰克福进行活动的布德堡男爵是里夫兰人。这只是随便举出的几个例子。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能举出好几十个，更不用说那些以彼得堡沙皇为后台，在德国身居高位和要职，同时又领俄国的优厚奉禄的人了。

没有必要说明（因为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奥地利大公妃、现在的皇太后索菲娅在人民敌人阵营和神圣同盟阵营中扮演

着什么样的角色。索菲娅本人又处在米哈伊尔大公妃、保尔·维尔腾堡亲王的女儿叶列娜大公妃的最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叶列娜使尼古拉和索菲娅同臭名昭彰的路德维希大公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些人物的圈子里，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讨论和通过了一项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奥地利的军法皇帝^①应当娶大公夫妇唯一在世的女儿^②为妻，借以使新“神圣同盟”亲密无间，团结一致，并使俄国能够日益接近自己的目的——在德国建立鞭子的绝对统治。

写于 1848 年 12 月 3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2 月 31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83 号

① 军法皇帝(或戒严皇帝)指弗兰茨·约瑟夫。——译者注

② 指叶卡特琳娜·米海依洛夫娜。——译者注

革命运动

科伦 12 月 31 日。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运动像 1848 年的革命运动这样以如此动人的序曲开始。罗马教皇给 1848 年的革命运动以宗教的祝福，拉马丁的风神之琴轻轻地奏出了优美慈爱的曲调，歌唱了所有社会成员和各族人民的《fraternité —— 手足情谊。

“拥抱吧，亿万人民！
普天之下共亲吻。”¹⁴³

现在，被赶出罗马的教皇在残暴的白痴斐迪南的保护之下稳坐在加埃塔；这个意大利的《iniciatore》（“倡议者”）¹⁴⁴正在运用计谋，伙同他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曾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的、意大利历来的死敌奥地利来反对意大利。不久前在法国举行的总统选举，对于叛徒拉马丁的不得人心作了统计学上的证明。没有比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更仁慈、更人道和更软弱的事变了；没有比这种软弱性的人道主义的必然后果更残酷的东西了。意大利、波兰、德国和首先是在六月战败的那些人们就是证明。

然而，随着法国工人在六月的失败，六月的胜利者自己也战败了。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的其他领袖被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政党即“国民报”派排挤掉了；而“国民报”派则被王朝反对派即梯也尔-巴罗排挤掉了；如果三次复辟的循环没有完结，如果

路易-拿破仑不只是一个空的投票箱（通过这个投票箱，法国农民声明他们参加社会革命运动，而法国工人则诅咒过去几个革命阶段的一切活动家：梯也尔—巴罗，拉马丁和卡芬雅克—马拉斯特），而是一个更有用的东西，那末这个王朝反对派也应该让位给正统主义者¹⁴⁵。但是我们要指出如下的事实：革命的法国工人阶级失败的必然结果，便是刚刚镇压了无产阶级的法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失败。

法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就是那些用谋求解放的英勇行动来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民族遭受新的奴役。波兰、意大利和爱尔兰又一次遭到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吉利的警察制度的掠夺、侮辱和残暴的蹂躏。法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就是欧洲各国曾经一度与人民结合起来用反对封建制度的流血起义来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中等阶级的失败。那不勒斯、维也纳、柏林！法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文明在同野蛮作斗争中的失败。在瓦拉几亚俄国人及其工具——土耳其人开始对罗马尼亚人实行压迫；在维也纳，克罗地亚人、潘都尔兵、捷克人、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和其他的歹徒扼杀了德国的自由，而沙皇目前在欧洲则处处出头露面。因此，打倒法国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欧洲解放的口号。

但是，英国这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负欧洲复辟费用的国家，这个在自己内部阶级矛盾发展得最尖锐最明显的国家，好像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

社会。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每个国家内的工业和贸易关系都依赖该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都受该国和世界市场的关系的制约。但是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而资产阶级又统治着英国。

因此,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而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赔偿它对十八世纪革命所犯下的罪过。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 1849 年的前景。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2 月 3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1 月 1 日“新莱茵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第 184 号

资产阶级的文件

科伦 1 月 4 日。大家知道,在资产阶级统治最发达的英国,社会慈善事业采取了最高尚、最慷慨的形式。由资产阶级社会举办的、让过剩的工人居民能够苟延残喘的英国 workhouse (习艺所) 这种社会机构,以十分微妙的形式把善举和资产阶级对被迫向它乞求善举的不幸者所施加的**报复**结合起来了。穷人不仅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几乎仅够维持体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只限于令人厌恶的、使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愚钝的、非生产性的、无意义的劳动,例如拉磨子。为了使不幸者明白他们真的犯下了弥天大罪,明白他们不但没有像通常那样成为给资产阶级带来利润的被剥削的对象,反而像堆在仓库里的酒桶使酒商担负一笔开支一样,使他们的天生的需求者增加了一笔费用,——为了使他们感到自己真的罪孽深重,就夺去了他们的一切,夺去了甚至对惯犯也加以保留的东西:夺去了同妻室儿女团聚、消遣、同别人交谈的机会等等。但是就连英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残酷的善举**”也丝毫不不是建筑在慈悲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非常实际的、很容易加以计算的基础上的。一方面,如果大不列颠全境的赤贫者一下子都被抛到街头,资产阶级制度和商业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另一方面,英国工业有时处在狂热的过度生产时期,有时又处在商业滞销时期,在前一种情况下,现有劳动力的供应难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而

劳动力终究是必须获得的，而且愈便宜愈好，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远远超过需求，工人大军勉强有一半人能够为了挣得一半的工资而从事有用的劳动。为了在兴旺时期经常有现成的后备军，而在商业雕蔽时期又可以在这种慈善机构中把后备军变成没有意志、没有反抗力、没有要求和欲望的机器，难道还能想出比办 work-house (习艺所) 更高明的办法吗？

普鲁士资产阶级却不同于英国资产阶级，并且胜过英国资产阶级。它不是像不列颠资产阶级那样在政治上狂妄自大到令人不禁想起渎神的罗马风尚的地步，而是对御座、祭坛、军队、官僚和封建制度表示至高无上的崇敬和基督徒般的温和恭顺；它不是努力通过贸易活动去征服全球，而是按中国方式在国内经营小本生意，像庸人那样缩手缩脚地拘泥于早已过时的、因循守旧的半行会制度，对工业中永无止境的伟大发明精神总想加以斥责。不过，普鲁士资产阶级有一点已经接近自己的不列颠的典范，这就是**对待工人阶级的无耻残酷**。如果说，普鲁士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集团，在这一点上也落后于不列颠人的话，那末，这不过是因为整个说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阶级**，由于缺乏勇气、智慧和毅力，它从来也没有争得过什么东西，而且以后也永远不能争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它并不具有全国规模，它只是作为**一省、一城、一地**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群**私有者**而存在，就**这种形式**来说，它对付工人阶级比英国资产阶级还要残酷。为什么人民从复辟时期起就那样怀念不久前被他们禁锢在地中海孤岛上的拿破仑呢？因为智者的专制要比愚者的专制好受些。所以，英国工人比起德国工人来可能有些民族自豪感，因为压迫他们的主人也压迫着整个世界，可是德国工人的主人，即德国资产者，本身就是**奴隶之一**，而天下最可怕、

最卑贱的事，莫过于做**奴隶的奴隶**。

我们把在光荣的科伦市从事城市建筑工作的无产者必须签字的“**工人手册**”逐字逐句地转载在下面，作为证明我国资产阶级卑鄙无耻地对待工人阶级的历史文件。

工人手册

第一条 每一个工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所有身兼警官的市监工的指示和命令。凡不服管教或拒不从命者，应立即开除。

第二条 未经建筑工程监工的特许，任何工人不得从一工段转到另一工段，或擅离工地。

第三条 凡窃取他工段的大车、独轮车或其他用具用于自己工段工作的工人，应予以开除。

第四条 凡酗酒、喧哗、吵架、争辩或殴斗者，应立即予以开除。此外，在**必要情况下**，肇事人应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第五条 凡**迟到工地十分钟以上者**，于半日内不予分配任何工作；迟到三次即可开除。

第六条 请求辞工或被开除的工人，应在所规定的下一个发工资的日子，按本人所完成的工作量领取工资。

第七条 工人被解雇，应载入工人手册。如工人系被开除，**得视情况禁止**其再在原建筑工地或一切城市建筑工地就业。

第八条 开除工人及开除的原因，每次都应报知**警察当局**。

第九条 如工人欲对**工地监工提出控诉**，则应推举由三名工人组成之代表团将控诉书呈交负责城市建筑工程的首长。该首长应就地调查控诉内容，并**自行裁夺**。

第十条 工作时间定为早六时半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至傍晚天黑。（真是妙笔！）

第十一条 工人必须同意上述条件，才能获得工作。

第十二条 工资于每星期六下午在建筑工地发给。

具有绝对支配权的建筑工程总监工

于科伦

工人 { 签字
或画押

{ 分配于某工段,担任某项
工作等等
建筑工程监工签字

全俄专制君主对他的臣民所下的**俄国式圣旨**,能比这更富于亚洲精神吗?

对于市监工,甚至对“**一切身兼警官的市监工**”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凡**不服管教或拒不从命者应立即开除**”。可见,首先必须**消极服从!**其次,根据第九条,工人有权将“**控诉书**”呈交“**负责城市建筑工程的首长**”。“**这位总监的裁夺是不容上诉的,只要从等级制的角度来看,就可以想见,这种裁夺自然是不利于工人的。**如果他做出裁夺,如果工人被列入了全市性的黑名单,那末这些工人就倒了霉,他们从此就要受**警察局监视**。而他们的最后一点市民自由的外表也就消失无余了,因为根据第八条,“**开除工人及开除的原因,每次都应报知警察局当局。**”

仁慈的先生们,如果你们解雇了工人,如果你们向工人宣布废除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你们的**工资**所依据的那份合同,那末废除这种**民事合同同警察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城市工人是苦役犯吗?或许,有人向**警察局告密**,说他们是对自己的天然上司,对你们这些明智的、显赫的、有势力的人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如果有人向**警察局告密**,说你们破坏了什么供应合同,或者没有按时支付期票,或者在新年喝得酩酊大醉,难道你们不会嘲笑这样的人吗?当然会嘲笑的!但是,如果事情出在工人身上,你们就不会认为自己同他们有着**民事合同关系**,你们就会刚愎自用地以**天然**

的主人的姿态统治他们！而为你们效劳的警察局就应当掌管工人记过簿。

根据第五条，凡是迟到**十分钟以上**的人，都要受到**半个工作日**没有工做的处分。处分和过错是多么不相适应啊！你们迟到了**整整几个世纪**，而工人却不能在六点半以后迟到**十分钟**，迟到了就得失去**半个工作日**？

最后，为了使这种家长式的专横不受任何破坏，使工人听凭你们随意处置，你们尽量使你们的走狗任意决定处分的轻重。根据第四条，在“**必要情况下**”，即在你们认为是必要的情况下，在开除和报告警方以后，“肇事人应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根据第五条，工人三次于六点半后迟到十分钟，即“**可**”开除。根据第七条，如工人被开除，“**得视情况禁止其再在原建筑工地或一切城市建筑工地就业**”等等，等等。

我们城市的卡托们^①，这些对柏林奴颜婢膝的伟人们，在他们的这个刑法典中为疯狂的资产者的胡作非为打开了多么方便的大门啊！

从这个模范法律的例子要以看出，**我们的资产阶级如果当了政，会赐给人民什么样的宪章。**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1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1 月 5 日“新莱茵报”
第 187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① 卡托 (M . Porcius Cato) 是古罗马的执政官、监察官，他拥护旧习，捍卫贵族特权，以严酷著称。——译者注

合众国的预算和基督教 德意志的预算

科伦 1 月 6 日。普鲁士政府究竟花了国家多少钱，我们终于在几天前弄清楚了。“普鲁士国家通报”终于用 1849 年国家预算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以前的预算一直在怎样卑鄙地欺骗我们。对这份新年礼物感到震惊的，只有那些一向把我们的天赋政府的一言一语奉为神圣真理，把 1820 年以来国家财政方面的弥天大谎当做我们这个警察国家的预算已经十分完善的证据的人。

普鲁士的面积约五千平方英里，人口稍微超过一千六百万。

北美合众国现在的领土几乎等于整个欧洲的面积，人口在两千一百万以上。

要考察普鲁士 1849 年度的预算，除了北美自由合众国的预算以外，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出发点了。

把两个预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普鲁士资产者为了如愿以偿地得到一个天赋政府，为了在戒严时期或非戒严时期受这个政府的雇佣兵的虐待，为了受那帮目中无人的官员和容克地主的蔑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另一方面，那个意识到自己力量并决定利用自己力量的刚毅的资产阶级，只须付出多么微小的代价就能维持自己的政府。

两个预算本身就已充分证明：一方面胆小怕事、目光短浅、庸

庸碌碌，而另一方面则意识到自己的优点、预见性和力量。

合众国 1848 年的全部开支共计 42 811 970 美元。这个数目包括在距中央政府所在地两千英里以外进行的战争，即墨西哥战争所需的费用。运送军队和一切军需品需要多么巨大的费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合众国的收入共计 35 436 750 美元，其中 31 757 070 美元得自关税，3 328 642 美元得自出卖国有土地，351 037 美元得自其他各种偶然收入。由于军费开支，一般收入不能抵偿全部支出，于是就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公债券是按照高于 *al pari* (票面价额) 的价格认购的。请到金融市场去打听一下，“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在这种优惠条件下是否能弄到一千塔勒！

在合众国，财政年度是从 7 月 1 日开始的。在 1849 年 7 月以前，由于进行墨西哥战争，开支比平时还会大大增加（当然不是按普鲁士规模增加）。但是，波克总统在给国会的咨文中答应，在下一财政年度，即到 1850 年 7 月 1 日为止的那个财政年度，提出一个普通的和平时期的预算。

这个强大的国家，即北美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和平时期的开支究竟是多少呢？

是 33 213 152 美元，其中包括国债利息 (3 799 102 美元) 和应该在 1850 年 5 月 30 日付给墨西哥的 3 540 000 美元。

如果除去预算中的这两笔特殊开支，那末合众国整个政府和管理机构一年的开支还不到两千六百万美元。

而普鲁士公民在和平时期每年向国家交纳多少钱呢？

答案是相当令人痛心的。给我们作出这一答案的是“普鲁士国家通报”。它宣称：每年九千四百万塔勒以上！

总之，北美共和国两千一百万居民虽然有钱，甚至很富，但交给国库的还不到两千六百万美元，就是说折合普鲁士货币还不到三千八百万塔勒；而一千六百万普鲁士人虽然比较穷，每年却必须向国库投入九千四百万塔勒，而国库还感到不满足。

但是，我们可不能不主持公道！

北美共和国只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任期四年的总统，诚然，这个总统为国家所做的事要比一打国王和君主加在一起所做的事还多，但是他每年只能得到三万七千塔勒（折合普鲁士货币）的微薄薪俸。在这区区三万七千塔勒中，反映出了基督教德意志人“天佑吾王，天佑容克”的心情的全部哀伤。根本没有侍从和宫廷珠宝商，根本没有人像在沙洛顿堡大街上那样为宫廷贵妇用清水泼道，根本没有用公民的钱兴办的猎场等等。噢，这多么可怕！但最可怕的是这些北美人，这些上帝的弃儿，看来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可怕的，这是野蛮的。

我们这里就完全不同了。虽然我们花的钱甚至比他们多两三倍，但是我们却由于具有他们所没有的而且靠三万七千塔勒根本不可能有的东西而感到心满意足。我们因为有上帝赐福的富丽堂皇的宫廷而感到欢欣愉快，人民每年为这个宫廷所花的钱的确确实数目我们不知道，大致估计一下至少有四五百万塔勒。

美国人真是傻得出奇，他们尽可能把钱积蓄起来，以便过豪华的生活，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而我们则认为抛弃自己的享受，即自己的钱财，使别人能够过豪华的生活，是基督教德意志人的天职。除了这种豪华以外，靠人民掏腰包而穷奢极侈的宫廷，对于大量落魄的伯爵、男爵以及一般“贵族”等等，什么样的善举没有做出来啊！这些人大多数只会消费，不会生产，如果不从国家那里以体面

的形式得些施舍，那他们终究会完全破产。如果我们要一一举出我们制度的善举和优点，就是花一天时间也说不完！

由于这种微不足道的预算，美国人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我们！

譬如说，如果总督伯提歇尔先生是在他们那里，他就不能从国库得到三千塔勒的赠礼。他们一定会说，他完全可以满足于自己的厚禄。伯爵和男爵们也根本不可能得到额外的子女教育费。在这种场合，北美共和国会对这些可敬的先生说：alors il faut s'abstenir d'avoir des enfants! (那就别生孩子好了!) 如果那里有一个“许泽尔”，那他就得不到每年六千塔勒的奖赏，而应该满足于自己的薪俸，并且这份薪俸也许甚至会减少到三千塔勒。一个人，一个普鲁士人，一个基督教德意志的将军，就只应该靠这点钱过活吗？多么邪恶的居心啊！A page! (真是荒唐之至!)

美国人也同汉泽曼先生一样，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他们最多只会给唐·卡洛斯一顿 whippings (鞭笞)，但永远也不会给他七十万塔勒，让他能够同自己的大贵族和僧侣们一起去过心满意足的生活，为梅特涅的正统主义而斗争。能够这样做的只有天赋王权，因为人民的腰包在任何时候都是理应为它敞开的。

美国人向国家交纳微不足道的捐税，因而只有一万人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在战时可以很快地扩充为由坚强的军人组成的两百万大军。美国人甚至很不懂得这样一种乐趣，即把大部分税款用来供养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平时可以用来对我们实行戒严，残酷地镇压我们，伤害我们，向我们开枪，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光荣和荣誉。

但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竟如此顽固，他们根本不想了解我们基督教德意志的制度，甚至认为少纳税比多纳税好。

德国资产者也是这样顽固，他们竟一口咬定，说不可能出足够的钱来维持天赋王权，来供养它的由士兵和官吏构成的大军以及那群领养老金的人，来支付作为奖赏的额外报酬等等。

北美富裕的共和主义者同普鲁士资产者之间的对比关系，正像他们的预算一样，是三千七百万比九千四百万。一个过着自己的生活，一个过着天赋的生活；这也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写于 1849 年 1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1 月 7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89 号

新年贺词

科伦 1 月 8 日。如果牧师和圣诗领唱者、教堂杂役和风琴演奏者、理发师和夜巡逻、田地看守人和掘墓人等等向我们恭贺新禧，那末这是古往今来的习俗，我们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

但是 1849 年的新年不以老习惯为满足。这一年一开始就显得有点不平常，连普鲁士国王也发表了新年贺词。

这一次的新年文告既不是告普鲁士人民，也不是“告我所宠爱的柏林人”¹⁴⁶，而是“告我的军队”。

在这个新年文告中，国王以自己的军队而“自豪”，因为“当（三月）叛乱破坏了我想审慎引导我的百姓建立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时”，军队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以前还说三月事件是“误会”等等，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掩饰了，于是三月“误会”也就变成了“叛乱”。

从国王的新年贺词中，我们嗅到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也从“十字骑士”^①的字里行间散发出来。贺词中说的是“叛乱”，于是报纸也依样画葫芦，写了一些谁也不知道的“三月罪犯”的事件，说什么犯罪的恶棍在三月间破坏了柏林宫廷生活的安宁。

如果我们问，三月“叛乱”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大的愤慨，那末我

① 指“新普鲁士报”，见注 38。——译者注

们会听到这样的答复：“因为它破坏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等等。”

假如你们这些三月叛乱者没有安息在弗里德里希斯海茵¹⁴⁷,那末现在就赏给你们“铅弹和火药”,或者终身苦役。要知道,你们这些邪恶分子破坏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可是,关于普鲁士王国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发展,关于挥霍行为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发展,关于虚伪和普鲁士王国的狡猾诡谲的“和平”传播,关于警察和兵营精神、密探活动、欺诈行为、假仁假义、厚颜无耻的和平发展,以及最后,使所谓的上层阶级过极端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给人民造成的令人厌恶的、使人愚蠢的影响的和平发展,关于所有这一切,是否还需要再提醒一下呢?这样的提醒是不必要的,因为只要环顾一下四周,只要多少注意一下,我们就可以重新看到“被破坏了的发展”的盛况,就能欣赏到上述“自由主义制度”的再版。

国王的祝贺文告接着说道：“我的军队不唯保持其昔时的英名,且又争得近日的光荣。”

可不是吗!它为自己争得了大概只有克罗地亚人才能进一步妄求的光荣。

但是,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自己争得了这种光荣呢?第一,“当德国需要我们出师什列斯维希的时候,军队以新的桂冠装饰了自己的旗帜”。

由维登布鲁赫少校递交的普鲁士给丹麦政府的照会¹⁴⁸,就是使普鲁士的新的光荣能闪闪发光的基础。作战的方式从头到尾都完全符合照会的精神,照会向丹麦王兄保证,普鲁士政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它不过是丢给共和主义者一点钓饵,遮盖一下其他人的耳目,以便赢得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然后就

可以很好地达成协议。

曾经在长时间内迷惑了社会舆论的弗兰格尔先生，像夤夜盗贼那样偷偷离开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他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因此换了一身便服。在汉堡，一切旅馆老板都公开表示不能接待他。他们珍惜自己的房舍、门窗，更甚于珍惜为人民所鄙弃的、以这位值得称颂的先生为代表的普鲁士军队的桂冠。也不应该忘记，进行这次极像旧帝国法庭的诉讼程序那样既没有好处又没有意义的战役（参看当时的“新莱茵报”¹⁴⁹）的唯一成绩就是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这次战役唯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丹麦人的不平凡的勇敢，他们顽强地牵着普鲁士军队的鼻子走，完全切断了普鲁士同世界市场的联系。

使普鲁士在这方面获得绝顶光荣的，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同丹麦的和谈以及和谈的结果——在马尔摩签订的休战协定¹⁵⁰。

如果罗马皇帝闻一闻从厕所税中得来的钱，还能说：《non olet》（“没有臭味”），那末相反地，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得到的桂冠，却镌着不可磨灭的字样：《olet!》（“臭不可闻！”）。

第二，“我的军队在镇压波兹南大公国的叛乱中，战胜了种种困难和危险”。

所谓“战胜了种种困难”，就是说：第一，普鲁士利用了柏林的甜言蜜语给波兰人造成的崇高幻想，波兰人把“波美拉尼亚人”当做反对俄国的德国战友，因此毫无顾虑地解散了自己的军队，而允许波美拉尼亚人开进国内，直到当普鲁士人开始极其残酷地蹂躏手无寸铁的人的时候，他们才重新集中已经分散的战斗力量。而什么是普鲁士人的英雄功绩呢！“光荣的”普鲁士军队的

英雄功绩不是在战争之中，而是在战争之后获得的。当梅洛斯拉夫斯基被介绍给六月的胜利者的时候，卡芬雅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普鲁士人怎么会在米洛斯拉弗城下一败涂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亲自听说此事的人所提供的材料来证实）。三千个好歹用镰刀和长矛武装起来的波兰人，曾两次打垮两万名组织严密和装备良好的普鲁士人，两次迫使他们退却。普鲁士骑兵在狼狈逃窜时，把普鲁士步兵撞得东滚西倒。波兰的起义者将反革命两度赶出城外以后，守住了米洛斯拉弗。但是对普鲁士人来说，比他们在米洛斯拉弗城下的失败更可耻的，就是他们经过以前的败北而终于取得的弗勒申^①城下的胜利。如果一个拿着手枪的胆小鬼遇上一个手无寸铁然而像海格立斯那样力大无穷的敌人，那末这个胆小鬼一定会逃开，而在距离相当远的地方把自己的全部子弹射完。普鲁士人在弗勒申城下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逃到一定的距离以外，然后再用霰弹、装有一百五十粒弹丸的榴弹和榴霰弹来轰击手持镰刀长矛的人，而镰刀和长矛，大家知道，对远处的东西是毫无办法的。到现在为止，只有英国人曾经用榴霰弹来轰击东印度半野蛮的居民。而只有被波兰人的勇敢精神吓得魂不附体并且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的普鲁士纠纠武夫，才会拿榴霰弹来对付那些被称做同胞的人。他们必须设法在一定距离以外大量杀伤波兰人，这是不言而喻的。离波兰人过近是太可怕了。这就是弗勒申城下光荣的胜利！但是，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普鲁士军队的英雄功绩是在战争之后开始建立的，正像狱卒的英雄功绩只是在宣判以后才开始建立一样。

^① 波兰称作：弗热斯尼亚。——编者注

普鲁士军队的**这个**光荣,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关于这一点,有几千波兰人作保证。他们由于普鲁士的背信弃义和黑白色的阴险狡诈而被榴霰弹和尖头子弹等等所杀害,或者后来被打上了硝酸银烙印¹⁵¹。

关于反革命军队的第二个桂冠,被普鲁士英雄烧毁的城市和乡村以及在自己家中被他们用枪托打死和刺刀刺死的波兰居民完全可以作证,普鲁士人的掠夺和种种暴行也可以作证。

永垂不朽的光荣归于波兹南的这些普鲁士勇士!那不勒斯的刽子手¹⁵²很快就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了,这个刽子手枪杀了忠心耿耿的首都民众,在二十四小时内任凭他的丘八们在首都抢劫掠夺。荣誉和光荣归于在波兹南战役中大显身手的普鲁士军队!因为这次进军成了文迪施格雷茨之流所率领的克罗地亚人、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奥尔托汉人及其他匪帮的光辉范例,激起了他们建立这类功绩的热情。布拉格(6月)、维也纳、普勒斯堡^①等地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¹⁵³。

归根到底,甚至普鲁士人对波兰人所表现的**这种**勇气,也只不过是他们害怕俄国人的结果。

“三是吉利的数字”。因此,“我的军队”也应获得三次光荣。而机会也就来了。因为“军队参与建立德国南部之秩序(!),又给普鲁士的名字增加了新的光荣”。

只有居心不良或患着缩小狂的人才是否会否认“我的军队”出色地为联邦议会尽了警察宪兵的责任,使它在重受洗礼以后,变得摩登起来,要求把自己称为中央政权了。同样不容争辩的是,在歼灭南

① 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

德的葡萄酒、肉、苹果酒等方面，普鲁士的名字也无疑获得了光荣。瘦骨嶙峋的勃兰登堡人、波美拉尼亚人等等养肥了他们的爱国的肚子，酒徒过了酒瘾，他们在留驻南德期间，以极其英勇的精神消灭了房东供给他们的一切，以致普鲁士的名字在这里家喻户晓。可惜的是他们还没有偿付膳宿费，不然的话名声一定会更加响亮。

“我的军队”的光荣实在不胜枚举。但是还不能不提一下，“每当我下诏军队，赤胆忠心、纪律严明的军队总是时刻准备为我效劳”。还有一点也可以大加赞扬，传诸后世，这就是：“我的军队以英武的精神和昂扬的士气涂除了一切卑鄙谰言。”

这个贺词对“我的军队”赞不绝口，它称赞军队“纪律严明”和“士气昂扬”，它再一次着重提到军队在大公国^①的英雄功绩，从而令人愉快地回想起军队在美因兹、施魏德尼茨^②、特利尔、爱尔福特、柏林、科伦、杜塞尔多夫、亚琛、科布伦茨、闵斯德、敏登等地所获得的桂冠。而我们这些不属于“我的军队”的人，因此就能使自己的狭隘的忠臣思想开阔起来。原来，枪杀老人和孕妇，盗窃（在奥斯特洛沃附近发生的盗窃已经有案可查），用枪托和军刀残害和平居民，毁坏房屋，用藏在大衣里面的武器在夜间袭击手无寸铁的人们，拦路抢劫（请回想一下诺依维特附近所发生的事情），——原来，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英雄行径在基督教德意志的语言中就叫做“纪律严明”、“昂扬的士气”！士气和纪律万岁！因为在这面旗帜下进行的掠夺的牺牲者是再也不会复活了。

仅仅从我们所提到的普鲁士国王新年贺词中的这几个地方，

① 即波兹南。——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斯维德尼察。——编者注

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无论从它的意义或精神来说,都足以同不伦瑞克公爵 1792 年的宣言¹⁵⁴相媲美。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1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1 月 9 日“新莱茵报”
第 190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匈牙利的斗争¹⁵⁵

科伦 1 月。当意大利去年夏秋两季的反革命进攻遭到第一次反击的时候，在匈牙利平原上，压迫者同直接导源于二月革命的运动的斗争的最后阶段正在结束。新的意大利运动是 1849 年运动的序幕，而对马扎尔人进行的战争则是 1848 年运动的尾声。也许，这个尾声还会演成一幕正在暗中准备着的新悲剧。

这个尾声像 1848 年革命悲剧中迅速交替的最初几场一样，像巴黎和维也纳的陷落一样，具有英雄豪迈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它迥然不同于 6 月至 10 月间发生的那些可怜的或微不足道的事件。1848 年的最后一幕通过恐怖主义正转入 1849 年的第一幕。

在 1793 年以后，在 1848 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 *terreur rouge*（红色恐怖）来对抗 *terreur blanche*（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长时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路德维希·科苏特；对于本民族来说，他体现了丹东和卡诺的形象。

敌人的优势的确大得惊人。整个奥地利，首先是一千六百万狂热的斯拉夫人，反对四百万马扎尔人。

群众性的起义，全国都来制造武器，发行纸币，迅速镇压一切

阻碍革命运动的人，不断革命——总而言之，在被科苏特所武装、组织和鼓舞的匈牙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荣的 1793 年的一切基本特征。维也纳缺少这种所谓在死亡的威吓下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整装待发的革命组织，否则文迪施格雷茨永远也进不了这个城市。我们看看他能否战胜这种革命组织进入匈牙利。

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观察一下正在进行的斗争和斗争中的各个党派。

奥地利君主国是由于企图仿照法国国王（直到路易十一为止）曾经在法国采用过的办法把德国联合为统一的君主国而产生的。由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有一种可怜的地方局限性，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具有一种同这一切相适应的小商贩性质，所以这种企图没有成功。哈布斯堡王朝没有得到整个德国，只是得到了德国南部的一些土地。当时在那里，不是在同分散的斯拉夫各民族直接进行斗争，就是德国封建贵族和德国市民阶级共同统治着被压迫的斯拉夫各民族。在这两种情况下，各省的德国人都需要外来的支援。对他们来说，联合起来反对斯拉夫人就是这种支援，于是，通过把有关各省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合并起来的方法，实现了这种联合。

这样就产生了德意志奥地利。为了判定我们的说法是否正确，只要随便拿一本历史教科书来读读就够了。那里讲到奥地利君主国是怎样产生的，它在反对斯拉夫人的不断斗争中怎样瓦解了又重新兴起。

匈牙利加入了德意志奥地利。马扎尔人在匈牙利进行的斗争同德国人在德意志奥地利进行的斗争一样。楔入奥地利大公国和施梯里亚的斯拉夫野蛮人中间的德国人和以同样方式楔入莱达河

流域的斯拉夫野蛮人中间的马扎尔人联合起来了。像德国贵族在南部和北部，在波希米亚^①、莫拉维亚、克伦地亚和克莱纳统治了斯拉夫民族，同化了他们，从而把他们卷入了欧洲运动一样，马扎尔贵族也在南部和北部，在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喀尔巴阡山附近地区上统治了斯拉夫民族。德国贵族和马扎尔贵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敌人是天然的同盟者。马扎尔人同奥地利的德国人之间的同盟是必要的。只要有一个大事件，只要有一次对他们两者的强有力的进攻，就会使这个同盟成为不可分割的。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庭帝国就是这样的事件。土耳其人威胁匈牙利，其次也威胁维也纳，因此，匈牙利曾在几世纪中同哈布斯堡王朝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

但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逐渐衰弱了。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而斯拉夫人也无力起来反对马扎尔人和德国人了。在斯拉夫土地上掌权的一部分马扎尔贵族和德国贵族被斯拉夫族同化了，于是，各斯拉夫民族自己也愿意保持这个要愈来愈坚决地维护贵族、反对不断发展的德国资产阶级和马扎尔资产阶级的君主国。民族矛盾消失了，哈布斯堡王朝也改变了政策。这个在德国市民阶级支持下登上了德意志皇帝宝座的哈布斯堡王朝，现在却开始比其他任何王朝都更坚决地维护封建贵族，反对资产阶级。

奥地利参加瓜分波兰，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加里西亚的名门豪绅和达官显贵，即波托茨基家族、留博米尔斯基家族、查尔托雷斯基家族，把波兰出卖给奥地利，而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最可靠的支柱，以此换得了哈布斯堡王朝对他们的领地的保护，以免受下

^① 即捷克。——编者注

层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侵犯。

但是，城市资产阶级愈来愈富裕，其影响也愈来愈大，和工业齐头并进的农业的进步也改变了农民对地主的地位。资产阶级和农民反对贵族的运动愈来愈带有威胁性。由于农民到处都是民族局限性和地方局限性的体现者，农民运动必然带有地方性质和民族性质，所以与农民运动一起又产生了民族之间的旧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梅特涅完成了他的杰作。他消除了贵族（除了最有势力的封建贵族以外）对国家事务的任何影响。他把那些最有势力的金融贵族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他必须这样做，财政状况要求他这样做。于是，他依靠上层封建贵族和金融贵族，依靠官僚和军队，在比他的一切竞争者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实现了君主专制的理想。他利用每一个民族的贵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农民的帮助，把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同时他又利用各民族的贵族对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恐惧心理，把各民族的贵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各种不同的阶级利益，民族局限性和各种地方偏见，尽管错综复杂，总是处在适度的抗衡状态中，使老奸巨滑的骗子手梅特涅有可能自由地施展他的伎俩。他唆使各族人民互相倾轧究竟收到了什么效果，加里西亚的大屠杀¹⁵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梅特涅利用染上了宗教狂热病和民族狂热病的卢西族¹⁵⁷农民，把为了农民利益而掀起的波兰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

1848年首先在奥地利造成了极可怕的混乱局面，使所有这些由于梅特涅的罪过直到当时还互相奴役的民族一度获得自由。德国人、马扎尔人、捷克人、波兰人、莫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罗马尼亚人、伊利里亚人、塞尔维亚人互相间都发生

了冲突,同时,在这些民族的每一个民族内部,各个不同阶级之间也进行着斗争。但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很快就有了头绪。斗争者分成了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站在革命方面,其他民族,即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萨克森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划分呢?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种划分符合这些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情况。这是解决所有这些大小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开始。

直到现在为止,奥地利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1848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三个民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

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因此,它们现在是反革命的。

至于**波兰人**,我们介绍读者看一看我们所写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那篇文章¹⁵⁸。为了压制波兰人的革命精神,梅特涅早就求助过卢西人;卢西人所不同于波兰人的,是他们的方言稍有差异,而主要的区别是他们信奉正教;他们自古以来就属于波兰,他们只是从梅特涅那里才知道,波兰人是他们的压迫者。似乎在旧波兰,波兰人本身没有遭受过同卢西人一样的压迫,似乎在奥地利统治下,梅特涅不是他们共同的压迫者!

波兰人和卢西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自己的历史情况和地理位置,他们同奥地利本土是截然分开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其他各民族的混乱情况,我们在叙述中只好把他们撇在一边。

可是,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波兰人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认识和真

正的革命精神，因为他们现在同自己以前的敌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结成同盟来共同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革命。一个斯拉夫民族能把自由看得比斯拉夫的民族特征更珍贵，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它的生命力，从而保证它是有前途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奥地利本土。

奥地利位于苏台德山和喀尔巴阡山的南部，易北河上游谷地和多瑙河中游地区。在中世纪早期，奥地利是一个完全居住着斯拉夫人的国家。按语言和风俗来看，这些斯拉夫人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弗拉基亚和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属于同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同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不同，被称为南方斯拉夫人。除了这些有血缘关系的斯拉夫民族以外，从黑海到波希米亚森林和提罗耳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广大地区中，只是在巴尔干南部居住着为数不多的希腊人，在多瑙河下游地区零星地散居着一些说罗马尼亚语的瓦拉几亚人。

德国人从西面，马扎尔人从东面分别楔入这些密集的斯拉夫人中间。德国人侵占了波希米亚西部地区，沿着多瑙河两岸一直伸展到莱达河东岸地区。奥地利大公国、莫拉维亚部分地区、施梯里亚大部分地区都德意志化了。这样就把捷克人和莫拉维亚人同克伦伦地和克莱纳的居民隔开了。马扎尔人用同样的方法清除了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中部直到德国边境的斯拉夫人，并占领了这个地区。马扎尔人在这里把斯洛伐克人和某些卢西人居住的地区（在北部）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隔离开来，统治了所有这些民族。最后，土耳其人模仿拜占庭人的榜样，征服了在多瑙河和沙瓦河南面的斯拉夫人，从此南方斯拉夫人的历史作用也就永远结束了。

胡斯战争，即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是南方斯拉夫人独立干预历史进程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尝试失败了，从此以后，捷克人便一直受着德意志帝国的束缚。

相反地，打败了斯拉夫人的胜利者——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却在多瑙河地区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如果没有德国人、特别是马扎尔人的帮助，南方斯拉夫人就会像在一部分斯拉夫人中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变成土耳其人，或者至少也会像至今斯拉夫族的波斯尼亚人的情况那样变成伊斯兰教徒。对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值得为此把自己的族别改成德意志民族或马扎尔民族以资酬劳。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土耳其人的入侵，是八世纪阿拉伯人入侵的再版。在维也纳城下和匈牙利平原上，不止一次地重演了查理·马尔泰尔的胜利¹⁵⁹。就像当年在普瓦提埃附近一样，也像后来蒙古人入侵时期在瓦尔施塔特附近¹⁶⁰一样，现在危险又威胁着整个欧洲的发展。当问题涉及拯救欧洲发展的时候，像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样几个早就分崩离析和衰弱了的民族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问题还在于拯救它们自己。

内部情况是和外部情况相适应的。作为动力的阶级，运动的代表者，即资产阶级，到处都是德国的或马扎尔的资产阶级。斯拉夫人好容易才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对南方斯拉夫人来说，这种现象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由于有了资产阶级，德国人或马扎尔人便掌握了工业，掌握了资本，德国的文化也发展起来了；在精神方面，斯拉夫人也受德国人的支配，连克罗地亚的斯拉夫人也是如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匈牙利，不过时间较迟，因而程度

也较弱罢了。在这里，马扎尔人同德国人一起领导了精神和贸易的发展。但是，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语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道地的马扎尔人了。只有新迁去的农民移民、犹太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例外，他们坚持在异国保留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

如果说马扎尔人曾在文明方面稍微落后于奥地利的德国人，那末最近他们已经用政治活动出色地弥补了自己的缺陷。在1830年至1848年这个时期中，只有匈牙利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比整个德国更活跃，并且，匈牙利旧宪法的封建形式也比德国南部宪法的现代形式更能用来为民主利益服务。谁在这里领导了这个运动呢？马扎尔人。谁支持奥地利的反动派呢？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

为了反对马扎尔人的这个运动，同时也为了反对在德国重新兴起的政治运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建立了自己的宗得崩德——**泛斯拉夫主义**。

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产生在俄国或波兰，而是产生在布拉格和阿格拉姆¹⁶¹。泛斯拉夫主义，这是奥地利的，其次是土耳其的一切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为了反对奥地利的德国人、马扎尔人，可能也是为了反对土耳其人而结成的同盟。土耳其人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被考虑进去，而作为一个也是处于完全衰落状态的民族，完全可以不考虑他们。泛斯拉夫主义按其基本倾向来说，是要反对奥地利的革命分子，因此，它显然是反动的。

泛斯拉夫主义很快就以双重的叛卖行为暴露了这种反动倾向：它使至今仍站在革命方面的唯一的斯拉夫民族——**波兰人**成了它的可怜的民族局限性的牺牲品；它把自己和波兰出卖给俄国

沙皇。

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德语、意大利语、马扎尔语、瓦拉几亚语、土耳其语、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以外,还要包括将近一打斯拉夫语和主要方言。这一切不是用直到现在把奥地利联合在一起并促进了它的发展的那些因素联合起来的,而是用斯拉夫民族特征的抽象性质和所谓的斯拉夫语(当然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共同语)联合起来的。但是,要不是在某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哪里会存在这种斯拉夫的民族特征呢?要不是在帕拉茨基先生、盖伊先生及其同僚的幻想中以及部分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斯拉夫人能够了解的俄国教堂的古斯拉夫祈祷仪式中,哪里会存在什么“斯拉夫语”呢?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都处在文明发展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从波希米亚的相当发达的(多亏德国人)现代工业和文化,直到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几乎是游牧性质的野蛮状态;所以,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的利益是极为对立的。事实上,这十个至十二个民族的斯拉夫语,是由同样数目的方言组成的,这些方言大部分互不相通,甚至可以归为不同的几大类(捷克语、伊利里亚语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语)。由于这些民族十分轻视文学,而且其中大多数不开化,这些方言已变成了真正的民间土话,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这些方言都以某种**异族的**,即非斯拉夫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标准语。所以,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

哪些民族应该领导这个庞大的斯拉夫国家呢?恰好是那些一千年来分散得七零八落的民族(其他的非斯拉夫民族往这些民族中间**灌输**了具有生命力和发展能力的因素);恰好是那些只是由于

各非斯拉夫民族的胜利武器才从土耳其暴政的蹂躏下被拯救出来的民族；恰好是那些到处被隔离的、丧失了自己的民族力量的、只有几千人或最多不过两百万人的弱小民族；这些民族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以致像保加利亚人这样一个在中世纪时最强悍的民族，现在在土耳其却只以温和敦厚和心地善良著称，并以被称为 *dobre chriztian*（善良的基督徒）为荣！在包括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这些民族中间，能够找到一个民族具有为人民所保持的、并被认为超乎琐碎的地方纠纷之上的民族历史传统吗？

八世纪和九世纪曾经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时代，当时南方斯拉夫人还统治着整个匈牙利和奥地利，并且威胁着拜占庭。如果那时他们都未能抵挡住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入侵，如果甚至在他们的两个敌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彼此进行着激烈斗争的时候，他们都未能获得独立，并建立起巩固的国家，那末现在，在经受了一千年的压迫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以后，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某个角落找到一个或几个残存的民族，即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残余。这些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这些**残存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被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

在苏格兰，盖尔人就是这样，他们是 1640 年至 1745 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柱。

在法国，布列塔尼人就是这样，他们是 1792 年至 1800 年波旁

王朝的支柱。

在西班牙，巴斯克人就是这样，他们是唐·卡洛斯的支柱。

在奥地利，泛斯拉夫主义的南方斯拉夫人就是这样；这只是残存的民族，只是一千年来极度混乱的发展的产物。这些同样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中的残存民族把整个欧洲运动的倒退视为唯一的救星，它们想使这个运动不是从西向东，而是从东向西地进行，在它们看来，俄国的鞭子是解放的工具和统一的纽带，——这一切都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可见，南方斯拉夫人早在 1848 年以前就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性质；1848 年向全世界揭露了他们的这种反动性质。

当二月风暴爆发的时候，是谁进行了奥地利革命呢？是维也纳还是布拉格？是布达佩斯还是阿格拉姆？是德国人和马扎尔人还是斯拉夫人？

的确不能否认，在有教养的南方斯拉夫人中存在过一个不大的民主党派，它虽然不放弃自己的民族特征，但愿意把这种特征献给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幻想也曾西欧的民主主义者当中博得了同情，并且当斯拉夫的民主主义者还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时，这种同情是完全正当的。这种幻想由于轰击布拉格而破灭了。在这个事件以后，所有的南方斯拉夫民族都效法克罗地亚人把自己交给奥地利反动派支配。那些还继续胡说什么民族平等、民主的奥地利等等的南方斯拉夫运动的领导者们，不是变成了像许多报纸的无耻文人一样的愚蠢的空想家，就是变成了像耶拉契奇一样的恶棍。他们的民主誓言并不比奥地利官方反革命势力的民主誓言更有价值。简言之，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特征的恢复实际上是从最残酷地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开始的；这是南方斯拉夫运

动的领导者们对俄国沙皇的第一次有力的效劳。

如果不算上层贵族、官僚和军阀，奥地利的权奸就只能从斯拉夫夫人那里得到支持。斯拉夫人在意大利的陷落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斯拉夫人袭击过维也纳，现在斯拉夫人又从四面八方进攻马扎尔人。他们的思想家是以帕拉茨基为首的捷克人，他们的军事首领是以耶拉契奇为首的克罗地亚人。

这就是他们对德国民主刊物的报答。6月间，当文迪施格雷茨屠杀捷克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德国民主刊物到处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而这同一个文迪施格雷茨现在却成了他们的英雄。

总括起来说：

在奥地利（波兰和意大利除外），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1848年，像近千年来一样，掌握了历史主动权。他们是**革命**的代表者。

一千年来一直被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牵着走的南方斯拉夫人在1848年所以要起来为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是为了与此同时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是**反革命**的代表者。此外还应该加上两个民族，也是早已走向衰落和丧失了任何历史活动能力的民族：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和罗马尼亚人。

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是在反对南方斯拉夫人的斗争中通过联合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现在这个王朝却想在反对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斗争中联合南方斯拉夫人来苟延残喘。

政治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谈谈军事方面。

纯粹是马扎尔人居住的地区，还不到整个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三分之一。从普勒斯堡^①到多瑙河和蒂萨河北面，直至喀尔

^① 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

巴阡山脉，居住着几百万斯洛伐克人和为数不多的卢西人。在南面，在沙瓦河、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之间，居住着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再往东去，沿着多瑙河，是有五十多万人口的塞尔维亚移民区。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和萨克森人把这两个斯拉夫地区联合起来了。

这样一来，马扎尔人便受着天然敌人的三面包围。如果占据着山口的斯洛伐克人表现得不是那么冷淡，那末他们在他们的地区特别适于游击战争的情况下会成为非常危险的敌人。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马扎尔人在北面只需要顶住加里西亚和莫拉维亚方面的军队的进攻。相反地，在东面，大批的罗马尼亚人和萨克森人动员起来了，并同驻扎在当地的奥地利军队汇合起来了。他们的阵地非常巩固，一方面因为这是山地，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占领着大部分城市和要塞。

最后，在南面，被德国移民、瓦拉几亚人以及奥地利的一个军所支持的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有宽广的阿利布纳尔沼泽作掩护，要进攻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克罗地亚人有德拉瓦河和多瑙河作掩护，同时又有一支拥有全部后备物资的强大的奥地利军队的支援，所以，他们早在 10 月以前就已经推进到匈牙利本土，并且现在他们坚守着他们在德拉瓦河下游的防御战线，并不费很大力气。

最后，现在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正以密集的纵队从第四方面，即从奥地利方面向前推进。马扎尔人被敌人的数倍于己的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了。

现在的斗争很像 1793 年反对法国的斗争，不同的是，人口稀少的、仅仅处于半文明状态的马扎尔人的国家，在物资供应方面远

不如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

匈牙利制造的武器和弹药质量必然很差；特别是制造大炮的工作总是无法迅速安排妥当。这个国家比法国小得多，因此，每让出一寸土地都意味着更大得多的损失。马扎尔人所剩下的只是他们的革命热忱、他们的勇敢精神以及科苏特给予他们的强有力的、动作迅速的组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已经取得了胜利。

“如果我们不能在莱达河上击溃奥皇军队，那我们就在拉布尼茨河^①上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拉布尼茨河上击溃他们，那就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那就在蒂萨河上击溃他们。总之，无论如何我们要击溃他们。”¹⁶²

科苏特是这样说的，并且他正尽一切可能去履行自己的诺言。

即使布达佩斯陷落了，马扎尔人也还有广大的下匈牙利草原。这个地方好像是故意为进行骑兵游击战争而创造的。在这里的沼泽地中，有许多几乎无法接近的地方，马扎尔人能够在这里坚守下去。马扎尔人几乎人人都是优秀的骑手，他们具有进行这种游击战争的一切特质。奥皇军队如果敢于进入这个荒凉地区，他们就必须从加里西亚或奥地利取得全部粮食补给，因为在这里他们确什么东西也找不到。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说他们能在这里坚持下去。以密集队形前进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而分散为流动队，就必然遭到复灭。它的笨重装备必然使它逃不出敏捷的马扎尔人骑兵队的手掌，而且，即使奥皇军队能够取胜，他们也根本无法追击马扎尔人的骑兵队；而被击溃的奥皇军队的每一个士兵所遇到的每一

^① 匈牙利称作：列普策河。——编者注

不如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

匈牙利制造的武器和弹药质量必然很差；特别是制造大炮的工作总是无法迅速安排妥当。这个国家比法国小得多，因此，每让出一寸土地都意味着更大得多的损失。马扎尔人所剩下的只是他们的革命热忱、他们的勇敢精神以及科苏特给予他们的强有力的、动作迅速的组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已经取得了胜利。

“如果我们不能在莱达河上击溃奥皇军队，那我们就在拉布尼茨河^①上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拉布尼茨河上击溃他们，那就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那就在蒂萨河上击溃他们。总之，无论如何我们要击溃他们。”¹⁶²

科苏特是这样说的，并且他正尽一切可能去履行自己的诺言。

即使布达佩斯陷落了，马扎尔人也还有广大的下匈牙利草原。这个地方好像是故意为进行骑兵游击战争而创造的。在这里的沼泽地中，有许多几乎无法接近的地方，马扎尔人能够在这里坚守下去。马扎尔人几乎人人都是优秀的骑手，他们具有进行这种游击战争的一切特质。奥皇军队如果敢于进入这个荒凉地区，他们就必须从加里西亚或奥地利取得全部粮食补给，因为在这里他们确什么东西也找不到。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说他们能在这里坚持下去。以密集队形前进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而分散为流动队，就必然遭到复灭。它的笨重装备必然使它逃不出敏捷的马扎尔人骑兵队的手掌，而且，即使奥皇军队能够取胜，他们也根本无法追击马扎尔人的骑兵队；而被击溃的奥皇军队的每一个士兵所遇到的每一

^① 匈牙利称作：列普策河。——编者注

瑞士报刊

伯尔尼 1 月 11 日。瑞士的政治报刊一年比一年更积极。现在，除了二十来种文学性的杂志以外，瑞士二十二州还有九十八种政治性报纸。这些报纸不像德国的甚至也不像法国的那种大型的报纸。除了瓦得州出版的某些报纸以外，其他报纸的篇幅通常都是对开或者四开的；其中只有十多种报纸每日出版，一小部分是每周五次，大部分是每周三次，有的甚至是每周一次。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这些报纸在内容和文字上都给人留下一种贫乏得可怜的印象。的确，在这里各州的故步自封的条件下，在只有这里才会发生的烦琐论战的条件下，难道卓越的记者天才能够得到发挥吗？难道真正有天才的记者能够在这种贫乏的环境中工作，能够满足于这种每周出三次的四开小报的圈子吗？

瑞士报刊最大的特点就是粗暴无礼。这里的报纸相互之间进行诋毁谩骂，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攻击。如果那位把 Code pénal (刑法典) 第三七〇条¹⁶⁴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莱茵检察官来到这个国家，那他连三天也呆不下去。

但是一切仅限于此而已。如果把这种无礼行为，这种没有任何俏皮味道的无礼行为去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或者说只剩下最卑贱的奴性，即奴颜婢膝地对待由太古时候阿尔卑斯山的牧人、孤陋寡闻的农夫和讨厌的市侩组成的，既不多又分散而且还极度

高傲的民族所具有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故步自封的奴性。很明显，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破坏论战的自由，因为每一个派别，甚至是最进步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在瑞士这种故步自封的条件下，各党派本身的特点就是故步自封，报纸也像各党派一样故步自封。因此，这里到处都表现出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因此，没有任何一家报刊代表那种先进的，但是甚至在德国也早已是尽人皆知的派别；因此，连最激进的报纸也不敢稍稍离开自己党派所规定的仅仅在最近的将来要实现的那种故步自封的纲领，不敢批评瑞士民族故步自封方面最故步自封的东西。凡是亵渎民族圣物的人，都会受到宗法式的私刑制裁。不然，正直的瑞士人要拳头干什么用呢？

瑞士报刊的平均水平就是如此。瑞士罗曼语区和伯尔尼的最好的报纸高于这个水平；瑞士东部的大部分报纸则低于这个水平。

我们现在就从瑞士首都的报刊谈起。伯尔尼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瑞士的报刊。在这个城市中，已经集中了伯尔尼州的全部报刊，这些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取得首都报纸所特有的影响。

反动党派的，或者照这里的说法，贵族党派的主要机关报，是“瑞士观察家”，“伯尔尼报”很恰当地把它称为替外国服务的瑞士军官的机关报。这家可敬的报纸（每周出版三次）赞扬瑞士克罗地亚人在意大利的英雄功绩，辱骂激进派，拥护雇佣兵条约¹⁶⁵，谄媚贵族，歌颂拉德茨基和文迪施格雷茨，为杀害罗伯特·勃鲁姆辩护，诽谤一切国家的革命，向政府告密出卖流亡者。这家高贵的报纸实际上不用编辑也行，因为它只是汇集了名门世家纨绔子弟以及在市政委员会中钻营肥差美缺的人的各种消息和小品。能同这

家报纸并驾齐驱的，要算“伯尔尼新闻”了。这家报纸前面几版完全是广告，后面几版完全是歌颂贵族土地所有者的假仁假义、营私舞弊的文章。“蜜蜂”的作用，应该相当于这派人的“喧声报”¹⁶⁶。但是由于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贵族先生们哭的时候总比笑的时候多，所以这个“蜜蜂”的幽默就显得非常乏味和可怜。

温和派或自由派的机关报，即奥克辛本派的机关报，首先要算“伯尔尼宪法之友”。这家报纸被公认为是奥克辛本的半官方机关报。它是由从前的一位教授卡尔·海尔佐克博士编辑的。这家报纸的编辑多少有点经验，但根本谈不上有才华。它只限于替政府和联邦委员会的行动辩护，因为这些行动都出自奥克辛本派。在有关东部各州，特别是有关诸旧州[Urkanton]的问题上，它自然会表现出惊人的自由思想，而对于外交政策问题，它不时发出令人难以想像的叫嚣，企图用威严的词句来偷运最无原则的中立政策。不太知名的“联邦报”所持的方针，接近于及蒙特人巴希用蹩脚的注文出版的法文报“瑞士”所持的方针。这家报纸同政府的联系不像“宪法之友”那样密切，但是同样热衷于歌颂执政的自由派多数，并且还心劳日拙地攻击瑞士法语区的革命报刊“窝州新闻”。该报的编辑直接参加了意大利问题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该报表现得比较规矩。——上述三家报纸都是每日出版。

激进派所掌握的报纸最多。激进派的主要机关报是“伯尔尼报”，它的编辑是大会议副议长、联邦院议员尼格勒尔律师。这家报纸是该州德语区最坚决的激进派的机关报，这一派在州委员会[Regierungsrat]中的代表是财政部长施坦普弗利。该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在尚须清除大堆垃圾的该州的立法和行政方面实现民主；在瑞士全境实现最大限度的集中；一有可能就放弃中立

政策。

“伯尔尼报”的撰稿人都是伯尔尼激进派中最知名的人物。因此毫不奇怪，该报不仅是本州最好的报纸，而且也是整个瑞士德语区最好的报纸。如果编辑和撰稿人能完全自由地写作，该报会办得更为出色，它会公开主张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海尔维第共和国，并且还会带上鲜明的革命色彩。但是现在不可能这样做，这个派别暂时也不允许这样做。除了“伯尔尼报”以外，从1月1日起又出版了一种日报——“联邦海尔维第”，这家报纸是以前在普伦特卢特^①（汝拉山脉）出版的“海尔维第”的继续，“海尔维第”是汝拉激进派及其领导者、州委员会委员施托克马尔上校的机关报。老“海尔维第”无疑是一家红色报纸；而新报将更坚决地坚持这个方针。

“瑞士报”（前“自由瑞士人”）也是站在激进主义立场上的，但是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此它只要求实现一些有利于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经济改革。但是总的说来，这家报纸也已经越过了通常的瑞士各州的故步自封（如中立、各州主权等等）的界限。除了上述三种日报以外，伯尔尼的激进派还办了一家在瑞士是唯一的，很不错的幽默报纸，即耶尼主办的“全景”。“全景”（每周出版一次）只是报道瑞士的，特别是伯尔尼州的生活。正因为这样，这家报纸才能在国内成为一种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诺伊豪斯政府的垮台。现在，它又在努力使奥克辛本派执政的时间不致太久。由于耶尼用无情的讽刺来破坏直到奥克辛本为止的一切执政者的威信，所以他在诺伊豪斯政府时期受

^① 法国称作：波尔兰特留伊。——编者注

到无数次审判和诬告，在诺伊豪斯政府垮台以后还收到许多恐吓信，受到许多迫害。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直到如今，伯尔尼的要人们都还心惊胆颤地等待这家每星期六出版的新报纸。勃鲁姆被枪杀后，该报照例登出了一幅讽刺画，画着一个断头台和一把斧头，四周围着许多残破的王冠，下面的题词是：“唯一的救星”。为了回答庄重的伯尔尼资产者对这幅讽刺画的愤慨，该报在下一号又登了一幅讽刺画，画的是一个路灯杆上挂着一顶王冠，下面的题词是：“Sua-viter in modo, fortiter in re（柔和其表，刚强其实）——纪念梅森豪泽”。

国民院和大会议员约·奥·魏茵加特主办的“湖乡通报”，在新年前是社会主义派的唯一代表。“湖乡通报”鼓吹一种多愁善感、慈悲为怀的社会主义和红色革命的奇异的混合体。它对伯尔尼州宣传社会主义，而在谈到外国时才提红色革命。就这家周报的文章而论，它是全州最糟的报纸。其实，魏茵加特先生虽然流露出一种基督教的慈悲心肠，但是他在政治上却是最坚决的激进主义的拥护者。从新年开始，“湖乡通报”遇到了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另一家周报“独立主义者”。这家周报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在伯尔尼州和瑞士全国寻找一种基础，来宣传社会主义原理和提出至少能消除最令人愤慨的混乱现象的措施。但是，无论如何，“独立主义者”总是全瑞士唯一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来在本国宣传自己思想的报纸。如果它成功的可能性同它在高级和最高级权力机关中已经引起的狂怒成正比，那末这家报纸的前途就大有可观了。

伯尔尼以外的报纸，我只想提一家：“进化报”¹⁶⁷，志愿军领导者贝克尔现在把它更名为“革命报”。这家在瑞士出版的所有报纸

中最坚决的报纸号召大家一定要实现新的欧洲革命,它竭力在周围寻找支持者。极其珍视自己的太平处境的资产者,为了对此表示感谢,非常仇视这家报纸。除了在瑞士、伯桑松和亚尔萨斯的德国流亡者以外,这家报纸没有多少读者。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更详细地谈谈伯尔尼州以外各地出版的报纸¹⁶⁸。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1 月 11 日

载于 1849 年 1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19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孟德斯鸠第五十六

一

科伦 1 月 20 日。“可敬的”约瑟夫·杜蒙让一个不但不取报酬反而付出酬金的匿名作者在来件照登栏中开导初选人，这个匿名作者还对“新莱茵报”作了如下的一番训诫：

“民主派机关报‘新莱茵报’老是注意本报以‘致初选人’为题发表的短评，说什么这些短评是从‘新普鲁士报’上转载的。

为了回答这个谣言，我们特此声明：这些短评都按广告收费，除第一篇转载自‘议会通讯’以外，其余各篇都是在科伦写的，直到现在为止，短评的作者不但没有读过‘新普鲁士报’，而且没有见过它。”

我们了解，对孟德斯鸠第五十六来说，确保自己的所有权是多么重要。我们也了解，对杜蒙先生来说，声明他甚至为了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印发传单和广告也要“收费”一事，是多么重要。

至于匿名作者，他会知道法国的一句成语：《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英雄所见略同”）。如果说他靠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东西竟和“新普鲁士报”、“普鲁士同盟”¹⁶⁹的论断一模一样，那也怨不得他。

我们从未读过他发表在“科伦日报”上的广告，我们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过杜蒙印刷所印刷的，从四面八方我们飞来的传单。

但是现在把两者比较一下，我们发现这种废纸原来既是广告又是传单。

为了向匿名的孟德斯鸠第五十六赎罪，我们忍受极大痛苦读完了他在“科伦日报”上发表的全部广告，并把他的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作为“公共财产”提交普鲁士公众审议。

真聪明啊！

孟德斯鸠第五十六所研究的主要是**社会问题**。他找到了一条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方便、最简单的道路”，并用最肉麻、最无耻的骗人的热情来推销他的莫里逊药丸^①。

“解决这个问题（即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方便、最简单的道路，就是接受去年12月5日的钦定宪法，加以修改，然后让所有的人向宪法宣誓，从而使宪法生效。这对我们说来是唯一的生路……因此，谁要是衷心同情自己苦难弟兄的遭遇，谁要是想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吃饱穿暖，——简言之，谁要是想解决社会问题，那就不要选举那些反对宪法的人。”（孟德斯鸠第五十六）

请投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拉登堡的票吧，这样，**社会问题**就能通过“最方便、最简单的道路”得到解决。请投杜蒙、康普豪森、维特根施坦，甚至康佩斯、梅维森之类 *dii minorum gentium*^②的票吧，这样，**社会问题**就能解决！一票一个“社会问题”！谁“想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吃饱穿暖”，那就请投汉泽曼和施图普的票吧！每投一票，社会问题就减少一个！接受钦定宪法——*voilà la 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这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毫无疑问，不仅孟德斯鸠第五十六，而且他在“市民联合会”¹⁷⁰中的庇护者，都不会等到接受和修改¹⁷¹钦定宪法，向宪法宣誓并加

① 一种号称能治百病的药丸。——译者注

② 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货”。——编者注

以批准之后，再来“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吃饱穿暖”。为此已经采取了措施。

几星期以来，这里流传着各种告示，在这些告示中资本家通知手工业师傅、小店主等说，鉴于目前的局势以及信贷增长的情况，从博爱的观点出发，贷款利息将由四厘提高到五厘。——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个办法！

此地的市政委员会本着同样的精神，为那些将要饿死或者不得已向城市出卖劳力的不幸的人制定了“工人手册”（参看“新莱茵报”第187号^①）。读者大概还记得，在这个钦赐给工人的宪章中说，失去工作的工人按合同应受**警察局**监视。——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二个办法！

三月事件以后不久，科伦市政委员会马上就开办了一个物美价廉、设备齐全、房间既漂亮又暖和的餐厅。钦定宪法颁布以后，拨出了另外一个由慈善机关管理的的地方来代替这个餐厅，这里不生火炉，餐具不全，而且不许立刻进餐，一夸特淡而无味的清汤要卖八分尼。——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三个办法！

当维也纳工人还控制着城市的时候，他们保护了逃亡资产者的银行、房屋和财产。但是这些资产者回来以后，却向文迪施格雷茨告发这些“强盗”，要求把他们**绞死**。失业工人请求市政委员会帮助，结果都被送到同匈牙利作战的军队里了。——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四个办法！

布勒斯劳^②市政委员会和政府眼看着那些失去生理上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在济贫院中寻求庇护的不幸的人死于霍乱而无助于

^① 见本卷第176—180页。——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衷，只是当瘟疫威胁着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他们的残酷的慈善事业的牺牲者。——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五个办法！

在柏林的“天佑吾王，天佑吾国”协会中，有一个钦定宪法的朋友曾经表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实现自己的计划还不得不讨好“无产阶级”，实在是一件难堪的事情。

这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的谜底！

我们的朋友海涅说：“普鲁士暗探之所以这样危险，是因为他们什么时候也拿不到钱，——他们始终只是希望得到钱。”而普鲁士资产者之所以这样危险，是因为他们什么时候也不给钱，而始终只是答应给钱。

英国和法国的资产者在选举中常常花很多钱。他们贿选的手段是举世皆知的。而普鲁士的资产者——“噢，他们真是再聪明不过了！”他们德行高尚、举止庄重，因此不会乱花钱，他们付出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这样不必破费分文！但是，正如杜蒙正式证明的那样，孟德斯鸠第五十六至少向“科伦日报”付出了广告费，并且还奉送了——已经是 gratis (免费) 奉送——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可见，归根到底我们这位孟德斯鸠的 *petites oeuvres* (小小作品) 的实际部分就是：请投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拉登堡的票！请选举康普豪森—汉泽曼！请把我们送到柏林去，让我们的人在那里先站稳脚跟！这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流芳百世的**汉泽曼**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恢复信贷，他先恢复了秩序。然后，正像 1844 年当“我敬爱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需要帮助而且应当给以帮助”的时候一样，就用火药和铅弹来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请投钦定宪法的朋友的票！

但是，孟德斯鸠第五十六接受钦定宪法，只是为了以后能够修改它和向它宣誓。

最亲爱的孟德斯鸠啊！你既然接受了宪法，那就只能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就是说，你只能按照国王和第二议院的愿望修改它，而第二议院是由容克地主、金融贵族、高级官员及僧侣组成的。这种唯一可能的修改，已经由钦定宪法本身预先规定好了。这种修改就是拒绝实行宪制，恢复旧式的基督教德意志的等级制度！

这就是在接受钦定宪法以后唯一可能和唯一被允许的修改，这种修改是高瞻远瞩的孟德斯鸠不能不同意的。

可见，归根到底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的 *petites oeuvres* (小小作品) 的实际部分就是：请投汉泽曼—康普豪森的票！请投杜蒙—施图普的票！请投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的票！请接受钦定宪法！请选举接受钦定宪法的复选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借口的。

其实，既然是钦定宪法，那又何必要借口。

但是，我们这位孟德斯鸠在实际指导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即谈到他的巨著的基本内容之前，自然也有一个理论部分作为开场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理论部分。

这位深思远虑的哲学家首先向我们说明，什么是“社会问题”。

“那末，实在说来，什么是社会问题呢？”

人们应该而且希望生存。

要生存，就要有住所、衣服和食物。

大自然根本不生产住所和衣服，而野生的食物也非常少，远不够用。

因此，人们自己就要设法满足这些需求。

这些都要靠劳动获得。

因此，劳动是我们生存的第一个条件——没有劳动我们就不能生存。

原始人每个人都自己盖自己的小屋，用兽皮为自己缝制衣服，为自己采集果实以供食用。原始时代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人们除住所、衣服、食物以外没有其他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仅仅满足自己**生理**的需求，那他们就同禽兽处在同一个阶段了。因为禽兽所做的也是这些。

但是，人是高于禽兽的生物，所以他要生存就需要更多的东西，他需要欢乐，需要提高到能享受精神财富的水平。而这些只有生活在社会中才能得到。

人们一生活在社会中，他们的生活条件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很快就发现，如果一个人只做一种固定的工作，工作起来就会容易得多。于是，一些人专门做衣服，另一些人专门造房子，还有一些人专门搞食物，一些人供给另一些人所没有的东西。这样一来，各种行业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人成了猎人，另一些人成了手工业者，还有一些人则成了农民。但是人们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人类还必须前进。人们开始创造发明。发明了纺纱和织布，学会了打铁和制革。发明得愈多，手工业的种类就愈多，由手工业供应犁、铧的农业就愈来愈容易耕作。一些劳动部门帮助另一些劳动部门，所有劳动部门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后来，又开始同毗邻的民族交往。一个民族有另一民族所需要的东西，而另一民族又有这一民族所没有的东西。交换开始了。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因而也出现了人类活动的新部门。于是文化也一步一步地提高了。从最初的简单的发明起，经过许多世纪，终于达到了我们今天的发明水平。

这样，在人们中间就产生了科学艺术，生活也愈来愈丰富多彩。医生治病，教士传教，商人经商，农民种地，花匠栽培花草，泥水匠建造房屋，木匠制造家具，磨坊主磨面，面包师则用面粉烘烤面包。一种行业同另一种行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谁也不能离群索居，谁也不能单靠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社会关系就是如此。

这种关系完全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如果你们今天闹革命，把这些关系

彻底破坏，到明天你们又重新开始生活，那末也会重新建立起和现存关系一模一样的关系。几千年来地球上一切民族的情况都是这样。如果现在有谁想把工人同资产阶级区别开，那就是弥天大谎。我们大家都在工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尽自己的力量、尽自己的才能工作。医生看病是工作，音乐师为舞蹈者伴奏是工作，商人写单据也是工作。大家都在工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岗位。”

多聪明啊！有耳朵的人都听着！

那末，实在说来，到底什么是生理问题呢？

每一个生物体都有一定的重量、密度等等。每一个有机体都由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特殊的作用，而相互作用的各个器官则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生理关系。”

不能否认，孟德斯鸠第五十六具有出奇的简化科学的才能。奖给孟德斯鸠第五十六一份专利证书（没有政府担保的）吧！

劳动的产品只能由劳动来生产。不播种就没有收获，不纺线就得不到棉纱，余此类推。

整个欧洲都将怀着赞叹的心情向这位伟大的天才致敬。他在这里，在科伦，没有“新普鲁士报”的任何帮助而独自发现了这些真理。

在劳动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进行或简或繁的分工。一些人烤面包，另一些人打铁，一些人煽动 [wühlen]，另一些人抱怨 [heulen]¹⁷²，孟德斯鸠第五十六写文章，杜蒙则从事刊印。亚当·斯密啊，这才是你应该请教的人呢！

劳动和分工是一切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的这些发现使他得出结论：“等级的划分”是同自然相适应的；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区别是“弥天大谎”；就算“革命”

今天把现存“社会关系”彻底破坏，那“也会重新建立起和现存关系一模一样的关系”；最后，谁要是衷心“同情自己苦难弟兄的遭遇”，谁要是想得到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的尊重，那他就绝对必须选举符合曼托伊费尔和钦定宪法精神的复选人。

“几千年来地球上一切民族的情况都是这样”!!! 在埃及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等级**；在希腊和罗马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自由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封建主和农奴、行会、等级**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劳动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占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另一个阶级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而出卖劳动也只有当购买劳动能使雇主阶级发财时才有可能。

既然如此，那末“几千年来地球上一切民族的情况”都和现在在**普鲁士**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这难道不非常清楚吗？因为**劳动和分工**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呀！或者实际上正好相反：社会关系，所有制关系，总是由于劳动方式和分工的经常改变而被推翻的？

在1789年，资产者并没有向封建社会呼吁说：贵族呀，你们还做贵族吧；农奴呀，你们还做农奴吧；师傅呀，你们还做师傅吧；因为没有劳动和分工，就没有社会！不呼吸空气，就没有生命！因此，就呼吸污浊的空气吧，不要把窗子打开，——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的论调就是这样。

只有像在愚昧鄙陋的环境中生活了一辈子的德意志帝国的庸人那样无耻的人，才会在刚刚往自己的笨脑袋里塞进（而且是浮皮了草和加以歪曲地塞进）一点诸如劳动和分工之类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码知识，就对那些使本世纪的人们绞尽脑汁的问题发表神

谕般的议论。

“没有劳动和分工，就没有社会！

因此

请选举普鲁士钦定宪法的朋友做复选人，而且仅仅选举钦定宪法的朋友。”

怀着感激心情的后代，总有一天会出于责任感，为解决了社会问题的孟德斯鸠第五十六（不要和冯·罗伊斯-什雷茨-格累茨-罗宾斯坦-艾贝斯瓦尔得·亨利希二百八十四世^①混淆起来！）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坟墓，并把这个墓志铭刻在墓碑上。

孟德斯鸠第五十六并不向我们隐瞒“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一旦他被宣布为立法者后，他想做些什么。

他教训我们说：“国家应该设法使每个人都能受到足够的教育而有可能学会一种有用的东西。”

孟德斯鸠第五十六从来没有听说过，在现存条件下，由于分工的关系，简单劳动正在代替复杂劳动，童工正在代替成年工，女工正在代替男工，自动机器正在代替独立的工人；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工人的教育逐渐成为多余的和不可能的了。我们且不把科伦的孟德斯鸠送到圣西门或傅立叶那里去，而把他送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去。让我们这位笨伯在改善现代关系以前，在发表神谕般的议论以前，先去研究一下这些关系的最基本的原理吧。

“对于因疾病或衰老而陷于贫困的人，应该由市镇予以照顾。”

孟德斯鸠，如果市镇本身陷于贫困，那怎么办呢？要知道，由于同宪法一起经钦定的一亿税额以及像瘟疫一样流行的戒严状

^① 暗指罗伊斯-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亨利希七十二世。——编者注

态，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如果新的发明和商业危机摧毁了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国家应该帮助和关怀受害者。”

不管科伦的孟德斯鸠对当世的情况了解得多么差，他总不能不注意到，“新的发明”和商业危机就像普鲁士内阁的法令和法制基础一样是经常不断的。在德国，只有在同其他民族的竞争使采用新发明成为生死问题的时候，才会采用新发明。难道应当把新产生的工业部门搞垮来帮助将要灭亡的部门吗？因发明而产生的新工业部门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比将要灭亡的部门生产的商品更便宜。鬼晓得要它们去支持将要灭亡的部门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国家或政府，那谁都知道，它们只是看来在给钱。要它们给钱就得先给它们钱。请问孟德斯鸠第五十六，谁应当给它们钱呢？是将要灭亡的工业部门，难道还嫌它们灭亡得不够快吗？是新产生的工业部门，难道要它们先天不足吗？或者是那些同新发明无关的工业部门，难道要它们由于发明了新的捐税而破产吗？孟德斯鸠第五十六，请你把这些好好想一想吧！

那末商业危机呢，最亲爱的孟德斯鸠？当欧洲爆发商业危机的时候，普鲁士国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设法用强行征税或类似的措施，从通常的税源中榨取最后一文钱。可怜的普鲁士国家啊！要使普鲁士国家幸免商业危机的祸害，那它除了国内劳动以外，还需要到九霄云外去寻找第三种收入的来源。当然，如果用国王的新年贺词、弗兰格尔的军令或者曼托伊费尔的政令就能把泥土铸成金钱，那末“拒绝纳税”也就不会使普鲁士的“亲爱的臣民”恐慌万状，而且就是没有钦定宪法，社会问题也能解决了。

大家知道，“新普鲁士报”曾把我们的汉泽曼宣布为共产主义

者，因为他曾想取消免税规定。我们这位从来没有读过“新普鲁士报”的孟德斯鸠，也在科伦通过**独立思考**想到要把一切威胁钦定宪法的人宣布为“共产主义者”和“红色共和主义者”！因此，你必须选举曼托伊费尔，不然你就不仅是劳动和分工的私敌，而且还是共产主义者和红色共和主义者。你必须承认勃律盖曼的最新的“法制基础”，不然你就是反对 Code civil¹⁷³！

费加罗，tu n'aurais pas trouvé c (你万没有想到这一点)^①！
关于孟德斯鸠第五十六，明天我们再来详细地谈！

① 博马舍“疯狂的日子，或费加罗的婚礼。”——编者注

二

科伦 1 月 21 日。孟德斯鸠第五十六想施展出一个老奸巨滑的**马贩**所能施展出的全部狡猾手段，来向初选人推销“赠马”^①，即钦定宪法。他是马市上的孟德斯鸠。

谁不想要钦定宪法，谁就是想要共和国，——不单是一般的共和国，而且是红色共和国！可惜在我们的选举中，很少涉及到共和国，更不用说红色共和国了。涉及的只是：

你们赞成旧的**专制制度**和刷新了的**等级制度**，还是希望实行资产阶级的**代议制**？你们想要一种适合于前几世纪的“现存社会关系”的政治制度，还是希望要一种适合于本世纪的“现存社会关系”的政治制度？

可见，这里根本没有涉及反对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法国正在进行，在英国正在酝酿，这里涉及的是反对那种使“**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遭受危险的政治制度的斗争，因为这种制度把国家的权柄交给“**封建的所有制关系**”的代表人物，即天赋国王、军队、官僚、容克地主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一小撮金融贵族和市侩。

由于钦定宪法的帮助，社会问题正按照这些先生的精神来解决。这是丝毫也用不着怀疑的。

^① 德国谚语“赠马不看岁口”，意思是说不要计较赠品的好坏。一般用这个谚语时是指坏的赠品，而“赠马”也就成了“次货”的代名词。——译者注

在官吏们看来，什么叫做“社会问题”呢？这就是保持他们的薪俸和照旧统治人民的地位。

在贵族和贵族大地主看来，什么叫做“社会问题”呢？这就是保存封建地主原来享有的特权，让贵族在军队和民事官厅中占据收入最多的肥差美缺，以及直接从国库中拿钱来供养他们。除了这些可以感触到的物质的，因而也是“最神圣的”利益以外，“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先生们自然还要保持那些使他们的门第同资产者、农民和平民的下等门第有所区别的社会特权。旧的国民议会之所以被驱散，正是因为它胆敢侵犯这些“最神圣的利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上述先生们的所谓对钦定宪法进行“修改”，无非是要实行等级制度，就是说，实行一种能代表封建贵族、官僚、天赋王权的“社会”利益的政治制度。

再说一遍，丝毫用不着怀疑，钦定宪法正按照贵族和官僚的精神来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它将赠给这些先生一种统治形式，使这些半神半人能够剥削人民。

但是，钦定宪法是不是按照资产阶级的精神来解决“社会问题”呢？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是不是能得到一种国家体制，使他们能自由地管理本阶级的共同事务，如商业、工业、农业的利益；使他们能最有效地使用国家的资金，最节约地组织财政管理，对外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劳动，对内开发国家财富的一切资源，清除其中的封建污泥呢？

难道在历史上可以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资产阶级在天赋国王存在的同时能够确立一种符合于它的物质利益的政治制度形式吗？

为了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资产阶级曾不得不在英国两次赶走

斯图亚特王朝，在法国赶走世袭的波旁王朝，在比利时赶走拿骚家族的代表¹⁷⁴。

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

任何一个世袭的天赋国王，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旧社会在新社会内部的体现者。国家政权掌握在天赋国王手中，就等于国家政权掌握在残存的旧社会手中，就等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其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极端敌对的封建等级手中。

而“天赋国王”正好是钦定宪法的基础。

正如社会上的封建分子把天赋国王看成是自己的政治领袖，天赋国王也把封建等级看成是自己的社会基础，看成是臭名远扬的“王权支柱”。

因此，每当封建主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军队和官僚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天赋王权就不得不实行政变，于是就造成革命的危机或反革命的危机。

国民议会为什么被驱散了呢？只是因为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对封建主义的利益，因为它想废除阻碍农业发展的封建关系，想使军队和官僚服从商业和工业的利益，想制止侵占国家资财的现象，想取消贵族和官僚的封号。

所有这些问题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

由此可见，尽管三月事件或其他事件迫使天赋王权不得不屈服，并且违反自己的意志披上了资产阶级王权的外衣，但是政变和反革命危机却是天赋王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难道在一种必然导致政变、反革命危机和戒严的国家制度之下，能够恢复信贷吗？

多荒唐啊！

资产阶级的工业**必须**打破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枷锁。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革命，恰好证明资产阶级的工业已经发展到了紧要关头：不是争得适合于自己利益的国家制度，就是灭亡。

钦定宪法所保障的官僚监护制度对工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请回想一下普鲁士的矿业管理机关和工厂规章等等吧！如果英国工厂主把自己的生产费用同普鲁士工厂主的生产费用比较一下，那他首先就会发现普鲁士工厂主由于必须遵守官僚命令而受到的时间上的损失。

哪一个糖厂主会忘记普鲁士同荷兰在 1839 年订立的通商条约¹⁷⁵？哪一个普鲁士工业家不会因回想起 1846 年而羞愧？那时普鲁士政府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而禁止某一个省份向**加里西亚**输出商品；那时破产在布勒斯劳像瘟疫一样盛行，而普鲁士内阁则故作惊讶地宣称，说它并不知道输往加里西亚的东西有那么多，等等。

钦定宪法将使这种人来执掌权柄，并且这种“赠品”本身，也是出自这些人之手。因此，请大家好好地考虑考虑这一点。

加里西亚的事情又使我们注意到另外一点。

当时普鲁士政府同奥地利和俄国结成联盟，使西里西亚的工业和商业做了反革命的牺牲品。这种手腕是会经常使用的。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反革命势力的银行老板就是**英国**，天赋王权以及它的“王权支柱”永远都必须从它那里寻找**国外**的支持。而德国工业最可怕的敌人也是**英国**。我们认为，这两件事是有充分说服力的。

在国内，工业被官僚桎梏所束缚，农业为封建特权所限制；在国外，贸易被反革命出卖给英国，——这就是钦定宪法庇护下的

普鲁士国民财富的命运。

被驱散了国民议会的“财政委员会”，在报告中充分阐明了天赋政府管理国家财政的真相。

这个报告只是作为一个例子指出了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权支柱”，为了资助外国的那些专制王权的觊觎者（唐·卡洛斯）而从国库中提取的款额。但是，为了使贵族能够过更体面的生活，为了使封建王权的“支柱”能够经常坚强有力而从其他公民的腰包中榨取出来的这笔钱，同那个与曼托伊费尔宪法同时经过钦定的全部国家预算比较起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为了使少数人能统治多数人，首先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为了使尽量多的人图一己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就要有尽可能庞大的官僚队伍；为了避免“新普鲁士报”所说的那种现象，即财富使臣民变得过分无礼，就要用最无经济效果的方式来挥霍国家的资金；为了使天赋政府在很容易预见到的危机时刻能够单独地对付人民，就要从流通中抽出尽可能多的国家资金，而不是对工业进行投资，——这就是钦定国家财政制度的基本要点。利用征收来的税款使国家政权作为一种压迫的、独立的和神圣的力量来同工业、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而不是把政权降低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简单的工具，——这就是钦定普鲁士宪法的基本原则！

什么人送什么礼！今天的普鲁士政府怎样，它所赠送的宪法也就怎样。要弄清这个政府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敌对态度，只要看一下它的工商业条例草案就够了。在进到成立协会的借口之下，政府企图退到行会制度。竞争使生产出来的东西愈来愈便宜，它使生产具有愈来愈高的发展水平，就是说使资本不断增加，分工系统更加发展，采用机器的范围不断扩大。每实行一种新的分工，都

要使手工业者先前的手艺降低价值，每采用一种新机器，都要排挤掉千百个工人，每一次扩大生产，即增加新的投资，都要使许多小商贩和小资产阶级的企业遭到破产。政府答应在**封建行会机构**的帮助下保护手工业不受工厂生产侵害，保护学得的手艺不受分工侵害，保护小资本不受大资本侵害。因此，在同英国的竞争进行的斗争中经过千辛万苦才勉强保住自己未遭完全失败的德国人民，特别是普鲁士人民，应该束手做英国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将被迫接受一个同现代生产资料相矛盾，并且已被现代工业摧毁了的工业组织。

自然，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喜欢资产阶级统治。当洋洋得意的当代“办事人物”^①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的时候，我们就在德国首先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

但是我们向工人和小资产者说：宁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受苦，也不要回到已经过时的旧社会去！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自己的工业为建立一种使你们都能获得解放的新社会创造物质资料，而旧社会则以拯救你们的阶级为借口把整个民族抛回到中世纪的野蛮状态中去！

我们知道，天赋政府的**社会基础**是中世纪等级和中世纪制度。这个政府不适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它不得不试图按照自己的样子来建立一个社会。因此，它企图以行会制度代替自由竞争，以手纺车代替纺纱机，以锄头代替蒸气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普鲁士资产阶级同它的英国、法国、比利时的先驱们完全相反，竟大声宣布说钦定宪法（以及天赋王权、官

①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共产主义者称为“冷酷的理论家”，而把自己叫做“办事人物”。——译者注

僚和容克地主)是自己的口号呢?

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而投入了反革命怀抱,好像反革命不是革命的序幕似的!

此外,资产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对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漠不关心,他们一味追求自己特殊的、甚至同本阶级相敌对的利益。

这就是金融贵族、国家的大债权人、银行家、食利者。这些人的财富是随着人民的贫困而增长的。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福利是同旧的国家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杜蒙和他的文化流氓无产阶级。这就是那些沽名钓誉的教授、律师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只有在一个把出卖人民利益给政府作为有利行业的国家里,才能获得高官厚禄。

这就是常同政府进行有利交易的个别厂主;就是从对人民群众的普遍剥削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商品供应者;就是在政治生活的大漩涡中愈来愈失去其作用的市侩;就是在旧机关的保护下假公济私的市政委员;就是因出卖革命而成为大人先生和雄鹰勋章骑士的油商;就是成了皇家银行经理的,破了产的呢绒商和铁路业投机商¹⁷⁶等等,等等。

“这些人就是钦定宪法的朋友。”资产阶级要是衷心同情自己的这些苦难弟兄,要想配受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的尊重,——那就请选举

符合钦定宪法精神的复选人。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1 月 20—2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1 月 21 和 2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01 和 202 号

普鲁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

科伦 1 月 21 日。我们刚刚收到下面这份登在“奥佩恩区报”上的颇有教益的文件：

“逮捕令。据克拉科夫奥地利王国政府委员会通知：匈牙利已采取措施，企图使科苏特假借别人的名字取道布勒斯劳前往汉堡。据估计，科苏特的路线是梅斯洛维茨——格雷维茨——科捷尔^①。

奉西里西亚省总督先生的指示，特命令各警察机关、地方法院和宪兵队严密注意科苏特的行踪，该犯特征见后。一旦科苏特出现在你们地区，应以逮捕，并押送我处作下一步处理。”

（接着，像前面已经说过的，是科苏特的特征。）在这个颇有教益的文件上签字的是：

“王国地方行政长官霍夫曼
1849 年 1 月 17 日于奥佩恩”

我们的读者对此将作何感想？上西里西亚的天赋的曼托伊费尔们竟同意在伟大的鼓动家科苏特遭到失败和顺利越过国境时逮捕他，并将他引渡给刽子手，让后者用铅弹和火药去尽快地赦免他。如果科苏特真的被引渡，那将是史无前例的最卑鄙的负义行为，最可耻的破坏国际法的行为。

诚然，按照德意志联邦的旧法律，在德意志奥地利要求之下，普鲁士有责任把那些因在德意志联邦境内进行的活动而被控的政治流亡者引渡给奥地利。但是革命消灭了德意志联邦的旧法律，甚

^① 波兰称作：梅斯洛维策、格利维策、科兹列。——编者注

至在普富尔政府时期，来自维也纳的流亡者在柏林也是没有危险的。但是对于匈牙利，普鲁士是没有这类义务的。匈牙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普鲁士引渡那些仅仅因在匈牙利境内进行的活动而被控的匈牙利流亡者，那这种行为的卑鄙无耻并不亚于把俄国或波兰的流亡者引渡给俄国。

甚至在博德尔施文克的统治下，也没有人敢把从加里西亚和克拉科夫进入普鲁士境内的流亡者引渡给奥地利。那时我们这里还是君主专制政体，而现在，我们是立宪国家！

况且，如果科苏特进入普鲁士领土，那他并不是政治流亡者，他是进入中立区的交战一方。

德意志奥地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联盟，它同另一个独立国家匈牙利进行战争。至于为什么进行战争，这同普鲁士无关。甚至在 1831 年也没有任何人敢把进入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引渡给俄国。那时我们这里还是君主专制政体，而现在，我们是立宪国家！

我们请社会舆论注意普鲁士政府对科苏特的这种善良意图。我们深信，这足以掀起一个声援这位 1848 年最伟大的活动家的浪潮，足以造成一个对政府表示愤慨的风暴，这种浪潮和风暴甚至连曼托伊费尔也不敢加以反对。

但是，科苏特还在德布勒森执掌政权，他受到全体匈牙利人民的热烈拥戴，科苏特的勇敢骑兵还驰骋在匈牙利的普什塔草原¹⁷⁷上，文迪施格雷茨还无可奈何地在泥泞的蒂萨河岸上踟蹰，因此你们的逮捕令与其说会引起恐惧，倒不如说会引起嘲笑！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1 月 21 日
载于 1849 年 1 月 28 日“新莱茵报”
第 20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

科伦 1 月 25 日。我们虽然不是经常看到，但是偶尔也能满意地看到，从革命和反革命这两股洪流冲击以后留下来的积层下面冒出一个旧的三月革命以前美好时期的路标。山岳已移，沟壑已平，丛林已倾，而路标屹立如故，焕发着昔日的光彩，上面依然写着原来的字样：“通往席尔达¹⁷⁸！”

柏林“国民报”¹⁷⁹第 21 号就像这种路标一样，向我们伸出一只木手，上面写道：“致初选人。通往席尔达！”

“国民报”在它的忠告中首先向初选人宣称：

“普鲁士人民第二次实现自己辛苦争得的普选权（似乎这种在每一村庄都有不同解释的钦定的所谓普选权同 4 月 18 日争得的选举法¹⁸⁰是一样的！）的日子已经到来，从这个普选权中一定会产生一些人，他们将第二次表达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而是全民的精神（!）、意见（!!）和意志（!!!）。”

我们不评论这段话的佞屈聱牙、生拼硬凑、夸张而又拙劣的风格。这家报纸说，普选权应该向我们揭示出，所谓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意志究竟是什么。

妙极了！但“全民”是由谁组成的呢？

由“个别等级和阶级”组成。

“全民意志”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由个别的、互相矛盾的“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构成，就是说，正好是由那种被“国民报”描写为“全民意志”的直接对立面的意志构成的。

看！“国民报”的逻辑性多么强！

“国民报”认为，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全民意志。这种意志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各种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统一的、一定的意志。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多数人的意志。

而多数人的意志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从多数人的利益、生活状况和生存条件中产生的一种意志。

可见，要有同样的意志，这些多数人就要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或者他们至少必须在自己的利益上、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上、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上，暂时互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说得明白一点，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而是唯一的一个阶级和在社会关系即在工业和商业关系方面都从属于这个唯一的统治阶级的其他阶级以及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意志。

“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所谓全民意志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吗？

当然是这样。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

而心地善良的“国民报”却像 1847 年那样，还在喋喋不休地

谈论想像中的“全民意志”。

再往下看。“国民报”讲完了这个高明的开场白以后，又提出了一个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意味深长的意见：

“1849年1月的情况，同1848年5月那种充满希望和到处是高昂情绪（为什么不添上一个祈祷情绪呢？）的日子比起来是不同了。”

那时的一切都装饰着鲜花，
太阳的光芒也在发笑，
鸟儿唱着热恋的歌，
人们都在希望，在思考。——
他们想：¹⁸¹

“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应当立即全部实现那些伟大的改革；如果本着当时的精神，适应着从那时以来已经提高了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在1807—1814年奠定的基础上继续进一步加以建设的话，这些改革早就在普鲁士实现了。”

“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国民报”的天真真是既伟大又可赞！那时近卫军怀着切齿的仇恨撤出柏林，那时普鲁士亲王不得不换上邮差服装从柏林狼狈逃走，那时人民在王宫前面迫使国王向三月革命牺牲者的尸体脱帽致敬，而高等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不得不按住因国王受到这种屈辱而引起的愤怒，——“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

的确，抱这样的幻想已经是有些过分了！但是现在，在不得不承认自己受骗之后，竟然还向全世界宣扬这种已经受过骗的轻信。——说实在的，c'est par trop bonhomme（这就太愚蠢了）！

在哪一点上“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呢？

就是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实现那些伟大的改革，如果……继

续进一步加以建设的话，这些改革早就……实现了。”

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不对，应该说似乎是——一致的。

这就是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三月革命的伟大成果！

而这些“改革”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着当时的精神，适应着从那时以来已经提高了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把 1807—1814 年的基础”加以发展。

就是说，一方面本着 1807—1814 年的精神，同时又本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精神。

很简单，所谓“当时的精神”，就是指当时法国人对当时普鲁士容克君主国所施加的全然是物质的压力，也就是指当时同样也不如意的普鲁士王国的财政赤字。只是为了使资产者和农民能够纳税，只是为了至少在表面上给普鲁士王国的臣民实行一些法国人在他们所占有的德国地区大量实行的那种改革，——总而言之，只是为了把破烂不堪的、腐朽了的霍亨索伦君主国重新缝补一下，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实行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所谓城市条例、赎买条例、军事制度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只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比法国 1789 年的革命，甚至比英国 1640 年的革命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难道这一点应该成为曾被革命席卷了全国的普鲁士的基础吗？

旧普鲁士一向妄自尊大，总是把自己当做世界历史的中心，事实上，历史总是把这个“理性的国家”在污泥里拖来拖去。旧普鲁士的这种妄自尊大自然不合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普鲁士在没有挨到法国人的闷棍之前，总是安然地坐在 1807—1814 年尚未发展的基础上，连动也不想动一下。它也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光荣的、官僚容克的普鲁士君主专制王国在去年 2 月受到法国人一个新的有力的刺激，而不得不要堂而皇之地从“1807—1814 年

的基础”上滚下去的时候，这些基础早就被遗忘了。它也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普鲁士君主专制王国说来，问题根本不在于这些基础，而仅仅在于防止法国的刺激造成更大的后果。所有这一切，妄自尊大的普鲁士都不去理睬，而当它突然受到一个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喊叫起来，把腐朽了的1807—1814年基础召来，就像孩子呼唤保姆一样！

好像1848年的普鲁士，在领土、工业、商业、交通、文化和阶级关系方面，不是和“1807—1814年基础”上的普鲁士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国家！

好像从那时起不是已经有两个全新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自由农民进入了普鲁士的历史；好像1848年的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同“基础”时代的怯懦的、温和的、怀着感激心情的小资产阶级有所不同！

这一切都无所谓。英武的普鲁士人除了他们的“1807—1814年基础”以外，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这就是一个能在上面进一步加以建设的基础，——而有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一个最巨大的历史变革的开始，只不过是一场最渺小的玩弄所谓改革的骗局的终结，——在旧普鲁士，人们对革命的看法就是如此！

在对祖国的历史作一些自以为是的、愚昧无知的幻想这一点上，“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诚然，谢天谢地，只是柏林一个城市是这样！

让我们再往下看。

“那些不得不放弃特权和优越地位的……在将来必须同全体同胞平等相处的等级和阶级，看来准备这样做了，——它们深信，旧制度已经不可能存

在，并深信这是合乎它们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

请看这个甜言蜜语、心地善良的资产者是怎样再一次歪曲革命的！贵族、僧侣、官僚、军官“看来准备”放弃自己的特权，但这并不是慑于武装的人民，也不是因为对欧洲革命一感到畏惧就在自己队伍中不可抑制地发生的愈来愈严重的精神瓦解和组织瓦解使得他们无力反抗，——不是的！和平、善良、互利的2月24日和3月18日¹⁸²的“协定”（用康普豪森先生的话来说），使“他们深信”，这是“合乎他们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

三月革命，甚至2月24日的革命，都是合乎容克地主、教会法庭顾问、厅长和近卫军中尉先生们的真正利益的，——这真是一个大发现！

可惜的是，“现在情况已经变了。从旧制度中得到好处并成为旧制度维护者的那些人，不但没有像他们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亲自去帮助清除旧废墟，建造新房舍，反而想去加固那些基础已经完全动摇了的破房子，并且想用一些表面上适合于新时代的形式来加以装饰”。

“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已经不同于似乎是5月的那种情况了，换句话说，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于5月所没有的那种情况了，或者说，现在的情况正好就是5月的情况。

柏林“国民报”就是用这样的文字来写文章的，并且还以此自豪。

总而言之，1848年的5月同1849年的1月只是表面上有所不同。以前反革命分子似乎是意识到了他们的职责，而现在他们是真正没有意识到，并公开承认这一点，——这使和平的资产者感到悲痛。要知道，反革命分子的职责就是为了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职责就是切断自己的血管，但

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正确理解的利益的维护者抱怨说。

到底为什么你们的敌人现在不去做那些你们认为终究是他们的职责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你们在春天没有尽到你们的“职责”，因为当你们强大的时候，你们的行动却像个胆小鬼，你们在那个会使你们壮大并把政权交给你们的革命面前发抖了；因为你们自己丝毫不去触动旧废墟，而沾沾自喜地对着镜子欣赏自己不彻底的成就上面的光环！现在，当反革命突然强大起来并且蹂躏你们的时候，当你们脚下的基础完全动摇了的时候，你们却要求反革命做你们的仆人，要他们清扫那些由于你们无力和胆小而没有清扫的废墟，——他们是强者，难道他们应该为你们这些弱者牺牲自己吗？

真是天真幼稚的蠢货！你们等着吧，不久人民就要起来了，他们会一下子把你们连同你们现在软弱无力地对之嗥嗥吠叫的反革命一齐打倒！

二

科伦 1 月 27 日。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没有考虑到一个似乎总可以为“国民报”稍加辩白的情况：“国民报”不能自由讲话，它处在戒严的压迫下。既然是戒严，它自然不得不唱出这样的调子：

让我沉默吧，别叫我讲，
因为秘密已如义务降临；
我本要向你倾诉衷肠，
只是命运不允许这样!!!¹⁸³

然而，就是在戒严时期，办报也不是为了发表违背自己心意的言论，何况戒严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篇文章的前一半毫无关系。

“国民报”的文笔既夸张又晦涩，这怨不得戒严。

“国民报”在 3 月以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天真幻想，这也怨不得戒严。

“国民报”把 1848 年革命变成 1807—1814 年改良的尾巴，这也根本不是戒严强迫它这样做的。

总而言之，戒严决没有迫使“国民报”对 1848 年革命和反革命发展的进程产生荒谬的想法，关于这些想法，我们在两天以前已经向它指出过。戒严针对的只是现在，而不是过去。

所以，在我们批评这篇文章的前一半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戒严这回事。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就把戒严考虑进去。

“国民报”在讲完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场白以后，就对初选

人说道：

“问题在于巩固既得的进步，保持已有的成就。”

什么“进步”？什么“成就”？所谓“进步”，是说“如今一切都变了”，已经不同于“似乎”是5月的那种情况了吗？所谓“成就”，是说“从旧制度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没有像他们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亲自去帮助清除旧废墟”吗？或者是指那些“加固破房子，并且想用一些表面上适合于新时代的形式来加以装饰”的钦定“成就”吗？

“国民报”的尊贵的先生们，戒严决不能成为替荒谬和糊涂的言论辩解的理由。

现在非常顺利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进步”，只是一种回到旧制度的退步，我们正沿着这条进步的道路愈走愈远。

我们现在仅有的“成就”（这完全不是普鲁士所特有的成就，也不是“三月的”成就，而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结果），就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残忍、最凶暴的反革命，但是，这种反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它的必然后果一定是一个新的、普遍的、胜利的革命回击。

也许“国民报”对这一点知道得和我们一样清楚，只是由于戒严而不敢这样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我们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横的敌人；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尊贵的先生们，戒严最多不过是迫使你们沉默，却不会迫使你们说话。所以，对上面引证的这句话我们是这样看的：如果这话是你们说的，那就对了；如果这话是戒严当局说的，那你们何苦去做它的机关报。你们或者是革命者，或者不是。如果你们不

是革命者，那我们就是死敌；如果你们是革命者，那就应该沉默。

但是，你们的话说得那么肯定，你们过去的行为又是那么规矩，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戒严同这个声明毫无关系。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反革命。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对于暴力反革命或者根本不能战胜，或者只有用革命来战胜。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革命在1849年1月21日以前，即在上述文章写好以前所达到的目的，正好就是反革命。

“我们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横的敌人。”

这就是说，也是一切革命后直到新制度巩固以前都必然产生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敌人，是2月24日和3月18日“暴力行动”的敌人，是无情地摧毁腐朽的制度及其衰弱的法制基础的那种“专横”的敌人！

“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真的，为了拜倒在“法制、安宁和秩序”面前，为了抗议革命并为反对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的疯狂叫嚣帮腔，真是选择了一个良好时机！这个时机选得很恰当，因为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革命被正式诬蔑为**刑事犯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根据国王签署的诏书毫不掩饰地在实行“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宫廷奸奴强加于我们的“法律”总是被用来对付我们，而不是保护我们；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宁和秩序”就在于使反革命得到“安宁”，以便恢复它自己的旧普鲁士的“秩序”。

不对，先生们，通过你们的口说话的并不是戒严当局，而是

讲柏林话的，目光短浅、软弱无力而又怀有许多善良愿望的名副其实的**奥迪隆·巴罗**。

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这样轻率、这样幼稚、这样胆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背弃革命。如果他不能讲话，那就行动。如果不能行动，那就宁可一言不发。

也许“国民报”的先生们在实行一种狡猾的政策？也许他们表现得如此温和，是为了在选举前夕再把一部分所谓温和派吸引到反对派方面来？

早在反革命开始向我们猛扑的第一天，我们就说过，从现在起仅仅存在着两个党：“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仅仅存在着两个口号：“民主共和国”或“专制君主国”^①。一切处在中间的已经不是党，而仅仅是派。反革命的一切行动都证明了我们所说的话。选举就是我们这些话的最光辉的证明。

当这两个党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的时候，当斗争进行得非常残酷的时候，当这种斗争仅仅由于有组织的丘八们的力量占压倒优势而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时候，任何中介的政策都将终止。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奥迪隆·巴罗**本人才能扮演**奥迪隆·巴罗**的角色。

但是我们这些柏林的**巴罗**们却有自己的保留、自己的条件、自己的解释。他们是抱怨派 [Heuler]¹⁸⁴，但绝对不是单纯的抱怨派；他们是带有保留的抱怨派，是静悄悄的反对派中的抱怨派：

“但是，我们想要人民觉醒了的自由精神和平等原则所要求的那种新法律；我们想要**真正的民主立宪制度**（即真正的无稽之谈）；我们想要的不是仅仅靠刺刀和戒严来维持的安宁，而是另一种安宁，这种安宁是在政治和精神

^① 见本卷第 146 页。——编者注

上(1)都有充分根据的思想的安静，是由于根据事实和措施确信人民每一阶级都有自己的权利而产生的一种安宁，等等，等等。”

我们不必劳神去抄完这些为适应戒严状态而编造的句子了。要说明问题，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一小束革命**成果**，例如，一点儿民主，甚至一点儿宪政，几项新法律，取消一些封建设施，实行资产阶级平等，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国民报”的先生们和以“国民报”为机关报的前柏林左派集团的先生们想要从反革命手中得到的东西，正是构成反革命驱散他们的原因的东西。

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

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东西，全是那些除了进行新的革命以外他们用别的方法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而新的革命他们又不想要。

因为新的革命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和上述微小的资产阶级要求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些先生们不喜欢革命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幸而历史的发展很少关心巴罗先生们“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巴黎的真巴罗在2月24日“想要”得到的不过是一些微小的改革，不过是自己取得一个部长职位而已。在他刚刚得到这些的时候，巨浪就把他卷走了。于是，他和他的全体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的信徒，就在革命的浪潮中消失不见了。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他终于重新取得了部长职位，他又“想要”各种东西了。然而，他所要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实现。自古以来，一切巴罗的命运都是如此。柏林的巴罗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论戒严也好，不戒严也好，他们仍将用他们善良的愿望来烦扰大家。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是在纸上实现自己的某些愿望。然后他们不是被国王撤职，就是被人民撤职。总之，他们的差事是丢定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1 月 25—2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1 月 26 和 28 日“新莱茵报”
第 205 号和第 207 号增刊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巴黎状况

巴黎 1 月 28 日。人民起义的危险暂时被消除了，因为议院投票反对立即禁止俱乐部活动，即反对禁止一切俱乐部活动。但是新的危险即政变的危险又出现了。

只要读一读今天的“国民报”就会发现，每一行字里都流露出对政变的恐惧。

“今天的投票对内阁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奥迪隆·巴罗先生、福适先生以及 tutti quanti（同他们一路的人）还要死抓住自己的部长职位不放，那就让他们试试看。”

“国民报”的精神似乎还很振作。但是，请听听这段话的末尾吧：

“……不要公开地起来反对宪法的精神和字句！”

奥迪隆·巴罗先生、福适先生以及 tutti quanti 公开地起来反对宪法干什么呢？巴罗和福适从什么时候起对 1848 年宪法感到欢欣鼓舞呢？

“国民报”已经不是威胁部长们，而是说服他们，劝他们辞职，而且还说服总统，要他免他们的职。这样的事竟发生在一个三十年来一直认为经过这种表决后部长们辞职就应是理所当然的国家里，真是不可思议！

“国民报”说，希望共和国总统会明白，议院的多数同内阁是完

全不一致的，只有使内阁辞职，总统才能加强他同多数的联系，阻碍他同多数建立亲密关系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内阁。

此外，“国民报”还竭力使内阁有可能不失体面地下台：它希望取消对部长们的谴责。议院的表决，已经够他们受的了。除非部长们真的以某种行动破坏了宪法，那时才能采取最后手段。

“国民报”最后感叹道：是啊，大家都敦促内阁辞职；依我们看来，内阁本身的声明，也未必能使它继续执政。巴罗先生今天晚上声明，如果国民议会投票反对立即执行建议，以后的事件将由国民议会自己负责。真是妙极啦，如果不再负责，那就不应该再执政。既然内阁不愿对事件继续负责，它也就不应该再领导这些事件。巴罗先生推卸了责任，就等于公开提出了辞职申请书。

简单地说，“国民报”不相信内阁会自动辞职，也不相信总统会免它的职。

但是，如果内阁不想承认国民议会的表决，那它除了实行政变以外别无出路。

依靠军事力量解散国民议会，准备君主制复辟，——“国民报”对于内阁继续执政所担心的也就是这些。

因此，“国民报”和红色报刊力劝人民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为暴力措施造成任何小小的借口，因为每爆发一次叛乱，都只能巩固正要倒台的内阁，都只对保皇派反革命有利。

政变已经日益迫近，尚加尔涅同别动队军官之间的冲突就是证明。《Bouchers de Cavaignac》（“卡芬雅克的屠夫们”）没有表示出丝毫想帮助保皇派实行政变的愿望。因此他们必须解散。他们满腹牢骚，尚加尔涅则威胁他们，说要用军刀来对付他们，并监禁他们的军官。

从表面上看，情况是复杂化了，但实际上却非常简单，正像革命前夕常见的那种情况一样简单。

国民议会同总统及其部长们之间的冲突表面化了。法国已经不能在最近十个月中对它进行管理的那些软弱无能的人的统治下继续存在下去了。赤字，工商业受压抑的状况，使农业破产的苛捐杂税，已经愈来愈无法忍受了。目前更加迫切需要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但是新组成的各届政府一届比一届更加软弱无能，更加没有作为。最后到了奥迪隆·巴罗，他已经无能到了极点，六个星期来简直一事无成。

但是这样一来，他倒使情况变得异常简单了。在他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个“正直的”共和国的内阁了。混合政府（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¹⁸⁵），“国民报”的政府，以前的左派政府，——所有这一切都试过了，都用旧了，都被抛弃了。现在轮到了梯也尔，而梯也尔则意味着公开的君主制复辟。

不是君主制复辟，就是红色共和国，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危机还可以拖几个星期，但终究是要爆发的。尚加尔涅-蒙克^①和他的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整装待命的三十万人，看来也不想久等了。

这就是“国民报”担忧的原因。它已经意识到自己无力把握局势。它知道，只要以暴力更换政府，就会使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执政。在它看来，君主制也好，红色共和国也好，都只能使它遭到毁灭。因此，它对和平的协议忧虑重重，对部长们却表示殷勤关切。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使红色共和国得到最后的胜利，法国

① 蒙克 (Monk 1608—1670) 是英国的将军，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曾起主要作用，所以“蒙克”二字常用来称呼以军官身分帝制复辟实行政变的人。——译者注

是不是必须在一个短时期内度过君主制阶段。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大。

有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这就是“正直的”共和国已经支离破碎，在它以后——当然，也许会插入几支短短的间奏曲——可能出现的只是**红色共和国**。

写于 1849 年 1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1 月 31 日
“新莱茵报”第 209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巴黎局势

科伦 1 月 30 日。昨天早上我们在本报号外中宣传：巴黎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第一议院初选人中的一些抱怨派，在我们的传单下面写道：“这是撒谎！”“你们吓不倒我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下流咒骂。

这些可怜的人儿把我们的号外看成了单纯的竞选手段，好像第一议院和第二议院，甚至整个普鲁士的运动就能促使我们捏造欧洲革命的历史似的！

施图普——是第一议院的复选人！食利者冯·维特根施坦——是第一议院的复选人！司法官冯·格罗特——是第一议院的复选人！但是，巴黎的革命怪物居然又敢咆哮！Quelle horreur（多可怕啊）！

本报今天也谈到了巴黎的局势：

“人民起义的危险暂时被消除了，因为议院投票反对立即禁止俱乐部活动，即反对禁止一切俱乐部活动。但是，新的危险即政变的危险又出现了。”“如果内阁不想承认国民议会的表决，那它除了实行政变以外别无出路。依靠武力解散国民议会，准备君主制复辟，——‘国民报’对于内阁继续执政所担心的也就是这些……政变已经日益迫近，尚加尔涅同别动队军官之间的冲突就是证明……从表面上看，情况是复杂化了，但事实上却非常简单，正像革

命前夕常见的那种情况一样简单。国民议会同总统及其部长们之间的冲突表面化了…… 不是君主制复辟,就是红色共和国,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正直的’共和国已经支离破碎,在它以后——当然,也许会插入几支短短的间奏曲——可能出现的只是红色共和国。”

在我们的号外中,我们曾预言 29 日会发生危机。

下面刊登的巴黎 29 日的通讯向读者表明,我们的报道是多么确切,今天我们把法国局势阐述得多么准确。

写于 1849 年 1 月 30 日

载于 1849 年 1 月 31 日“新莱茵报”
第 209 号特别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日报”论选举

科伦 1 月 30 日。“科伦日报”终于也获得了选举总结，这种总结多少给该报的伤口涂上了一点药膏。

“民主派的选举总结，——最可敬的勃律盖曼兴高采烈地嚷道，——民主派的选举总结（即“新莱茵报”的总结）简直夸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现在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抗议书。”

从四面八方！“科伦日报”想用自己的“抗议”把我们压下去。两页压缩了的关于各地选举结果的综合报道，其中每一条消息都表明“新莱茵报”“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大”，每一条消息都证明立宪派的胜利，——这大概会使我们羞愧满面了吧？

不然。

“我们现在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抗议书。”

最可敬的勃律盖曼没有“夸大”。他真的收到了总计达四份之多的抗议书：来自西方（特利尔）、北方（哈姆）、南方（济克堡）和东方（阿恩斯贝尔格）！难道这不是“从四面八方收到的”反对民主派的夸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选举总结的抗议书”吗？！

暂且让“科伦日报”深信立宪派在这四个决定性的地方获胜而高兴吧。可惜这种兴致已经被伤心的事情破坏了，因为在许多地方立宪派终究由于“群众太容易受引诱”而告失败。

立宪派已经天真地承认他们无力“引诱”“群众”！

不过“科伦日报”总还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什么安慰呢？就是“德意志报”驻科布伦茨的记者是它的患难朋友。这位朋友在现在这种惨状之下找到了不愧登在“科伦日报”头条新闻地位上的恰当的词句：

“请注意，在这里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政治问题同社会问题比起来退居到次要地位，它完全被社会问题吞没了。”

几天前，“科伦日报”对社会问题还是不闻不问的。关于这个彼岸的东西，它或者缄默不语，或者用一种极其轻蔑的口吻（极尽“科伦日报”在这方面之能事）去谈它。对于社会问题，“科伦日报”以往总是抱着无神论者对待神灵所抱的那种怀疑态度。但突然它遇到了一件像“一千零一夜”中的渔夫所遇到的那种事情：正象在渔夫面前从一个由海底捞出的启封的瓶子中钻出一个巨大的妖怪一样，在发抖的“科伦日报”面前，从选票箱里也突然地、令人畏惧地钻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的幽灵。最可敬的勃律盖曼吓得跪倒尘埃。他最后的希望幻灭了，幽灵一口吞没了他在漫长岁月中情意缠绵地倍加爱护的整个“社会问题”、法制基础和其他一切。

“科伦日报”的政策真聪明！它企图用它的社会的失败来掩盖它的政治的失败。

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也被它击败了，——这个发现是“‘科伦日报’在初选后得到的”最伟大的“经验”！

但是，也许“科伦日报”早就热衷于“社会问题”了吧？

事实上，孟德斯鸠第五十六就曾在“科伦日报”上宣称，社会问题是无限重要的，承认钦定宪法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①。

^① 见本卷第 215 页。——编者注

但是，承认钦定宪法——这首先就是“科伦日报”称之为“政治问题”的东西。

可见，在选举以前是政治问题吞没社会问题，在选举以后则是社会问题吞没政治问题。可见，区别就在这里，初选后所获得的经验也就在这里，就是说，选举以后认为正确的东西，同选举以前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真理的东西，正好是对立的。

“政治问题被社会问题吞没了！”

还在选举以前，我们就尽可能具体地证明，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所谓“社会问题”，因为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本身的社会问题，而且同这种社会问题同时存在的，还有这个阶级的一定的政治问题^①。关于这些，我们暂且不谈。在严肃庄重的“科伦女人”^②面前，我们暂且不谈这些浅薄的见解，而来尽力研究一下这家信念坚定、思想深刻的报纸的思维过程和阐述手法。

“科伦日报”认为，所谓社会问题，就是如何帮助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问题。

现在，当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在初选中摆脱了大资产阶级、高等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影响时，“科伦日报”宣告说：“政治问题被社会问题吞没了！”

这对“科伦日报”真是一个最好的安慰！就是说，工人、农民和小资产者以显著的多数票击败了大资产阶级和其他著名的立宪派的代表，击败了“科伦日报”的候选人，这根本不是“立宪派”的失败，而只不过是“社会问题”的胜利！而立宪派遭到了失败，这也不是民主派获得胜利的证明，而只是政治同物质问题相比退到了次

^① 见本卷第 225—231 页。——编者注

^② 指“科伦日报”。——译者注

要地位的证明。

我们的邻居，这位政论家的论据真是深刻充分！这些小资产者已经濒于死亡，难道他们会因为钦定宪法而欢呼吗？这些农民不是在抵押贷款和高利贷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就是在封建义务的压迫下呻吟，而钦定宪法正是为了剥削农民的金融贵族和封建贵族的利益而发明的。难道农民会为自己的剥削者而欢呼吗？最后，这些无产者既苦于我们的官僚的立法狂，又苦于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发财迷。难道他们有理由为钦定宪法促使这两个搜刮民脂民膏的阶级进一步勾结起来而欢呼吗？

难道这三个阶级所最关心的不是要消灭不代表这些阶级而只代表它们的直接敌人和剥削者的第一议院吗？

其实，“科伦日报”说得对：社会问题吞没了政治问题。不久前才参加政治运动的那些阶级，将为了“社会问题”的利益而投票反对自己本身的政治利益，赞成钦定宪法！

小资产者和农民，尤其是无产者，是否能找到一种比民主共和国更好的国家制度形式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呢？全社会最激进、最民主的阶级不正是这些阶级吗？特别**革命的**阶级不正是无产阶级吗？“反正一样，社会问题吞没了政治问题，”——“科伦日报”扬声说道。

如果相信“科伦日报”，那末社会问题的胜利同时也就是钦定宪法的胜利。

但是，“科伦日报”的“社会问题”还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请读一下“科伦日报”关于第一议院的选举及其“幸运结局”的总结，所谓“幸运结局”就是约瑟夫·杜蒙先生当了复选人。这样，“科伦日报”本身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而且同这个事实比起来，在选举平

民的第二议院时可能出现的一切次要的“社会问题”都将退居次要地位。

但愿现在在巴黎威严出现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问题”的无情风暴,不要摧毁“科伦日报”的脆弱的“社会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1 月 30

原文是德文

日载于 1849 年 2 月 1 日“新莱茵报”
第 210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康普豪森

科伦 2 月 3 日。根据完全可靠的消息，在议院开幕前，勃兰登堡内阁将辞职。在议院开幕时，康普豪森先生将以新首相的身分出席会议。

我们本来就相信，为此正在进行某种准备，因为几天以前，这个圆滑的国家要人在此地的朋友们曾经放出风声，说他似乎已经对政治厌倦了：

唉，无谓的奔忙已使我十分倦怠；
为什么一会儿快乐，一会儿悲哀？
啊，甜蜜的世界，
去吧，请进入我的胸怀。¹⁸⁶

因此，据说他想回到安静的家庭生活去，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波澜较少的领域——油类投机买卖。

每一个有远见的人都会明白：康普豪森先生已感觉到有重新被请出来拯救王室的必要，并且“为自己的宽大精神所感动”，希望再次以他独具的优点充当“宪制国王的产婆”。

议院中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将欢庆这个议会的“胜利”。德国人是健忘的，而且不记前仇。去年还在反对康普豪森先生的那个左派，将以感激的心情欢迎他的就任，把这当做是王室方面的巨大让步。

为了使人民不致再次受骗，我们简略地提一下这个“有思想的”国家要人的最杰出的活动。

康普豪森先生复活了在3月18日被埋葬了的**联合议会**，并且就未来宪法的某些基本原则同它达成了协议。

康普豪森先生这样一来也就达成了有关**法制基础**，即有关间接否定革命方面的协议。

康普豪森先生接着又用**间接选举**来为我们造福。

康普豪森先生把普鲁士亲王的逃跑变成了增长见识的旅行，并把他从伦敦召回来，于是再一次抛弃了革命，抛弃了革命的一个主要成果。

康普豪森先生组织了市民自卫团，但他一开始就把这个人民的武装变成了一个阶级的武装，并使人民和市民自卫团作为两种敌对的力量互相对立起来。

康普豪森先生同时还容许旧普鲁士的官僚和军队改组，让它们一天比一天更有能力来准备反革命政变。

康普豪森先生容许用榴霰弹屠杀几乎手无寸铁的波兰农民，这是一件流芳万世的伟绩。

康普豪森先生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以便使过度的爱国主义激情得到发泄，并且借以恢复普鲁士自卫军的名声。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就用一切力量在法兰克福帮助实行在马尔摩签订的卑鄙的休战协定，因为这是弗兰格尔进军柏林所必需的一步。

康普豪森先生只是在莱茵省取消了旧普鲁士的几项反动法律，但是在一切旧的省份都完整地保存了普鲁士法的一切警察式的立法制度。

康普豪森先生是第一个阴谋反对德国统一（当时无疑是革命

的统一)的人,首先他召集了他的柏林协商议会,以此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相对立,接着又千方百计地反对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和影响。

康普豪森先生要求他的议会把议会的制宪全权限制为“协商的”全权。

康普豪森先生又要求议会禀奏王室,承认对议会的全权所作的这种限制,即议会是一个可以被任意延期或解散的制宪议会。

康普豪森先生接着又要求议会抛弃革命,甚至把这件事当做是否信任内阁的问题提出来。

康普豪森先生向他的议会提出了一个和钦定宪法没有多大区别的宪法草案,这个草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公愤。

康普豪森先生常常自夸他是起中介作用的首相,但是,这种中介作用不过是使在王权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背叛人民而已。

康普豪森先生最后便辞职了,因为这种背叛已经完全商量妥当,并且已经准备就绪,只等行动内阁及其便衣警察加以实行了。

康普豪森先生后来又任所谓的中央政权大使,并且在以后历届内阁中都担任这个职务。当克罗地亚人、卢西人、瓦拉几亚人的军队在维也纳蹂躏德国土地的时候,当他们在德意志的这个最好的城市中大肆烧杀,并且令人发指地用那种连梯利血洗马格德堡时¹⁸⁷都没有用过的办法来蹂躏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仍然是大使。

他虽然是大使,但是却袖手旁观。

康普豪森先生在勃兰登堡主阁时仍然是大使,因此他参加了普鲁士的反革命,并同意在不久前颁布的普鲁士通告上署名。而这个通告竟明目张胆地公开要求恢复以前的联邦议会¹⁸⁸。

康普豪森先生现在终于又要组阁了,这是为了掩护反革命的

退却,同时也是为了给我们长期保证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成果。

上面这些就是康普豪森的丰功伟绩的一部分。如果他现在又当了首相,那他一定会急速增大这些丰功伟绩一览表的篇幅。我们也将把这些伟绩尽可能准确地记下来。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2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2 月 4 日“新莱茵报”第
213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审判案¹⁸⁹

马克思的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

今天的审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对“新莱茵报”提出控告的根据的 Code pénal (刑法典) 第二二二条和第三六七条，是当局能够用来迫害报刊的莱茵省法律中唯一的两条，当然，直接号召叛乱是另外一回事。

你们大家都知道，检察机关迫害“新莱茵报”的瘾头特别大。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虽然检察机关费尽了心机，但除了说我们连犯了第二二二条和第三六七条的规定以外，它还无法控告我们犯了别的什么罪行。因此，为了报刊的利益，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谈谈这两个条文。

在做法律分析以前，请允许我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检察官称被指控的文章的下面这个地方是**卑鄙无耻**：“茨魏费尔先生不是把执行权和立法权集中于一身了吗？也许检察长的荣誉可以用来遮盖人民代表的过失吧？”诸位先生！有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检察长，同时却是一个不好的人民代表。也许茨魏费尔先生所以是一个好的检察长，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好的人民代表。检察机关大概不太了解议会的历史。在制宪议会的讨论中占如此显著地位的关于

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ffisen in Köln.

I.

Der erste Wreßprozeß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II.

Prozeß des Kreis - Ausschusses der
rheinischen Demokraten.

Köln, 1849.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载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科伦受审时
发言全文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的扉页

不能兼职的问题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对执行机关的代表的不信任，是怀疑执行机关的代表会为了现存政府的利益而轻易牺牲社会的利益，因此，他最不适合于当人民的代表。具体地说，检察官的情况怎样呢？哪一个国家不承认这个职位同人民代表的崇高称号是不相容的呢？请你们回忆一下在法国和比利时报刊上，在法国和比利时议会中对阿贝尔、普路古尔姆、巴魏的抨击——这种抨击就是要反对总检察官和议员由一人兼任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这种抨击从来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甚至在基佐内阁时期也是这样，而路易-菲力浦的法国和列奥波特的比利时被认为是典范的立宪国家。不错，在英国对 attorney-general (检察长) 和 solicitor-general (副检察长) 是另外一种情况。但他们的地位和 procureur du roi (最高陪审员) 的地位有本质的区别。他们或多或少地已经是法官了。诸位先生，我们不是立宪主义者，我们站在我们的原告先生们的观点上，是为了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打击他们。因此我们才引证立宪惯例。

检察官想用关于道德的陈辞滥调把议会历史的整整一个时期一笔勾销。我坚决驳斥他非难我们卑鄙无耻的说法，我认为这种非难是出于他的无知。

现在我开始对案件做法律方面的分析。

我的辩护人^①已经向你们证明，如果不是根据 1819 年 7 月 5 日的普鲁士法律，控告我们侮辱了检察长茨魏费尔就根本站不住脚。Code pénal 第二二二条只谈到关于《outrages par paroles》，口头的侮辱，没有谈到书面的或报刊的侮辱。1819 年的普鲁士法律

^① 施奈德尔第二。——编者注

只是为了补充,而不是要取消第二二二条。只有当 Code 规定要对这类口头侮辱的行为加以惩罚时,普鲁士法律才能把第二二二条的规定扩大到对书面的侮辱也要加以惩罚。只有在第二二二条关于口头侮辱所规定的情况和条件下才能谈得上书面的侮辱。因此,有必要弄清楚第二二二条的确切含义^①。

我们来看看对第二二二条所做的解释(Exposé par M. le conseiller d'état Berlier, séance du février 1810 (国务委员会委员贝利耶先生在 1810 年 2 月的会议上所作的说明)):

《Il ne sera donc ici question que des seuls outrages qui compromettent la paix publique, c'est-à-d. de ceux dirigés contre les fonctionnaires ou agents publics dans l'exercice ou à l'occasion de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 dans ce cas ce n'est plus un particulier, c'est l'ordre public qui est blessé la hiérarchie politique sera dans ce cas prise en considération: celui qui se permet des outrages ou violences envers un officier ministériel est coupable sans doute, mais il commet un moindre scandale que lorsqu'il outrage un magistrat》。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

“总之,这里所指的只是破坏**社会秩序**、**社会安宁**这样一些侮辱行为,即当官员或负责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或者由于执行职务而受到的侮辱,在这种情

① 第二二二条宣称:《Lorsqu'un ou plusieurs magistrats de l'ordre administratif ou judiciaire auront reçu, dans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 ou 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 quelque outrage par paroles tendant à inculper leur honneur ou leur délicatesse, celui qui les aura ainsi outragés sera puni d'un emprisonnement d'un mois à deux ans》。(“如果行政机关或司法部门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执行职务**而遭到某种口头侮辱,使他们的名誉或尊严受到损害,侮辱他们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 (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况下,受到损害的已经不是个人,而是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到政治等级制度了:谁敢侮辱负责人员或对他们施加暴力,那末毫无疑问,他就是犯了罪,但是他引起的乱子比起侮辱法官来要轻一些。”^①

诸位先生,从这段解释中你们可以看出,立法者制定第二二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只有”当侮辱官员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社会安宁的时候,才能适用这一条。但什么时候社会秩序、la paix publique(社会安宁)才会遭到破坏呢?仅仅是在发生下面情况的时候:有人企图发动暴乱推翻法律,或者阻挠现行法律的实施,即反抗执行法律的官员,妨碍官员,使他无法执行职务。反抗可能只是发发牢骚,说些侮辱人的话,但是也可能达到采取暴力行动,进行暴力反抗的程度。Outrage,侮辱——这只是情节最轻的 violence,不服从、暴力反抗。因此,在解释中就谈到了《outrages ou violences》,“侮辱或暴力行为”。按意思,这两个词是相同的;但是 violence,暴力行为只是对执行职务的官员进行的情节较重的 outrage,侮辱的一种形式。

就是说,这个解释指出,必须是:(1)在官员执行职务时受到的侮辱,(2)当面对他进行的侮辱。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是实际上破坏了社会秩序。

在有关《outrages et violences envers les dépositaires de l'autorité et de la force publique》,即有关“对享有国家威信和被授予国家权力的人所进行的侮辱和暴力行为”的整整一章中,你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规定。这一章的各条款规定了不服从行为的轻重的顺序:面部表情,言语,威胁,暴力行为;后者按其严重程度不同又有

^① 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所区别。最后,各条款还规定,如果这些不同形式的不服从行为发生在法庭上,得加重处分。在法庭上引起的“乱子”被认为是最大的乱子,是以最不能容忍的方式破坏了对法律的遵守、*paix publique* (社会安宁)。

因此,只有(1)当着官员的面,(2)在官员执行职务的时候对他进行了书面的侮辱,第二二二条才能适用。诸位先生,我的辩护人已经向你们举出了类似的例子。例如,如果他现在在陪审法庭的审判会上用书面形式侮辱了审判长等等,那他本人就要受到第二二二条的惩处。但是,对于在官员执行职务以后经过了很长时间,而且又不是当着他的面对他“进行了侮辱”的一篇报纸上的文章,Code pénal (刑法典)中的这个条款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

对第二二二条所做的这种说明,能够向你们把 Code pénal 中似乎存在的漏洞,似乎存在的不彻底的地方解释清楚。为什么我可以侮辱国王,却不能侮辱检察长呢?为什么 Code 和普鲁士法不同,不对侮辱陛下的行为规定处罚呢?

因为国王从不亲自执行官员的职务,而总是交给别人去执行,因为国王从不直接和我打交道,而只是通过他的代表。从法国革命中产生的 Code pénal 的专制制度,同普鲁士法的那种宗法式的拘泥迂腐的专制制度有天壤之别。只要我真的妨碍了国家权力,哪怕只是侮辱了执行自己职务,对我实现国家权力的官员,拿破仑的专制制度也会立即置我于死地。但是,官员在不执行这种职务的时候,他就成了市民社会的普通一员,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特别的防御手段。而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却用官员来同我对抗,把官员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似乎官员的品质是和这种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就像天惠是和天主教的神甫结合在一起

一样。普鲁士官员对普鲁士俗人，即非官员来说，始终是神职人员。对这种神职人员的侮辱，即使不是在他执行职务的时候，不是当着他的面，而是当他已经回到私生活中的时候，这仍然是对宗教的玷污，是一种亵渎行为。官职越高，对宗教的玷污罪行就越重。因此，侮辱国王，侮辱陛下是对国家神职人员的最大侮辱，根据 code pénal，从刑法观点看来，这是决不可许的事情。

但是有人会说，既然 Code pénal 第二二二条所说的仅仅是《dans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对官员的 outrages，即在官员执行职务时对官员的侮辱，那就用不着证明，立法者这里所指的是要官员亲自在场。这是按第二二二条治罪的任何一种侮辱行为所必需的条件。可是，第二二二条对《dans l'exercice de leurs fonctions》还作了如下的补充说明：《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

检察长把这句话解释成：“在他们的职务方面。”诸位先生，我要向你们指出，这样翻译是错误的，而且是同立法者的意思直接矛盾的。请你们看看同一章的第二二八条。那里写道：凡犯有《dans l'exercice de ses fonctions ou 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殴打官员罪者，一律判处两年至五年的徒刑。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在他的职务方面”吗？难道能够给以某方面的殴打吗？难道这里不需要有官员亲自在场这样一个前提吗？我能殴打一个不在场的人吗？显然，这句话应该翻译成：“凡犯有由于官员执行他的职务而殴打官员罪者”。但是，在第二二八条中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第二二二条的句子。显然，《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这两条的意义是相同的。因此，这些补充不但不排除把官员亲自在场作为条件，相反地，是以官员亲自在场为前提的。

法国立法的历史在这方面还向你们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证

明。你们都记得，在波旁王朝复辟初期，法国各党派在议会中，在法庭上彼此之间发生过剧烈的冲突，在法国南部甚至动起了刀子。当时的陪审法庭无非是胜利了的党派对付失败了的党派的战地法庭罢了。反对派的报刊无情地斥责陪审法庭的判决。第二二二条没有提供任何武器来反对这种不受欢迎的论战，因为第二二二条只适用于在法庭上当面侮辱陪审员这样的事件。因此，1819年制定了一条新法律，惩治一切攻击 Chose jugée，已经宣布了的判决的行为。Code pénal (刑法典) 没有规定法庭的判决具有这种不可侵犯性。如果第二二二条谈到了执行职务“方面”的侮辱，难道能够用新法律来补充吗？

但是，《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这个补充说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补充说明的目的是为了使官员在执行职务的前后不久不受到攻击。如果第二二二条只谈到在官员执行职务的当时对官员的“侮辱或暴力行为”，那末，比方说，我可以在法院执行官查封财产以后把他从楼梯上推下楼去，然后就说，我只是在他对我执行完了法院执行官的职务以后才侮辱了他的。再比方说，我可以半路袭击骑马到我家来执行法警职务的治安法官，把他痛打一顿，逃避根据第二二八条应给予我的惩罚，借口说我打他不是在他执行职务的时候，而是在他执行职务之前。

因此，加上《à l'occasion de cet exercice》，由于执行职务这样一个补充说明，是为了保证执行职务的官员的安全。它所指的侮辱和暴力行为，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执行职务的当时，但必须是在这前后不久，而且——这点很重要——这些行为要和执行职务有密切的关系，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被侮辱的官员亲自在场。

即使我们在文章中侮辱了茨魏费尔先生，第二二二条也不适

用于我们的文章，这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地加以证明呢？当被指控的文章写成的时候，茨魏费尔先生**并不在场**；那时他不是住在科伦，而是住在柏林。在这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茨魏费尔先生执行的不是检察长的职务，而是协商派¹⁹⁰的职务。因此，他不可能作为正在执行职务的检察长而受到侮辱和詈骂。

除了我上面的全部论述以外，还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证明，第二二二条不适用于“新莱茵报”上那篇被指控的文章。

这就是 Code pénal（刑法典）中关于**侮辱**和**诽谤**的区别。你们可以在第三七五条中找到这种区别的精确解释。在“诽谤”这一条的后面是这样说的：

《Quant aux injures ou aux expressions outrageantes qui ne renfermeraient l'imputation d'aucun fait précis》（在关于“诽谤”的第三六七条中是这样说的：《des faits qui, s'ils existaient》，事实，如果它们是真正的事实》，《mais celle d'un vice déterminé la peine sera une amende de seize à cinq cent francs》。“对于带有谴责某种缺陷，而不是谴责某种行为的詈骂和侮辱性言词……罚款十六到五百法郎。”

在第三七六条中我们还读到：

“所有其他的詈骂和侮辱性言词……都应受一般的行政处分。”

那末，诽谤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把**某些事实**归罪于某人的詈骂。侮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谴责某种缺陷和一般的侮辱性言词。如果我说：“你偷了一个银匙子”，那末照 Code pénal 的理解，我就是对你进行了诽谤。如果我说：“你是一个小偷，你有偷窃的习惯”，那我就是侮辱了你。

可是，“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根本没有对茨魏费尔先生进行这样的谴责，说茨魏费尔先生是人民的叛徒，说茨魏费尔先生发表了

卑鄙的声明。这篇文章说得很具体：“据说，似乎茨魏费尔先生还声明说，他将要在一星期内在莱茵河畔的科伦城里取消 3 月 19 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取消倒霉的 1848 年的其他一切产物。”

由此可见，在这里归咎于茨魏费尔先生的的是一个十分肯定的声明。所以，如果说在这里必须在第二二二条和第三六七条之中选择一条来运用，那末自然应该选择关于诽谤的第三六七条，而不是关于侮辱的第二二二条。

为什么检察机关不把第三六七条而把第二二二条用到我们身上呢？

因为第二二二条是不明确，它使人们有更大的可能用欺骗手段达到谴责所想要谴责人的目的。侵犯《délicatesse et honneur》，侵犯尊严和名誉是极不明确的概念。什么是名誉？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侵犯尊严和名誉？这完全要以我所接触的那个人为转移，以他的文化程度、个人偏见和自负心理为转移。在这里，除了 *noli me tangere*（含羞草），除了妄自尊大的自以为不可侵犯的官员的虚荣心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标准。

但是，即使是关于诽谤的一条，即第三六七条也不适用于“新莱茵报”上那篇文章。

第三六七条要求《fait précis》，肯定的事求，要求《un fait qui peut exister》，真正能成为事实的事实。但是要知道，我们并没有谴责茨魏费尔先生，说他取消了出版自由，封闭了俱乐部，在某个地方取消了三月的成就，而只是把一个普通的声明归咎于他。而第三六七条是指责某人有如下行为：如果这种行为确已发生，就会引起刑事警察或违警警察对此人的追究，或者至少引起公民对他的

鄙视或憎恨。

但是，仅仅一个想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声明**并不能成为刑事警察或违警警察对我进行迫害的借口。甚至不能说这个声明一定会引起公民对我的憎恨和鄙视。自然，口头声明可能是很卑贱的、值得鄙视和憎恨的思想的反映。但是，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难道我不能作出以我根本无力采取的行动相威胁的声明吗？只有行为才能证明这种声明的**严重程度**。

此外，“新莱茵报”写的是：“**据说**，似乎茨魏费尔先生声明说……”。为了诽谤某人，我自己绝不会把自己的论断置于怀疑之下，绝不会像在这里一样用“**据说**”这样的词；我一定会说得很肯定。

最后，诸位陪审员先生，根据第三六七条，构成**诽谤罪**的对某种行为的指责会引起《citoyens》公民对我的憎恨和鄙视，其实这些《citoyens》，这些公民在政治事务中一般都不再存在了。在这些事务中存在的只有政党的信徒。在这个党的成员中使我遭到憎恨和鄙视的东西，在那个党的成员中却会受到热爱和尊敬。本届内阁的机关报“**新普鲁士报**”谴责茨魏费尔先生，说他像**罗伯斯庇尔**^①。在这家报纸看来，在它的党看来，我们的文章没有使茨魏费尔先生遭到憎恨和鄙视，相反，却为他解除了压在他身上的憎恨，压在他身上的鄙视。

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不仅在今天这个场合要这样，而且在一切场合，只要检察机关企图把第三六七条运用到政治性的论战上，都应该注意这一点。

① 见本卷第 28 页。——编者注

诸位陪审员先生，一般说来，如果你们要像检察机关所解释的那样，把关于诽谤的第三六七条运用于报刊，那末你们借助刑事立法就可以把你们在宪法中所承认的和通过革命才取得的出版自由取消。这样你们就是批准官员们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如果现行法律和社会发展刚刚达到的阶段发生显著的矛盾，那末，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的职责恰恰就是要在过时的律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分量话。那时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超过法律，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为止。这是陪审法庭的最高尚的特权。诸位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文字本身就便于你们执行这个任务。你们只是应当根据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政治权利、我们的社会要求来解释它。

第三六七条结尾说道：

《La présente disposition n' est point applicable aux faits dont la loi autorise la publicité, ni à ceux que l' auteur de l' imputation était, par la nature de ses fonctions devoirs, obligé de révéler ou de réprimer》“本规定不适用于法律允许公布的行为，也不适用于控诉人由于其职务或职责必须加以揭露或阻止的行为。”^①

诸位先生，毫无疑问，当立法者谈到揭露的**职责**时，他指的不是自由报刊。但是，他同样也很少想到，这一条有一天会被运用于自由报刊。大家知道，在拿破仑统治下是没有任何出版自由的。因此，如果你们想把这条法律运用于完全不是为此而制定的

^① 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这种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阶段，那你们就把它全部运用起来，按照现代的精神来解释它，使第三六七条的最后一句也施惠于报刊。

如果按照检察机关对第三六七条所作的那种狭隘的解释，那末这一条就排斥了对真理的证明，只允许根据官方文件或者已经做出的法庭判决来进行揭露。如果是这样，那何必还要报刊 *post festum*（放马后炮），在已经宣判之后来揭露呢？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如果你们这样来解释第三六七条——其实，如果你们不想为了政府当局的利益取消出版自由，你们就应当这样来解释它，——那末 *Code*（法典）同时也就给你们提供了反对报刊滥用职权的武器。根据第三七二条，如果某人进行揭露，那末对他的司法上的追究和关于是否诽谤问题的判决必须延期进行，直到对所揭露的事实调查清楚为上。根据第三七三条，属于诽谤性的揭露要受到惩罚。

诸位先生！只要粗略地看一看被指控的那篇文章，就可以确信，“新莱茵报”抨击地方检查机关和宪兵，毫无侮辱或诽谤之意，它只是在履行它的揭露职责。对证人的讯问已经向你们证明，我们关于宪法所报道的完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但是，“新莱茵报”上的那篇文章的全部实质在于，它预言了随后到来的反革命，抨击了汉泽曼内阁。这个内阁在上台时曾经发表了一个奇怪的声明，说什么警察愈多，国家就愈自由。这个内阁曾经以为贵族已被战胜，现在它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为了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剥夺人民的革命成果。因此它就为封建反革命准备了基础。在那篇被指控的文章中，我们只不过是揭露了汉泽曼内阁和德国各邦政府的系统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周围的一种明

显表现。

不能把在科伦的逮捕看作是孤立的现象。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就足以证明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不久,就开始了对柏林报刊的迫害,为此并使用了旧普鲁士法的条款。过了几天,即7月8日,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的主席尤·符尔夫被捕,这个俱乐部委员会的许多委员的住宅受到搜查。后来陪审员宣告符尔夫无罪,其实当时任何一个政治性的控诉都没有得到陪审法庭的批准。同一天,即7月8日,在慕尼黑禁止军官、官员和编制以外的官员参加人民集会。7月9日,布勒斯劳“德意志”协会主席法肯海恩被捕。7月15日,检察长施纳泽在杜塞尔多夫市民联合会发表演说,正式向人民俱乐部起诉,根据他的要求,人民俱乐部主席在9日被捕。你们看,这就是检察机关公正无私的例证,这就是检察长同时以某个党派的信徒的身分出现,而一个党派的信徒又同时以检察长的身分出现的例证。尽管我们由于抨击茨魏费尔而开始受到法律追究,我们仍然揭穿了施纳泽的阴谋诡计¹⁹¹。固然,他很小心,没有进行答辩。同一天,当检察长施纳泽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对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的演说时,国王下令解散了民主主义者期图加特区域联合会。7月19日,海得尔堡的民主大学生联盟被解散。7月27日,在巴登的所有民主团体被解散以后不久,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的所有民主团体也被解散。难道我们应该对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公然反对人民的叛变阴谋保持缄默吗?巴登政府、维尔腾堡政府和巴伐利亚政府敢于做的,当时普鲁士政府还不敢做。它所以不敢,是因为普鲁士的国民议会开始觉察到反革命的阴谋,并且坚决反对汉泽曼内阁。但是,诸位陪审员先生,坦率地说,如果普鲁士的人民革命不立刻粉碎普鲁士的反

革命，那末在普鲁士也将完全取消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我深信我的话是正确的。由于实行戒严，这种自由现在就被部分地取消了。在杜塞尔多夫和西里西亚的某些地区，有人竟敢恢复了**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不仅德国的一般情况和普鲁士的一般情况使我们有责任抱着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去注视政府的每一个行动，去公开揭露政府所采用的制度的任何一个微小的症状。科伦的地方检察机关也给我们提供了特殊的理由，使我们把这个检察机关作为反革命的工具在舆论面前揭露出来。在7月一个月里，我们就不得不揭露了三次非法逮捕事件。前两次国家检察官黑克尔保持了沉默。第三次他企图为自己辩解，但是在进行了回击以后，他便哑口无言了。理由很简单：他没有什么可说的。¹⁹²

在上述情况下，检察机关敢于断言我们在这样的场合不是在进行揭露而是在进行吹毛求疵的恶意诽谤吗？这样的观点是以某种奇怪的误解为基础的。至于我本人，诸位先生，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宁肯去研究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宁肯去分析历史的进程，也不愿意同当地的要人、宪兵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尽管这些先生们以为自己很伟大，但在现代的巨大斗争中他们却**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决定同**这样的**敌手交锋，我认为，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牺牲。但是首先，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此外，诸位先生，直接同个人、同活的个体及其个人生活发生接触的下级政权机关和社会权力机关是奴隶制度这一建筑的主要支柱。所以，只是一般地同现存关系、同最高权力机关作斗争是不够的。报刊必须反对**某一具体的**宪兵、**某一具体的**检察官、**某一具体的**行政长官。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

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听众发出叫好声。）

恩格斯的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前面的发言人所谈的主要是对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先生一事提出的控告；现在请允许我提请你们注意对诽谤宪兵一事提出的控告。首先谈谈提出控告时所依据的那些法律条款。

刑法典第三六七条规定：

“凡在公共场所或公共集会上，或在真实的和正式的文件中，或在已刊印的或未刊印的文章中（只要这些文章已经张贴、出售或分发），指责某人有下列行为者则犯有诽谤罪：如果这种行为确已发生，就会引起刑事警察或违警警察对此人的追究，或至少引起公民对他的鄙视或憎恨。”^①

第三七〇条对此作了如下补充：

“如果指责所根据的事实按照法定手续查明属实，则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不受任何惩罚。——只有以法庭判决或其他真实文件为根据的证据，才算是合法证据”^②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已就这些法律条文向你们作了自己的解释，并要求据此宣判我们有罪。有人已经向你们指出，这些法律是在这样的时期制定的：当时检查机关严密控制着出版界，政治情况与现在截然不同。因此，我的辩护人^③表明了这样的看法：你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受这些陈旧的法律约束的。检察机关的代表同意

①②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③ 施奈德尔第二。——编者注

这种看法,至少对于第三七〇条是这样。他这样表示:“陪审员先生,对于你们来说,最主要的当然是确定所审查的事实真实性是否已经得到证明。”——我要感谢检察官的这种承认。

如果你们不持有这种看法,即第三七〇条至少由于它对实据的限制而已经过时,那末毫无疑问,你们一定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上述两条应该另做别的解释,而不是像检察机关解释的那样。陪审法庭的特权是:陪审员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审判实验解释法律,而按照他们的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启示去解释法律。根据第三六七条对我们提出控诉,是因为我们指责这些宪兵有下面这种行为:如果这种行为确已发生,就会引起公民对他们的鄙视和憎恨。如果你们按照检察机关的意旨解释“憎恨和鄙视”这两个词,那末,只要第三七〇条还有效,出版自由就会完全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报刊怎么能履行自己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呢?只要报刊向舆论揭露这种逞凶肆虐的行为,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而且如果按照检察机关的愿望办事,还要被判处徒刑、罚款和剥夺公民权;只有下述情况例外,即报刊可以公布法庭判决,就是说,只有当揭露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揭露。

和第三六九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上述法律条款(至少是根据检察机关的解释)是多么不适合于我们今天的情况。第三六九条规定:

“至于通过外国报纸而成为举世周知的诽谤,凡将这些文章寄往报社者……或协助这些报纸运入国内和在国内散发者,均应交付法庭审判。”^①

诸位先生!根据这一条法律,检察机关就必须每日每时把普鲁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士王国的邮政官员交付法庭审判。难道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哪一天普鲁士邮局不在由于递送某种外国报纸而协助“运入和散发”检察机关所认为的那种诽谤吗？但是，检察机关并没有想到对邮局提出控诉。

其次，诸位先生，请你们注意，这些条款是在这样的時候制定的：当时由于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在报刊上不可能对官员进行诽谤。因此，按照立法者的意思，这些条款应该是防止对私人而不是对官员的诽谤，这些条款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自从获得出版自由时起，官员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举世周知的事情；这就根本改变了整个情况。正是现在，当旧的法律和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之间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应该挺身而出，对旧的法律作新的解释，使它适合于新的情况。

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检察机关自己承认，对你们来说，诸位先生，最重要的是——不管第三七〇条怎样规定——实据问题。因此，他们也就企图削弱我们所援引的以证人的供词为基础的实据。我们看一看“新莱茵报”上那篇被指控的文章，就可以确信，事实是否证实了该文所提出的指责，这些指责是否真的含有诽谤的成分。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有六七个宪兵来到了安内克的住宅，他们一进门就马上粗野地把女仆推开”，等等。

诸位先生，你们已听到安内克关于这一问题的供词。你们还记得吧，我曾想专门就粗野地对待女仆的问题再向见证人安内克提出一个问题，但审判长认为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这一事实完全能够成立。我现在要问你们：我们在这一点上诽谤了宪兵吗？

再往下看：“在前室里，他们不但催逼，而且动起手来。有一个

宪兵把一扇玻璃门打得粉碎，他们把安内克推下楼去。”诸位先生，你们已经听到见证人安内克的供词；你们会记得见证人埃塞尔的叙述吧，他谈到了宪兵是怎样把安内克从屋中“匆匆”带出并推进马车的。诸位先生，我要再问一次：这里有什么诽谤呢？

最后，在文章中有一处未经逐字证实。这就是下面的一段：“这四个法庭的得力骨干中，有一个一早起来就喝了不少‘精神’^①、甘露和烧酒，走起路来已经有点摇摇晃晃。”

诸位先生，我同意一点，就是根据安内克的话的正确意思，能成立的只是：“根据宪兵的行为断定，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是醉汉。”也就是说，能成立的只是宪兵的举动像醉汉。但是，诸位先生，请你们注意我们在两天以后对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的反驳的答复：“要说侮辱，也许只侮辱了一位宪兵先生；报道中说这位先生一早起来就喝得有几分清意，有点摇摇晃晃。但是，如果审讯证实——我们毫不怀疑这一点——当局的代表先生们确曾对被捕者态度粗野，那末，在我们看来，我们当时只是以极其关怀的心情和报刊应有的公正态度，并且也是为了我们所责难的先生们自己的利益，指出了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可是，现在检察官却把这种为博爱精神所驱使而指出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的做法说成是侮辱！”¹⁹³

诸位先生，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出，我们是坚决主张对上述事实进行侦查的。如果没有进行侦查，这不是我们的过失。至于谈到对酗酒的责备，那末，请问，如果有人说什么普鲁士王国的宪兵喝酒有些过度，这对他来说，有什么了不起呢？这能不能叫做诽谤？关于这一点，我愿意向全莱茵省的舆论界请教。

① 双关语：《Geist》意指“精神”，同时也指“烈性酒”。——编者注

这些所谓的被诽谤者甚至没有被指出名字，没有被确切指明是谁，检察机关怎么能说这是诽谤呢？这里指的是“六七个宪兵”。他们是谁？他们在什么地方？诸位先生！你们是否知道，确实有某个宪兵由于这篇文章而受到了“公民的憎恨和鄙视”呢？法律明确地要求确切指明被诽谤者是谁；但是，在被指控的文章的那一段话中，任何一个宪兵都不可能看出对自己的侮辱，顶多是整个普鲁士王国宪兵队可以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它能够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是因为报上写着：这一团体的成员采取非法行动和粗野态度，却逍遥法外。但是，诸位先生，不能认为对普鲁士王国宪兵态度粗野的一般指责是犯罪。我要求检察机关给我指出，法律中有哪一条规定了对普鲁士王国宪兵队的侮辱、詈骂、诽谤（如果这里一般谈得上诽谤的话）是有罪的。

检察机关认为，被指控的文章只是不可遏止的诽谤狂的一个证明。诸位先生，这篇文章你们已经读过了。你们是否在这篇文章中发现，我们把当时科伦所发生的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违法行为看成是孤立现象，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这些事件，为了发泄我们对下级官员的所谓仇恨而大加渲染呢？相反地，我们不是指出，这些事实是那时反动派在整个德国同时进行的突袭长链上的一个环节吗？难道我们仅限于攻击科伦的宪兵和检察机关而没有力求揭露事情的本质，分析事情的根源，想到柏林的秘密内阁¹⁹⁴吗？当然，攻击柏林的大秘密内阁，并不像攻击科伦的小检察机关那样危险，今天我们出庭受审，就是这一事实的证明。

请你们看一看文章的结尾。那里写道：“总之，行动内阁所采取的行动，中间派左翼内阁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汉泽曼先生一扮演

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

诸位先生，也许你们还记得去年8月间所发生的事件吧，还记得汉泽曼先生怎样成为多余的人而被“解职”（不错，是在体面的自愿退职的形式下），普富尔—艾希曼—基斯克—拉登堡的内阁，道道地地的“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是怎样替换了他的吧。

再往下看：“柏林的左派应该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它是能够放心地让左派在议会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议会外解除了3月19日革命的武装，它是会在议会里大胆地承认这一革命的。”

这一见解是多么正确，当然用不着我来证明。你们自己也知道，当左派的威力在议会内增长起来的时候，人民党的威力却在同等程度上在议会外被消灭了。为了向你们表明革命确实被解除了武装，旧政权确实占据了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阵地，我是否还需要向你们列举一些事实呢？这些事实如下：普鲁士丘八在无数城市的兽行至今未受到惩办，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实行戒严，在很多场合下解除了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最后，弗兰格尔向柏林举行了英勇的进军。

最后是一个光辉的预言：“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

这个预言一字不差地应验了！左派终于在议会里获得了多数的那一天，成了他们实际失败的一天。正是左派在议会里所获得的胜利，引起了11月9日的政变，国民议会开会地点的变更和延期举行，最后又导致了国民议会的解散和钦定宪法的颁布。当左派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确实在议会外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诸位先生,这种一字不差地被证实了的政治预言,是我们从在整个德国同时也在科伦发生的暴行中得出的结果、总结、结论。既然如此,还有人敢说这是盲目的诽谤狂吗?我们的罪行就是正确地指出了确凿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而为了对这一罪行负责,今天我们出庭受审。诸位先生,整个案件实际上不就是这样的吗?

总之,诸位陪审员先生,此刻你们必须在这里解决莱茵省的出版自由问题。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末,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如果你想这样做,那你就宣判我们**有罪**吧!

发表于1849年2月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2月14日“新莱茵报”第221号,并印成单行本“两个政治审判案”(1849年科伦“新莱茵报”出版科出版)发表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 委员会的审判¹⁹⁵

马克思的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如果本案是在12月5日以前起诉的话，检察机关提出的控告我还能够理解。而现在，在12月5日以后，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蹂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

检察机关的代表根据什么来批评国民议会，批评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呢？根据1848年4月6日和8日的法律。但是，当政府在12月5日擅自确定了宪法，并迫使国家接受新的选举法的时候，它干了什么勾当呢？它蹂躏了1848年4月6日和8日的法律。这些法律对于政府的拥护者来说已不复存在了，——为什么对政府的反对者还应当存在呢？12月5日政府站到了革命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到了反革命的立场上。对于它，只存在着革命者或者同谋者。它自己把所有依靠现行法律、捍卫现行法律免遭任何破坏的公民群众都变成了叛逆者。在12月5日以前，对国民议会开会地点的变更、对国民议会被强行解散、对柏林的戒严，可以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而在12月5日以后，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些措施成了反革命的开端，因此允许采取一切斗争手段来反对那个本身已不

再承认那些使它成为**政府**的条件的派别，既然它本身已不再承认这些条件，所以国家也就不能再承认它是政府了。

诸位先生！国王本来至少能够保存法制的外表，但是他忽视了这一点。国王可以驱散国民议会，然后委托内阁向全国宣布：“我们决心实行政变——形势迫使我们这样做。形式上我们违犯了法律的规定，但是也有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危机时刻。在这种时刻，就只有一种不可违犯的法律——保存国家。当我们解散国民议会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宪法，所以我们不可能违背宪法。但是，有两个构成法——1848年4月6日和8日的法律。实际上，现在只有一个唯一的构成法——**选举法**。我们号召全国人民根据这一法律进行新的宪举。在这种初选产生的议会面前，我们将作为**责任内阁**出现。我们希望，这一议会将承认政变是出于形势所迫的**救国行动**。它将追认这次政变。它将宣布：我们为了救国而违犯了法律的字句。让议会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吧。”

如果内阁这样做的话，它就有了**形式上的理由**把我们送交你们的法庭审判。国王也就拯救了法制的外表。但是，他不可能这样做，他**不愿意**这样做。

在国王眼里，三月革命是暴力行动。一种暴力行动只能用另一种暴力行动来铲除。内阁既然反对根据1848年的四月法律进行新的选举，也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责任内阁**，也就是撤销了它本来对之负责的那个法院本身。这样，内阁从一开始就把国民议会向人民的申诉变成了空洞的外表，变成了虚构，变成了欺骗。内阁既然发明了一个以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法为基础的第一议院作为立法议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那末它就废除了那些构成法，抛弃了法制基础，伪造了人民选举，剥夺了人民对国王的“救国行动”表示某种意

见的可能性。

因此，诸位先生，不能否认事实，未来的历史学家谁也不会否认这种事实：国王实行了革命，他推翻了现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诉诸被他自己可耻地蹂躏了的法律。当顺利进行革命的时候，可以绞死自己的敌人，但不能对他们作出法庭判决。可以把他们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清除掉，但不能把他们当作罪犯来审判。在实行了革命或反革命以后，不能用已被推翻了的法律去反对这种法律本身的**维护者**。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制伪善，诸位先生，你们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

诸位先生，我已经向你们说过，政府伪造了人民对“国王的救国行动”的意见。尽管如此，人民还是表示**反对国王，拥护国民议会**。第二议院的选举是唯一合法的选举，因为只有这种选举才是根据1848年4月8日的法律进行的。而且，几乎所有赞成拒绝纳税的人都再次被选入了第二议院，许多人是第二次、第三次当选。甚至和我一起被控告的施奈德尔第二也当选为科伦的代表。可见，关于国民议会是否有权决定拒绝纳税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由人民解决了。

但是，撇开这个最高判决不谈。诸位先生，你们大家也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这里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这里根本没有应受你们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权力是现行法律的执行者，只有违犯这些法律或以暴力阻止社会权力去执行这些法律的人才是罪犯。现在的情况是，一个社会权力违犯了法律，另一个社会权力——不管它是怎样的社会权力——捍卫法律。这两种国家权力之间的斗争，既不属于私法范围，也不属于刑法范围。究竟谁有理，是国王有理还是国民议会有理，——这是一个历

史问题。所有陪审员，所有普鲁士法院加在一起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力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历史。因此，我不明白，怎么能够根据 Code pénal（刑法典）把我们带到被告席上来。

这里的问题在于两种权力之间的斗争，而两种权力之间的斗争只有力量^①才能解决——关于这一点，诸位先生，革命报刊和反革命报刊都已经同样地承认了。政府本身的机关报在斗争结束前不久宣布了这一点。“新普鲁士报”——现任内阁的机关报——已颇为明显地承认了这一点。在危机发生前几天，这家报纸大约说过如下的话：现在问题不在于法律，而在于力量；所有的人都将相信，旧的天赋王权还拥有力量。“新普鲁士报”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力量反对力量。它们之间的斗争必然由胜利来解决。反革命已获得胜利了，但是目前还只是演完了第一幕。在英国，斗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驯服工具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来论证他的控告。我曾经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对我们的控告。但是，不瞒你们说，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说，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说给三月的革命指出道路了。

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经过政府同联合

① 双关语：《Gewalt》的意思是“力量”，也是“权力”。——编者注

议会的协商而产生的。有人想用这种办法来保存同旧的法律秩序之间的传统联系，并以些扼杀正是废除了这种秩序的革命。康普豪森一类的人物认为拯救法律发展的外表非常重要。他们是怎样拯救这种外表的呢？通过一系列明显而荒谬的矛盾。诸位先生，请你们试试看，能否在旧的法律观点上停留一分钟！难道单是一个康普豪森大臣，一个**责任大臣**，一个没有官运的大臣的存在，不就已经是非法行为吗？康普豪森作为一个**责任首相**的地位是非法的。这位从**法律观点看来并不存在的官员**竟召集了联合议会，以便利用它来通过法律，但是，这个议会本身并没有**合法的权力**来通过法律。这种自相矛盾、不驳自倒的玩弄形式的把戏竟被称为发展法律和保存法制基础！

诸位先生，我们暂且撇开事情的形式方面不谈。联合议会是什么呢？它是旧的、过时了的社会关系的代表。进行革命正是为了反对这种社会关系。可是，有人却建议让这些被战胜了的社会代表来批准构成法，而这些法律是应当承认、指导和组织革命去反对这个旧社会的！多么荒谬的矛盾！要知道，联合议会已经同旧王权一起被推翻了。

诸位先生，在这里我们面对面地遇到了臭名远扬的**法制基础**。因此，我必须谈谈这个问题，因为人们十分公正地把我们看做法制基础的反对者，因为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应当归功于对法制基础的形式上的承认。

联合议会所代表的首先是大地产。而大地产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基础。与此相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我们的社会，是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全部生存条件，它依赖于商业和工业。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农业是根据

工业原则经营的,而旧的封建主已沦为经营牲畜、羊毛、谷物、甜菜和烧酒等等的工厂主,已沦为像所有商人一样经营这类工业品的人!尽管他们死死抱住自己的旧成见不放,实际上他们正在变成资产者,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买进来,在价格最昂贵的地方卖出去。所以,这些先生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赢利方式证明,他们那种传统的高傲自大完全是虚伪的。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因素是以**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前提的。联合议会代表的就是这种早已不存在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早已不复存在,而这种方式的代表人物虽然死死抱住旧的特权不放,但是他们分享新社会的福利并不比别人少些,并且同样地剥削新社会以自肥。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已经改变了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也要取得政权,它要从代表衰亡社会的利益的人物手中夺取这种政权,因为这种政权的全部组织是在完全不同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于是就产生了革命**。由此可见,革命既反对**专制王权**,反对旧社会的这个最高政治表现,也反对**等级代表制**,因为等级代表制所代表的是一种早已被现代工业消灭了的社会制度,或者最多是些日益被资产阶级社会所超过、排挤和破坏的高傲的**等级残余**。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竟能想出荒唐的主意,让联合议会——这一旧社会的代表——对这个用革命方法确定了自己权利的新社会颁布法律呢?

据说这是为了保存**法制基础**。可是,诸位先生,你们怎样理解保存法制基础呢?保存那些属于前一个社会时代的、由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社会利益的代表人物所创立的法律,——这只能意味着把这种与共同需要相矛盾的**利益提升为法律**。但社会不是

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 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实质上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种保存法制基础**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使那些现在**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私人利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其目的在于强迫社会接受那些已被这一社会的生活条件、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交换以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无效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使那些专门维护私人利益的立法者继续掌握政权；其结果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

这就是信奉法制基础和保存法制基础的真正含义。有人就是依据这种关于法制基础的高谈阔论（这种论调不是有意地欺骗别人，就是无意地自我欺骗）来论证联合议会的召开的，他们强迫这一议会给那个由于革命而成为必需的并由这一革命所产生的国民

议会制造了构成法。现在，他们又想根据这些法律来审判国民议会！

联合议会代表封建社会。与此相反，国民议会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它由人民选举出来，以便独立地制定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应当适应同过去一直存在的政治制度和以往存在的法律发生了冲突的那种生活关系。因此，国民议会从一开始就是自主的制宪议会。如果说它不顾这些竟然采取了协商主义的观点，那末这不过是对国王的纯粹形式上的谦让，纯粹是一种客气。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去研究国民议会是否有权违反人民意愿而采取协商立场的问题。它主张双方都必须抱有诚意，以避免与国王发生冲突。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同联合议会协商通过的4月6日和8日的法律，从形式上说是无效的。从事实上看，这些法律也只有这样一种意义：它们表述和规定了能使国民议会成为人民主权的真正表现的那些条件。联合议会的立法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它使国王不致丢脸地宣布：**我败了！**

诸位陪审员先生，现在我来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检察官的发言。

检察官说：

“国王让出了完全由他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放弃某种东西也不会超过借以表现这种放弃的那种词句的直接含义。但1848年4月8日的法律并没有赋予国民议会拒绝纳税的权利，也没有规定国民议会一定要设在柏林。”

诸位先生！国王所掌握的是**残缺不全**的权力；国王放弃权力是为了拯救他的**残缺不全**的权力。诸位先生，你们都记得，国王即位后曾立刻在科尼斯堡和柏林正式立下誓言，决不同意立宪政体。你

们都记得，1847年，在联合议会开幕时，国王曾庄严地宣誓，说他不容许把一块纸片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之间。可是，1848年三月事件以后，国王在他钦定的宪法中亲自把自己宣布为立宪国王。他把这种毫无根据的异邦呓语——一块纸片放在了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之间。检察机关的代表敢于断言国王是自愿如此露骨地推翻自己的庄严保证吗？国王是自愿在整个欧洲面前承担允许协商或允许宪法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彻底行为的罪名吗？国王作了让步，这是革命迫使他不得不作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遗憾的是，检察机关的代表所作的通俗的比喻什么也证明不了。事实上，如果我要放弃，我就只放弃那一定要放弃的东西。如果我给你们送礼而你们竟根据我的礼单要求我继续把东西送来，那你们就实在太无耻了。但是，在三月事件以后送礼的正好是人民，受礼的是国王。不言而喻，礼物的性质应当由送礼者决定，而不是由受礼者决定，应当由人民决定，而不是由国王决定。

国王的专制权力被摧毁了。人民胜利了。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而人民受了骗。人民受了骗——诸位先生，这一点检察机关的代表本人已经不辞劳苦地向你们证明了。为了反驳国民议会有拒绝纳税的权利，检察机关的代表已详尽地向你们作了说明：如果1848年4月6日的法律中有过某种类似规定，那末，我们在1848年4月8日的法律中就绝对找不到这种规定了。就是说，有人利用了这个间歇时期，以便在两天以后从人民代表手中剥夺在两天以前才赋予他们的权利。检察机关的代表还能更成功地败坏国王的信义吗？他还能更确凿地证明有人想欺骗人民吗？

接着，检察机关的代表说：

“变更国民议会开会地点和延期召开会议的权利是从执行机关的特权中

产生的，并且这是所有立宪国家所公认的。”

谈到**执行机关变更立法议会开会地点**的权利问题，我请求检察机关的代表哪怕是举出一条法律或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下这种说法。例如，在英国，国王本来可以根据旧的历史权利在他所愿意的任何一个地方召开议会。法律并没有规定伦敦是议会的法定会址。诸位先生，你们知道，在英国，最重要的政治自由一般都是由习惯法确认的，而不是由成文法批准的；例如，出版自由就是如此。但是，如果某一个英国内阁突然想起要把议会从伦敦迁移到温卓尔或里士满，那末只要一说出这种想法，就足以使人相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错，在立宪国家中国王有权**延期召开议会**。可是不要忘记，另一方面，在所有宪法中都明文规定，议会会议可以延期**多久**，在多长期限以后又应召开。普鲁士没有任何宪法——它还尚待制定；也没有召开延期举行的议会会议的决定期限——因此，国王也就没有延期召开议会的权利。不然，国王就可以把召开议会的日期推迟十天、十年，以至于无限期地延期。有什么保证能使议会在某个时候召开，或者使议会能毫无障碍地举行会议呢？议会是否能与国王并存是由国王任意决定的，立法权——如果这里一般还谈得上立法权的话——成了虚设。

诸位先生！从这个例子中你们可以看出，用衡量立宪国家现存关系的尺度来衡量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国民议会之间的冲突会导致什么结果。这将导致**承认专制王权**。一方面授予国王以宪法执行机关的权利，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法律、任何惯例和任何根本规定，对国王实行一个宪法执行机关所应受的限制。对人民代议机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应当在**专制国王**统治下起制宪议会

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是**执行权与立法权**相对立，而且宪法的分权原则根本不适用于**普鲁士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王，这一点是否还需要加以说明呢？假定说，你们没有考虑到革命，你们奉行的是正式的**协商论**。可是，即使按照这种理论来说，互相对立的也是两个独立自主的权力机关。不容置疑，在这两个权力机关中，必然是一个消灭另一个。两个独立自主的权力机关不可能同时肩并肩地在**一个国家里**行使职权。这是一种类似化圆为方问题^①的荒诞事情。两个最高权力机关之间的斗争必须用物质力量来解决。可是，我们不准在这里研究协商是否可能的问题。仅仅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两个权力机关相互之间发生关系，是为了签订条约。就连康普豪森本人也设想过条约签订不成的可能性。他曾在讲台上向协商派指出，如果达不成协议，国家将遭到危险。危险本来在于协商的国民议会**对国王所采取的根本立场**，而现在，在事后，人们竟要国民议会**对这种危险负责**，同时，却否认国民议会的这种根本立场，把国民议会变成**制宪议会**！他们想用逃避困难的办法来解决困难！

诸位先生，我认为我已经向你们证明了：**国王既无权变更开会地点，也无权延期召开协商派议会。**

但是，检察机关的代表并不限于分析国王是否**有权变更国民议会开会地点**的问题；他还千方百计地证明这种变更是**适宜的**。他大叫大嚷地说：“如果国民议会听从国王，迁移到勃兰登堡去，难道

^① 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一已知圆的面积；一般指不能解决的问题。——译者注

是不适宜的吗？”检察机关的代表认为，这种行动所以适宜，是由于议会本身的处境决定的。据他说，议会设在柏林是不自由的等等。

可是，难道国王迁移议会的目的不是很明显的吗？难道国王本人不是已经透露了有关这种迁移的所有被正式列举出来的理由的真正含义吗？问题根本不在于讨论是否自由，问题在于：或者解散议会并钦定一部宪法，或者召集唯唯诺诺的代理人建立一个虚设的代议机关。当来到勃兰登堡的议员出乎意外地达到了法定人数时，他们就扔掉了一切假面具，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不过，不言而喻，国王无权宣布国民议会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除了议会本身，谁也不能决定，它究竟有无必要的讨论自由。当国民议会一旦做出了不合国王心意的决议时就宣布议会是不自由的，它无力对它的决定负责，并取消这个议会，——对国王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方便的事情呢！

检察机关的代表还谈到，政府有责任维护国民议会的尊严，使它避免受到柏林居民恐怖主义的损害。

这种论证简直是对政府的一种恶毒的嘲笑。我且不谈人们是怎样对待个别人的，而这些人终究是被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人们对这些代表极尽侮辱之能事，对他们进行最卑劣的迫害，对他们采取某种类似“野蛮的狩猎”¹⁹⁶的行动。但是，我们且不谈这些个别的人。就以对待国民议会的工作来说，人们是怎样维护它的尊严的呢？他们把国民议会的档案交给丘八们任意糟蹋，这些丘八把各个部门的文件、国王的信函、法律草案和各种文稿用来点烟斗、生炉子，丢在地上踩来踩去。

甚至连查封财产时所必需的手续也没有遵守，甚至连清单也没有开，就把档案抢走了。

显然，有人企图消灭人民花了很大代价才得到的一切东西，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诽谤议会，以便毁掉政府和贵族所切齿痛恨的改革计划。在干了这一切勾当以后，还硬说政府把国民议会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是出于对它的尊严的亲切关怀，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现在，我来谈谈检察机关的代表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的**正式效力**问题所提出的论据。

检察机关的代表说，为了使拒绝纳税的决议成为正式合法的决议，议会应该把它呈交**国王批准**。

但是，诸位先生，国王和议会并没有直接关系——代表国王的是勃兰登堡内阁。这样一来，议会就得和这个勃兰登堡内阁——检察官竟然要求干这样荒唐的事情——进行谈判，以便宣布这一内阁犯有叛国罪，以便拒绝向它纳税！除了要国民议会无条件地服从勃兰登堡内阁的一切要求以外，上述要求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检察机关的代表说，拒绝纳税的决议之所以没有正式效力，还由于只有经过**二读**提案才能成为法律。

一方面，对待国民议会不遵守必须履行的**极重要**的形式，另一方面，却要求国民议会遵守无关紧要的**手续**。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某一项不合国王心意的提案通过了一读，但是有人用武器的力量来阻止二读，于是法律依旧无效，因为没有通过二读。检察机关的代表忽略了当时出现的特殊形势，当人民代表在会议厅里通过这个决议时，他们正受到刺刀的威胁。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Habeas Corpus A kte，市民自卫团法¹⁹⁷。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

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犯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

检察机关的代表说：“国民议会不愿意和解”，它“没有寻求和解”。诸位先生，我不知道，这是故意歪曲——我远不愿意设想检察机关的代表会这样做——还是简单地由于不了解情况。

如果说人民因为某种原因而责备柏林国民议会的话，那正是因为它无论如何要实行和解。如果说这个议会的议员本身感到后悔的话，那正是后悔自己太热衷于协商了。正是这种协商热狂使议会渐渐地脱离了人民，正是这种热狂使议会丧失了自己的全部阵地，最后，正是这种热狂使议会在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时候遭到了国王的打击。当国民议会终于想表现意志的时候，它已经处在孤立和无力的状态中，这正是由于它在必要的时候没有意志，并且不善于表现意志。当国民议会背弃了革命并批准了协商论时，当它从革命的国民议会的立场堕落到模棱两可的协商派团体的地位时，它第一次表现了这种协商的热狂。当它把普富尔虚假承认施泰因提出的军令¹⁹⁸信以为真的时候，它的调和主义的软弱性达到了极点。这一军令的公布本身变成了一出滑稽剧，因为它最多不过是弗兰格尔军令的可笑的回声。可是，议会不去超过这个军令，而是双手牢牢抓住这个经普富尔内阁修改后变得软弱无力和空洞无物的军令。为了避免和国王发生任何严重的冲突，议会装出一副向旧的反动军队示威的可怜相来代替真正的示威。实际上连解决冲突的影子都没有，而议会却假仁假义地宣布冲突已经真正解决。这个议会竟这样缺乏斗争欲望，竟这样热心地企求调和，而检察机关的代表却把它描绘成一群爱闹事的莽汉！

我是否还需要指出一个证明这个议会的热心于调和的本性的

征候呢？诸位先生，请你们回忆一下国民议会就停止赎买法^①同普富尔达成的协议。如果议会不能消灭军队中的敌人，它首先应该有农民结成朋友。可是，它也放弃了这种做法。它认为，最重要的，比保存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寻求和解，避免与国王冲突，无论如何要避免冲突。而有人却指责这个议会，说什么它不愿意和解，说什么它没有寻求和解？

甚至当冲突已经爆发时，议会还试图和解。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中间派拥护者翁鲁的小册子¹⁹⁹。从这本小册子中你们应该看出，为了避免破裂，什么办法没有使用过：派代表团去觐见国王，国王却不许他们觐见，个别代表企图说服大臣，而大臣却以贵族的傲慢态度拒绝接见他们；议会想实行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却遭到了耻笑。甚至到最后，只有准备战争一条路可走的时候，议会还力图媾和。而检察机关的代表却责难这个议会，说它不愿意和解，说它没有做过和解的尝试！

在冲突发生以前，甚至在冲突期间，当柏林国民议会还认为同国王的友好协商和和解是可能的并极力促其实现的时候，它显然是沉醉于痴心妄想，它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没有认清自己存在的条件。

国王不愿意和解，他也不可能希望和解。诸位陪审员先生，关于3月间所爆发的，并且以后在国民议会和国王之间继续进行的那种斗争的性质，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里的问题不是内阁和议会反对派之间的普通的冲突，也不是已经当了大臣的和想当大臣的两帮人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个立法议会中的两个政治派

^① 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

别之间的党派斗争。也许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议员或者少数派议员是这样想的。可是，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协商派的意见，而是国民议会所处的实际历史情况，这种情况是由于欧洲革命和因此而引起的三月革命所形成的。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旧社会的相应的政治表现是天赋国王、监护一切的官僚和独立的军队。这一套旧政权机构的相应的社会基础是享有特权的贵族土地占有制及其农奴和半农奴、小规模宗法式的或者在行会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彼此隔绝的等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尖锐对立，而首先是乡村对城市的统治。旧的政权机构——天赋国王、监护一切的官僚和独立的军队——感到：一旦侵犯了旧社会的基础，即享有特权的贵族土地占有制、贵族本身、乡村对城市的统治、乡村居民的依附地位以及和这一切生活条件相适应的法律，如市政条例，刑事立法等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就会从它的脚下消失。而国民议会就是实行了这种侵犯。另一方面，这个旧社会感到：一旦国王、官僚和军队丧失了封建特权，政治权力就会从它手中滑掉。而国民议会就是想消灭这些特权。因此，军队、官僚和贵族联合起来唆使国王实行政变，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国王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是和旧的封建官僚社会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也允许别人推动他去实行政变，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国王是封建贵族社会的代表，正像国民议会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一样。现代资产阶

级社会的生存条件，要求把官僚和军队，把这些过去的商业和工业的统治者降低为商业和工业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交换的简单机构。资产阶级社会不能容忍农业受封建特权的限制，工业受官僚监护的限制。这是同它的自由竞争的生活原则相矛盾的。它不能容忍对外贸易的条件不受国民生产的利益的调节，而受宫廷对国际政策的考虑的调节。它必须使财政管理服从于生产的需要，可是，旧国家却必须使生产服从于天赋国王的需要，使它成为给那些作为王权堡垒和王权社会支柱的人们缝缀的补丁。正像现代工业实际上消灭了一切差异一样，现代社会也必须消灭城乡之间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一切壁障。在这个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不再有等级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些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

因此，天赋王权，这个旧的封建官僚社会的最高政治表现和最高政治代表，不可能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出任何真诚的让步。它的保全自身的本能，它所依赖的站在它后面的社会，将经常驱使它收回已经作出的让步，保存自己的封建性质，冒险实行反革命政变。在每一次革命以后，反革命总是王权赖以复辟的生存条件。

另一方面，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要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唯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

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所以，国民议会只得二者择一：或者对旧社会让步，或者作为独立的力量反对国王。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把**拒绝纳税**说成是一种“动摇**社会基础**”的措施。其实，拒绝纳税与社会基础没有丝毫关系。

诸位先生，一般说来，究竟为什么赋税、同意纳税和拒绝纳税在立宪主义历史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呢？其原因非常简单。正像农奴用现钱从封建贵族那里赎买了特权一样，各国人民也要从封建国王那里赎买特权。国王们在与别国人民进行战争时，特别在与封建主进行斗争时需要钱。商业和工业越发展，他们就越需要钱。但是，这样一来，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也就跟着发展起来，他们所拥有的货币资金也就跟着增长起来，并且也就借助于赋税渐渐从国王那里把自己的自由赎买过来。为了保障自己的这些自由，他们保存了经过一定期限重新确定税款的权利——同意纳税的权利和拒绝纳税的权利。在英国历史中，可以特别详细地探求出这一过程。

所以，在中世纪社会中，赋税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之间的唯一联系。由于这一联系，国家不得不对资产阶级社会作出让步，估计到它的成长，适应它的需要。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同意纳税的权利和拒绝纳税的权利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对管理其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即政府的一种监督。

因此，**部分的拒绝纳税**是每一个立宪机构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每当否决**预算**的时候，都要发生这种拒绝纳税的事件。例行的预算只适用于一定的期限；除此以外，如果议会会议延期召开，那末议会必须在极短的间歇时期以后重新召开会议。在这种条件下，国王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在新议会中没有多数支持内阁，或者国

王没有根据新议会的精神任命内阁以前，否决预算就意味着坚决拒绝纳税。由此可见，否决预算是拒绝纳税的议会形式。在我们所探讨的冲突中，这种形式是不适用的，因为宪法还不存在——它还尚待制订。

但是，像现在所探讨的这种形式的拒绝纳税，即不仅否决新预算，而且甚至禁止缴纳目前的赋税，也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事情。在中世纪就经常采用这种办法。甚至旧的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旧的封建的勃兰登堡各等级也曾经通过拒绝纳税的决议。在现代立宪国家中，更是不乏其例。1832年，拒绝纳税在英国导致了威灵顿内阁的垮台。而且，诸位先生，请注意，在英国并不是议会通过拒绝纳税的决议，而是人民本身以自己的权力宣布并实现了这一行动！而英国是历史上的立宪主义国家。

我决不想否认这一点：使查理一世上断头台的英国革命就是从拒绝纳税开始的。以宣布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告终的北美革命也是从拒绝纳税开始的。拒绝纳税在普鲁士也可能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件的先兆。但是，使查理一世上断头台的并不是约翰·汉普敦，而是他自己的顽固不化，他对于封建等级的依赖性，他想用强力压制新生社会不可抗拒的需要的狂妄想法。拒绝纳税只是国王和人民之间分裂的标志，只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紧张而危险的程度的证明。并不是拒绝纳税引起了分裂和冲突——它只是证明了分裂和冲突的存在。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它将导致推翻现存政府，推翻现存政治制度。但这根本不会触及社会基础。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拒绝纳税正是社会对于威胁其基础的政府所采取的一种自卫手段。

最后，检察机关的代表指责我们，说我们在被指控的呼吁书

中比国民议会本身跑得更远。“首先，国民议会没有公布它的决议。”诸位先生，我是否有必要认真地回答，为什么拒绝纳税的决议甚至在法令汇编中都没有发表呢？

此外，他指出，国民议会并不像我们这样，号召使用暴力，总的说来，它不像我们这样站在革命立场上，而是想坚持合法的基础。

过去，检察机关的代表把国民议会描绘成非法的，现在却又认为它已经合法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把我们描绘成罪犯。可是，如果征税被宣布为非法的，难道我不应当用暴力来反抗用暴力实行的非法行为吗？因此，甚至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也完全有权利以暴力还击暴力。不过，说国民议会想坚持纯粹合法的基础，想坚持消极反抗的立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它的面前有两条道路：或者是革命道路——它没有走这条路，这些先生们不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险，——或者是局限于消极反抗的拒绝纳税。国民议会正是踏上了这一条道路。但是，人民在实行拒绝纳税时必须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国民议会的行为并没有预先决定人民的行为。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利——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且根据自己的自主的权力来行动。比如说，如果某一个国民议会把自己出卖给某一个叛变的政府，人民就必须把两者——既把政府，也把国民议会一起赶走。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利用革命来回答它。这一点人民不需要征得任何国民议会的同意。普鲁士政府企图出卖国家，这一点国民议会本身已经承认了。

诸位陪审员先生，我现在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发言。在国王亲手撕毁了1848年4月6日和8日的法律以后，检察机关的代表

不能再抬出这两条法律来反对我们。这些法律本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它们是联合议会随意捏造出来的。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拒绝纳税的决议，无论形式上和事实上都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在呼吁书中比国民议会跑得更远。这是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义务。

最后，我再说一遍，只是戏剧的第一幕结束了。两个社会——中世纪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将以政治形式继续进行。只要议会重新召开，同样的冲突又将重新发生。内阁的机关报“新普鲁士报”已经预言：当选的还是那批人——这就是说，必须第二次驱散议会。

可是，不管新的国民议会选择什么样的新的道路，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许，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

发表于 1849 年 2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2 月 25 和 27 日
“新莱茵报”第 231 和 232 号；
并印成单行本“两个政治审判
案”（1849 年科伦“新莱茵报”
出版科出版）发表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拒绝纳税案

科伦 2 月 9 日。如果说陪审员前天关于本报一案的判决对报刊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末昨天宣判马克思、施奈德尔、沙佩尔无罪，便对莱茵各法院审理的一切关于拒绝纳税的案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案件的事实本身非常清楚，不应该有任何怀疑。在被指控的那个文件中说：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号召莱茵省各民主团体通过并实施下列措施：

(1) 在普鲁士国民议会本身已经作出拒绝纳税的决定以后，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抗强行征税；

(2) 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

(3) 各地都应该要求地方当局正式声明，它是否承认并愿意执行国民议会的决定。在遭到拒绝时，应该成立安全委员会……市镇委员会如反对立法议会，则应由该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①

这个文件用不着加以解释。不管拒绝纳税的决定有无法律效力，这里的问题显然是唆使暴动和内战。被告也直认不讳，说“敌人”（见第二项措施）一词系指内部敌人，指政府的武装力量。虽然如此，政府当局因为没有任何希望根据 Code（法典）中这一

^① 见本卷第 39 页。——编者注

条来定罪，所以选择了比较温和的起诉条文：号召叛乱和反抗政府当局的代表（见第二〇九条及以下各条）。

于是，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纯政治性的问题：被告是否有权根据国民议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用上述方式号召反抗政府当局、组织武装力量同国家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并且自行任免国家官员。

经过极简短的讨论之后，陪审员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

在作出这种判决以后，拉萨尔和康塔多尔大概很快也会被释放。科伦检察院对待他们的态度，大概不会跟陪审员对待马克思、施奈德尔和沙佩尔的态度不同。

顺便指出，我们明天还要来谈拉萨尔问题。看来，现在有些好心人想把拉萨尔一案拖到下次开庭期（3月）结束时再审理，就是说，再赐给他加上三个月的审前羁押。但是，希望科伦陪审员的判决能戳穿这种仁爱的计划。关于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监狱受到怎样的待遇，我们明天将要报道一些令人愉快的细节。^①

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2月9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2月10日“新莱茵报”
第218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

政治案件

魏玛区消息，2月3日。当天的“法兰克福报”登载了下面的报道：

“我们的第一地方陪审法庭对当前的政治案件进行宣判的日子终于临近了。在审讯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延期以后，据我们所知，法庭终于明确规定于本月15日开庭。开庭后，首先将听取对去年10月间在本地和耶拿被捕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拉弗里博士、罗泰硕士、大学生阿美隆格、奥托博士和文学家耶德的起诉。在当时的大批被捕者中间，检察官能够勉强拼凑一些材料来起诉的，只有这几个人。对这次被捕的魏玛文学家戴茵哈尔特的侦查所提供的材料是如此之少，以致他在刑事法庭牢狱有损健康的条件下蹲了两个月以后，检察官仍然无法对他提出任何控诉。当时被捕的耶拿硕士朗格，在狱中四次吐血，后来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被送到耶拿他的父母那里。此后不久，经过刑事法庭一连三天的审讯之后，于今年1月7日死去了。我们的陪审员将会大吃一惊，因为提交法庭作为控告上述诸人的罪证的，将不是那个大肆宣传和到处谈论的叛国计划，而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希望人民在不久将来的胜利中，不要像在3月里那样幼稚和健忘，让屠杀自己的所有刽子手仍旧留在原来职位上。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一定会马上把这帮反动官吏首先是那帮嗜血成性、虚伪奸诈，而且还被叫做“法官”的司法人，送到宾夕法尼亚监狱²⁰⁰拘留半年，然后再把他们送去修筑铁路和公路，以便作进一步的治疗。）

写于1849年2月9日左右
载于1849年2月10日
“新莱茵报”第21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科伦日报”的分工

科伦 2 月 10 日。上星期我们甚至未能关心一下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最近的邻居，虽然我们很愿意这样做。别的事情——谁都知道是什么事情²⁰¹——占去了我们的全部时间。现在我们就来赶快弥补这个损失，首先看一下同我们毗邻的政论家。

“科伦日报”分工之协调是罕见的。在该报的后一部分，即第三版和第四版，高贵的沃尔弗斯为比利时大肆吹嘘，尽一切可能使亨利五世能重新登上祖宗的宝座并钦定一个“比利时式”的宪法。这一部分我们暂且不谈，现在来看看该报的正面，即第一版。在这一版上，我们的朋友许金占居一个地下室。在这个地下室里，他以散文和诗歌形式把自己的空谈的幻想或幻想的空谈方面的新作提供给爱好者。有趣的“政治对话”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里，天才的作者，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企图从德国教授的猪皮里引出一个麦菲斯托费尔，但是他只引出了瓦格纳²⁰²。在地下室上面的第一层楼上，杜蒙先生开设了宽敞的政治沙龙，由勃律盖曼和施万贝克（不要同魏斯勃劳特混淆起来）这两位大人物招待宾客。勃律盖曼负责哲学部分，负责在各种灾难中拯救原则，负责在一切地震中保护法制基础，负责哀歌体即辞世词和安魂曲。施万贝克负责的是吟诵部分，是高尚的抒情诗、精神的愤慨、颂歌和风暴。他的欣喜若狂的词句，达到了奥林帕斯山的最高峰，它的步伐虽

然并不总是那么稳健，但节奏始终未乱。的确，“科伦日报”所富有的那种谨严的六脚韵，几乎全都出自施万贝克之手。

今天第一个投入我们眼帘的，正好是这个高尚的施万贝克。在一篇 de dato（标明的日期是）科伦 2 月 7 日的论文中，他向我们描述了专制制度的惨痛后果和革命的惨痛后果。

伟大的施万贝克大发雷霆，他埋怨普鲁士人民不是根本没有参加选举，就是选得很糟。

“这个国民议会应该完成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工作；但是这个议会中的一部分人将破坏这一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君主派；另一部分人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们还没有成为立宪派，所以也会破坏这一工作。这两种人之所以都将破坏这一工作，正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君主立宪的拥护者，——这难道还有人怀疑吗？狂风将从对立的两极吹来，被克服了的过去将同遥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展开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谁知道会不会丧失现在！”

请注意，这些经典词句的风格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每一个句子都简短而有力，每一个词都发出精神的愤慨。请你们尽可能生动地设想一下“被克服了的过去”同“遥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之间的斗争。你们谁不会觉得，你们似乎亲眼看到“被克服了的过去”终于赶上了“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它们像两个泼妇一样彼此揪住对方的头发，正是由于一方的不可达到性和另一方的被克服性，当狂风从对立的两极吹来的时候，现在愈来愈多地丧失了！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都是些小事。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些大人物加以评论，那我们就要说：勃律盖曼通常是词不达意，而施万贝克正好相反，是因词害意。

的确，当发现这个不仅受普鲁士国王委托而且也受“科伦日

报”委托来完成建立君主立宪国家这一工作的议会，是由不是太左就是太右的人组成，因而不能实现这个崇高目的的时候，谁能不在高尚的愤慨中因词害意呢？何况这件事发生在“狂风从对立的两极吹来”以及“科伦日报”在“丧失现在”的时候！

人民选举的代表并不喜欢“科伦日报”认为他们“应该喜欢”的东西，这对“科伦日报”说来已经够伤心了。但是，如果人民嘲笑扮演珈桑德拉²⁰³的施万贝克，并且不去从“民族的伟大中心”中选举君主立宪的典范人物，而去选举那些或者已经不再是君主派的人，或者尚未成为立宪派的人，那对于人民来说就更糟了。Tu l' as voulu, Georges Dandin! (你想要的是这个吗？乔治·唐丹!)^①——当被克服了的过去同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之间的强烈冲突使现在濒于灭亡的时候，施万贝克痛苦地这样喊道！

“换句话说，反动的标志和新的革命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断革命的标志，并没有晚一点出现。”

在作出这一卓越的发现以后，珈桑德拉-施万贝克就把视线转到奥地利。施万贝克的视线是经常集中在奥地利的。奥地利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以前曾因维也纳蛊惑宣传的暴戾而感到愤慨，在这里，他现在正在消灭马扎尔人，在这里，高尚颂歌的作者终于表现了一点温情，对那些曾被战地法庭赐予铅弹和火药的人们表现了一点良心上的责备。因此，这位充满预感的先知就在他的每一篇社论中投给奥地利一瞥温柔的目光。

“其实，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指奥地利）绝对的官僚制换成了绝对的民主制，后来又换成了绝对的军事权力，最后仍然是一切如故！”

^① 莫里哀“乔治·唐丹”。——编者注

革命的后果是多么可悲，由于人民永远不听那些没有得到公认的珈桑德拉的话而造成的结局又是多么令人痛心！“最后仍然是一切如故！”固然，梅特涅的传统政府同现在的反革命军事专政有很大的区别；但梅特涅时代的好心肠的奥地利人民的变化尤其大，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充满革命狂热的人民；此外，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反革命总是只会导向更彻底的、流血更多的革命。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最后仍然是一切如故”，暴政依然是暴政。

那些坐在酒吧间空谈政治而照施万贝克的说法却构成“德意志民族伟大中心”的庸人，那些每逢革命遭到暂时的挫折就大喊大叫“起义有什么好处，我们还不是同从前一样”的笨蛋，那些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的渊博的历史专家，——所有这些人如果知道伟大的施万贝克同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那他们定会欣喜若狂。

珈桑德拉对奥地利作了这番必不可少的观察以后，便把视线重新转到普鲁士来，他准备展望一下未来。他按照应有的方式权衡了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的轻重。他依次仔细地审察了君主政体及其属僚、弗兰格尔、戒严（他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解除戒严）和“普鲁士同盟”²⁰⁴。接着他说：

“但是，综上所述，我们仍然应该承认，从数量上说，我们的反动派并没有多大力量。糟糕的是人民的伟大中心非常习惯于专制制度，甚至根本不能理解自治问题，而这一切又仅仅是因为懒。你们这些大批没有参加选举的人……你们都是专制制度的真正拥护者！……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懒得不愿参加自由的政治生活的人民更讨厌的东西了。”

“德意志人民的伟大中心”，你们不配有自己的施万贝克！

像下面所说明的，这个“懒得不愿参加自由的政治生活”的“人民的中心”，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这是多么痛心的自供

啊！但是，这种痛心很快就因为对民族伟大中心的可耻的“淡漠”所表示的自满的精神愤慨而减轻了。

“但是，更糟得多的是革命的可悲的后果。在我们的人民中，幻想家、空想家、狡猾的煽动家（天真的自供！）以及没有任何政治认识的轻率的群众，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要多得多。1848年第一次向我们表明：在这个平静、正直、思想健全的人民中间隐藏着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个人民怀有某种模糊的革命倾向，人们开始把实行革命这种方便的手段（无疑，比起在“科伦日报”上写思想深刻、充满颂歌的社论来要“方便”得多）当做……万应灵药。”

“中心”太懒，而外围、“贱民”、“轻率的群众”又太急。“狡猾的煽动家”同“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结合在一起，当然不能不在施万贝克的心灵中引起忧郁的预感，何况资产阶级又受着“懒”和“淡漠”的支配！

“事物的自然过程就是如此：打击引起反击。”

珈桑德拉在作出这一新的、伟大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儿童动人的变奏曲的主题的哲学发现以后，就来结束自己的文章，并且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只有当民族的伟大中心，当有力量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统一和强大到足以制止这种右倾和左倾的时候，才能打开通往真正自由的政治生活的道路。我们手头有一份德国北部的报纸，上面……写道：‘……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对两个极端派即左派和右派取得了胜利，未来完全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担心这种高兴暂且还为时过早。如果这还需要证明，那末就看普鲁士的选举吧。”

这种哀泣表现出当代珈桑德拉对这个不愿按“科伦日报”指示前进的邪恶世界的堕落所产生的极大的精神愤慨。在“被克服了的过去”、“遥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和可疑的“现在”这些方面，施万贝克研究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决定性的斗

争不是发生在封建官僚的君主制同资产阶级之间，也不是发生在资产阶级同人民之间，而是发生在君主制同人民之间，发生在**君主派同共和派**之间，而**资产阶级，立宪派**则退出了战场。

我们不想花很多时间去讨论，资产阶级是不是真的处在斗争之外，它这样做是因为懒呢还是因为弱，也不想去讨论普鲁士的选举说明什么。单是“科伦日报”承认如下一点就已经够了：在现在正在进行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站在最前列，引起斗争的利益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斗争的焦点在于要君主专制政体还是要共和制。

现在请大家翻一翻去年 11 月以来的“新莱茵报”，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每一号上和在每一个场合，如在维也纳反革命胜利时，在柏林反革命胜利时以及在钦定宪法颁布时，都曾经写过，看看我们是不是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这一长篇论文和在初选以前写的其他一系列论文中曾经非常详细地说明过：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怯懦决定了反革命的可能，而反革命则把资产阶级推在一旁，使封建社会的残余同现代社会的一个极端之间，君主制同共和制之间的直接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三个月以前认为是德国整个革命进程的历史必然结果的东西，“科伦日报”却以混乱、模糊的预言形式把它重新提出来，当做江湖术士对即将于 3 月 5 日举行的选举的结果之预测。这些混乱、模糊的预言竟被当做一种发现，立即作为标上△记号的浮夸傲慢的社论推荐给善意的读者。天真的“科伦女人”啊！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2 月 10 日
载于 1849 年 2 月 11 日“新莱茵报”
第 219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拉 萨 尔

一

科伦 2 月 10 日。昨天我们曾经答应^①回头再谈谈拉萨尔问题。拉萨尔被关在杜塞尔多夫监狱已经十一个星期，可是直到现在才结束了对一些简单的、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的侦查，直到现在高等法院才作出决定。事情竟被轻而易举地弄到这种地步：如果高等法院和检察院想使用最大限度的注定期限，那它们就可以把这个案子拖到杜塞尔多夫陪审法庭下次开庭期结束的时候，从而使囚徒再享受三个月的审前羁押！

这算什么审前羁押呵！

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科伦各民主团体的代表团向总检察官尼科洛维乌斯呈递了一份由数千公民签名的请愿书，其中提出了下列请求：（1）加速对关在杜塞尔多夫狱中的政治犯案件的侦查；（2）在审前羁押期间对待政治犯要有礼貌。尼科洛维乌斯先生答应尽可能注意这些合理的要求。

但是，下面就有一个例子，说明杜塞尔多夫监狱怎样对待总检察官先生，怎样对待法律以及最普通的礼貌。

1 月 5 日，一个狱吏粗暴地把拉萨尔辱骂了一顿，末了还跑到

^① 见本卷第 308 页。——编者注

典狱长那里去诉苦，硬说拉萨尔辱骂了他。

过了一小时，典狱长在法院侦查员陪同下来到拉萨尔的牢房，一进门也不向拉萨尔打打招呼，就为刚才的事情对他进行申斥。拉萨尔打断了他的话，指出有教养的人进到别人房间时是要打招呼的，他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典狱长遵守这个礼节。

典狱长先生认为这太过分了。于是就气势汹汹地向拉萨尔逼近，一直把他挤到窗口，并且挥动拳头，放开嗓门厉声喊道：

“听着，你在这里是**我的**一个犯人，仅仅是一个犯人；你必须服从监狱规则，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下令把你关进**禁闭室**，可能你还要受到**更坏**的待遇！”

拉萨尔再也忍不住了，他向典狱长声明，典狱长没有任何权利根据监狱规则来处罚他，因为他是未决犯；叫喊是没有用的，也证明不了什么；虽然这所房子是监狱，但**这里**总还是**他的**房间，如果典狱长（用手指着他）到**他这里来**，那必须向他打招呼。

这时典狱长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冲到拉萨尔面前，向他挥动着手臂喊道：

“不准乱指！不然我就马上给你一个耳光，让你……”

拉萨尔立即请法院侦查员做这件闻所未闻的无礼举动的见证人，并且请求他保护。法院侦查员劝典狱长冷静一点，但是典狱长还是三番五次地嚷着要打拉萨尔的耳光，后来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在发生了这样一件有教益的事件以后，拉萨尔就要求国家检察官冯·阿蒙对典狱长莫莱特先生提出控诉。的确，典狱长的暴行不仅是粗鲁的举动和严重的侮辱，同时也是越职。

冯·阿蒙先生回答说，对于狱吏的越职问题，不经行政当局预先批准不能提出控诉。他建议拉萨尔去找政府，同时还引证了

1844年的某个旧敕令。

所谓钦定宪法的第九十五条宣称：

“对因越职而违反法律之文武官员提出控诉，不需经当局预先批准。”

这同一宪法的第一〇八条又明文规定，废除一切与该条款相矛盾的法律。但是拉萨尔向国家检察官提出第九十五条也无济于事，——冯·阿蒙先生固执地坚持他对权限争议问题的看法，并且临走的时候向拉萨尔提出一个宝贵意见：“您大概忘记了，您是一个未决犯！”

我们说，这个所谓宪法仅仅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完全不是用来对付官老爷的，难道说得不对吗？

总之，用打耳光、关禁闭和体罚（因为这正是莫莱特先生留作后备的那种“更坏的待遇”）来威胁，——这就是向代表团许诺的对待政治犯“要有礼貌”！

顺便指出，根据法律，拘留狱一定要同徒刑狱分开，拘留狱的囚犯所遵守的制度应当同刑事犯所遵守的制度完全不同。但是杜塞尔多夫没有专门的拘留狱，于是未决犯在被非法关进徒刑狱以后，还必须遵守为已被判决的囚犯所规定的狱规，也可以被关进禁闭室和受到体罚！为了对拉萨尔达到这个值得赞扬的目的，莫莱特先生召集了一次纪律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应当使拉萨尔先生获得这些享受。但是看来侦查员和检察官先生还能冷静地对待这一切，或者是躲到权限争议问题的后面去了！

拉萨尔已经向总检察官发出呼吁。我们也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公诸于世，希望舆论界支持在押人的申诉。

此外，我们听说，对拉萨尔单独囚禁终于取消了，他现在至少是同康塔多尔关在一个牢房里。

二

科伦 3 月 3 日。大家都还记得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案件：一个不幸的少女因被控杀害婴儿而被送交陪审法庭。陪审员判她无罪。接着她又因隐瞒怀孕而被送到违警法庭。在公众的哄笑声中，高等法院关于送交法庭审判的决定只好宣布无效。

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正在走着它的光荣的先驱者的老路。

由于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 2 月 22 日的决定，拉萨尔、康塔多尔和韦耶尔斯以发表叛逆性的言论的罪名被送交陪审法庭。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同一个高等法院却又作出决定，再次把拉萨尔交给违警法庭进行审判，理由是他在诺伊斯的演说²⁰⁵中号召“以暴力反抗官员”（构成第二〇九、二一七条所指的罪行）。

我们先来核对一下事实。

在那些构成把拉萨尔送交陪审法庭审判的理由的情节中，同样也有这篇在诺伊斯发表的演说。高等法院指出，拉萨尔在这篇演说中“号召武装反对政府当局”（构成第八十七、九十一、一〇二各条所指的罪行）。

可见，为了同一篇演说，拉萨尔既被送交陪审法庭审判，又被送交违警法庭审判。如果陪审员把他开释，他还要受到违警法庭的审判。如果违警法庭不审判他，那他无论如何还要受到审前羁押，直到违警法庭判他无罪为止。总之，不论陪审员如何判决，

拉萨尔总是得不到自由的，而普鲁士国家也就得救了。

我们再说一遍，为了同一篇演说，拉萨尔既被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送交陪审法庭审判，又被送交违警法庭审判。事实原来是同一个。

但问题不仅仅在这里。

如果我在演说中“号召武装反对政府当局”，难道这不就是说我在号召“以暴力反抗官员”吗？要知道，政府当局的存在正是通过它的官员、军队、行政机关、法官表现出来的。如果撇开政府当局的这个肉体，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想像，一个虚名。不以暴力反抗它的官员，就不可能推翻政府。如果我在演说中号召革命，那末我用不着再加上一句：“你们要用暴力反抗官员”。如果照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的办法去做，那末凡是因为唆使推翻政府而根据第八十七、一〇二条被送交陪审法庭审判的人，以后都必须一律根据第二〇九、二一七条再送交违警法庭审判。

难道在 Code d' instruction criminelle²⁰⁶ 中不是已经有一条作了下面的规定吗？

《Toute personne acquittée légalement ne pourra plus être reprise ni accusée à raison du même délit》？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

“凡依法宣判无罪者，不得因同一违法行为再次送交法庭审判或对他起诉。”

但是，不论是在陪审员宣判无罪之后因同一违法行为把我送交违警法庭审判，还是从一开始就宣布陪审员的判决无效，就是说，从一开始（1）就一方面把我送交陪审法庭审判，（2）同时又因同一违法行为把我送交违警法庭审判，——不管怎样，这丝毫

也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

我们要问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是不是过分的爱国热忱使它的司法视觉迟钝了？我们要问法院侦查员艾贝迈尔，他对拉萨尔是不是完全不怀私仇？最后，我们要问杜塞尔多夫检察机关的某位官员，他是不是说过：“宣判康塔多尔和韦耶尔斯无罪对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拉萨尔我们无论如何要抓在自己手里。”

我们怀疑拉萨尔是否也愿意长期被载入 par excellence（道地的）“国家臣民”的清册中。

拉萨尔一案对我们说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一位同胞、一位党的朋友的自由和权利。其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这里涉及这样一个问题：**陪审法庭处理政治犯罪的特权**是否要同一切所谓**三月成果**遭到同样的命运，领取薪俸的法官今后是否还可以把不领取薪俸的陪审法庭任意贬到空头法庭的地位，就是说，如果陪审员认为某一事实不是政治犯罪或违法行为，那他们是否可以把这一案件立即作为普通的违法行为交给违警法庭审理。究竟为什么把这些罪行和违法行为从普通法庭职权范围中划出来交给陪审法庭呢？显然是人们没有考虑到领取薪俸的法官们的廉洁和奉公守法，而设想他们在政治审判案中会保护任何东西，只是不保护被告的利益。

关于拉萨尔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谈。^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2 月 10 日
和 3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载于 1849 年 2 月 11 日和 3 月 4 日
“新莱茵报”第 219 和 237 号

^① 见本卷第 531 页。——编者注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²⁰⁷

—

科伦 2 月 14 日。我们一再指出，在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以后出现的甜蜜幻想，例如幻想达到各族人民的普遍友爱，建立欧洲联邦共和国和实现永久和平，实质上只是掩盖了当时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们极端的张惶失措和庸碌无能。这些人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为了捍卫革命需要做些什么；他们不能或者不想采取任何真正革命的措施；一些人的故步自封和另一些人的反革命阴谋——这一切就使得人民仅仅得到的只是一些温情脉脉的漂亮话，而不是采取革命行动。夸夸其谈的恶棍拉马丁，就是这个在诗意盎然的美丽辞藻和华而不实的悦耳言词掩盖下背叛人民的时代的典型人物。

进行过革命的各族人民都懂得，他们当时由于轻信浮华的言词和虚夸的保证，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结果不是革命的安全得到保障，而是到处成立了暗中破坏革命的反动议会；不是实现了过去在街垒上所许下的诺言，而是反革命在那不勒斯、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得胜，米兰的陷落和反对匈牙利的战争发生；不是各族人民结成兄弟同盟，而是“神圣同盟”在英国和俄国的庇护下重新恢复。那些在 4 月和 5 月里还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些浮华言词的人，现在只好满面羞愧地回味他们当时怎样受了这些傻瓜和恶

棍的欺骗了。

沉痛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欧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词和美好的意愿，而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和流血的斗争；问题不在于欧洲各族人民在一个共和国的旗帜下结成同盟，而在于革命的各族人民结成反对反革命民族的同盟，这种同盟不是在纸上，而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实现。

这种沉痛的、然而却是必要的经验使整斗西欧不再相信拉马丁的漂亮话了。相反地，在东欧却还有一些貌似民主和革命的派别，继续做这种漂亮话和柔情蜜意的应声虫，继续宣扬关于欧洲各族人民友爱的福音。

这些派别（我们撇开某些愚昧无知的德国空想家如阿·卢格先生等等不谈）就是各斯拉夫民族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

我们看到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的纲领，是一本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著”1848年克顿版²⁰⁸。

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小册子。

我们就来看看，巴枯宁怎样在他的呼吁书中一开头就陷入了去年3月和4月的幻想：

“革命生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高呼憎恨旧的压迫，高呼同情和热爱一切被压迫民族。各族人民……终于体验到了旧的外交所带给人类的耻辱，并且已经认识到，只要欧洲还有一个民族受着压迫，各民族的幸福安宁就无法得到保障……打倒压迫者！——响起了一致的呼声。光荣归于被压迫的人们，归于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各族人民！不应当再进行侵略战争，但必须把最后一次战争，即争取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光荣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废除各种暴君会议基于所谓历史的、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强行划定的各种人为的界线！除了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

线，即根据正义和民主的精神划定的自然界线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界线。这就是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第 6 页和第 7 页）

从这段话中我们已经完全可以重新看到革命最初几个月中的那种一味耽于幻想的狂热。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实际存在的妨碍这种普遍解放的障碍，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其差别如此之大的各个文明发展阶段，以及由这一点所决定的各族人民的不同的政治要求。“自由”一词代替了这一切。这里根本没有谈到现实，即使不得不谈一谈的时候，现实也被描绘成为由那些“暴君会议”和“外交家们”任意制定的某种绝对不中用的东西。书中简单地把绝对不能违反的、无条件地要求“自由”的冒牌的人民意志同这种可憎的现实对立起来。

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中间谁更有力。冒牌的人民意志所以如此可耻地受到欺骗，正是因为它轻信那种脱离实际存在的关系的如此荒诞的抽象概念。

“革命已经以其充分的权力宣布解散那些专制国家，如普鲁士邦……奥地利……土耳其帝国……和暴君们的最后希望——俄罗斯帝国……革命已经宣布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总联邦。”（第 8 页）

在这里，在西方，我们真正应该感到奇怪的是，当这一切美好计划刚一付诸实现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居然还有人认为这些计划是某种值得赞扬的伟大的东西。要知道，糟糕的是，正是由于：革命虽“以其充分的权力宣布解散那些专制国家”，但同时它又“以其充分的权力”根本不去动手实现自己的法令。

当时召开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完全赞成这些幻想。请听：

“我们亲身体验到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和血统关系。我们宣誓，决不

容许别人再把我们的命运分开。我们诅咒那个长期使我们成为它的牺牲品的政策，我们自己给自己确立了完全独立的权利，并庄严地宣誓，一切斯拉夫民族今后都应该获得这种独立。我们承认波希米亚^①和莫拉维亚的独立……我们向德国人民，向民主的德国伸出友谊之手。我们代表我们那些居住在匈牙利的人，向马扎尔人，向我们种族的凶恶敌人建议结成兄弟同盟……在我们的解放同盟中，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那些呻吟在土耳其人压迫之下的兄弟。我们庄严地诅咒那个曾经三度瓜分波兰的罪恶政策……我们说出了这一切，我们要同各民族的一切民主主义者(?)一起要求：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第10页)

民主泛斯拉夫主义居然到现在还提出这些要求：

“当时我们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正义和人道完全在我们这一边，而在我们敌人那一边的只是违法和野蛮。这不是我们所醉心的那种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唯一正确和必要的政策即革命政策的思想。”

“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布拉格代表大会以后许多斯拉夫人所起的作用，本来应当打破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幻想；他们本来应当认识到，用一切善良愿望和美好幻想丝毫也不能左右铁的现实，他们的政策同法兰西共和国的政策一样，很少能说是“革命的政策”。但是，他们直到现在，即1849年1月，还向我们端出那一套陈词滥调，殊不知由于

^① 即捷克。——编者注

实行了血腥的反革命，西欧已对这一套陈词滥调的内容绝望了！

关于建立“各族人民的普遍的兄弟同盟”和划定“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线”问题，我们再说一句话。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主的。

根据**道德的理论**，这两个共和国本来应当是“兄弟的”和“结成联邦的”国家，但是，由于得克萨斯问题，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战争；美国人民的“主权意志”依靠美国志愿军的勇敢，从“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出发，把自然确定的边界线向南推移了几百英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次战争虽然有力地打击了巴枯宁以“正义和人道”为依据的理论，但它完全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进行的。巴枯宁是否要谴责美国人进行这种“侵略战争”呢？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要顺便指出，这种不顾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而硬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建立各族人民普遍的兄弟同盟的理论，早在革命前很久就受到了“新莱茵报”编辑们的批评，而且当时批评的是这些编辑的好友——英国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这可以在当时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民主报刊上找到证明。²⁰⁹

至于专门谈到泛斯拉夫主义，我们在“新莱茵报”第 194 号^①上已经指出，如果撇开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真诚的自我欺骗不谈，泛斯拉夫主义的目的实际上无非是要给那些在历史、文学、政治、贸易和工业方面都依附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零散的奥地利斯拉夫人一个据点，这个据点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由斯拉夫人的多数所统治的、依附于俄国的奥地利联合君主国。我们已经论证过，那些几百年来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必然要成为反革命的民族，而且它们 在 1848 年革命中所采取的全部立场的确都是反革命的立场。既然民主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不加区别地要求一切斯拉夫人都获得独立，我们应该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指出，对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政治上的浪漫和温情是可以原谅的。除了波兰人以外（由于很明显的的原因，波兰人不是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些人全都属于这样的民族，这些民族或者像南方斯拉夫人一样，由于其全部历史状况必然是反革命的民族，或者像俄罗斯人一样，距离革命还很远，因此它们至少在目前还是反革命的。这些由于在国外所受的教育而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派别，企图把自己的民主主义观点同自己的民族感情调和起来，大家知道，这种感情在斯拉夫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因为现实世界，他们本国的实际状况不能为这种调和提供任何根据，或者只能提供一些假想的根据，所以除了彼岸的“梦想的空中王国”²¹⁰、美好愿望的世界，幻想的政治以外，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如果克罗地亚人、潘都尔兵和哥萨克人是欧洲民主的先锋队，

^① 见本卷第 200—204 页。——编者注

如果西伯利亚共和国大使在巴黎呈递国书,那该多好啊!当然,这是美妙的前景;但是,就连最激烈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也不要要求欧洲民主必须等待这种前景的实现,目前恰好正是宣言专门为其要求独立的那些民族,是民主的特别凶恶的敌人。

我们重复一遍,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充其量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外,没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

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

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命运正是这样。捷克人(我们把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也算在内,尽管他们的语言和历史有所不同)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查理大帝时代起,波希米亚就并入了德国。有一个短时期,捷克民族曾经获得了解放,建立了大莫拉维亚帝国,但是很快又被征服了,在五百年中它一直像皮球一样,在德国、匈牙利和波兰之间被抛来抛去。此后,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最后并入了德国,斯洛伐克地区则留给了匈牙利。这个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还要要求独立吗?

所谓南方斯拉夫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伊利里亚的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威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绍克人²¹¹的历史何在呢?从十一世纪开始,他们就连政治独立的最后一点影子也丧失了,他们分别受到德国人、威尼斯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现在竟有人想把这些破烂的碎片拼凑成一个坚固、独立并且有生命力的民族!

不仅如此。如果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像波兰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一样，是一个紧密的实体，如果它们能够联合成一个拥有一千二百万到两千万人口的国家，那末他们的要求倒会有一些认真的性质。但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已经像一个楔子楔入他们中间，直抵喀尔巴阡山的最边缘，差不多已到达黑海；他们用一条宽达六十到八十英里的广阔地带把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同南方斯拉夫人隔开。居住在这个地带以北的五百五十万斯拉夫人，同居住在这个地带以南的五百五十万斯拉夫人，被一个由于历史和必然性的缘故而成为同盟者的一千万到一千一百万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紧密实体分开了。

但是，为什么五百五十万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不能建立一个国家，另外的五百五十万南方斯拉夫人也不能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一起建立另一个国家呢？

请随便拿一张精确的语言分布图来，看一看捷克人和在语言上与捷克人相近的邻族的分布情形。他们像楔子一样插在德国中间，但两边都受到德国人的压迫和排挤。波希米亚三分之一的居民讲德语；在波希米亚捷克人和德国人的比例是 34 比 17。但是正是捷克人应当成为计划中的斯拉夫国家的核心，因为莫拉维亚人也同德国人混杂得很厉害，而斯洛伐克人则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混杂在一起，在民族关系上他们已经完全衰落了。如果到头来这个国家仍然受德国城市资产阶级的统治，那这算是什么斯拉夫国家呢？！

南方斯拉夫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把德国和匈牙利同亚得利亚海隔开，但德国和匈牙利出于“地理上和贸易上的考虑”，是不能让别人把它们同亚得利亚海隔开的。诚

然,这种地理上和贸易上的考虑对于巴枯宁的幻想来说并不是一种障碍,然而这种考虑毕竟是存在的,并且对于德国和匈牙利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从但泽到里加的波罗的海海岸对于波兰一样。在问题关系到各大民族的存在和其一切资源的自由发展的地方,悲天悯人地对某些分散在各个不同地方的德国人或斯拉夫人表示关切,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何况这些南方斯拉夫人到处都同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混杂起来了,在这里,随便翻开语言分布图就会看出,计划中的南方斯拉夫国家会变成许多零零碎碎的小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整个国家也要落入的里雅斯特、阜姆、萨拉的意大利资产者和阿格拉姆、莱巴赫、卡尔施塔特、泽姆林、潘切沃、威斯基尔欣^①的德国资产者手中!

但是,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不能并入到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摩尔拉克人²¹²和保加利亚人中去吗?当然,如果除了上述的困难以外,奥地利边疆居民对居住在沙瓦河和乌纳河东岸的土耳其斯拉夫人没有世仇的话,这样做是可能的。但是,尽管他们属于同一个族系,这些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把对方看作骗子手和土匪的人彼此之间的仇恨,甚至比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之间的仇恨还要大得多。

其实,如果能够帮助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获得他们的所谓“权利”,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处境会十分令人惬意!那样一来,在西里西亚和奥地利之间,会插入一个独立的波希米亚-英拉维亚国家;奥地利和施梯里亚同它们通向亚得利亚海和地中海的天然出口的联系就会被“南方斯拉夫共和国”切断;德国的东部就会像被老鼠

^① 克罗地亚称作:里耶卡、萨达尔、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称作:柳布梁纳;克罗地亚称作:卡尔洛瓦茨;塞尔维亚称作:泽蒙、潘切沃、贝拉茨尔克瓦。——编者注

啃碎了的面包一样，被弄得支离破碎！这一切就是对德国人的报
答，因为德国人曾经努力使顽固的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开化起
来，在他们那里建立贸易和工业以及多少还过得去的农业和文化！

然而，正是这种以开化为名而加在斯拉夫人身上的羁绊，构成
了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滔天罪行！请大家听听下面的话吧：

“你们的愤怒是正当的，你们有权要求对那种万恶的德国政策进行报复，
因为这种政策只想使你们遭到灭亡，使你们世世代代遭受奴役”……（第 5
页）

“……马扎尔人，我们种族的凶恶敌人，一共才不过四百万人，他们却吹
嘘要把羁绊加到八百万斯拉夫人的身上……”（第 9 页）

“我知道马扎尔人对我们的斯拉夫弟兄干下的一切坏事，我知道他们对
我们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我知道他们如何鄙视我们的语言，如何践踏我们
的独立。”（第 30 页）

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对斯拉夫民族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
行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里不谈瓜分波兰的事情，这个问题与此
无关，我们只谈据说是斯拉夫人所蒙受的“世世代代的不公平待
遇”。

德国人在北方从斯拉夫人手中重新夺回了起初属于德国而后
来属于斯拉夫人的由易北河至瓦尔塔河的那片地区；所以要夺取
这片地区，是由于从瓜分卡罗林君主国而产生的“地理上和战略上
的考虑”。这些斯拉夫地区已经完全德意志化；这已是既定事实，而
且已经无法挽回，除非泛斯拉夫主义者能够找到已经消亡了的索
布语、温德语和奥博德里特语，并把这些语言强加于莱比锡、柏林
和施特廷^①的居民。但上述夺取行为是有利于文明的，这一点至今

^① 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

还没有人否认过。

在南方，当德国人发现各斯拉夫部族的时候，它们都已经零零散散。这是那些曾经占据过后来为马扎尔人所占领的地区的非斯拉夫族的阿瓦尔人所干的事情。德国人强迫这些斯拉夫人纳贡，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德国人也同阿瓦尔人和马扎尔人进行了这样的战争，结果从他们手中夺取了由恩斯河至莱达河的这个地区。德国人在这里强迫他们德意志化，而各斯拉夫地区的德意志化过程则和平得多，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至于说到“压迫”，那末斯拉夫人所受到的德国人的压迫，并不比德国人民大众所受的压迫更重。

至于说到马扎尔人，那末要知道，在匈牙利住着大量的德国人，但是马扎尔人从来没有理由抱怨“万恶的德国政策”，虽然他们总共只有“约四百万人”！如果说“八百万斯拉夫人”在八个世纪中一直被迫忍受四百万马扎尔人所加在他们身上的羁绊，那末，单单这一点便能充分证明：究竟谁具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更富有精力——是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呢，还是为数不多的马扎尔人！

当然，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滔天“罪行”在于，他们妨碍了这一千二百万斯拉夫人受土耳其人同化！要不是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这些在历史上起了如此微小的作用的零散的小民族凑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去同穆罕默德和苏雷曼的军队作战，要不是他们的这些所谓“压迫者”决定了为保护这些弱小民族而进行的各次战役的结局，那末，这些民族会落到什么地步呢！直到今天还受着“七十万奥斯曼人蹂躏”的“一千二百万斯拉夫人、瓦拉几亚

人和希腊人”的命运不是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吗？（第8页）

最后，在欧洲几个大君主国一般地说已经成了“历史的必要性”的时代，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预历史的发展（否则他们光靠自己始终是无法过问历史的发展的），能否认为这是“罪行”和“万恶的政策”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践踏几朵娇嫩的民族鲜花，但是，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义者现在为了维护其衰弱不堪的被保护人而要求的那种软心肠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而波斯人、赛尔特人和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居民在哪方面不如捷克人、奥古林人和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呢？

但是**现在**，由于工业、贸易和交通的长足进展，政治上的集中成了比当时即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更加迫切的要求。凡是还能集中的一切，都正在集中。正是**现在**，出现了泛斯拉夫主义者，他们要求我们“解放”这些已经半德意志化的斯拉夫人，要求我们消灭斯拉夫人的一切物质利益强加于这些斯拉夫人的集中。

一句话，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对上述斯拉夫人所犯下的“罪行”，原来是最好的、值得感激的行为，原来是我国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在自己历史上可以夸耀的行为。

至于说到马扎尔人，那末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他们从革命开始的时候起，对待目空一切的克罗地亚人就过于迁就和软弱。大家都知道，科苏特除了没有让他们的代表在议会中用克罗地亚语发言以外，对他们作了一切可能的让步。唯一可以责备马扎尔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对这个本性就是反革命的民族让步太多了。

二

科伦 2 月 15 日。昨天我们在文章的最后曾经指出，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历史，在历史、文学、政治、贸易和工业方面他们都依赖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他们部分地已经被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同化了，一旦成立许多独立国家，统治这些国家的也不会是他们，而是他们城市中的德国资产阶级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最后，无论是匈牙利，还是德国，都不会容许割去和单独成立这种没有生命力的小的中间国家。

但是这一切也许还不会有决定意义。如果斯拉夫人在他们受压迫的某一个时期开始新的革命历史，那末他们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具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们求得解放，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局部利益就会在欧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

可是这种情形过去恰好一次也没有发生。斯拉夫人——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把波兰人除外，——恰好是经常充当反革命的主要工具。他们在家里受压迫，在外边，在斯拉夫人影响所及的一切地方，他们却是一切革命民族的压迫者。

请不要反驳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似乎是在维护德国人的民族偏见。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报纸上有事实为证，正是“新莱茵报”的编辑们，早在革命以前很久就最坚决地反对过德国人的民族局限性的一切表现²¹³。虽然和其他一些人不同，他们没有人云亦云地对德国的一切乱加指责，但是他们历史地指出和无情地揭露

了德国由于它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工业不发达，而在历史上无疑起过的那种卑鄙作用；他们向来承认，西方那些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落后的德国人比较起来有许多长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权不赞成斯拉夫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像我们谴责我们自己的民族一样来严厉谴责其他民族。

直到现在人们总是说，德国人是全欧洲专制制度的雇佣兵。我们丝毫不打算否认德国人在 1792—1815 年反对法国革命的历次可耻战争中，在 1815 年以后压迫意大利和 1772 年以后压迫波兰的过程中所起的可耻作用；但是，谁在背后为德国人撑腰呢？谁利用他们来作自己的雇佣兵或先锋队呢？是英国和俄国。要知道，俄国人直到现在还在吹嘘，说他们用无数的军队决定了拿破仑的垮台。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在以自己的优势兵力把拿破仑由奥得河击退到巴黎的那些军队中，有四分之三是斯拉夫人，俄国的斯拉夫人或奥地利的斯拉夫人。

但是，德国人压迫过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呀！在瓜分波兰的时候，是一个斯拉夫国家和一个半斯拉夫国家彼此之间进行竞争；镇压考斯丘什科的军队大多数是由斯拉夫人组成的；吉比奇和帕斯凯维奇的军队完全是斯拉夫军队。在意大利，只有 tedeschi（德国人）在一个长时期内享有压迫者的臭名。但是，再问一次，可以最好地被用来进行压迫、而其残暴行为都算在德国人身上的那些军队又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还是斯拉夫人。请到意大利去问一问，是谁镇压了米兰的革命。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对你说，这是 tedeschi 干的，——自从 tedeschi 在维也纳进行了革命以后，人们已经不再仇视他们了，——人们会说，这是 croati（克罗地亚

人)干的。现在意大利人用这个名称称呼一切奥地利军队,就是说,称呼他们最痛恨的一切: i croati!

但是,如果斯拉夫人无论在什么地方认真地参加了 1848 年的运动,如果他们迅速地加入到革命民族的行列中来,那这些责难就会是多余的、不公正的。只要大胆地进行一次民主革命的尝试,纵然遭到失败,也可以使各族人民忘却他们许多世纪的耻辱和怯懦,也可以使一个即使是深受鄙视的民族的名誉马上得到恢复。德国人在去年已经有过这种体验。但是当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举起革命旗帜的时候,斯拉夫人却像一个人一样全都站到**反革命**的旗帜下面了。走在前面的是很久以来一直对马扎尔人坚持其反革命的分离主义打算的南方斯拉夫人,其次是捷克人,他们后面是武装起来的、准备在决定关头投入战斗的**俄国人**。

大家知道,在意大利,马扎尔的骠骑兵曾经大批投向意大利人;在匈牙利,整个整个的意大利营听从匈牙利革命政府的指挥,并且现在还在匈牙利旗帜下作战;大家知道,德国兵团在维也纳是怎样对待人民的;甚至在加里西亚,这些兵团也决不是可靠的部队;大家知道,曾有大批波兰人,不分奥地利的波兰人,还是非奥地利的波兰人,在意大利、维也纳和匈牙利同奥地利的军队作过战,并且现在还在喀尔巴阡山地区作战;但是有谁听说过捷克军队和南方斯拉夫军队举行过起义来反对黑黄旗^①呢?

恰恰相反,至今大家所知道的只是:其基础已经动摇的奥地利,由于斯拉夫人的黑黄色狂热才得到了保全,暂时获得了巩固;正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威亚人、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卢西人给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提供了军队去镇压维也纳、克拉科

^① 即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编者注

夫、里沃夫和匈牙利的革命。现在我们又从巴枯宁那里得知，驱散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加里西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人，而且“只是斯拉夫人”！（第 33 页）

1848 年革命强迫欧洲的一切民族表明态度：是拥护这次革命，还是反对这次革命。在一个月內，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进行了革命，而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在那个时候，应当把东欧民族的混乱状态弄清楚。当时的问题在于：哪个民族将在这里发起革命，哪个民族将发挥最大的革命毅力，从而保证自己的未来。斯拉夫人仍然是那样无声无息，而忠实于自己以前的历史作用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则领导了运动。于是，斯拉夫人就完全投入了反革命的怀抱。

而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情况怎样呢？

我们再重复一遍：奥地利斯拉夫人中间的所谓民主派，不是恶棍，就是空想家，而那些在本民族中不能为从国外输入的思想找到基础的幻想家又经常被那些恶棍牵着鼻子走。在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空想家们占了上风。当贵族泛斯拉夫主义者图恩伯爵和帕拉茨基等人觉得这种空想是一种危险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空想家出卖给了文迪施格雷茨和黑黄色反革命。这个为充满了幻想的布拉格青年所维护的幻想家代表大会竟被本民族的士兵们所驱散，人们竟用一种斯拉夫人的军事代表大会来和这个想入非非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对抗，这是多么辛辣而难堪的讽刺啊！占领了布拉格、维也纳、里沃夫、克拉科夫、米兰和布达佩斯的奥地利军队，才是真正的，积极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结果，证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幻想是多么没有根据和虚无缥缈。如果是在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那里，轰击像

布拉格这样一个城市的事件一定会引起对压迫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可是捷克人怎么样呢？他们却去亲吻那些把他们抽打得遍体鳞伤的鞭子，他们却热烈地向他们的兄弟在它下面被处死刑、他们的妻子在它下面遭到凌辱的那面旗帜宣誓。布拉格的巷战对奥地利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们为了他们的可怜的“民族独立”的前途，竟把民主和革命出卖给奥地利君主国，出卖给这个正如巴枯宁本人在第二十九页上所说的“为在欧洲的心脏系统地实行专制制度效力”的“中心”。我们总有一天还要无情地报复斯拉夫人这种出卖革命的怯懦而卑鄙的行为。

这些叛徒们也终于开始明白，他们受了反革命的欺骗，根本谈不到“斯拉夫的奥地利”，以及“各民族平等的联邦国家”，更不用说为奥地利斯拉夫人建立民主的机关。耶拉契奇这个并不比奥地利斯拉夫人中的其他大多数民主主义者更坏的恶棍，痛心疾首地悔恨他这样被人利用了，而斯特拉蒂米洛维奇为了不再被人利用，宣布要公开起义反对奥地利。现在斯拉夫菩提树²¹⁴所属各团体又在到处反对政府，他们根据沉痛的经验一天比一天深刻地认识到，他们上了别人的什么圈套。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无力在自己的祖国反对由他们自己改组过的奥地利军阀，他们遭到了被他们所出卖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遗弃，他们遭到了革命的欧洲的遗弃，他们将被迫忍受那种在他们的帮助下加在维也纳人和马扎尔人身上的军事专制制度。“要服从皇帝，这样奥皇军队就不会像对待造反的马扎尔人一样来对待你们。”拉亚契奇总主教的这句话表明，在最近时期中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波兰人的行动截然不同！八十年以来他们一直受压迫，受奴役，遭到破产，他们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并且宣布，波兰的革命化同

波兰的独立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巴黎、维也纳、柏林，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波兰人都参加了历次革命和革命战争，不管是反对德国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或者即使是反对波兰人都是一样。波兰人是没有任何泛斯拉夫主义欲望的唯一斯拉夫民族。他们能够成为这样的民族，是有充分理由的：压迫他们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所谓斯拉夫兄弟**，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仇恨甚至超过对德国人的仇恨——他们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们。

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们当然明白：他们的愿望，一般说来凡是是可以实现的，都已经在俄国保护下重新恢复起来的“奥地利联合君主国”中实现了。如果奥地利瓦解了，那末等待着他们的前途将是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革命恐怖主义，而决不会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是在奥地利统治下受奴役的一切民族的解放。因此，他们只有指望保全奥地利，而且为了使斯拉夫人在这个国家中保持多数，指望加里西亚仍然属于奥地利。可见，**泛斯拉夫主义的利益是同波兰的复兴直接相矛盾的**，因为没有加里西亚的波兰，不是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喀尔巴阡山的波兰，就不是波兰。但是，正因为如此，“斯拉夫的奥地利”是极其虚无缥缈的幻想，因为正像奥地利直到最近几个月的全部历史所证明的，如果没有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没有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两个中心，奥地利就要重新瓦解。所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实现只能是俄国对奥地利的庇护。因此，公开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拚命保全“联合君主国”，是完全正确

的；这是唯一能够挽救一点什么东西的手段。但是所谓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面临着一种极其困难的抉择：他们或者是放弃革命，借助于“联合君主国”至少部分地挽救民族特性，或者是放弃民族特性，通过瓦解“联合君主国”的办法挽救革命。在那个时刻，东欧革命的命运，是取决于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立场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紧要关头，由于自己微不足道的民族希望，把革命出卖给了彼得堡和奥里缪茨！

如果德国的民主派在它的纲领中把归还亚尔萨斯、洛林和在一切方面都倾向于法国的比利时的要求列入头条，借口说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德国人，那我们将怎么说呢？如果德国的民主派打算成立泛日耳曼德国—丹麦—瑞典—英国—荷兰同盟，以便“解放”说德语的一切国家，那他们会是多么令人可笑呵！幸运的是，德国民主派的发展已经超过了这些幻想。1817年和1830年，德国的大学生们曾经醉心于这类反动的幻想，而现在全德国都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只是在德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这类虚无缥缈的幻想之后，德国的革命才有了可能，德国人民才开始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泛斯拉夫主义的幼稚性和反动性并不比泛日耳曼主义少些。当你们读到去年春季的布拉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历史时，你们会感到，你们被抛回三十年以前去了：三色饰带、古式服装、古斯拉夫的祈祷仪式、原始森林时代及其风俗的完全复原；“同盟会”是真正的德国大学生联合会²¹⁵，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是瓦特堡纪念大会²¹⁶的再版；还是那一套话，还是那些幻想，而且还是那首悲伤的歌曲：“我们建筑了美丽的大厦”²¹⁷等等。谁想读一下这首译成了斯拉夫散文的著名歌曲，就让他读一读巴枯宁的小册子。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的会员们曾经长期受着强烈的反革命情

绪、极端的仇法情绪和最狭隘的民族情感的支配，后来他们全都成了他们仿佛曾经醉心过的事业的叛徒。和这些人一样，只是更迅速些罢了（因为 1848 年是革命的年度），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民主外貌很快就变成了狂热地仇恨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情绪，变成了间接反对复兴波兰（留博米尔斯基）和直接参加反革命的行动。

如果个别诚实的斯拉夫民主主义者现在号召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参加革命，把奥地利君主国当作主要的敌人，甚至为了革命的利益同马扎尔人一起前进，那末这会使我们想到这样一件事情：一只母鸡，绝望地在池塘边跑来跑去，看样子是它所孵出来的那些小鸭突然离开了它，跑到它所不能跟去的另一个天地去了。

但是，我们不要沉溺于幻想。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认为，民族特性，即虚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是**高于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同意参加革命，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允许他们不顾最迫切的物质需要，把一切斯拉夫人毫无例外地联合成为一些独立的斯拉夫国家。如果我们德国人也提出这种荒诞无稽的条件，那我们在三月里不知要走到哪里去了！但是革命是不允许向它提出任何条件的。或者做一个革命者，接受革命的一切后果，不管这种后果是什么，或者投入反革命的怀抱，有朝一日会不知不觉地（也许是事与愿违地）发现自己同尼古拉和文迪施格雷茨处在同一个阵营中。

我们和马扎尔人应该保障奥地利斯拉夫人的独立，——巴枯宁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像卢格那种类型的人真的会私下对他许下这种诺言。他们竟要求我们和欧洲的其他革命民族保证反革命势力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大门口肆无忌惮地存在，保证他们有策划阴谋和武装起来反对革命的自由权利；我们应当在德国的中心建立一个反革命的捷克国家，我们应当在俄国楔入德国、波兰和匈牙利

的、设在易北河、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地区的前哨部队的援助下粉碎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力量！

我们打算这样做。对于那些以最反革命的民族的名义向我们所说的关于博爱的悲天悯人的漂亮话，我们的回答是：恨俄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又加上了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只有对这些斯拉夫民族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我们才能够同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我们现在知道，革命的敌人集中在什么地方：他们集中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斯拉夫地区；无论什么花言巧语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渺茫的民主未来的指示，都不能阻止于我们把我们的敌人当作敌人来对待。

如果巴枯宁最后还要叫喊：

“的确，斯拉夫人不应该**丧失**任何东西，而应该得胜！的确，他应该生存下去！而且我们将会生存下去。只要有人对我们的哪怕是**最小一部分**权利提出异议，只要**我们共同机体上的一个器官还同我们分开或者同我们脱离**，我们就将斗争**到底**，我们将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斯拉夫民族终于成为伟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为止”，——

如果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认真地接受这些话，并在凡是涉及虚构的斯拉夫民族特性的地方都放弃革命，那末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

那时候就要斗争，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进行歼灭战，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而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为了革命的利益！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2 月 14—15 日
载于 1849 年 2 月 15 和 16 日“新莱茵报”
第 222 和 22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 治理下的普鲁士财政

科伦 2 月 16 日。3 月间“被免职的”大臣冯·博德尔施文克又打算从他幽居的洞穴里爬到地面上来。冯·博德尔施文克当选为第二议院的议员了。泰尔托夫农民联合会选得可真好啊！

民主派的报刊过去一直很少评论以前的大臣和以前的其他要人，现在却应该算一下这些先生们的旧账。因此，我们想使我们的读者和检察官都回想一下同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担任财政大臣时的活动有关的一些事实。

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任财政大臣的时间是 1842 年春到 1844 年 5 月 3 日。

他很喜欢说，他如何如何克尽职守。他为人“坦率”。例如，他在 1842 年 10 月 24 日向等级委员会²¹⁸坦率地说：“普鲁士财政应该是有限公开的，这种公开就是在法令汇编中每三年公布一次国家预算。”接着他解释了普鲁士国家预算是如何以及用什么方法编制的。普鲁士国家预算“主要是根据编制预算以前三年中各主管部门结算的平均数字”编制的。

10 月 26 日，这同一个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又坦率地说，近七年来的收入，增加了 5 500 000 塔勒以上，并且估计还会继续增加（“国家报”第 306 和 307 号）。当时不得已而只好相信大臣先生的

话,因为“有限的公开”给普鲁士的财政蒙上了一层难以看透的黑幕。现在至少应该怀疑一下财政大臣先生当时提出的保证是否可靠,因为有关以前财政管理方面的许多事情近来已经大白于世了。

法令汇编中公布的财政预算,应该以各主管部门的专门预算的平均数为根据,而各主管部门的专门预算又是以前三年的实际收入为根据而编制的。如果是这样,那末在法令汇编中公布的每一份预算都应该包括接近于前三年实际收支的平均数字。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照博德尔施文克先生自己的话说,预算就是**不正确的,是伪造的官方文件。**

1844年法令汇编(第96页)²¹⁹中公布了一个由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签署的预算。这个预算的收入部分和支出部分都是57677194塔勒。这个数目理应表示前几年收支的平均数。但是事实上,前几年的收入和支出都多得多。后来政府把1840—1843年财政部门的统计材料²²⁰告诉了第一届联合议会的议员。

根据这个材料,数目是:

	收 入	支 出
1843年·····	73 822 589 塔勒	79 102 787 塔勒
1842年·····	73 876 338 塔勒	75 269 431 塔勒
1841年·····	71 987 880 塔勒	74 185 443 塔勒
	219 686 807 塔勒	228 557 661 塔勒

因此,收入的实际平均数是73 228 935塔勒,支出的平均数是76 185 887塔勒。可见,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所说的收支数字缩小了很多,即**每年隐瞒了15 551 741塔勒的收入和18 508 693塔勒的支出。**如果精确计算一下,这些数字当然是会有些出入的,因为各主管机关专门预算的三年平均数字,并不是做每一个预

算草案时都必须重算一遍，所以这种平均数字可以适用于 1841 年，甚至可以适用于 1838 年。但是，这也不会使隐瞒的数字降低很多，因为 1840 年的收入也是 71 059 475 塔勒，而支出甚至达到 77 165 022 塔勒。关于 1839 年和 1838 年，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然而因为在和平时期，在财政立法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国家收入的改变不是跳跃式的，而是渐进的，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认为，1838 年和 1839 年国家的收入至少有 70 000 000 塔勒。

可见，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的预算，大概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 1848 年以前的两个后继者的预算一样，是伪造的。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一定知道，他公布的东西是不正确的。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他不会不知道。这个数字同实际情况相差太大，以致布勒斯劳的厅长贝尔鸠斯和后来的毕洛夫-库梅洛夫甚至根本没有看见决算就公开指出这些数字是不确实的。自然，如果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坦率地说出了真相，他对省议会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和演说就会受到另一种待遇。在普鲁士财政“有限公开”的情况下，他可以吹嘘，而在完全公开的情况下，他只能等着丢脸和受责备。他洋洋得意地谈到收入增加了 5 500 000 塔勒，但是关于自 1840 年至 1843 年支出超过收入 14 976 401 塔勒一事，却讳莫如深。虽然国家在这四年中不得不拿出 290 746 282 塔勒来，但是就连这笔巨大的款项也抵偿不了为数 305 722 683 塔勒的庞杂支出。何况这种开支既不是为了战争，也不是为了在国外大力保卫本国工商业的利益，又不是为了建立舰队，更不是为了大力振兴国内的农业和手工业！豪华的王宫建筑，官员中的宠臣，给容克地主和官僚的赠礼，以及军队的给养和各种检兵典礼等等，这一切使国家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代价。但是，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当然不是那种会承认这一

切的人。因此他就编造了假预算，想使人民相信，收入和支出都比实际情况要少得多。

但是编造假预算永远都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普鲁士法律对这类渎职行为规定要严加惩处。发表在法令汇编上的那些预算案，都是正式文件，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普鲁士法虽然对国家官员编造假的正式文件没有规定特别的处分，但是 1831 年 6 月 3 日的指令（参看康普茨“年鉴”第 37 卷第 407 页²²¹）规定，应把这种行为视为欺骗和渎职，并予以应得的处分。普鲁士司法机关从那时起也就这个问题表示了意见。普鲁士法关于渎职行为作了如下的规定（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三三三节²²²）：

“凡故意破坏有所任职务之指示者，应立即免职；此外，应按其所犯罪行及造成损失之大小，处以相当罚款、监狱监禁或要塞监禁，并剥夺担任公职之权利。”

免职、禁止担任任何公职，此外，还要罚款和剥夺自由——按照法律，这就是一切编造假预算的人应有的下场。——因此，如果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不能消除别人对他公布假预算的重大怀疑，那末法官就必须对他采取上述处分。我们要求他，也要求检察官，把这件事加以澄清。

罚款、监狱监禁或要塞监禁，应该按所犯罪行及造成损失之大小来规定。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同他在职务上的先驱者和后继者一起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规模也非常大，只有各部大臣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才能为全民造成这样的损失。我们要在这里指出这个数目，同时顺便指出，这里也涉及到各部大臣的其他渎职行为。

1820 年 1 月 17 日的敕令规定，普鲁士国家预算中的必要开

支是 50 863 150 塔勒。并且接着就一字不差地说：

“上述我所认为必要的管理经费数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此事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各需亲自对我负责，整个内阁的责任更为重大，总的说来，我所允许的数目为达到预算中所规定的目的已绰绰有余。”

至于“必要的管理经费数目”究竟是多少，在后面的“管理经费”同国债方面的开支的对比中有明确的规定。管理经费包括从国库中拨出来但不是用作支付国债利息或偿还国债的一切款项。我们知道，按照至今尚未废除的 1820 年 1 月 17 日的敕令，这种开支不得超过 50 863 150 塔勒。敕令是在 1820 年的法令汇编中公布的，并且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说在君主立宪政体宣布成立以前这类敕令在普鲁士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凡是超过法定数目的，就是违法行为，就是大臣的渎职。

向第一届联合议会提出的关于 1840 年至 1846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向现在已被解散了的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 1847 年财政管理的报告都表明，从 1840 年到 1847 年，所有大臣年年都违反了自己的职责。他们每年所开支的管理经费都超过了，并且大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数目。为了叙述得更加连贯，我们在这里不是只谈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一人，而是要谈到 1840 年到 1847 年的历任财政大臣。这些大臣是：阿尔文斯累本伯爵——从 1835 年到 1842 年，冯·博德尔施文克——从 1842 年到 1844 年，弗洛特韦尔——从 1844 年 5 月 3 日到 1846 年 8 月 16 日，冯·杜厄斯堡——从那时起直到三月革命推翻内阁为止。所有这些大臣在同样程度上都犯了这种罪行。只要叙述一下事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渎职的高官们是怎样破坏了萌芽中的国家福利。

我们已经知道，经常的开支，即除了用在国债方面的以外的全

年开支,按照法律不能超过……50 863 150 塔勒。

但是,1840年支出了……77 165 022 塔勒

其中应扣除:

(a) 偿还国债……8 579 345 塔勒

(b) 似乎是交入国库……613 457 塔勒

共计……9 192 802 塔勒

因此,管理经费是……67 972 220 塔勒

所以,这一年非法支出……17 109 070 塔勒

1841年支出……74 185 443 塔勒

其中偿还国债和交入国库……14 419 563 塔勒

所以,管理经费……59765880 塔勒

法定数目……50 863 150 塔勒

超过法定数目……8 902 730 塔勒

1842年支出……75 269 431 塔勒

没有交入国库分文

偿还国债支出……8 684 865 塔勒

所以,经常开支应为……66 584 566 塔勒

超过法定数目……15 721 416 塔勒

1843年开支……79 102 787 塔勒

交入国库和偿还国债……8 261 981 塔勒

所以,管理经费……70 840 806 塔勒

法定数目……50 863 150 塔勒

超过法定数目……19 977 656 塔勒

1844年开支……78 243 308 塔勒

其中交入国库、支付国债利息和

偿还国债……9 252 605 塔勒

所以,经常开支……68 990 703 塔勒

法定数目……50 863 150 塔勒

就是说,超过法定数目……181 127 553塔勒

1845 年开支	77 903 361 塔勒
没有交入国库分文	
偿还国债	<u>7 267 082 塔勒</u>
所以,经常开支	70 636 279 塔勒
法定数目	<u>50 863 150 塔勒</u>
就是说,超过法定数目	19 773 129 塔勒
1846 年开支	78 562 335 塔勒
没有交入国库分文	
偿还国债	<u>7 423 831 塔勒</u>
管理经费	71 138 504 塔勒
法定数目	<u>50 863 150 塔勒</u>
所以,超过法定数目	20 275 354 塔勒
1847 年开支	80 392 730 塔勒
其中救济费	6 207 650 塔勒
偿还国债	<u>7 209 192 塔勒</u>
共计	<u>13 416 842 塔勒</u>
所以,管理经费	66 975 888 塔勒
法定数目	<u>50 863 150 塔勒</u>
就是说,超过法定数目	<u>16 112 738 塔勒</u>
以上几年共超支	135 999 646 塔勒

最近八年来,在阿尔文斯累本、博德尔施文克、弗洛特韦尔和杜厄斯堡诸大臣的治理下,从国库中,即从人民的财富中,从穷人的资金中,非法动用了几乎一亿三千六百万塔勒!而这些先生们竟还逍遥法外,挂着星章和勋章,有的人,例如弗洛特韦尔,甚至还身居要职!前几天报上有一则消息,说有一个法官——他被认为是民主主义者——因被控没有把五十塔勒交给应该交给的人而遭到逮捕。一个是五十塔勒,一个是一亿三千六百万塔勒!

也许,1820年规定的数目同近来的国家的需要已经不相适应

了。如果是这样，那政府就应该公开说明，并且**依法**规定新的预算。但是政府不想这样做，而且也不敢这样做。它所以不想这样做，是由于它的专制主义的愿望；它所以不敢这样做，是因为怕道出财政部门的秘密。有维多利亚女王莅临的阅兵、洗礼、婚礼、教堂、耶路撒冷的主教管区、过时的几乎被遗忘了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敕令、骑士的城堡、头盔、近卫军军官、容克地主、僧侣和官僚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民的灾星在普鲁士财政中起过什么作用和起着什么作用，这是不应该让人民知道的。所以普鲁士的财政是秘密的，而大臣们甚至当着现存法律的面成了罪犯。诚然，现在还没有找到审判他们的法官。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执政时的普鲁士财政使国库空虚到什么程度，这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来：

1840年：往年结余现金	16 949 157 塔勒
年收入	<u>71 059 475 塔勒</u>
共计	88 008 632 塔勒
年支出	<u>77 165 022 塔勒</u>
尚余现金	10 843 610 塔勒
1841年：往年结余现金	10 843 610 塔勒
年收入	<u>71 987 880 塔勒</u>
共计	82 831 490 塔勒
其中除去年支出	74 185 443 塔勒
尚余现金	8 646 047 塔勒
(阿尔文斯累本编制的发表在法令汇编中的收支一览表，不论收入或支出部分，都是 55 867 000 塔勒！)	
1842年：往年结余现金	8 646 047 塔勒
年收入	<u>73 876 338 塔勒</u>
共计	82 522 385 塔勒

	年支出	75 269 431 塔勒
	尚余现金	7 252 954 塔勒
1843 年:	往年结余现金	7 252 954 塔勒
	年收入	73 822 589 塔勒
	共计	81 075 543 塔勒
	年支出	79 102 787 塔勒
	尚余现金	19 72 756 塔勒
1844 年:	往年结余现金	1 972 756 塔勒
	年收入	75 976 613 塔勒
	共计	77 949 369 塔勒
	年支出	78 243 308 塔勒
	赤字	293 939 塔勒
1845 年:	年收入	77 025 034 塔勒
	除去 1844 年赤字	293 939 塔勒
	尚余	76 731 095 塔勒
	年支出	77 903 361 塔勒
	因此, 赤字	1 172 266 塔勒
1846 年:	年收入	75 721 698 塔勒
	除去 1845 年赤字	1 172 266 塔勒
	尚余	74 549 432 塔勒
	年支出	78 562 335 塔勒
	因此, 赤字	4 012 903 塔勒
	(根据 2 月 3 日指令召集了第一届联 合议会, 但是议会没有批准信贷。)	
1847 年:	年收入	79518543 塔勒
	除去 1846 年赤字	4012903 塔勒
	尚余	75505640 塔勒
	年支出	80392730 塔勒
	因此, 赤字	4887090 塔勒

为了抵敷必需的开支, 从国库中支取了 4 000 000 塔勒, 这样

一来,进款就要增加到 83 518 543 塔勒。于是,旧政府是带着一个有赤字的国家储金总局和一个空虚的国库进入 1848 年的。在这六年中(1840 年到 1847 年),现金从结余 16949157 塔勒变成了亏空 4 887 090 塔勒,就是说,减少了 21 836 247 塔勒。

八年中的收入共计……………598 988 170 塔勒

支出……………620 824 417 塔勒

因此,赤字如上所述是……………21 836 247 塔勒

这种现金不断减少的情况已经不能再否认了,虽然政府拚命加以掩饰,把收入和支出的余额一年一年地往下推,并且在统计中不谈已经出现的赤字,反而假造盈余。可见,普鲁士的财政是在“和平时期”,在非常“安宁”和“有秩序”的情况下,被普鲁士政府弄得破了产。当 1848 年运动开始、金融市场陷入萧条状态的时候,国家对私人不但不能有所支持,反而要他们为自己的继续存在作出新的牺牲。这一切,资产者先生们都应该感谢普鲁士的前任各届大臣和他们的同谋者。如果他们不犯下这种渎职罪,那就不会出现赤字,而会有 136 000 000 塔勒的现金,从而也就能够维持信贷。这就是普鲁士刑事立法第三三三节所指的那种罪行所造成的损失。

国家储金总局出现了赤字,而收入又怎样呢!我们已经指出,收入一年一年地从 71 000 000 增加到 80 000 000。但是这仅仅是纯收入,这仅仅是各主管部门除去管理费用以后上缴的款子。在税务、关卡、邮政、林务等部门中,凡有关这些管理部门的薪俸、办公费等等都早已扣除,只有纯结余才列为收入。但是,国家既要拿一笔钱去支付税务、林务、邮政等部门的职员薪俸和办公费,同时还要用一笔钱去作为给总督们和现役将军们的赏赐和赠礼。这些预

先列销的管理费用，在 1847 年预算中达 20 887 541 塔勒。如果加上这个数目，那末年收入就有 90 000 000 到 100 000 000，而年开支甚至超过 100 000 000 塔勒。人民付出了这样大的一笔钱，而结果却是一个空空的国库！

我们已经看到，1820 年 1 月 20 日的敕令中对大臣的职责作了规定。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明知故犯地——只能是这样——违反了这种规定。因此，他也就再一次触犯了上述普鲁士法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三三节。按照法律，他应受的处分是**撤职、罚款或要塞监禁和剥夺担任任何公职的权利**。由于他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应该按照法律所许可的最高限度来剥夺他的自由。

前任大臣冯·阿尔文斯累本、弗洛特韦尔和冯·杜厄斯堡的情况也都是这样。

必须责令前任大臣先生们赔偿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赔偿非法支出的 136 000 000 塔勒，这一点在民法中就有规定。关于这个问题，刑事立法（普鲁士法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三四一节）中写道：

“凡官员无力偿还因渎职而故意使国家或第三者受到之损失者，该官员须在刑满后留在国家机关内进行强制工作，直至其以某种方法偿清损失为止。”

再说一件小事情！根据各年预算，从预算结余中交入国库的款项是：

1840 年	613 457 塔勒
1841 年	2 837 000 塔勒
1843 年	1 000 000 塔勒
1844 年	2 000 002 塔勒
共计	6 450 459 塔勒

根据国库决算，自 1840 年 7 月 1 日起从预算结余中交给国库

的只有 6 423 332 塔勒。因此，国家储金总局中列为**拨给国库的钱比国库收到的钱多 27 127 塔勒**^①。请问冯·阿尔文斯累本先生、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弗洛特韦尔先生和冯·杜厄斯堡先生，这 27 127 塔勒到哪里去了呢？但愿不是被私吞了？

能为这些前任大臣先生找到一个检察官和审判庭吗？而目前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还是第二议院的议员！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2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2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224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① 在“新莱茵报”上误印为“17127 塔勒”；编辑部在“再论普鲁士的财政”一文（见本卷第 370 页）中作了更正。——编者注

施 泰 因

科伦 2 月 16 日。布勒斯劳的“法定秩序拥护者同盟”（“天佑吾王，天佑吾国”同盟）给尤利乌斯·施泰因博士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道：正像布勒斯劳的勇敢的庸人一样，“新莱茵报”被施泰因先生的保守演说弄糊涂了，“新莱茵报”“认为对民主事业来说他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是坚决立场的拥护者。我们从不巴结某一个议会政党。我们所代表的党，即人民的党，在德国暂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当问题在于同**现存政府**作斗争的时候，我们甚至同我们的敌人结成联盟。我们注意到，在迄今存在于德国的精神发展的可悲条件下形成的那个官方普鲁士反对派是个事实。因此在竞选斗争中，我们甚至把**我们自己的观点**放到次要地位²²³。现在，在选举以后，我们又坚持我们过去的那种不但对政府而且对官方反对派也不调和的观点。

“法定秩序拥护者同盟”弄错了。我们并不认为施泰因、瓦尔德克先生之流“对民主事业说来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一直认为，施泰因、瓦尔德克先生之流不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对民主派说来是一件好事。

在本报最初几号的一号中，我们曾经说过，除了三四个人以外，柏林协商议会中的极左派在国民公会中只能构成一个极右

派²²⁴。我们从来没有把施泰因和瓦尔德克算在这三四个人之内。

关于施泰因先生本人,我们还记得这样的事情:他曾经作为狂热的立宪主义者起来反对共和主义者,他曾经在“西里西亚报”²²⁵上对工人阶级的代表进行真正的告密,并为此目的利用了一个同他志同道合的教师,这个人现在是“法定秩序拥护者同盟”的盟员。

协商派议会的所谓民主派,也像这个议会本身一样可怜。可以预料:为了再度当选,这班先生将承认钦定宪法。这班先生的观点的特征是:在选举以后,他们会在民主俱乐部中否认他们在选举以前在复选人会议上所坚持的东西。这种狡猾的自由主义的小聪明从来不是革命者的外交所固有的。

写于 1849 年 2 月 16 日

载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
“新莱茵报”第 2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日报”驻维也纳记者

科伦 2 月 17 日。世界历史上又少了一个谜！大家知道，用△作记号在“科伦日报”上写编辑部文章、同时以□作记号在同一家“科伦日报”上发表**维也纳**通讯的施万贝克先生，在这些文章和通讯中竭力诽谤马扎尔人，责难他们胆怯、下流，不仅打败了他们，而且屡次消灭了他们，并热烈欢迎联军在战地法庭的伴随下进入匈牙利各个城市 and 各个州。

现在，施万贝克先生本人解开了这个谜；像阿基里斯一样，只有我们的施万贝克自己能够治疗他所击破的伤口。

这个谜的谜底究竟是什么呢？——**害怕韦尔登**。这就是要侮辱维也纳人和马扎尔人，散布关于奥地利人战绩的可耻谣言，向克罗地亚人和潘都尔兵摇尾乞怜和阿谀奉迎的原因。

因为，——大名鼎鼎的施万贝克说，——因为，他说：

“直到现在为止，卫戍司令韦尔登男爵总是直截了当地把那些敢于怀疑奥皇军队在君主国各个据点上的胜利进展的人叫做撒谎者，并封之以恶棍的光荣称号。”（“科伦日报”第 40 号）

由于尊敬韦尔登，“科伦日报”的读者们不得不读了两个月标着□记号的关于匈牙利战争的虚构的维也纳通讯。

关于**普斯库亨**，歌德曾经这样说过：

“鲸鱼身上还生虱子，我又怎能免俗。”²²⁶

科苏特也能把这句话应用于**施万贝**克。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2 月 17

日载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新莱茵报”

第 2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泽 特

科伦 2 月 17 日。任何一个小地方都有它的 esprit fort (贤者); 科伦检察机关里也有这样的人。科伦检察机关的 Esprit fort 是一个叫做泽特的人, homo novus atque ignotus (一个新的不知名的人) (换言之, 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家)。

有两种勇敢: 卓越的勇敢和智慧贫乏的勇敢, 后者从自己的官职中, 从它在斗争时可以使用特权武器等等这种意识中汲取力量。科伦检察机关的 esprit fort 在他昨天控告金克尔²²⁷的起诉词中表现了哪一种勇敢, 在庭审记录公布以后, 公众自己就会得出结论。同时公众将考虑到, 泽特先生还年轻。

可是, 如果我们不立即向欧洲公众介绍我们的 esprit fort 的一句格言, 那我们就忽视了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我们知道, 科伦检察机关的狄摩西尼企图用以后的解释把他起诉词中的这个地方修饰一下。但是我们非常重视充满灵感的天才的那种直接启示, 不愿使这种启示因为解释——较晚的反射的结果——而被歪曲和削弱。

副国家检察官泽特先生声明:

用德语来说: 《Sie dürfen Alles, was ich sage, widerlegen, aber sie dürfen meinen V ortrag nicht kritisieren》. (“你可以反驳我所说的一切, 但无权批评我的起诉词。”)

用法语来说: M .Saedt, substitut du procureur du rois' adressant à l' accusé:

《Libre à vous réfuter tout ce que je viens de dire, mais il ne vous appartient pas de critiquer le réquisitoire d' un substitut du procureur du roi》. (Avis à la 《Réforme》, à la《République》et à la《Révolution》²²⁸ .)

(副王国检察官泽特先生向被告说:

“你可以反驳我所说的一切,但无权批评副王国检察官的起诉词。”(兹通知“改革报”、“共和国报”和“革命报”。))

用英语来说: The queen' s counsel, Mr .Saedt, to the defendant:

《You may refute all I say, but you have no right to criticize my speech》. (NB. Our English contemporaries, principally the《Northern Star》²²⁹, are requested to publish the above.)

(王室顾问泽特先生向被告声明:

“你可以反驳我所说的一切,但无权批评我的起诉词。”(注意我们请求我们的同时代的英国人,特别是“北极星报”转载这些话。))

用意大利语来说: Sig .Saedt, accusatore pubblico, replicò:

《Dite quanto volete in rifutazione di questo che ho detto, ma vi è difeso di criticare il mio requisitorio》. (Avviso all'《Alba》, al《Contemporaneo》ed alla《Concordia》²³⁰ .)

(国家起诉人泽特先生反驳说:

“你可以随便反驳我所说的话,但无权批评我的起诉词。”(兹通知“黎明报”、“现代人”和“协和报”。))

用西班牙语来说: El fiscal, Sennor Saedt, dijo, hablando alacusado:

《Sennor.V md puede refutar todo que ho dicho; pero el que vengo de decir pro requisitorio, es defendido de tocarlo》. (Pregamoslos jornales radicales de Madrid de publicar esas lineas.)

(检察官泽特先生向被告说:

“阁下可以反驳我所说的一切,但无权涉及我在起诉词中所说的话。”(我们谨请马德里的各家激进报纸转载一下这几句话。))

用丹麦语来说:《De Kunne gjensige alt hvad jeg siger, men De have intet Ret at kritisere mit Requisitoire (Angreb)》. (De danske demokratiske Tidender ville vaere meget glaedt at meddele det danske Publikum den foregaaende Bewiis af de preussiske Magistraters Saudhed.)

“你可以反驳我所说的一切,但无权批评我的起诉词。”(丹麦的各家民主报纸会乐意向丹麦公众介绍这个证明普鲁士官员的诚实品质的声明。))

让泽特先生本人去决定:他的格言用哪一种语言表达听起来最悦耳。

写于 1849 年 2 月 1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25 号

“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

科伦 2 月 17 日。

“我终于摸到了海底，
我的锚牢牢地扎在这里”，——

勇敢的施万贝克捧着新教赞美诗集引吭高歌。这个义愤填膺的卫道者不顾“奥地利照会”和“愤激若狂的心情”，终于在“科伦日报”**第一版**上出来替文迪施格雷茨说话了。

请听：

“德国的所谓民主报刊，在奥匈冲突中竟站在马扎尔人方面……真是稀奇的事情！德国民主派竟站在这样一个贵族等级方面，对于这个等级来说，尽管已经到了十九世纪，它自己的人民还始终是 *misera contribuens plebs*（可怜的纳税人民）；德国民主派竟站在人民的最无耻的压迫者方面！”

我们记不大清楚，我们是否让读者注意过勇敢的施万贝克的一个特点：他惯于只说出结论，而不说明前提。上面的几句话正好是这样的结论，可是对赖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却秘而不宣。

但是，即使马扎尔人真的是“人民的最无耻的压迫者”的“贵族等级”，那又该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文迪施格雷茨这个杀害罗伯特·勃鲁姆的凶手就会因此而变得稍微好一点吗？难道“联合君主国”的骑士们、德国的死敌和施万贝克的好朋友——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施利克等一伙人想镇压“贵族等级”并实行自由的农

民土地所有制吗？难道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为争取莱茵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和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而斗争吗？

1830年波兰人起义反对俄国，当时的問題是否在于“贵族等级”领导了起义呢？当时首要的问题是赶走外国人。当时整个欧洲都站在这个无疑领导了这一运动的“贵族等级”方面，因为波兰的贵族共和国比起俄国的专制政体来终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难道1830年法国规定的使二十五万人垄断了选举权的选举资格，实质上不是和贵族的统治一样，是对 *misera contribuens plebs* 进行政治奴役的工具吗？

姑且认为匈牙利的三月革命是纯粹贵族革命吧。难道奥地利“联合”君主国因此就有权压迫匈牙利的贵族，从而也压迫匈牙利的农民，就像它过去压迫加里西亚的贵族，并在后者的帮助之下压迫加里西亚的农民（见1818年里沃夫议会会议记录）一样吗？但是，伟大的施万贝克当然不屑知道，大多数匈牙利贵族也同大多数波兰贵族一样，都是纯粹的无产者，他们所享有的全部贵族特权只不过是不能对他们施以体罚而已。

伟大的施万贝克当然不屑知道，匈牙利是从三月革命时起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完全废除了农民的封建义务的唯一国家。伟大的施万贝克宣布马扎尔人是“贵族等级”、“人民的最无耻的压迫者”、“贵族”。可是这同一个伟大的施万贝克却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马扎尔的豪绅显贵们，如埃斯特哈济之流，从战争一开始就开了小差，并且跑到奥里缪茨致敬去了^①；也正是马扎尔军队中的“贵族”军官们从斗争开始直到今天每日每时都在出卖民族的事

① 1848年10月7日维也纳革命胜利后，奥皇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反动臣仆第二次从维也纳逃到奥里缪茨。——译者注

业！否则为什么大多数众议院议具（其中一共只有十一个豪绅显贵）直到现在还留在德布勒森城科苏特那里呢？

第一版上的施万贝克，在社论中高唱颂歌的施万贝克就是这样。但是第三版上的施万贝克，曾经六次冲击列奥波特施塔特^①、四度占领埃塞格^②、屡次强渡蒂萨河的施万贝克，作为战略家的施万贝克也想发表自己的意见。

“可是随后战争发生了悲惨的、简直令人可怜的转变。几乎没有经过战斗，马扎尔人就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自己的全部阵地；他们甚至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弃了设防的首都，于是耶拉契奇的克罗地亚人就迫使他们退到蒂萨河后面。”

“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是说，马扎尔人把奥地利人阻挡在莱达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地区达两个月之久以后，他们是“几乎没有经过战斗”而撤退的。英勇的施万贝克估计一个统帅的作用，不是根据其战斗的物质结果，而是根据其人力损失的多寡！

“他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弃了设防的首都！”但是应该知道，欧芬^③的西面固然已经设防，但东面却没有任何工事。多瑙河已经封冻，于是奥地利人的骑兵和辎重就渡到河的对岸，占领了佩斯，从那里用炮火轰击毫无防御的欧芬。

如果多伊茨没有设防，莱茵河又已经封冻，法国军队趁此机会在维塞林格和沃林根地区渡过莱茵河，并在多伊茨附近架起一百门大炮对准科伦，那末勇敢的施万贝克大概也会劝恩格斯上校保卫科伦，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吧。好一个勇敢的施万贝克！

① 维也纳的一个区。——编者注

② 克罗地亚称作：奥谢克。——编者注

③ 匈牙利称作：布达。——编者注

“耶拉契奇的克罗地亚人迫使”马扎尔人“退到蒂萨河后面”。这些“克罗地亚人”总计有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名士兵，其中包括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圭茨、乔里奇、西姆尼奇、努根特、泰奥多罗维奇、普赫纳等人的部队，以及驻扎在德拉瓦河畔和巴纳特地区的一些非正规部队，对于这一点，伟大的施万贝克能否认吗？而所有这些都是“耶拉契奇的克罗地亚人”？！不过，作为克罗地亚人的同族，而且对历史和地理只是一知半解的施万贝克是克罗地亚人的崇拜者，这一点倒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我们也决不认为奥地利大本营的官方公报是一种福音书”。相反，施万贝克常常在公报中，比如说在施利克的公报中发现

“一些必须由读者用各种各样的猜测来加以填充的空白，而结果毫不奇怪（!!），这些猜测所描绘的事态比实际情况要糟得多!!!”“我们也怀疑普赫纳的公报把事情说得过于乐观了。如果相信这些公报，那末他对‘叛乱将军’的征讨应该是接近于胜利的完成。可是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我们突然读到了普赫纳的呼吁，他在呼吁中恳求萨克森人和瓦拉几亚人为了神圣的一切而不要丧失勇气；我们也意外地知晓，被击溃了的贝姆突然出现在格尔曼施塔得^①附近，即萨克森人聚居地区的中心，而可怜的德国人（!!）却终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去向俄国人寻求保护。于是在官方的公报和事变之间就有了一个不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完全是由官方公报的不精确（!!）所造成的。”

施万贝克公民承认，奥地利的公报以及后来的“科伦日报”曾厚颜无耻地谎报奥地利人的战绩；而当谎言已经十分明显，绝对无法否认的时候，热爱真理的施万贝克就把这称为“官方的公报和事

^① 罗马尼亚称作：锡比乌。——编者注

变之间的一个不大的矛盾”。

“但是，如果说我们决不把奥地利军队的公报当作神论来看待，那末这丝毫也不能使匈牙利的捷报在我们的（观察了上述“不大的矛盾”的）眼睛中赢得什么东西。这些捷报是通过幻想编造出来的，它们如果不是这样滑稽可笑，那末读起来也许很舒服。”

这些“捷报”真是如此“滑稽可笑”，直到现在，它们除了伟大的施万贝克自己所被迫承认的以外，什么也没有报道出来。也许托卡依现在掌握在施利克的手中？是否有一个奥地利人在索尔诺克渡过了蒂萨河呢？奥皇军队在十四天之内是否前进了一步呢？

我们刚才收到的奥地利的第 22 号公报（见下文）²³¹使施万贝克公民的任何回答都成为多余的了。从这份公报中我们了解到，奥地利人甚至还没有到达第 20 和 21 号公报所说的那些地点。

“无可奈何：匈牙利战争正飞速地走向结束。”这是很明显的。施万贝克还在十四天以前就已经写道：“匈牙利战争正走向结束。Parturiunt montes, nascetur ridiculus mus”（雷声大雨点小）。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正是施万贝克第一次宣告奥地利人胜利地进入德布勒森城的时候。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四天，尽管说马扎尔人“大言不惭”，但奥地利人直到现在甚至还没有渡过蒂萨河，更不用说占领德布勒森了。

“从四面八方溃退下来的成群的匈牙利人加入了贝姆的队伍，于是他的队伍变成了一支特兰西瓦尼亚的人数不多的奥皇军队所不能抵挡的大军；这一点不应该使任何人感到惊奇。”

决不应该！但是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正当匈牙利人占据着蒂萨河与马罗什河战线，而施万贝克公民虽然热诚祷告也无法使一个奥地利人穿过这条战线的时候，怎么可以说是“从四面八方溃退

下来的成群的匈牙利人”；其次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溃退的人群”居然能突然组成为一支大军，而追击他们的军队竟不立即赶来，把他们从新的阵地上撵走。也许伟大的施万贝克认为，在他那朦胧的幻想中被打得一败涂地的匈牙利人会头也不回地一直从多瑙河逃到阿柳塔河^①，而不管后面是否有人在追击他们。

施万贝克公民把自己变成了十九世纪的卡诺，因为他表现了一种新的迂回运动，用这种迂回运动可以使从四面八方溃退下来的人群突然变成一支常胜大军。

当然，这支新的常胜大军会使情况大大复杂化。但是，——施万贝克写道，——

“我们要看俄国在这里怎样使用它的否决权”。

现在正向俄国求援来反对马扎尔人的勇敢的施万贝克，就是去年3月22日曾经发表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反对俄国沙皇的那个施万贝克。当时这位施万贝克宣称，如果俄国干涉我们的事情（要知道马扎尔人的事情无疑也是我们的事情），那末他施万贝克就要发出震撼沙皇宝座的呼声。正是这个施万贝克在“科伦日报”中一直负有这样一种责任，即用及时表现出来的仇恨情绪和用适当的谨慎的自由思想来挽救“科伦日报”在安全的东欧各国中的自由主义声誉。但东欧的纠纷显然使他感到很苦恼，于是为了完全听任因奥地利照会而产生的“激愤若狂的心情”的驱使，他便呼吁俄国人到特兰西瓦尼亚来结束斗争。

对这篇从头到尾以文迪施格雷茨的精神大声说教的文章的最

^① 罗马尼亚称作：奥尔特河。——编者注

好回答，就是读者在下面可以读到的奥地利军队的第 22 号公报。施万贝克在这篇文章中显得对地理和战略一无所知，而且常常要依赖“新莱茵报”；为了向他说明这份公报的含义，我们把我们对公报的评论也一并刊载出来。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2 月 17 日
载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新莱茵报”
第 2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罗马宣布成立共和国²³²

意大利的制宪议会不是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意大利人知道，一个分成许多封建小国的国家要想达到统一，非消灭各邦君主的权力不可。意大利人在 1848 年最先开始了运动，而在 1849 年又是他们最先开始的。这是怎样的进步啊！正像法国已经没有拉马丁一样，意大利再也没有庇护九世了。充满幻想的欧洲革命时期，富于遐想、良好愿望和华丽辞藻的时期，在炮击、大屠杀和流放中庄严地结束了。奥地利的照会、普鲁士的照会、俄国的照会是对拉马丁的呼吁的最适当的回答。

德国人凭着自己的彻底性和顽强精神，习惯于用皮蒂娅的那种傲然睥视一切的态度从上面向下观看肤浅的意大利人。把意大利的 1848 年同德国的 1848 年作一对比，会是对德国人的最好的回答。在作这样的对比时，首先必须考虑到，革命的意大利曾受到德国和法国的威胁，而革命的德国在自己的行动中却丝毫没有受到阻碍。

罗马共和国！——这是 1849 年革命的序幕。

写于 1849 年 2 月 21 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2 月 2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28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再论旧普鲁士的财政

科伦 2 月 21 日。我们必须补充一下本报第 224 号刊载的我们那篇评论博德尔施文克之流和普鲁士财政部门的文章。^①我们曾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指出，记入国库表册中的款项，比根据国家储金总局的决算拨给国库的款项少了 27 127 塔勒（上次误印为 17 127）。后来，我们在政府公布的报告中发现了一项记载，这项记载可以解决这笔钱下落不明的谜。

原来，1844 年的行政开支中为数 2 000 002 塔勒的所谓储蓄，并没有以现款拨交国库，而是用这笔钱购买了普鲁士的国库债券。由于当时国库债券的行市不利，在购买时亏损了 27 127 塔勒。普鲁士大臣们是——或者以前是——一些出色的财政家！这一点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来。因此，关于这 27 127 塔勒的去向，我们就不必再质问前任的大臣先生们了。我们可以告诉他们的只有一点：他们的善于经营的本领在这件事情上使我们遭到的损失不只是 27 000 塔勒，而是 400 000 塔勒以上。这种责难首先是针对弗洛特韦尔先生的，因为他当时是财政大臣。也许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它的大臣们使它遭受损失是由于自己无能还是由于心怀恶意，这反正都一样。研究这个问题可能只有这位大臣的

^① 见本卷第 343—354 页。——编者注

亲属有兴趣。

当时的国库大臣冯·梯勒在其 1847 年 4 月 6 日关于国库的报告中完全公开地宣称，在国库方面确定了以下两条基本规则：

- (1) 国库的现金永远应当是**硬币**；
- (2) 除了军备开支以外，不得从国库支取任何金额。

至于第一条规则，那末既然一般地必须有国库存在，那当然只有在国库中存有**现金或贵重金属**的情况下，国库才有意义。一个无法依靠人民的政府，为了以防万一，必须在所谓的艰难时期拥有某种后备。当政府的信用在交易所里也开始动摇的时候，政府必须有资金储备，以便摆脱这种困难的境况，而这只有靠现金或贵重金属才能做到。黄金和白银在任何时候都能开启资产阶级的心扉。而国家证券的贬值则是使交易所的“尊严”也要丧失的最有效的办法。当国家的信用大降，以致需要国库来支持的时候，没有比向交易所抛出国库债券并为其找寻买主更有失体面的了。观察过大交易所生活的人都知道，在国家信用下降时向金融投机商抛售国家证券，这些投机商会表现出何等蔑视的表情和姿态。话又说回来，这种投机商人可能是商业枢密官，甚至还是非常“善意的”枢密官。

可见，购买国库债券是普鲁士政府所能采取的最不成功的措施。

冯·梯勒先生在上述的报告中声明，他**被迫**接受了 1 972 875 塔勒的国库债券，而不是 2 000 002 塔勒的现金。我们认为，所谓他似乎是“被迫”这样做的解释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如果报告可靠的话，国家证券就是由国家储金总局购买的。否则，全部金额会以现金转交国库。因此，弗洛特韦尔先生看来是和这个成功的财政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资产阶级的悭吝使人竭力在利息上面打算盘,但是不能使人考虑全国范围的重大财务问题。这种悭吝怎样导致双倍亏本的可耻的结局,这从以下的数字中看起来。

在买进时比票面价格亏损了…………… 27 127 塔勒
 应当加上在卖出时的更大的亏损。从 1848 年 3 月到
 7 月初,国库债券的行市摇摆于 66% (“买主”) (4 月 4
 日)和 83.5% (“卖主”) (3 月 21 日)之间。而因为在卖
 出时刚出现大量的证券,行市就立即下跌,所以应该
 认为政府卖出它的国库债券没有高于债券价格的
 70%。由此可见,在卖出时亏损了,亏损数目大约
 不少于票面价值 197 2875 塔勒的 30%,也就是……591 840 塔勒
 总计……………618 967 塔勒
 的亏损。从这里应当减去三年的利息(每年 69 048
 塔勒),共…………… 207144 塔勒
 这样,纯亏损的金额大概是…………… 411 823 塔勒
 几乎损失了全部金额的 $\frac{1}{4}$,并且国家的信用由于国库债券行市的
 下跌而受到了更严重的破坏。

我们之所以详谈普鲁士财政大臣和国库大臣弗洛特韦尔—梯勒之流的英明手段的这个小小的范例,仅仅是因为这个例子是对我们上面谈到的那篇文章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否则,当许多重大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研究这类小事情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2 月 21 日
 载于 1849 年 2 月 23 日“新莱茵报”
 第 22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小资产阶级的悭吝使人竭力在利息上面打算盘,但是不能使人考虑全国范围的重大财务问题。这种悭吝怎样导致双倍亏本的可耻的结局,这从以下的数字中看起来。

在买进时比票面价格亏损了…………… 27 127 塔勒
应当加上在卖出时的更大的亏损。从 1848 年 3 月到
7 月初,国库债券的行市摇摆于 66% (“买主”) (4 月 4
日)和 83.5% (“卖主”) (3 月 21 日)之间。而因为在卖
出时刚出现大量的证券,行市就立即下跌,所以应该
认为政府卖出它的国库债券没有高于债券价格的
70%。由此可见,在卖出时亏损了,亏损数目大约
不少于票面价值 197 2875 塔勒的 30%,也就是……591 840 塔勒
总计……………618 967 塔勒
的亏损。从这里应当减去三年的利息(每年 69 048
塔勒),共…………… 207144 塔勒
这样,纯亏损的金额大概是…………… 411 823 塔勒
几乎损失了全部金额的 $\frac{1}{4}$,并且国家的信用由于国库债券行市的
下跌而受到了更严重的破坏。

我们之所以详谈普鲁士财政大臣和国库大臣弗洛特韦尔—梯勒之流的英明手段的这个小小的范例,仅仅是因为这个例子是对我们上面谈到的那篇文章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否则,当许多重大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研究这类小事情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2 月 21 日
载于 1849 年 2 月 23 日“新莱茵报”
第 22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本来可以谈出很多东西，可是它宁愿对这个问题完全保持沉默。在巴登南部，下层居民已经受了好几个月的来自巴黎的鼓动。本地民主派和在瑞士的流亡者之间的联系也同样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对于这种卑鄙无耻的告密，我们作如下的回答：一、我们从来没有隐译我们同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波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派的联系；二、那些确实是因为我们而“泛滥在莱茵河流域的德国地区”（岂止这一地区！）的“革命传单”，是我们自己在科伦这里印刷的。做这件事我们并不需要巴黎的帮助；许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让我们的巴黎朋友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援助多于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援助。

写于 1849 年 2 月 2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2 月 23 日
“新莱茵报”第 229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御前演说

—

科伦 2 月 28 日。昨晚过于匆忙地向“新莱茵报”读者披露的御前演说，使“科伦日报”万分恐慌和苦恼；现在证明已披露的御前演说是与原话无关的。一夜之间，只有一段话，即关于柏林戒严的那一段话，有了更动。这样一来，勃兰登堡内阁就把本质的东西删除了，把自己的言论的锋芒削弱了。

我们昨晚披露的这一段话的原话如下：

“为了恢复法定秩序，有必要在首都及其近郊宣布戒严。只要目前尚受到威胁的社会安全（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必须采取这一措施）还没有得到强硬的法律的经久可靠的维护，戒严就不能取消。这些法律的草案将立刻提交给你们。”²³⁷

这一段话虽然也是遮遮掩掩，但还是泄露了御前演说的全部秘密。直截了当地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只要普遍戒严被钦定为全王国的法律并成为我们的立宪惯例，特别戒严就会取消。这一套“强硬的”法律将以关于结社和出版的九月法令²³⁸开始^①。

① 在报上接着转载了御前演说的全文。——编者注

二

科伦3月1日。我们首先要指出,御前演说受到了“科伦日报”的满堂喝彩。该报对御前演说中所提到的政府的一些行动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但是对御前演说本身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批评意见。

“国王的御前演说是真正宪政的御前演说”,——这家精明的报纸的社论是这样开头的,这篇社论实质上不过是解释御前演说罢了。

“宪政的御前演说”!其实,对于那些曾经在联合议会中期待“国王的肺腑之言”、枯燥的训诫性的真诚谈吐的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希望看到勃兰登堡和弗兰格尔的那种一边不时碰响马刺和洋洋得意地捋捋胡子、一边自吹自擂的姿态的人来说,这个文件应该是非常“宪政的”。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方面,曼托伊费尔比康普豪森能干得多,他完全抛弃了1847年的“天才的演说姿态”。资产阶级的大臣提出了资产阶级式的肤浅的、艰涩的、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枯燥无味的文件。贵族的大臣则以最大的温顺服从枯燥无味的宪政形式,企图利用这种形式,用轻快平稳的语调来嘲弄两院和整个立宪政体。

至于御前演说的实质,正如我们昨天所提到的,关于保持戒严的那一段话被掩盖起来了,因此演说的实质几乎一点也没有留下。这是内阁在演说中坦白地和诚实地向议会表明态度的唯一的一段

话。

只有“科伦日报”或柏林“国民报”才把御前演说的其余部分也当做真话。谁要以虔敬的心情和郑重的态度来观察前天在柏林演出的那出宪政的戏剧，谁就太天真老实了，当然也就永远不能了解：怎么可以把这种神圣的行为变成猥亵的笑柄。但是，那些像曼托伊费尔先生那样对这整出宪政的喜剧很少感到兴趣的人，就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以致于 *au sérieux* (认真地) 看待大臣在前天代表上帝庇佑的君主送给白厅²³⁹的洗耳恭听的公众的文件。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向可惜很不习惯于微妙的智力游戏的德国公众说明曼托伊费尔先生的御前演说的真实含义，那会使曼托伊费尔先生感到高兴。

你们以为，曼托伊费尔会吹嘘他所实行的反革命的顺利结局，会像笨拙的骑兵班长弗兰格尔之流那样，荷枪实弹和用锋利的马刀等来威胁议会。恰恰相反！曼托伊费尔对于这一切只是用几句话顺便提了一下，就像是谈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样。

“第一议院和第二议院的诸位议员先生，你们还记忆犹新的那些事件，迫使我在去年 12 月解散了为协商宪法而召集的议会。同时，由于我坚信绝对必须彻底恢复巩固的公共法律秩序，我赐予了全国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的内容完全符合我在去年 3 月所许下的诺言。”

曼托伊费尔先生这样说，就像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一样——就像在谈用新礼服来换旧礼服，任命一个编制外的官员或逮捕某个“煽动者”一样。强迫有自主权的议会迁移、延期和解散，宣布戒严，实行军刀制度——总之，整个政变，都被说成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那些事件”。这就完全跟高贵的总督耶拉契奇一模一样，他也是极其从容不迫地谈论他的披着红斗篷的士兵怎样活

活地烧死某个农村居民。

于是就以钦定的所谓宪法来“完全实现我在去年3月所许下的诺言”！你们认为狡黠的曼托伊费尔竟糊涂到认真地说这些话吗？Allons donc（算啦）！

这样的开头使人大为惊愕。但是应当善于利用这种最初的惊奇，以便随后再赠送一些更令人惊奇的东西。曼托伊费尔先生是这方面的能手！

“从那时起，几个月以前还笼罩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紧张状态已让位于比较安静的气氛。受到这样严重破坏的信用又逐渐重新恢复。商业和工业开始摆脱曾经威胁它们的萧条而恢复元气。”

当可尊敬的议员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样的眼光面面相觑啊！商业和工业在恢复元气！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同一个曼托伊费尔既然能钦定宪法，为什么不能钦定一个“商业和工业”的高涨呢？曼托伊费尔在说出这种难以置信的断语时所表现的过于自信的态度真正是令人吃惊的。Mais nous marchons de surprise en surprise（但意外的事情接踵而来）：

“诸位，你们知道，我授予你们以修改宪法的权利。现在你们的工作就是在彼此间以及跟我的政府把此事协商好。”

当然罗，诸位，“协商”！但是讽刺也就在于，像曼托伊费尔钦赐给“我的人民”的这样两个议院是永远不能够“在彼此间协商好”的！那末究竟为什么要想出个第一议院来呢？诸位，如果你们竟出乎意料之外地在彼此间协商好了，那末你们还得跟“我的政府”达成协议。而你们跟它是什么也协商不好的——曼托伊费尔担保这一点！

可见，第一议院和第二议院的诸位议员先生，你们修改宪法就

已经够忙了。“我”根据经验确信，在两个缔约者之间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力求在三个不容许协商的要素之间达成协议是适当的。我担保你们会这样永无休止地进行协商性的辩论而毫无进展；否则曼托伊费尔就会答应担任“国民报”的撰稿人了。

好啦，诸位先生就“协商”吧！

但是，即使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你们终于解决了那由于礼貌而不得不称为你们的任务的事情，你们还是决不会因此而前进一步。所以，“我的政府”“为实施宪法”而颁布了将近一打法律，这些法律使这部宪法的最后一点自由主义的影子也消失了。这些法律中有两个行会规章²⁴⁰。这两个规章堪称是 1500 年的规章，它们可以向你们这个如此成功地勾结起来的代议机关提出十年的伤脑筋的工作。“所有这些法律都将立刻提交你们批准。”

好啦，诸位先生就“批准”这些法律吧！

但是随后“我的政府”会立刻提交给你们一些有关戒严的法案——九月法令、gagging laws²⁴¹、禁止俱乐部活动法令等等。而在你们“批准”这些法令以前（应当相信事情永远达不到此种地步），戒严应继续保持下去。

你们认为你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止于此吗？——决不是，最重要的还在后面：

“此外，你们还要讨论各种法律——为实施宪法所必需的一部分——，这些法律草案将陆续提交给你们。我特别建议你们严密注意下述草案：新市政条例，关于县、行政区、省的机构的新条例，国民教育法，教会管理法，所得税法，土地税法，关于田赋购买法和关于无偿废除某些田赋的法律，以及创立农业银行的法律。”

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大约有三打构成法，好几千条条文，诸位先

生，你们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以致修改宪法、批准预定的法律、讨论提出的草案等工作顶多只能完成一半。即使这样，你们也得表现出真正超人的工作能力。可是在目前，各地还在继续戒严，而且在还没有戒严的地方也要实行戒严（谁妨碍我们在全普鲁士“按地区”实行戒严呢？）；在目前，钦定的所谓宪法和钦定的补充法令仍然有效，至今还在实行的根本不适用的市政条例仍然有效，同样情形的县、行政区、省的代议制也仍然有效，将像以前一样没有受教育的自由，高等贵族仍然免纳土地税，农民还要服徭役。

但是为了使你们不能抱怨，除了这一切未完成的工作以外，还要提交给你们 1849 年和 1850 年的**两份预算**。你们会被这么多的工作激怒得从自己座位上跳起来吧？那就更好，第一议院和第二议院的诸位议员先生。这样，“我的政府”就将根据钦定的所谓宪法，永世地征收现行的各种赋税。何况，联合议会所批准的二千五百万已经剩下不多了，如果“我的政府”还需要钱用，那它就会自己决定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步被解散的国民议会的后尘，那末，诸位先生，我提醒你们，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战斗力和忠诚”是“经受了严重的考验”的，特别是在去年 11 月大肆搜捕协商派的时候“经受了严重的考验”。

好啦，第一议院和第二议院的诸位议员先生，现在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使你们既不能在彼此间协商好（由于两院的成分），也不能跟“我的政府”协商好（由于“我的政府”的成分）；已经提交给你们这样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你们即使别的任何事情一概不管，也不能搞清楚这些材料的一小部分，这样，就保持住了官僚封建的军事专制制度，——在这样的时候，你们要记住祖国所期待于你们

的是什么：

“第一议院和第二议院的诸位议员先生！现在，祖国信赖地希望，由于它的代表和我的政府的通力合作，能使重新建立起来的法定秩序得到巩固，以便有可能享受宪政的自由和这种自由的平静发展。保卫这些自由和法定秩序——这两个社会福祉的基本条件，将永远是我关注的对象。我指望在这件事情上能得到你们的帮助。依靠上帝的保佑，你们的活动一定会使普鲁士的尊严和荣誉得到提高，普鲁士的人民同自己的君主们紧密地团结一致，已经不止一次地顺利渡过了艰难的时刻；同时，你们的活动也会为祖国创造出一个在狭义上和广义上都是和平幸福的未来！”

公民曼托伊费尔的御前演说就是这样。而居然有一些毫无风趣的人竟把这种巧妙表演的喜剧称为“宪政的御前演说”！

真的，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促使曼托伊费尔先生丢掉他的公事皮包的话，那就只有这种对他的最善良的意愿的曲解了！

写于 1849 年 2 月 28 日—3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 日和 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34 和 235 号

卢 格

科伦 3 月 9 日。“德意志总汇报”²⁴²刊载了该报的老撰稿人、性格如波美拉尼亚人、聪慧如萨克森人的阿尔诺德·卢格先生的下述声明：

“柏林 3 月 5 日。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现任委员德斯特尔、赖辛巴赫和赫克札梅尔宣称，即将出版一种名为‘民主总汇报’的新的民主派报纸，这家报纸将‘真正’是柏林党的机关报。这一声明很可能引起疑惑，使人以为‘改革报’和‘阅报室’这两种报纸似乎不真正是党的机关报，而在声明的开头甚至还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两种报纸都被查封了。中央委员会宣称并认为弗兰格暂时停止这两家报纸的出版是彻底查封两报，声明的这一部分的全文如下：‘民主派最近几个月来在德国各地所经受的种种严重的考验，不仅使它深信必须有坚强的组织，而且也使它感到需要有固定的、属于党的机关报作为它在报界的代表。当局依靠军刀制度，得以在许多地方（‘军刀制度’其实只统制着柏林！）查封了一些民主派的机关报，因为某些个别人不能够忍受如此重大的牺牲来使这些暴力措施无效’。至于军刀制度，每个人都知道所谓‘许多地方’只是柏林。甚至整个民主派也只有消灭军刀制度，才能使这些措施‘无效’，因为弗兰格已经使柏林和柏林的邮局不接纳民主派的机关报。就让中央委员会指出那些手段——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牺牲’，借助于这些手段它处在我们的地位就可以使这种暴力无效吧！可是，即使按照弗兰格的意见，‘改革报’和‘阅报室’也并没有‘被查封’。然而我确信，凡是收到上述通告的民主派都会把通告解释成，似乎‘改革报’和‘阅报室’都已经停刊，代之而起的将是‘民主总汇报’。我认为必须消除这种误解。‘改革报’并未彻底被查封，一旦柏林取消戒严，它就会重新开始柏林出版，而且正是作为民主派的

真正的机关报出版；根据已被解散的国民议会的左派和德国民主主义者上届中央委员会的明确的决议，这一机关报同由本届中央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德斯特尔和赫克札梅尔）所钦定的新报纸一样地‘属于’党。

‘改革报’编辑部

阿尔诺德·卢格”

笔者附言：“请求德国各报的可敬的编辑部转载我们的这个声明。”

我们感到非常满意的是，我们从这个值得注意的声明中知道，*ci-devant* (以前的)法兰克福的“事变的理智的编辑”²⁴³，现在的发行人——毫无疑问是“作为一个发行人”——决不自认为他满意于钦定“在柏林”发行新的民主派报纸²⁴⁴，即应该“真正”成为“柏林党”的机关报的报纸。

法兰克福的“事变的理智的编辑”和“改革报”²⁴⁵的柏林编辑阿尔诺德·卢格先生断言，“改革报”“本身”也曾经是“柏林党”的机关报；根据民主主义者“上届”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改革报”“曾属于”（如法国人所说，*elle avait été*（老早以前它是））“党”的。不错，“上届”中央委员会“真正”不再存在了，但是正因为如此，重新出现的“改革报”才能仍然是已故的中央委员会和“已被解散的”国民议会的已被解散的左派的“真正的”机关报。

还是让阿尔诺德·卢格先生去反对来自刚刚钦定的柏林“民主总汇报”的发行竞争吧；在柏林以外，谋求“柏林党”的机关报这个光荣称号的报刊肯定是比较少的。我们至少一向认为“改革报”是“柏林党”的“真正”机关报；我们也能充分地珍视爱国志士卢格由于上述“牺牲”而做的自我克制。可是结果却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矛盾。高贵的印刷厂主卢格站在法制基础上，以便保持自己的“改革报”成为党的“真正的”（*sans garantie du gouvernement*（未得政府保障）而享有专利权的）机关报。另一方面，哲学家卢格却又站在

叛变的立场上来反对“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以便“真正”有可能以自己的精神（以书商的精神）来造成更多的“牺牲”。

下述事实可以作为这个矛盾之谜的解答：

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已经向卢格声明，愿意把“改革报”当做自己的《M oniteur》^①，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位卢格不发表一切议论并停止写作。

写于 1849 年 3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0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42 号

① 《M oniteur》（“通报”）全名为《Le M oniteur universel》（“总汇通报”），1789 年在巴黎出版，是代表法国政府的报纸，这里借指正式机关报。——译者注

经济状况

科伦 3 月 6 日。对英国人来说,从没有比他不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金钱的时候更为不幸的了。这就是一切大投机买卖、一切盈利的企业的秘密所在,但同时也是一切破产倒闭、一切金融危机和商业停滞的秘密所在。

在 1840 年、1841 年和随后的几年中,新的亚洲市场除了与欧洲大陆进行一般的贸易以外,对英国的输出提出了特别的需求。工厂主和出口商有充分理由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中向亨利·璞鼎查爵士高呼“万岁”。可是好景不常。广州、孟买和加尔各答很快就为滞销的商品所充斥,而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出路的资本为了扭转危局,重又在国内寻找用途。它涌入铁路建筑部门,从而为投机倒把开辟了活动场所,使投机活动很快就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根据保守的统计,新的投资总额估计有六亿,如果不是英格兰、爱尔兰和大陆某些地区的马铃薯歉收,棉花价格暴涨,和因这两种情况而造成的工业品销路缩减,以及铁路事业方面的狂热的投机倒把使英格兰银行于 1846 年 10 月 16 日把贴现率提高了 50%,那末新的投资总额也许增加得更多。

在不列颠人对本国银行万能所具有的迷信的恐惧心理支配下,贴现率的这点点提高,或者换句话说,银行经理的这种不信任表示,立刻引起了相应的反应:精神普遍颓丧了,信贷受到了限制,

继表面繁荣之后发生了大量的破产现象。结果，假若不是随即废除了谷物法²⁴⁶，从而意外地巩固了已经动摇的信用并重新激发起了企业主的事业心，那末马上就会爆发像 1825 年和 1836 年那样大规模的商业危机。

这一重大措施所产生的短时期的影响，使贸易界满怀奢望，因此它轻易地忘记了几乎降临的灾难。俄勒冈冲突²⁴⁷的消除预示当时仍然兴旺的对美贸易将继续下去，英国在旁遮普的胜利²⁴⁸保证了印度斯坦的安宁，这一切自然也使得人们又振作起来。虽然在 1845 年的歉收以后，1846 年又遭到了同样的歉收，虽然各地都还不得不靠以前的积蓄来勉强为生，不得不支付经营企业所需贷款的 12—15% 的利息，但是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所有的纺纱厂仍然不停地开工，仿佛歉收、铁路方面的投机倒把和市场上的商品充斥现在突然都变成了一瞬间就可以解决的纯粹的小事。

然而这一切好景很快就消逝了。其实，早在 1847 年 9 月，当包林博士在自由贸易论者布鲁塞尔会议上以令人捧腹的激动神色过高评价废除谷物法的神奇影响时²⁴⁹，伦敦就已有人指出，甚至“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万能措施”也已经不能挽救国家免除人们早就怀着恐惧等待来临的灾难。不得不向命运屈服，而伦敦一些像里德·厄尔文公司那样在毛里求斯岛上拥有将近百万英镑地产的公司，由于这部分英国殖民地的悲惨状况，开始纷纷地倒闭和破产，同时又殃及东印度和西印度的许许多多较小的公司。

同时，工厂区的首脑们确信他们在估计废除谷物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上犯了错误。商业活动在世界各地都停顿了，而恐怖也在这同一时刻笼罩了伦敦的西蒂^①、利物浦、曼彻斯特、里子等地的

① 伦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译者注

交易所。

于是，在 1845 年 10 月被各种事件挡住了的危机终于在 1847 年 9 月爆发了。信用扫地了。精力消耗尽了。英格兰银行不援助国内的银行；这些银行也停止了对商人和工厂主的信贷。银行家和出口商开始限制自己同大陆的交易，而大陆上的商人也开始对欠了他们债的工厂主施加压力；工厂主自然竭力想靠批发商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批发商则压榨小店主。每个人都力求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摆脱困境，而商业危机的灾难也就逐渐震撼了全世界，从伦敦西蒂的巨贾到最末一个德国小店主，无一幸免。

这是 1848 年 2 月 24 日以前的事！在 1847 年的最后四个月，英国经历了最不景气的日子。铁路业的投机商破产了；在殖民地商品的贸易方面，从 8 月 10 日到 10 月 15 日，伦敦有二十家第一流的商行相继倒闭，这二十家商行的资产总额为五百万，所生股息约占全伦敦的百分之五十；而在工厂区，11 月 15 日曼彻斯特的一百七十五家纺纱厂中充分开工的只有七十八家，一万一千名工人被抛到街头，灾难达到了顶点。

1847 年就这样结束了。1848 年间大陆受到了英国这次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这一次自然更加显得严重，因为政治上的动荡也未能促使英国的这一非常事变的后果得到消除。

现在我们来谈谈现代经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即革命对贸易活动的影响。

英国贸易出口统计表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说明，因为在英国支配着世界贸易的情况下，这些统计表的内容就正是用数字表明的政治和贸易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数字表明的各国的支付能力。

因此,如果我们看见,1848年4月的输出额缩减了1 467 117英镑,5月又缩减了1 122 009英镑,1847年的输出总额达到51 005 798英镑,而1848年总共46 407 939英镑,那末,由此就可以作出对革命非常不利的结论;并且,当我们看到1848年1月和2月即革命爆发前夕的输出额确实是比1847年多294 763英镑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因为,第一,在1月和2月中,即正是在区分危机的顶点和革命的两个月中,输出额有所增加,这很容易解释,因为那时美国人用卖给英国大批粮食所得的钱购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英国工业品,这样就至少在短期内防止了可能出现的赤字。第二,在英国的贸易史上,我们可以找到特别显著的例证来说明,输出额的缩减不是紧接在危机之后,而只是在危机已扩展到大陆上以后才发生的。

因此,1848年头两个月的输出额有所增长这一点绝不应使我们产生错误的认识,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看看输出额在全年内的普遍缩减。

我们已经指出,1848年的输出额比1847年的输出额下降了4 597 859英镑。这自然是颇大的缩减,这种缩减变成了那些在政治上宛如狂吠的恶犬、在贸易上宛如年迈的老太婆的反动分子反对革命的口实,遗憾的是,他们竟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口实来同一切不熟悉经济问题的人们进行争辩。

然而,驳倒这帮人的谰言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因为只要翻阅一遍近三十年来的出口统计表,就可以看出,由于商业危机和革命的同时影响所造成的1848年输出额的缩减,同前几年输出额的下降没有丝毫联系。

1825年的输出总额是38 870 851英镑，在这一年的商业危机以后，1826年的输出额下降到了31 536 724英镑。因此输出额缩减了7 334 127英镑。1836年的输出额是53 368 572英镑，在这一年的危机以后，1837年的输出额下降到了42 070 744英镑。因此，输出额缩减了11 297 828英镑。再没有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这两次商业危机固然都是完全由工业品的生产过剩引起的，但在规模上根本不能同刚刚结束的危机相比。在这两次商业危机以后，输出额的缩减总数比1848年的输出额下降的总数大一倍，而1848年是这样一个年头，在这一年以前，亚洲市场就已为货物所充斥，发生了两次歉收，投机活动的规模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在这一年中，旧欧洲的每个角落都掀起了革命！

的确，1848年对于贸易还是很仁慈的！革命使得各地的贸易停滞了，出卖货物困难而危险，不少人在债务的重压下破了产。但是，去年路易-菲利浦当政时，也和今年共和国时期一样，在巴黎同样很难盘点出两万或三万法郎这样很少几个钱。在德国南部，在莱茵，在汉堡和柏林，无论发生革命与否，我们也一样地遭到破产，而意大利的贸易无论是在教皇庇护的统治时期或是在米兰、罗马和巴勒摩的英雄们的统治时期，都同样处在被压迫的境地。

因此，硬说贸易的重新活跃是反革命暂时胜利的结果，同样也是可笑的。法国人之所以在伦敦的拍卖中肯多付百分之二十五的价钱来收购羊毛，并不是因为路易-菲利浦的一些大臣重新掌了权，——不是的，他们之所以要付昂贵的价钱，是因为他们需要羊毛，而他们之所以需要大量羊毛，他们的需求之所以增加，正是因为路易-菲利浦统治的最后几年中这种需求缩减得非常厉害的缘故。需求的这种波动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可以看到。

而英国人之所以又整天地在一切矿山中，在一切锻铁场中，在一切纺纱厂中，在自己的一切港口上工作，并不是因为某个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根据战地法庭的判决处死了一些维也纳人，——不是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工作，是因为广州、纽约和圣彼得堡的市场需要用工业品去供应，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开辟了一个似乎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投机买卖的新市场，是因为继 1845 年和 1846 年的歉收之后出现了 1847 年和 1848 年的两次丰收，是因为英国人消灭了铁路业方面的投机活动，是因为货币重又回到了自己往常的轨道上，而英国人将工作下去……直到爆发新的商业危机。

但是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决不是君主制国家最近几年中对英国的工业产品提出了主要的需求。那个几乎毫不间断地向英国产品提出了最大量需求的国家，那个现在还在吞食曼彻斯特、里昂、哈里法克斯、诺定昂、罗契得尔等地市场上和现代工业的所有大通商港口上的一切货物并以自己的船舶来活跃海洋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即北美合众国。正当现在世界上的一切君主制国家都摇摇欲坠的时候，这个国家却大大地昌盛起来了。

如果说德国的某些工业部门的状况在最近几年内有所好转的话，那末这也只应归功于英国的繁荣时期。但愿德国人能从全部经济史中知道，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史，他们必须为英国的危机付出代价，而在英国的过度生产时期，他们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好处。而他们的各个基督教德意志政府给他们的恩典只是加速破产而已。

写于 1849 年 3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7 日
“新莱茵报”第 239 号

“新莱茵报”

英国士兵的誓言

科伦 3 月 7 日。“新普鲁士报”万分得意地援引英国士兵的誓言，并且由于发现英国士兵只宣誓效忠于女王而并不宣誓效忠于宪法，感到无比高兴。它说，我们在普鲁士这个最年轻的立宪国家中，为什么要一反最古老的立宪国家的先例，迫使士兵对宪法宣誓呢？

但是，“新普鲁士报”却忘记告诉自己的读者，英国士兵对于民法是处在怎样的地位。

英国士兵在犯了一切不是纯粹纪律的过失时，都由普通法院、治安法院、petty sessions (小型审判庭)、quarter sessions (季度审判庭)²⁵⁰或陪审法庭进行审讯，他们和其他公民发生任何纠纷时，都被当做普通公民看待，——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但还不止于此。在英国，每一个公民，不管他是官员、士兵或者是其他什么人，都要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负法律责任，而不能借口某项行动是按照自己上司的命令作出的。举例来说，发生了叛乱。召来了军队。不论是否根据法律提出了驱散民众的要求。民众拒不散去。不论民政官（通常是治安法官或选任的市政官）是否准许军队进行武装干涉。士兵开枪射击，有人被打死。尸体由负责调查现场情况的专门验尸委员会检验。如果验尸委员会认为军队的武装

干涉并非出于不得已的情况，它就会对所有肇事者，即对准许军队进行武装干涉的民政官、命令开枪射击的军官和**所有确实开枪射击的士兵**作出蓄意谋杀的裁决。

如果民政官没有准许军队进行武装干涉，那末裁决的结果则不涉及民政官。但对于军官和士兵的裁决并不因此而改变。

这个关于蓄意谋杀的裁决也就是正式的起诉书，据此就可以把所犯的刑事罪交由普通的陪审法庭审理。

由此可见，英国的士兵在法律上绝没有被看成是机械地照命令办事的没有意志的机器。相反地，法律认为他是《free agent》（“自由行动者”），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他随时都应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负责。如果被控告的士兵为自己辩护，说他是奉命射击的，他必须“服从命令”，那末他就会受到英国法官严厉的斥责！

普鲁士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在普鲁士，只要士兵声明他是奉自己的直接上司的命令开枪的，那就可以使他免受任何惩罚。在普鲁士以及在法国，官员违犯了法律，只要能证明他这是按照规定的官阶制中相应的上司的命令做出的，就可以完全免受任何法律处分。

我们并不认为，短短的几句誓言就可以改变一个人，就可以使一个黑白色近卫军中尉变成“宪政自由”的维护者，——应当认为，“新普鲁士报”是会相信我们所说的这一点的。

为“天佑吾王，天佑吾国”而奋斗的先生们，根据自己亲属们的切身经验，在最近十二个月当中已能愉快地看到，宣誓具有怎样的意义。因此，只要能够像上面所说的使“我的英勇军队”在法律方面处于跟英国士兵完全相同的地位，那末，无论“新普鲁士报”要军队

对国王宣誓、对达赖喇嘛宣誓或是对那个还不知是谁的人宣誓，我们都毫不反对。

写于 1849 年 3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9 日
“新莱茵报”第 241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三月同盟

科伦 3 月 10 日。法兰克福的所谓“帝国议会”的法兰克福的所谓“三月同盟”²⁵¹，竟厚颜无耻地给我们寄来了如下一封石印的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编制一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我们支配的所有报纸的名单，并分发给和我们有关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助下，使上述报纸优先得到有关的公告。

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们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收费的‘公告’对报纸来说是整个企业的收入来源的意义。

其次，鉴于艾森曼博士先生在维尔茨堡发行的民主立宪派报纸‘德意志人民报’有竞争不过反民主报刊的危险，而编辑先生又声明他除了已作过的牺牲外，不能再作新的牺牲，所以，中央三月同盟决定建议各同盟给该报以友好的支持。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1849 年 2 月底于法兰克福”

“新莱茵报”也被列入了随信附来的报纸名单——据说这些报纸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三月同盟支配”，“三月同盟”的拥护者都应当把“有关的公告”优先供给这些报纸刊载——，并且还加了一个光荣的星标。

现在我们特向 ci-devant (以前的)“帝国议会”的这个所谓“三月同盟”的一切愚顽的和极愚顽的^①成员作如下的声明：“新莱茵

报”从未奢望充当某个议会政党、尤其是人所不齿的法兰克福帝国俱乐部的政党的机关报；我们报纸的版面从来没有提供给这个俱乐部的所谓“三月同盟”支配；“新莱茵报”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个“三月同盟”。因此，既然“三月同盟”也把我们的报纸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它支配的报纸的石印名单，并称为它的机关报之一，那末这简直是对“新莱茵报”的诬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嘘。“三月同盟”的品德高尚的爱国志士们对此自然会感到“心安理得”。

从“三月同盟”“决定”推荐“艾森曼博士”的“民主立宪派”报纸（德意志的[teutsche]报纸：“德意志人民报”）来看，“三月同盟”列举我们的报纸就更加荒谬。谁能不为伟大的“德意志的”[《teutsche》]超级蒙难者艾森曼的悲惨遭遇而惋惜呢？把自己的狱中回忆录以一万二千盾卖给了巴伐利亚的“民主立宪的”国王的艾森曼“博士”，不能“再作新的牺牲”并在发行方面有“竞争”不过那些反对“三月同盟”的非钦定的普通报纸的危险，哪个正人君子能不为此感到震惊呢？请爱国志士们想一想：既然蒙难者艾森曼（他是一万二千盾的拥有者，他是薪资五塔勒的议员）竟不得不吁求社会的“援助”，可见“德意志人民报”的情况不知糟糕到了什么地步。不管怎样，既然“民主立宪派”的艾森曼之流竟盗用“新莱茵报”的名义来写求乞信，而“新莱茵报”又是德国唯一抨击爱国志士和帝国求乞议会中的“无耻的可憎的求乞者”的报纸，那就可见他们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不妙的。

对于财迷心窍、耽于竞争的爱国志士们关于“收费的公告对报

① 原文中的《linkische undäuberst linkische》同 linke undäuberst linke》（“左的和极左的”）相似。——编者注

纸来说是**整个企业的收入来源**的意义”这个齜齜的意见，我们当然不打算回答。“新莱茵报”在一切方面都始终和爱国志士们不同，而尤其和他们不同的是，它从来没有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收入来源。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10 日
载于 1849 年 3 月 11 日“新莱茵报”
第 24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维也纳和法兰克福

科伦 3 月 12 日。帝国国会拟于 3 月 15 日在克累姆西尔讨论宪法委员会所起草的宪法草案。战地法庭的那些皇家的恶棍认为，这个时机最适宜于把早已炮制好的“天赋”宪法抛给帝国国会，从而结束他们一直忍耐到今天的，在克累姆西尔上演的人民代议制的全部滑稽剧²⁵²。

钦定宪法的全套诡计，还是去年夏天由那些受过和未受过涂圣油仪式的反革命分子在雪恩布龙—维也纳、波茨坦—柏林、伦敦（在这里，梅特涅好像是神圣同盟的一只十字圆网蛛，坐在慢慢在奋起争取自由的各族人民周围编结起来的蛛网的正中）和巴黎策划好了的。这套诡计之所以先由波茨坦国王施行，完全是由于普鲁士的形势造成的，普鲁士有可能比奥地利先走这一步。

11 月，奥地利官方把罗伯特·勃鲁姆的血淋淋的头抛到那些坐在圣保罗教堂开会的人们的脚跟前。在此以前数天，韦尔凯尔和莫斯累这一对最可爱的孪生的帝国专员满载羞辱从文迪施格雷茨的前厅和奥里缪茨的庆祝宴会上回来了；除了极可尊敬的韦尔凯尔和莫斯累，任何别的人要是受了这样的羞辱，是会宁愿开枪自杀，也不会仰人鼻息的。但这一对外交场中的孪生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还夸耀自己的迂回旅行^①。

^① 见本卷第 78—84 页。——编者注

国民议会的大多数人都表示《satisfait》，即表示满意，这种表现跟路易-菲力浦时代的法国议院一模一样，后者甚至在官方做出最卑鄙龌龊的事情的时候，在官员们的营私舞弊行为被确凿证实的时候，还声称自己《satisfait》，即表示满意。

就让被杀害的罗伯特·勃鲁姆的鲜血溅在这些坐在圣保罗教堂里开会的人们的脸上吧。不错，他们的脸红了，但这不是由于内心惭愧或者是由于义愤填膺和慷慨激昂，而是由于兴高采烈和心满意足。当然，又派了几名帝国专员到奥地利去。但他们得到的结果只是：那里用比以前更加鄙视的态度对待所谓的国民议会议员和被他们出卖了的德国。

《Mocht nix, 's is olles Aansl!》（“没有关系，反正是一样！”）——这就是这些先生过去和现在的座右铭。

我们记得，在普鲁士政府发生政变前不久，巴塞尔曼、西姆桑、当然也有“高贵的”加格恩先生以及其他曾以帝国专员的身分到过柏林。

而现在我们又看见帝国专员到了奥地利，到了奥里缪茨，他们在来到这里时，像在柏林一样，帝国国会已被解散，而皇上靠克罗地亚人、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古楚耳人等的帮助，给人民钦定了一部“天赋”宪法。

凡是在人民的自由即将遭到扼杀的地方，所谓中央政权的专员就像嗅得出猎获物的兀鹫一样马上就会出现。嗅觉从来没有欺骗过他们。

现在，这个法兰克福蛤蟆坑总该相信，厄运马上就要临到它的头上。它要自食其果了。在它进行卑鄙勾当的地方将树起一块墓碑，行人可以在上面读到：“由于胆怯畏缩、学究式的愚钝和懦弱成

性，在人民的幸灾乐祸的嘲笑或完全冷漠轻视的氛围中，自己作孽而死。”

但是，在这些卑贱的小商贩中，有一部分人居然现在还敢以法兰克福出产的“基本权利”来自吹自擂，自以为他们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他们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饶舌的洗衣妇一样喋喋不休地侈谈“基本权利”，可是神圣同盟及其帮凶的“基本力量”却愈加团结起来，并愈来愈大声地嘲笑教授和庸人关于基本权利的空谈。一些人把自己的“基本权利”在一块纸片上确认下来，而另一些人，即反革命分子诸公，则用磨得锋利无比的马刀、大炮和斯拉夫的红斗篷把自己的“基本力量”巩固起来。

只要德国人民在德国国土上任何一个地方企图利用自己历来的基本权利——起义反对封建的或市侩立宪的暴政的权利，法兰克福就会急忙派出“帝国军队”，以使用驻扎军队、抢劫、屠杀和种种军事骚扰来惩治和镇压人民，以便使反革命的工具保持正常状态，即靠损害人民和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来把它好好地养肥，使它更有力量，好继续建树英雄业绩。

在类似的情况下，法兰克福诸君总是有必要的力量，因为他们从我们的爱民如子的君主们的上述“基本力量”的武库中借用了这种力量。

因此，毫不奇怪，为什么法兰克福蛤蟆坑要熟视无睹地保持缄默和不声不响地看着受过涂圣油仪式的先生们宣布自己的“基本权利”，即令这些先生们的“天赋的”基本权利是直接反对它的。

所以，现在它也得同样安静地看着，奥地利的塔梅尔兰^①怎样

^① 指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靠上帝和索菲娅的恩典,赐给自己心爱的“臣民”(其中有大量德国人)以十三条基本权利,同时随着这次变革,又一次赏给法兰克福的英雄们一记响亮的耳光。真是活该!

写于 1849 年 3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俄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3 日
“新莱茵报”第 244 号

译自“新莱茵报”

* 三个新法案

科伦 3 月 12 日。普鲁士王权认为它大显威风的时候终于来了。“未被削弱的”天赋国王²⁵³今天赐给我们三个新法案——关于俱乐部和集会、关于招贴²⁵⁴和关于出版的法案，议会就要根据这些法案把令人非常愉快的一系列九月法令横加在我们头上。

明天我们将原封不动地发表我们所收到的这些草案及其说明的全文。我们还要回过来谈论（而且不止一次地）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这些绝妙的产物。今天我们只简略地谈谈这三个法案。

一、俱乐部法。”一切会议均应于召开前二十四小时提出申请。”这样一来，凡因意外的重大事件而举行的紧急会议都要遭到禁止，但正是这样的会议是最重要的。应当准许一切人出席会议，这就是说，要禁止征收抵补组织会议的开支的入场费。社团开会时，必须把会场的四分之一的地方让给非社团人员。这就是说，社团必须出较高的租金来租赁较宽敞的会场，让警察局的雇佣密探有可能用喧哗、叫嚷和起哄来阻挠问题的讨论并破坏整个会议。如果这一切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那末“警察当局的代表”还有权用任何借口“立即解散”任何会议，就像“警察当局”的最高首脑、我们的皇恩浩荡的国王陛下曾“立即解散”协商议会一样。一旦警察局宣布解散会议，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必须立即离开会场，不然他们就会遭到和柏林的协商骑士们同样的命运，即被人用刺刀撵出

会场。

不错，俱乐部活动是不需要得到“预先批准”的，但是必须向地方当局预先提出许多申请书和履行很多手续，以致仅仅因这个缘故，俱乐部的活动就几乎不可能开展。至于召开露天集会、组织示威游行等等，那就**需要**得到警察局的预先批准。而为了杜绝佩戴红色绦带、帽徽和帽子的现象，还钦命重新颁布关于搜捕佩戴黑红黄三色²⁵⁵徽章的人的旧法令。

笃爱真理、言而有信的霍亨索伦一年前用颤动的声调向我们保证的“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就是这个样子！

二、**招贴法**。凡属政治性内容的招贴，除关于合法的，即**业经批准的会议**（可见，一切会议仍然只是被恩“准”的）的通告外，一律禁止张贴。这就是说，俱乐部理事会在风暴时期也没有权利即使通过招贴来**号召民众保持镇静**；而凡此种都是为了使受害者一个也不能逃脱耀武扬威的丘八之手！其次，在街头**出卖或分发印刷品**，如果未经有关方面的许可，也在禁止之列，**但这种许可又可能随时被撤销**！换句话说，普鲁士王权想用**修订版的 crieurspublics 法令**²⁵⁶来造福我们；这个法令是吓破了胆的法国众议院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专制最坏时期被迫通过的。

可是，制定这项法令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据说招贴和报贩会妨碍市内交通，此外，招贴还有损公共建筑物的外观！

三、**出版法**。但是，和那些想用来堵塞出版言路的美妙的法案相比，这一切还算不了什么。谁都知道，从 1830 年起，霍亨索伦家族对人民的关怀主要表现在，他们力图使普鲁士的宗法家长制度同路易-菲力浦式的精致的现代奴役制度结合起来，以便用这种办法来改进普鲁士的宗法家长制。他们保留了笞刑并补充以大桡船

苦役,保留了书报检查制度,同时又赐给我们九月立法的最精美的杰作。总之,让我们能够同时享受封建奴役制度、官僚警察制度和现代资产阶级法定的残酷手段这三者的好处。而这一切的总和就叫做“众所周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自由主义”。

具有许多复杂条文的霍亨索伦新出版法案赐给了我们一个最完美的综合物:(1)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2)法国的九月法令和主要是(3)值得颂扬的普鲁士法。

第九节系抄自Code。在施行普鲁士法的地区,以往对图谋罪和教唆罪(即使教唆成功)的惩罚都轻于对现行犯的惩罚。这些地区现在都采用了code的条文。根据这一条文,凡教唆犯罪得遂者与犯罪者同等论处。

第十节。法国的九月法令规定:企图侵害市民社会中的财产和家庭所依据的基础者,或挑拨公民相互仇恨或歧视者,皆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试对照 loi du 9. sept. 1835 (1835年9月9日的法令),第八条:

Toute attaque contre la propriété... toute provocation à la haine entre les diverses classes de la société sera punie etc. (凡属企图侵占财产者……凡属挑拨社会各阶级间的仇恨者,皆处以……等等。)

区别仅仅在于:普鲁士的译文——挑拨一般公民相互仇恨,等等——比原文糟十倍。

草案的以下各节的制定,只是为了重新把出色的普鲁士法赐给莱茵省,这部普鲁士法我们充分领教了三十二年,而在3月18日以后不久才被废除的²⁵⁷。顺便说一下,国王还准备把我们本莱茵省的法律所根本没有的以下各种新罪名钦定给我们:

1.用明知是虚假的消息或用在法律上不能得到证实的事实来

挑拨人们仇恨和轻视国家机关或政府者。

2. 发表在形式上势必(!)煽起对合法存在的宗教团体(根据钦定宪法,甚至土耳其人和多神教徒也都算是合法存在的宗教团体!)的仇恨和歧视的“言论”者。

这两种新的罪名是要在我们这里采用(a)旧普鲁士的“煽动不满”和(b)旧普鲁士关于亵渎宗教的概念;这两种罪行都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

3. 侮辱陛下和不敬重(!!)

(a) 国王(!)

(b) 王后(!!)

(c) 王储(!!!)

(d) 王室的其他成员(!!!!)

(e) 某个德意志邦的元首(!!!!!)

者处以为期一个月至五年的徒刑!

4. 还有一条大有教益的法令,根据这条法令,即使是对证据确凿的事实做出的论断,但只要被论断的事实证明是蓄意侮辱者,也应按侮辱罪论处!

5. 侮辱

(1) 两院中的一院

(2) 两院的议员之一

(3) 国家机关(未规定有对整个社团的侮辱罪)

(4) 官吏或军队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就他们的职务方面而论”的)

处以九个月以下的徒刑。

6. 对私生活的侮辱或诽谤。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只规

定对公开进行的或到处散布的侮辱或诽谤加以惩治。新法案则企图把在私人谈话中、在自己房屋中、在自己家庭中、在私人通信中所发表的任何意见都置于警察局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并加以惩治，——也就是说，新法案企图组织最卑鄙的无孔不入的特务活动。有无限权威的法兰西皇室政权的军事专制总还尊重私人交谈的自由；这个政权——至少在它的立法中——是禁止擅入私人住宅的。普鲁士的家长立宪制的监视和惩罚竟推广到了私人生活，推广到了私人生活中最忌讳的领域——甚至连野蛮人也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家庭关系的领域。然而，正是这同一法律以前曾有三项关于任何侮辱家庭关系的言行都要处以两年徒刑的规定！

这就是想恩赐给我们的是新“成果”。彼此相互补充的这三个最残酷的法律，达到了暴戾恣睢和背信弃义的顶点。这三个法律就是“未被削弱的”国王用欺诈手段向议院勒索的取消柏林戒严状态的赔偿！

这一切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至于出版法案，则没有钦赐给旧有各省什么新货色。普鲁士法本身本来就已经够恶劣的了。真命天子完全是对我们莱茵省的居民发泄怒气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鲁士法，由于废除了普鲁士法，我们才终于有可能稍微比较自由地喘一口气，自从我们被束缚于普鲁士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可是现在有人想把这部最可耻的普鲁士法再度强加在我们头上。

天赋国王在解释这个美妙的文件时通过他的奴才曼托伊费尔的嘴，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国王想“尽可能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他想排除可恨的法兰西法律，而在各地普遍施行可耻的普鲁士法。其次，国王想把由于“1848年4月15日的指令“废除了”有关侮辱陛下的刑事法规”而“在莱茵省大部分地区”

(请听!)造成的“缺陷弥补起来”!

这就是说,新的刑事法规要剥夺在我们莱茵省居民这里所剩下来的所谓 1848 年革命的唯一成果——我们自己的立法行动不受任何限制。

总之,无论如何要使我们成为普鲁士人,即成为合乎皇恩浩荡的君主的心意的普鲁士人,忍受普鲁士法的管束、骄横的贵族的欺凌、官吏的压迫、军刀制度的统治和棍棒的毒打并接受书报检查制度的俯首帖耳的普鲁士人。这些法案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知道有一个反革命计划,而我们的读者如果知道根据这个计划要搞什么活动,一定会大吃一惊。我们毫不怀疑,柏林诸公一定会对莱茵省居民再次感到大失所望。

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回过来谈这些可耻的法案,单就起草这些法案一事,大臣们就该坐上被告席。但有一点我们今天就应该指出:如果议院同意了和这些法案哪怕稍微有一点相似的东西,那末,莱茵省的议员就该马上退出书院,因为议院通过这样的决议,就是打算把自己的选民抛回到旧普鲁士立法的宗法式野蛮状态中去。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12 日
载于 1849 年 3 月 13 日“新莱茵报”
第 244 号特别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译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政府的挑衅

科伦 3 月 12 日。加冕的和未加冕的先生们打算以 1849 年 3 月的加倍的欢乐来补偿他们在 1848 年 3 月所受的痛苦。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要在三月事件周年纪念的时候，尽量在德国各地制造骚乱，从而使反革命先生们能够得到新的借口来采取暴行。因此，几个星期以来立宪派和贵族的报纸天天都在散布荒诞无稽的谣言，说什么正在大规模地准备三月起义，说共和主义者的志愿部队多次越过法国和瑞士的国境实行进犯（在瑞士有十五个半德国共和主义者）；而且总是引用“可靠的消息”、“无可怀疑的事实”和“确凿的报道”来证实这些谣言，以便使盲从的庸夫俗子们极度惊慌。在这当儿，“天赋”的滑稽家们却安然坐在后台，为奴才报刊有系统地传播的荒诞消息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欢欣鼓舞，当胆小的庸夫俗子们对这种人为的骚乱 *au sérieux*（信以为真）的时候，他们就得意洋洋地流露出蔑视的微笑。

巴登，也就是贝克，受命为这次运动打开场锣鼓。巴登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立即唯命是听地弹起了这一套关于进犯、叛乱和其他愚蠢行为的无聊的老调。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赶紧来帮腔。卖身求荣并且已经出卖了自己的、毫无用处的、小商人气质的法兰克福的“日报”不甘落后，而且也不能落后，他们以自己在全帝国的作用自夸。无论是黑森人，盲人和明眼人^①，还是施梯维式的汉诺威

人,无论是像腊肠一样的细高个的不伦瑞克人,还是其他各族人民(居住在德国的殉难者和殉教者),都必须唱一个调子。这一点可尊敬的弗兰格尔—曼托伊费尔做得最好。为居住在伯桑松的德国流亡者预备了四百张伪造的护照,此外,向黑白色国家^②的各个角落发出了指示,并且派遣了密使,责成他们通过报刊和口头宣传尽量喧嚣,说三月叛乱分子共和主义者就要来到了。

但是许多基督教德意志的报纸没有考虑这些非常狡猾的指示,它们一开始便过分地喧嚣起来。为了纠正这个错误,它们把鼓擂得更紧更响,散布更加厚颜无耻的谎言。

自然,汉泽曼先生马上就参加到这一伙高声怪叫的人当中来了,在他新创办的报纸²⁵⁸上对他们阿谀奉承,大加支持。汉泽曼在第一议院里给自己戴上了反对派议员的假面具,同时他又在设法消除他的伪装的反者派面貌所产生的印象,他以曼托伊费尔—勃兰登堡政府的忠实卫士的身分,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了关于危险的三月起义的非常荒唐的消息和通讯。我们只须举出一个例子来看看就够了。以最后消息的形式在他的报纸上刊载的科伦通讯中散播了下面这些捏造的谰言:

“几天以来,可以说我们是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生活。假如你从街上走过,你就会看见甚至在白天也有成群的工人在闲逛,他们有时哀求乞讨,有时抢劫;特别是他们常常侵犯一些小酒铺和小香烟铺。事情已经弄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的市政厅也不得不用大批军警来守卫。晚间在街上任何人也不能保证自己没有危险。最糟糕的是,工人们的情绪被人人为地激动起来,以便在3月18日掀起真正的起义。”

① 双关语:《Hesse》——黑森的居民,《blinder Hesse》——“盲人”——编者注

② 普鲁士。——编者注

只要在科伦这里把这篇文章转载出来,就可以彻底揭露它的挑衅的和可笑的性质。

在科伦的白天,特别是晚上,可以看到的景象是**各兵种士兵之间经常不断的流血毆斗**。显然,有人蓄意以**对工人的诽谤**来掩盖就“我的英勇军队”提出的质问。

政府在公开准备政变,以便完成反革命事业。因此,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准备起义。但是人民清楚地懂得,法国特别是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危急局势,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为起义打下基础。因此,人民决不会接受那种笨拙的挑衅。

写于 1849 年 3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4 日
“新莱茵报”第 245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霍亨索伦王朝的总改革计划

科伦 3 月 14 日。“只要普遍戒严被钦定为全王国的法律并成为我们的立宪惯例，特别戒严就会取消。这一套‘强硬的’法律将以关于结社和出版的九月法令开始。”

这是我们在刊登御前演说时所加的按语（“新莱茵报”第 234 号^①）。那末内阁在议会首先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呢？它出现在议会之前，并宣称：

“我们将使你们摆脱戒严状态，但你们要成立管制集会、结社、出版的常设战地法庭，作为交换。”

我们丝毫也不能隐讳，议会左派的胆怯行为从一开始就帮助了内阁转入进攻。

我们要把臭名远扬的三个法案同九月法令，同三月以前的刑事立法草案，同普鲁士法 *en détail*（详细地）加以比较。但是，首先我们且把前天本报号外中业已提及的旧普鲁士改革派的总计划^②告诉给我们的读者。

就在柏林的非官方报纸公布臭名远扬的三个法案的那一天，“新普鲁士报”这家勃兰登堡先知的《*Moniteur*》（“正式机关报”）登出了“对于目前正在开会的所谓人民代议机关的重大任务的意

① 见本卷第 375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01—406 页。——编者注

见”。霍亨索伦王朝和它的勃兰登堡内阁的出身太“高贵”了，不能在“政权”的太阳正高照“未被削弱的”王冠的时候，还来玩弄假仁假义的把戏。在这样的时刻，国王的心已不能克制，在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思想时使用了极其粗野的词汇来侮辱平民大众。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自己的力量满怀胜利信心的时候，在如歌德所说的“醉若登仙”的时刻，命运——何必隐讳这个——冷酷无情的命运不止一次地借助于非常事变，肆意把“我们善良的国王”、我们“圣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作的预言、威胁和他所宣布的心愿都一概化为乌有，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把王冠戴在自己头上时所说的话，跟拿破仑戴上伦巴第的铁制王冠时所说的话一模一样^①。但是，谁都知道，就连神仙也得依从铁面无情的天命。不管怎样，国王的心也跟女人的心和其他任何人的心一样，总觉得如果能扫除一切障碍，让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任意翱翔，并使世界（哪怕是只在口头上、文字上）服从于自己内心的愿望，那倒是件无比快意的事情。

仅就这一点而言，“新普鲁士报”流露出的多少反映了国王情绪的心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已经很值得注意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心情的流露也使人民了解到，人们期待他们去做什么，而在必要时，将迫使他们去做什么——当然是为了人民本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

“新普鲁士报”（第 59 号附刊）为了使读者便于了解霍亨索伦王朝的总改革计划，把这个计划加以分段标题，这无论如何总算是

对读者的一种值得称颂的照顾。难道它不能用默示录的形式，即学

^① 见本卷第 471—472 页——编者注

约翰启示录的方法，把国王的决定晓谕给世人吗？好吧，我们也就这样按题分段地来谈吧！

“目前正在开会的所谓人民议机关的重大任务”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清洗两院中的政治犯。A Jove principium^①。对于那想按照国王的心意来办事的议会的第一条训诫，就是按照国王的心意来改组。因为它目前的成分还是犯上不恭的普选制（尽管是间接的普选制）的可悲的产物。

那末国王的心要求的是什么呢？

“新普鲁士报”道出了秘密，现在的人民议机关有“污点”，这种污点使它不配和不能“整个地作为普鲁士的荣誉、普鲁士的忠诚和爱国热忱的体现者”。它身上满是缺陷，而要想在陛下的眼中成为“清白无辜”的，它就必须去掉这种缺陷。

“这种污点，这种缺陷就在于，议员中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参与了翁鲁派的犯罪的恶行，特别是参与了该报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

随后又说：“政府由于其本身的令人遗憾的软弱，或由于不信任那确实深受革命思想方式熏染的司法机关，所以没有把这些人交付法庭惩办。议会的任务就是纠正这种疏忽，这种错误；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一切参加议会的法官和法学家的天职，即令是为了挽回本等级已失去的荣誉也得这样做。必须呈请政府——但愿这是议会组成后的首要措施之一——训令司法大臣立即下令审讯和惩办这些罪犯。此项清洗工作乃是两院顺利地继续进行活动的首要的和最必需的条件。”

国王的内心愿望是想诛灭一切侮慢地拒绝纳税的罪犯的九族。王国政府太软弱了，它难以实现这个愿望。普鲁士王国的人民

^① 直译为“从丘必特开始”，意即“擒贼先擒王”。这句话摘自古罗马诗人味吉尔的作品“牧歌”。丘必特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主神。——译者注

真是厚颜无耻，冥顽不化，竟然为了对国王慈父般的心公开表示愤慨，又把犯人和罪人选做自己的代表。现在两院的任务就是强迫王国政府实现陛下本人的宿愿。议会必须恭请内阁允许它把一切害群之马和根本不配出入宫廷的分子从自己中间驱逐出去。首先是文人和伪君子、“法官和法学家”应该拯救自己的“等级”，因为自从曼托伊费尔无端怀疑普鲁士的西密斯^①，以为她无视国王的明确提示，可能变成了瞎子的时候起，他们等级的“荣誉”就开始丧失了。但是，在决不把真命天子的任何任性要求当作法律，不打算绝对服从国王本人的圣谕的人民的 eyes 中，法官等级怎么能挽回自己的荣誉呢？

如所周知，在一切宗教中，忏悔、牺牲、乃至自我牺牲，是祈祷式即膜拜的真正本质。因此，“所谓的”人民代议机关为了证明它是国王的心的代表——而国王的心是有生命、有个性、有人格的，真正人民的心——，就必须在御座前首先牺牲自己这个人民主权的代表者的身分。

它必须赶走一切不合陛下心意的议员，把他们监禁起来，并交给刽子手，以作为祭祀专制王权的赎罪供品。这样，它首先就可以赎偿自己的罪过，即它产生于人民的主权这一原罪。同时它也可能赎偿自己侮慢陛下因而是亵渎神圣的罪孽深重的既往。它要净身，以便蒙受圣眷，成为整个王权的真正代表。它将由“所谓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真正的人民代议机关（在更高的、普鲁士王国的意义上来说）。国王就是真正的普鲁士人民。因此，真正的普鲁士人民——决不学外国的坏习惯，把它跟全国居民的表面总数混为一谈

^① 西密斯 (Themis) 是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一般用她来代表公正无私的裁判。——译者注

——推选代表只是为了使国王的意愿以人民的意愿的形式返回于国王，从而使国王自己的高贵心灵中最隐秘的要求通过议会的法案和决议的形式，变成既平凡又为人人所应遵守的现实。

所以，我们期待于柏林的两院的是，它们将以**自我牺牲**即**拒绝纳税的罪人**的举动来开始自己对国王的膜拜。

“新普鲁士报”毫不讳言，甚至到了那时候，两院在国王陛下前面也还不能算是清白无辜的。它必须再作另一部分牺牲，但已不是由团体来承担了。这一部分牺牲取决于个别有关的议员是否确实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和是否痛恨自己。

“新普鲁士报”感叹道：“不错，经过这次清洗，不可能把那样一些议员都统统清除掉，这些议员在**承认自己在国难中的一分罪责并表示悔改，立誓和公开保证**尽力同他们自己要负一部分罪责的罪行作斗争以前，鉴于他们以往的政治活动和国务活动，最好把他们清除掉。但是，自然也谈不到根据法律把这些替革命干过事，特别是在3月18日和11月8日期间以显要官员的身分**被利用来干这种事情**的人（纯粹是普鲁士的语法！）都毫无例外地根据法律从议会中清除掉。不过，如果他们不发生上述那种**所希望**的转变，那末最好是他们自己的意识能把他们阻止于议会以外。当然，在实现这种（最崇高的）愿望时，也应该区别对待，例如突然摇身一变而为国家栋梁的**莱茵商人们**和**旧普鲁士**（封建）家族出身的人们就不相同，旧普鲁士家族的显赫声名历来是同我们王朝的历史，同君主国的**开国基地**（**西里西亚**不也是开国基地么？）密切联系着的。”

我们早就对“**莱茵商人们**”谈过这一点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只是强忍心头的 dégoût（厌恶），才把这批资产阶级恶棍选为自己的下贱工具，只等时机一到，就给他们几记耳光，同他们一刀两断。**汉泽曼！康普豪森！屈韦特尔！**跪下吧！跪在王宫之前，跪在人民面前，沉痛地低下罪孽深重的头来，穿上悔罪人的衣服，庄严地宣誓，公开地表示你们悲痛已极，后悔不该一时胆大妄为，竟用资产

阶级立宪的阴谋来准备唯有“我的英勇军队”才应该干的反革命活动；你们这些吝啬小气的家伙、贪图小利的农奴、俗不可耐的油商、狡黠圆滑的铁路业投机商，你们不仅挽救了御驾，还居然敢用那种只适合于葬礼的念悼文的声调吹嘘这番救驾之功。跪下吧！穿上悔罪人的衣服！要不就隐退到修道院里去！

至于“旧普鲁士家族出身的人”，优秀民族的这些天意命定的高贵的后裔，我们希望最近的将来在“国家通报”上读到他们中的某些人——阿尔宁、奥尔斯瓦特、博宁、普富尔——的讣告。除非他们自愿去死，我们才能相信他们的悔悟。不能期望汉泽曼之流的莱茵商人会有这样伟大的精神。汉泽曼是个最糟糕的伏尔泰信徒，是个鼠目寸光的人，而更主要的是个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的人。

所以，退出议会，离开舞台吧，你们这些 3 月 18 日的活纪念碑，国王的磨难、屈辱、不彻底性和软弱无能的活见证！退出议会，要不就自甘充当 3 月 18 日的替罪羊！

至于那些投票赞成拒绝纳税的人，两院自己将用他们在御座之前举行百牛大祭，以表示自己洗心革面和幡然悔悟，从而也证明他们有资格完成国王钦定给“所谓人民议机关”的下一步“任务”。

(待续^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1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5 日“新莱茵报”
第 246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① 本文的续篇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一文（见本卷第 432—440 页）。——编者注

书报检查

科伦 3 月 14 日。德国的日刊终究是全世界最软弱、最无力、最胆怯的刊物！人们在它的面前可以做出种种最卑鄙无耻的下流勾当来侮辱它，而它对这一切都可以缄默不言，忍气吞声。假如偶然有人不知道，由于上帝的恩典，在许多地方长出了多么瑰丽的三月的紫罗兰，那末，从报纸上当然也决不能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一点情况。

在杜塞尔多夫，公民和共产主义者德利加夫斯基在去年秋天想借口戒严来恢复书报检查制度^①。书报检查制度只存在了两天；随后掀起的公众的怒潮迫使丘八老爷们放弃了恢复书报检查制度的企图。

但旧有各省的情况又怎样呢？

三个月以来，书报检查制度在两个不同的地区气焰万丈，而旧普鲁士的所有报刊却安然容忍这种闻所未闻的侵犯它的权利的行为！

请听。

西里西亚罗森堡^② 3 月 7 日。在“罗森堡-克罗茨堡电讯”第 19 号第一版上登载了如下的声明：

① 见本卷第 64—69 页。——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奥列斯诺。——编者注

“我们请求本报诸位可敬的读者不要责难本号出版误期和报道不完备。我们请求读者注意：我们目前仍然处于戒严的条件下，‘电讯’最近一个时期的检察官是本地的王国行政长官扎克先生，他已当选为第二议院的议员，自从扎克先生启程前往柏林以后，本报要**直接通过军事的书报检查**。

编辑部启”

再听：

在**爱尔福特**，从11月25日起，也同样毫无阻碍地开始**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爱尔福特出版界的检察官起初是**弗·沃·胡特施坦纳尔**先生。现在他是警局督察员，过去他是在书报检查制度条件下标榜自由主义的“巴门日报”的编辑，伪装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民主主义者，稍后，他便成了敦克尔的部下和普鲁士警察局的专职密探。虽然此公甚至把从倒霉的柏林“国民报”（！）上转载来的文章也尽行删除，但他的公务活动仍然被认为不够普鲁士化，于是上面就派了一个**军官**来接替他的职位。因此，在爱尔福特也同样**实行军事的书报检查制度**。

不仅如此，对于在外地即没有实行戒严的地区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也实行了书报检查制度。2月7日的“爱尔福特通报”刊载了如下的文告：

“兹奉王国卫戍司令部命令，仰爱尔福特市民知照，如有人**散发或张贴对政府的措施表示怀疑或对这些措施采取敌对态度的外地出版之印刷品**，从而造成居民和当今立宪政府的关系**疏远**或使人产生对某些居民阶级之痛恨，因而在本市引起人心骚动和秩序混乱，**‘警察当局应对其治以应得之罪’**并**‘立即逮捕’**”。

市政府。警察局

1849年2月5日于爱尔福特”

恢复书报检查制度，用军事的书报检查制度代替普通的书报

检查制度,这些措施本来是跟报刊休戚相关的。可是,邻近的几个城市——布勒斯劳、柏林、莱比锡——的报刊却把这一切都看做理所当然的事情!确实,德国的报刊还依然是“**好报刊**”。

但我们要问我们在柏林的那些醉生梦死的议员,他们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才提议把大臣们交付法庭审判?

写于 1849 年 3 月 1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5 日
“新莱茵报”第 246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十 亿

科伦 3 月 15 日。二月革命以后不久，在巴黎就感到银根紧张。宣布了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尊重财产) 的规定，而可怜的小资产者就把这看做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措施。临时政府之所以更情愿同意这个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规定，是因为银行立即给了它五千万的无息贷款。临时政府主要是由“国民报”派²⁵⁹的小资产者组成的，所以银行的慷慨欺骗了它。五千万很快就用光了。当时，股东和持有银行券的人最巧妙地利用了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规定，从银行里把自己的黄金提取净尽。小资产者也想为自己的利益利用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规定，于是前去找自己的银行家，要办理以他们的 propriété (财产) 即他们的工业企业、店铺或工厂为抵押的期票兑现；银行家借口银根紧张，拒绝办理期票兑现。于是小资产者又跑去央求其他的银行家，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期票保证并在银行中兑现；银行家拒绝这样做。好一个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可见虽然银行家自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尊重，但正是他们首先违反了 this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规定。于是哀号四起，到处喊叫信贷和信用遭到了破坏。但是，小资产者却怎样也不顾放弃自己的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 的幻想；他们认为，将来恢复了“安宁和秩序”，信用也就会恢复，那时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 propriété 作抵押来使自己的期票兑现了。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

六月战斗以后，安宁和秩序都恢复了，但在依法律手续同破产的债务人达成协议以后，全部 propriété（财产）都落入了银行家的腰包，而小资产者只是当他们的《propriété》（财产）已经化为乌有的时候，才懂得了《respect》（“尊重”）的意义。但是，因大资产阶级造成的金融危机而受害最大的，无疑是工人。正当临时政府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想出了臭名远扬的四十五生丁税²⁶⁰的时候，墙上出现了一张工人署名的招贴，开头一句话是：avez-vous besoin de l'argent?（你们需要钱吗？）这张招贴直截了当地要求收回 1825 年作为赔偿送给流亡者的十亿。当时的流亡者都是谁呢？正是那些在国外挑起和支持反法战争、后来由外国人护送回到法国的人。那些享受了赔偿的流亡者是谁呢？是奥尔良公爵（即刚被推翻的国王）和正统派（即早已被推翻的国王的拥护者）。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没收了叛国的流亡者的财产；在两次复辟²⁶¹以后回国的国王和流亡者赐给了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以赔款。国王们又再度被逐，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的决定又重新生效，因此，这笔赔偿金应当由人民来享受是完全自然的。工人们兴高彩烈地读着这样来解释关于归还十亿的要求的招贴；他们成千成万地聚集在招贴的旁边并各抒己见地讨论它的内容。这种情况继续了一整天；次日，墙上的招贴不见了。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感到危机四伏，于是重金雇用了一批人，命他们于夜间把这张招贴撕毁，不留丝毫痕迹。当时，所有的人都浸沉在新组织计划的狂热中。每个人都只是想，怎样能发明一种新制度，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马上就在“国家”中加以实行。临时政府产生了一个倒霉的念头，想对农民课以四十五生丁税。工人们以为这四十五生丁税将产生跟归还十亿——征收地产税——同样的结果，所以就放弃了关于十亿的念头。“辩论日报”²⁶²和没有脑筋的

“国民报”支持他们的这种想法并在社论中解释说：真正的资本是“土地”，是天赋的地产；临时政府为工人征收这种赋税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当开始征税的时候，农民到处都对城里的工人表示愤慨。农民说，“怎么？我们的景况本来就比工人的景况坏：我们得出重利借钱来种地和养家，可我们除了给资本家纳税和付息以外，还得出钱来养活工人！”

农民离开了革命，因为革命不但不保护他们的利益，反而只使他们受到损害。工人识破了反动政党想出来的征税的险恶用心，他们现在开始明白了 *respect de la propriété*（尊重财产）的全部用意，因为形式上的财产和实际上的财产之间的区别显露出来了，从而他们知道了，资产阶级的资本抽掉了土地本身的所谓基础，这块土地的形式上的所有者就成了资本家的臣仆，而赋税却单单落在债台高筑的臣仆的头上。再加上实际的土地所有者又拒绝信贷、查封财产和用诸如此类的措施，使农民感到了他的威力，于是农民就对革命深恶痛绝。作为大地主而在农村有很大势力的正统派利用了这种情况，于是保皇党分子开始为亨利五世密谋种种诡计。在对革命是这样可悲的情况下，5月15日²⁶³来临了。巴尔贝斯关于十亿的要求，虽然是改头换面的，但仍然像火星一样重又惊起了人民并燃起了一场大火。甚至六月战斗也未能根除关于十亿的念头，现在，当在布尔日开始审讯巴尔贝斯²⁶⁴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更有加无已地吸引住农民。要求正统派即自己的地主和吸血鬼归还他们农民所征集的十亿法郎，这要比拿破仑诱人得多。争取归还十亿的宣传鼓动已经遍及全法国，如果这个问题由全民投票来决定，那末赞成归还的票数就要比赞成拿破仑的票数还多。要求归还十亿，这是吸引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革命措施。来自各地的请愿书和这

些请愿书的口吻证明，革命已经深入人心。在克柳尼，人们不仅要求归还十亿，而且还要求归还这十亿自 1825 年以来的年息三厘的全部利息。从布尔日的审讯开始以来，这类请愿书大量增多，使得布尔日的法官以及他们一伙的反动政党开始惶惶不安。阿热、安塞、马仑、圣维巴尔德、维特尔和许多其他市镇现在都通过自己的议员把请愿书递交议院。报纸每天在 *rappel dumilliard*（归还十亿）的标题下，公布所有投入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的市镇的名称。很快，在所有的墙壁上，在一切市镇上，都可以见到：*rappel du milliard*。如果当前的选举在这个口号下举行，那我们要看，资本家们——不管他们自称为什，是正统派、奥尔良派或干脆就是资产者——能用什来同这十亿对抗，他们是否能击败那些想靠这十亿进入新议院、以便使这些钱用来造福于工农的民主派候选人。但这还不是全貌。路易-拿破仑到处向农民许愿，答应不仅归还按四十五生丁税缴纳的税款，而且还要减低一切赋税。所有的请愿书都要求把十亿主要用于这个目的。至于归还十亿的法律根据，那倒有先例可援，这就是：紧接着 1830 年七月革命以后，突然停止了十亿下欠余款的支付。当时之所以没有要求归还已经交付了的税款，完全是因为这些钱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落入了路易-菲力浦本人和他的家族的腰包。

反革命政党既不能否认这种要求的正义性，它暂时只好推诿说实现这一要求有困难。困难似乎在于要寻找出那些从这项赔偿金中多少不等地捞了一大笔钱的人。但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我们就先得大笔钱的人找起。在名单的开头，我们可以找到奥尔良公爵（后来的路易-菲力浦）和他的妹妹阿黛拉伊德女士，他们得了五千万，而只要动用一些不久前国民会议还给王室的无数财产，这

五千万很容易就收回了。

孔代亲王得了三千万，但是谁继承了这笔财产呢？是奥马尔公爵和德·菲雪尔女士。这样一来，一开头就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王室在法国占有大量的地产和森林，而农民已经开始计算，这几千万没有在 1830 年就归还给他们，使他们遭到了多大的损失。

写于 1849 年 3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16 日
“新莱茵报”第 247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

科伦 3 月 15 日。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倒霉的三月同盟^①这个无愧于所谓“三月革命”的后裔。有人责备我们，说什么我们攻击三月同盟，就是“危害自由的事业”。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在 1848 年 12 月就已经使“科伦日报”大吃一惊，揭露了三月同盟是**不自觉的反革命工具吗？**²⁶⁵难道我们不是早就已经对“三月同盟”说出了我们对“三月同盟”的看法吗？如果三月同盟是个革命政党的组织，如果它哪怕只是**三月起义**的真正的、健康的产儿，那我们也就闭眼不看无疑是它所干的这种**用文告进行投机**的蠢事了。第一，如果不把呼吁看做活动，可以说三月同盟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其次，三月同盟像个幼稚的莽汉一样，动摇于立宪派（我们认为这些人是比冯·拉多维茨骑士的俱乐部²⁶⁶更坏的反动分子）和某些被全帝国和解的空想计划搞昏了头脑的真正正直的民主派之间。在这种中央商务同盟^②中，按其本性来说，总是犹豫不决占上风的；这种同盟也许能煽起人民的不满，但在紧要关头它会背叛人民，然后又因自己所犯的**错误而痛哭流涕**。所以，商务同盟总是“万事亨通”！而这个同盟的好见怪的脾气却向来很少引起我们

① 见本卷第 394—396 页。——编者注

② 俏皮话：《Central-Märzverein》是“中央三月同盟”，《Central-Commerzverein》是“中央商务同盟”。——编者注

的同情；显然这些自由派还仍然把自由出版看做仅仅为个人争得的权利。例如，艾森曼先生曾公开宣称自己是永恒不渝的立宪主义者，即共和主义的敌人，而这正是在把“新莱茵报”说成是“纯德国式争吵”的典型的那次三月同盟的会议上宣称的。就是说，要求我们根据对统一的最荒谬的理解，来支持一个荒谬地理解德国统一的人的报纸，不管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出于礼貌，只要这些老爷们在法兰克福的使命不一定要他们“留在原地”，那末他们要我们“带到”多远，我们就把他们“带到”多远。在这些老爷当中有一些“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²⁶⁷。他们不会不知道，不仅在德国，而且不论是在何地何时，同一切三月同盟的意愿相反，还在真正的革命开始以前，斐扬派²⁶⁸就被消灭了。正是那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饭馆中“率先”高喊反对波拿巴的福格特，定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波拿巴手下的一名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²⁶⁹，这对社会共和国的拥护者们有什么好处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15 日

载于 1849 年 3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24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第二议院的奏折草案

科伦 3 月 16 日。下面我们向本报读者介绍第二议院的奏折草案，这是御前演说的枯燥无味、奴性十足的翻版。它的作者是臭名远扬的红色土地^①骑士、勇敢的 (!) 冯·芬克。

奏折起草委员会“感激地承认 (旧约的笔调)，由于去年 12 月 5 日宪法的颁布，确立了法律秩序”。委员会居然以“普鲁士人民”的名义来表示这种感激。为什么在委员会看来，人民会感谢用军刀钦定的十二月宪法呢？因为人民“渴望”“恢复社会的法律秩序”。不幸的骑士芬克啊！他所承担的任务是表明自己是“法制基础”的维护者，遵守法制是他的专职。但是，在践踏了 1848 年 4 月 6 日和 8 日的法令从而摧毁了这种法制基础本身的勃兰登堡内阁面前，怎样声明承认“法制基础”呢？再也简单不过了！内阁钦定一个新的法制基础即战地法庭，同时也钦定一个战时状态的宪章、法典和哲理——12 月 5 日的宪法。起初，内阁消灭了“社会的法律秩序”。然后，政府宣布了另外一种靠克罗地亚人的刺刀维持的“社会的法律秩序”，宣布了 quelconque (随便什么样的) 法制基础。但奏折起草委员会以普鲁士人民的名义，芬克以普鲁士奏折起草委员会的名义，迫不及待地急忙祝贺随便什么样的 (任何的、不管哪一种) “社

^① 即威斯特伐里亚。——编者注

会的法律秩序”的恢复！法制基础死亡了！法制基础万岁！假若普鲁士政府明天被推翻，假若柏林成立了 Comité du salut public（公安委员会），那末在最前前往致贺的人当中，在参加婚礼的宾客当中，必定会有一个“法制基础的捍卫者”，一个以感激的声调承认恢复了**随便什么样的**“社会的法律秩序”的芬克。

幽灵要乘马急行²⁷⁰，奏折起草委员会也要乘马急行。先是“感激”（遵照“新普鲁士报”的指示）12月5日的政变！然后是宣布军法宪法为“今后普鲁士邦的现行根本法”！最后则庄严地宣誓，要“以虔敬和矢忠于国王陛下的精神来进行**修改**”，也就是要以**钦赐者的精神**来修改。这样一来，可以预料，一定会迫使我们退回到“**联合议会**”以前的时代中去！

至于柏林的“戒严”，奏折起草委员会就只会玩弄陈词滥调，说什么“**若没有法定秩序**，真正的自由是不可思议的”。而“**法定秩序**！”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从华沙事件²⁷¹中就可以了解。要是普鲁士不要钱也能存在，或者它不求助于这些令人讨厌的议会吹牛家也能得到金钱，那你再看吧！至于“在柏林城外”宣布的不定期戒严，委员会则认为还是以“等待国王陛下政府的下一步通知”为宜。而在目前，宣布了戒严的爱尔福特和西里西亚地区必须静心忍耐。只要爱尔福特和罗森堡的军事书报检察官^①不“抽掉”芬克所拟定的奏折草案，芬克就已经很 *satisfait*（满意）了。这倒用不着耽心！

随后，芬克以奏折起草委员会的名义允诺，而委员会又以第二议院的名义允诺，第二议院则以人民的名义允诺：“集中全力”来尽

① 见本卷第 416—418 页，——编者注

可能比较令人满意地完成普鲁士王国政府给予“所谓人民代议机关”的任务。那就祝君成功吧！

“我们也很高兴地承认，普鲁士军队在斗争的日子里表现出了军人的勇敢，在严酷考验的日子里表现出了忠诚。”

以帝国法庭²⁷²的精神向丹麦的进军！在米洛斯拉弗和弗勒申城下的会战！在安哈尔特、美因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胜利！²⁷³还不止于此！芬克很高兴地承认“我的英勇军队”的忠诚，但正是这支军队杀害了他芬克的前辈并烧毁了旧国民议会的文件。芬克完全有理由高兴。若没有“普鲁士军队在严酷考验的日子里”的“忠诚”，我们的芬克就决没有机会靠起草这个奏折草案来使自己的英名留芳千古了。顺便指出，奏折起草委员会在这一点上也像小学生般地遵从“新普鲁士报”编制的霍亨索伦王朝的总改革计划中所包含的那些指示。

但德国问题呢？

“普鲁士”将不惜“任何牺牲”，必定要以不同于弗里德里希大帝兼并西里西亚的别种方式来兼并小德意志的土地^①。在“掠夺”方面，现代的普鲁士不愧是“和平”进步的维护者。此外，奏折起草委员会“希望”“德国各邦政府和德国国民议会之间达成协议”。我们则希望德国各邦政府不必对这个帝国神学师资培养所特别客气。

其次，奏折起草委员会还表示了这样的心愿，即希望“丹麦国王关于停止休战的声明不至于破坏和平”。芬克知道得很清楚，丹麦的这个停止休战的声明不会比普丹战争本身更严重。普鲁士军

^① 即除奥地利以外的整个德意志。——编者注

队以帝国军队的名义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行动,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则以帝国军队的名义在德国南部行动;前者在这里,后者在那里,都宣布成立了战地法庭!

对瓦德马尔亲王的逝世表示哀悼,保证决心作自我牺牲(通过这种手法,所有这些冯·博德尔施文克辈、里德尔辈、冯·泽肯多尔夫辈、阿尔宁辈、哈永科特辈、伦纳德伯爵辈、康普豪森辈、芬克辈、格律恩辈及其他的流氓坏蛋都成了普鲁士的莱喀古士和梭伦),虔诚信赖,崇敬法律,总体精神,正义,天命,国王的心和普鲁士的前途,“以及德意志的前途”,——所有这一切,都被奏折起草委员会当做餐末的甜食(由殷勤的冯·芬克帮忙预备好的)端出来款待大家!

倘若某个冯·芬克靠著这点可怜的烹饪技术,就胆敢以委员会的名义、议会的名义、人民本身的名义,把这个人民代议机关和人民变为欧洲戏院最贱楼座观众的笑柄,那末白痴也应该在这种人民代议机关和这种人民中享有公民权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3 月 16 日

载于 1849 年 3 月 16 日“新莱茵报”
第 247 号特别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三月十八日

科伦 3 月 18 日。坦白地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今天没有找到社论的题材。柏林的三月革命这种对维也纳革命的微弱反应，从来没有使我们感到兴奋。1848 年 3 月 19 日柏林曾歌颂：“耶稣是我的庇护人！”我们奉劝威武的柏林人，在今年的 3 月 18 日应该说：“弗兰格尔是我的庇护人。”

“新莱茵报”将只纪念 6 月 25 日²⁷⁴。

但“科伦日报”即“科伦的资产阶级”将要做些什么呢？

在 1848 年 3 月 22 日，“科伦日报”对冯·“阿尔宁”先生的主要指责是，他不该封闭“莱茵报”。康普豪森那时还不是内阁大臣。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把真象弄清楚。

对于康普豪森和我们在科伦共事²⁷⁵的那一段最幸福的日子，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康普豪森对我们的态度和现在我们对他的态度——这就是 1848 年三月革命的秘密。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18 日

载于 1849 年 3 月 18 日“新莱茵报”
第 249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新普鲁士报”论三月十八日

科伦 3 月 18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机关报“新普鲁士报”为 1849 年 3 月 18 日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庆祝自己革命的周年纪念的人民是加倍不幸的；人们生来好作孽，但以自己的罪孽为荣并庆祝自己的罪行，这乃是受了恶魔的唆使。

同一家报纸在同一号上刊载的小品文中，把 3 月 18 日和 19 日的斗争称为“血腥的滑稽戏”！“我的人民”之所以受到这种应得的褒奖，是由于他们进行了不彻底的革命的结果。

接著，报纸报道说，弗兰格尔数日前曾“巡视”了弗里德里希斯海茵²⁷⁶。

但不知弗兰格尔先生在 1850 年 3 月 18 日又将“巡视”什么，知道这点是有点意思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18 日

载于 1849 年 3 月 18 日“新莱茵报”

第 249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案

—

科伦 3 月 21 日。依照我们的诺言^①，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谈谈霍亨索伦王朝关于出版自由和结社权利方面的改革草案，谈谈这些浸透着戒严精神的法案。今天我们只是把这些法案跟过去被莱茵省等级会议²⁷⁷（当时尚在康普豪森反对派庇护之下）所否决的刑法方案作一个对比，并且指出，莱茵省居民应该感谢柏林三月起义的是哪些辉煌的“成果”，柏林大公的“未被削弱的”国王恩赐给莱茵省法律的是哪些浸透了暴戾恣睢的普鲁士法精神的革新。

在持有特许纪念状²⁷⁸的联合议会中，来自波美拉尼亚省拉曼彻的容克地主塔敦-特利格拉弗两年前曾挺身捍卫出版自由。威斯特伐里亚新出现的“勇敢的”芬克骑士的战友举起自己的长矛说：“不错，对著作家先生们要公开审判，但是要真正公开的审判”：

“出版自由——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十一月内阁的钦定法律草案，是本着国王特许状的精神所表演的三月以前的那套老把戏的重演。“强大的普鲁士王权”者 Codepé（刑法典）的可恨的条文，对莱茵省陪审法庭宣判拒绝纳税

^① 见本卷第 415 页。——编者注

的拥护者和叛乱分子无罪做的回答是：“不错，要公开审判，但是要真正公开的审判”：

“出版自由——同时旁边还有绞架、普鲁士法的绞架！”

Code pénal (刑法典) 的条文并不知道霍亨索伦陛下的感情脆弱不堪。虽然有各种资格限制并经过警察当局的精心挑逃，但在莱茵省将找不到一个陪审员会同意对侮辱陛下这样骇人听闻的罪行判处比侮辱“私人”为重的惩罚，即超过五法郎罚款的惩罚。帝王专制政体认为声称它的“陛下”可能受“侮辱”乃是有失尊严的事情；但是，臣民之父的基督教德意志意识——这种意识显然是决不能同拿破仑的妄自尊大相比拟的——重又“深感需要”在自己的莱茵大公国中恢复对自己旧普鲁士尊严的维护。“强大的”王权不敢废除莱茵省的诉讼程序，但它在这种诉讼程序上移接了普鲁士法的大有希望的嫩枝，并宣称要进行：

“公开的、真正公开的审判——同时旁边还有普鲁士法的绞架！”

关于这个在最近将来要被钦定为对莱茵 code (法典) 的补充的“公开审判”，法案第二十二节这样写道：

“凡预定发行之出版物，若……其内容含有可以依据行政当局的命令予以追究的罪行或过失，不论在何处发现该出版物，纵令该出版物已经开始发行，警官皆有权予以没收。”

警察有权在邮政局或编辑部没收他们所不喜欢的报纸，纵令“已经开始发行”，即在警察的“预防措施”“本身”理应结束，而“按照法律”，事情已属于司法机关的权限范围之内的时候，警察也有权没收。凡是在出版物、报纸等的“内容含有”可以“依据行政当局的命令”即按警察局的命令予以“追究”的“罪行或过失”的一切场

合,亦即凡是当警察想要满足其庖代检察官的乌凯马尔克²⁷⁹般的僭望并认为需要照例搬出一些“罪行或过失”或一般“可以予以追究”的行为来替这种欲望辩解的时候,警察都有这种没收之权。最后,凡是这种印刷品, *c' est-à-dite* (也就是说) 国王和他那神圣的埃尔曼达德²⁸⁰认为必须没收的一切著作,不论警察在何处发现,他都可以加以没收;这就是说,警察可以侵入民宅,可以干预家庭生活的秘密,在没有任何根据需靠戒严或克罗地亚部队来保卫财产的地方,警察都可以在宪制法定秩序的掩护下,对和平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警察式的掠夺。法案在这里指的是一切“预定”要发行的出版物,“纵令”这些出版物已经开始发行。因此,“不言而喻”,法案规定有权没收那些尚未开始发行、还不能成为据以指控犯有“罪行或过失”的根据的出版物;这样一来,法案就把警察式的掠夺也推用到那些在法律上完全不“应予以追究”的私人占有物上了。法国的九月法令,卡芬雅克军事专攻的军刀检查制度,甚至连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韪”提交给旧有各省的等级会议及其委员会的刑法草案,至少总还尊重“远不能成为据以犯有指控罪行或过失”的根据的私有财产。相反地,在柏林的三月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出版法案,却对公民的财产和私有物组织公然无忌的警察式的劫夺,并且为了基督教德意志的警察道德,把毫不牵涉到刑法的私人关系粗暴无礼地公诸于世。

“公开的、真正公开的审判——同时旁边还有普鲁士法的绞架!”

随着这种公开审判的改进,普鲁士法的条文也有了改进。

期待已久的关于侮辱陛下的法律,在第十二节中作了如下的“制定”:

“凡通过语言、文字、印刷品或以符号、图画或其他某种描写形式表现出对国王陛下之不敬者，处以两月至五年的徒刑。”

如果莱茵的臣民不知道，维也纳民族交易市场²⁸¹上钦定给他们的霍亨索伦大公要求人们对他的“尊敬”要达到什么程度，就请他们去查一下关于柏林刑事立法的说明吧。

依照普鲁士法，侮辱陛下的最重惩罚在此以前是两年监狱监禁或要塞监禁，而对陛下表示不敬的最重惩罚则是一年监狱监禁或要塞监禁（普鲁士公法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一九九、二〇〇节）。

可是，这些条文对于“强大的普鲁士王权”的君主感情来说，似乎还不是充分的保障。还在1847年提交给联合委员会²⁸²的“普鲁士各邦刑事立法草案”中就已经规定，“凡蓄意通过语言、文字或以图画等形式对国王的名誉表示任何侮辱者（第一〇一节），罚苦役六个月至五年”；可是，“凡本身虽不能算作侮辱国王、但有失对陛下应有之尊敬的言论或行为”（第一〇二节），处以六星期至一年的徒刑。在官方关于这个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虽然萨克森等级会议（对1843年的类似草案）建议在“表示不敬”之前加上“蓄意”二字，使这种说法的含义精确，以免那些“决无对国王表示不敬之意图”的言论和行为受制于这条法律，但是，据说政府必定会拒绝加上“蓄意”二字，因为这会“抹杀侮辱陛下和表示不敬之间的差别”，因为“蓄意”表示“不敬”应该定罪为“侮辱”。

现在打算钦定给我们的出版法仍然是以这种说明作为依据的。从这种说明自然可以得出结论：现在和侮辱陛下同样处以两月至五年徒刑的“表示不敬”，正是“非蓄意的”侮辱。

同时“说明”也指出，当时只是根据莱茵省等级会议的建议才把“表示不敬”的最重惩罚定为一年。

“三月的成果”对莱茵省居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普鲁士法一移入 Code pénal (刑法典), 就给莱茵省居民钦定了这样一些新的罪名, 如处以两年徒刑的侮辱陛下之罪和处以一年徒刑的“表示不敬”之罪²⁸³。在 1843 和 1847 年的法案中, 被侮辱的陛下的身价抬高到了五年, 而所表示的不敬则不得不根据莱茵省等级会议的建议, 保持一年的刑期。在继三月起义之后所取得的戒严的成就之下, “表示不敬”(即令是非蓄意的)却提高为五年徒刑, 而莱茵省法律则又补充了一些新的罪名, 这些新罪名使莱茵省法律接近了旧普鲁士法的美德。

“出版自由, 在戒严条件下的公开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二

科伦 3 月 22 日。

曼托伊费尔关于草案第十二节的说明指出：“关于侮辱陛下之律令尤其不可缺少，因为在莱茵省的大部分地区，有关侮辱陛下的刑法都已根据 1848 年 4 月 15 日的敕令废除了，这个缺陷从那时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弥补。”

曼托伊费尔的说明断言，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的这一部分（它甚至超过旧普鲁士法与 1843 年和 1847 年的刑法草案所体现的圣谕）对于莱茵省特别需要。1848 年 4 月 15 日的敕令，即“陷于毁灭的王权”（见本月 20 日的“新普鲁士报”）在三月起义的压力下所作的诺言，在莱茵省“废除”了好容易才照普鲁士法所钦定下的补充条文，重新恢复了本来就不很纯粹的 Code pénal（刑法典）。但是，为了适当地弥补这个在三月里所赢得的“缺陷”，并用文件来证明霍亨索伦陛下越来越善于提高自己的身价，“强大的”十一月内阁提供给莱茵省居民的不是三月以前的普鲁士法的旧条文，——不是的，而是一个衡量对国王陛下的尊敬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超过以往的刑法草案所创制的各种惩罚的一倍左右。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国王驾崩，国王万岁）！在 1848 年 3 月以前，臣民之父的“未被削弱的”尊严，按普鲁士法，价值为一年徒刑；到 1849 年 3 月，侮辱“陷于毁灭的”王权，价值就已经提高到五年徒刑。在 1848 年 3 月以前，莱茵省的法律只是从宗法式的普鲁士法中补充了一些条文；在 1849 年 3 月，则钦定给莱茵省法律以曼托伊费尔

的十一月成就：

“出版自由，军刀检查制度——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但莱茵省法律的“缺陷”还表现在别的方面。所以柏林的出版改革草案第十二节又作了如下的补充：

“凡以上述方式（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图画或其他描写形式）侮辱王后者，亦同等论处（两月至五年的徒刑）。凡以这种方式侮辱王位继承人（？）或王室之其他成员……者，处以一月至三年的徒刑。”

我们已经指出，旧普鲁士法对侮辱“国家元首本人”的行为只处以两年徒刑。出版法案显然进了一步，因为它对侮辱次要人物王后的行为都处以五年徒刑，对侮辱次要人物王位继承人（？）和“王室”的“其他”成员的行为都处以三年徒刑。

莱茵省法律既很少知道什么侮辱“国家元首本人”，也同样很少知道什么侮辱“王后”等等。以前，莱茵省的报纸可以逍遥法外地杜撰一些什么“宫廷期望发生意外事件”，这有时——根据医学性质的原因——也可以算是一种不敬的表示。

最后，联合委员会原蒙特许的刑事立法草案认为侮辱“王后”轻于侮辱“国家元首”，因此不是处以五年徒刑，而是处以（第一〇三节）三年徒刑。而关于对侮辱“王后”和侮辱王室其他成员皆予以同等惩罚的问题，1847年草案说明宣称，莱茵、西里西亚、萨克森和波美拉尼亚诸省的等级会议本来想对这些人物加以区分，但对于政府来说，这种可悲的“诡辩”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强大的曼托伊费尔内阁却不认为旧莱茵、西里西亚、萨克森的等级会议的“诡辩”有损它的尊严。难道油腔滑调的海特男爵不是属于当时特蒙批准的诡辩家吗？曼托伊费尔—海特的出版法案“确定”了王后和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诡辩的差别；它是按照

三月以后一般国王尊严感的日渐加强来确定这种差别的。旧莱茵、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的等级会议要求在后和王室其他成员之间加以区分，以便使侮辱后者所受的同等惩罚（三年徒刑）得以减轻。强大的曼托伊费尔—海特内阁接受了这种区分，但只是为了把对侮辱王后罪的处刑标准提高到侮辱“国家元首”罪的重新提高了的处刑程度。

君主尊严的概念也用这样的方式发展，对上述同一节的补充也就可以证明；根据这一补充条文，侮辱任何一个“德意志邦的元首”，都跟侮辱“王位继承人”一样要处以三年徒刑。

依照莱茵省法律，侮辱第三流的“国家元首”视同侮辱私人（罚款五法郎），其治罪只是根据受侮辱者的申诉，而不是因为这种罪行具有公法性质。根据 1843 年莱茵省等级会议“触犯圣怒”否决了的刑事立法草案和 1847 年再度提出的法案，侮辱外国君主及“王后”者，处以两月的徒刑至两年的苦役；可是普鲁士的等级会议建议完全取消这一条，而威斯特伐里亚的容克地主反对派则认为最初的处刑标准过高。最后，曼托伊费尔—海特内阁弥补了莱茵省法律在三月以后的这些严重缺陷，把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有资格限制的代议机关所抨击的刑期从两年提高到三年，并挺身尽力捍卫联合议会的波美拉尼亚的唐·吉诃德：

“出版自由，真正公开的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最富煽动性的出版改革草案的第十九节简直是可笑到极点了：

“如有人通过语言、文字、印刷品、符号、图画或其他某种写形式侮辱……

(1) 两院中之一院（“作为议院而论”），(2) 开会期间某一议院之议员，(3) 其他某一政治团体、公共机关或公务人员，处以九个月以下的徒刑。”

尽管曼托伊费尔—海特用刺刀驱散了协商议会和两院等“政治团体”，可是他们却为了“维护这些议会”而把一些新罪名塞进莱茵省居民的“有缺陷”的 Code pénal（刑法典）出于上帝和国王的恩典，曼托伊费尔—海特内阁钦定给全国一部国产宪法，以便给莱茵省法律钦定一种前所未闻的新罪名——“侮辱议院”。

“出版自由，公开审判——同时旁边还有绞架！”

莱茵省的居民小心点吧！以往各次企图把普鲁士法移入莱茵省法律的历史，以及霍亨索伦王朝对三月诺言的**进一步发挥**，都向他们表明，应该从莱茵河彼岸的成就中期待什么东西。

以前用战地司法蓄意侵犯 Code（法典）的目的，不外是要使莱茵省完全成为旧普鲁士的省份之一，因为在莱茵省没有彻底服从于普鲁士法的棍棒制度以前，就不能达到完全归并的地步。可是，新法案在用普鲁士法的长处来弥补莱茵省法律的“缺陷”的借口之下，还改进了旧有各省的普鲁士法，即消除了普鲁士法中的过于温和这一“缺陷”。

不管现在的议院是多么不中用，我们仍然不认为它会通过这些法案。但我们推想，在这种情况下，会钦定给我们一付绞杀出版物的霍亨索伦绞架，而我们所希望的也正是这个。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3 月 21—2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3 月 22 和 23 日“新莱茵报”
第 252 和 253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柏林关于奏折问题的辩论

科伦 3 月 25 日。坦白地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没有特别的兴致来比较详细地分析柏林的所谓第二议院的辩论。已被解散的协商议会的辩论虽然意义微小和毫无生气,但它究竟还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这些辩论所涉及的问题对于欧洲的命运没有任何影响,尽管其所涉及的法律事先就已经被认为会遭夭折,但辩论终究还是涉及了我们最切身的利益,它像一面准确的镜子那样反映出了普鲁士反动势力的成长。而现在的议院所进行的辩论,除了要使已完成的反革命合法化以外,别无任何其他目的。所谈论的不是现在——由于禁止议员对政府提出质问,不可能讨论这类问题——,所谈论的是过去,即 12 月 5 日至 2 月 26 日的暂时空位时期²⁸⁴;假如议院绝对不承认这次空位,它就会被强迫解散,它的工作又会徒劳无益。

现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和反革命正手持武器进行决战,俄国人正驻扎在东方边境上,而法国也正在准备一场必将震撼全世界的新革命,在这种时候,那有闲情逸致去注意这样的会议!

关于奏折的辩论,是我们所看到过的一切辩论中最枯燥无聊的了。当然,全部辩论都是围绕著承认或者不承认钦定的所谓宪法这个问题兜圈子。但这个议院承认与否,又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在戒严条件下,在顺利实现的反革命的压制下选出来的,在戒严条

柏林关于奏折问题的辩论

科伦 3 月 25 日。坦白地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没有特别的兴致来比较详细地分析柏林的所谓第二议院的辩论。已被解散的协商议会的辩论虽然意义微小和毫无生气,但它究竟还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这些辩论所涉及的问题对于欧洲的命运没有任何影响,尽管其所涉及的法律事先就已经被认为会遭夭折,但辩论终究还是涉及了我们最切身的利益,它像一面准确的镜子那样反映出了普鲁士反动势力的成长。而现在的议院所进行的辩论,除了要使已完成的反革命合法化以外,别无任何其他目的。所谈论的不是现在——由于禁止议员对政府提出质问,不可能讨论这类问题——,所谈论的是过去,即 12 月 5 日至 2 月 26 日的暂时空位时期²⁸⁴;假如议院绝对不承认这次空位,它就会被强迫解散,它的工作又会徒劳无益。

现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和反革命正手持武器进行决战,俄国人正驻扎在东方边境上,而法国也正在准备一场必将震撼全世界的新革命,在这种时候,那有闲情逸致去注意这样的会议!

关于奏折的辩论,是我们所看到过的一切辩论中最枯燥无聊的了。当然,全部辩论都是围绕著承认或者不承认钦定的所谓宪法这个问题兜圈子。但这个议院承认与否,又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在戒严条件下,在顺利实现的反革命的压制下选出来的,在戒严条

议。但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表示准备承认国民议会的解散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准备拒绝关于钦定的畸形宪法是否合法的原则争论，决心为了仁爱而宽恕自己所受到的拳打脚踢和种种侮辱，并立即着手来修改宪法！

自然，右派以应有的鄙视态度否决了这个胆怯的提议，并强迫左派参加原则的争论。

左派是罪有应得。为什么这些先生认为他们必须在绝对不能搞出任何名堂的地方去搞出一点名堂来呢？为什么他们硬要自己相信：能够用议会方式争得那只有用革命方式即用武力才能争得的东西呢？这些先生确实“由于议会活动而提高了水平”，议员瓦尔德克向我们娓娓动听地叙述了这种水平，在这种水平上，esprit de corps (等级精神) 出现了，而革命毅力——*s'ily en avait* (如果说以前曾有过它的话)——却消失了。

称为左派的这个乌合之众的第一个发言人是冯·贝尔格先生。但是切莫认为，在我们面前的又是那个去年曾用各种正中要害的辛辣俏皮话使右派恼恨的矮小而精神饱满的神甫。贝尔格先生不再扮演神甫的角色——他现在是以牧师的姿态出现。

他认为，最好能把奏折草案写得使“最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议院应该向全国表明，“它的代表并不打算为了对几条原则的徒劳的争论而牺牲国家的福利”。贝尔格先生在讲话结束时指出，草案中缺少“我们(?)所遵循的和解精神”和“协商”的愿望。他预言说，议院通过关于奏折的辩论不会“在祖国确立和平及对美好前途的希望”。

的确！难道幽里希地区和杜伦的选民派贝尔格先生到柏林来，是要他把人民争取自己制定自己的宪法的权利的斗争宣布为“对

几条原则”的徒劳无益的“争论”吗？是要他用虔诚的语调来鼓吹“和解”与“协商”，要他在只有**战争**可谈的时候来侈谈“和平”吗？

人们之所以选举您贝尔格神甫先生，并不是因为您是一个布道者，而是因为您**投票赞成拒绝纳税**。选举您出来不是为了要和平，这种选举从一开始起便是对政变的**宣战**。派您去柏林，不是要您去提议和解和协商，而是要您在那里**表示抗议**。而现在，您当上了议员，您就把人民主权和“专制王权”之间的斗争宣布为对几条原则的徒劳无益的争论！

大多数投票赞成拒绝纳税的议员之所以再度当选，并不是因为他们从1848年5月到11月的全部活动都使选民感到满意，而是因为他们作出过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从而站到了革命的立场上，因为可以期望，政府给他们饱享的闷棍将最终擦亮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要想争得任何一点东西，就应该对王权和政府采取怎样的行动。人们曾希望，由于这一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向左跨出哪怕是一步也好。

与此相反，看来11月间所施的惩罚收到了效果。这些先生不但没有向左转，反而向右转了。他们以抱怨派²⁸⁵的最善意的激情，宣扬和解和协商。他们声言准备忘记和宽恕他们所身受的暴力，他们主张和平。他们在自己的提议被否决时受到侮辱性的嘲笑，完全是罪有应得。

下一个站起来发言的人是西里西亚的地主**伦纳德伯爵**。

伦纳德先生认为，3月里没有发生任何变革，只不过增添了一个新要素。王权依旧是王权，但是一个人民有**发言权的等级**(!)代议机关作为“决定性的要素”补充了进来。在其他方面则一切仍如往昔。(的确，这也就正是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宪法形式钦定给

我们的东西,和必须加以修改的东西。)议员应该“代表人民总体的宪法,也就是说,人民和君主一起,而不是人民反对君主”。(那末试问,如果议员本来就“代表”君主的话,又何必还要一个君主呢?)从这种新的国家理论出发,伦纳德先生还向议院作了如下的声明:议院的存在决不是“为了跟国王零零碎碎地讨价还价”——即不是为了跟国王协商,——“为了跟它进行关于言辞或甚至,如果愿意的话,关于权利的争执”;政府和议院决不是“诉讼双方的律师”。议员如果对自己的职权不是这样理解,就会“在理论上进行内战”。

伦纳德先生的话是说得够明显的了。在渎神的立宪国家中,议会通过自己的委员会即内阁来操纵国事,而国王则只有表示同意和签字的权利。在受考验的日子里,即在康普豪森、汉泽曼和普富尔时期,我国也曾经是那样。但是,在天赋的普鲁士君主立宪王国中,情形却恰恰相反:国王通过自己的大臣来操纵一切,而议院若是除了同意天赋国王的心愿外,还胆敢有所别的作为,那它就要倒霉!

伦纳德先生继续说道:“在王权和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嫌隙的最鲜明的证据是,目前各省都以万众一心的热忱在讨论德国问题……这样热忱的原因……多半是由于我们历代的天赋王权、豪侠重义的和战无不胜的(特别是在香槟、在耶拿附近²⁸⁶和在1848年3月18日那天)霍亨索伦王朝的尊严和伟大。(会场活跃并有叫好声!)”

下述情况就可以证明这种热忱:3月19日,即伦纳德先生说这些话的那一天,在居尔岑尼希有五千人^①宣告要“打倒德意志皇帝”;此后不几天,在法兰克福否决了普鲁士国王作为世袭皇帝的

① 见本卷第693—694页,——编者注

候选资格，前天在法兰克福投票赞成一般世袭皇帝政权的，只有四票微弱的多数；这两点也可以证明这种热忱。

不，这个完全不像狐狸的伦纳德^①最后高呼道：“谁也不能用烈性毒药来毁灭那萌生于正在痊愈的创伤上的新生命，不能把业已形成的裂痕（这就是说，裂痕毕竟存在！）变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非常值得尊敬的伦纳德！我们希望，恶徒们任何时候也不能“用烈性毒药来毁灭萌生于创伤上的新生命”——这个创伤是你那靠封建特权而装满了黄金的钱袋于去年春天遭受到的，而由于你又重沐天恩，它“现在正在痊愈”，——不能把因此在你的收入和支出之间“业已形成的裂痕变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现在走上讲坛的是雅科比先生。这位议员的发言虽然比贝尔格坚决，他的结论虽然说得比较明白和确切，但他也还是不能不玩弄外交辞令。照这位发言者的意见，在奏折中承认宪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决不能**马马虎虎**和不适时宜地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宪法尚未修改，未经最后批准和未经宣誓保证。仿佛对这样一部宪法在什么时候一般可能是恰当的和适时的！

对于协商议会的被强迫解散，雅科比先生也“不想再重新挑起旧的争执”。至于这种强迫解散是一种救亡行为，抑或是某种外交式阴谋的最终目的，——这个问题他想“让公正无私的历史”去解决。“公正无私的历史”将载明，那些在处于多数时曾经这样慷慨陈词的人，现在当他们是少数时，却像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低声下气地说话。

“至于要由人民来承认宪法，那我必须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我们的议会是

① 俏皮话：Renard（伦纳德）是姓氏，其同音词《renard》则是“狐狸”。——编者注

唯一合法、唯一有权表示这种承认的机关。”

不，雅科比先生，你们的议会决不是这样的机关。你们的议会不过是主要由于政府的阴谋策划而建立起来的机关，是在钦定的所谓选举法的基础上和在臭名昭彰的复选人“独立”的条件下选举出来的机关²⁸⁷。你们的议会当然可以承认宪法，但这将不过是同一部钦定宪法对钦定宪法的承认而已。人民绝不会去理睬它，而“公正无私的历史”不久将只会这样载明：这部所谓的宪法，尽管获得承认——假定它终于获得了这种承认——，终究被欧洲革命的进程所扫除并永远消声匿迹。

也许雅科比先生对于这个知道得不比我们差。右派议员也知道雅科比知道这点。那末这整套关于法制基础的无稽之谈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在被迫解散的议会的法制基础遭到怀疑的时候，更是多此一举！

杜塞尔多夫和爱北斐特的律师和议员舍勒尔先生对德斯特尔所提出的奏折草案极为愤慨。他认为，在向国王呈递这份奏折的代表团之后，“必定会随即发生武装起义”。舍勒尔先生，在其行动之后随即会实行武装起义的那些人，是用完全另一种语言跟国王们讲话的！

这份草案会“投给国家一个火炬”。但舍勒尔先生深信，“火炬不会引起火灾，而只会使拿火炬的人遭殃”。

不能把话说得再明显了。舍勒尔先生给左派一个好心的劝告，劝他们把草案拿回去，如若不然，有朝一日，不管议员的什么不可侵犯性，他们会遭到逮捕。真是非常仁慈的劝告，舍勒尔先生！

现在登上讲坛的是瓦尔德克先生。他丝毫也没有改变；他是个左派，但一点也没有左过想使大家都能接受的程度。瓦尔德克先生

在发言中一开始就表示遗憾，因为右派总想把挑起关于十一月政变的倒霉争论的责任推在他头上。要知道，瓦尔德克先生和“他的党”本来就“相当明确地表示了意见，认为根本不应该挑起这种对几条原则的争论”。照他的看法，“在应该怎样处理宪法这个问题上，议会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非常不妙！）——必须对宪法加以修改。瓦尔德克先生重又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对几条原则的争论是多余的，并再一次地博取右派的好感：“难道你们不能暂时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这样你们的观点完全不会受到损害；也怜惜一下别人的观点吧！”

被强迫解散的“人民代议机关”的一个前议员对那些想起国民议会解散成功便拍手称快的多数人的态度是理应如此的！

“也怜惜一下别人的观点吧！”这位大丈夫恳求怜惜！

但是，当宪法的制定工作大功告成，那时——未来的大臣“希望”——“那时，由于议会活动，这个议会将会真正提高到为充分领悟这项声明（关于宪法合法性的声明）的影响所必需的水平”！

讲得实在中听！我们的初出茅庐的议会讲坛骑士们虽然只有七个月的议会实践，但却装成这样经验丰富和精明能干的议员，好像他们在圣斯蒂凡教堂的板凳上坐了五十年，或者参加过巴黎历届议院（从 1815 年的“无双议院”起到 2 月 24 日的“无双议院”止）²⁸⁸的会议似的！

然而就是是，非就是非。我们的议会讲坛骑士们在自己短促的宦海生涯中偶尔尝到一点议会的乐趣就欣然自得到这种程度，以致把自己的革命毅力——*si jamais il y en avait*（如果说他们曾经具有过它的话），——丧失得一干二尽，好像他们在议会的辩论中都变老了。

在瓦尔德克之后显示自己的讲演艺术的，是曾经显赫一时、曾经无所不能的冯·博德尔施文克先生。

像曼托伊费尔先生一样，他的前任上司也“奉陛下之命”成了君主立宪的信徒。听听这位君主专制的末届首相怎样维护君主立宪，倒是很有趣味的。

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在二月革命以前曾被认为是当时内阁的最好的演说家。他在联合议会的各次会议上的发言比其他人成功。但当你读他现在的讲话的时候，甚至用他本人的眼光来看，也可能对这个古怪发言的荒唐无稽感到惊异。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奉命成了立宪主义者；但是除了这个称呼而外，他——不知是奉命还是未奉命——断没有任何改变。他为自己辩护说，这是由于他“在乡间幽居”的缘故；而其实可以认为他让人把他埋葬了整整一年。

他坦白承认，左派所提出的毫无瑕疵的奏折草案，“详尽无遗地向他充分解释了他们的观点，这一点他在来到议院之前一无所知”。

Que! bonhomme (头脑多么简单的人啊)！看来，在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治理普鲁士的时候，他那些靠我们出钱养活的多不胜数的密探没有给他提供什么情报，所以他现在还满以为这类现象是后来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呢！

左派声明说，他们来到议院不是根据钦定的军法宪章，而是根据普选权。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怎样回答这一点呢？

“假若我们认为我们的委任是由普选权产生的，那末一切手续(对代表资格的审查)都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只要走到市集上说一声选举我吧，就够了！我不知道，照你们的意见要多少有普选权的分子才能得到进入这个议院的权

利。你们要多少就拿多少；这样你们就很容易凑齐足够数量的选票；如果承认这种普选权，这个议院的会场很快便会挤满，那时连我们都没有立足之地了；至少，从我自己这方面去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会辞却委任的，而且辞却得愈快愈好。”

如果是某个威斯特伐里亚的农民，或者是荣任大臣时的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对于普选权说出这样奥妙无穷的话来，那我们不会感到吃惊的。上面摘引的他的那一段发言，从这样一种角度来看是颇耐人寻味的，即它表明，可以当普鲁士的首相和管理全套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僚机构而对最重要的欧洲性问题却“一无所知”。但是，在法国两度施行了普选权以后，在普鲁士两度施行了左派所谓的普选权并且结果甚至给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本人也在议院钦定了一个席位以后，——在经过这一切以后，只有老朽的普鲁士大臣才能对普选权大放这种妄诞无稽的厥词！可是不应该忘记，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曾经被埋葬了，他只是在不久前才复活，为的是“奉陛下之命”进入议院！

往下，博德尔施文克先生又说：

“虽然我们决不同意关于这部宪法只有修订后才能生效的观点，但我们仍然绝对深信王权不会拒绝满足议院的……愿望(!)……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必跟政府吵架和打官司，就好像我们是仇敌一样；相反，我们坚信，跟我们打交道的王权，也像我们一样，所关心的只是祖国的福利……在安乐的时刻和患难的时刻，我们都必须跟我们的君主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是虔诚信赖、尊重法律、总体精神等等的原则。”

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以为他还是在联合会议上发言。从前也好，现在也好，他总是站在信赖的基础上。然而这个人是对的！由于左派所谓的普选权，而且又靠着关于独立性的条文、间接选举和曼托伊费尔的阴谋诡计，建立了这样一种议院，把这种议院称为高级联

合议会是完全不算污辱的。

在议员舒尔采-德里奇作了无关紧要的发言以后，轮到曾经显赫一时的阿尔宁伯爵先生讲话。和博德尔施文克先生不同，阿尔宁先生最近一年没有睡大觉，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为什么必须立即承认全部宪法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我们能绝对相信修改宪法的活动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吗？要是万一没有呢？那时把什么当做根本法呢？这就是说，正因为我们处于三方面不一定会对应予修改的那些宪法条款取得协议的情况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应该使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也得到宪法。”

难道这不明显吗？这已经是同一个会议进行中的第二次微妙的暗示了。

议员德斯特尔也发言反对委员会的草案。在参加一般性辩论的左派的所有发言中，德斯特尔的发言无疑是最好的。在那些使人败兴和烦闷的全部辩论之后，这位来自美延的议员在攻击右派时所表现的勇气与活力给人留下一种愉快的印象。但是，连德斯特尔也不能不做一些外交式的让步和玩弄议会式的手腕。例如，他声明，他也完全同意革命应该结束。如果说，一个议员由于考虑到议会的情况而说出这种话来，也许还可以原谅，那末，一个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说这样的话就不应该了，并且，在随后立即同芬克进行关于“文化程度”的争论时，他丝毫也不应让人怀疑他会认真坚持这种胡说。何况，反正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

临结束时，议员里德尔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说，“国王重又握取了颁布法律的权利”。喝倒彩的喊声向里德尔表明他说的话是多余的。于是他吓得连忙补充说：“自然这是暂时的！”

这是对议员先生们的第三次微妙的暗示！

议院转入了对个别问题的讨论，关于这些讨论，我们留在明天再报道。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3 月 25 日

载于 1849 年 3 月 30 日“新莱茵报”
第 25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

科伦 3 月 27 日。意大利战争开始了²⁸⁹。这场战争使哈布斯堡王朝背上了重担，这付重担大概会把它压垮。

在匈牙利还没有同联合君主国公开交战而只是偶尔对南方斯拉夫人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奥地利还不那么难于对付那些只有一半起来革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并因本国君主的三次叛变而瘫痪的意大利人。虽然如此，还是费了很大力气才取得了胜利！首先曾需要使教皇和托斯卡纳大公直接或间接地从威尼斯省调回自己的部队，使查理-阿尔伯特和他那一些是碌碌无能、一些是卖身求荣的将领公然背叛意大利的事业，而主要的是采取两面政策或伪装让步，时而迫使马扎尔人、时而迫使南方斯拉夫人把他们的部队派往意大利，然后拉德茨基才在明乔河畔取得了胜利。谁都知道，只是在南方斯拉夫的边屯团大批调到意大利以后，濒于瓦解的奥军才重又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后来，当在同皮蒙特签订的停战协定仍然有效，只需要奥地利在意大利仅保持原有军队的数量，而不必过分加强它的时候，奥地利还能够把自己六十万军队中的基本兵力用来对付匈牙利，还能够把马扎尔人赶出一个又一个的阵地，依靠源源开来的援兵，最终击溃匈牙利的武装力量。科苏特也就会像拿破仑一样，不能长期地抵挡这样优势的兵力。

但是，意大利战争大大改变了形势。从停战协定显然将被破坏的时候起，奥地利就不得不把派往意大利的部队的数量增加一倍，不得不把刚刚被动员来的新兵分给文迪施格雷茨和拉德茨基两人。这样一来，可以设想到，他们两人谁都得不到足够数量的援兵。

因此，对于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重要的只是赢得时间——购买和制造武器所需要的时间，把民团和国民自卫军变成善战的兵士所需要的时间，使国家革命化所需要的时间，而奥地利同自己的敌人比起来，将一天天弱下去。

正当战争本身的进程越来越有力地把罗马、托斯卡纳甚至皮蒙特都卷入了革命，并使它们日渐增强自己的革命力量的时候，正当它们可以期待到在法国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时候，在奥地利的第三种破坏势力即斯拉夫人反对派，也在日益扩大自己的地盘并且组织日益完善。为感谢斯拉夫人拯救奥地利而颁布的钦定宪法把他们抛回到三月革命以前的状况，官僚和军阀的胡作非为使斯拉夫人受尽了侮辱，——这一切都是决不能改变的既成事实。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科伦日报”迫不及待地想要奥地利军队结束同匈牙利的讨厌的战争。例如，昨天它报道说，奥军分兵三路强渡蒂萨河，这个报道所以可靠，仅因为它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战报的证实。相反，另一方面却有消息说，马扎尔人的军队正在加速向佩斯城挺进，显然是企图解救被围困的科莫恩^①。科莫恩虽然遭到猛烈的炮击，但是仍然英勇地屹立着。在遭受炮击时，科莫恩的保卫者一枪不发，但当奥军试图进攻时，他们却以

^① 匈牙利称作：科马罗姆。——编者注

霰弹的猛烈射击，使奥军遭受惨重的损失并败退下去。据传闻，正当邓宾斯基安然地等待科堡公爵的波兰枪骑兵团前来进攻，并命令乐队吹奏“波兰尚未灭亡”²⁹⁰的时候，这支枪骑兵团投到马扎尔人方面来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能报道的关于匈牙利战场的全部情况。3月23日从维也纳发出的消息尚未收到。

现在我们来看看意大利战场。在这里，皮蒙特军队沿提契诺河和波河驻扎配置成一道长弧。它的第一线从阿隆纳起，经过诺瓦拉、维吉瓦诺、沃格拉、直到皮阿琴察地区的卡斯特-圣卓万尼。这支军队的预备队配置在这一线之后的几德里的地方，在韦尔切利、特里诺和亚历山大里亚地区内的塞齐亚河和博尔米达河沿岸。配置在最右翼，在托斯卡纳和摩地那交界处的萨尔察纳附近的，是拉·马尔摩拉所指挥的特遣军，它准备穿过鲁尼贾纳山的山口，进入巴马和摩地那，以便左面同主力军的右翼，右面同托斯卡纳和罗马的军队会合，伺机强渡波河和艾契河^①，并在威尼斯省境内进行军事行动。

在对面，在提契诺河和波河的左岸，有拉德茨基。大家知道，他的军队共分为两个军：一个占领伦巴第，另一个占领威尼斯省。从威尼斯省没有传来关于部队配置的任何消息，可是我们却到处听说，拉德茨基在伦巴第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都集中在提契诺河一带。他从巴马调回了自己的全部军队，在摩地那要塞只留下了几百人。在华里斯、科摩、瓦尔·德·因泰尔维和瓦尔特林纳没有留下任何部队；甚至连国境海关缉私队也不见了。

^① 意大利称作：阿迪杰河。——编者注

拉德茨基所统率的为数五万人的全部军队，占据着从马振塔到帕维亚的提契诺河沿岸和从帕维亚到皮阿琴察的波河沿岸的阵地。

据说，似乎拉德茨基本人曾有这样一个卤莽的计划：率领这支军队立刻渡过提契诺河，利用意大利人势必混乱的机会，直取都灵。不能不令人想起，拉德茨基还在去年——而且不止一次地——就有过诸如此类的拿破仑式的计划，那时他就已经由于这种计划而吃了亏。不过，这一次军事会议一致反对这个计划，并且决定，不进行决战，而向阿达河、奥利奥河方向撤退，万不得已时，甚至向基泽河方面撤退，以便把来自威尼斯省和伊里里亚的援军调集到那里。

奥军能否毫无伤亡地实现这次撤退，他们能否长久地抵挡住皮蒙特军队，就要看皮蒙特军队的机动性如何和伦巴第人的斗志如何了。要知道，奥军现在已经放弃了阿尔卑斯山南坡，即科摩、布里昂察、贝尔加莫阿尔卑斯山区、维尔特林（瓦尔特林纳）和布里西亚省的大部分地方，这些地方最适合于开展民族游击战争。集中在平原上的奥军必定会放弃山区。如果皮蒙特军队以轻装部队开始迅速进攻，他们就可以在这里，在奥军的右翼，于短期内组织好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将威胁奥军的翼侧部队，如果能打败奥地利的一个军，就可以威胁奥军的退却，切断它的交通线并把起义一直扩展到特里延特阿尔卑斯山区。要是加里波第在这里就好了。不过他决不会有再为卖国贼查理-阿尔伯特效力的念头了²⁹¹。

拉·马尔摩拉所支援的托斯卡纳—罗马的军队，应当占领从皮阿琴察到费拉拉的波河一线，尽可能迅速地强渡波河，然后再强渡艾契河，切断拉德茨基和奥地利—威尼斯军的联系，在他的左

侧,可能还在他的背后作战。不过,这支军队未必能这样迅速地赶到,以便影响军事行动的开始。

但是,所有这些因素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皮蒙特人的行动。他们的军队是优良的、善战的,但是如果还像去年一样被人出卖,那它一定会被击溃。伦巴第人要求得到武器以便向自己的压迫者作斗争;但是如果还像去年一样,不坚决的资产阶级政府再次使群众的起义陷于瘫痪,那末拉德茨基就能够再度进入米兰。

对付政府的叛变和怯懦,只有一种手段:革命。也许正是需要查理-阿尔伯特的再次叛变,伦巴第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再次背信弃义,才能使意大利的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使意大利争取独立的战争进行到底。但那时卖国贼可就要遭殃了!

弗·恩格斯定于 1849 年 3 月 27 日
载于 1849 年 3 月 28 日“新莱茵报”
第 25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皮蒙特军队的失败

科伦 3 月 30 日。拉莫里诺的叛变奏效了。皮蒙特军队在诺瓦拉城附近被完全击溃，并向博尔哥马涅罗，向阿尔卑斯山麓败退。奥军占领了诺瓦拉、韦尔切利和特里诺，打开了通向都灵的道路。

直到现在还没有比较详细的消息。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如果不是拉莫里诺使奥军得以楔入皮蒙特各师之间并孤立其中一部分，奥军就不可能获得胜利。

查理-阿尔伯特也叛变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他的叛变是仅仅通过拉莫里诺呢或是还用其他方式——这我们只有以后才能知道。

拉莫里诺正是那个冒险家：他在 1830—1831 年波兰战争期间有过一段非常可疑的经历，以后于 1834 年即进军萨瓦²⁹²时期，正好在发生严重变故的当天携带全部军款潜逃，后来在伦敦，他又为了一千二百英镑而替前不伦瑞克公爵制定了一个征服德国的计划。

这样一个骗子手居然能够得到这样的职位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害怕热那亚和都灵的共和主义者甚于害怕奥地利人的查理-阿尔伯特，从一开始就已经打算叛变了。

在这次失败以后，人们期待爆发革命和在都灵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从下述事实就可以看出来，即有人想用查理-阿尔伯特让位给他的长子的办法来防止这种事变。

皮蒙特军队的失败比德国皇帝的所有各种丑剧都具有更大的意义。这是整个意大利革命的失败。在战胜了皮蒙特之后，就该轮到罗马和佛罗伦萨了。

但是，只要各种征兆不是假象，那末意大利革命的这次失败也正是欧洲革命爆发的信号。法国人民看到，随着本国国内反革命对他们的奴役的不断加剧，外国的武装反革命也逐渐逼近他们的边境。与巴黎的六月胜利和卡芬雅克专政同时发生的，是拉德茨基胜利地进攻到了明乔河；与波拿巴的总统选举、巴罗内阁和俱乐部法²⁹³相应和的，是奥军在诺瓦拉附近取得胜利并向阿尔卑斯山脉推进。巴黎的新革命酝酿成熟了。一年来一直在准备脱离皮蒙特而并入法国的萨瓦，反对参战的萨瓦，渴望投入法国的怀抱；巴罗和波拿巴一定会拒绝它。热那亚，如果不是太迟的话，也许还有都灵，将要宣布成立共和国并向法国求助，而奥迪隆·巴罗一定会傲慢地回答它们说，他能够捍卫撒丁领土的完整。

但是，如果内阁不愿意却道这一点，那末巴黎人民倒是清楚地知道：法国是不会容忍奥地利人呆在都灵和热那亚的。巴黎人民也不会容许他们呆在那里。巴黎人民将用胜利的起义来回答意大利人，而法国军队，从2月24日²⁹⁴以来唯一没有上过战场的一支欧洲军队，必定会归附他们。

法国军队急不可待地要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同奥军较量一番。它不惯于反对使它能够得到新荣誉和新桂冠的革命，反对那打着反对同盟的斗争旗帜的革命。法国军队不是“我的英勇军队”。

意大利人的失败使人们感到悲痛。除波兰人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遭受自己强邻这样的凌辱和压迫，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作过这么多果敢的努力来摆脱他们身上的枷锁。但是，每一次这个不幸的民族都被迫屈服于自己的压迫者。一切努力、全部斗争的唯一结果，就是新的失败！但是，如果现在的失败将导致巴黎的革命并引起到处已露端倪的欧洲战争，如果这次失败成为整个大陆上的新运动——将具有与去年的运动完全不同的性质的运动——的推动力，那末甚至意大利人也会有理由来庆贺自己的这种结局。

二

科伦 4 月 1 日。根据来自意大利的最新消息，皮蒙特军队在诺瓦拉附近的失败，并不具有像拍往巴黎的急电中所说的那种决定性的意义。

皮蒙特军队遭到了失败，他们被截断了同都灵的联系，并败退到山中。不过如此而已。

如果皮蒙特是个共和国，如果都灵政府是个革命政府并有勇气采取革命的措施，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但是，意大利的独立的丧失，将不是由于奥军的无敌，而是由于皮蒙特王室的怯懦。

奥军的胜利是靠什么取得的呢？是靠下述情况：由于拉莫里诺的叛变，皮蒙特军队中的两个师被切断了与其他三个师的联系，而陷于孤立的这三小师则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奥军击溃了。这三个师现在正向瓦里斯阿尔卑斯山^①麓败退。

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服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① 意大利称作：平宁阿尔卑斯山。——编者注

西班牙人在 1807—1812 年证明了这一点²⁹⁵，匈牙利人现在也在证明着这一点。

赫山诺夫斯基被击溃在诺瓦拉城下，并被切断了到都灵的去路；拉德茨基进驻到距都灵九德里的地方。在皮蒙特这样一个君主制（虽然也是立宪制）的国家中，战争的结局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向拉德茨基求和。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共和国中，这是决定不了什么的。如果不是君主国天性怯懦，从没有勇气采取极端革命的手段，如果不是这种不可避免怯懦，赫山诺夫斯基的失败可能成为意大利的幸福。

如果皮蒙特是个无须理会君主制传统的共和国，它就有可能完全按另一种方式结束战争。

赫山诺夫斯基败退到比耶拉和博尔哥马涅罗。在那里，他本来很容易把军队聚集起来，用大胆的进攻把拉德茨基的胜利化为乌有，因为在那里，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阻挡他继续退却，几乎不可能把军队沿着两三条狭窄的河谷摆开。

如果皮蒙特军队的统帅具有革命的勇气，如果他们知道在都灵有一个准备采取最坚决行动的革命政府，他们就会明白应该怎样行动。

在诺瓦拉会战以后，马乔列湖附近驻扎了三万皮蒙特军队的士兵。如果在大约两天之内把这支军队集中起来，就可以把它迅速调到驻有不到一万二千名奥军的伦巴第。这支军队就能够占领米兰、布里西亚和克雷莫纳，组织普遍起义，各个击破从威尼斯省开来的各奥地利军，从而完全摧毁拉德茨基的整个作战基地。

这样，拉德茨基就不会前往都灵，而必定会立刻掉过头来，返回伦巴第，途中必然会遭到皮蒙特民兵的追击，因为皮蒙特民兵一

定会支持伦巴第的起义。

这种**真正**的民族战争，就像伦巴第人在 1848 年 3 月所进行的结果把拉德茨基赶到奥利奥河和明乔河对岸的战争一样，会把整个意大利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并使罗马人和托斯卡纳人充满新的毅力。

当拉德茨基还停在波河和提契诺河之间而进退未决的时候，皮蒙特和伦巴第的军队就可以开到威尼斯去解围，同拉·马尔摩拉和罗马军队联合起来，用游击队进行连续的袭击，以便不断地惊扰奥军元帅，从而削弱并分割他的部队，最后把他打败。伦巴第只是等待皮蒙特人的进军；它甚至还没有等他们到来就已经起义了。只有奥军的要塞还在箝制着伦巴第的城市。一万皮蒙特军队已经到了伦巴第；再赶来两三万人，拉德茨基的退路就被截断了。

但是，群众起义，全民起义，这是使王室望而生畏的手段。这是唯有共和国才会采取的手段，—— 1793 年就证明了这一点。采用这种手段必须以**革命的恐怖**为前提，而究竟有哪个君主敢于这样做呢？

可见，断送意大利人的决不是诺瓦拉和维吉瓦诺会战的失败，而是君主制迫使他们采取的怯懦和谨小慎微的行为。诺瓦拉会战的失败只是造成了**战略上的**损失：意大利人被切断了去都灵的道路，而奥军却打开了去都灵的道路。假如在会战失败之后立即开始**真正的革命战争**，假如意大利残存的一部分军队立刻宣布自己是全民起义的核心，假如把**军队**的普通战争变为 1793 年法国人所进行的那种**人民的战争**，那末这种损失就根本算不了什么。

但是，君主国当然决不敢进行革命的战争、决不敢发动全民起义和实行革命恐怖。它宁可跟自己的最凶恶的但出身相同的敌人

讲和,而不愿同人民联合。

查理-阿尔伯特是不是个卖国贼,这无关紧要,只是他的一项**王冠**,只是一个**君主制**就足以把意大利引向灭亡。

但是,查理-阿尔伯特确是个卖国贼。所有的法国报纸都披露了欧洲列强的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披露了反革命企图彻底镇压欧洲各国人民的进军计划。俄国和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法国和撒丁,都签字参加了这个新的神圣同盟。

查理-阿尔伯特奉命同奥地利作战,让人把自己打败,从而使奥地利人有可能在皮蒙特、佛罗伦萨和罗马恢复“安宁”并给各地钦定军法宪法。为此,查理-阿尔伯特一定能得到巴马和皮阿琴察,俄国人一定能平定匈牙利,法国一定能成为帝国;这样,才能确保欧洲的安宁。照法国报纸上的消息看来,反革命的庞大计划就是如此;而这个计划也向我们说明了拉莫里诺叛变和意大利人失败的缘由。

但是拉德茨基的胜利使君主制遭到一个新的打击。诺瓦拉会战和皮蒙特军队在会战后的毫无作为证明,在人民必须竭尽全力来自救的紧要关头,束缚人民最厉害的莫过于君主制了。为了使意大利不致因君主制而灭亡,首先就必须使意大利的君主制灭亡。

三

现在，我们面前终于展现出一幅关于奥军从出征皮蒙特到诺瓦拉获胜的鲜明清晰的图画。

拉德茨基一面故意散布谣言，说他只限于防御并要向阿达河撤退，一面则暗地把自己的全部队伍集中到圣安吉洛和帕维亚。由于都灵的亲奥地利反动政党的叛变，拉德茨基充分探悉了赫山诺夫斯基的一切计划和作战部署，探悉了他的军队的全部配置情况。相反地，拉德茨基却成功地使皮蒙特人对他的计划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正因为如此，皮蒙特军队才配置在波河的两岸，只想集中力量从各个方面同时向米兰和洛迪推进。

不过，要是在皮蒙特军队的中央进行认真的抵抗，那末拉德茨基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有现在所获得的这么快的胜利。如果拉莫里诺军在帕维亚拦阻了拉德茨基的去路，那就有足够的时间，在援军尚未开到之前，阻止拉德茨基渡过提契诺河。在这段时间内，驻在波河右岸和阿隆纳附近的几个师也可以开到。沿着提契诺河配置的皮蒙特军队掩护着都灵，它的力量可以绰绰有余地击溃拉德茨基的军队。自然，只有在拉莫里诺履行自己职责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切。

他没有这样做。他让拉德茨基渡过了提契诺河，结果皮蒙特军的中央被突破了，而配置在波河彼岸的几个师则陷于孤立。其实，战局也就这样决定了。

于是，拉德茨基把自己为数六七万人并拥有一百二十门火炮的全部军队都摆在提契诺河和阿哥尼亚河之间，并从翼侧向提契诺河沿岸的五个皮蒙特师展开了进攻。他仗其巨大的优势兵力，于21日在摩尔塔拉、加尔拉斯科和维吉瓦诺击溃了距离最近的四个师，占领了摩尔塔拉，从而迫使皮蒙特军队向诺瓦拉撤退并威胁他们去都灵的唯一能够通行的道路——从诺瓦拉穿过韦尔切利和基瓦索的道路。

但是，皮蒙特军队就连这条道路也失去了。为了有可能集中自己的部队，特别是把配置在极左翼即阿隆纳附近的萨拉洛利师调来，他们必须把诺瓦拉变成自己的作战枢纽，而且他们还有可能在塞齐亚河彼岸重新部署。

因此，几乎被切断到都灵的去路的皮蒙特军队，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他们要不就在诺瓦拉应战，要不就把自己的兵力调往伦巴第，组织人民战争，把预备队和国民自卫军留在都灵，让都灵去听天由命。这样，拉德茨基就不敢继续前进了。

但是，要想有这样的出路，就必须在皮蒙特本土准备**群众起义**，可是，恰好就没有这样做。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已经武装起来，而人民群众却手无寸铁，尽管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把放在军械库中的武器发给他们。

君主国不敢求助于曾在1793年拯救了法国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因此，皮蒙特军队不得不在诺瓦拉应战，尽管他们的阵势非常不利而敌方的兵力又占很大的优势。

炮兵较弱的四万皮蒙特军队（十个旅）抵抗着为数至少六万人并拥有一百二十门火炮的奥地利军队。

皮蒙特军队布阵在诺瓦拉城下通往摩尔塔腊的大道两旁。

左翼是两个旅，由杜兰多指挥，有相当坚固的比科卡阵地作为依托。

中央是三个旅，由贝斯指挥，有契塔德拉庄园作为依托。

右翼是两个旅，由佩罗纳指挥，有科尔特努奥沃台地（沿着通向韦尔切利夫的大道）作为依托。

两个预备军的配置如下：一个由两旅组成的军，由热那亚公爵指挥，配置在左翼；另一个由一个旅和近卫军组成的军，由萨瓦公爵、即现在的国王指挥，配置在右翼。

奥军的配置情况，从他们的战报来看，还不太清楚。

起初，达斯普雷指挥的奥地利第二军攻击皮蒙特军队的左翼，随后阿佩尔所指挥的第三军以及预备队和第四军也都相继展开。奥军得以完全展开自己的战线，以优势兵力对皮蒙特的战斗队形的各点同时发起集中的攻击，击溃了皮蒙特军队。

皮蒙特军队阵地的要冲是比科卡。奥军如果占领了它，就能把皮蒙特军队的中央和左翼部队围困在城市（未设防）和运河之间，就能打散他们，或者迫使他们缴械投降。

因此，主要攻击也就指向以比科卡为主要依托的皮蒙特军队的左翼。这里的战斗非常激烈，可是很长时间不分胜负。

对中央也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攻击。皮蒙特军队曾数次丢掉了契塔德拉庄园，而贝斯又数次把它夺回来。

当奥军发现在这里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的时候，他们重又把自己的主力调去进攻皮蒙特军队的左翼。皮蒙特的两个师都被击退到比科卡，最后，比科卡本身也终于被攻陷了。萨瓦公爵带领自己的预备队猛攻奥军，但是没有成功。奥皇军队的优势太大

了，阵地丢失了，会战的结局也就决定了。皮蒙特军队所剩下的唯一退路是通往阿尔卑斯山方向，即到比耶拉和博尔哥马涅罗去的道路。

关于这次靠叛变进行准备和靠优势兵力获得胜利的会战，早就焦心盼望奥军胜利的“科伦日报”是这样说的：

“这次会战将永远是战争史上的光辉范例(!)，因为拉德茨基老将在这里所取得的胜利是巧妙运用计谋和真正大无畏精神的结果，自伟大的战神拿破仑时代以来，没有任何战绩可以与之相比(!!!)。”

拉德茨基，或更确切些说，他的总参谋长海斯，非常巧妙地实现了他同拉莫里诺的阴谋，这一点应该承认。自格鲁希在滑铁卢叛变以来，确实再没有比拉莫里诺所干的卑鄙勾当更骇人听闻的了，这一点也是真实的。但是拉德茨基却不属于“战神”(!)拿破仑一流的人物；不，这是威灵顿一流的人！威灵顿和拉德茨基两人为获得胜利所付出的更多的是金钱而不是勇敢和智谋。

“科伦日报”昨天还信口雌黄地胡说什么民主派议员都逃出了都灵，什么伦巴第人的“举动像一群胆怯的流氓”，等等；对于这类谎言，我们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谈论。最近的事件已经驳倒了这种说法。这种谎言只能证明，“科伦日报”对于大奥地利扼杀——而且还是靠叛变——小皮蒙特是感到高兴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3 月 30 日—
4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载于 1849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和
4 日“新莱茵报”第 260 号、第 261 号
增刊和第 263 号

法兰西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科伦 4 月 3 日。在法国国民议会 3 月 31 日的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矮小而机智的人”——梯也尔先生发表了演说。他恬不知耻地和毫不含糊地把 1815 年的维也纳条约赞扬了一番，把这个条约当作当前欧洲政治局势的基础来维护。难道这个矮子讥笑有人在实际上维护这个条约，而在法律条文上又否定这个条约的这种矛盾现象，不是完全正确的吗？临时政府和卡芬雅克的小心翼翼的行为正是这样。巴罗的对外政策是卡芬雅克政策的必然结果，就像卡芬雅克的对外政策是拉马丁政策的必然结果一样。拉马丁是临时政府对外政策的执行者，他同整个临时政府一样，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内部发展不致受到妨碍为借口，出卖了意大利和波兰。枪炮的轰隆声同拉马丁的花言巧语的宣传大概不大协调吧。临时政府曾经断言，似乎用“博爱”的词句可以消灭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借助幻想可以消除阶级斗争，它对民族矛盾和对外战争也完全采取这种态度。在临时政府的庇护下，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压迫者和法国资产阶级一起又重新站稳了脚跟，而后者在 6 月底就已实现了拉马丁的博爱，为了在国内能够从容地进行内战，为了不妨碍“正直的”温和的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去消灭胜利了的红色共和国——工人共和国，卡芬雅克支持对外媾和。在卡芬雅克执政期间，欧洲恢复了旧神圣同盟，而法国则恢复了由

正统主义者、路易-菲力浦的拥护者、波拿巴主义者和“正直的”共和主义专组成的新神圣同盟。奥迪隆·巴罗内阁就是这个双料的神圣同盟的内阁。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这个神圣同盟的政策。为了在法国国内彻底实现反革命，这个内阁需要国外反革命的胜利。

在国民会议 3 月 31 日的会议上，临时政府背弃了卡芬雅克。卡芬雅克却理直气壮地断言，他是临时政府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也背弃了冷静地确信二月革命的意义就在于 1815 年的维也纳条约的奥迪隆·巴罗。弗洛孔声言——连奥迪隆·巴罗也不否认这一点——两天以前，内阁已经真的下了一道不准前往意大利的禁令，所有想到那里去的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都拒绝发给护照。难道巴罗没有资格当亨利五世的首相吗？

至于说到赖德律-罗兰，他在反驳梯也尔时已经承认：

“是的，我应该承认我做得不对；临时政府本来应该进兵国境，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保护被压迫的弟兄，这样欧洲也许就不会再有暴君了。但是，当时我们没有下决心进行战争，这是君主政体的过错，它使我们财源枯竭，使我们军械库空虚。”

写于 1849 年 4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4 月 4 日
“新莱茵报”第 263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皇 冠 喜 剧

科伦 4 月 3 日。勃兰登堡先生昨天已把国王在“德国问题”上将采取哪些步骤通知了第二议院。诱惑力太大了；“新普鲁士报”的“忠实的埃卡尔特们”²⁹⁶和他们的一切警告全都被置诸脑后了。普鲁士国王一定会接受所进献的皇冠，因此，最近我们也许能够亲眼看到基督教德意志帝王陛下隆重地进入“帝国政府”的官邸。

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同意从平民的法兰克福议会手中把皇冠接受过来的同时，也给了这个议会本身和希望这个议会独立自主的幻想轻轻的一击。

首相“承认，法兰克福议会的决定将使实现德国统一的事业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他不能不顾及各邦政府的权利。他认为：只有在各邦君主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决议才能生效，而且只有其君主表示自愿同意的德意志各邦才有义务遵行这项决议。为了实现这种自愿联合，普鲁士政府方面将采取一切措施”。

想得真妙！帝国皇冠始终是可以接受的，特别当它是长期向往而得不到手的东**西**，是一生的目的的时候，更是这样。请看看冯·拉多维茨的著名小册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什么没有当上德国皇帝”²⁹⁷。但是，法兰克福议会所进献的皇冠不知沾染了多少平民的血污，不知记录了多少关于有主权的人民受统治的悲惨岁月的沉痛回忆，以致这位天赋的而且又恢复了自己权力的国王能

够不再费任何周折就把皇冠戴到自己的头上。

只有当其他也是由上帝加冕的君主们表示同意这种行动的时候，上帝才能清洗新皇冠上所沾染的罪恶深重的三月成就的全部污点，使它成为尊贵的东西；只有那时，这位由二百九十名教授和宫廷顾问推选出来的人才会把皇冠拿到手中，并且像某个时候有人在柏林曾经说过的那样说道：“这项皇冠是上帝赐给我的，谁想染指，谁就罪该万死！”

由于皇冠所引起的这一场喜剧，特别是由于各邦政府对这一切承认或不承认的结果，德意志帝国的混乱局面将进入怎样一个新阶段——这一点我们就让有真知灼见的“科伦日报”来回答吧。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3 日

载于 1849 年 4 月 4 日“新莱茵报”

第 263 号特别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雇佣劳动与资本²⁹⁸

—

科伦 4 月 4 日^①。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详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我们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讲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首先必须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当实现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工人阶级遭到失败的时候，它的敌人（在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则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败；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败，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维也纳的陷落，柏林十一月^②的悲喜剧，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拚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那些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和工人

①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某些版本中（包括 1891 年版在内）去掉了每篇文章开首的日期。——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柏林十一月”前面加有“1848 年”等字。——编者注

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我们曾经根据这些实例证明过：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仿佛距离阶级斗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败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没有在世界战争中较量一下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在我们的阐述中，也如在现实中一样，比利时和瑞士都是大历史画中的两幅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前者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两者都自以为既跟阶级斗争无关，又跟欧洲革命无关。

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 1848 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

我们分三部分来加以说明：(1) 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 中等资产阶级和农民等级^①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 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加之，在德国到处对一些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的了解都极端无知和十分混乱，从特许的现存制度的辩护者到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未被承认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这种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比“诸侯王爷”还多。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农民等级”改为“所谓的市民等级”。——编者注

假如问工人们：“你们的工资是多少？”，那末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做一天工从资产者那里得到一法郎^①。”；另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得到两法郎”，等等。由于他们工作的劳动部门不同，他们每一个人因劳动了一定的时间或^②做了一定的工作（譬如，织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个印张的字）而从各自的资产者那里得到的货币数量也不同。尽管他们得到的货币数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工资是资产者为了偿付劳动一定的时间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货币。

可见^③，资产者是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④。资产者用以购买工人劳动^⑤的那个货币量，譬如说两法郎，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两磅糖的两法郎，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购买十二小时劳动^⑥的两法郎，就是十二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见，劳动^⑦是一种商品，是和沙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来计量的；后者是用重量来计量的。

① 一法郎等于八普鲁士银格罗申。[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法郎”完全改为“马克”。——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了一定的时间或”删去了。——编者注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可见”后面加有“看起来仿佛”。——编者注

④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后面加有：“但这只是表面情形。实际上，他们是为了货币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资本家以一日、一周、一月等等为期购买这个劳动力。而当他把劳动力买到手以后，他就使用它，迫使工人在约定的期间内劳动。”——编者注

⑤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资产者用以购买工人劳动”改为“资本家用以购买工人劳动力”。——编者注

⑥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使用”。——编者注

⑦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①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一定的比率进行的。一定量的货币交换一定量的劳动^②时间。织布工人的十二小时劳动交换两法郎。但是，难道这两法郎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两法郎买到的商品吗？可见，实质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③，并且是按一定的比率变换的。资本家付给他两法郎，就是为交换他的劳动日而付给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见，这两法郎是表现劳动^④跟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⑤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只是劳动价格^⑥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说，比如拿一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产者^⑦供给他一架织布机和一些纱。织布工人动手工作，纱变成了布。资产者^⑧把布拿去，卖了——比方说——二十法郎。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二十法郎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很久以前，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很久以前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

① ④ ⑤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使用”。——编者注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改为“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商品”。——编者注

⑥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价格”改为“通常被称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编者注

⑦ ⑧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资产者”改为“资本家”。——编者注

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织布工人从资产者那里领来使用的织布机和纱不是他的产品，同样，他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①交换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资产者给自己的布找不到一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赚的钱，也许甚至不能捞回他用于开销工资的款项。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钱，比他付给织布工人的工资数目大得多。这一切都与织布工人毫不相干。资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现有财产即一部分资本去购买织布工人的劳动^②，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资本去购买原料（纱）和劳动工具（织布机）完全一样。购买了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生产布所必需的劳动^③）以后，资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当然，我们这位善良的织布工人现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做织布机一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

所以，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④的那一部分。

总之，劳动^⑤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

可是^⑥，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

① ② ③ ④ ⑤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⑥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可是”后面加有“劳动力在动作中的表现”。——编者注

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十二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十二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十二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假如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末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

劳动^①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②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③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④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⑤。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地，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

① ② ③ ④ ⑤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私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十五小时却属于它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工人使他不能再获得利益或者不能使他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①为其工资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②;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资产阶级^③中间寻找一个买主,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现在,在更详细地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先简短地叙述一下在决定工资时起作用的一些最一般的条件。

我们已经说过,工资是一定商品——劳动^④的价格。所以,工资是由那些决定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规律决定的。

那末,试问: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① ④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改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编者注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资产阶级”改为“资本家阶级”。——编者注

二

科伦 4 月 5 日。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

同一种商品，有许多不同的卖主供应。谁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卖同一质量的商品，谁就一定会战胜其他卖主，从而保证自己有最大的销路。于是，各个卖主彼此间就进行争夺销路、争夺市场的斗争。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想尽量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卖主排挤掉。因此，一个人就要比另一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主之间**就发生了**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但是**买主之间**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最后，**买主和卖主之间**也有**竞争**。前者想买得尽量便宜些，后者却想卖得尽着贵些。买主和卖主之间的这种竞争的结果怎样，要依上述竞争双方的对比关系怎样来决定，就是说要看是买主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呢还是卖主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产业把两支军队抛到战场上对峙，其中每一支军队内部又发生内讧。战胜敌人的是内部冲突较少的那支军队。

假定说，市场上有一百包棉花，而买主们却需要一千包。在这种情形下，需求比供应大十倍，因而买主之间的竞争就会很激

烈，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竭力设法至少也要搞到一包，如果可能，就把一百包全都搞到手里。这个例子并不是随意虚构的。在商业史上有过这样一些棉花歉收的时期，那时几个资本家彼此结成联盟，不只想把一百包棉花都收买下来，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买下来。这样，在我们前述的情形下，每一个买主都力图排挤掉另一个买主，出较高的价格收买每包棉花。棉花的卖主们看见敌军队伍里发生极剧烈的内讧、并完全相信他们的一百包棉花都能卖掉，因此他们就严防自己内部打起架来，以免在敌人竞相抬高价格的时候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于是卖主阵营里忽然奠定了和平。他们冷静地叉着双手，像一个人似地对抗买主；只要那些最热衷的买主出价又没有一定的限度，那卖主的贪图也就没有止境了。

可见，某种商品的供应低于需求，那末这种商品的卖主中间的竞争就会很弱，甚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卖主中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买主中间的竞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结果便是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显著地上涨。

大家知道，较为常见的是产生相反后果的相反情形：供应大大超过需求，卖主中间拚命竞争，买主少，商品贱价拍卖。

但是，价格上涨和下跌是什么意思呢？高价和低价是什么意思呢？沙粒在显微镜下就显得高，宝塔比起山岳来就显得低了。既然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那末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让我们随便问一个资产者吧。他会像新即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马上毫不犹豫地利用乘法表来解开这个形而上学的纽结。他会对我们说，假如我生产我出卖的这个商品的费用是一百法郎，而我把它卖了一百一十法郎（自然是在一年期满后），那末这是一种

普通的、老实的、正当的利润。假如我在进行交换时得到了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法郎，那就是高额利润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二百法郎，那就会是特高的巨额利润了。对于这个资产者来说，究竟什么是衡量利润的尺度呢？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少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亏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大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赢利了。他是以生产费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润的升降的。

由此可见，供求关系的改变，引起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引起高价或低价。

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应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涨，那末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率。举例说，假如一尺绸缎的价格从五法郎上涨到六法郎，那末白银的价格对于绸缎来讲就下跌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这样，它们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绸缎来却是跌价了。这时若要交换得原来那么多的绸缎，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

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资本将涌向繁荣的产业部门中去，而这种资本流入较为有利的产业部门中去的现象，要继续到该部门的利润跌落到普通水平时为止，或者更确切些说，要继续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生产费用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那末资本就要从该种商品生产部门中流出去了。除了该工业部门已经

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该商品的生产,即该商品的供应,就要因为资本的这种外流而缩减,直到该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说,直到该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说,直到供应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因为商品的现时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

由此可见,资本是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出。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问题时能够证明:不仅供应,连需求也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未免离题太远了。

我们刚才说过,需求和供应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销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总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不应当了解成经济学家们所了解的那种意思。经济学家们说,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规律。他们把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下降所抵销,而下降则被上涨所抵销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变动看作偶然现象。那末,同样也可以(另一些经济学家就正是这样做的)把价格的波动看作规律,而把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看作偶然现象。可是实际上,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我们细加分析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

像地震一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转中，竞争可以说是拿一个极端去抵销另一个极端。

由此可见，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这样来决定的：某些时期，某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费用，另一些时期，该商品的价格却下跌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而抵销以前超过的时期，反之亦然。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家阶级来说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构成生产费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工具^①，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

一般调节商品价格的那些最一般的规律，当然也调节工资，即调节**劳动价格**。

劳动报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供求关系为转移的，依购买劳动^②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③的工人之间的竞争情形为转移的。工资的波动一般是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相适应的。可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④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那末，劳动^⑤本身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工具”改为“劳动工具损耗部分”。——编者注

② ③ ④ ⑤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愈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愈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愈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生存^①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

工厂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譬如说,假如一架机器值一千法郎,使用期限为十年,那末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一百法郎,以便在十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坏的机器。同样,简单劳动^②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缓工人后代的费用,即使工人阶级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的费用。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计算进去的。

总之,简单劳动^③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这种最低工资,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们的本题了。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生存”后面加有“及其劳动能力”。——编者注

②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愈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愈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愈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生存^①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

工厂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譬如说,假如一架机器值一千法郎,使用期限为十年,那末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一百法郎,以便在十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坏的机器。同样,简单劳动^②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缓工人后代的费用,即使工人阶级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的费用。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计算进去的。

总之,简单劳动^③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这种最低工资,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们的本题了。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生存”后面加有“及其劳动能力”。——编者注

②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愈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愈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愈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生存^①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需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

工厂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譬如说,假如一架机器值一千法郎,使用期限为十年,那末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一百法郎,以便在十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坏的机器。同样,简单劳动^②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缓工人后代的费用,即使工人阶级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的费用。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计算进去的。

总之,简单劳动^③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这种最低工资,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们的本题了。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生存”后面加有“及其劳动能力”。——编者注

②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质有丝毫改变。

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然而远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

任何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一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例如,值一千法郎的一座房子是一千法郎的交换价值。值一生丁^①的一印张纸是 $\frac{100}{100}$ 生丁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由以交换的一定比率就是它们的**交换价值**,如果这种比率是用货币来表示的,就是它们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丝毫不能改变它们成为**商品**,或者表现**交换价值**,或者具有一定**价格**的这种性能。一株树不论其大小如何,终究是一株树。我们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不是以两为单位,而是以公担为单位,难道铁作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能竟会因此而改变吗?铁作为一种商品,只是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

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②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生丁”改为“分尼”。——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资本和雇佣劳动^①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②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可是，如果我不把靠这些生活资料维持我的生活的一段时间用来生产新的生活资料，即在消费的同时用我的劳动创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费而消失了的价值，那末我把这些生活资料消费完，它们对于我就算是完全白耗费了。但是，工人为了换到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家。因此，对于工人本身来说，这种力量是白耗费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个农场主每天付给他的一个短工五银格罗申。这个短工为得到这五银格罗申，就整天在农场主的田地上干活，保证农场主能得到十银格罗申的收入。农场主不但收回了他付给短工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见，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费了他付给短工的五银格罗申。他拿这五银格罗申买到的正是一个短工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农产品并把五银格罗申变成十银格罗申的劳动和力量。短工则拿他的生产力（他正是把这个生产力让给了农场主）换到五银格罗申，并用它们换得迟早要消费掉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五银格罗申的消费有两种方法：对资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资本和雇佣劳动”改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本家来说,是有**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使他得到了十银格罗申;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和农场主进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

资本只有同劳动^①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②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所以,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呵!工人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就会灭亡。资本若不剥削劳动^③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④,资本就得购买劳动^⑤。投入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殖愈快,也就是说,产业愈繁荣,资产阶级愈发财,生意愈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愈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愈高。

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

① ③ ④ ⑤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雇佣劳动”改为“雇佣工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生产着同它敌对的力量——资本，而它从资本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使资本加速增殖的杠杆为条件的。

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①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就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依存一样。

当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资本的。所谓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一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的利益”改为“工人的利益”。——编者注

四

科伦 4 月 7 日。资本愈增长，雇佣劳动量就愈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愈增加，一句说，受资本支配的人数就愈增多。我们且假定有这样一种最适意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工资一般不仅是由我能够用它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

工资包含着各种对比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①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是不是单由这个货币价格来决定的呢？

在十六世纪，由于美洲的发现^②，欧洲流通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③所得到的银币数仍和从前一样。他们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们的工资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们拿同样数量的银币所交换到的别种商品比以前少了。这是促成十六世纪资本增殖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举一个别的例子。1847年冬，由于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面包、肉类、黄油、干酪等等）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④所得的货币量仍和以前一样。难道他们的工资没有降低吗？当然是降低了。他们拿同样多的货币所能换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比以前少了。他们的工资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银的价值减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了。

我们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一切农产品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们的工资正因为工资的货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

总之，劳动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是和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我们谈到工资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

① ③ ④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美洲的发现”改为“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金矿”。——编者注

工资。

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无论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完全表示出来。

此外，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对比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

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反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①。

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但是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三法郎降低到两法郎。这时，虽然工人拿这两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恩格斯把自“反之，相对工资”以下的一段话改为：“而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直接劳动从劳动新创造出的价值中所获得的那个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这种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的份额。”

上面，在第 14 页[见本卷第 477 页。——编者注]上，我们说过：‘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但是，资本家要从卖出由工人创造的产品所得的进款中再补偿这笔工资。资本家在补偿这笔工资时，照例要在扣除生产费用后，还有若干剩余，即还有利润。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价格，对资本家来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补偿他所垫支的原料价格和他所垫支的工具、机器及其他劳动资料的损耗；第二，补偿资本家所垫支的工资；第三，这些费用以外的余额，即资本家的利润。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已存在的价值；很清楚，补偿工资的那一部分和构成资本家利润的余额完全是从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并附加到原料价值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把工资和利润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看成是工人生产的产品中的份额。”——编者注

法郎可以买到比从前拿三法郎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一法郎,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得替资本家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①。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多的劳动。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坏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

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规律究竟是怎样的呢?

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交流价值^②即利润愈增加,则劳动的交流价值^③即按日工资就愈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

也说有人会驳斥说:资本家赢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资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场或者原有市场上的需要骤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大为增加;所以,一个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资即劳动^④的交流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改为“资本所得的份额比劳动所得的份额提高了”。——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资本的交流价值”,改为“资本的所得份额”。——编者注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的交流价值”改为“劳动的所得份额”。——编者注

④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

首先必须承认,所得出的结果依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经过相反的途径得出的。固然,利润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资的降低,但是工资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润的增加。资本家用同一数量的劳动^①,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说,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资本家得到的纯收入相比却减少了。

此外,我们还应提醒,无论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别种商品相交换的比率,总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资本家相互间的盈亏得失必定在整个资本家阶级范围内互相抵销。改进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绝不是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如果我用纺纱机能够在一小时内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一倍的纱,比方从前为五十磅,现在为一百磅,那末我用这一百磅纱交换所得^②的商品,并不比以前用五十磅交换到的多些,因为纱的生产费用减低了一半,或者说,因为现在我用同样多的生产费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产品。

最后,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场的也好)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率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活劳动^③加到全部积累起来的劳动上去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增殖资本的比率,即按利润比工资增加的比率增长的。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别人的劳动”。——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在“所得”之后还有“平均起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句话。——编者注

③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活劳动”改为“直接劳动”。——编者注

可见,即使我们单只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范围内观察问题,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交换价值^①同样迅速下降,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在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末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

这样我们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使**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

^① 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的交换价值”改为“劳动价格”。——编者注

扩大了。

最后：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敌对它的力量，即愈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能在愈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资产阶级增殖财富、重新为资本加强权力而工作——这样的工作无非是它本身在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

五

科伦 4 月 10 日。然而，是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我们不当听信他们的话。我们甚至于不能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好。资产阶级太开明了，太会打算了，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奴仆的衣着华丽夸耀于人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锱铢必较。

因此我们就应当更仔细地研究一个问题：

生产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影响工资的？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本整个说来是在不断增长，那末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资本的数目和资本的数额^①日益增加。资本的增殖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数额的增加，就使得有可能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投入产业战场**。

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贱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须廉价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增加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资本的数目和资本的数额”改为“资本家的数目和他们的资本的数额”。——编者注

五

科伦 4 月 10 日。然而，是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我们不当听信他们的话。我们甚至于不能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好。资产阶级太开明了，太会打算了，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奴仆的衣着华丽夸耀于人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锱铢必较。

因此我们就应当更仔细地研究一个问题：

生产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影响工资的？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本整个说来是在不断增长，那末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资本的数目和资本的数额^①日益增加。资本的增殖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数额的增加，就使得有可能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投入产业战场**。

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贱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须廉价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增加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资本的数目和资本的数额”改为“资本家的数目和他们的资本的数额”。——编者注

际生产费用的百分率，是依每尺麻布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一般生产费用为转移的。

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因为同他竞争的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费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

这样，资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像采用新生产资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说他们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资料曾经能够用以前的价格供给加倍的产品，那末**现在**他们已不得不按**低于**以前的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在这种新生产费用的水平上，同样一场钩心斗角的斗争又重新开始。又有人实行更细的分工，又有人增加机器数量，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日益扩大。而竞争又对这个结果发生反作用。

由此可见，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

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并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

这个规律正就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费用**趋于一致的规律。

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的采用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当这种生产资料的采用一旦成为普遍的现象时，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

是：要取得原有的价格，他就必须供给比以前多十倍、二十倍、一百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现在他必须售出也许比以前多一千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损失；因为他现在必须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利润^①，并且也是为了抵补生产费用（我们已经说过，生产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贵）；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手都成了生死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因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愈大而愈残酷无情地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规模发展起来。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强大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更廉价的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廉价生产即按原先价格供给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可见，资本家努力的结果，除了必须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以外，换句话说，除了使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恶化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虽然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制造出来对付竞争者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着他自己，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进行廉价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若是想像一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我们就会明白，资本增殖、积累和集聚的结果，如何导向了不断地、日新月异地、更大规模地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得到利润”改为“得到更多的利润”。——编者注

旧机器。

这些同生产资本的增殖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确定呢？

更进一步的分工使一个工人能做五个、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五倍、十倍乃至二十倍。工人中间的竞争不只表现于一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一个工人贱些，而且还表现于一个工人做五个、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而资本所实行的和经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进行这种竞争。

其次，分工愈细，劳动就愈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体力上或智力上的特别本事和技能了。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排挤；我们还要提醒一下，一种工作愈简单，就愈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愈少，工资也就愈降低，因为工资像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总之，劳动愈是不能给人以乐趣，愈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愈激烈，工资也就愈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造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了贫困所迫，就愈加重分工的极危险的后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资就愈少。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他工作得愈多，他给自己的工友们造成的竞争就愈激烈，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原因同样很简单：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给自己，即自己给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造成竞争。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

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到街头上去，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我们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资本家相互间的产业战争。这种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

不错，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似乎因采用机器而成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工业部门里找到工作。

他们不敢干脆地肯定说，在新的劳动部门中找到栖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实最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谎言。其实，他们不过是肯定说，在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面前，譬如说，在一部分已准备进入那种衰亡的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现了新的就业门路。这对于不幸的工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资本家老爷们是不会缺少可供剥削的新鲜血肉的，于是他们就让死人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这种安慰，与其说是对工人的安慰，不如说是对资本家本身的安慰。要知道，假若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末资本的最可怕的时刻就会到来，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了！

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工人以及原已指望受雇于该产业部门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报酬会和已失去的工作的报酬同样高呢？要是这样，那就是违反了一切经济规律。我们说过，现代产业经常是用简单的和低级的工作来代替较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

既是这样，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一大批工人若不甘愿领取更低更坏的报酬，又怎能在别的部门找到栖身之所呢？

有人说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种例外。他们说，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的生产也必然增加，而在这个生产部门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也必然随之增加；况且这个产业部门的工人是熟练工人，而且还是受过教育的工人。

从 1840 年起，这种原先也只是一半正确的论点已经毫无正确的影子了，因为机器生产部门也完全和棉纱生产部门一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而机器生产部门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作用。

可是，在一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许会雇佣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难道先前一个男工的工资不是应该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吗？难道先前最低工资不是应该足够维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后代吗？资产阶级爱说的这些话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现在要得到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资，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剧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来愈消瘦。

不言而喻，小产业家是支持不住这种战争^①的；这种战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必须要做大产业家而绝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战争”改为“斗争”。——编者注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用不着进一步说明的:资本愈增殖,资本的总量和数目愈增加,资本的利息也就愈减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利息来维持生活,必须投到产业方面去,即补充小产业家的队伍,从而增加无产者的候补人数。

最后,上述发展进程愈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而“地震”^①也来得愈来愈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来得愈益剧烈了。这种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②愈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新市场或以前只被微微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但是,资本不光靠剥削劳动来生活。像贵贵的野蛮的奴隶主一样,资本也要他的奴隶们陪葬,即在危机时期要使大批的工人死亡。由此可见: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虽然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待续)²⁹⁹

卡·马克思根据他在 1847 年
12 月下半月所做的讲演写成
载于 1849 年 4 月 5—8 日和
11 日“新莱茵报”第 264—267
号和第 26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①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地震”改为“产业方面的地震”。——编者注
② 在 1891 年的版本中,“市场”改为“新市场”。——编者注

* 政治流亡者的引渡

科伦 4 月 12 日。普鲁士政府发布了逮捕奥、德和非德籍的所谓政治犯，特别是科苏特、贝姆、佩尔采尔及其他匈牙利英雄的命令，这就表明了普鲁士的宪法自由和血腥的帝王战地司法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尽管有皇冠问题，尽管有德国问题、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和其他问题，波茨坦和奥里缪茨之间仍然存在着 *entente cordiale* (衷心的一致)，这是事实，只有“科伦日报”和其他善于骗人的报刊的那些惯耍外交手腕的文坛田鼠才看不见这个事实。但这种 *entente cordiale* 竟达到卑鄙齷齪的顶点，甚至于把政治流亡者引渡给奥地利人，——这是我们素负盛誉的内阁给我们做出的一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如果罗伯特·勃鲁姆从维也纳逃到了普鲁士，普鲁士政府也会把他引渡给刽子手的。

普鲁士政府在今年 4 月 4 日曾把罗伯特·勃鲁姆的战友之一、维也纳立宪民主党人赫克引渡给战地法庭那些嗜血的奥地利恶狗。“上西里西亚火车头报”刊载了下面这篇拉提博尔^① 4 月 4 日的通讯：

“昨天白天，维也纳立宪民主党人赫克被警察用专车从布勒斯劳押送到

^① 波兰称作：拉威布日。——编者注

这里，他因参加维也纳十月革命而被控以叛国罪，不久前才逃到该城。赫克在其致维也纳亲属的一封信中告知他在布勒斯劳的住址。这封信显然遭到了和许多其他信件同样的命运，就是说，它在奥地利的某个邮政驿站中被人拆看了，因为此后不久布勒斯劳警察当局即奉命应奥地利政府的请求，前往上述赫克的住地将他逮捕并引渡给奥地利人。

依照这道命令，被捕者于昨天白天被押送到此地。被捕者由于早已身患重病，不能继续前往战地法庭。赫克被关入城内监狱，由士兵严加看守，但今晨五时他已经由两名市警备队员和一名宪兵押解出境。备受称颂的普鲁士人道精神，在这两个半小时的最后路途上，竟无视其病情的需要，一次也未准许他下车。同时也拒绝给他任何清凉饮料喝，因为没有钱买，虽然被捕者声明，他在布勒斯劳被捕时有八十塔勒被没收了，而旅途的花费，我们确实知道，总共只(!)需要三十塔勒。

德国报纸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严肃地告诫奥地利流亡者，留在普鲁士的特别是西里西亚的领土内是很危险的。关于引渡罪犯的旧协定还继续有效。战地司法所宣称的德国根本大法，无论在普鲁士或者在奥地利，都同样得到承认并被狂热地运用着。”

在宣布戒严的各国中的执行战地司法的英雄们所给予我们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当报复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各国民派必将表现出这些老爷们现在所表现的这种团结精神。

半个欧洲的渣滓——国王们和大臣们——去年春天在英国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

我们向曼托伊费尔、勃兰登堡及其同伙保证，在下一场革命——他们自己正在大力加速它的来临——的时候，一定会很顺利地做到使英国把他们引渡给复仇心炽热的胜利的德国人民。对这一点的保证现在就已经具备了。

弗·恩格期写于 1849 年 4 月 12 日
载于 1849 年 4 月 13 日“新莱茵报”
第 271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声 明

科伦 4 月 14 日。公民卡·马克思、卡·沙佩尔、弗·安内克、海·贝克尔和威·沃尔弗(助理)于今日成立了莱茵民主联合会区域委员会。

公民马克思、沙佩尔、安内克和沃尔弗联合发表如下声明：

“我们认为，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分庞杂，这势必将妨碍有利于事业的有效活动的开展。

我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因此我们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各民主团体莱茵区域委员会。

弗·安内克 卡·沙佩尔
卡·马克思 海·贝克尔
威·沃尔弗(助理)”

写于 1849 年 4 月 14 日
载于 1849 年 4 月 15 日
“新莱茵报”第 273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第二议院四月十三日会议

科伦 4 月 19 日。为了多样化,我们现在又回头来谈谈我们敬爱的柏林第二议院。它审查了议员资格,通过了奏折,制定了会议规则,并以空前未有的特别兴致讨论了德国皇帝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新莱茵报”小品文的题材³⁰⁰。这一切活动由于诺瓦拉和佩斯的炮声而毫不被人注意,就连埃克恩弗尔德的“海战”和攻占杜佩尔村的堡垒³⁰¹所给人的印象,都比普鲁士人民代议机关中的右派和左派的所有一切发言给人的印象要来得强烈。

但是现在,当可敬的议院忙于讨论三个禁口律³⁰²——招贴法、俱乐部法和出版法,而其中之一的招贴法已经审查完毕的时候,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更大一些,探究一下我们的议员先生怎样竭尽全力来补充钦定宪法,也就更加有趣。

我们来看看 4 月 13 日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速记记录³⁰³。

首先,议员利济斯基就使用波兰后备军对丹麦作战一事,对内阁提出质问。

根据后备军法第六十一节,只有在国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才能动员后备军。后备军的全部组织机构证明,一般只有在正规军和预备队不足时才能使用后备军。可是现在却动员后备军去对那只用常备部队的一个军就可以打败的小小的丹麦作战!

但还不止于此。尽管只是采取背信弃义的行为和野蛮的暴力

才把所谓的德属波兹南并入德意志联邦，尽管位于有名的分界线那边的波兹南部分³⁰⁴，按照各种条约，都跟德意志联邦毫不相干，当局还是在分界线两边的波兹南地区动员了一部分后备军派往什列期维希。

这些后备军士兵按民族说来是**真正的波兰人**，并且其中一半人甚至没有加入德意志联邦，但他们竟被派到什列斯维希，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士兵，戴上缀有**德意志帝国**黑红黄三色帽徽的头盔，为了**德意志的更大的荣誉而送死**！

“德国战争”在伦巴第的结局是由克罗地亚人决定的；“德国”对维也纳的斗争的结局又是由克罗地亚人以及捷克人、卢西人决定的；“德国”在什列斯维希的战争的结局将由**波兰人**来决定。现今就是靠这样的士兵来取得“德国武器的胜利”的！

国王就是这样来履行他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于4月11日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的：

“据此，出生于波兹南大公国的新兵不应编入西里西亚的或德国的任何其他部队，反之，德国的新兵也不应编入波兰的部队。部队的训练和指挥应该用他们的语言……各种不同兵种的波兰军队应该成为**完全独立的单位**”，等等。

利济斯基在谈到这一切时的语调是平静而坚决的。在发言结束时，他提请会议注意这种特别险恶的用心：后备军有三个营正好是在去年唯一严重遭受普鲁士所强加的国内战争危害的省份中募集的。

陆军大臣施特罗达先生接着发言。

大臣先生向会议作了一个极其冗长的报告。他说：“普鲁士的整个军事组织是建立在常备军和后备军相结合的原则上的，在编

才把所谓的德属波兹南并入德意志联邦，尽管位于有名的分界线那边的波兹南部分³⁰⁴，按照各种条约，都跟德意志联邦毫不相干，当局还是在分界线两边的波兹南地区动员了一部分后备军派往什列期维希。

这些后备军士兵按民族说来是**真正的波兰人**，并且其中一半人甚至没有加入德意志联邦，但他们竟被派到什列斯维希，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士兵，戴上缀有**德意志帝国**黑红黄三色帽徽的头盔，为了**德意志的更大的荣誉**而送死！

“德国战争”在伦巴第的结局是由克罗地亚人决定的；“德国”对维也纳的斗争的结局又是由克罗地亚人以及捷克人、卢西人决定的；“德国”在什列斯维希的战争的结局将由**波兰人**来决定。现今就是靠这样的士兵来取得“德国武器的胜利”的！

国王就是这样来履行他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于4月11日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的：

“据此，出生于波兹南大公国的新兵不应编入西里西亚的或德国的任何其他部队，反之，德国的新兵也不应编入波兰的部队。部队的训练和指挥应该用他们的语言……各种不同兵种的波兰军队应该成为**完全独立的单位**”，等等。

利济斯基在谈到这一切时的语调是平静而坚决的。在发言结束时，他提请会议注意这种特别险恶的用心：后备军有三个营正好是在去年唯一严重遭受普鲁士所强加的国内战争危害的省份中募集的。

陆军大臣施特罗达先生接着发言。

大臣先生向会议作了一个极其冗长的报告。他说：“普鲁士的整个军事组织是建立在常备军和后备军相结合的原则上的，在编

我们正是现时在分界线所穿过的地区内募集我们的帝国军队。

(3)“直到现在,在使用在波兹南大公国内已经动员的常备军时,除了合乎国家目的的意见外,其他任何意见均在所不顾。”

即然践踏了 1848 年 3 月和 4 月所作的有关常备军的庄严誓约,那末为什么对后备军就不可以这样做呢?难道后备军的波兰籍士兵就不能像常备军的波兰籍士兵一样也成为优秀的“帝国军队的士兵”吗?

我们所考虑的只是“合乎国家的目的”!

而“合乎国家的目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合乎目的”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就是想使能够拿起武器和受过军事训练的居民,离开那些尚未完全跟“普鲁士祖国”融为一体的地区。就是想惩罚那些不以普鲁士精神来投票的不称心的选民。就是想使这些选民对公民的义务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并为此目的而强使他们到“我的英勇军队”中去补课。用自己的普鲁士主义态度激起某些可恨的选民的反抗,然后就好极其冷酷无情地判他们十五年苦役,或者甚至可以借助于战地法庭对他们饬以铅弹和火药。

因此,就在波兹南以及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一部分地区征集了后备军。固然施特罗达先生没有谈到莱茵省,但是克列弗尔营已经被派到什列斯维希去了。或者,莫非是施特罗达先生打算在莱茵省也划一条分界线,以便后来声明:莱茵省“除一小部分外”,都是威斯特伐里亚的组成部分?

尚未发生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虽然征兵的事直到现在还没有涉及莱茵省的大部分地区,我们还是知道,尽管一再辟谣,但是把第八军即莱茵省的后备军也动员起来的这种坚决的意图仍然存

在。这种动员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而相应的命令也会很快下达。

自然，这也是“合乎国家的目的”并为“目前形势”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莱茵省的议员提出质问，施特罗达先生也会像他现在回答利济斯基先生一样回答他们：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因为“莱茵师业已集中在弗伦兹堡附近”！

施特罗达先生的讲话结束以后，利济斯基先生要求发言对事实提出更正。但会议规则禁止对大臣的回答提出事实更正。会议规则是对的。居然认为大臣的回答需要事实更正，这是多么不合乎普鲁士人本性的卤莽无礼的行为！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19 日

载于 1849 年 4 月 20 日“新莱茵报”

第 27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俄 国 人

科伦 4 月 21 日。大约十一个月以前，当“新莱茵报”开始出版的时候，它曾是提醒人们注意俄国军队在我国东部边境集结的第一家报纸。那时许多善良的公民说这是夸大其词，庸人自扰，等等。

现在已经清楚了，我们是不是夸大其词。最初只是保卫自己边境的俄国人，随着反革命势力的加强，开始转入了进攻。巴黎的六月胜利把他们引进了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维也纳和佩斯的陷落又把他们引进了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塔得^①。

一年以前，俄国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当时，在它被突然爆发的革命的无限威力吓得惊慌失措的最初时刻，本来是很容易把三四万俄国军队逐出波兰并建立一个自由的波兰的。有人这样号召过，但是这种号召没有得到响应。这就是俄国人有时间武装起来，而现在他们为数五六十万人的军队把我们包围在尼门河到多瑙河与阿留塔河^②一带。据“波罗的海报”的报道，仅仅沿普鲁士边境就驻扎有大约十五万人；其余的军队驻在国内，在加里西亚边境附近，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立陶宛、波多利亚和沃伦，在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莫德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和

① 罗马尼亚称作：锡比乌和布拉索。——编者注

② 罗马尼亚称作：奥尔特河。——编者注

扎莫斯提耶诸地的要塞中，据“波罗的海报”的报道，在这些要塞中储存有足够供二十五万人用的武器和军需品。

这家报纸写道：

“粮食储备是靠发放强制债券建立的，每个地主都必须接受债券而供应军队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食品。明年这项债券将被折算为赋税。因此，不久前曾流传着一种谣言，说俄国政府命令在波兰预征一年的赋税。”

这项债券的接受情况如何，我们将从其他方面得知。

去年末和今年初，波兰地主曾必须供应大量食品，不过这项供应已被算做纳税。大家满以为这样就算完了，可是现在才知道，赋税必须提前交到今年年底。

供应军队给养的这种强制措施就已经表明，集中在波兰的俄国军队的数目是多么巨大。

另一家报纸——波兹南的“东方日报”³⁰⁶——4月13日从波兹南报道说：

“在西方的俄国军队的数量是：在波兰王国驻扎有利季盖尔的一个军；利季盖尔第四军的一半再加上预备队，总共大约有十二万人。在立陶宛驻扎着一个所谓的掷弹军（原沙霍夫斯基军）和第一军的一部分。近卫军会到得迟一些——关于它要来的事已经谈了好几个月了。在杜布诺设有大本营的沃伦，配置了契果达耶夫斯基第四团的其余部队。在基辅附近驻扎着第二辅助军，在克列美涅茨驻扎着六千到八千人的快速军（巴甫洛夫率领）。最后，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还配置了为数多至六万五千人的利迭尔斯军。”

这些部队集结在这里的目的何在——这一点他们自己作了非常天真地解释：

“俄国兵士和军官谈话都是不太审慎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为什么他们屯驻在边境这个问题，他们每人的回答都是一样，即因为我们的皇帝是普鲁士国王的姻兄弟。自从俄国人在大战中打败法国人以后，一直到巴黎的全部

土地都属于皇帝的了；他委任德国各小邦君主（Fürsten）来治理国事，而任命自己的姻兄弟普鲁士君主为总督。现在法国人和德国人都举行了叛乱，而德国各邦君主和总督又都向皇帝求援——这就是我们屯驻在边境这里的原因。如果安宁不能很快恢复，我们就要越过国境去整顿秩序。”

但是这还没有完。尼古拉皇帝已经下令在帝国西部募集新兵，每千人募集八名。命令附有必须募集新兵的二十一个省的名单。

国境那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五十万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的野蛮人，只等待适当的时机一到，就将进攻德国并把我们变为信奉正教的沙皇的农奴。

像特兰西瓦尼亚一度被俄国人占领一样，像现在要求三万俄国人进入这个地区和再派三万人穿过加里西亚一样，像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也向信奉正教的沙皇求援一样，——在我们这里情况也将是这样。我们还会看到，政府和资产阶级**将把俄国人召进我们的国家**，就像不久前在特兰西瓦尼亚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事情也正是这样发展的。反革命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胜利，对我们的影响还不算大。可是，当德国尝到了俄国的鞭子，那时它的举动就会有所不同了。

俄国人是德国的真正的解放者，——我们在去年 6 月这样说过³⁰⁷。我们现在还重复这句话，但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我们这样说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4 月 22 日“新莱茵报”
第 279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关于招贴法的辩论

—

科伦 4 月 21 日。现在回过来谈谈 4 月 13 日的会议。在大臣回答了议员利济斯基的质问之后，议院就转入关于招贴法的辩论。

罗尔谢特先生宣读了中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随后韦森东克先生提议 en bloc (整个地) 否决政府的法案。

阿尔宁先生(伯爵)接着发言。他说，这个提议是不能接受的。这等于提议转入讨论当前事务。然而对待政府的法案，是不能通过转入讨论当前事务的决定的。这是由会议规则硬性规定的。

左派先生们到现在才明白，右派在会议规则中加进第五十三节的目的何在。对待政府的法案，议院无权通过转入讨论当前事务的决定。这一条款看来天真无邪，然而正好意味着：你们没有权利 en bloc 否决政府的任何一个法案，而必须对这个法案逐条逐款地加以讨论，哪怕它有一千条也好。

这甚至激起了中间派议员的愤怒。于是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每一方都挖空心思来解释会议规则，最后，主席宣布韦森东克的提议可以接受，会议随即转入进一步的讨论。

接着发言的是卢普先生，伟大的卢普，即那个曾经被革职，曾

经遭到各种报纸的迫害和攻讦，并被开除了前古斯塔夫-阿道夫同盟³⁰⁸的卢普。卢普先生发表了一篇演说，据同样伟大和同样有教化的^①柏林“国民报”的意见，在这篇演说之后，不仅在一般辩论中，而且在对个别问题的辩论中，左派都未必还能再有什么补充。那我们就来看看“光明之友”卢普的这篇堪为纯理智之产品的透彻的演说吧！

这篇透彻的演说的确是“光明之友”精神、“自由协会”³⁰⁹精神的真正产物，也就是说，它除了重复那些关于招贴问题所能说出的老生常谈以外，没有透彻地说明任何东西。

卢普先生的发言是从解释政府和中央特设委员会对招贴法的不同说明开始的。政府认为这个法令是纯警察性的措施，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整饬街道交通和顾全美观，而中央特设委员会则撇开这种荒谬的普鲁士式的把戏，把政治性的缘由提到了首位。这一解释是“光明之友”的激昂慷慨的说教的前奏。

“可见，这个法案肯定列为本次会议所必须讨论的最重大问题。本来我们并不愿意说（我们不愿意说！），世上多几张或少几张招贴，对于我们反正（！）都是一样；因为（！）权利与自由的崇高性质也就正在于此，甚至看来是最无足轻重的东西，如果同崇高的东西发生了联系，那它本身也就立即具有较为高尚的意义（！）。”

卢普先生在他那牧师的开场白中确定了招贴的“崇高性质”和“较为高尚的意义”并激发起自己听众的虔敬情感之后，就可以安然让他那“永远清彻的、水晶般纯净的和从容不迫的”纯理智之流任其游泄了。

① 原文在此处用了一个难以译出的双关语：《lichtfreundlich》[有教化]系由《Lichtfreunde》（“光明之友”意即教化主义者）一字变来的。——编者注

首先，卢普先生意味十分深长地指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用来防止想像中的危险的措施却制造出实际的危险”。

这句陈腐的话在左派的席位上引起了一阵欢腾和热烈的叫好声。

此后卢普先生又同样意味深长地证明，这个法案跟卢普先生所断然拒不承认的钦定宪法相矛盾！

援引钦定宪法，并以回忆 11 月间所挨的耳光来作为反对继续挨耳光的论据，——左派的这种政策真是奇怪！

卢普先生继续说道，如果政府认为这个法案并不触动出版自由，而只是涉及利用街道和广场传布出版物的问题，那末同样也可以说，过去在书报检查制度之下也有出版自由，因为受管制的并不是出版物的利用，而只是出版物的传布。

凡是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时期在柏林住过的人，都能对这句说的全部新颖之处作出应有的评价，这句话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在所谓自由主义者当中流行了，然而它还是在左派席位上引起了活跃和喝彩声。

卢普先生引证钦定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的条款，并详细地证明曼托伊费尔的法案和曼托伊费尔宪法有着明显的矛盾。

但是，最可爱的卢普先生，*tout bonhomme que vous êtes*（不管您是个头脑怎样简单的人），您也不可能不知道，曼托伊费尔之所以钦定了宪法，只是为了以后好通过保留旧的或施行新的禁口律，来取消宪法中所包含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词句。

卢普先生竟然振振有词地向右派解释说，以后，即在修改宪法时，他们可以把招贴法加到宪法里面去，但现在他们必须否决这个法令，因为不然他们就是擅自预先修改宪法！

好像右派先生们所关心的是保持一贯性，而不是快些消灭可恶的出版物、俱乐部、激愤情绪、商业中的不信任及其他多少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成果似的！

卢普先生还给这些有力的论据加了如下一些老生常谈：

(1) 招贴之所以遭到非难，是因为它散布**激愤情绪**。可是防止激愤情绪不是法治国家的事情，而是警察国家的事情。

(2) 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不能容忍激愤情绪和招贴的政府不是强有力的政府。

(3) 德国人乐意服从领袖。

(4) 没有招贴也没有防止住三月十八日事件。（“不是骏马，不是骑手”³¹⁰，等等）

(5) 革命是专制暴政的结果。

卢普先生从这一切当中得出结论说，为了曼托伊费尔的利益，招贴法必须否决。

他用哀求的声调呼吁说：“诸位，保卫政府，别让这个法令像警察国家的任何其他法令一样把它引向自欺自慰吧！”

按照卢普先生的意见，否决曼托伊费尔的法案不是对曼托伊费尔表示不信任，相反地，而是对他**表示信任**。卢普先生希望曼托伊费尔成为他所幻想的那种“强有力的政府”，因此他反对由于通过招贴法而削弱曼托伊费尔。你们以为卢普先生是在开玩笑么？他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卢普先生是“光明之友”，而“光明之友”是从来不开玩笑的。“光明之友”像他们那个可敬的亲戚阿塔·特洛尔³¹¹一样，也是不能忍受笑声的。

但卢普先生在结束他的全部发言时摊出了最后一张王牌。

“否决这个法令，将大大有助于使那部分在宪法未经修改以前不能同意

承认宪法的居民感到心安。”

卢普先生所关心的，是“使那部分”还没有跟曼托伊费尔沆瀣一气的“居民感到心安”！

左派先生们原来就是这样！他们厌恶激烈的运动，而既然他们是议员，并且懂得他们无力向军刀专政作斗争，他们希望的只是赶快了结那些关于原则的讨厌问题，装样子把宪法修改一番就宣布其生效，对这部宪法举行宣誓，最后使“革命结束”。那时他们就可以过宪制的安静生活，照章行事，夸夸其谈，互相倾轧，偏袒徇私，更换内阁，等等；就可以过法国的奥迪隆^①辈、梯也尔辈和摩莱辈在巴黎过了十八年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闲散生活，也就是基佐如此喜欢称之为宪制游戏的那种生活。因为只要扰乱他们安宁的革命运动一减退，瓦尔德克内阁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了！而人民本来还没有成熟到共和国的水平呀！

在卢普先生的演说之后，剩下需要说明的还有一切。首先要谈的问题不是一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贴方面的限制。必须说明招贴的作用，捍卫“街头文学”，特别是捍卫工人享受免费文学的权利，而招贴则是免费文学的一种。不应该对用招贴引起激愤情绪的权利含糊其词，而应该公开地维护这种权利。但卢普先生关于这点却只字未提。卢普先生又一次用庄严而枯燥的语调，罗罗嗦嗦地重复了关于出版自由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是在书报检查制度存在三十三年以来已有足够的机会从各方面加以讨论了的，——并且由于他说出了“国民报”的先生们就这个问题所知道的一切，这家报纸就认为卢普先生透彻地阐明

^① 即巴罗。——编者注

了问题!

在“光明之友”卢普之后接着发言的是“蒙昧主义者”里德尔。但是里德尔先生的演说太妙了,不好仓卒地来谈它。A demain donc, citoyen Riedel! (那末就明天再见吧,公民里德尔!)

二

科伦 4 月 23 日。议员里德尔的演说在已举行的辩论中无疑是最典范的一篇演说。当内阁阁员的席位上还保持一定程度的审慎，甚至曼托伊费尔还使用一些假立宪主义的词句，只有笨拙的暴发户海特男爵一人有时忘记他所扮演的立宪派角色的时候，从巴尔宁-安格闵德来的里德尔先生却毫不客气地以乌凯马尔克的真正代表的姿态出现。从来还没有一个选区像里德尔先生的选区这样有如此合格的代表人物。

里德尔先生在自己的演说一开始就问：什么是招贴？并且回答说：

“就词的本来含义说，招贴乃是应该对居民情绪起安定作用的公开声明。”

根据里德尔先生的词源学，招贴的“用途”就是如此。

我们暂且不打算跟里德尔先生争论“招贴”一词的来源。我们只提醒他注意：如果他比较仔细地读完了法案，他就完全不必对词源学下这么大的功夫了。法案中不仅谈到“招贴”，而且也谈到“就词的本来含义说”除了张贴而外别无任何其他“用途”的“声明”。

里德尔先生不是这样，而是对人们最可耻地滥用“招贴”一词表示义愤：

“招贴照例只是用来煽起激情，煽起特别是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或复仇

的火焰…… 因此,招贴照例是和它自己的名称完全对立的。用以招贴的使用往往变成滥用(即滥用其名称),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地方警察当局是否应该放任这种使用招贴来胡作非为的行为(即这种滥用“招贴”名称的行为)?警察局是否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种造成滥用(名称)招贴(并非招贴的声明,即并非安定人心的声明)来胡作非为的同谋者?”

简单点说,将来是否应该“按用途”(即按招贴一词的意义)来使用招贴?

曼托伊费尔提出来论证招贴法案的理由,一则是警察性质的,另一则是必须整顿市容,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中央特设委员会从政治上考虑主张通过法令,这是多么大的失策啊!这个法令之所以必不可少,——是由于词源学的原因,而实质上这个法令应该称为:关于恢复招贴一词的“真正含义”的法令。

可是,论据十足的里德尔先生却大大地错了。如果我们不惜使我们的读者感到万分无聊,同里德尔先生进行一场词源学的争论,那我们会捧着迪茨的语法来向他证明,“招贴”一词完全不是出自拉丁文 *piacare* (安抚、调解、劝慰),而只是法文 *placard* (声明、海报、招贴)的曲解,这个法文词的词根是 *plaque* (题词的牌子),又是出自德文。这样一来,里德尔先生所谓起安定作用的全部理论,就会像纸牌搭成的小屋一样散塌了。

这对于里德尔先生当然无所谓,而且到底还是他对。所谓起安定作用的整个这一套理论,本来只不过是学究式的伎俩,是 *captatio benevolentiae* (企图哗众取宠),而隐藏在这背后的是显然想利用有产阶级恐惧心理的企图。

招贴“煽起激情”,招贴“煽起特别是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招贴“号召无知的群众游行示威,而游行示威则会危险

地(！)破坏秩序并超出法定自由的范围”。所以招贴必须禁止。

换句话说，联合起来的封建主、官僚和资产者去年秋天用武力举行了政变，而现在打算靠议会给我们钦定一些为了使这些先生们能够安然享受自己的胜利成果所必需的补充法令。他们讨厌死了“激情”，他们用各种手段来扑灭“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权力机关了——，来恢复“秩序”和重新把“法定自由”限制在适合于他们的范围之内。而这些范围将是什么样的，可以从里德尔先生把绝大多数人民称为“无知的群众”这一点判断出来。

里德尔先生感到侮辱这班“无知的群众”的话还说得不够。他继续说道：

“阅读这些(包含在招贴中的)报道的，多半正好是人民中的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最不习惯看书面报谎，不能像惯于阅读并熟悉出版物骗局的公众那样，以应有的谨慎和保留态度来衡量和检验书面报道的可靠性……”

这班无知的群众，这个最不习惯看书面报道的阶级究竟是什么人呢？也许是乌凯马尔克的农民吧？决不是，因为第一，他们是“民族的中坚”，第二，他们不读招贴，第三，他们把里德尔先生选为自己的议员。里德尔先生所指的只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招贴是影响无产阶级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按自己的地位本身来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无论在立宪制度下还是在专制制度下都是受剥削的阶级；它随时准备再拿起武器；主要威胁正是从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所以，凡是有助于在无产阶级中保持革命毅力的一切东西，都要取缔！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比招贴更有助于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贴可以把每条街的拐角变为一张大报纸，过路的工人能从中

得悉当天的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见,他们能在这里同时遇到不同阶级和不同见解的人,跟这些人讨论招贴的内容;简而言之,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一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

但正好这一点是右派先生们所不喜欢的。到底还是他们对。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危险;那末大权在握的他们为什么不力求用尽一切手段来消除这种危险呢?

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对此表示异议。托天之福,我们在军刀专政之下生活已经将近六个月了。我们决不幻想现在能够同我们的敌人公开作战,同样我们也决不幻想采用唯一能使我们党取得政权的手段。我们不会卑下到从道义上去责备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容克地主、官僚和资产者的三角联盟,指责他们想不择手段地把我们变成奴隶。即使抱怨派先生们那种正气凛然的说教腔调和慷慨激昂的悲愤情绪本身并不是反对我们的,那末单是为了下面这一点,我们也要拒绝这类空洞的论战词句,即我们终究还是坚决希望对我们的敌人进行报复。

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现在执掌政权和拥有正式多数的先生们却不像我们这样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很艰想像还有比里德尔先生更恶劣的乌凯马尔克的代表了,可是甚至他也禁不住要在自己演说结束时声明:

“当然,我从未打算在任何程度上阻挠**自由发表意见**。我认为追求真理的精神斗争是自由民族的神圣事业,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在另一处地方,里德尔先生说,他希望

“容许招贴根据一般文学著作的传布原则来传布。”

在先已作了各种解释之后,这几句话应该作何了解呢?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话,那末现有的政府和君主立宪目前就根本不能在文明国家中保持政权。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但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这些先生们对于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可是他们又为什么不公开地这样说呢?

的确,里德尔先生,为什么您不建议立即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呢?要知道,此外就没有更好的手段来安定“激情”,来扑灭“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和保障“法定自由的范围”了! *Voyons, citoyen Riedel soyons francs!* (真的,公民里德尔,让我们开诚布公吧!)要知道事情终究会是这样的!

里德尔先生离开了讲坛。接着发言的是司法大臣,从爱北斐特来的法律顾问**西蒙斯**,他是乌培河谷如海特男爵一样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后裔。

西蒙斯先生一开始讨论问题就提出了令人折服的论证。显然,他在司法部还是个新手。

司法大臣先生说,招贴是张贴在街道和广场上的,因此,“首先必然确定街道和广场的用途是什么!!”

不错,里德尔先生值得感谢地确定了招贴的“用途”和“真正的词义”。可是,问题决不在于此,相反,而是在于“街道和广场的用途”。正是在这上头,司法大臣博得了千古不朽的荣誉。

在这个议院中,人们居然郑重其事地争论街道和广场的用途,

争论只有小学生才感到深奥的语法疑难等等问题，试问，能够设想还有比这个议院更好的小学校吗？

那末，“街道和广场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呢？

用途就是：街道……不“能用于任何私人目的或公共目的”。因为“街道……的这种用途不能得到证实！！”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国要有一个所谓的司法大臣——原来是要他给我们做这样意义深刻的解释。的确，现在已很清楚，为什么西蒙斯先生没有好意思向议院作自我介绍。

自然，在听了这些卓越的思想以后，大臣演说中的其他内容就丝毫不值得注意了。西蒙斯先生装作在法国法学方面博学多识的样子，把他以前担任检察官时一些久已忘怀的往事追述了一番。然后说了诸如此类的一些话：

“对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必须〈!〉给予肯定的回答，鉴于有人在这里表示〈!!〉怀疑〈!!!〉，至少〈!!!!〉我的意见〈!!!!!!〉是这样。”

最后，西蒙斯先生居然打算“批准限制招贴的法律基础”。

批准基础！西蒙斯先生，您从哪里学来的这种用语？

在里德尔和西蒙斯两位先生发表了这么绝妙的演说以后，我们自然也就不能再来谈贝伦兹先生在他们之后所作的发言了。贝伦兹先生正确地感觉到禁止招贴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但这种思想他发挥得很不够。

一般辩论结束了。赞成 en bloc (整个地) 否决法案的是一百五十二人，反对的也是一百五十二人。顺便说说，左派当中，科伦的吉尔先生无故缺席。要是吉尔先生出席了的说，法案就会被全盘否决。所以，法案部分通过，应该归功于吉尔先生。

关于草案的各别部分的讨论，我们不去谈它了。讨论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对书贩建立了警察监督。

对此，书贩可以向吉尔先生表示感谢！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21 和 23 日

载于 1849 年 4 月 22 和 27 日“新莱茵报”
第 279 号增刊和第 28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拉 萨 尔³¹²

科伦 4 月 26 日。我们应当报道这样一事实，它证明 *en fait de justice*（在司法问题上）再也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总检察官尼科洛维乌斯先生显然想获得甚至连黑克尔先生也不曾获得的荣誉。

从我们过去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杜塞尔多夫的副检察长冯·阿蒙第一在对拉萨尔进行刑事审讯期间，把拉萨尔写给一个雪恩施坦的农民^①吁请他在斗争爆发时给杜塞尔多夫增援一百人左右的一封信，放在自己的办公桌里压了三个星期，不交给法院侦查员；只是当法院侦查员通知他侦查已告结束的时候，冯·阿蒙先生才把这封信交给法院侦查员。我们想提醒一下，这封信其实没有包含任何直接号召起义的内容，因此高等法院和检察院并未把它当作一种罪证，可是由于这封信必须重新进行侦查，而这就是陪审法庭在上一次开庭期没有结束拉萨尔案件的原因。

有鉴于此，拉萨尔当时向总检察官对冯·阿蒙第一先生故意拖延案件提出了抗议。

总检察官不但没有给拉萨尔以任何回答，反而把他的声明连同根据第二二二条就这一声明对拉萨尔开始进行侦查的命令送交

^① 施坦吉尔。——编者注

杜塞尔多夫的检察机关,理由是仿佛在拉萨尔的声明中对冯·阿蒙先生进行了侮辱!

Pends-toi, Figaro, tu n'aurais pas inventé cela! (上吊吧,费加罗,你万没有想到这一点!)^①

于是,根据第二二二条的精神,应当把给尼科洛维乌斯先生的信看成是对冯·阿蒙先生的侮辱!在我们有幸因为出版问题同茨魏费尔和黑克尔两位先生打的那两场官司的审讯期间,有一次我们已经说明:第二二二条本身不适用于在报刊上进行的公开侮辱,而只适用于对官吏先生们当面进行的侮辱^②。

即使第二二二条曾被应用于报刊上的公开言论所造成的侮辱,但是,显然当时谁也不会断言,给第三者的信就能构成对官吏的侮辱。根据迄今存在的违警法庭的诉讼程序,向来都规定,把含有侮辱内容的文件送给被侮辱者本人或把它公开传播才能构成罪行。现在,尼科洛维乌斯先生做出一件发明,如果有人向第三者写信时用侮辱性的言词写到官吏的话,那也是对官吏的侮辱!可见,必须留神不要在私人通信中用不敬的语调谈论官吏!

因为拉萨尔的信是呈交冯·阿蒙先生的上级机关的,所以这就是**申诉书、抗议书**,这样就使案情起了更加令人难以想像的变化。

因为法律甚至责成对于非法的行动要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这样,如果申诉是真实的,它就完全合理;如果它是虚假的,总检察官就应当根据第二七三条提起诉讼——因为这是**诽谤性的申诉**。但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可以用世界上最轻而易举的办法根据文

① 博马舍“疯狂的日子,或费加罗的婚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65—272 页。——编者注

件来证明他的申诉是真实的,然而以侮辱官吏罪受违警法庭审判时,他却被剥夺了证明这一点的可能。

案件是由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审理的。可是高等法院也承认,只有当着公众或者当着被侮辱者的面进行的侮辱才能构成罪行,并且停止了对这一案件的审理。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议,于是我们这里的久经考验并且向来稳妥可靠的科伦检察院真的根据第二二二条作出了追究拉萨尔的决定,拉萨尔现在有福气还在忍受违警法庭的纠缠!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根据第二二二条有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不过,拉萨尔案件将于5月3日在陪审法庭上审理。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4月26日

载于1849年4月27日“新莱茵报”
第28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第二议院的解散

科伦 4 月 28 日。今天白天传遍了全城的流言，已在今天晚上得到证实：国王和他的军法内阁解散了第二议院³¹³。

详细情况见后面的 de dato Berlin (柏林通讯)。

国王和他的军法内阁大臣们采取了这种行动，就是又一次的食言背约。根据 12 月 5 日所钦定的军法宪章，召开会议肯定是为了“修改宪法”。只有在根据这一宪法而召开的第一届议会对这部拙劣的作品进行修改以后，它才具有最终的完全的效力。去年 12 月所钦定的那种东西的意义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两院至少有一部分制宪权力。因此，只要两院还没有行使这种权力，只要两院没有同国王一起修改宪法，它们是不可能被解散的，正如为了协商普鲁士宪法而召开的如今已经仙逝的议会不可能被解散一样。

虽然如此，还是把这个在军刀专政下，在刺刀威胁下，通过购买、恫吓和欺骗而组成的可怜的第二议院驱散了！

这就叫做“普鲁士的荣誉”、“普鲁士的信义”！

如果大臣们再等待几个星期，也许匈奥革命就会替他们代劳，把两院都驱散。

至于这种新政变的意义，那是一目了然的。加倍的军刀统治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承蒙皇恩，给我们钦定了出版法、俱乐部法、惩治

叛乱法、招贴法等等,以致德国的庸人只好大哭一场。迫害、惩治、抓人即将开始。到处都将实行戒严,除此以外,最后还将实施备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和上院的新宪法,根据这一宪法,目前的第一议院将以**第二议院**的身分登场。

总之,普鲁士蛮横无耻到什么地步,他们就会干到什么地步。

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只希望曼托伊费尔先生重新召开已经仙逝的联合议会。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28 日

载于 1849 年 4 月 29 日“新莱茵报”
第 285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波 兹 南

科伦 4 月 28 日。如果我们间或谈谈关于我们的霍亨索伦王朝的“显赫和强大”以及关于这一高贵宝座的主要支柱——遍布全国各省的勃兰登堡骑士臭虫集团同时惊人繁荣的问题，我们的读者会感激我们的。

我们今天来继续进行这一富有教益的考察，谈谈我们狭义的祖国^①的波兰部分。早在去年夏天，由于那用榴霰弹和硝酸银³¹⁴对波兰进行的臭名昭彰的“绥靖”和“改组”，我们就已经揭穿了德意志犹太人散布的关于在城市中“德国居民占优势”、在乡村地区“德国人占有大量土地”及普鲁士国王对提高公共福利有功等等谎言。“新莱茵报”的读者该记得，我们根据官方的数字材料及格涅兹诺和波兹南大主教给资产阶级“过渡”大臣康普豪森的通知查明，在这个地区划入普鲁士分界线的各部分，德国人不是占一半，而是勉强占居民的六分之一³¹⁵。同时，随着反革命进程使重新瓜分和缩小波兹南的波兰部分成为可能，普鲁士政府的骗人统计学家便愈来愈扩大这个虚报的德国居民的数目。当时我们查明，德国的民族蠢才和法兰克福议会泥坑里的投机分子在做这项统计时还把波兰的犹太人也列为德国人，虽然这个最令人讨厌的种族除了他们的熏

① 即普鲁士，以区别于德意志。——编者注

心利欲之外,无论按他们的鄙俗俚语,或是按他们的出身,都不可能同法兰克福具有血缘关系。我们查明,纵使有少数德国小土地占有者居住在波兹南的个别行政区,那也只是由于普鲁士背信弃义地利用波兰贫困的结果,因为根据 1833 年的敕令,只有普鲁士顽固的容克地主才能收买一切**拍卖**的庄园,为此政府还特为容克地主发放了贷款。最后,如我们所查明的,霍亨索伦王朝慈父般的恩德和功绩在于他们在三月革命后由于怯懦而许下了进行“民族改组”的甜蜜诺言,可是后来,随着反革命势力的壮大,王朝却以五次愈来愈广泛的瓜分把套在这个国家脖子上的绞索拉得愈来愈紧,后来更以“绥靖”、缴械作为进行“改组”的条件,最后当这些条件都已实现,又派出“我的英勇军队”去进攻手无寸铁的易于轻信的边境地区,以便和犹太人结成联盟去抢劫教堂,焚烧村庄,在公共场所探条打死波兰人或**用硝酸银打上烙印**,而在报复了对“三月诺言”的信仰以后,在这遍布死尸的土地上颂扬上帝和基督教德意志陛下。

在波兹南进行普鲁士“改组”的恩德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谈谈普鲁士占有大量土地,地产和庄园的来源。它们的历史在不小程度上是对霍亨索伦王朝的“显赫和强大”及它所宠爱的流浪骑士阶层的英勇行为的一个很好的补充说明。

1793 年三个戴皇冠的小偷,像三个绿林大盗瓜分赤手空拳的行人的财物那样,瓜分了他们的赃物——波兰。按照 1815 年霍亨索伦王朝根据**世袭**君主权利统治了莱茵省的方式,即按照贩卖人口和人的灵魂的方式,霍亨索伦王朝当时也成了波兹南和南普鲁士的**世袭**君主。将来当这种贩卖人和人的灵魂的权利一被消灭,波兰人就会像莱茵省居民一样用**红笔把世袭**大公霍亨索伦统治他们

的权利一笔勾销。

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对抢劫来的波兰的慈父般的关怀，首先表现在没收波兰王室和教会的领地上。一般说来，我们丝毫不反对这种没收，而且我们还希望很快也会轮到没收其他王室的领地。我们只想问一问，这些被没收了的领地用来为谁的利益服务？是为了慈父般的勃兰登堡政府在 1848 年“绥靖”和“改组”期间如此仁慈地关怀过的国家的“公共福利”吗？是为了用血汗创造了这些领地的人民吗？让我们看一看吧。

当时的大臣霍伊姆统治了西里西亚省二十年，他独自为政，完全不受任何监督，并利用这一权力进行最可恶的容克地主式的敲诈和勒索，而为了奖励他给上帝、国王和祖国所建树的功勋，南普鲁士也委托给他管辖。霍伊姆向他的主子 and 国君提议，为了王朝“显赫和强大”的利益，为了造成忠诚于王朝的显赫而强大的容克地主，要把尽可能多的教会土地、官地和没收来的庄园分赐给所谓“有功的人们”。结果也就是这样做了。流浪骑士，王妃的宠臣，大臣们的亲信，他们想要笼络住的同谋们，大多数都获得了抢劫来的边区的大片富饶领地作为赏赐，这样，在波兰人中间就到处都是“德国的利益”和“主要是德国土地”了。

为了谨慎，以免激起国王的贪心，霍伊姆对国王只以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价钱估价这些庄园，而且往往还低于它们的实际价值；雷伊姆害怕——而这也确实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国王知道这些庄园的真实价值，那他首先考虑的便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慈父般的”腰包了。在“绥靖”以后，从 1794 年至 1798 年霍伊姆统治的四年中，在波兹南行政区有二十二批，在卡利希行政区（原彼得库夫行政区）有十九批，在华沙行政区有一批，大大小小总共是

五十二批庄园这样被分赐掉，它们所包括的领地不少于二百四十一个。对国王说这些领地的价值是三百五十万塔勒，而实际上它们的价值超过两千万塔勒。

当波兰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要夺回根据奴隶买卖权从他们那里偷去的这两千万塔勒，这波兰的亿万财富的时候，他们会想起这点的！

仅仅在卡利希行政区，被分送掉的庄园便占全部王室和教会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而这些庄园的收入甚至按 1799 年低得可怜的奉送的价格估计，每年也有二十四万七千塔勒之多。

波兹南行政区分布有广大森林的奥文斯克领地被送给了服饰杂货商特雷斯科夫。同时与其毗邻的连一棵小树苗都没有的古老领地施里姆却宣布为国家的地产，不得不由国家出钱到特雷斯科夫领地上去购买树木。

最后，在其他各行政区，馈赠文书明确规定免收这些领地的普通赋税，而且是“永远”免收，因此无论哪一个普鲁士国王都无权对它们课以新税。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偷来的庄园是用什么方式赠送并且是赠送给什么样的“有功的人们”的。可是，由于这些顽固的容克地主的功劳浩大，为了叙述连贯起见，我们不得不另写一篇专文来谈这个问题^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28 日

载于 1849 年 4 月 29 日“新莱茵报”
第 285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① “新莱茵报”上没有本文的继篇。——编者注

柏林的反革命策划

科伦 4 月 30 日。我们的反革命政府的阴谋策划逐渐地越来越明显了。

政府曾想在 4 月 27 日把普鲁士反革命推向新的阶段。它想把柏林人民逼上街头，很可能照卡芬雅克那样，先让起义行动“采取巨大的规模”，然后使用卡芬雅克的手段，而且也同卡芬雅克一样以压倒的优势力量来进行镇压；设立战地法庭，对某些议员和大批煽动者³¹⁶饬之以铅弹和火药；最后，制定出一些新的钦定法律，以便摆脱那些连 12 月 5 日军法宪章都还保留着的使我们的反革命先生们感到累赘的羁绊。

如果挑起了起义行动，那就有了很好的借口断言，说什么人民“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运用那些钦赐的自由权利，说什么实行这样的选举法和这样的宪法就无法治理国家。“为了避免流血”，因而也是为了人民本身的利益，就得把自由消除得一干二净。“为了避免流血”，就得宣布全国（东波美拉尼亚除外）戒严！这一切，只有等到柏林发生了相当大的骚动，而布勒斯劳、马格德堡、科伦等地也都发生了骚动以后，等到这些骚动被霰弹顺利地镇压下去以后，才能实现。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警察才残酷地对待在雅叙厅里集会的左派议员³¹⁷，军队才包围登哥夫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和群众猛

烈开火，并且使群众无法逃散，因为广场上所有的出口都被封锁了。

尽管反革命先生们用尽一切挑衅手法，可是人民行动平静，终于粉碎了他们的全部计划。他们没有任何借口来钦定法律，虽然他们必须这样做。或许今天晚间我们就能知道这些先生们又决定玩弄什么新诡计了。

他们的计划有多么庞大，这是清清楚楚的。第一，汉诺威也同时解散了议院，第二，拉多维茨先生奔赴柏林。这两点尤其是第二点便是证明。

拉多维茨先生是普鲁士反革命的首脑人物。十一月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就是由拉多维茨先生制定的，可是他本人却仍然躲在幕后，在法兰克福为普鲁士夺取世袭皇位而进行阴谋活动。这一次拉多维茨先生亲自到柏林去，据说终于要公开露面，出任首相了。拉多维茨内阁——这就是症结的所在！

此外，我们还清楚地知道下列事实：

(1)上星期所有的行政长官都接到了总督们的通告，通告说议院即将解散，并指示采取一切必要的警戒措施。

(2)所有行政区政府[Regierungen]都接到内阁训令，训令的内容是：

1.所有各城市市长每日应向该行政区政府报告解散议院所引起的反应。各行政区政府则应就此种情况向内阁呈送综合报告。

2.新的选举暂不举行。同时，对于“所谓”左派的许多成员将采取措施。

3.必须采取一切预防办法，以制止任何叛乱。

签署此项训令的是：曼托伊费尔。

曼托伊费尔先生，或者更正确地说，他的上司拉多维茨先生，恰恰在此刻公开实行他们企图恢复专制制度的阴谋，对正在发展着的匈牙利-波兰-德国革命说来是再好不过的帮助。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3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 日“新莱茵报”
第 286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曼托伊费尔先生，或者更正确地说，他的上司拉多维茨先生，恰恰在此刻公开实行他们企图恢复专制制度的阴谋，对正在发展着的匈牙利-波兰-德国革命说来是再好不过的帮助。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4 月 3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 日“新莱茵报”
第 286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曾当着法院侦查员艾贝迈尔先生^①(这位先生已大驾光临科伦)的面对拉萨尔蛮横无礼。拉萨尔曾向检察机关递过申诉书,而总检察官批道:该行为**既非犯罪,亦非过失**,不应予以起诉!

我们再提醒一件事,医生规定拉萨尔为了维持健康必须有若干次放风,检察机关对此表示同意,可是当局却予以禁止,尽管根据法律,未决犯不属当局管理,而属检察机关全权管理。

至于到监狱里去探望拉萨尔时会遇到什么样的刁难、推托、借口等等,凡是曾试图进入杜塞尔多夫这座“老店”内部去看看的人都是知道的。

侦查终于结束了,案件应该移交给高等法院。陪审法庭上一次会审是在2月和3月间,那时候审理此案还完全来得及。可是那些先生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避开这次机会。当此案的材料交到副检察长冯·阿蒙第一“阁下”那里去做最后结论的时候,他突然拿出拉萨尔写给阿尔腾基尔欣区的一个叫做施坦吉尔的农民的信,以便根据这封信再次提出控告。然而这封信已在阿蒙先生的办公桌里面安安静静地放了好几个星期,而他也从未想到把它做为一条新的罪状附在材料里面。可是就在一切都准备好了,陪审法庭即将开庭的时候,阿蒙先生把这封信拿出来了。这当然就需要传讯新的证人,而审判就要推迟几个星期。这样一段时间就恰好足以阻挠在**当时即将到来的陪审法庭开庭期间**对拉萨尔案件的审理。

这封被阿蒙先生(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长久搁置在办公桌里的信,其实是无足轻重的,无论高等法院或检察院都没有理睬它,没

^① 见本卷第316—318页。——编者注

有把它列入罪证！

总之，这次算是幸运地躲过了陪审法庭，下次开庭期要等到5月。代表团曾经一个接一个地去见总检察官尼科洛维乌斯先生，要求迅速处理此案，或者组织陪审法庭特别审判庭来审理。尼科洛维乌斯先生答应尽一切力量，并且宣称拉萨尔决不致被关六个月。结果怎样呢？到六个月总共只差两个星期左右了。

高等法院最后做出决定：将三名被告的案件全移交检察院办理。可是这就产生了难题：人们确信，在整个杜塞尔多夫司法区都找不到会判决康塔多尔先生有罪的陪审员。可是要释放康塔多尔，同时也就得宣布拉萨尔无罪，而且要由那些在别的情况下定要判决他有罪的人们来宣布。然而给拉萨尔判罪，正是杜塞尔多夫当局、内阁以至大权奸所渴望的事情。对拉萨尔的怒火“直到国王的宝座前都没有熄灭”。

结果是：“检察院停止对康塔多尔起诉，予以释放。拉萨尔、韦耶尔斯则继续管押，听候陪审法庭审讯”。

要知道，康塔多尔和拉萨尔是以同一罪名被控的，唯一的区别是拉萨尔在约伊斯发表了一次演说。

于是那些先生们就恰恰抓住在约伊斯发表的这次演说，以此为理由把拉萨尔交付陪审法庭审判。

我们来简单地追溯一下事件的全部经过。

当已经仙逝的国民议会和王室之间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众所周知，杜塞尔多夫这个城市，是莱茵省最大的宣传鼓动中心之一。这里的市民自卫团完全站在国民议会方面，而且是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领导的。只要柏林一发出信号，他们就准备从消极反抗转为积极反抗。武器和弹药都已准备就绪。拉萨尔和康塔

多尔是整个运动的首领。他们不仅号召公民武装起来反抗曼托伊费尔内阁，而且实际上进行了武装公民的工作。杜塞尔多夫是他们活动的中心。由此可见，如果真的犯了什么罪的话，罪是在这里犯的。但是根据起诉书，犯罪地点在哪里呢？不是在杜塞尔多夫，而是在约伊斯！！

拉萨尔曾经在约伊斯出席一次集会，并且号召派遣武装人员去支援杜塞尔多夫。这一号召没有产生任何后果，因为事态还没有发展到战斗。看来这就是拉萨尔所犯的罪吧！

可见，拉萨尔所以必须受陪审法庭审判，不是由于他的主要活动，不是由于真正的武装活动，也不是由于那时眼看可能在杜塞尔多夫爆发的真正的起义。在这方面什么“罪”也没有发现。甚至检察院，虽然那样昏庸无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所谓的罪行是一个纯粹偶然的，附带的行为，它完全从属于在杜塞尔多夫进行的主要活动，离开后者则毫无意义，——这个所谓的罪行不是在杜塞尔多夫为反抗政府而组织武装力量，反倒是号召约伊斯的居民支持这种组织活动！

当拉萨尔在约伊斯发表这次可怕的演说时，康塔多尔当然没有在场；康塔多尔没有号召约伊斯的居民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康塔多尔只不过组织了杜塞尔多夫的居民准备武装反抗，并且号召当地的本身就是政府武装力量的一部分的市民自卫团起来反抗政府。区别就在这里，因此康塔多尔就被释放，而拉萨尔则被继续管押，等候下次陪审法庭开庭审讯。

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除此而外，拉萨尔还直接向农民施坦吉尔呼吁派遣武装人员支援杜塞尔多夫。这封信附在侦查材料里面，而且起诉意见书里一字不漏地引用了这封信（见“新莱茵报”第

277号增刊)。难道在起诉意见书里,这封信是被当作把拉萨尔送交陪审法庭的根据吗?根本不是。高等法院曾挖空心思对拉萨尔提出九条罪状,而其中有八条都被检察院取消了,就连这个高等法院也没有想到要把这封信列为罪状之一。原来,这封信所包含的所谓“罪行”同拉萨尔在约伊斯所犯下的罪行毫无二致。

检察院把此案交付法庭的决定前后不符,自相矛盾,无法理解,很难有编造得比这更糟糕的东西了。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科伦检察院本身的决定,去年11月在杜塞尔多夫进行宣传鼓动,直接号召反抗内阁,武装公民,购置弹药,市民自卫团直接和公开反对政府并拿起武器誓为保卫国民议会而和政府进行斗争——这一切根本不算犯罪。科伦检察院承认了这一点。

因此,在这方面,检察院和科伦高等法院看法是一致的,甚至和科伦检察机关也是一致的。在对莱茵区域委员会的案件进行侦查时,它们都绝口不提号召武装起来反对“敌人”的事,都把属于刑事案件性质的事情放在一边,只是从一件本应属违警法庭处理的号召叛乱的事实着眼,此事之所以由陪审法庭审理,只是因为这个号召是通过报刊发出的。

对付拉萨尔的办法则阴险得多。先给以刑事追究,而以违警法庭作为后备。万一在约伊斯演说这件事情上拉萨尔被判无罪,就以他在杜塞尔多夫的两篇演说中号召反抗官员(即号召叛乱)为理由,把他送交违警法庭。

这里只需要提醒一下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审判经过。案情完全相同。在审判这一案件的时候,研究了这样的问题:是罪行(即拉萨尔被控的那种罪)昭著还是根本无罪。结果认为,号召武装反

抗政府，不能不同时号召反抗组成政府的所有各个官员。陪审团宣判无罪。

拉萨尔的处境将会是这样：陪审法庭无疑将宣判他无罪，但是那时他又要受到违警法庭的审讯。那时将再设法制造要他继续坐牢的口实，而违警法庭是不会落到陪审法庭那种困难处境的！

明天我们将就起诉意见书本身进行分析，并且根据这份起诉意见书举出新的证据来说明这个案子的全部诉讼程序是多么荒唐可笑。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1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2 日“新莱茵报”
第 28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普鲁士给法兰克福诸君的耳光

科伦 5 月 1 日。普鲁士反革命的历史上又增添了一段新的插曲。国王狠狠地打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记耳光，并把奉献给他的那顶幻想帝国的虚假皇冠轻蔑地当面掷还给它。

如果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曾经果断行事，它现在就能下令逮捕这位桀傲不逊的霍亨索伦先生，以“侮辱国民议会”之罪（根据在普鲁士也曾颁布过的 1848 年九月法令）交付陪审法庭审判。目前还没有一条“帝国”法令免除各邦君主对“帝国”的责任。而无需负任何责任的皇权却被霍亨索伦自己否认了。

4 月 28 日的新的普鲁士“帝国”照会就所谓德意志帝国宪法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指责，以冲淡这次“帝国”挨耳光的事实。这部无辜的可怜的作品，在普鲁士照会中竟被描绘成为万恶之源，描绘成为革命和秘密共和主义的“超越任何界限的”极端产物。

圣保罗教堂是烧炭党人的巢穴！韦尔凯尔、加格恩是秘密的共和派，“怀中藏着匕首的麦罗斯”³¹⁹！巴塞尔曼这位看见魔影的先生，自己成了“巴塞尔曼式的人”³²⁰！这对于遭到了人民唾弃、遭到了法兰克福和维也纳那些被迫害的街垒战士咒骂的可尊敬的法兰克福诸君说来，当然是一种恭维。各色各样的人，直到福格特先生都会真的相信这种胡说。

普鲁士照会是在真正解散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之前对议会的一

个最后威胁。倔强的霍亨索伦再一次伸出了“协商”之手。的确，国民议会即已**堕落到这种地步**，它自然很可能再向前移一小步，完全变为普鲁士的工具。

可是一部分人民——特别是南德意志诸小邦的农民和小资产者——对国民议会和所谓帝国宪法还迷恋不舍。军队对帝国宪法也有好感。每向统一德国迈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在人民看来，都是朝着消灭小邦割据局面和免除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迈进一步。同时对普鲁士的仇恨也起着不小的作用。士瓦本人甚至为保护所谓帝国宪法而闹了革命。当然，这只是杯水风浪，但仍然是不能忽视的。

可见，假如可尊敬的法兰克福诸君哪怕是有一丝一毫骨气的话，要解散法兰克福议会不用暴力是办不到的。目前他们还可能有一个最后机会来弥补他们的大错于万一。在匈牙利人民取得胜利，奥地利垮台，霍亨索伦—拉多维茨—曼托伊费尔的叛变行为激起普鲁士人民的愤慨的情况下，法兰克福和南德意志已公开起来保卫帝国宪法，这两个地区很可能成为以匈牙利为支柱的一次新的革命起义的临时中心。

到那时，这些先生们就应该不惜**宣布内战**，如果万一时机成熟，就应该**放弃恢复耶邦议会而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

但是谁要以为法兰克福诸君能够做到**这一步**，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先生们将会嚷嚷一阵，为保住一点起码的面子而扯扯皮，然后便遵照倔强的霍亨索伦的指示来处理一切。人民或许又要开始在什么地方构筑街垒，然而也要像九月十八日事件那样被出卖的³²¹。

这出精彩的帝国问题的戏,如果由法兰克福的诸位先生来导演,结局一定会是这样的。但是匈牙利的骠骑兵,波兰的枪骑兵和维也纳的无产者可能还要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时终究会出现另一种局面。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1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2 日“新莱茵报”
第 28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解 散

科伦 5 月 1 日。据昨日从柏林到达此间的议员们说，德勒斯顿的议院也被解散了。

汉诺威、柏林、德勒斯顿——慕尼黑议院暂时还只是推迟会期——善良的德国小市民，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当他们打算和你开什么玩笑吗？

去年，当法兰克福议会召开的时候，普鲁士命令所有小邦都各自成立议院。现在，刚好一年以后，普鲁士又命令解散所有的议院。那一次是康普豪森，这一次是曼托伊费尔。两次都是同一目的，同一意图。尽管说得那么好听，可是康普豪森和曼托伊费尔还是手拉着手。

在德国，仍然有保护君主的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1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2 日“新莱茵报”
第 28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拉 萨 尔

科伦 5 月 2 日。昨天我们答应要回头来分析一下对拉萨尔的起诉意见书。

拉萨尔被控犯有触犯“刑法典第八十七和一〇二条所指的罪行”。

第八十七条系针对“以 exciter（煽动）公民或居民武装反对王室为目的的侵害行为或密谋行为”。

根据第一〇二条，凡在公共场合和集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或者在张贴的标票中 exciter（煽动）公众进行前述之罪行者，一律按本章前列各条（第八十七条也包括在内）所规定之刑罚（主要是死刑）惩处。只有在这种煽动未产生后果的情况下，死刑才可改为流刑。

拉萨尔被控的罪名是什么呢？

因为他仿佛一下子，在同一个时间内既触犯了第八十七条又触犯了第一〇二条，所以他只可能被控：

违犯第一〇二条，煽动进行第八十七条所规定的罪行，也就是说：

煽动公民进行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为目的的侵害行为或密谋行为，也就是说：

煽动公民去煽动进行武装活动！

对于通常人的理智来说，这是显然毫无意义的胡说。可是检察机关和检察院竟要这样决定！

问题在于，第一〇二条把煽动别人进行第八十六——一〇一条所规定的罪行（如果这种煽动产生了后果）跟本人进行这些罪行等同起来，因此自然就适用于以上所有各条。它甚至还适用于第八十七条中所指的其余各种情况。要知道，所有这些条文都是针对一些可以煽动的特定行为的。比如，针对侵害行为和密谋行为的第八十七条，还提到对皇帝的生命和人身的侵害和密谋，提到以推翻或改变政体或改变王位继承办法为目的的侵害和密谋。这都是可以“煽动”的事情。煽动刺杀国王，煽动革命都是可能的事；煽动以刺杀国王和进行革命为目的的密谋行为也同样是可能发生的。但是，“煽动组织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为目的的侵害 resp.（或）密谋活动”，一句话，煽动一种煽动行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是荒谬的罪名，正像“企图在将来企图进行叛国活动”一样，在实行普鲁士法的美好的旧时代，曾不止一个贫苦的学生会会员因为这个罪名而坐上十来年牢房；或者正像 *suspect de suspicion d'incivisme*（因被怀疑缺乏公民情感而被怀疑）一样，戴着正统主义眼镜的人自称仿佛在 93 年恐怖时期的监狱记事簿中看到过这种罪名。

假如“煽动去煽动进行武装活动”从逻辑观点和法律观点看来真的是可能的罪行，那末，要把触犯第八十七条中的上述部分和第一〇二条的罪行同时归罪于拉萨尔，起诉根据的就不应该是在诺伊斯发表的演说，而应该是给国民议会的建议书，因为他在建议书上说道：“我们恳求国民议会：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

这里面包含着“煽动去煽动进行武装活动”。然而甚至在这份 *non plau ultra*（绝妙的）起诉意见书里也没有想到，要把这句话看

成罪行。

检察机关从该章那么多条款里恰好选择这样一个根本用不上第一〇二条的地方来和第一〇二条联系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道理很简单。第八十七条所规定的罪名是要处死刑的。可是在全莱茵省也找不到一个陪审法庭会把拉萨尔判处死刑。因此他们宁愿使用第一〇二条，这一条规定在煽动“犯罪”未产生后果的情况下，死刑改为流刑。他们想这样便不难找到陪审员了。

所以，为了摆脱拉萨尔这个难题，检察机关发明了一条**莫须有的罪状**，把法律上的两处地方凑在一起，而这样凑在一起除了**纯粹胡闹**而外毫无任何意义。

总之：要么是拉萨尔**触犯了第八十七条**，如果这样，那就干脆大胆判他**死刑**好了；要么是他没有触犯第八十七条，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没有触犯第一〇二条，那就应该被无条件地**宣告无罪**。同时触犯前面提到的第八十七条里面的那部分和第一〇二条，这是不可能的。

应该注意检察机关的诡计。对拉萨尔的控告实质上应按第八十七条（死刑）判刑。但他们不敢这样控告他。他们把第八十七条和第一〇二条（流刑）结合起来控告他；但是，如果这种办法无效，如果陪审团宣告拉萨尔无罪，那就把他送交违警法庭，控以触犯第二〇九条和第二一七条之罪（**六天至一年的徒刑**）。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同一件事实，即在拒绝纳税运动时期进行宣传鼓动！

我们现在来仔细分析一下真正的 *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11月21日在诺伊斯发表的演说。

拉萨尔被控直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

按照起诉意见书所引用的三个证人的证词，拉萨尔确曾直接

煽动诺伊斯的居民**武装起来**，购置弹药，以武力保卫已争得的自由权利，以积极的行动支持国民议会等等。然而，**一般地煽动武装起来**既不是什么过失，更不是什么罪行，尤其是从革命以来，从 1848 年 4 月 6 日法令通过以来，更是如此。这个法令保证每一个普鲁士居民都有携带武器的权利。煽动武装活动，根据 Code (法典)，只有当这种武装活动的目的是反对个别官员 (叛乱) 或反对王室 resp. (或) 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起义) 的情况下，才受刑事处分。这个案子里专门指的是煽动，即直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

但是，在所有三个证人的证词里，**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武装反对王室；他们只谈到武装起来**保卫国民议会**。而国民议会是一个依法召集的，合法存在的机构，是立法权的，在这里甚至是制宪权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像制宪权超越于执行权之上一样，国民议会是超越于“王国政府”之上的。而我们的检察机关却认为煽动人民全体武装起来保卫这个和国王平行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是犯了大罪。

仅仅在下面这一点上检察机关灵敏的嗅觉还能发现对“王国政府”的疏远关系，那就是拉萨尔曾提到诺伊斯的炮台。然而，难道拉萨尔曾煽动诺伊斯的居民武装起来夺取莱茵河左岸的炮台难道是像起诉意见书摘要所说的那样，像为判处拉萨尔的徒刑需要的那样，他曾“直接”煽动他们去这样做吗？

恰恰相反！他无论“直接”也好，间接也好，都没有煽动他们去这样做。他只是说：杜塞尔多夫的人民**期望着**诺伊斯的居民拿下这些炮台。而这种至多不过是口头上流露出来的“期望”，照可尊敬的检察机关看来却是 *excitation directe*，**直接煽动**武装反对王室！

总之，在杜塞尔多夫为保卫国民议会而公开进行的、自然不外是反对普鲁士军队、亦即反对王国政府 (le gouvernement de l'empereur) 的、不折不扣的、真正的武装活动，丝毫也不算是犯罪，至多不过是反抗个别官员的过失；而这篇简单的演说，这短短的几句话，却包含着刑事重罪！

对于拉萨尔所做的事情不敢控告；但他所说的话竟成为一项大罪。而他说了些什么呢？——期望诺伊斯的居民拿下炮台。他说是谁在这样期望呢？——难道是他拉萨尔本人吗？根本不是，——是杜塞尔多夫的人民！

拉萨尔说：第三者期望你们做出什么什么事情，可是按照检察机关的逻辑，这是“直接煽动”你们真正去做所期望的事情。

目前在柏林，大臣们解散了议院，准备继续编造钦定法律。假定，今天当局强行废除普选权，取消结社权和出版自由，我们就会说：我们期望人民用街垒来回答这个可耻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检察机关就会宣布，这就是我们在“直接煽动”柏林公民武装起来反对王权。假使一切都以检察机关的意志为转移，那我们就会因情况不同而被判处死刑或流刑！

对拉萨尔的审判从头到尾都是对一个被仇视的宣传鼓动家的蓄意陷害。这是一种以“鼓动不满”为借口而进行的密谋性的审判案，正像我们直到3月间为止也是在莱茵这里有幸领教过的官司一样。对韦耶尔斯的审判案同样也是以侮辱国王陛下为借口而进行的密谋性的审判案。韦耶尔斯曾说：“国王该死”，“一刻钟也不能再让皇冠留在国王头上”；就是这样几句从 Code pénal (刑法典) 观点看来完全无辜的话居然也是“直接煽动进行武装活动”！

然而，即使拉萨尔真的曾煽动武装反对王权，那又怎样呢？我

们从宪法的观点,按照宪法的概念来研究一下。在 11 月里,“王国政府”出动军队把人民代表的会议从一座饭店撵到另一座饭店,强行制止他们举行会议,把他们的文件发给兵士去卷烟卷、生火炉,直到最后把他们本人驱逐回家,在那个时候,为了保护制宪的人民代表,难道不是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不仅“煽动进行武装活动”,而且自己也要**武装起来**反对背信弃义的“王国政府”吗?难道按照联合议会的决议,按照康普豪森先生著名的“法制基础”(更不要说 3 月 19 日所争得的权利了),这个议会不是同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缔约者”吗?难道不应该保护这样一个议会不受所谓“王国政府”的袭击吗?

然而,我们看到了,用拳打脚踢的办法对付人民代表已成为“王国政府”的第二天性。钦定议院召开还不到两个月,王国政府一见它们通过一个不如意的决议就把它们驱散了,而这些议院仿佛还是负有修改宪法的任务的!现在,议院已承认钦定宪法,目前我们简直根本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宪法。谁知道明天还会钦赐给我们什么呢?

有人预见到了这一切,针对这一切采取了行动。他们力图给如此傲慢的权奸的暴力行为以强有力的反抗。从**所有立宪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眼光看来,他们**完全处于合法地位**,可是这样一些人却被曼托伊费尔、西蒙斯之流下令逮捕,监禁六个月,最后才交付陪审法庭,罪名是**煽动起义!**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2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3 日“新莱茵报”

第 28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莱茵省市政委员会代表大会被禁

科伦 5 月 2 日。我们特别高兴地向读者报道, 尊贵的科伦市政委员会召集的莱茵省各城市市政委员会代表大会被当局用一纸命令禁止了。在 9 月间民主派的集会禁止³²²的时候, “善良的市民们”曾那样“悠然自得”, 现在他们会感谢自己的主子和国君。民主派的集会自由在 1848 年 9 月被取消, 至少是由于公开使用暴力的法令, 即戒严令, 而科伦市政委员会的集会自由却是在法制基础最时行的情况下被一脚踢掉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2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3 日“新莱茵报”
第 28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莱茵各城市代表大会

科伦 5 月 3 日。莱茵省市政委员会代表大会仍然要举行，不过将采取不很正式的方式，时间订于下星期二。

不言而喻，我们对这个资产者的会议不能寄予任何期望。这个会议的代表是按照三级资格选举制选出的，根据这种选举制人民群众被排除于选举之外。将有一个代表团被派往柏林，它甚至不可能见到冯·霍亨索伦先生。

但是，也许大会根本不开。星期日各个政党都要在科伦这里召开代表大会³²³。政府不惜任何代价力图挑起人民和军阀之间的冲突，以便像迫害柏林人那样来迫害我们莱茵省居民。

科伦工人的任务就是粉碎普鲁士的这一诡计。行动要沉着冷静，决不能为军阀们的任何挑衅所动，这样科伦工人就能使政府无法找到采取暴力行动的任何借口。

最近将有决定性的事件发生。维也纳、波希米亚、南德意志、柏林都是怨声载道，只等时机的到来。科伦能够给予支援而且是很有力的支援，但却不能首先开始坚决的行动。

科伦工人要记住，特别是在下星期日要记住，政府的一切挑衅行为的目的在于：使暴动在不利于我们而有利于政府的时机发生。

只有在发生巨大事件时才能实行革命；如果上了政府挑衅的

当,那结果至多也不过是一次骚动。

科伦的工人们,你们要记住九月二十五日事件³²⁴啊!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4 日“新莱茵报”
第 289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同盟中的第三者

科伦 5 月 3 日。我们曾经数百次地指出过，在俄奥两国的同盟中，冯·霍亨索伦先生及其内阁扮演着“同盟中的第三者”的角色。正直的德国公民曾经数百次地怀着愤慨的心情否认过这种说法。

结果如何呢？现在已经完全确定，解散议院的秘密原因之一是：根据同奥里缪茨的公爵和彼得堡至高无上的信奉正教的沙皇的秘密协定，桑苏西宫俄国藩臣^①[Unterkä * 9] s]承担了调遣四万名普鲁士士兵到波希米亚去的义务——一方面是为了使人民驯顺听话，另一方面是作为反对匈牙利人的预备队。这件事甚至在圣保罗教堂公开议论过。连柏林的中间派和一部分右派也不能对此保持缄默。因此就把他们驱散了。

但是不仅如此。柏林的“国民报”5 月 1 日从柏林报道说：

我们刚从完全可靠方面获悉：“昨天早晨，上西里西亚铁路管理局收到了内务部一封电报，说有三万名俄国士兵要经由上西里西亚铁路从克拉科夫调往奥国（可见是从克拉科夫经过梅斯洛维茨、科捷尔、拉提博尔^②和奥得

-
- ① 奥里缪茨的公爵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信奉正教的沙皇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桑苏西宫俄国藩臣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译者注
- ② 波兰称作：梅斯洛维策、科兹列、拉威布日。——编者注
- ③ 捷克称作：博古敏。——编者注

堡^③)。上西里西亚铁路管理局特此通知,普鲁士王国政府对此毫不反对,并且如政府所希望的,铁路管理局将丝毫不妨碍这次调运工作。”

在电报上署名的是:冯·曼托伊费尔

我们原来已搞到这种地步:俄国皇帝藩臣的波茨坦政府不仅下令逮捕科苏特、贝姆和戈尔盖^①。不,它还调遣三万名俄国宪兵经由铁路通过普鲁士领土到匈牙利去,——此外,它还派遣四万名普鲁士士兵到波希米亚去镇压其自由遭到粗暴蹂躏,但渴望复仇的民族!

听着吧,莱茵省的居民们!可见,迫使我们屈从于俄国和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为了把我们的儿子和兄弟,像我们一样的莱茵省居民,送到波希米亚去,可能还送到匈牙利去,叫他们为俄国沙皇效忠,帮助镇压那个最后拿起武器来保卫1848年革命的民族!

1815年有人把我们出卖给普鲁士,是为了使我们也蒙受耻辱,仿佛俄国士兵大张旗鼓地去打匈牙利的革命军队,是受到我们的纵容,是通过我们的领土,通过跟我们一起被束缚在一个邦中的地方。

我们只是被武力强迫才成为普鲁士的臣民和继续做臣民的。我们从来不是普鲁士人。但是现在,当我们被指使去反对匈牙利的时候,当俄国匪帮蹂躏普鲁士土地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是普鲁士人,是的,我们感到做普鲁士人是多么可耻!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5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5月4日“新莱茵报”
第289号附刊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① 见本卷第232—233、507—508页。——编者注

他们要戒严

科伦 5 月 5 日。仍有谣传，说在星期日，趁各党派召开区代表大会之际，又要给科伦这个美好的城市钦定**戒严**。

从军事当局所进行的种种细致的准备工作可以看出，它的确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不仅如此，还采取了显然是要挑起混乱的措施。

譬如，为什么要突然准许“我的英勇军队”——这使士兵们本人大为吃惊——可以在**晚上十点钟**以前而不是九点钟以前回兵营呢？

又有人说要**捕人**了。我们愿意相信这一点。这样的意图是早就有了的。并且大家知道，有一次，就是通过这种逮捕而完全实现了挑起混乱的计划。

我们再说一遍：民主派，特别是科伦的工人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明天不给渴望戒严的当局以**任何借口**来掩饰其暴力行动。

近来的反革命政变首先威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召开了各城市代表大会。我们就让**资产阶级最先发言**。且看这些先生们在星期二会通过什么样的决定。我们确信，某些头脑简单的民主人士将对这个盛大的“各城市代表大会”的结果大失所望。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在星期二之前宣布戒严，那末各城

市代表大会便不会举行,而对于这一点,谁也不会比那些召开这次大会的先生们更感到满意了。

如果工人们明天让人挑起混乱,那末他们就只是为资产阶级、同时也就是为政府去火中取票。现在,整个德国正处在内战前夜,工人们也许很快就有可能举行实现自己要求的发动,试问在什么时候他们是否甘愿被人这样利用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6 日“新莱茵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第 291 号

* 普鲁士军队和人民革命起义

科伦 5 月 7 日。在德国，心怀不满的人与日俱增；情况越来越明显了。

当德意志的一个反革命中心——奥地利忙于同匈牙利作斗争的时候，另一个反革命中心——普鲁士却派遣它的武装部队到四面八方去镇压人民的革命起义。

在德勒斯顿，在这个艺术与豪华的和平城市里，人民拿起了武器，用街垒和射击来回答王国政府的背叛性宣言。大部分军队都转向人民方面；斗争结果本来可以说已见分晓；但是突然出现了普鲁士的队伍，站在背叛的国王方面反对人民。

在普法尔茨，人民也拿起武器来反抗那越来越无耻的巴伐利亚的反革命；而在这里也有普鲁士的队伍，准备在适当时机进行干涉，并在驱散法兰克福议会的同时把普法尔茨的起义镇压下去。

无论在德国北部和西南部，到处都有普鲁士的队伍，准备用武器实现反革命。

为了使我国和邻近各邦都不缺少普鲁士的队伍，到处都在按照我们出色的军制**召募后备军**。

因此，在一个地方是奥地利军队成为反革命的中心，而在另一个地方又是普鲁士军队成为反革命中心。起来反对反革命的新的革命一天比一天更加剧烈，更加广泛。

德勒斯顿还存在着临时政府，它正在从全国各地动员人民的力量。

普法尔茨还存在着地方保卫委员会，它正在把普法尔茨的居民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团结在革命旗帜的周围。

在莱茵普鲁士，后备军**拒绝进军**。甚至在爱北斐特，在黑白色的乌培河谷，后备军也拒绝越出自己的集合地点。

最后，在奥地利，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匈牙利的革命正在不可遏止地向前发展**。维也纳的邮件没有到达，这可能是由于马扎尔人把莫拉维亚铁路切断了。丝毫不容怀疑，他们已**冲入莫拉维亚**。有人从拉提博尔^①给我们来信说，八天前在奥地利边界的哥尔科维茨，5月3日在洛斯劳^②，以及在普鲁士的上西里西亚都听到了大炮的轰隆声。无论如何，在雅布龙卡这一边一定发生了战斗。

一般说来，**匈牙利人的胜利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在咫尺**。毫无疑问，**俄国人不会来了**。因此，再过几天，匈牙利人就要到维也纳，匈牙利的革命将要完成，而第二次德国革命就要庄严地揭幕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7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8 日“新莱茵报”
第 292 号特别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波兰称作：拉威布日。——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沃德集斯拉夫。——编者注

* 问 工 人

科伦 5 月 7 日。普鲁士的先生们看来是想要用一切力量来挑起骚乱。

前天,给炮兵(顺便提一下,政府把他们大大地估计错了)发了上个月的“加赏”,每人十五个银格罗申。当然,步兵也拿到了这种加赏。

驻扎在此间的一个团的军官们,直接要求士兵在明天挑起骚乱。

今天晚间,在新市场已经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军民冲突。

我们再一次问一问工人们,他们是否打算听任普鲁士的那些大人先生们给他们指定发动起义的日期?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7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8 日“新莱茵报”
第 292 号特别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沙皇和他的藩臣们

科伦 5 月 8 日。传闻法国驻柏林大使就普鲁士人进入萨克森一事提出抗议。

可见，法国政府终于发觉，东欧的反革命对它也是个威胁，新的神圣同盟的最终和最高的目的不过是征服，而这一次还可能是瓜分法国。

我们确实知道，根据信奉正教的沙皇同他的奥里缪茨和波茨坦的两个藩臣之间所签订的条约，同盟的最终目的是：征服法国，废除共和制，立“圣路易之子”、波尔多的白痴亨利为法国和纳瓦腊的“正统国王”。

奥迪隆·巴罗参与了这一阴谋，几乎用不着怀疑。

普鲁士后备军的士兵们，这就是他们所希望于你们的！要你们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就是为了先驱使你们同德国、普鲁士的兄弟们厮杀，把你们去年争得的自由所剩下的点滴残余都消灭掉，然后再驱赶你们去打那些对你们的处于威胁中的自由进行援助的匈牙利人；如果你们使你们的王公老爷们和你们的最高主子和统治者，沙皇尼古拉感到满意，完成了这些任务的话，他们将率领你们跨过莱茵河，去打曾经给你们带来自由的那个民族，你们现在所享有的一切自由都是那个民族在 1789—1794, 1830 和 1848 等年代举行的英勇起义给你们提供的。

街垒战士们，威严的人民大众！你们在去年争得了一点自由，难道就是为了要在现在以后备军士兵的身分亲手把它断送，然后再为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子俄国沙皇去摧毁匈牙利和法国这两个自由堡垒吗？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8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9 日“新莱茵报”
第 29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

科伦 5 月 9 日。冯·霍亨索伦先生的政府显然想在自己和普鲁士国家寿终正寝前的最后几天再一次挽回普鲁士和霍亨索伦名字的旧有威望。

谁不知道海涅是这样描写的：

这个小孩，南瓜脑袋，
满嘴胡子，头发花白，
两只手又长又壮，
大大的肚皮，细细的肚肠，
这家伙真是奇形怪状……³²⁵

谁不知道那个姓霍亨索伦的下士家族是靠着在继承方面昧良心、搞阴谋、耍流氓而爬上去的？

谁都知道，所谓“大选帝侯”^①（仿佛哪个“选帝侯”可能是“伟大”的！）如何对波兰干出了首次叛卖行为：他在和波兰联合对付瑞典的时候，突然转到瑞典人方面去，为的是根据奥利弗和约³²⁶更无情地掠夺波兰。

谁都知道，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卑鄙面目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畜牲般的粗野。

① 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谁都知道，弗里德里希二世这位家长式暴政的鼻祖，棍棒教育的朋友，如何把自己的国家拍卖给法国投机家；谁都知道他怎样同俄国、奥地利结成联盟来掠夺波兰³²⁷，这次掠夺甚至在 1848 年革命后的今天，也还是德国历史上一个洗刷不掉的可耻的污点。

谁都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怎样帮助完成对波兰的掠夺，他怎样把掠夺来的波兰国家的和教会的财产分赐给自己的朝臣。

谁都知道，在 1792 年他怎样同奥地利、英国联合镇压光荣的法国革命，侵入法国；同样谁都知道，他的“英勇军队”是怎样丢尽了脸皮被赶出法国的。

谁都知道，他在当时怎样背弃他的盟友，急忙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了和约³²⁸。

谁都知道，他自称是法兰西和纳瓦腊的正统国王的忠实信徒，从法兰西共和国以贱价收买了这位国王的王冠上的珠宝，就这样乘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兄”的危难而大发横财。

谁都知道，他的生活是纯粹霍亨索伦式的混合物，既淫佚放荡，又崇奉鬼神，既衰老而淫乱，又像小孩子一样迷信。就是这位先生下了几道比硕夫斯威德尔式的敕令³²⁹，扼杀了发表意见的自由。

谁都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继承者，“正义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怎样为了抛给他的诱饵——汉诺威——而把自己的老盟友出卖给拿破仑。

谁都知道，他随后又怎样把拿破仑出卖给他那些以前的盟友，充当英、俄的走卒来进攻体现在拿破仑身上的法国革命。

谁都知道，这次进攻获得了多大的成绩：“英勇军队”在耶拿

吃了空前的败仗,突然暴露了普鲁士整个国家机关的道德腐化。普鲁士官吏们的叛卖勾当、卑劣行径、曲意逢迎的行为是罄竹难书的,速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都感到厌恶。

谁都知道,在181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怎样用花言巧语迫使普鲁士人民相信,仿佛对法国的进攻是“解放战争”,而实际上是镇压法国革命,是要使旧日的“天赋的”君主制复辟。

谁都知道,当神圣同盟的参加者们在1814年3月30日一进入巴黎,那些漂亮的诺言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谁都知道,当拿破仑从易北河回来的时候,德国人民的热情又大大低落,以致霍亨索伦只好答应立宪(在滑铁卢战役的四个星期以前,即1815年5月22日所下的敕令)来重新激发这股日益减退的热情。

谁都记得,在德意志联邦条例和维也纳和约上所许下的诺言:出版自由、宪法等等³³⁰。

谁都知道,“正义的”霍亨索伦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为镇压各国人民成立了神圣同盟,召开了代表大会,作出了卡尔斯巴德决议³³¹,实行书报检查制度,警察逞凶,贵族称霸,官僚横行,王室对诉讼程序横加干涉,迫害宣传鼓动家,大批的人被判罪,在财政上挥霍无度,而宪法连个影子也没有。

谁都知道,1820年霍亨索伦怎样向人民保证以后不再增加税额和国债,后来又是怎样履行自己诺言的:把Seehandlung³³²变成了国家专用的秘密借贷所。

谁都知道,霍亨索伦是怎样回答六月革命时期法国人民的呼吁的:在边界上调集军队,压制本国人民,镇压德国各小邦的运动,在神圣同盟的皮鞭下彻底奴役这些小邦。

谁都知道,就是这个霍亨索伦在俄波战争时怎样破坏了中立,让俄国军队通过自己的国境去袭击波兰的后方,把本国的军械库、军需仓库供俄国军队使用,给每一个被打败的俄国军在普鲁士提供安全的避难所。

谁都知道,这位出生于霍亨索伦家族的藩臣 [Unterlös],按照神圣同盟的意图,全力去巩固贵族、官僚、军阀的统治,用蛮横的暴力——不仅在于普鲁士,而且在全德意志——把言论自由消灭得干干净净,绝不让“顺民的有限理智”³³³对政府起一丝一毫的影响。

谁都知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时期,特别是在1815—1840年,用来实现这种壮志宏图的蛮横的暴力手段是史无前例的。无论何时何地,从来没有像在这位“正义的”君主统治时期这样大批地捕过人,判过罪,监狱从来没有像这样挤满过政治犯,何况这些宣传鼓动家都是一些无辜的头脑简单的人。

难道还有必要谈论那位用莱宁的一个修道士³³⁴的话说“将是本族最末一人”的霍亨索伦^①吗?难道还用再谈论基督教德意志伟大精神的复活、再度急剧恶化的财政困难、天鹅勋章³³⁵、最高书报检查法庭、联合议会、宗教大会、“一块纸片”³³⁶、借款失败以及1840—1848年这个光辉时代里的其他一切成就吗?难道还需援引黑格尔的话来证明为什么霍亨索伦家族偏偏要用一个喜剧人物来收场吗?

这些都没有必要讲了。上述事例已足以全面地说明普鲁士霍亨索伦这一姓名的特征。固然,这个姓名也一度失掉光彩,但从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曼托伊费尔及其同流成了国王的左右手以来，又恢复了昔日的威望。普鲁士又像从前一样，由一个臣服俄国的准国王治理；霍亨索伦又成了全俄专制君主的藩臣，萨克森、巴伐利亚、黑森-洪堡，瓦尔德克等地所有小诸侯的太上皇；“顺民的有限理智”又重新获得旧日的权利——唯命是听。“我的英勇军队”——信奉正教的沙皇目前还没有亲自使用这支军队——能够在萨克森、巴登、黑森和普法尔茨强行建立那种已在华沙统治十八年之久的秩序，能够在本国和奥地利利用黎民的鲜血粘合破裂的皇冠。至于从前在危急大难关头许下的诺言，我们和长眠地下的祖先一样，丝毫不挂在心上；只要我们一旦平定国内，就立即大张旗鼓向法国推进，征服香槟葡萄之乡，毁灭伟大的巴比伦这一万恶之源！

这就是我们的最高当局的策划，我们的高贵的霍亨索伦就是要把自己的战船开进这样一个可靠的避风所。所以钦定法律越来越多，改变越来越频繁；所以胆小怕事的法兰克福议会才老是吃耳光；所以才宣布戒严、逮捕、实行迫害；所以普鲁士的大兵才侵入德勒斯顿和南德意志。

然而，还存在着一支力量，尽管桑苏西宫³³⁷中的先生们不太把它放在眼里，它终究会发出自己雷鸣般的声音。这支力量就是人民。在巴黎，在莱茵，在西里西亚，在奥地利，他们都在勉力抑制着自己满腔的怒火，等待着起义的时刻到来，谁知道，也许很快他们就会给所有的霍亨索伦，所有的大小王公贵人以应得的报偿。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5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0 日“新莱茵报”
第 294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反革命的进攻和革命的发展

科伦 5 月 9 日。反革命正以迅速的步伐迫近，但是革命发展得更快。

如果说反革命在**德勒斯顿**获得成功³³⁸使人们有根据来预见它的胜利，如果说反革命在**布勒斯劳**利用挑起的叛乱而实行了**戒严、书报检查**和组织**军事法庭**，那末，革命可以因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别的胜利而感到自豪。

我们且不谈**莱茵普鲁士后备军**的正在迅速增长的**公开暴动**，它恰好席卷了黑白反动派势力最强的各个区；我们也不谈在德国南部发生的运动，它在各处都为各邦政府、资产阶级和法兰克福议会本身³³⁹所出卖。我们只谈一谈那些从外面闯进来的能给德国各种小规模、分散的、被出卖的运动带来统一并建立起坚实支柱的大事件：**匈牙利和法国的革命**。

在**匈牙利革命**接二连三取得胜利并在最近的决定性战斗（这一战斗原来应该在 5 日或 6 日在普勒斯堡^①附近进行）之后将直接向**维也纳**挺进并解放该城的同时，**法国**突然也重新加入了大家眼看着发展起来的公开运动。最近几个月来处于隐秘状态的发展即将结束。法国军队在**罗马城**下的失败³⁴⁰暴露了以往历届政府的

① 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

昏庸无能，并使之名声扫地。人民，这个最后的、最高的审判官，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不管这将通过选举还是通过公开革命而发生，但是法国人民很快就会给运动一个全欧洲都能感觉得到的推动。

欧洲的君主们很快就会看到：优秀的革命人民未改当年本色，——1849年的法国革命将不是用拉马丁的词句，而是用大炮的语言同他们谈话。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5月9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5月10日“新莱茵报”
第294号特别附刊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普鲁士新宪法

科伦 5 月 12 日。三位一体³⁴¹中靠天命和戒严治理国家的波茨坦成员，去年 11 月间，在驱散了人民代表以后，钦定了宪法；这一宪法需要提交很快就应召开的议会去修改。大家知道，新的人民代表遭到了跟旧的人民代表同样的命运；前者被弗兰格尔的刺刀所驱散，而对于后者，曼托伊费包的一张关于解散的便条³⁴²就成了解散回家的命令。这样，宪法的修改工作也就告终了。

于是，基督教德意志臣民之父和他的党羽，这一大群门第高贵的和身世微贱的，挂满勋章的和挂不挂勋章的寄食者、懒汉和吸吮人民血汗的吸血鬼——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自由广阔的活动天地，能够为所欲为。

去年 11 月间，王权、官僚和容克地主还不得不作各种各样伪善的声明，把一些看去极为开明的条文加进宪法中去。要把十一月宪法打扮得无论如何可以用来欺骗所谓“普鲁士人民”中那个人数众多的愚钝部分。

而现在，所有这一切微妙的外交手腕都已变成多余的了。姻兄弟尼古拉不是已经带着两万士兵驻扎在德国的领土上了吗？德勒斯顿不是由于大炮轰击被破坏了吗？普鲁士不是已同科尼施泰因的胆怯的逃亡者、同皇帝候选人慕尼黑的马克西³⁴³、同汉诺威的恶犬恩斯特-奥古斯特、同德国的一切内外反革命匪帮结成最密切

的同盟吗？

应当承认，霍亨索伦最巧妙的利用了时机。他下令为自己“心爱的”臣民制订了新的宪法，并于5月10日在沙洛顿堡批准和钦定了它。

最近颁布的普鲁士王国宪法，是表达了真实的意图的唯一的宪法，跟十一月宪法相比它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即它总共只有十七节，内云……^①

写于1849年5月1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5月13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297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接着，在“新莱茵报”上以“普鲁士的最新宪法”为题刊登了1849年5月10日关于在全普鲁士实行戒严和建立战地法庭的敕令。——编者注

杜塞尔多夫的血腥法律

科伦 5 月 12 日。“新宪法”昨天已经在杜塞尔多夫生效。一般的法律和法庭已被废除，臣民之父授予了“我的英勇军队”以杀人的特权。

卫戍司令在取得胜利和血腥地镇压人民之后，立即请求柏林方面给予指示。他收到冯·霍亨索伦先生的下属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用电报拍来的命令——颁布**血腥法律**并成立刽子手的军事法庭。

根据军事当局所颁布的命令的第一条和第六条，结社权被废除了，不值一谈的钦定宪章的第五、六、七、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各条均失去效力。

去年，在“公民和共产主义者”德利加尔斯基^①的统治下宣布戒严时，对杜塞尔多夫的报刊实行了**检查**，这个措施甚至激起了大部分软弱无力的协商派的愤怒叫喊。如今，在霍亨索伦王朝取得新的成就之后，当支持波茨坦藩臣的不是议院，而只是同宗的翘鼻子的哥萨克的时候，人们已不满足于**检查**，而要干脆扼杀报刊了。

按第七条的规定，在杜塞尔多夫地区**禁止**发行杜塞尔多夫的报纸，“新莱茵报”也在禁止之列。第八条规定，只有官方的“告

^① 见本卷第 64—69 页。——编者注

示”才能刊行。

在“公民和共产主义者”德利加尔斯基于军刀专政下，被任意逮捕的受害者至少应当按一般法律由普通法院审理。可是现在，法律和法院都暂时被取消了，并且成立了刽子手的特别军事法庭。

第九条。凡通过语言、文字、刊物或描绘等方式号召反对当局的合法 (!) 决定者，交军事法庭惩处。

第十条。凡被揭露对合法当局的措施进行公开的或武装的反抗，或者以叛变投敌行为使军队遭受危险或损失者，按军法立即枪决。

嗜血豺狼文迪施格雷茨的桂冠使得恢复了元气的霍亨索伦不能安眠！

写于 1849 年 5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3 日
“新莱茵报”第 297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贝尔格区的起义

科伦 5 月 12 日。目前，整个莱茵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爱北斐特，在那里，“起义的旗帜”现在比莱茵省的其他任何城市都举得更高。议院的解散成了一贯风平浪静的乌培河谷开始行动起来的先兆。连愚蠢透顶的“抱怨派”和极其可怜的“伪君子”也懂得了反动派的罪孽过于深重，并为工人们的英勇和热情（对于工人们的精力，我们从未怀疑过）所鼓舞，终于拿起了武器，参加了决心同专制制度进行殊死斗争的街垒战英雄的行列。

我们从战地获得的消息很不确切，以致真假难分。不过，下面这些情况还是可以深信无疑的：全体居民都拿起了武器；街道和房屋都变成了街垒；武装的增援部队正从邻近地区——从佐林根、勒姆谢德、格莱弗拉特，从分布在埃奈泊流域的各个地方，——总之，从整个贝尔格区匆忙赶去。起义者并不限于占领爱北斐特和巴门等城市，而要把防御行动扩展到郊区的各个重要据点去。

有人肯定地说，战斗者的计划中包括赶忙去援助杜塞尔多夫，以便把这座城市从普鲁士军队的手中解放出来。现在第一次站在人民方面坚决进行战斗的后备军，在这些行动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战斗者有足够的装备和金钱，因为许多大商人都甘愿打开自己的钱柜。例如，据报道，仅仅一家商号就给了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

五百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①。

在这种情况下，王室的雇佣军队要准备进攻，以便在贝尔格区也要极力进行跟在布勒斯劳、德勒斯顿、爱尔福特等地同样残酷的镇压，自然就用不着惊奇了。但愿这次情况会有不同的发展。

威塞尔的炮兵纵列将调到爱北斐特去。进攻大概决定在下星期一开始。

这些消息是否可靠我们不能担保。但是不管反革命的计划如何，爱北斐特所面临的将是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它真正能对祖国作出重大的贡献。

写于 1849 年 5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3 日
“新莱茵报”第 297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① 普鲁士金币，等于 $5\frac{2}{3}$ 塔勒，在 1750—1855 年间通用。——译者注

* “科伦日报” 卖身求荣

科伦 5 月 13 日。我们提醒本报读者注意一下最近几天的，尤其是今天的（星期日，5 月 13 日）“科伦日报”。

的确，“最下流的淫佚放荡”从来没有像在我们出色的当代女人^①最近发表的社论和通讯中那样紧密地同卖身求荣的无耻行径互相结合。

几天以前，我们还看到，“科伦日报”的老板约瑟夫·杜蒙先生在莱茵省市政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坚毅果敢地拥护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今天我们却看到，那同一个人物通过自己的奴才勃律盖曼，在每一句话里都无耻透顶地对起义的失败表示高兴，虽然这些起义是莱茵省市政委员会作出的那些决议的结果。

然而，正因为如此，“科伦日报”也就有福气成为与戒严状态同时钦定给莱茵省各城市的独一无二的报纸。

不错，同时钦定给这些城市的还有**鲜血和——污秽！**

写于 1849 年 5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3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97 号增刊

^① 指“科伦日报”。——译者注

“十字报”

科伦 5 月 15 日。普鲁士的一家该受绞刑者的小报^①选登了“新莱茵报”对“奥里缪茨的帝俄藩臣”和“普鲁士骑士臭虫集团”^②所说的一些非爱国主义的话，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这家小报在选登这些话的时候，仅仅刊载了一篇布勒斯劳的通讯，并在它的末尾加上了这样一段伪善而轻率的“十字骑士”的牢骚话。

“同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较起来，就连 1793 年登载在法国‘通报’上的关于普鲁士国王结婚的声明：《Le jeune tyran de Prusse vient d’être une demoiselle de Mecklenbourg!》（“年轻的普鲁士暴君刚刚同梅克伦堡家族的一位女郎结婚!”）也要黯然失色。”

为了尽可能充分地说明“新莱茵报”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我们劳驾该受绞刑者的小报把本报第 294 号上 Premier-Cologne（标有记号科伦的一篇社论）——“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也转载一下。据说，冯·霍亨索伦夫人是该受绞刑者的小报的热心读者，而我们决不会那么“片面”，以致不让尊贵的夫人了解一下有关她丈夫的王朝的某些历史情节，作为消遣。

写于 1849 年 5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6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99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指“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536 和 569 页。——编者注

* 普鲁士给法兰克福诸君的 又一记耳光

科伦 5 月 15 日。鞭子的神圣同盟刚给普鲁士钦定了一部实行戒严的最新宪法^①，今天我们又高兴地看到了另一个并不逊色的文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软弱无能的议员们，由于自己极端宽大、胆怯和愚蠢，在整整一年中诚挚地帮助了德国人民的雇佣叛徒来准备反革命的胜利，现在他们自食其果了。如果我们的议员们头脑还可能稍微清醒一点的话，如果在他们心灵里不仅能产生三月啤酒所激起的义愤，而且还能产生哪怕很小一点革命的义愤和热情的话，那末这在沙洛顿堡的藩臣颁布下列“敕令”以后就该发生了。

“敕 令”

我们，受命于天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及其他人等，据内阁奏请，特颁布命令如下：

第一条

根据 1848 年 3 月 30 日和 4 月 7 日所颁布的联邦议会决议，及上月 11 日所颁布的敕令，由普鲁士邦选入德意志国民议会的议员，其委托书已宣告无效。

第二条

兹责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我们的全权代表通知各议员恪守本法令，并指

^① 见本卷第 578—579 页。——编者注

示他们绝不要再出席议会以后的各次会议。

弗里德里希-威廉

勃兰登堡伯爵 冯·拉登堡 冯·曼托伊费尔

海特男爵 冯·拉贝 西蒙斯

1849年5月14日于沙洛顿堡”

写于1849年5月1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5月16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299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特别附刊

新的军法宪章

—

科伦 5 月 15 日。我们还应当指出波茨坦藩臣最近对他的那些用掠夺和贩卖人口的办法得到的“世袭”臣民所表现的慈父般的关怀。我们指的是不久以前钦定的军法宪章^①，这是霍亨索伦王朝所作的一切诺言中唯一真实的诺言，在这里，普鲁士的尊严终于在在最迟钝、最轻信的人面前都显露出了它的赤裸裸的本质，抛弃了最后一点滑稽可笑的伪善虚饰。

驱散本来应当“修改”12月5日钦定宪法的无害的柏林议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只不过是给俄国人进入德国领土所做的必要准备。波茨坦的巴什基里亚人和信奉正教的沙皇所豢养的跟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像恶犬般到处奔驰的哥萨克联合起来，实行了三国同盟对匈牙利的臭名远扬的侵犯，在这次侵犯中，普鲁士由于其胆怯和背信弃义的本性，像一个密探一样带着逮捕令站在大门口，而奥地利和俄国的刽子手则应该在这个国家里面进行血腥的狩猎。但是，除此以外，这个联合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霍亨索伦王朝这个联盟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俄国人进入德国领土应当赋予

^① 见本卷第 578—579 页。——编者注

波茨坦的英雄以必要的**勇气**，并帮助他**对革命进行报复**，因为革命曾在去年3月**迫使他承认胆怯**。

为了说明霍亨索伦王朝在各个时代所固有的天生的怯懦，我们不必探索历史，甚至不必追溯这个高贵家族的祖先的经历，他们隐身在丛林草莽之中，像劫路的强盗一样窥伺着手无寸铁的过往行人，并以此为“王朝的尊严和光辉”奠定了基础。我们不必提起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向法兰西共和国的大吹大擂的进军，在这次进军中，伟大的霍亨索伦头一个开了小差，出卖了德意志“帝国军队”，以便同俄国一起重新掠夺波兰；我们也不必谈他的继承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在用虚伪的诺言把“我的人民”驱入战斗之前，在拿破仑战争中起了可怜的作用。“三月的成果”的遭遇只不过是旧的“世袭的”怯懦和背信弃义的继续。协商议会是由于怯懦（它代替了关于臭名昭彰的大言不惭的“一张羊皮纸”的演说）而向革命作出的第一个让步；当维也纳的陷落使恢复了元气的霍亨索伦得到足够的勇气的时候，协商议会就被驱散了。钦定宪法连同“进行修改”的议院是怯懦的伪善的第二个行动，因为“未被削弱的国王”当时还认为必须作出某些自由主义的让步。在同俄国沙皇和君主安排的阴谋如愿以偿之后，议院便被解散了。但是只有当俄国人**真正**进入德国的领土，哥萨克的支援眼看就要来到的时候，霍亨索伦才有勇气拿出最后的计划：消灭最后一点伪善的“宪法保证”，办法是实行最无限制的，最专横恣肆的军刀专政，停止旧的甚至3月以前的法律和法院的效力，用“铅弹和火药”来为霍亨索伦王朝在3月几次让步中所表现出来的怯懦向革命进行报复。

这就是不久前钦定的军法宪法的历史起源。现在来看看它的

内容。

根据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为了防止骚动”，不仅每一个要塞司令可以宣布要塞实行戒严，而且每一个“军长”可以宣布该军所在的全军区实行戒严。

“为了防止骚动”，*c'est-à-dire* (就是说)，如果司令官或将军自以为预先看出了“骚动的苗头”。霍亨索伦王朝的大臣们做起文章来，通常总是语法知识贫乏得惊人，也许他们是想说“一旦发生骚动”吧！该如何解释，由将军们和司令官们久经考验的理解力去决定。

这样，“为了防止骚动”，司令官可以宣布自己的要塞实行戒严，而军长则可以宣布全省实行戒严。但这“骚动”的界限没有确定。“骚动”一定要在要塞内或省内发生，还是在多么远的距离内发生的危险会使要塞或省受到威胁——这个“分寸”也要由将军或司令官自己去掌握。而“掌握分寸的本领”，按照梯岑中将的惯用说法，乃是普鲁士军官所首先必须具备的。

为了法制基础的所有崇拜者的利益起见，将军在“为了防止骚动”时的权力，毕竟有所限制，但这种限制办法又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只有在“为了防止战争”时，将军和司令官才能**独立地**宣布自己的省和要塞实行戒严。但是，新宪章第二条解释道，在“为了防止骚动”时，宣布实行戒严的命令由内阁发出；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官对于自己的要塞，将军对于自己的省虽有权宣布实行戒严，然而只是**暂时地、预先地**，即在内阁批准或(!)取消这一戒严令之前。这是对那些受到骚动威胁的臣民的愉快的保证！但是，我们的大臣们难道不是“负责任的”吗？司令官们和将军们只不过“暂时”专政，最后一级还是有“负责任的”大臣，——这一切难道不能拯救“法制基础”

吗？不错，根据第七条和第十三条，“暂时的”戒严使司令官或将军有权**暂时地**停止普通法院的活动，**暂时地**成立军事法庭，而军事法庭也是**暂时地**宣判死刑（第八条），并且**暂时地**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死刑判决（第七节第十三条）。但是“法制基础”还是由于有最后一级——“负责的”大臣们——而得救了，——法制基础万岁！这里我们有一个唯一的小小的愿望，就是让法制基础的崇拜者们能够首先亲自体验一下以上帝和基督教德意志藩臣陛下的名义宣布的**暂时的**死刑。

二

科伦 5 月 16 日。塞万提斯在某处说到一个勇敢的阿尔古阿西尔³⁴⁴和他的司书为了维护社会道德而供养了两个名声很坏的妇人。这两个殷勤的女神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大的集市及其他盛大场合出现，老远就可以看出是什么货色。她们一勾搭上什么外来的客人，就马上设法告诉自己的情人，她们到哪个旅馆去了。阿尔古阿西尔和他的司书便闯到那里去，使她们大受惊吓，演出吃醋的场面，只有在客人苦苦哀求并付出相当数目的赔偿费以后才把他放走。他们用这种办法把私人利益同社会道德的利益结合起来，因为上了当的人会长期警惕，不再重起邪念。

普鲁士维护制度的英雄们同这些道德的维护者一样，用最简单的方法保障正常的军法安宁。为了进行挑衅，他们派出几个喝得醉熏熏的法制栋梁去进行挑衅，要他们闯进人群用军刀砍伤几个人，这样在某个边远城市或乡村就引起了激愤情绪，这样就可以借口保护全省免受继续扩展的罪恶骚动的波及而宣布戒严，并以欺骗手段剥夺该省最后一点点宪法成果。

根据新的军法宪章第五条，“军事长官”可以在宣布专区戒严时使最近在 12 月间钦定的“成果”的第五条至第七条和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八条停止生效。

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从三月诺言中把那些被新的军法宪章所废除的条款取消，那末剩下的还有什么呢？这样一来，“为了防止骚动”，任何一个“军事长官”可以随意使下列条款停止生效：

十二月宪法第五条：“保证人身自由”。

第六条：“住宅不可侵犯”。

第七条：“不得剥夺任何人的法定的受审程序”。

第二十四条：“每个普鲁士人都有权……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在言语上或出版物上犯的过错等等，应根据普通刑法予以惩处”。

第二十六条：“如果作品的作者是为人所共知的，并且处在司法当局权力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内，则印刷厂主、出版者和发行者可不受惩处”。

第二十七条：“一切普鲁士人有权在室内举行和平的、不带武器的集会”。

第二十八条：“一切普鲁士人有权结成其目的不违反刑事法规的社团”。

只要军事长官“为了防止骚动”宣布戒严，“人身自由”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审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厂主的保护、结社的权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违反刑事法规”的“社团”——娱乐场和跳舞厅，也只有 par grâce de M. le commandant（得到卫戍司令先生的恩准）才能存在，而决不是根据“权利”存在。

同时，新的军法宪章第四条规定：

“宣布（pur et simple（绝对的））戒严以后，行政权即归**军事长官**掌握，一切民政、行政和市政机关都必须执行军事长官的命令和委托。”

这一节顺利地取消了一切通常的市政和行政管理形式，并且给那些已变成“执行委托的奴仆”的愚钝而无耻的官僚犍牛们套上了主权的军事独裁的牛轭。

第八和第九两条规定了坚毅的霍亨索伦王朝甚至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想借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制度的惩治办法。这个新刑法无论如何要比一切枯燥无味的、协商主义的法律理论简明得多。

第八条：“凡在宣布戒严的地区或专区内蓄意放火，蓄意造成水灾（规定

得多么仔细!)，或者对武装力量或民政和军事当局代表进行攻击或手持凶器公开进行暴力反抗者，一律处以死刑。”

“对武装力量或当局代表进行反抗”！大家都知道“英勇军队”的行动，都知道那些为了统一事业而被大量集聚在西部各省的勇敢的波美拉尼亚人、普鲁士人和上西里西亚波兰人，怎样按照最崇高的榜样，只是由于情况关系和解除了公民的武装之后才获得勇气（像在杜塞尔多夫、布勒斯劳、波兹南、柏林、德勒斯顿等地所发生过那样），并且用屠杀赤手空拳的人们、妇女和孩子来完成戒严。这样，波茨坦巴什基里亚的公爵的“世袭”臣民就被授予了值得深深感谢的自由——在宣布戒严之后，或者让臣民之父的善良旨意的英勇执行者“按照规定程序”杀害自己，或者是进行“反抗”而被按照军法枪毙。

还有必要来谈第九条的条文吗？根据这一条的规定，散布把当局“引入歧途”的消息，违反“为了社会安全而颁布的禁令”，等等，就要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甚至连最通常的警察和宪兵职能今后都以战地法庭的精神予以完善了。

还有必要来提起臣民之父霍亨索伦及其走狗西蒙斯—海特男爵—曼托伊费尔的怯懦的背信弃义吗？他们命令战地法庭由三个“高级军官”和两个由军事长官任命的民事法官组成，这样既可以在没有头脑的资产者心目中保持“诉讼”程序的外观，又可以凭着军人刽子手在数量上的优势，事先对判决稳有把握。

有必要来提起第十三条关于“军法审判程序”的种种规定吗？那里没有一处谈到证人的供词，可是根据这些条文却显然可以用嗜血的恶狗文迪施格雷茨的精神，即“根据总的情况”来定案。

有必要来提起这样一些条款吗？它们规定战地法庭的判决不

得上诉，而死刑判决仅由“军事长官”批准，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执行；最后，即便在戒严解除以后，如遇战地法庭的判决尚未执行，“普通法院”也只能用按照法律的惩处来代替战地法庭的惩处，而“罪行”本身“则必须认为业已证明”，对于控诉正确与否不得加以讨论。

最后，有必要来谈这部依靠哥萨克支持的新宪法的最后一条也是最精彩的一条吗？按照这一条的规定，“除了戒严以外”，也就是说，“不是为了防止骚动”，十二月成果的第五、六、二十四至二十八等条，即“人身自由”、“住宅不可侵犯”、“出版自由”和“结社的权利”，也可以在个别专区内取消。

在领教了这一切好处之后，我们就没有必要因为这些新的、唯一真实的许诺，因为皇上的旨意由于哥萨克的接近而终于真诚地流露出来，而来向一切善意的普鲁士人表示衷心的祝贺了。说实在的，我们很高兴渴望秩序的资产者和幻想法制基础的可怜的傻瓜们受到这种血腥的惩处。

但是人民很快就会感到，这种新的“成果”使他们无法再容忍下去，他们会向这些骗人的、胆怯的危害国家的盗贼进行报复，而莱茵省决不会放过使我们能高唱 *Ca ira*³⁴⁵ 的这种期待已久的时机！

瘦瘪的骑士们，
不久该会走开了，
那时就要从铁制的长瓶里，
把钱行酒给他们倾倒！³⁴⁶

写于 1849 年 5 月 15—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6 和 17 日
“新莱茵报”第 299 和 300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爱北斐特

科伦 5 月 16 日。在爱北斐特的街垒上也有过“新莱茵报”的代表。

为了驳斥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我们应当请读者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简短报道。

5 月 10 日，“新莱茵报”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科伦前往爱北斐特。他从佐林根带去了两箱子弹，这是佐林根工人在突击格莱弗拉特军械库时获得的。恩格斯到了爱北斐特以后，给安全委员会作了关于科伦局势的报告，并听候该委员会调动。军事委员会立即委派他领导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并给了他如下的委任状：

“安全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兹授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检查城内全部街垒，并指导建筑防御工事。请街垒上一切岗哨于必要时给该人以协助。”

(签名) 许纳拜恩 特罗斯特

1849 年 5 月 11 日于爱北斐特”

第二天，大炮又交由恩格斯支配：

“兹授权公民弗·恩格斯自行斟酌安装大炮，并招聘为此所必需之工匠。有关开支由安全委员会负担。”

安全委员会

委员会代表

(签名) 波特曼 许纳拜恩 特罗斯特

1849 年 5 月 12 日于爱北斐特”

恩格斯在到达爱北斐特的头一天，就组织了工兵连，并且在该城几个出口处构筑了街垒。恩格斯出席了军事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并建议该委员会聘请米尔巴赫先生担任卫戍总司令，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以后几天，恩格斯继续他的活动：改建了许多街垒，拟订了新街垒的布置计划，并加强了工兵连。从米尔巴赫到任的时候起，恩格斯就听从他的指挥，也参加了卫戍总司令所召集的各次军事会议。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逗留的全部期间，受到了贝尔格和马尔克的武装工人以及志愿部队的无条件信任。

在恩格斯到达的头一天，安全委员会委员里奥泰先生就探询了他的意图。恩格斯说，他来到爱北斐特，首先是因为受到科伦方面的派遣；其次是因为考虑到也许他对军事方面会有所帮助；第三是因为他本人是贝尔格区人，他认为能够亲身参加在该区人民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自己的光荣。他只希望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而根本不想涉及运动的政治方面，因为非常明显：目前在这里，运动只能在黑红黄三色旗下进行，因而需要避免反对帝国宪法的一切发动。

里奥泰先生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14日早晨，当恩格斯陪同卫戍总司令米尔巴赫到恩格尔堡去参加总集合的时候，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赫希斯特先生走到恩格斯跟前，对他这样说道：虽然恩格斯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但是爱北斐特的资产者对他的到来仍然感到万分惶恐；他们时刻耽心他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所以一致希望他离开。

恩格斯说，他不想勉强人家接受他的效劳，但是也不愿意胆

恩格斯在到达爱北斐特的头一天，就组织了工兵连，并且在该城几个出口处构筑了街垒。恩格斯出席了军事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并建议该委员会聘请米尔巴赫先生担任卫戍总司令，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以后几天，恩格斯继续他的活动：改建了许多街垒，拟订了新街垒的布置计划，并加强了工兵连。从米尔巴赫到任的时候起，恩格斯就听从他的指挥，也参加了卫戍总司令所召集的各次军事会议。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逗留的全部期间，受到了贝尔格和马尔克的武装工人以及志愿部队的无条件信任。

在恩格斯到达的头一天，安全委员会委员里奥泰先生就探询了他的意图。恩格斯说，他来到爱北斐特，首先是因为受到科伦方面的派遣；其次是因为考虑到也许他对军事方面会有所帮助；第三是因为他本人是贝尔格区人，他认为能够亲身参加在该区人民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自己的光荣。他只希望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而根本不想涉及运动的政治方面，因为非常明显：目前在这里，运动只能在黑红黄三色旗下进行，因而需要避免反对帝国宪法的一切发动。

里奥泰先生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14日早晨，当恩格斯陪同卫戍总司令米尔巴赫到恩格尔堡去参加总集合的时候，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赫希斯特先生走到恩格斯跟前，对他这样说道：虽然恩格斯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但是爱北斐特的资产者对他的到来仍然感到万分惶恐；他们时刻耽心他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所以一致希望他离开。

恩格斯说，他不想勉强人家接受他的效劳，但是也不愿意胆

这个新的运动一开始，恩格斯便会——这一点工人们可以相信！——像“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刻出现在战斗岗位上，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7 日“新莱茵报”
第 300 号增刊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

科伦 5 月 18 日。不久以前，柏林曾要求科伦地方当局重新宣布戒严，企图按军法查封“新莱茵报”，但是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反抗。这之后，科伦行政区政府便请示本地检察机关，企图以非法逮捕的手段来达到那个目的。这一企图由于检察机关在司法上的怀疑而遭到了破产，就同前此曾两度由于莱茵陪审员的明智而遭到破产一样³⁴⁷。无可奈何，只有诉诸警察诡计；这次他们达到了目的。“新莱茵报”现在暂时停刊。5 月 16 日该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接到了下述荒唐无稽的政府命令：

“查最近几号 (!) ‘新莱茵报’ 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故该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应予被剥夺其外人待遇法 (!)，因它已遭彼粗暴之破坏，鉴于彼未被允许继续留居普鲁士国土，应令其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境。若彼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

王国行政区政府

缪勒尔

致本市王国警察厅长盖格尔先生

1849 年 5 月 11 日于科伦

干吗要玩弄这些愚蠢的词句，编造这个官方的谎言！

最近几号“新莱茵报”按其倾向和语调来说同该报“试刊”第一号丝毫没有差别。在这“第一号”里就曾经说过：

“许泽尔先生的阴谋（在美因兹）只不过是柏林反动派企图

……把我们徒手交给……军队去摆布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³⁴⁸

Eh bien, Messieurs, qu' en dites-vous maintenant? (先生们, 你们对这一点有什么可说的呢?)

至于我们的倾向, 难道政府过去不知道吗? 难道我们不曾向陪审法庭声明过: 现时“报刊的任务是破坏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①? 至于霍亨索伦藩臣, 那末请读一读 1848 年 10 月 19 日的“新莱茵报”, 那里这样写道:

“国王是始终如一的。遗憾的是, 三月事件把这块倒霉的纸片置于陛下和人民之间, 不然的话国王就会永远是始终如一的了。看来目前陛下又要像三月事件以前那样相信斯拉夫民族的‘铁蹄’的威力, 而维也纳人民也许就是把铁变成粘土的魔术师。”³⁴⁹

Est-ce clair, Messieurs (明白了吗? 先生们。)

而“社会共和国”呢? 难道我们只在“最近几号”新莱茵报”里才宣布过它吗?

对那些没有看出我们关于欧洲运动的全部议论和报道都贯穿着一条“红”线的蠢人, 难道我们没有用坦率明确的语言说过吗?

在 11 月 7 日的“新莱茵报”上我们可以读到: “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起来, 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 国家的破产, 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也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但是发展的进程将不会等待欧洲各国转给欧洲社会的期票的支付日期。

在巴黎, 六月革命会给以致命的反击。随着‘红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 军队将从各国的内地调到边境并越过边境, 而各

^① 见本卷第 278 页。——编者注

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

Vae victis! (战败者罪该万死!)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³⁵⁰

Est-ce clair, Messieurs?

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隐瞒我们的观点是多余的。有一次，我们在和地方检察机关争论的时候，曾大声地宣布过：

“‘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的时代开始。”³⁵¹

要知道，在当时我们是和检察机关说话的呀！我们用下面的话总结了旧的1848年（见1848年12月31日的“新莱茵报”）：

“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①

试问，难道只是在“最近几号”“新莱茵报”里我们才认为必须明显地以社会共和的精神发表言论吗？难道你们没有读过我们关于六月革命的文章，难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吗？

① 见本卷第146页。——编者注

那末你们干吗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

普鲁士政府的命令荒唐到如此地步，竟说“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粗暴地破坏了外人待遇法”。

外人待遇法是厚颜无耻的侵略者 V order-Russen（博鲁士）^① 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给我们莱茵省居民钦定的，“新莱茵报”的确“粗暴地”破坏了这个外人待遇法。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因此受到莱茵省的感激。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今后，在莱茵省享受充分公民权的将只有一家“新普鲁士报”了。

在临别前，我们谨向读者再提一下我们新年号上的一句话：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

这就是 1849 年的前景。”^②

看吧，在东方，由各民族的战士组成的革命军已经同以俄国军队为代表的、联合起来的旧欧洲相对峙，而巴黎已经出现了“红色共和国”日益逼近的征兆！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5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第 301 号

① 翻译不出的双关语：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称普鲁士人为《V order—Russen》（拉丁文是《Borussi》）。——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75 页。——编者注

* 匈 牙 利

科伦 5 月 18 日。正当匈牙利战争随着俄国人的实际干涉而变成欧洲战争的时候，我们被迫停止对战争今后进程的报道。现在只好再次向我们的读者概要地评述一下这个伟大东欧革命战争的进程。

记得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即 1847 年秋天，科苏特所领导的普勒斯堡议会就通过了一系列革命的决议，如关于地产出卖权、关于农民迁徙自由、关于赎买封建义务、关于解放犹太人、关于各阶级同等课税等决议。议会还允许克罗地亚和斯拉窝尼亚的居民在内政方面正式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最后，在巴黎开始二月革命的那一天（2 月 22 日），议会要求成立单独的匈牙利责任内阁，从而迈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分离的第一步。

二月革命爆发了。结果维也纳政府对匈牙利人的要求的抗拒被摧毁了。在匈牙利革命的第二天（3 月 16 日），维也纳政府同意成立独立的匈牙利内阁，因而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也就缩小为君合国^①了。

匈牙利独立以后，匈牙利革命就立刻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取

① 君合国——即两个国家由同一君主统治，但两国之内政外交各自独立。——译者注

消了一切政治特权，实行了普选制，在国家补偿的条件下，无偿地废除了一切封建义务——徭役和什一税，并且同特兰西瓦尼亚建立了联盟。科苏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叛变的总督耶拉契奇被免职了。

同时奥地利政府又开始恢复元气。在维也纳的假责任内阁仍旧软弱无力的时候，音斯布鲁克宫廷的权奸依靠在意大利的奥皇军队，利用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要求，利用卢西农民根深蒂固的狭隘性，却愈益加强起来了。

6月17日，塞尔维亚人在宫廷的金钱和密使的帮助下在巴纳特和巴奇卡举行了暴动。6月20日，耶拉契奇在音斯布鲁克觐见了奥皇，并重新被任命为总督。他回到克罗地亚以后，就拒绝服从匈牙利政府，并于8月25日向它宣战。

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奸的背叛行为是非常明显的。匈牙利人曾再度企图使奥皇回到宪法的轨道上来。他们曾派出一个二百名议员的代表团到维也纳去，奥皇却支吾其词。愤激情绪增长了。人民要求保证，并力主更换内阁。于是混进佩斯内阁的叛徒被清除出去了，9月20日科苏特被任命为总理。但是才过四天，奥皇的全权代表、督军斯蒂凡大公就逃到维也纳去了。26日，奥皇发布了众所周知的致匈牙利人的声明，声明中宣布匈牙利内阁为叛乱内阁，予以撤销，同时任命仇恨匈牙利的耶拉契奇为匈牙利的执政者，企图消灭匈牙利革命最重要的成果。

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匈牙利部长签署的声明曾被科苏特宣布无效。

同时，耶拉契奇利用匈牙利军官团和总参谋部——名义上是匈牙利的，实际上是前奥皇的——中的紊乱状况和叛变行为，乘

机推进到了施土尔威森堡^①。在这里，匈牙利军队虽然有许多指挥人员叛变，但是仍然击溃了耶拉契奇，并乘胜追入奥地利境内，直抵维也纳城下。奥皇和老卖国贼拉图尔决定派兵增援耶拉契奇，决心在德国和斯拉夫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征服匈牙利。可是10月6日维也纳革命爆发了，奥皇的计划暂时没有得逞。

科苏特立刻率领匈牙利军队去援助维也纳人。但是由于维也纳国会不坚决和他手下的军官们的叛变，以及他这支大部分由民团编成的军队组织不佳，使他停滞在莱达河附近，无法疾速前进。在那里他不得已逮捕了一两百名军官，将他们押回佩斯，还枪决了其中的一些人。在这以后，他才决定转入进攻。可是已经迟了：维也纳已经陷落，匈牙利的未受过训练的民团也在施韦哈特附近被奥地利的正规军击退。

奥皇军队与匈牙利军队之间六个星期没有发生军事行动。当双方军队都在竭力加强自己兵力的时候，奥里缪茨的权奸实行了蓄谋已久的政变。他们迫使因向革命让步而危及自己地位并已毫无用处的白痴斐迪南退位，然后让他们的工具——索菲娅的儿子，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登上了皇位。佩斯议会根据匈牙利的宪法，不承认这次皇位更迭。

在12月中旬，军事行动终于又开始了。在这以前，奥皇军队几乎已包围了匈牙利。现在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动进攻。

最高统帅文迪施格雷茨亲自率领至少有九万人的三个军，从奥地利出发向多瑙河以南推进。努根特率领将近两万人从施梯里亚沿德拉瓦河左岸前进，达伦率领一万人从克罗地亚沿德拉瓦河

^① 匈牙利称作：塞克希费黑伐尔。——编者注

右岸向巴纳特前进。已经在巴纳特作战的，有几个边屯团、泰梅希瓦拉^①的警备部队、克尼查宁的塞尔维亚民团和塞尔维亚辅助军，共计有三四万人，由泰奥多罗维奇和卢卡文纳指挥。在特兰西瓦尼亚，驻有普赫纳所率领的两万至两万五千人以及由布柯维纳侵入的马尔科夫斯基所率领的一万至一万五千人。最后，施利克率领两万至两万五千人，从加里西亚向蒂萨河上游进攻。

可见，奥皇军队至少有二十万，其中大部分都是参加过战斗的，而曾经在南方和特兰西瓦尼亚参加过战斗的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萨克森的民团和国民自卫军还没有计算在内。

匈牙利能用来同这支强大兵力对抗的大概总共只有八九万受过训练的部队，其中有两万四千人曾在奥皇军队中服过役，此外有五六万是组织得最差的匈牙利志愿兵和民兵，并且这支军队的指挥官大部分都像科苏特在莱达所逮捕的军官们一样，是一些叛徒。

但是，在受暴力镇压的奥地利目前已无法再多征到一名新兵了，奥地利在财政方面已经破产，几乎没有钱了，而匈牙利人却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匈牙利人由于民族自豪感而更加强烈起来的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热忱，一天比一天高涨，他们为科苏特提供的志愿兵，其数目之多，对于一个五百万人的小民族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匈牙利的印刷机为科苏特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货币来源，每一个匈牙利人都把这些国家发行的纸币当作硬银币使用。制造枪炮的工厂都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军队所缺少的，只是武器、经验和优秀的指挥官，这一切必须在几个月之内准备出来。因此，问题只是在于争取时间，诱使奥皇军队深入腹地，在那里它会被不

^① 罗马尼亚称作：提米希瓦拉。——编者注

断的游击战拖得精疲力尽，并且由于必须在自己的后方留下强大的警备部队及其他部队而遭到削弱。

这也就是匈牙利人采取下面计划的原因：慢慢退到腹地，在经常的小战斗中训练新兵、在万不得已时，就在自己和敌军之间沿蒂萨河设防，这里遍布着难以通行的沼泽，这是围绕匈牙利国土核心地带的天然屏障。

根据一切推测，即使奥军有优势兵力，匈牙利人也可以在普勒斯堡^①和佩斯之间的地区坚守两三个月。但是严寒已经到来了，所有的江河和沼泽有好几个月要冻结，其冰层之厚甚至连重炮也能通过。这就使得一切有利于防御的地形条件都丧失了；匈牙利人构筑的一切防御工事都变成无用之物，并且有被包抄的危险。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二十天功夫，匈牙利军队就由艾登堡^②和普勒斯堡败退到腊布^③，由腊布退到莫尔，又由莫尔退到佩斯，甚至于被迫退出了佩斯，实际上在战役一开始时就已经退到蒂萨河东岸去了。

其余几个军也遭到了与主力军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努根特和达伦对匈牙利人所占据的埃塞格^④不断加强攻势，塞尔维亚人也越来越逼近马罗什河防线。在特兰西瓦尼亚，普赫纳在马罗什瓦沙尔希耳^⑤附近同马尔科夫斯基会师。在北方，施利克由喀尔巴阡山推进到了蒂萨河边，并越过密什科尔茨同文迪施格雷茨建立

① 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

② 匈牙利称作：肖普朗。——编者注

③ 匈牙利称作：迪厄尔。——编者注

④ 塞尔维亚称作：沃锡耶克。——编者注

⑤ 罗马尼亚称作：特尔古-木雷希。——编者注

了联系。

看来奥军差不多要扑灭匈牙利的革命了。三分之二的匈牙利和四分之三的特兰西瓦尼亚成了奥军的后方，而匈牙利人在正面、两翼和后方同时受到了打击。再前进若干德里，奥皇各军就会速结成一个愈来愈小的包围圈，而匈牙利在这个包围圈里会像让巨蟒缠住一样，被窒息而死。

现在的任务是，当蒂萨河阵地暂时还是敌人从正面无法逾越的障碍的时候，从各方面来改善自己的阵势。

这一点已从两方面作了：在特兰西瓦尼亚是由贝姆作的，在斯洛伐克是由戈尔盖作的。他们两人都进行了机动，这些机动表明了他们是当代最有天才的统帅。

贝姆于12月29日到达克劳森堡^①，这是特兰西瓦尼亚境内还留在匈牙利人手中的唯一据点。他在这里迅速集中了自己所率领的增援部队以及被击溃的匈牙利军队和塞克列人³⁵²的军队的残部，向马罗什瓦沙尔希耳进攻，击溃了奥军，驱逐了马尔科夫斯基，先是越过喀尔巴阡山，把他赶到布柯维纳，又由那里赶到加里西亚，一直赶到斯塔尼斯拉夫。然后，他迅速地折回特兰西瓦尼亚，开始追击在退却中停留在距海尔曼施塔特前面几德里路地方的普赫纳。经过几次小战斗和向各个方向疾进以后，除了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塔得^②两个城市以外，整个特兰西瓦尼亚都落到了贝姆手中。如果不是引进俄军的话，这两个城市也被攻下来了。对方由于一万名俄国辅助部队的增援而占了优势，才迫使贝姆退到塞克列人的地区。在那里他着手组织塞克列人的起义，当

① 罗马尼亚称作：克罗什。——编者注

② 罗马尼亚称作：锡比乌和布拉索。——编者注

他成功以后，他就让推进到舍斯堡^①的普赫纳去同塞克列民团周旋，自己则绕过普赫纳的阵地，直取海尔曼施塔特，赶走了俄军，击溃了跟踪而来的普赫纳，然后向喀琅施塔得推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喀琅施塔得。

这样就夺取了特兰西瓦尼亚，并解放了匈牙利军队的后方。由蒂萨河所构成的天然防线，现在又有了由齐普斯到巴纳特边界的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作为自己的延续和补充。

与此同时，戈尔盖在匈牙利的西北部进行了同样的胜利进军。他率领一个军由佩斯突围到斯洛伐克后，在两个月当中使从三面向他攻击的圭茨、乔里奇和西姆尼奇三个将军的一个军胆战心惊。当他能面对着敌人的优势兵力无法扼守自己的阵地时，他就冲过喀尔巴阡山，到了埃佩尔耶什和卡绍^②。他在这里绕到了施利克的后方，迫使施利克迅速放弃自己的阵地和整个作战基地，向文迪施格雷茨的主力军方面退却。戈尔盖则沿着赫尔纳德河向蒂萨河进发，与匈牙利的主力军会合了。

这支现在由邓宾斯基指挥的主力军也渡过了蒂萨河，全线击退了敌军，并推进到了离佩斯六德里的霍特房。但是敌人在这里集中了强大的兵力，这又迫使匈牙利军队退却。匈牙利军队经过在卡波尔诺、马格拉尔和波罗斯洛附近的激烈防御战以后，再次退过蒂萨河，这时戈尔盖也正好接近蒂萨河边的托卡依。这两个军的会合，成了匈牙利人再次发动强大攻势的信号。从后方开来了刚训练出来的新兵——匈牙利作战部队的援兵。编成了几个波

① 罗马尼亚称作：锡吉希瓦腊。——编者注

② 斯洛伐克称作：普列绍夫和科什泽。——编者注

兰军和德国军，培养和招收了一批有才干的指挥官；突然间，与奥皇军队相对垒的，已不是12月作战时那种缺乏领导的和缺乏组织的乌合之众，而是集中的、勇敢的、众多的、组织得很好并且有卓越指挥的军队了。

匈牙利军队分三个军渡过了蒂萨河。右翼（戈尔盖）向北面推进，在埃佩尔耶什附近迂回以前追击自己的朗堡师，并迅速把它赶到里马索姆巴特^①那边的奥皇主力军方面去了。奥皇主力军在埃尔劳^②、迪恩迪厄希、格德勒和霍特房附近被邓宾斯基所击溃，并仓卒地退向佩斯。最后，左翼（费特尔）把耶拉契奇逐出克奇克梅特、索允诺克和策格列德后，就在亚斯贝雷尼附近将其击溃，迫使他也向佩斯城退却。在这里，奥皇军队沿多瑙河配置在由佩斯到瓦岑^③一线，而马扎尔人则对它构成了很大的半包围圈。

为了使佩斯不遭到布达方面的炮击，匈牙利人采取了他们行之有效的办法——多用机动，少用正面硬攻来把奥军赶出阵地。戈尔盖攻克了瓦岑，并把奥军击退到了赫兰河和多瑙河以西，在赫兰河和诺伊特腊河^④之间击溃了沃尔格穆特，从而解救了被奥皇军队包围的科莫恩^⑤。奥皇军队由于退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仓卒撤退。新任总司令韦尔登已向腊布和普勒斯堡方面退却，而耶拉契奇为了安定他手下的极端顽固的克罗地亚人，不得不仓卒地率领他们顺多瑙河而下，退往斯拉窝尼亚。

① 斯洛伐克称作：里马斯卡-索博塔。——编者注

② 匈牙利称作：埃格尔。——编者注

③ 匈牙利称作：伐茨。——编者注

④ 斯洛伐克称作：赫朗和尼特腊。——编者注

⑤ 匈牙利称作：科马罗姆。——编者注

在与其说是退却，不如说是窜逃的过程中，韦尔登（特别是在施利克指挥下的后卫部队）和耶拉契奇还遭到了一系列的惨败。当耶拉契奇军缓慢而吃力地冲过托耳诺和博罗尼约两州的时候，韦尔登得到了在普勒斯堡收集残部的机会，这些残部已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了。

与匈牙利人对奥地利主力军获得这些惊人胜利的同时，摩里茨·佩尔采尔由塞格丁^①和托耳诺向彼得瓦尔登^②推进，解除对它的围困，占领了巴奇卡，攻入了巴纳特，以便在这里同由特兰西瓦尼亚向前推进的贝姆会师。贝姆已经攻克了阿腊德，包围了泰梅希瓦拉。佩尔采尔配置在紧靠土耳其边界的韦尔舍茨^③，所以巴纳特在几天之内就被攻占了。在这同时，塞克列人掩护着特兰西瓦尼亚各个设防的山口，民团则掩护着上匈牙利的各个山口，而戈尔盖率领大军驻守在通往莫拉维亚-加里西亚的雅布龙卡山口。

总而言之，再过几天，无往不胜的马扎尔军队就会驱赶着强大的奥军的残部，胜利地进入维也纳，并且永远消灭奥地利君主制度。

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分离，早于4月14日在德布勒森就决定了。与波兰人的联盟，在1月中旬也已公开宣布，并且由于有两三万波兰人参加匈牙利军队而成了现实。从10月6日维也纳革命和施韦哈特会战时起即已存在的与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的联盟，也因德意志军团参加匈牙利军队、和当时的战略形势与政治形势而保持住了，当时的形势迫使马扎尔人必须攻占维也纳，使奥地利

① 匈牙利称作：塞格得。——编者注

② 塞尔维亚称作：彼得罗瓦拉丁。——编者注

③ 塞尔维亚称作：伐尔夏茨。——编者注

革命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所宣布的独立得到承认。

这样，匈牙利战争很快就失去了它最初所具有的民族性质，正因为它的看起来是纯粹民族的行动，正因为宣布独立，这次战争才具有了真正全欧的性质。为了两国的解放而与波兰成立的联盟，为了德国东部的革命化而与德国人成立的联盟，只有在匈牙利与奥地利分离、从而宣告奥地利君主制度解体的时候，才固定下来，并获得坚固的基础。匈牙利独立、波兰复兴、德意志奥地利成为德国的革命中心、伦巴第和意大利取得独立，——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现，那末整个东欧国家的体系就会完全瓦解：奥地利会消失，普鲁士会被融化，而俄国会被排挤到亚洲边界。

所以神圣同盟一定要竭尽全力来堵塞具有威胁性的东欧革命的道路。俄国军队已逼近特兰西瓦尼亚和加里西亚的边境。普鲁士已占领波希米亚-西里西亚的边境，并让俄军通过自己的领土进入普雷劳^①，几天之后，俄国的第一个军就驻扎在莫拉维亚的领土上了。

匈牙利人清楚地知道，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将要对付人数众多的新开到的军队，因此没有像最初所预期的那样迅速地向维也纳推进。维也纳也像佩斯一样，他们如果不对市区进行炮击，是不能用正面攻击攻克的，可是炮击又没有可能。像在佩斯一样，他们又要被迫采取迂回运动，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确信自己的两翼和后方不受威胁。可是恰好这时他们后方受到俄军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直取维也纳，预料将受到拉德茨基部队猛烈的攻击。

因此，匈牙利人这样做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不急于进攻维也

^① 捷克称作：佩尔热罗夫。——编者注

纳，而只是加紧肃清匈牙利境内的奥皇军队，从小喀尔巴阡山到施梯里亚的阿尔卑斯山脉坡地构成一个很大的弧形来包围奥皇军队，派出一个加强军把守住雅布龙卡，在加里西亚各山口上构筑了工事，封锁了这些山口，扩大了对布达的攻势并且迅速征集了二十五万新兵（特别是在新占领的西方各州中）。他们这样做，就保证了两翼和后方的安全，并且建立了军队，这种军队不会害怕逼近的俄国援兵，就像以前不害怕那么庞大的奥皇军队一样。这支著名的黑黄军队^①进入匈牙利的时候是二十万人，而回去的时候恐怕还不到五万人；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被俘的被俘，或者投到匈牙利人方面去了。

不错，俄国人会派出更庞大的军队：预期将调来十二万人，而据另一些消息说，将调来十七万人。根据“的里雅斯特自由港”的报道，野战军队远远超过五十万人。但是俄国人好夸大是众所周知的：在所举出的数字中通常只有一半列在花名册上，而被列在军册上的人数真正在队伍中的又不到一半。如果除了占领波兰所必需的军队之外，俄国援军的实际人数能有六七万人的话，奥地利就很满意了。而这样一个数目，匈牙利人是能对付得了的。

1849年的匈牙利战争与1830—1831年的波兰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前者与后者不同之处，就在于当时对波兰人不利的一切情况，现在都对匈牙利人有利。大家知道，列列韦尔当时曾坚持下面两点而没有成功：第一，要以解放农民和犹太人的办法来使居民群众依附革命，第二，要以在整个旧波兰发动起义的办法

^① 指奥皇军队，因为他们的兵士的领章、衣领和折袖都是黑黄两色的，所以称为“黑黄军队”。——译者注

来使参加瓜分波兰的三个强国卷入战争，并使战争成为欧洲的战斗。当时在波兰实行得太迟的事情，匈牙利人一开始就做了。国内社会关系的革命，消灭封建制度是匈牙利的第一个措施。吸引波兰和德国参战是第二个措施，从而使欧洲战争成了事实。随着俄国的第一个军踏上德国领土，欧洲战争就开始了，而随着法国的第一个营进入德国的领土，这个战争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就要到来。

正是由于匈牙利战争成了欧洲战争，它就同欧洲运动的其余一切因素相互作用。它的进程不仅影响着德国，而且也影响着法国和英国。决不能期望英国资产阶级会容忍俄国把奥地利变为它的一个省。同样毫无疑问，法国人民看到反革命日益逼近法国边境，也不会置之不理。不管法国的选举结果如何，军队都会赞成革命。而目前，问题决定于军队。如果军队希望战争，——而军队是希望战争的，——那末战争就会发生。

战争就要爆发。巴黎革命行将到来——不管这是由于选举的结果，还是由于已经发生的军队同革命政党在选举投票箱旁举行了联欢的结果。在未来的德国革命军队的核心正在南德意志形成，因而妨碍普鲁士积极参加匈牙利战争的时候，法国正在准备积极参与斗争。问题将在几个星期之内，也许将在几天之内决定。不久之后，法国的、匈牙利—波兰的和德国的革命军队就要在柏林城下的战场上庆祝自己的友好节日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5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俄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

译自“新莱茵报”

第 301 号

“告我的人民”

科伦 5 月 18 日。“告我的人民！”不是“我的英勇军队！”俄国人真的被击败了吗？难道风向变了，又像去年 3 月那样把“未被削弱的”俄国奴仆头上的军帽吹掉了吗？难道处于戒严状态中的“顺民”的总起义又爆发了吗？

1813 年，“已长眠地下的”老头儿^①也从哥萨克的推进中吸取了足够的勇气，来结束他所扮演的可怜的懦夫角色以及对革命帝国的血腥惩罚；那时尽管有哥萨克、巴什基里亚人和由于耶拿和马格德堡两次战役以及尤斯特林举城向一百五十个法国人投降事件³⁵³而闻名的“英勇军队”，然而，只是由于“告我的人民书”许下的虚伪诺言，才使神圣同盟反对法国革命继承者的十字军征讨成为可能。而现在呢？难道哥萨克侵入德国领土没有使恢复了元气的霍亨索伦增加勇气来拒绝他在三月战斗以后所扮演的懦夫角色，来废除革命“在他和他的人民之间”所放置的那“一块纸片”吗？难道“我的英勇军队”没有在德勒斯顿、布勒斯劳、波兹南、柏林和莱茵河流域勇敢地用榴霰弹和硝酸银残杀手无寸铁的人们、妇女和儿童，以此来向革命进行报复吗？

难道不久前钦定的军法宪章不是“甚至不用戒严”就把 3 月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间作出的最后一些胆怯的让步——废除书报检查、结社自由和武装人民——重新取消了吗？

不，尽管有了同哥萨克的联盟，尽管授予了横行霸道的“英勇”兵痞进行屠杀和设立战地法庭的特权，但是，耶拿和马格德堡的英雄的儿子仍然感到不够安全。未被削弱的国王非常恐惧，他下诏“告我的人民”，他“感到不得不”还要向被蹂躏的、备尝戒严之苦的和遭到霰弹射击的“人民”呼吁，请他们支持王室反抗“国内外敌人”。

“值此严重关头，普鲁士所负之使命乃在保卫德意志，使之免遭国内外敌人之侵袭。为此，我今晓谕万民枕戈以待。事关我国以及有赖我国援助之余德意志诸邦秩序之恢复与法纪之整饬。事关建立德意志之统一，捍卫其自由，以防奸党之恐怖统治，该党为谋一己之私利，不惜置道德、荣誉、忠诚于不顾，并已使部分国民堕入其谎言与欺骗之迷网。”

“圣谕的实质即在于此”，——警察局恶棍杜蒙这样叫喊道。的确，警察局收买的杜蒙的捧场者找到了真正的“实质”。

“国外的敌人”！对于勇敢的霍亨索伦说来，这是“恐怖党”，阴森可怕的党^①，它使得我们有必要侵入“其余德意志诸邦”。莱茵省、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人民被号召“为了德意志的统一”，结束其他德意志诸邦，如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等的革命运动！为此目的，霍亨索伦在1813年恩赐给人民的诱饵又重新抛出来了，经过考验的“皇上的金口玉言”又被当作可靠保证，向“国民”允诺了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有名无实的承认，以及保障权利和自由不受“无神论者”的侵犯。“我与朝廷愿效命上帝。”难道作为保证

^① 俏皮话，德文原文是：《Schreckenspartei》（“恐怖党”）和《Partei des Schreckens》（“阴森可怕的党”）。——编者注

的经过考验的“霍亨索伦皇上的金口玉言”不值得进行一次十字军征讨来反对那个“对于大有希望的国王说来阴森可怕的党”吗？

俄国皇帝的强大藩臣把普鲁士代表从法兰克福召回，只是为了在现在按照自己的三月诺言“称霸德意志”。协商议会和钦定议院被驱散了，“一块纸片”为军法宪法和刽子手的军事法庭所代替了，这一切只是为了保证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保障”！

出版自由遭到践踏，在爱尔福特报刊受到**检查**，在整个波兹南、布勒斯劳以及西里西亚各个省会报纸干脆被查封了，就像“国民报”在柏林被查封一样。在杜塞尔多夫 *de jure*（在法律上）重新实施书报检查，*de facto*（实际上）报刊已完全被取缔了（杜塞尔多夫各报纸、“新莱茵报”，等等）。最后钦赐给“自由”臣民的只有卑鄙无耻的作为警察局爪牙的“科伦日报”和柏林的该受绞刑者的小报^①。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们不致对“皇上的金口玉言”的价值产生丝毫怀疑！

的确，霍亨索伦的话值得黎民百姓为了加强国王的勇气去穿上军装，值得独守空房的妻子根据后备军法按月领取皇上恩赐的一个塔勒，“以免贫困”。

写于 1849 年 5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俄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
第 301 号

译自“新莱茵报”

① 指“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编者注

致科伦工人

在临别前，我们提醒你们不要在科伦进行任何变乱。在科伦军事管制状态下，你们会遭到悲惨失败的。从爱北斐特的例子中你们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怎样要工人去赴汤蹈火，然后又极其卑鄙地出卖他们。科伦宣布戒严会使整个莱茵省精神沮丧，而目前你们只要一起义，戒严就会成为必然结果。你们的平静会使普鲁士人感到绝望。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莱茵报”编辑部

写于 1849 年 5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俄文

载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
第 301 号

译自“新莱茵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文章和文件

1849年5月31—7月

致“法兰克福报”编辑部

致“法兰克福报”编辑部

请求尊敬的“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在贵报显著地位用大号字刊登以下的声明；如果这只能按照收费广告的条件办理，那末请把相应的钱数记在“新德意志报”³⁵⁴编辑部·魏德迈的账下。

卡尔·马克思博士

5月31日于宾根

声 明

“新莱茵报”编辑部认为自己有责任通知自己的通讯员和公众，以“西德意志报”³⁵⁵名义在科伦出版的一家小报跟它毫无关系。下面署名的编辑部同人保留单另通知“新莱茵报”将在何时何地复刊的权利。

“新莱茵报”编辑部

卡尔·马克思 恩斯特·德朗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格奥尔格·维尔特 斐·沃尔弗
威·沃尔弗

卡尔·马克思写于1849年5月31日
声明载于1849年6月2日和7日
“新德意志报”第129和133号，
及1849年6月3日“新科伦报”
第126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弗·恩格斯

* 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³⁵⁶

凯则尔斯劳顿 6 月 2 日。德国的反革命报纸千方百计地诽谤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它们毫不害臊地硬说全部起义的目的只不过是“要把普法尔茨、巴登并且间接地把整个德国‘出卖给法国人’”。他们极力想用这种办法恢复从所谓美好的古老时代就开始了的对法国人的反革命仇恨，并且指望这样会使我们的德国北部和西部的德国兄弟离开我们。但是，不知为什么，恰好那些责难普法尔茨和巴登把自己出卖给法国的极其肮脏、虚伪的小报却拥护俄国干涉匈牙利，拥护俄国军队通过普鲁士，甚至拥护俄奥普之间的新神圣同盟。我们不妨举其中的一家报纸——“科伦日报”来作证明。

总之，如果为了扼杀匈牙利的自由，俄国人踏上德国的土地，踏上普鲁士的土地，那不是叛国！如果普鲁士国王同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结成同盟，来用哥萨克的马蹄践踏德国自由的最后残余，那不是叛国！如果我们大家，如果从尼门河到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德国被胆怯的暴君出卖给俄国的沙皇，那不是叛国！但是，如果普法尔茨博得法国人民，特别是亚尔萨斯人民的同情，如果它不以愚蠢的自满心推开这种同情的表现，如果它派人去巴黎了解法国的情绪，了解法兰西共和国政治中即将发生的新转变³⁵⁷——那当然就是背

叛祖国，就是叛国，就意味着把德国出卖给法国，出卖给“世世代代的敌人”、“帝国的敌人”！反革命的报纸就是这样议论的。

是的，“天赋的”可尊敬的先生们，普法尔茨和巴登正是采取了这种行动，并且它们丝毫不为自己的行动感到羞愧。是的，如果这是叛国，那末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全体居民就是由二百五十万国事犯组成的。的确，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人民不是为了在自由西方和专制东方之间即将开始的伟大斗争中站在暴君一边而进行了革命。普法尔茨的人民和巴登的人民进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卑鄙地扼杀自由的同谋者，——奥地利、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最近几个月来极其可耻地沾染了这种污点，——是因为他们不容许使他们也成为奴役自己兄弟的工具。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军队无条件地参加了这个运动；它拒绝了对背信弃义的君主的誓言，像一个人一样转到了人民方面。无论公民或士兵都不愿意同克罗地亚人和哥萨克人一道去反对自由。如果奥里缪茨、柏林和慕尼黑的暴君们还能找到如此堕落的士兵，他们竟愿意把自己同巴什基里亚人、潘都尔兵、克罗地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匪徒相提并论，并且跟这一帮野蛮人在同一面旗帜下作战的话，——那会更糟。不管这对我们如何沉痛，我们将不把这些雇佣兵看作是我们德国的兄弟，而把他们看作是哥萨克和巴什基里亚人，我们不管他们的首领是卖国贼——过去的帝国陆军大臣³⁵⁸。

况且在目前，当欧洲的战斗、人民的战争正在叩门的时候，谈什么“叛国”及其他像是蛊惑家的攻击的那种责难，根本是可笑的。过几个星期，也许只要过几天，共和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的军队就要在德国的土地上进行决战。人家甚至不要征求德国对这点的同意，——请看君主们和资产阶级已使德国落到什么地步！德国不

积极参加战争，战争将不顾它的意志，不容它进行任何反抗而降临到它的身上。多亏三月的执政者、三月的议院，同样多亏三月的国民议会，德国才在即将来临的欧洲战争中处于这种光荣地位。当问题关系到整个欧洲的自由或奴役，幸福或灾难的时候，就根本谈不到德国的利益、德国的自由、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福利。所有一切本民族的问题都在这里告终，这里只有一个问题！你是想做自由人，还是愿意忍受俄国的蹂躏？而反革命报纸还在议论什么“叛国”，仿佛很快就被变成两军争战的消极舞台的德国，还可能用某种方式出卖似的！无庸争辩，去年的情况不同。在去年，德国人能够进行反对俄国压迫的斗争，他们能够解放波兰人，从而把战争转移到俄国的领土上去，靠牺牲俄国的利益来作战。但是现在，多亏我们的君主，战争将在我们的土地上并且靠牺牲我们的利益来进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欧洲的解放战争对德国来说同时又将是国内战争，德国人将在这次战争中自相残杀。

这就是我们君主们的叛卖行为和我们人民代表们的软弱无能所给予我们的恩典，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叛国的话，那末这就是叛国！简言之，在正弥漫全欧的伟大解放战争中，普法尔茨和巴登将站在自由一边反对奴役，站在革命一边反对反革命，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君主，站在革命的法国、匈牙利和德国一边反对专制的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如果“抱怨派”先生们要把这叫做叛国的话，那末在全普法尔茨和全巴登，谁也不会理睬他们的号叫。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6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9 年 6 月 3 日“城乡信使”报
第 110 号

俄文译自“城乡信使”报

卡·马克思 六月十三日

6月21日于巴黎

你们对巴黎的居民很了解，可以 a priori（预先）识破那种说他们怯懦的臭名昭著的责难，认为这是滑稽可笑的。但是我知道，六月十三日事件看起来是根本无法解释的，尤其在德国是如此，必然有人会利用它来编造形形色色的恶毒谰言。

六月十三日的主要当事人并不是人民，而是“山岳党”³⁵⁹。可是，“山岳党”背后又有秘密委员会³⁶⁰为之撑腰，这个委员会推动“山岳党”前进，并在某种程度上使赖德律-罗兰扮演了主角。

“山岳党”的主要错误在于它这样满怀着胜利的信心，以致希望通过和平的游行示威来获得一切。这样一来，它便使政府有可能不与它作战就赢得对它的胜利。从沙托·得奥街出发通过各条林荫路的游行队伍完全是赤手空拳的。政府通过密探完全获悉一切详细情况，便秘密令国民自卫军、温先猎兵以及其他各部队悄悄地占领了所有重要据点。游行队伍陷入了重重包围，当时即使他们手持武器，也无法作任何反抗。何况他们都是赤手空拳！预先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的尚加尔涅，非常聪明，没有下令鸣警报。好像按照魔棍的指示一样，全部有决定意义的据点一下子都被军队占领了。由此你们一定明白，赤手空拳的群众便分散到四面八方去找武器；

卡·马克思 六月十三日

6月21日于巴黎

你们对巴黎的居民很了解，可以 a priori（预先）识破那种说他们怯懦的臭名昭著的责难，认为这是滑稽可笑的。但是我知道，六月十三日事件看起来是根本无法解释的，尤其在德国是如此，必然有人会利用它来编造形形色色的恶毒谰言。

六月十三日的主要当事人并不是人民，而是“山岳党”³⁵⁹。可是，“山岳党”背后又有秘密委员会³⁶⁰为之撑腰，这个委员会推动“山岳党”前进，并在某种程度上使赖德律-罗兰扮演了主角。

“山岳党”的主要错误在于它这样满怀着胜利的信心，以致希望通过和平的游行示威来获得一切。这样一来，它便使政府有可能不与它作战就赢得对它的胜利。从沙托·得奥街出发通过各条林荫路的游行队伍完全是赤手空拳的。政府通过密探完全获悉一切详细情况，便秘密令国民自卫军、温先猎兵以及其他各部队悄悄地占领了所有重要据点。游行队伍陷入了重重包围，当时即使他们手持武器，也无法作任何反抗。何况他们都是赤手空拳！预先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的尚加尔涅，非常聪明，没有下令鸣警报。好像按照魔棍的指示一样，全部有决定意义的据点一下子都被军队占领了。由此你们一定明白，赤手空拳的群众便分散到四面八方去找武器；

一种报复。那时“山岳党”抛弃了无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抛弃了“山岳党”。

不管六月十三日这一天对我们在全欧洲的党来说多么沉痛，这一天还是有积极的东西，即国民议会的反革命政党没有流很多的血（如果撇开里昂³⁶⁴不算的话）就达到了**独裁**。这个政党不仅将分裂成各个组成部分，而且它的极端派很快就会达到这种状况，即它本身将力图摆脱累赘的共和国外表，那时，你们就会看到，**只要轻轻地吹一股风就会把它一扫而光，二月又会重新到来，不过将具有更大的威力。**

卡·马克思写于 1849 年 6 月 21 日

载于 1849 年 6 月 29 日“人民之友”报
第 26 号

署名：卡·马一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之友”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
1955 年“历史问题”杂志
第 11 期

卡·马克思 致“新闻报”编辑

您在7月26日的“新闻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我来到巴黎的短评，接着其他各家报纸又逐句地转载了它。由于这篇文章对一些事实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我不得不写几句话予以回答。

首先，归我所有 365 并由我担任主编的“新莱茵报”从来没有被封闭过。它由于戒严而停刊了五天。戒严一解除，该报就重新出版，并在以后七个月内继续出版。普鲁士政府看到不可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封闭该报，于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手段——排除它的所有人，即禁止我在普鲁士居留。关于这一措施是否合法的问题，将由马上就要召开会议的普鲁士众议院予以解决。

我被禁止在普鲁士居留以后，起初到了黑森大公国，在那里也和在德国其余各地一样，我并没有被禁止居留。我来到了巴黎，但决不是如贵报所断定的那样作为流亡者而来的，而是完全自愿来的，我手头有完全有效的护照，并且所抱的唯一目的是为我在五年前就已动笔编写的一部政治经济学史再多收集一些材料。

我也没有接到**立即**离开巴黎的命令；我有时间来向内政部长提出抗议。我已提出这个抗议，并在等待它的结果³⁶⁶。

此致敬礼

卡·马克思博士

写于1849年7月27日左右
载于1849年7月30日“新闻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的手稿“工资”的第一页

卡·马克思
工 资³⁶⁷

[A]

下列各点已经阐明：

(1) 工资= 商品的价格。

因此，工资的确定大体上是与一般的价格的确定相一致的。

人的活动= 商品。

生命的表现——生命活动——只是手段；与这种活动分开的生存才是目的。

(2) 和商品一样，工资是由竞争决定的，是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

(3) 供应本身取决于生产费用，即取决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4) 利润和工资成反比。其经济生活表现在利润和工资中的两个阶级的对立。

(5) 争取提高或降低工资的斗争。工人的联合。

(6) 劳动的平均价格或正常价格(最低工资)只是对工人阶级而不是对个别工人发生效力的。工人们为保持工资而联合起来。

(7) 取消赋税和保护关税，缩减军队等对工资的影响。平均确定的最低工资= 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

[B]

补 充

I. 阿特金森

1. Handloomweavers (在手织机上工作的纺织工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时。)(这种工人有五十万。)³⁶⁸

“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状态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容易学会,而且常有被较便宜的生产资料所排挤的危险。在供应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需求的暂时缩减就要引起危机。一个劳动部门变得无用而另一个劳动部门又随之产生,这种情况会招致暂时的苦难。以印度达卡地区的手工织工为例: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他们不是饿死,便是被迫返回农业生产。”(摘自1835年7月包林博士在下院的演说。)³⁶⁹

(利用这个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转移的例子来与糟透了
的自由贸易论者论战。³⁷⁰)

2. 关于人口论再谈几句。

3. 分工的变化和更加细密对确定工资的影响。

II. 卡莱尔

1. 不仅应当考虑 wages (工资) 的数量。在质量方面它也发生变化,由意外的情况所决定。

2. 工资的优点是:只有必要性、利益、生意才把工人和雇主联结起来。已经丝毫没有像中世纪那种宗法制的东西了。

济贫法,消灭鼠患, chargeable labourers³⁷¹。

3. 绝大部分劳动不是 skilled labour (熟练劳动)。

4. 马尔萨斯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们的全部理论归纳起来是：工人节制生育，就能缩减需求。

III. 麦克库洛赫

“工人所挣得的日工资，等于叫做人的机器的所有主所获得的普通利润量，这里还包括为了 to replace the wear and tear of the machines (补偿机器的损耗)，也就是为了以新工人代替老工人和已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所必需的款额。”³⁷²

IV. 约翰·威德

1. “如果目的是要使工人成为能够在该项工作中提供最大量劳动的机器，那末，更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分工了。”³⁷³

2. 工资的降低就使得工人不是减少自己的开支，便是提高自己劳动的生产率，例如，在使用机器的工厂中（一般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要工作更多的时数，或者——手工业者、手工织工等——在同一小时内要生产更多的东西。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工资降低了，因为需求缩减了，所以他们是在不利的时刻增加供应量。结果工资更加降低，而资产者随后赶来说道：“要是只这些人希望工作才好呢！”

3. 一般说来，不能有两种市场价格，正是更低的市场价格（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占上风，这是普遍规律。

假定有一千个同样熟练的工人；五十个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不是由九百五十个在业者决定，而是由五十个失业者决定的。

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对劳动这一商品比其他商品的影

响更加厉害,因为工人不能把自己的商品储藏在仓库里,只能出卖自己的生命活动,否则,就要因失去生活资料而死亡。

劳动这一出卖的商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地方,特别在于:它具有**暂时的性质**,不能把它**蓄积起来**,它的**供应**不能像其他产品那样容易增加或减少。

4.资本家的人道就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尽可能多的劳动。农业工人夏季比冬季收入多,虽然冬季他们需要更多的食物和燃料,需要更暖和的衣服。

5.例如,取消**星期日**对工人来说,纯粹是损失。雇主们竭力这样来降低工资:他们保持工资的名义数额,却强迫工人多劳动比如十五分钟,缩短吃午饭的时间等等。

6.工资由时尚、季节的更换和商业行情的波动来决定。³⁷⁴

7.如果一个被机器排挤出去的工人转到别的劳动部门去,那末这照例是**更坏**的部门。他永远也不能恢复自己以前的那种状况了。

机器和分工以更低廉的劳动代替高价的劳动。

有人向工人建议:

(1)开办储蓄银行;(2)尽可能学会各种劳动(这样一来,在一个劳动部门中出现工人供应过剩现象,就会立即波及一切部门)。

8.在萧条时期:

(a)停止工作;(b)降低工资;(c)每周的工作日减少,工资照旧³⁷⁵。

9.关于 combinations of trade (工会组织),应该指出:

(1)工人的开支(费用)。由于联合的结果而有有机器的发明。另一种分工。降低工资。工厂往别的地区 Déplacement (迁移)。

(2) 如果他们全都做到使工资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以致使利润降低到大大低于别国的平均利润以下或者使资本增长较慢，那末，一国的工业就要破产，而工人就要和雇主一起破产，甚至更坏。

虽然降低某种赋税不能使工人得到任何好处，可是增加赋税却损害工人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发达的国家中，赋税增加的好的方面在于：小农和小私有者（手工业者等）会因此而纷纷破产，并被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

爱尔兰人在英国，德国人在亚尔萨斯对工资的影响。

V. 拜比吉

Trucksystem³⁷⁶ .

VI. 安得鲁·尤尔³⁷⁷

现代工业的普遍原则：以童工代替成年工，以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以女工代替男工。

工资平均化。现代工业的主要特征。

VII. 罗西³⁷⁸

罗西先生认为：

工厂主预先支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所应得的那部分产品，因为工人不能等到产品出卖。这是一种投机，直接跟生产过程没有

任何关系。如果工人自己能把自己养活到产品卖出的时候，那末他作为 associé (股东) 也将得到自己的一份。

所以，工资同资本和土地不一样，它不是产品的构成部分。它只不过是社会状态的一种偶然标志，一种形式。工资不包含在资本之内。

工资不是生产所绝对必需的要素。在另一种劳动组织之下，它可能消失。

[VIII.] 舍尔比利埃

1. “生产资本的增加不一定会引起用于工人 *approvisionnement* (生活费) 的份额的增加。原料和机器的数量可能不断增加，而用于工人 *approvisionnement* 的份额则可能日益减少。

劳动的价格取决于：(a) 生产资本的绝对数量；(b) 资本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对比关系。这是工人的意志不能给予任何影响的两件社会事实。

2. 与其说是工人的**绝对消费量**，不如说是工人的**相对消费量**决定他的生活幸福或是不幸。在必要的消费的范围以外，我们享受的**价值实质上是相对的**。”³⁷⁹

在谈到工资的降低或提高的时候，永远也不应该忽视整个世界市场和各个国家工人的状况。

制定公平工资的平均主义的和其他的尝试。

最低工资本身也在变化并愈来愈降低。以烧酒为例。

[IX.] 布雷

储蓄银行³⁸⁰

掌握在专制制度和资本手中的一种有三重意义的工具。

1. 货币流回国家银行，银行再贷给资本家，赚取利润。
2. 政府套在工人阶级很大一部分人的脖子上的一条金锁链。
3. 此外，经过这种途径，资本家本人又掌握了一种新武器。

工资一旦降低，就永远不能再提高到原来的水平。绝对工资和相对工资。

[C]

1. 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资有什么影响？

(见 VI, 3.)^①

机器；分工。

劳动日益简单化。劳动的生产费用日益减少。劳动变得日益低廉。工人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关于这一点，包林博士自己1835年在议会里谈到印度达卡地区的手工织工。

工人被排挤出去而从事的新的劳动比以前的更坏；更具有从属性。成年工的劳动由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由女工的劳动代替，较熟练的工人的劳动由不大熟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

不是增加劳动时数，便是降低工资。

^① 见本卷第 649—654 页。——编者注

工人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一个人把自己卖得比另一个人便宜些，而且在于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

生产力提高的后果一般是：

(a) 工人的状况与资本家的状况相比，相对恶化，享受的价值也是相对的。要知道享受本身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的享受、关系、对比；

(b) 工人成为愈来愈片面的生产力，它要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熟练劳动愈来愈变成简单劳动；

(c) 工资愈来愈以世界市场为转移，而工人的状况也愈来愈不稳定；

(d) 在生产资本中，用于机器和原料的份额的增长要比用于工人 *approvisionnement* (生活费) 的份额的增长快得多。所以，生产资本的增加并不使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反地增加。

工资取决于：

(a) 生产资本总量；

(b) 生产资本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对比关系。

工人对前者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没有工资的波动，工人就不会从文明的发展中得到任何好处，他的状况就会始终不变。)

关于工人和机器的竞争应该指出，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例如手工棉织工人）比直接在工厂里做工的使用机器的工人更苦。

新生产力的任何发展同时也成为反对工人的武器。例如，交通工具的一切改进都加剧不同地区工人的竞争，使地方性竞争成为全国性竞争，等等。

一切商品都减价，而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却不减价，其结果便

是：工人穿上破衣烂衫，他的贫困蒙上文明的色彩。

II. 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竞争

(α) 为了确定相对工资，应该指出，一个塔勒对于工人和一个塔勒对于企业主有不同的价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贵的价格买更坏的东西。他的一个塔勒能买到的商品，不像企业主的一个塔勒所能买到的那样多，那样好。工人不得不成为**挥霍者**，违反一切经济原则来进行买卖。这里我们一般应该指出，我们所指的只是一个方面，即**工资本身**。可是，只要工人开始以自己的劳动价格交换其他商品，对他的剥削就又重新开始。

Epiciers (小店主)、当铺老板、房东——*tout le monde l'exploite encore une fois* (所有的人都要再一次地剥削他)。

(β) 企业主掌握着就业手段 [Bescä * 9] ftigungsmittel]，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资料，就是说，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降低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了。

(γ) 劳动这一商品与其他商品相比有很大的缺点。对于资本家来说，同工人竞争，只是利润问题，对工人来说，则是生存问题。

劳动这一商品有比其他商品**更暂时**的性质。它不能蓄积起来。它的**供应**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容易增加或减少。

(δ) 工厂管理制度。住宅立法。Trucksystem (实物工资制)，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主用提高商品价格而不改变名义工资的办法来欺骗工人。

III. 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

(a) 根据普遍的经济规律，不可能有**两种市场价格**。在一千个

是：工人穿上破衣烂衫，他的贫困蒙上文明的色彩。

II. 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竞争

(α) 为了确定相对工资，应该指出，一个塔勒对于工人和一个塔勒对于企业主有不同的价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贵的价格买更坏的东西。他的一个塔勒能买到的商品，不像企业主的一个塔勒所能买到的那样多，那样好。工人不得不成为**挥霍者**，违反一切经济原则来进行买卖。这里我们一般应该指出，我们所指的只是一个方面，即**工资本身**。可是，只要工人开始以自己的劳动价格交换其他商品，对他的剥削就又重新开始。

Epiciers (小店主)、当铺老板、房东——*tout le monde l'exploite encore une fois* (所有的人都要再一次地剥削他)。

(β) 企业主掌握着就业手段 [Bescä * 9] ftigungsmittel]，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资料，就是说，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降低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了。

(γ) 劳动这一商品与其他商品相比有很大的缺点。对于资本家来说，同工人竞争，只是利润问题，对工人来说，则是生存问题。

劳动这一商品有比其他商品**更暂时**的性质。它不能蓄积起来。它的**供应**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容易增加或减少。

(δ) 工厂管理制度。住宅立法。Trucksystem (实物工资制)，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主用提高商品价格而不改变名义工资的办法来欺骗工人。

III. 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

(a) 根据普遍的经济规律，不可能有**两种市场价格**。在一千个

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没有什么可进行交换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无法交换自己的劳动。

(6)至于谈到提高工资,那末应该指出,任何时候都必须注意到世界市场,如果其他国家工人失业了,提高工资就会成为泡影。

V. 最低工资

1.工人所得的日工资是他的机器即他的肉体给他这个所有主带来的利润。其中包括为补偿该机器的 wear und tear (损耗)或者也就是为以新工人代替丧失了工作能力的老工人所必需的款额。

2.最低工资所产生的结果是:例如,取消星期日对工人来说纯粹是损失。他必须在更加恶劣的条件下挣得工资。这就是拥护取消星期日例假的诚实的慈善家们的目的。

3.虽然平均最低工资是由最必需的生活资料本身的价格所决定的,但还是应该指出:

第一,不同国家的最低额各不相同,例如,爱尔兰的马铃薯³⁸²。

第二,不仅如此。最低额本身有自己的历史运动,它愈来愈降低到绝对最少的水平。以烧酒为例。最初用葡萄渣酿制,后来用谷物,再以后用马铃薯酒精。

促使最低额达到真正最低的水平的不只是

1.机器生产普遍发展,分工,工人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并摆脱了地域限制;而且是

2.赋税的增加和国家预算支出的增加,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取消某种赋税不会使工人得到任何好处,可是在最低工资还没有降低到极限数额以前,实行任何新税都会损害工人的利益。而这种情况在所有公民关系发生紊乱和困难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同时还

应指出，赋税的增加会加速小农、小资产者和手工业者的破产。

例子——解放战争³⁸³以后的时期。生产出更低廉的产品和代用品的工业的发展。

3.这种最低额使各国趋于平衡。

4.工资一旦降低，以后就是再提高，也永远不能达到原来的水平。

总之，在发展过程中，工资双重地下降：

第一，相对地，对一般财富的发展来说。

第二，绝对地，因为工人所换得的商品量愈来愈减少。

5.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时间愈来愈成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因而也成为工资的尺度。与此同时，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这一商品的生产愈来愈低廉，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愈来愈少。

农民还有空闲时间，还可以有辅助收入。但是，大工业（不是工场手工业）消灭这种宗法制状态。这样一来，工人生活即生存的每一时刻都愈来愈成为交易的对象。

（现在还有下列几节：

1.关于改善工人状况的建议。马尔萨斯、罗西等。蒲鲁东、魏特林。

2.工人的联合。

3.雇佣劳动的积极意义。）

VI.改善生活状况的建议

1.最喜欢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储蓄银行制度**。

我们绝不认为有必要讲，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可能储蓄。

应指出，赋税的增加会加速小农、小资产者和手工业者的破产。

例子——解放战争³⁸³以后的时期。生产出更低廉的产品和代用品的工业的发展。

3.这种最低额使各国趋于平衡。

4.工资一旦降低，以后就是再提高，也永远不能达到原来的水平。

总之，在发展过程中，工资双重地下降：

第一，相对地，对一般财富的发展来说。

第二，绝对地，因为工人所换得的商品量愈来愈减少。

5.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时间愈来愈成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因而也成为工资的尺度。与此同时，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这一商品的生产愈来愈低廉，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愈来愈少。

农民还有空闲时间，还可以有辅助收入。但是，大工业（不是工场手工业）消灭这种宗法制状态。这样一来，工人生活即生存的每一时刻都愈来愈成为交易的对象。

（现在还有下列几节：

1.关于改善工人状况的建议。马尔萨斯、罗西等。蒲鲁东、魏特林。

2.工人的联合。

3.雇佣劳动的积极意义。）

VI.改善生活状况的建议

1.最喜欢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储蓄银行制度**。

我们绝不认为有必要讲，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可能储蓄。

不需受任何教育就干得了的简单劳动代替复杂劳动；我们也不打算指出，现代工业日益迫使七岁以上的儿童从事机器劳动，不仅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收入的来源，而且成为他们双亲即无产者收入的来源；工厂管理制度使学校教育法失效，普鲁士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也不打算指出，即使工人受到智力教育，这种教育对他的工资也毫无直接影响；教育一般说来取决于生活条件，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资产阶级没有使人民受到真正教育的经费，即使有这笔经费，它也不肯使用。

我们只来着重指出一个纯粹经济的观点。

(β) 慈善的经济学家们所主张的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这样的：使每个工人熟悉尽可能多的劳动部门，以便他一旦因工厂采用新机器或分工发生变化而被抛出一个部门时，可以尽可能容易地在另一部门中被雇用。

假定这是可能的。

这样做的后果就会是：如果一个劳动部门的工人过剩，那末所有其他劳动部门的工人马上也会过剩，并且一个生产部门的工资的降低，就会比以前更快地直接引起工资的普遍降低。

此外，由于现代工业到处都使劳动大大简单化，使得它很容易为人们所掌握，所以，一个工业部门的工资的提高，也会马上引起工人涌向这个工业部门，而工资的降低也会多少直接地带有普遍的性质。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分析资产阶级方面所提出的许多小的治标办法^①。

^① 手稿中这个地方添有“赤贫现象”几个字。——编者注

3.但是我们应当转到第三个建议——马尔萨斯理论上来。这个建议实际上引起了并且还不断地引起极重大的后果。

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这个理论整个可以归结如下：

(α)工资水平取决于所供应的工人和所需要的工人的比例。增加工资的办法可以有两个：

或者是使劳动得以使用的资本增长得很快，以致对工人的需求比工人的供应增加得快（以更迅速增长的级数增加）。

其次，或者是人口增加得很慢，以致尽管生产资本增长不快，工人之间的竞争仍然不剧烈。

对相互关系的一方面，即对生产资本的增加，你们工人不能发生任何影响。

相反地，对另一方面，你们完全能够发生影响。

你们尽可能少生小孩，就能够从工人方面缩减供应，即缓和工人之间的竞争。

只要提出下面几点意见，就足以揭穿这个十分愚蠢、卑鄙和虚伪的学说：

(β) (这应该是对第一节“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资有什么影响”的补充)

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长了，工资就会增长。如果使劳动得以使用的资本增长了，即生产资本增加了，这种需求就会增长。

对此这里应当做两点主要说明：

第一：提高工资的主要条件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和尽快增长。所以，使工人能够勉强生活的主要条件是他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比资产阶级愈来愈降低，是他尽量增加自己敌人的力量——资本。这就是说：工人只有在他生产并加强和他敌对的力量即他本身的对立

者的条件下,才能勉强生活下去;在这种条件下,当他造成这种和他敌对的力量时,他才能从后者得到就业手段,这种手段又使他成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成为加强生产资本并使之快速增长的杠杆。

顺便指出:如果懂得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完全可以明白傅立叶主义者的和其他的想使二者调和的企图是多么滑稽可笑。

第二:在我们这样一般地阐述了这种颠倒的关系以后,这里还要加上第二个更重要的因素。

这就是,生产资本的增加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生产资本是在什么条件下增加的?

资本的增加就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就使劳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因而也就造成使劳动更加简单化的另一种分工;

其次,使采用机器的规模日益扩大,并采用新机器。

因此,这意味着,随着生产资本的增长:

工人之间的竞争同样地加剧,因为分工简化了,任何劳动部门对每个人都更加开放了。

工人中间的竞争不断加剧,还因为他们必须同样地与机器竞争,并且他们会因机器而失业。所以,生产资本的积聚和积累使生产规模愈来愈扩大,——而且还由于所提供的资本的竞争,资本的利息愈来愈下降,——

其后果是:

小工业企业倒闭,经不起同大企业的竞争。资产阶级的许多阶层被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因而,工人之间的竞争由于随着生产资

本的增加而必然发生的小企业主的破产而日益加剧。

同时，由于利息率降低，以前没有直接参与工业的小资本家，也不得不从事工业活动，就是说，补充大工业新受害者的队伍。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工人阶级的人数也在增加，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

生产力的发展既然引起劳动规模的扩大，那末在竞争愈来愈普遍的情况下，暂时的生产过剩愈来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世界市场愈来愈广阔了。因而，危机愈来愈尖锐了。在有这样突然的手段促使工人结婚和繁殖的情况下，工人大批聚集在一起，集中起来，因而他们的工资便愈来愈波动。所以，任何一次新危机都直接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大为加剧。

总而言之，随着更迅速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和流通速度的加快即资本的急剧周转，生产力的提高，就表现在同一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说，根据竞争规律，必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意味着，生产要在愈来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而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能经得起竞争，劳动规模就得愈来愈大，资本就必定愈来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为了使这种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分工和机器生产就必定不断地和不平衡地发展起来。

这种在愈来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也扩展到作为资本一部分的工人身上。工人必须在愈来愈困难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产品，就是说，在生产费用愈来愈降低的情况下领取更少的工资，干更多的活。这样一来，最低工资愈来愈促使在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条件下更拚命地干活。

不平衡性是以几何级数而不是以算术级数增长的^①。

^① 这句话马克思写在手稿的页边上。——编者注

可见,伴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来的是大资本的统治加强,叫做工人的机器愈来愈简单化,由于扩大分工的范围和采用机器的规模,由于公开规定奖励生育,由于资产阶级的破产的各阶层的竞争等等,工人之间的直接竞争也日益加剧。

我们还可以更简略地把这一点表述出来。

生产资本有三个构成部分:

- (1) 供加工用的原料;
- (2) 机器和煤这种为开动机器所需要的材料,建筑物等等;
- (3) 用于工人生活费的那部分资本。

在生产资本增加的情况下,这三个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怎样呢?

伴随生产资本的增加而来的是生产资本的积聚,而伴随资本的积聚而来的是只有剥削范围不断扩大,资本才能获得利润。

因此,很大一部分资本将直接变为劳动工具并作为劳动工具而发挥职能,而生产力愈提高,这种直接变为机器的一部分资本将愈增多。

机器生产的发展,完全和分工的发展一样,会导致在更短的时间内能够生产出多得多的产品。因此,原料储备也要以同样比例增加起来。在生产资本增加的情况下,变为原料的那部分资本也必需要增加。

现在剩下了生产资本的第三部分,即用于工人生活费的那一部分,亦即变为工资的那一部分。

这部分生产资本的增加和其他两个部分有什么关系呢?

分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一个工人能生产出以前三个、四个、五个工人所生产的东西。采用机器的后果是同样情况以更大得无

比的规模表现出来。

首先,不言而喻,生产资本中变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的增加不会引起用于工资的那部分同样的增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机器和实行更进一步的分工就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所以,由此直接得出的结论是,用于工资的那部分生产资本,不会与花费在机器和原料上的那部分同等地增长。不仅如此。随着生产资本,即资本本身力量的增加,投入原料和机器的资本和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之间的不均衡现象会同等地增长起来。这也就意味着用于工资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同用于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资本比较起来,则愈来愈少。

资本家把更大量的资本投入机器以后,就不得不花费更大量的资本来购买一般原料和为开动机器所必需的原料。但是,如果以前他雇用一百个工人,那末现在他也许只需要五十个工人就够了。否则,他也许就要再次加倍地增加其他两部分的资本,即更加扩大不均衡现象。所以,他解雇五十个工人,或者一百个工人仍要以从前五十个人的价格进行劳动。这样一来,在市场上便出现了多余的工人。

在分工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只有用于购置原料的资本将必定增加。也许一个工人可以代替三个工人。

假定这是一种最好的情况。资本家扩大了他的企业,而所采用的办法不仅能够保留原有数量的工人——他当然不会等到能够这样做的时候,——而且甚至还增加了工人的数量,这时,为了保留同样数量的工人或者甚至使工人的数量有可能增加,就势必要大大地扩大生产,而且工人人数和生产力的比例就会相对无限地不成比例^①。因此,生产过剩会提前到来,而在最近一次危机中,失

业的工人会比任何时候都多。

可见,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必然得出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变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作为真正的资本的资本,和用于工资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相比,会不成比例地增长;换句话说,就是工人只得在彼此之间分配跟生产资本总量相比日益减少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所以,他们的竞争便日益加剧。换句话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工人的就业手段或生活资料就相对地愈减少,换句话说,和就业手段相比,工人人口增长得就愈快。而且,这种不均衡现象总是和一般生产资本同等地增长的。

为了消除上述的不均衡现象,生产资本就必须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为了以后在危机时期再消除这种不均衡现象,它还要增长得更多些^②。

资产者把这个不过是由工人和资本的关系产生出来的、甚至使对工人最有利的状况——生产资本不断增加——变为不利的状况的规律,由社会规律变成了自然规律,硬说根据自然规律,人口比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增长得快。

他们不懂得,生产资本的增加包含着这种矛盾的增加。

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① 翻译不出的双关语《...und das Verhältnis der Arbeiterzahl im Verhältnis zu den Produktivkräften ist relativ unendlich mehr Mißverhältnis geworden》。——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这个地方意思不太清楚:《Um das oben angedeutete Mißverhältnis auszugleichen, muß es in geometrischer Porportion vergrößert werden und um es nachher in Zeiten der Krise zu readjustieren, wird es noch mehr vergrößert》。——编者注

生产力,尤其是工人本身的没有报酬的社会力量,甚至是和工人作对的。

(γ)第一种荒谬说法:

我们知道,如果生产资本增长(经济学家们所假设的最有利的情况),如果因此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应地增长,那末,根据现代工业的性质并根据资本的本性所得出的结论是:工人的就业手段不会以同等程度增长,引起生产资本增加的那些情况会使劳动的供求不均衡现象更快地加剧,——一句话,生产力的增长同时也使工人人数和工人的就业手段数量之间的不均衡现象加剧。就其本身来看,这既不取决于生活资料数量的增加,也不取决于人口的增加。这是由大工业的本性以及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所必然产生的现象。

但是,如果生产资本的增长总是很慢,如果生产资本始终不变或者甚至还减少,那末对劳动的需求来说,工人人数永远都是太多了。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最有利和最不利的情况下,从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从资本本身的本性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工人的供应总是超过对劳动的需求的。

(δ)更不用提这样一种谬论了,这种谬论说什么整个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一个不生小孩的决定,相反地,它的生活状况会使性欲成为它的主要享乐并使它片面地发展。

资产阶级在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后,还想把工人的再生产也限制在最低限度以内。

(ε)可是,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对待这些话和劝告

是多么不认真。

第一，现代工业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就是对生育的真正奖励。

第二，大工业经常需要未就业工人后备军以备生产高涨时期之用。因为资产者对工人所抱的主要目的一般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钱得到劳动这一商品，而这只有在这种商品的供应大量超过需求的情况下，即有极多的过剩人口的时候，才有可能。

可见，人口过剩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对工人好言相劝，是因为它知道这种劝告是无法实行的。

(i) 资本既然只有在它能给工人工作的时候才能增长，所以资本的增长就包含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并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按照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本性，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必定还要相对地快一些。

(k) 同时前面提到的理论，即竭力说人口比生活资料增加得快是自然规律的理论，所以更受资产者的欢迎，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慰了他的良心，责成他把冷酷无情当作一种道德义务，它将社会现象变成自然现象，并且让他能像看待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那样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地来静观无产阶级大批饿死，另一方面，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过并主张因此惩罚它。它说什么无产阶级可以用理智抑制自然的本能，并用道德监督的办法来限制自然规律的有害发展。

(l) 济贫法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运用。消灭鼠患。砒霜。Workhouses (习艺所)。一般的赤贫现象。脚踏的轮子又列于文明领域之内。野蛮现象再度出现，但它是在文明本身的怀抱中产生的，并且归属于文明；因此便发生了染有麻疯症的野蛮现象，作为文明的麻疯症的野蛮现象。Workhouses 是工人的巴士底狱。妻子和丈夫分

居。

4.现在我们要简略地提一提那些想用另一种确定工资的办法来改善工人状况的人们。

蒲鲁东。

5.最后,在慈善的经济学家关于工资的意见中,还要指出一种观点。

(α)在其他经济学家之中,尤其是罗西发挥了下述观点:

工厂主预先支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所应得的那分产品,因为工人不能等到产品出卖。如果工人自己能把自己养活到产品出卖的时候,那末他作为 *associé* (股东) 将享有对应付给他的那部分产品的权利,就像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情形一样。因此,工人的份额具有的正是工资形式,那是一种偶然事物,因为这是投机的结果,是和生产过程同时发生而又绝不是生产过程的必然组成因素的一种特殊活动的结果。工资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制度的一种偶然形式。它不是资本的必要部分。它不是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之下,它可能消失。

(β)这个高明见解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工人持有足够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足够的资本,用不着被迫地以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话,那末工资形式就会消失。这意味着:要所有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因而也就是说,这等于要保全资本而又不要雇佣劳动这个对立物,但是没有雇佣劳动,资本就不能存在。

(γ)其实,这种说法应该加以注意。工资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却是生产的暂时历史形式。生产的一切关系(资本、工资、地租等)都是暂时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要被消灭的。

居。

4.现在我们要简略地提一提那些想用另一种确定工资的办法来改善工人状况的人们。

蒲鲁东。

5.最后,在慈善的经济学家关于工资的意见中,还要指出一种观点。

(α)在其他经济学家之中,尤其是罗西发挥了下述观点:

工厂主预先支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所应得的那分产品,因为工人不能等到产品出卖。如果工人自己能把自己养活到产品出卖的时候,那末他作为 *associé* (股东) 将享有对应付给他的那部分产品的权利,就像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情形一样。因此,工人的份额具有的正是工资形式,那是一种偶然事物,因为这是投机的结果,是和生产过程同时发生而又绝不是生产过程的必然组成因素的一种特殊活动的结果。工资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制度的一种偶然形式。它不是资本的必要部分。它不是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之下,它可能消失。

(β)这个高明见解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工人持有足够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足够的资本,用不着被迫地以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话,那末工资形式就会消失。这意味着:要所有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因而也就是说,这等于要保全资本而又不要雇佣劳动这个对立物,但是没有雇佣劳动,资本就不能存在。

(γ)其实,这种说法应该加以注意。工资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却是生产的暂时历史形式。生产的一切关系(资本、工资、地租等)都是暂时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要被消灭的。

居。

4.现在我们要简略地提一提那些想用另一种确定工资的办法来改善工人状况的人们。

蒲鲁东。

5.最后,在慈善的经济学家关于工资的意见中,还要指出一种观点。

(α)在其他经济学家之中,尤其是罗西发挥了下述观点:

工厂主预先支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所应得的那分产品,因为工人不能等到产品出卖。如果工人自己能把自己养活到产品出卖的时候,那末他作为 *associé* (股东) 将享有对应付给他的那部分产品的权利,就像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情形一样。因此,工人的份额具有的正是工资形式,那是一种偶然事物,因为这是投机的结果,是和生产过程同时发生而又绝不是生产过程的必然组成因素的一种特殊活动的结果。工资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制度的一种偶然形式。它不是资本的必要部分。它不是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之下,它可能消失。

(β)这个高明见解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工人持有足够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足够的资本,用不着被迫地以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话,那末工资形式就会消失。这意味着:要所有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因而也就是说,这等于要保全资本而又不要雇佣劳动这个对立物,但是没有雇佣劳动,资本就不能存在。

(γ)其实,这种说法应该加以注意。工资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却是生产的暂时历史形式。生产的一切关系(资本、工资、地租等)都是暂时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要被消灭的。

多么巨大的进步呵。^①

(第三:人们把劳动变成商品,并使它本身受自由竞争的支配以后,力求尽可能便宜地,即用尽可能少的生产费用来生产它。因此,在未来的社会组织中,任何体力劳动都会无限轻易,无限简单。——做出一般的结论。)

第三,由于一切都成了出卖的对象,工人就认定,一切他们都能摆脱,都能割弃;因此,他们就第一次摆脱了对一定关系的依附。既不缴纳产品,也没有那种仅仅是一定等级(封建等级)的附属品的生活方式了,工人可以随便处理自己的钱了,这是一个优点。

马克思写于 1847 年 12 月底

原文是德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24 年

俄文译自手稿

“社会主义经济”杂志,原文

第一次发表于 1925 年“在

马克思主义旗帜”杂志

① 手稿中这个地方添有如下的话:“民族关系、阶级斗争、财产关系”。——编者注

弗·恩格斯 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³⁸⁴

巴黎。拉斯拜尔还是赖德律-洛兰？社会主义者还是山岳党人？这就是使红色共和国的党派分裂成为两个敌对营垒³⁸⁵的问题。

其实，这里争论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您问一下山岳党人的报纸“改革报”、“革命报”，它们会告诉您，它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据它们说，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累进税、遗产税和劳动组织的纲领，同山岳党所提出的毫无二致；它们会说，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这场不适当的争吵完全是由某些嫉妒成性和野心勃勃的人挑起来的，他们滥用人民的“真诚信任”，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激起对人民政党活动家的猜疑。

如果您问一下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人民报”³⁸⁶，它用来回答您的，会是关于头脑空虚的山岳党人愚昧无知的辛酸倾诉，难以计数的关于法律、道德和经济的论文，最后是神秘的暗示，说问题的实质是公民蒲鲁东所提供的新万应灵药，这种万应灵药很快就要显示出它对路易·勃朗学派那一套陈旧的社会主义辞藻的优越性。

最后，如果您问一下社会主义者工人，他们会简单明了地回答您：《Ce sont des bourgeois, les montagnards》（“这些山岳党人都是资产者”）。

又是唯有工人一下子就看破了问题的实质。他们根本不想知道山岳党,因为山岳党全是**资产者**。

社会主义民主党早在二月以前就是由两个不同的派别构成的:第一个派别包括演说家、议员、作家、律师等等以及相当数量的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实“改革报”派正是由他们组成的;第二个派别是由巴黎的工人群众构成的,他们决不是前者的无条件的追随者,相反,他们是对前者疑心极重的同盟者,他们根据“改革报”派的活动家是提出比较坚决的主张还是采取比较动摇的立场,时而比较紧密地靠近他们,时而又同他们离得比较远。在专制制度存在的最后几个月当中,“改革报”同“国民报”进行论战,表现得非常坚决,于是在它同工人之间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因此,“改革报”派活动家也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而进入临时政府的。

这里没有必要来详谈:这些“改革报”派的活动家如何由于在临时政府中是少数派,因此无力捍卫工人的利益而只是帮助了“纯粹的”共和派³⁸⁷抑制工人,直至这些共和派重新组织起国家政权——这个政权这时已成为他们的用以反对工人的政权了;“改革报”派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如何由于受拉马丁那一套所谓自我牺牲的陈词滥调的影响并醉心于权力而同意参加执行委员会³⁸⁸;从而分裂和削弱了革命政党,使该政党的一部分人为政府效劳,以致促进了五月和六月起义的失败;此外,他本人又是怎样地反对工人。这一切不需要在这里多谈了。这些事实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简言之,在六月起义以后,在执行委员会垮台和以卡芬雅克为代表的“纯粹的”共和派建立了绝对统治以后,“改革报”派、民主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共和国进一步发展的一切幻想都破灭

了。他们被推进了反对派的队伍，他们又变得自由了，又扮演了反对派的角色，并恢复了自己同工人的旧有的联系。

在没有发生任何严重问题以前，当问题还只在于揭露卡芬雅克那种胆怯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的时候，工人能够容许他们在出版界的利益由“改革报”和“民主社会革命报”去代表。何况“真正的共和国”³⁸⁹和真正的工人报纸已经被戒严、倾向性的诉讼和报纸保证金所消灭。同样，工人们能够容许山岳党在国民议会中代表他们。因为拉斯拜尔、巴尔贝斯和阿尔伯已被逮捕，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迫逃亡。部分俱乐部被封闭了，其余的受到严格的监视，而反对言论自由的旧法律至今仍然继续存在。报纸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例子，说明这些法律如何被用来反对工人。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代表说话的工人，不得不又满足于在2月以前曾经代表过他们的那些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它的演说家。

但是发生了总统选举的问题。共有三个候选人：卡芬雅克、路易-拿破仑、赖德律-罗兰。对于工人来说，卡芬雅克是根本谈不上的。这个家伙在六月里曾用霰弹杀害过他们，并向他们投掷过燃烧弹，他指望得到的只能是他们的憎恨。而路易·波拿巴呢？他们只是为了开玩笑才会投票选举他，以便今天用选票把他抬上去，明天又用武力把他推翻，而把正直的“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和他一起推翻。最后是赖德律-罗兰，他向工人们吹嘘自己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红色候选人。

这样，有了临时政府的经验以后，在5月15日和6月24日以后，又要求工人们来给激进小资产阶级和赖德律-罗兰投信任票吗？2月25日，当武装的无产阶级统治巴黎的时候，当可能得到一

切的时候,不就是这些人只会说安慰人的漂亮话,而没有革命的行动,只会许诺和规劝,而不采取迅速和坚决的措施,总之,只有 93 年的旗帜、词句和名称,而没有 93 年的毅力吗?不就是这些人曾经同拉马丁和马拉斯特一道呼吁首先应该**安抚资产阶级**,因而忘记需要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吗?不就是这些人在 5 月 15 日表现得不坚决,并在 6 月 23 日命令从玄森调来炮兵,从奥尔良和布尔日调来几个营吗?

为了选票不致分散,本来人民也许会投票赞成赖德律-洛兰的。但是赖德律-洛兰在 11 月 25 日发表了反对卡芬雅克的演说,再一次站在胜利者一边,并责备卡芬雅克反对革命的行动不够坚决,未能再多派出几个营去反对工人。

这篇演说彻底打消了工人对赖德律-洛兰的任何信任。甚至到现在,在他亲身经历过六月战斗的一切后果之后已经过了五个月的时候,他还是站在胜利者方面反对战败者,并且以他曾要求派遣比卡芬雅克所能拿出的还要更多的营去反对起义者而引以自豪!

这个惋惜六月起义没有被尽快镇压下去的人,竟想充当作为六月阵亡战士继承者的政党的首领?

在发表这篇演说以后,赖德律-洛兰这个候选人在巴黎工人中间已注定要遭到破产。在巴黎取得胜利的是他的竞争者拉斯拜尔,拉斯拜尔更早地被提为候选人,并且得到工人的同情。如果巴黎的选举具有决定意义的话,那末拉斯拜尔现在就是共和国的总统了。

工人们非常清楚,赖德律-洛兰还没有离开舞台,他还能够而且也一定会给激进党带来很大的好处。可是他已失去工人的信任。

他优柔寡断、崇尚虚荣和爱好华丽辞藻，由于这一切他甚至受过拉马丁的支配，他们，工人们曾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无论他在将来能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能使工人们忘记这一点。工人们将永远懂得，如果赖德律-罗兰又开始坚决地行动起来，那末他的坚决将只是那些在他后面推动他的武装工人的坚决。

工人们给赖德律-罗兰投了不信任票，同时也就是给整个激进小资产阶级投了不信任票。犹豫不决、好唱 *dévoûment* (自我牺牲) 等的陈词滥调、为了革命的模糊回忆而忘记革命的行动，——这就是赖德律-罗兰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固有特征。

激进小资产者之所以带有社会主义情绪，只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即将灭亡，看到自己即将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不是作为小资产者、小量资本的所有者，而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在幻想劳动组织，幻想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变革。只要他们获得政权，他们很快就会忘掉劳动组织。因为政权，至少是在最初一些日子的陶醉中，会使他们看到有获得资本和从威胁他们的灭亡中得救的前景。只有当武装的无产者端着刺刀为他们作后盾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自己昨天的同盟者。他们在 2 月和 3 月间就是这样行动的，而他们的领袖赖德律-罗兰就是第一个这样行动的人。如果现在他们的幻想已经消失，难道这能改变工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吗？如果他们回过头来，愿意痛改前非，他们是否有权要求工人们现在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又重入圈套呢？

工人们不会这样做，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对待激进小资产阶级，——工人们没有投票选举赖德律-罗兰，而投票选举拉斯拜尔，就是让激进小资产阶级了解这一点的。

可是拉斯拜尔究竟对工人有什么功劳呢？怎能把他作为一个

par excellence (纯粹的)社会主义者而同赖德律-洛兰相对立呢？

人民知道得很清楚，拉斯拜尔不是官方的社会主义者和体系的发明者。人民根本不要官方的社会主义者和体系的发明者，这些人已使人民非常讨厌。不然，人民的候选人就会是公民蒲鲁东，而不是热情洋溢的拉斯拜尔了。

但是人民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决不像未被承认的反动派领袖们出于谦虚所爱指责的那样，是忘恩负义的。人民清楚地记得，拉斯拜尔最先责备临时政府毫无作为而一味空谈共和国。人民还没有忘记《A mi du Peuple》³⁹⁰ par le citoyen Raspail (公民拉斯拜尔的“人民之友”)。拉斯拜尔最先表现出勇气——而这的确需要勇气，——发表了反对临时政府的革命言论；此外，拉斯拜尔根本不是某种一定的社会主义 couleur (派别)的代表人物，他只是在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这就是巴黎人民群众投票选举拉斯拜尔的原因。

这里所谈的根本不是山岳党在宣言中极其郑重地宣布过的能拯救世界的某些琐屑措施。这里所谈的是社会革命，它将给法国人带来跟那些语无伦次的、已成为死板公式的词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里所谈的是实现这一革命所必需的毅力。问题在于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一度表现了软弱无能以后，是否还能在它那里找到这种毅力。巴黎无产阶级投票选举拉斯拜尔也就是回答说：**找不到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报”和“革命报”对下面这一点感到莫名其妙，即人们虽然赞同它们的词句，却不投票选举宣扬这种词句的赖德律-洛兰。这两家可敬的报纸自认为是工人的报纸，其现在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代表小资产阶级，它们当然不能

了解，同一种要求，在工人嘴里富有革命性，而在它们嘴里就是空洞的词句。不然，它们就应当抛弃它们自己的痴心妄想！

至于公民蒲鲁东和他的“人民报”呢？这一点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2 月初
原文第一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5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7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40 年“无产阶级
革命”杂志第 3 期

弗·恩格斯

* 蒲鲁东

巴黎。昨天我们谈到过山岳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谈到过赖德律-洛兰的候选资格和拉斯拜尔的候选资格，谈到过“改革报”和公民蒲鲁东的“人民报”。我们曾答应回头来谈谈蒲鲁东。

公民蒲鲁东是个什么人呢？

公民蒲鲁东是勃艮第的农民，他曾经改换过许多种职业，研究过各种各样的科学。他第一次受到公众的注意，是由于在 1840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什么是财产？”³⁹¹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财产就是盗窃。”

这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使法国人大为惊讶。路易-菲力浦的政府和毫无幽默感的、老板着面孔的基佐，眼光如此狭隘，竟把蒲鲁东置于被告席上。但这是枉费心机的。可以预料，任何一个法国陪审法庭都不会根据这样一种聋人听闻的奇谈怪论来给他判罪。事情果然如此。政府丢了脸，而蒲鲁东却成了一个著名人物。

至于该书本身，那末全书都是以上述结论的精神写成的。每一章都是令人惊奇的奇谈怪论，其表达方式是法国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此外，该书包括的内容，部分是关于道德法律方面的论断，部分是关于道德经济方面的论断。其中每一个论断的目的都是想要

证明：财产是以矛盾为基础的。至于法律方面的论据，那是可以同意的，因为再没有比证明全部法学都是以一大堆矛盾为基础的这一点更容易的事了。至于说到经济方面的论断，那末其中很少包含有什么新东西，即使有，也是以虚假的计算为基础的。三重规则到处都遭到了恶意的破坏。

可是法国人并不了解这本书。法学家认为它太偏重于经济，经济学家认为它太偏重于法律，而两者都认为它的道德气味太浓。他们终究宣称：A près tout, c' est un ouvrage remarquable (这毕竟是一部卓越的著作)。

但是，蒲鲁东还力图赢得更大的胜利。他在写了许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以后，终于在1846年出版了他那包括两大卷的“贫困的哲学”³⁹²。在这部应使他名垂千古的著作中，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之新颖，以致它在《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 or Offices》（“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或交换所”³⁹³）的名称下，早在十年以前就在英国十个不同城市中破产过十次了。

这部冗长的、臃肿的伪科学著作，不仅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家，而且对以往一切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极其粗暴的指责，它没有给轻率的法国人留下任何印象。这种叙述和论断的方式他们从来还没有见到过，它比蒲鲁东上一部著作中的那些可笑的奇谈怪论还要更不合他们的胃口。这类奇谈怪论在这本书中也颇不少（例如，蒲鲁东曾一本正经地宣布“他是耶和华的私人仇敌”³⁹⁴），但是它们隐藏在伪辩证法的论断下面。法国人又宣称：《c' est un ouvrage re-

marquable》（“这是一部卓越的著作”），并把它搁在一边。在德国，这部著作自然受到了较大的尊重。

马克思当时发表了一部既机智而又严正的著作来驳斥蒲鲁东（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布鲁塞尔和巴黎版³⁹⁵）——这部著作按其思想方式和语言来说，要比蒲鲁东那部矫揉造作的荒唐东西千百倍地更带法国味。

至于蒲鲁东这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对现存社会关系的批评，那末，在读完这两本书之后，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种批评等于零。

至于谈到蒲鲁东关于社会改造的计划，那末，如前面所说的，它们只有一个优点，即它们早在许多年以前就在英国的无数次破产中光辉地表现了自己。

这就是革命前的蒲鲁东。当他还企图不依靠资本、而借助于不亚于轻视三重规则的计算的计算来出版“人民代表”日报时，巴黎工人起义了，他们赶走了路易-菲利浦并建立了共和国。

由于有了共和国，蒲鲁东起初成了一个“公民”；后来由于相信他的社会主义者清白名字的巴黎工人的选举，他才成了人民代表。

这样，革命把公民蒲鲁东从理论领域推到了实践领域中，从他的斗室推到了讲坛上。这位固执的、高傲的无师自通的学者，对他以前的一切权威——法学家、院士、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这个人在他本人应当帮助创造历史的时候，表现得怎样呢？

应当称赞的是，他一开始活动，就在那些遭到他极端蔑视、尖锐攻击，被他称为无知庸人和傲慢笨蛋的社会主义者中间采取极左翼的立场，并同他们一起投票。

诚然，据说在山岳党的大会上他又重新激烈地恢复了他对以前的敌手的旧的尖锐的攻击，他毫无例外地把他们每一个人都称为无知的庸人和空谈家，说他们甚至丝毫也不懂得他们所说的东西。

我们很愿意相信这一点。我们甚至愿意相信，蒲鲁东那些以空谈家的枯燥热情和过分自信的口吻叙述的经济学方面的奇谈怪论，在山岳党人先生们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混乱。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是经济理论家，并且他们还都或多或少地依靠小小的路易·勃朗；而小小的路易·勃朗虽然是比完美无缺的蒲鲁东严肃得多的作家，但是他的思维过于直观，不能对付蒲鲁东那种矫揉造作的伪科学的经济学原理，不能对付他的荒诞的先验性和伪数理逻辑。加之，路易·勃朗不久之后不得不从法国逃亡，而他的那些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束手无策的信徒们就失去保护，落到蒲鲁东这只豺狼的凶残的爪牙中了。

大概没有必要重复这一点，即蒲鲁东尽管取得了这一些胜利，但仍然是一个非常拙劣的经济学家。不过，他的弱点恰好是在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所不熟悉的方面。

蒲鲁东生平最大的胜利，是他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赢得的。我已记不清他发言谈什么问题了，只记得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钟头，激起了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狂怒，因为他讲的纯粹是蒲鲁东式的奇谈怪论，一个比一个更荒诞，而且每一个都是要最粗暴地侮辱听众的最神圣、最高贵的情感。这一切都是用他所特有的枯燥的迂腐的冷漠态度、用平淡的迂腐的勃艮第方言、用世界上最冷酷沉着的声调说出来的。效果——发狂的资产者的舞蹈病——的确不坏³⁹⁶。

但是,这是蒲鲁东的社会活动的顶峰。同时,他通过他的报纸“人民代表”(这是在对三重规则的痛苦试验以后勉强创办起来的,不久就干脆称为“人民”了)以及工人俱乐部继续宣传他那套旨在造福世界的理论。而这一切并不是毫无结果的。工人们说:《On ne le comprend pas, mais c' est un homme remarquable》(这个人很难了解,但他确实是个好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2 月初
原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5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
第 7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40 年“布尔什维克”
杂志第 14 期

附 录

卡·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

科伦 11 月 14 日。在“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今晨被法院侦查员的传讯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大量民众聚集在上诉法院的院子里向他表示同情，并等候结果。当卡尔·马克思离开侦查员出来的时候，人们向他高声欢呼，并把他送到埃塞尔大厅，在这里，马克思用简短几句话对人民的同情表示了感谢，并且说明，他之所以被传，只是由于要结束有关黑克尔案件的审问。问题在于，前任国家检察官，现任检察长黑克尔先生认为：卡尔·马克思诽谤性地宣布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因为“新莱茵报”上登载了一篇由“黑克尔”³⁹⁷署名的文件。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5 日
“新莱茵报”第 14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弗·恩格斯请求准许他 居留伯尔尼的申请书

(初稿)

致伯尔尼州司法和警察当局

请允许我根据护照签发局的指令，请求准许我在伯尔尼居留³⁹⁸。

我曾住在科伦(莱茵普鲁士)，从事著述。由于今年9月25日和26日在这个城市发生的骚乱，我受到法院的侦查^①，并且有被捕的危险。我只是由于逃亡才躲开了这次逮捕。几天以后，发出了逮捕我的命令(见10月1日、2日或3日的“科伦日报”)³⁹⁹，这样，我的身分便确定为政治流亡者。如果需要，我可以给当局提供这个命令的副本。

到瑞士之后，我之所以愿意居留伯尔尼州和伯尔尼城，而不是别的哪个城市，其原因如下：

(1)伯尔尼离德国边境很远，这使德国当局无法制造借口用种种要求来麻烦瑞士政府，说什么我滥用避难权和准备制造骚乱^②。

① 接着在手稿中涂掉了“我被控告号召暴乱，等等”这一句话。——编者注

② 接着在手稿中涂掉了“号召起义来反对德国政府，等等”这一句话。——编者注

(2)伯尔尼正好在现在能给我一个机会,按照瑞士联邦议会的实例来研究宪法的实际运用,从这里面,德国无论如何是能为自己吸取许多东西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民可能在自己国内实行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宪法的时候。

我想我的流亡不会为时太久,因为,姑且不说普鲁士现今的局势未必可能保持稳定,我有充分理由期望科伦的陪审员做出宣告我无罪的判决。我逃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审前的长期羁押。所以,我估计到明年春天就能返回祖国。

至于生活资料,我完全有保证。如果需要,我可以对这点提出证明。

根据护照签发局的指令附上护照一份,这是法国临时政府在我于今年4月间从巴黎返回祖国时根据我的请求签发的,这次特由科伦给我寄来。

我趁此机会谨向当局致以最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8年11月15日于伯尔尼邮政街

43号B格贝尔利先生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4年第1版第25卷,原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7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代表团晋见检察长茨魏费尔

科伦 11 月 22 日。昨天，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诸先生，因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见“新莱茵报”第 147 号）^①一案，本应去见法院侦查员。可是谣传当局企图把被传唤人立即逮捕起来。不管这种谣传在许多法学家看来是多么不可靠，人民委员会⁴⁰⁰还是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晋见检察长茨魏费尔先生，以期弄清事实真相。果然，茨魏费尔先生向代表团声明：根本没有发出逮捕被传唤人的命令，只有在呼吁书引起叛乱的情况下，才可能发出这样的命令；因为到那时，被传唤人的那种由第二〇九条和二一七条⁴⁰¹规定的过错（这种过错暂且只归违警法庭审理）就可能成为罪行。

检察长先生认为，根据上述各条法律的规定，应当进行传讯，与此相反，代表团声明：在目前，当柏林国民议会是普鲁士唯一的合法权力机关时，首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来惩办那些用暴力反抗国民议会决议或号召进行这种反抗——如艾希曼总督不久前在科布伦茨所做的那样^②——的官员和机关。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3 日
“新莱茵报”第 15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 39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7—38 页。——编者注

关于法院侦查员侦讯马克思、 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的通告

科伦 11 月 25 日。在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因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第二个呼吁书^①一案而受法院侦查员侦讯时，被告声明这一呼吁书是由他们起草和签署的。这一声明载入记录后，侦讯就告结束。被告没有一人被捕。这一通告可以作为对区域委员会所收到的许多信件的答复。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6 日
“新莱茵报”第 153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 39 页。——编者注

关于法院侦查员侦讯马克思、 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的通告

科伦 11 月 25 日。在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因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第二个呼吁书^①一案而受法院侦查员侦讯时，被告声明这一呼吁书是由他们起草和签署的。这一声明载入记录后，侦讯就告结束。被告没有一人被捕。这一通告可以作为对区域委员会所收到的许多信件的答复。

载于 1848 年 11 月 26 日
“新莱茵报”第 153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 39 页。——编者注

洛桑工人联合会给 弗·恩格斯的委托书

兄弟！

鉴于不可能派代表去出席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⁴⁰⁴，特委托你做我们的代表。作为一个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老战士，在这次大会上你当然也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虽然这一次你不必同资产者和其他小商人打交道；要知道这是真正的无产者，你应当同他们一道并且为他们进行工作。那末，让我们把我们对中央联合会的愿望简单地告诉你。

(1) 各联合会联合的目的应当是：

- (a) 成立中央联合会和中央会计处。
- (b) 对工人进行社会的和政治的教育。
- (c) 同莱比锡德国工人委员会⁴⁰⁵建立联系，以便加强主要是工人之间的联合。

(2) 选出的中央联合会的义务应当是：

- (a) 同莱比锡工人委员会建立联系。
- (b) 为了减少通讯，着力推销中央委员会出版的报纸（“博爱报”⁴⁰⁶）。
- (c) 掌管中央会计处，每半年提出一次有关报告。
- (d) 把一切重要事件及时地通知各兄弟联合会。

(3) 各兄弟联合会之间相互的义务以及对中央联合会的义务是：

- (a) 每个会员每月交纳一巴茨^①以下的会费，同时双方应经常交换邮资总付信件。
- (b) 联合会的每个分会应给自己的会员颁发会员证。
- (c) 持有会员证的每个联合会会员有权加入任何一个联合会，但会员证须经本人最后所属的那一个联合会的主席签署。

至于我们的选择，那末我们仍和过去一样，认为伯尔尼联合会最适当。如果要讨论我们的最后一个通告，那末它只不过是今年夏天我们就已承认伯尔尼联合会为中央联合会的结果，但是由于缺乏有关事态发展的任何消息，我们便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在会上通过了上述通告。我们否决了每人每周交纳半巴茨的做法，因为这样会使会员人数减少，同时并不能使收入增加很多。

代表联合会四十一名会员向你致敬并握手

格·施奈贝尔格

邦格特

克·哈夫

1848年12月8日于洛桑

原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5年国际版
第1部分第7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瑞士货币。——编者注

“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 预订通知

请预订下季度(1849年1—3月)“新莱茵报”的订户在最近期间将订单寄来,科伦的寄本报发行科(下制帽坊街17号);外地的寄德国各地邮局。

在法国收订人是:日·阿·亚历山大先生(斯特拉斯堡布兰德巷28号和巴黎诺特丹·德·纳扎列特街23号),以及亚琛皇家邮政总局;在英国是:伊·伊·尤厄尔先生等(伦敦新门街72号);在比利时和荷兰是:相应的皇家邮局和列日的邮局。^①

由于废除印花税,订费随之降低,今后科伦一季的订费只收一塔勒七银格罗申六分尼,在普鲁士各地邮局(包括邮资)只收一塔勒十七银格罗申;德国其他各地的订户酌加邮资。

编辑部的成员无任何变动。

前几个月出版的“新莱茵报”各号就是它的纲领。由于编辑部和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北美的民主派的领导人有私人联系,因此它能比任何别的报纸更正确更明白地给自己的读者报道国外的社会政治运动情况。从这方面看,“新莱茵报”不仅是德国民主派的,而且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

^① 在“新莱茵报”第176—195号上这段话略有变动。——编者注

刊登广告：第四版小号字一行或者相应的篇幅收广告费一银格罗申六分尼。

由于本报具有广泛的联系，各种广告都能广泛传播。

“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

载于 1848 年 12 月 19 日—
1849 年 1 月 14 日“新莱茵报”
第 172—19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对“新莱茵报”的审判延期举行

科伦 12 月 20 日。对“新莱茵报”的审判原定今天在陪审法庭进行。被告是“新莱茵报”总编辑马克思博士先生，该报发行负责人科尔夫先生，以及恩格斯先生。后者缺席。他们被控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宪兵。审判由于当局没有遵守诉讼程序的一条规定⁴⁰⁷而延期举行。

载于 1848 年 12 月 21 日
“新莱茵报”第 17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德利加爾斯基對“新萊茵報”的控告

科倫 12 月 21 日。今天，馬克思博士由於被控對“公民和共產主義者”德利加爾斯基先生^①進行誹謗，又被法院偵查員傳訊。這個新的審判是對“新萊茵報”的第幾次審判，這很難確定，因為這類審判太多了。

我們畢竟感到遺憾的是：德利加爾斯基先生竟對我們這樣忘恩負義。要知道，他之所以在歐洲有了一點兒名聲，是全仗我們談到他的幾篇文章。“公民和共產主義者”德利加爾斯基先生，這是多么可恥的忘恩負義呵！！這就是我們時代道德敗壞的標志——甚至連普魯士皇家共產主義者對別人為他效勞也毫無感激之情。

載於 1848 年 12 月 22 日
“新萊茵報”第 175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萊茵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① 見本卷第 64—69 頁。——編者注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 1849年1月15日会议记录摘要

在宣读和批准了上一次会议的记录以后,主席勒泽尔问编辑普林茨公民是否在座,有人回答说普林茨已经离去,接着他说,由于普林茨最近的所做所为和他不向联合会请示就擅自改变报纸的方针,作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对他追究责任……

公民马克思和沙佩尔提出了有许多人附议的提议:在委派普林茨任联合会正式机关报⁴⁰⁸的编辑的同时,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它应监督使机关报真正代表联合会的利益,并根据我们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

提议被通过了,并委派公民沙佩尔、勒泽尔和赖夫组成编辑委员会。

公民威斯特曼宣读从布鲁塞尔寄来的哥特沙克医生的“声明”⁴⁰⁹,并且说他不同意后者的行动。

公民马克思提出了有沙佩尔附议的提议,建议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上述的声明太可疑、太模糊,很难从中做出一定的结论;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应该指派一个委员会,由它指出看起来模糊的地方并写信给哥特沙克医生,请他对此加以说明和解释。

这个提议得到一致赞同;经提议选出公民马克思博士、安内克、沙佩尔、勒泽尔和埃塞尔组成委员会……

公民安内克提议在将来的会议上讨论即将进行的选举⁴¹⁰问题。

公民沙佩尔认为,如果这是在一个月以前发生的话,那末我们作为一个特殊的党派,也许可能获得某种重大的结果。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组织起来,工人联合会不可能使它所提出的自己的候选人当选。

公民马克思的意见也是这样,认为处在这种状态的工人联合会现在不可能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当前的问题不在于获得某种原则上重大的结果,而在于起来反对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的统治;而这连普通的民主主义者,即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也完全不满意现存政府。考虑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然现在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反对现存专制制度的反对派,那末根据常识也可以判断:如果已明白在选举中不可能捍卫住自己的原则性观点,那就应该与其他也是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党派联合起来,不让我们的共同敌人——专制王权获得胜利。

接着决定参加这个城市里在划分选区之后就应成立的共同选举委员会,并在那里捍卫共同的民主原则。

为了在工人与民主派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指派公民沙佩尔和勒泽尔参加民主协会委员会的会议,并在本委员会会议上作有关的报道……

载于 1849 年 1 月 21 日
“自由、劳动”报第 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劳动”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新莱茵报”被宣判无罪

科伦 2 月 8 日。昨天本报简略地报道过：陪审法庭昨天开庭审理了“新莱茵报”总编辑马克思、编辑恩格斯和发行负责人因登载一篇注明“科伦 7 月 4 日”的文章（载 1848 年 7 月 5 日该报）⁴¹¹而被控告的案件。这一篇关于安内克先生被捕事件的文章，就成了以诽谤执行逮捕任务的宪兵（Code pénal（刑法典）第三六七条）和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Code pénal 第二二二条）的罪名提出控诉的借口。陪审法庭在进行了短暂会议后，宣判全体被告无罪。

这个审判案是对“新莱茵报”的许多审判案中最早的一个，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上述的第二二二条和第三六七条（由于第三七〇条）在这一次陪审法庭的判决中，跟至今在莱茵各违警法庭中解释和应用得完全不同。可是，如果除去惩罚直接号召内战和叛乱的那些条文以外，第二二二条和第三六七条是高明的莱茵检察机关至今能够应用于出版方面的仅有条文。因此，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的判决是莱茵普鲁士出版自由的一项新保证。

一旦有可能，我们就将向我们的读者简略地报道法庭审讯⁴¹²的情况。

今天，马克思又因号召拒绝纳税一案同科伦议员施奈德尔、沙

佩尔一道到陪审法庭受审，上述号召是他们以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发出的^①。

载于 1849 年 2 月 9 日
“新莱茵报”第 21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 39 页。——编者注

对“新莱茵报”的两次审讯

科伦 2 月 8 日。昨天和今天，在我们的陪审法庭上又就报刊案件进行了两次审讯——昨天审讯“新莱茵报”总编辑马克思以及该报撰稿人恩格斯和沙佩尔，今天审讯马克思、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他们被控犯有煽动人民拒绝纳税、反对政府的罪行。出席旁听的人空前踊跃。在这两次审讯中，被告都是自己替自己辩护，力求证明控告毫无根据；他们的论据如此有力，以致陪审员在两次审讯中都不得不宣判被告“无罪”。

在政治审判案中，政府很不走运，陪审法庭不能使它如愿以偿。本地卫戍部队的几个军官的命运可能更坏，他们参加了去年 9 月的人民运动，当这个运动遭到失败时，他们就越境逃往比利时去了；现在，他们重新出庭受审，等候对他们的已经开始审理的案件作出决定⁴¹³。

载于 1849 年 2 月 16 日“德意志
伦敦报”第 20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伦敦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民主宴会

莱茵河畔缪尔海姆 2 月 11 日 (迟到)。今天在这里举行了由工人联合会组织的民主宴会。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的会员。音乐和歌声同演说和敬酒交相更替。

当地工人联合会主席**本格尔**在他的内容丰富的报告中谈论了现在和过去的关系。**鲁卡斯**举杯向客人们表示祝贺,特别是祝贺那些像在座的“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那样早在二月革命以前很久就用自己的言行捍卫了工人阶级权利的人。**沙佩尔**提议为“民主共和国”干杯。**卡尔·马克思**谈到了德国工人在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参加斗争的情况。他提议为协商议会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议员之一——**格拉德巴赫**干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举杯为匈牙利人和科苏特祝贺。**沃林根**的**奥特**谈到了立宪自由主义,谈到了贵族和民主派,而**费希巴赫**则谈到了人民群众的贫困和消灭贫困的办法。**格拉德巴赫**在讲话中评论了被解散的国民议会,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议会的软弱无能、犹豫不决和缺乏革命精神。最后,**克拉埃**谈到了二月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莱茵省第一次举行的这个民主宴会起了很好的影响,它无疑将成为效法的榜样。

载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
“新莱茵报”第 2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二月二十四日的宴会

科伦 2 月 27 日。前天，为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在埃塞尔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宴会⁴¹⁴。能容纳两三千人的大厅里座无虚席。

卡尔·马克思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主席，但他由于工作繁忙，不得不婉言谢绝。根据大家的意见，卡尔·沙佩尔担任了主席。他在宣布宴会开始时，提议为悼念在巴黎二月起义和六月起义中以及在 1848 年其他各次革命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干杯。

在这以后，科伦的议员施奈德尔律师就向自己的选民告辞了。接着由格拉德巴赫议员讲话，他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反革命在最近一次取得胜利的原因，并号召科伦的人民群众，如果发生某种反对议院的新的暴力行动，就应起来保卫自己的代表。（这是对今天“科伦日报”上的告发⁴¹⁵的回答。）

举杯祝酒的还有下列人士：里廷豪森博士提议为社会民主共和国干杯。——“新莱茵报”编辑弗·恩格斯：为正在进行斗争的意大利人、首先为罗马共和国。——卡·克拉麦尔：为纪念罗伯特·勃鲁姆。——法兰克祖国民议会议员维勒：为德国民主。——商人古方蒂：为赖德律-洛兰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退役炮兵下士丰克：为打倒暴君。——卫尔博士：为在座的妇女们。——贝克尔博士：为各国的民主主义者。——木匠库尔特：为科苏特和匈牙利人。——沙佩尔：为政治犯和流亡者，特别是伯桑松的德国

人⁴¹⁶。——工人**卡斯滕斯**^①：为未来的社会革命。——“新莱茵报”编辑**斐迪南·沃尔弗**：为劳动权。——工人**豪斯曼**：为统一。——**卡·克拉麦尔**：为梅洛斯拉夫斯基和1848年波兰的战士。——旅馆老板、波恩的**康普**：为各国人民的友爱。——大学生**勃鲁姆**：为乌培河谷的民主主义者。——工人**米勒**：为梅利奈、特德斯科和由于里斯康土案件⁴¹⁷而在安特卫普被判刑的其他十五个人。——工人**勒泽尔**：为纪念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马拉和1793年的其他英雄。

宴会有音乐伴奏，人们唱了“马赛曲”、吉伦特派歌曲⁴¹⁸及其他歌曲，并且观看了在海尔克斯指挥下的工人合唱团的演出。最后，宴会在为“普遍社会民主共和国”举杯祝贺声中结束。

在宴会上为伯桑松的德国流亡者组织了一次募捐。募集了相当大一笔款子。

在整个晚间，军队随时准备出动，街上加强了巡逻，但这一切与其说是由宴会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士兵之间的欧斗引起的。

载于1849年2月28日
“新莱茵报”第2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弗·列斯纳。——编者注

居尔岑尼希的宴会

科伦 3 月 20 日。昨天晚上，在居尔岑尼希举行了纪念去年柏林街垒战一周年的宴会。如果资产阶级为“祝贺允诺”制宪等等而在本月 18 日举行音乐会时，本城最大的大厅都挤得相当满的话，那末，昨天，这个大厅甚至未能容纳下蜂拥而至的一半公众。在挤得满满的大厅里共有五六千人，而在街上还有好几千人徒劳地等机会进去。大厅很快就被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有几个演说者直到晚上九点钟以后才进入了大厅。

担任主席的卡尔·沙佩尔先宣布宴会开始，他举杯祝贺一切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主权的人民。接着，有下面这些人相继举杯致词：海·贝克尔提议为纪念 3 月 18 日和 19 日的牺牲者干杯；公民瓦赫特尔举杯祝德国的米歇尔聪明起来；公民卫尔举杯祝贺彻底的、而不是半途而废的革命；公民里廷豪森提议为打倒德国皇帝干杯；卡·克拉麦尔举杯祝贺出席宴会的民主妇女；“新莱茵报”编辑威·沃尔弗举杯祝贺意大利共和国；“新莱茵报”编辑恩·德朗克举杯祝贺无产阶级革命；彼·诺特荣克提议为匈牙利人和科苏特的胜利干杯；“新莱茵报”编辑哥·毕尔格尔斯提议为推翻奥地利干杯；“新莱茵报”编辑斐·沃尔弗提议为布尔日案件的被告⁴¹⁹干杯；“新莱茵报”编辑弗·恩格斯提议为巴黎的六月起义者干杯；卡·沙佩尔提议为英国的宪章派及其最革命的领袖厄内斯

特·琼斯和乔·朱·哈尼干杯；卡·克拉麦尔举杯祝贺波兰人；“工人报”⁴²⁰编辑克利·埃塞尔提议为红色共和国干杯。

宴会是在有条不紊、非常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宴会于晚上十一点钟在全体到会者为祝贺红色共和国的干杯声中结束。把我们的宴会同本月 18 日“抱怨派”在居尔岑尼希举行的音乐会比较一下，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科伦还没有一个纪念会像昨天晚上在红色旗帜下举行的宴会那样聚集了那么多、那么明理的公众。

载于 1849 年 3 月 21 日
“新莱茵报”第 25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工人联合会 1849年4月16日全体会议的决议

会议一致决定：

(1) 退出德国民主协会总会，加入中央委员会设在莱比锡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⁴²¹。

(2) 为了更加密切地联合纯粹社会的政党，委托委员会在召开莱比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以前在科伦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的地方代表大会。

(3) 派遣代表出席即将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载于1849年4月22日
“自由、博爱、劳动”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 1849年4月17日会议记录摘要

…… (5)为执行昨天全体大会的决定:定于5月的头一个星期日在这里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

委员会委派公民卡·马克思、威·沃尔弗、卡·沙佩尔、安内克、埃塞尔和奥托六人组成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临时委员会来执行这一决定,并责成他们向各有关的联合会发出适当说明开会理由的邀请书……

载于1849年4月22日
“自由、博爱、劳动”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的决议⁴²²

(1) 鉴于哥特沙克医生在“自由、劳动”报中把公民卡尔·马克思描绘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弗兰茨·拉沃的朋友和同道者，而公民马克思在2月8日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的意思是，虽然他在目前支持把拉沃和施奈德尔第二提为候选人，但他远不是要在原则方面与这些人团结起来；相反地，拉沃恰好在他活动的最盛时期遭到了“新莱茵报”的无情攻击；但是，现在根本谈不到红色民主主义者和无色民主主义者[blassen Demokraten]，因为目前的任务主要还是反对君主专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红色民主主义者和无色民主主义者就必须联合起来反对“抱怨派”；

(2) 其次，哥特沙克医生在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表示，他能使科伦工人倾向于红色君主政体，就像倾向于红色共和国一样，从而把工人本身描绘成为对他盲目服从的机器；

(3) 上述报纸对拉沃的攻击极为卑鄙、恶毒，并且指责他身上的疾病，说什么他生病是假装的；

(4) 这家报纸的其他攻击大部分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荒唐可笑简直不值一驳；然而这些攻击暴露了它们的作者可鄙的仇恨，狠毒和卑劣的、背信弃义的性格；

(5) 哥特沙克医生在被宣判无罪以后，对许多工人联合会会员谈到改组工人联合会的计划以及他为了这个目的想把他本人（作

为主席)和由他选定的另外五人(作为委员会委员)置于联合会领导地位的意图,这证明有专制独裁的趋势并违反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6)由于企图实现这个新的组织方案,他背弃了真正无产者的政党而投入了小资产者的怀抱,因为他准备把每月会费提高到五个银格罗申;

(7)哥特沙克医生未受联合会委托,甚至没有通知联合会或它的领导机关,就擅自变动联合会的报纸,因而两个星期没有出报⁴²³;这是违反联合会权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无法开脱的,无论是哥特沙克此后很快就走了,或是有任何必要性或者认真的原因,都不能作为原谅这种行为的理由;

(8)哥特沙克医生在被宣判无罪以后,辜负了科伦工人的期望,没有像以前一样在他们当中重新开始他的进步活动,而是令人奇怪地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说,对工人所表现的忠诚和毅力没有表示任何谢意,就走掉了;

(9)哥特沙克医生由于过分迂腐而自愿流亡国外,并从布鲁塞尔寄来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无论如何既不能为他的行为作解释,也不能为他的行为辩护,因为他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竟在这个声明中说,他是否能回来只取决于“当今国内最高审判官”或是“人民的呼声”,可见他不是把全体人民的呼声,而是把别的什么人当作最高审判官;他这里所说的最高审判官只能是国王,因此他便直接转到正统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方面去了;另一方面,在这个声明中他又嘲笑人民,认为人民能够把凡是承认和求助于别的什么最高审判官而不承认和求助于人民呼声的人都召回来,他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最可怜的伪君子的角色,并力图为自己保留一条既通向国王

又通向人民的道路；

(10) 哥特沙克医生对于工人联合会请他解释他那个看来难以了解的所谓声明，尤其要指出他所说的“当今的最高审判官”是谁的要求，没有给予答复；

(11) 哥特沙克医生虽然没有得到谁的召请，还是回到了德国，因此这段自愿流亡国外的插曲就完全失去意义，而且，如果估计到这时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都为了把他选入柏林议会而卖力活动的話，那末这看来必定是一种考虑不周的竞选花招，——

鉴于这一切，科伦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声明：本会无论如何不能赞同哥特沙克医生自从此地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以后的行为，并且坚决地、愤怒地粉碎这样一种意图，即认为工人联合会能够让人利用去为红色君主政体的利益服务，或者容许人家利用对个别人的攻击把它引入歧途，或者强迫它接受一位主席和由谄媚者组成的委员会，或者召回为了赎罪同时恳求国王和人民宽恕的自愿流亡者，或者容许任何人像对待一群无知的小伙子一样对待工人联合会。

载于 1849 年 4 月 29 日
“自由、博爱、劳动”报第 2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工人联合会 1849年4月23日全体会议的决议

(1) 全体大会今后将在每星期三举行。

(2) 批准委员会所选出的由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威廉·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安内克、埃塞尔和奥托等人组成的、负责筹备在科伦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临时委员会。

载于1849年4月29日
“自由、博爱、劳动”报第2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召开工人联合会 代表大会的通知

不久以前，莱茵省民主联合会区域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退出了该委员会，同时这里的工人联合会已宣布退出莱茵省各民主团体联合会总会^①。所以采取这种步骤，是因为确信：由于这些民主团体成分复杂，很难指望它们会给工人阶级或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什么好处。

因此，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使各工人联合会的单一成分紧密团结起来，使他们致力于共同的活动。

为此目的，这里的工人联合会认为，首先必须建立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的临时委员会，并选举下面署名的人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责成他们采取一切为达到上述目的所必需的步骤。

临时委员会特邀请一切工人联合会以及所有其他暂时虽不用这个名称、然而**是坚决拥护社会民主派原则**的团体，都派遣自己的代表于下个月的头一个星期天（5月6日）⁴²⁴出席省代表大会。

列入议事日程的将有以下几个问题：

- (1) 组织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工人联合会；

^① 见本卷第 509 和 697 页。——编者注

(2) 选举出席将于 6 月间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

(3) 讨论和批准应交给代表带往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各项建议。

务请被选举出席这里的预备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于 5 月 6 日上午十时前携带委托书前往旧市场上西蒙的“克兰茨”旅馆报到。

卡·马克思(缺席) 威·沃尔弗

卡·沙佩尔 弗·安内克

克·约·埃塞尔 奥托

注意：书面通知请寄：下制帽坊街 17 号工人联合会主席卡尔·沙佩尔。

载于 1849 年 4 月 25 和 29 日
“新莱茵报”第 282 号和
第 285 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新莱茵报”编辑们的命运

……“新莱茵报”的各个编辑的命运是这样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在爱北斐特发表的演说而受到刑事追究；马克思、德朗克和维尔特，作为非普鲁士臣民，应该离开普鲁士；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要受司法追究：前者是因为没有履行军职，后者则是因为仿佛曾在旧有各省里犯过政治罪行；今天法院拒绝了把科尔夫交保释放的请求。

（“杜塞尔多夫日报”）

转载于 1849 年 5 月 22 日“德意志报”
第 140 号和 1849 年 5 月 23 日“特利尔
日报”第 12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报”
和“特利尔日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尔·马克思离开科伦

科伦。昨天早晨，“新莱茵报”前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先生同其他几个编辑一道离开了科伦，前往上莱茵河地区；在那里，他的活动将会像在这里一样卓有成效。

载于 1849 年 5 月 22 日
“新科伦报”第 1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科伦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新莱茵报”审判案

科伦 6 月 29 日。今天，违警法庭判决了去年 11 月开始的关于诽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⁴²⁵的案件。被传讯的有卡·马克思、恩·德朗克、格·维尔特、海·贝克尔、海·科尔夫、印刷厂主迪茨和贝希托特。前三人缺席。除科尔夫以外，其他人都会被宣判无罪；科尔夫（作为“新莱茵报”前发行负责人），因侮辱“可笑的施泰德曼”而被判处一个月徒刑并偿付七分之一的诉讼费。法庭断然驳回了就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夫斯基一事而向维尔特提出的控告。

载于 1849 年 6 月 1 日
“新德意志报”第 12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德意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通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

兹根据王国法院侦查员关于传讯下列人犯的命令，敦请各有关民政和军事当局，采取措施，缉拿下开人犯，彼等犯有刑法第九十六条所载之罪行，业已畏罪潜逃，一经查获，请予逮捕，并解交本人，计开：(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新莱茵报”编辑，巴门人，最近住在科伦……

代理检察长
国家检察官 艾希霍恩

1849年6月6日于爱北斐特

计开：(1)恩格斯。年龄：二十六到二十八岁；身高：五英尺六英寸；头发：浅色；前额：高耸；眉毛：棕色；眼睛：兰色；鼻和嘴：匀称；胡须：栗色；下颚：椭圆形；脸庞：椭圆形；脸色：健康；身材：匀称。特征：说话很快，近视……

载于1849年6月9日
“科伦日报”第13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日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马克思所写的“柏林的危机”和“柏林的反革命”等文是普鲁士酝酿和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直接反应。1848年11月1日国王撤换了普富尔内阁，政权落入公开反革命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之手。11月9日国王下令，要普鲁士国民议会由柏林迁往偏僻的市镇勃兰登堡开会。政变就这样开始了。到1848年12月5日国民议会被解散后政变遂告结束。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发动群众起来反抗酝酿中的反革命政变。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外回到德国之后，马上就着手实现他们的计划，即出版一份革命的机关报，他们认为这种机关报是教育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工具。从德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以民主派左翼即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一翼的面貌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这样也就决定了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出版的“新莱茵报”的方向。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师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为了把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迅速报道给自己的读者，编辑部常常一天中出两次报；当材料多得连四个版也登不完的时候就出增刊，而当收到新的重要消息时就以传单形式出特别附刊和号外。决定报纸对异常重要革命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这些社论都标有“*科伦”和“**科伦”的记号。标有星花的编辑部的文章有时也登在报纸的其他栏中（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的通讯栏）。每一位编辑除了修改通讯稿件和帮助总编辑作组织

工作外，都负责研究其一方面的问题。恩格斯写有关柏林国民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辩论情况的评论，写有关匈牙利的革命战争、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的文章，而在1848年11月到1849年1月期间则写了一系列关于瑞士的文章。威廉·沃尔弗写关于德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特别是西里西亚的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情况的文章，并且还负责“国内新闻”栏的工作。格奥尔格·维尔特负责编辑诗体和散文小品文栏。恩斯特·德朗克一度当过“新莱茵报”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员，他写了一些关于波兰的文章，在1849年3月至5月写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的评论。斐迪南·沃尔弗很长一段时期是“新莱茵报”驻巴黎的通讯员之一。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也参加了报纸的工作，但是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只写过一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还是经马克思彻底修改过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1848年10月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在报纸上发表了她的革命诗歌。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当局以不承认马克思的普鲁士的公民权来刁难他，不让他莱茵省居住，并且还对该报编辑，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连串的控诉。在科伦九月事件之后，军事当局于1848年9月26日宣布科伦戒严，并且封闭了好几家民主报纸，其中也有“新莱茵报”。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有被捕的危险，因此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科伦；威廉·沃尔弗也不得到普法尔茨去避一避，后来又在科伦藏了好几个月，以防警察局的通缉。在1849年1月以前，由于恩格斯被迫离开德国，编辑部的主要重担（包括写社论在内）就落在马克思一人的肩上了。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

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5页。

- 2 指1848年11月5日“新普鲁士报”上登载的“勃兰登堡内阁”一文。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这个报还称为“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报头上画有十字。——第5页。
- 3 “协商论”（《Vereinbarungstheorie》）是以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为代表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用来为自己的叛变行为辩护的论据，它主张普鲁士国民议会应当只限于“在法制的基础上”通过同国王协商的办法来确立立宪制度。——第5页。
- 4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和以后的几篇文章是他被迫居留瑞士时写的。1848年9月26日科伦宣布戒严，并颁布了逮捕“新莱茵报”的几位编辑（其中也包括恩格斯）的命令。恩格斯从普鲁士流亡到比利时，但立刻又被驱逐到法国。他在巴黎作了短期的逗留以后，于10月徒步去瑞士（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49—571页恩格斯的手稿“从巴黎到伯尔尼”）。11月9日左右，恩格斯到了伯尔尼，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849年1月。在流亡期间，恩格斯不断地给“新莱茵报”写文章，还写了不少带有通讯性的短评。在“昔日的公国”、“新的代表机构。——瑞士运动的成绩”、“联邦法院的选举”、“联邦委员会委员剪影”、“国民院”、“瑞士报刊”等文章中，恩格斯以鲜明的笔调描绘出了当时瑞士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生活的局限性、地方主义；而当时的瑞士恰好是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理想。——第7页。
- 5 诺恩堡-瓦连迪斯公国（德国对纽沙特尔及其领地瓦兰兰的称呼）在1707—1806年间是普鲁士所属的一个小邦。1806年，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纽沙特尔并入法国。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纽沙特尔并入瑞士联邦，成为瑞士联邦的第二十一州，但同时继续保持它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1848年2月29日纽沙特尔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最终结束了普鲁士的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1857年普鲁士被迫正式放弃

- 对纽沙特尔的特权要求。——第7页。
- 6 神圣的埃尔曼达德是十五世纪末叶由西班牙王权建立的城市联盟，目的是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大封建主，以维护专制制度的利益。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的武装力量执行了警察的职能。后来人们就转而把警察称为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第7页。
- 7 “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报”（《Constitutionnel neuchâelois》）是瑞士君主立宪派的报纸，从1831年起至1848年2月在纽沙特尔出版。
“纽沙特尔共和主义者报”（《LeRépublicain neuchâtelois》）是瑞士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报纸，从1848年3月起至1849年10月在拉绍德封出版，从1849年11月起至1856年在纽沙特尔出版。——第8页。
- 8 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1847年7月瑞士议会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因此宗得崩德便在11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9页。
- 9 1848年前瑞士立法机关——联邦议会的议员们，受到本州政府颁布的旨在极力阻挠在联邦议会内实施任何一种进步措施的法令的限制。——第9页。
- 10 Moderados（莫迭腊多斯，即温和派）是西班牙温和自由党的名称。该党是在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自由党分裂成右翼——莫迭腊多斯和左翼——埃克萨尔塔多斯（即激进派）的结果而形成的。——第10页。
- 11 “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日报”（《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是激进党的机关报，1842年起在日内瓦出版，并以此名称一直出版到1861年。——第12页。
- 12 1847年联邦议会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瑞士由国家联盟改组为联邦国家，废除寺院特权，禁止耶稣会活动。资产阶级对封建教权反动派

- 的这一胜利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获得的。——第 12 页。
- 13 1848 年 10 月 24 日在夫赖堡（法国称作：弗里布尔）州发生了天主教会所组织的骚乱，目的是要推翻该州的民主政府，这个政府是在宗得崩德被击溃后成立的。骚乱很快就被平息了。——第 13 页。
- 14 威廉·退尔是关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据说，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第 13 页。
- 15 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关于勃兰登堡内阁所说的一句话：“不是勃兰登堡在议会，就是议会在勃兰登堡。”1848 年 11 月 9 日的“新普鲁士报”在引用这句话时这样解释：“勃兰登堡将在议会，而议会已在勃兰登堡。”——第 14 页。
- 16 指从 1417 年起管辖封疆伯爵领地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第 14 页。
- 17 传说查理五世在逝世前不久曾为自己举行了一次葬礼，并且亲自参加了出殡仪式。——第 14 页。
- 18 指 1532 年在累根斯堡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查理五世刑律（*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残酷著称。——第 14 页。
- 19 法王路易十六（路易·卡佩特）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人民起义时，曾企图寻求国民议会的保护。8 月 10 日君主政体被推翻；翌日国王被捕。国民公会审判了路易十六，认为他犯有危害民族自由和国家安全的罪行，宣布处以死刑。1793 年 1 月 21 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1848 年 6 月 19、21、22、26 日“新莱茵报”第 19、21、22、26 号及 9 月 9 日“新莱茵报”第 98 号上曾登载了有关审判路易十六的一组文章——“国民公会关于前法王路易·卡佩特的辩论”。——第 14 页。
- 20 1848 年奥地利帝国国会的大多数斯拉夫议员属于资本家地主集团，他们力图建立一个以君主制奥地利为首的斯拉夫联邦国家。——第 15 页。

- 21 1848年11月9日，在普鲁士国民议会宣布了国王关于将议会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的命令以后，大部分右翼议员便顺从地离开了会议大厅。——第15页。
- 22 马克思借用了海涅在1831年出版的“加里多尔夫就贵族问题致穆·冯·莫里特加伯爵书”一书序言中的形象的比喻：“高卢的雄鸡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内也已经破晓。”在这里高卢雄鸡的叫声象征着法国革命。——第18页。
- 23 席勒“奥尔良姑娘”第三幕第六场。——第19页。
- 24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第三幕第三场。——第19页。
- 25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日报，政府的官方机关报；1789年起在巴黎出版。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是革命政府的机关报。——第20页。
- 26 1848年11月3日“科伦日报”登载了一篇关于臆造的非洲“黑格兰”（Hyghlans）（半人半猿）部落的短文；文中谈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正在学习阿拉伯语。”11月5日的“新莱茵报”曾嘲笑过这篇报道，并加以评论：“这种发现……无论如何对于抱怨派来说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因为他们可以从黑格兰人身上获得颇有价值的支持。”关于抱怨派见注172。——第20页。
- 27 根据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宪法，1848年12月法国应举行总统选举。这个宪法赋予作为执政当局的首脑的总统以巨大的权力。这是统治阶级——慑于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资产阶级——日益走向反革命的明证。12月10日举行选举的结果，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第20页。
- 28 马克思把1789年6月20日的巴黎事件和1848年11月11日的柏林事件作了对比。1848年11月8日国王签署了关于将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的命令。国民议会的大多数通过了一项继续在柏林开会的决定来回答此项命令。11月10日国民议会被赶出它往常开会的地方——话剧院，11月11—13日议会在射击俱乐部开

- 会。——第 21 页。
- 29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 1802 年起即以此名称出版；1848—1849 年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派资产阶级怯懦的和反革命的立场，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 21 页。
- 30 1848 年 11 月 14 日和 15 日“新莱茵报”第 142 号（增刊）和第 143 号刊登了格·维尔特的“在英国拒绝缴纳与 1832 年改革有关的税款”一文。——第 21 页。
- 31 这是马克思给 1848 年 11 月 14、17、18 和 19 日“新莱茵报”第 142（增刊）、145（特别附刊）、146 和 147（增刊）号上连载的标题为“卡芬雅克先生”的几篇文章写的编者按语。这几篇文章转载（略经修改）自“新闻报”。它们连续发表在该报 1848 年 11 月 7—11 日各号上，总标题是“在 6 月 23 日起义情况调查委员会面前的卡芬雅克先生”。——第 23 页。
- 32 这是对法国士兵给拿破仑第一取的绰号“小伍长”的改写；暗示路易·波拿巴流亡英国时参加过特种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在破坏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 23 页。
- 33 指卡芬雅克将军参加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以及在 1848 年担任该地总督期间对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血腥镇压。正是卡芬雅克的这些“成绩”使他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赢得了可靠的“秩序的维护者”的声望。——第 23 页。
- 34 “新闻报”（《La Presse》）是 1836 年起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在 1848—1849 年期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艾·日拉丹曾任该报编辑。——第 23 页。
- 35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指导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民主团体的活动，马克思在这个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

根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

议，1848年6月底成立了由科伦三个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执行区域委员会的职能。1848年8月13—14日，在科伦召开的莱茵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加下确定，由科伦三个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组成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活动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里亚。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到工厂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工作的决议。

鉴于普鲁士国内开始了反革命政变，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还在国民议会作出相应决议之前，便在1848年11月14日召集莱茵省居民拒绝纳税。

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在莱茵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848年11月19日“新莱茵报”第147号增刊报道了各个城市和农村（如维特利希、别恩堡、波恩、科伦及奈海姆）反抗征税的情形，结尾写道：“柏林只有靠外省的革命毅力才能保全，外省的大城市，尤其是各个省会只有靠乡村的革命毅力才能保全。拒绝纳税（不论直接税或间接税）就能使乡村有大好机会来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第24页。

- 36 指1848年8月28日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的人身保护法（与1679年英国的法令相似，该法令称为 Habeas Corpus Act（人身保护法））；这一法令一开始就被普鲁士政府粗暴地破坏了。——第25页。
- 37 本文标题是马克思从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6篇中引用来的。——第28页。
- 38 “新普鲁士报”的报头上印有一个后备军的十字勋章，勋章上有一句题词：“前进，天佑吾王，天佑吾国”。往下在正文中引用了1848年11月11日“新普鲁士报”第115号上的话。——第28页。
- 39 马克思讽刺普鲁士财政大臣汉泽曼所提出的措施与十八世纪荷兰交易所商人品托的观点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前者主张以强制公债作为刺激货币流通的手段，后者把证券投机当作促进周转的因素。参看“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08—

- 309页)。——第28页。
- 40 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所谓“行动内阁”）自1848年6月25日至9月21日执掌政权。
1848年夏在柏林城里除普通警察外还组织了一支携带武器的便衣警察，他们专门破坏人民群众的街头集会和演说，并且进行特务活动。这支警察部队被称为 *КОНСТЕБЛЫ*（特别警察），因为他们的行动和参加破坏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的英国特别警察的活动如出一辙。——第28页。
- 41 *Santa casa*（圣殿）——人们对马德里宗教裁判所的建筑物的称呼。——第29页。
- 42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八章。——第32页。
- 43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 Staats-Anzeiger*》）是1819年创刊于柏林的一家报纸。自1819年至1848年4月是普鲁士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自1848年5月至1851年7月，该报成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名称照旧。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这是人们根据报纸老板的名字对该报的称呼，原名是“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该报从1785年起以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针。——第36页。
- 44 所谓“枢密官区”是柏林西南部的一个街区，普鲁士官员大多居住于此。——第36页。
- 45 1848年10月31日，柏林获悉奥地利反革命在维也纳疯狂镇压起义的消息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示威游行以手无寸铁的机械制造工人遭到市民自卫团第八营的挑衅性袭击而告终。普鲁士反动派利用这次挑衅事件撤换了普富尔内阁，代之以公开反对革命的勃兰登堡内阁。——第36页。
- 46 市政厅位于柏林的中心区。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区还保留着科恩

- (Köln) 或阿特科恩 (Altköln) 的古称。1848 年 11 月 14 日普鲁士国民议会在此举行。——第 36 页。
- 47 由于这个呼吁书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马克思、沙佩尔、施奈德尔第二遭到了控告 (见本卷第 286—306 页)。——第 39 页。
- 48 根据 1848 年 9 月 12 日所通过的瑞士宪法, 联邦法院的成员由联邦议会的两院即国民院和联邦院联席会议选出。——第 40 页。
- 49 “瑞士国民报” (《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是一家资产阶级日报, 1842 年起在巴塞尔出版。——第 40 页。
- 50 指 1848 年 10 月 24 日在夫赖堡 (弗里布尔) 爆发的反民主叛乱 (见注 13)。马利耶主教是这次叛乱的煽动者。——第 41 页。
- 51 “窝州新闻” (《Nouvelliste Vaudois》) 是瑞士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798 年创刊, 1914 年以前在洛桑出版; 在四十年代带有激进色彩。——第 41 页。
- 52 “瑞士信使报” (《Courier Suisse》) 是一家反动报纸, 从 1840 年起到 1853 年在洛桑出版。——第 41 页。
- 53 1848 年 10 月 25 日马利耶主教被捕。10 月 30 日, 加入教区的各州 (弗里布尔、伯尔尼、窝州、纽沙特尔和日内瓦) 的政府代表在夫赖堡 (弗里布尔) 举行会议。会上决定释放马利耶主教, 但禁止他在上述五州居留和进行活动。12 月 13 日马利耶被驱逐出境, 直至 1856 年为止。——第 42 页。
- 54 指 1848 年 11 月 23 日在科伦举行的莱茵民主主义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有关拒绝纳税运动的问题, 以及吸引农民同反革命派斗争的问题。马克思参加了大会的工作。——第 44 页。
- 55 由于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给“新莱茵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企图推翻对他和检察长茨魏费尔的控诉, 因此马克思讽刺地称科伦检察官是“新莱茵报”的“新的、大有前途的撰稿人” (见“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一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202—204 页)。——第 46 页。

- 56 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临时中央政权的决议,这个政权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被推选担任这一职务)和帝国内阁组成。临时中央政权没有自己的预算和军队,没有任何实力,它只是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反革命政策的执行者。——第52页。
- 57 “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四十年代它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茹·巴斯蒂德在1836—1846年间曾担任该报外交政策栏的编辑。
“国民评论”(《Revue nationale》)是基督教民主派的刊物,1847年5月至1848年7月在巴黎出版,负责人是菲·毕舍和茹·巴斯蒂德。——第52页。
- 58 马克西米利安·加格恩受帝国摄政王政府的委托到柏林和什列斯维希去参加关于和丹麦休战的谈判。此行完全失败,因为普鲁士和丹麦毫不重视软弱无力的中央政权的代表。
马克思把加格恩这次毫无结果之行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德国流行很广的约·提·海爾梅斯所写的小说“索菲娅从默麦尔到萨克森旅行记”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相比,这位女主人公在旅途中消磨了十多年的时间,但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地。——第53页。
- 59 1848年4月巴登发生了共和派起义,领导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起义由民主派队伍从瑞士边境进攻开始。到4月底,这一准备得不充分、组织得不好的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第54页。
- 60 首府州(Vorort)——对瑞士联邦代表会议后来是联邦议会举行会议的那个州的称呼。——第54页。
- 61 Quidquid delirant reges, plectuntur Achiui——昏君闯祸,黎民遭殃(贺雷西“书信集”第一辑第二封信)。——第54页。
- 62 1848年10月23日德意志中央政权致瑞士首府州伯尔尼的这份照会发表在1848年11月6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上。——第55页。

- 63 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是德国作家克·奥·符尔皮乌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本属于所谓“匪盗”小说之列的小说，于十八世纪末出版，受到很大欢迎。

卡尔·穆尔是席勒所写的“强盗”这个剧本中的主角。

施因德汉斯 (Schinderhannes) —— 意为屠夫汉斯，是德国强盗约翰·毕克列尔的绰号，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 第 56 页。

- 64 暗指路易·波拿巴，他曾利用自己和拿破仑第一的亲属关系进行投机。—— 第 56 页。

- 65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二十一章。—— 第 58 页。

- 66 1848 年 4 月巴登共和派起义失败后，它的领导人之一弗里德里希·黑克尔逃亡到了瑞士。他在瑞士的一个乡村穆坦茨 (巴塞尔州) 一直居住到 9 月，后来便到美国去了。—— 第 60 页。

- 67 1848 年 11 月 20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向中央政府呼吁，请求它通过住在柏林的帝国专员帮助委任一个在国内享有威信的内阁，也就是委任一个和公开反对革命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比起来更能为普鲁士资产阶级所接受的内阁。—— 第 63 页。

- 68 这些名称是马克思从德利加尔斯基告杜塞尔多夫居民书中引来的；“新莱茵报”紧接着这篇文章发表了这个文告。文告中说：

“我作为一个虔信上帝、忠于国王的共产主义者，兹声明如下：为了救济杜塞尔多夫的贫穷的兄弟们，只要我住在此地，我将通过此地的出纳总局每年支出一千塔勒，并按月将钱交给本地市济贫金出纳处……同胞们！请效法这个榜样，做一个崇高的共产主义者吧。这样，这里及其他任何地方很快就会建立起安宁、和平和信任来。

公民冯·德利加尔斯基

11 月 23 日于杜塞尔多夫”

由于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德利加尔斯基对“新莱茵报”提出控告，说该报造谣诬蔑（见本卷第 686 页）。—— 第 64 页。

- 69 指杜塞尔多夫邮政总局局长毛伦布勒歇尔于 1848 年 11 月 21 日发表的声明，这篇声明谴责市民自卫团干涉邮政局的工作。——第 67 页。
- 70 关于人身保护法见注 36。——第 68 页。
- 71 Code pénal——是 1810 年法国通过的刑法典，沿用于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1815 年莱茵省合并于普鲁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省。——第 69 页。
- 72 见“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521—526 页）。——第 70 页。
- 73 见“逮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90—193 页）。——第 70 页。
- 74 引自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诗人马·克劳狄乌斯的“莱茵葡萄酒之歌”。——第 70 页。
- 75 迪什是科伦的一个旅馆；米连茨是柏林的一个旅馆，1848 年 11 月 15 日普鲁士国民议会在这里举行会议。——第 70 页。
- 76 1848 年 9 月底帝国司法大臣，要求科伦检察机关控告“新莱茵报”编辑部，因为该报发表了一系列小品文，该文以施纳普汉斯基骑士为名嘲笑了著名的反动分子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小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是格·维尔特写的，刊载在 1848 年 8—9 月、12 月和 1849 年 1 月的“新莱茵报”上，文章没有署名。——第 71 页。
- 77 根据 1831 年宪法选举出来的苏黎世州政府，由于 1839 年 9 月 6 日保守派和教权派的叛乱被推翻了。自由派在 1845 年的选举中获胜，重新掌握了政权。——第 72 页。
- 78 S. Franchini. 《Statistica della Svizzera》. Lugano, 1827; 《Nuova statistica della Svizzera》, 1848. ——第 75 页。
- 79 “洛桑日报。瑞士报纸”（《Gazette de Lausanne et Journal Suisse》）——1798 年在洛桑创刊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第 75 页。
- 80 “执行权委员会”（《Commission du pouvoir exécutif》）是制宪议会为

- 了代替已经卸去全权的临时政府而于 1848 年 5 月 10 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 1848 年 6 月 24 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第 76 页。
- 81 指 1806 年在纽伦堡出版的匿名小册子“深受屈辱的德国”（《Deutschland in seiner tiefen Erniedrigung》）。书商依·弗·帕尔姆为了出版这本反对拿破仑统治和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小册子而被法国当局枪杀了。——第 78 页。
- 82 “奥地利事件调查委员会报告。——本报告是因费奈迪、亨利·西蒙、维斯涅尔和鲍恩什米德等议员的质问和收到大批关于奥地利事件请愿书而提出的”。这个报告发表于 1848—1849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制宪议会记录”第 2 卷第 602—619 页上（《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gebenden Reichs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2, Frankfurt am Main, 1848—1849, S. 602—619）。——第 78 页。
- 83 艾塞勒和柏塞勒是约·威·克利斯特恩匿名出版的讽刺性小册子“1847 年 4 月艾塞勒博士和柏塞勒男爵出席省议会会议旅途散记。现代史的风俗画。”1847 年莱比锡版（《Doctor Eisele's und Baron von Beisele's Landtagsreise im April 1847. Genrebilder aus der neuesten Zeitgeschichte》. Leipzig, 1847）中的两个滑稽人物。——第 79 页。
- 84 指 1784 年出版的，十九世纪又多次再版的卡·阿·科尔图姆的讽刺长诗“约卜西之歌。怪诞滑稽的史诗，共分三章”。附在诗集中的谈谐的旅行图上画着复杂曲折的迷途。——第 79 页。
- 85 席勒的诗歌“奖杯”（德文标题是《Der Taucher》——“潜水员”）中的一句的改写。——第 79 页。
- 86 韦尔凯尔是多卷集“政治辞典，一名政治学百科全书”（《Staats-Lexikon oder Encycloä * 9 〕 die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的发行人之一，本书第一版于 1834—1848 年在阿尔托纳出版。——第 79 页。

- 87 阿伦特整理的民歌。——第 81 页。
- 88 罗西尼的歌剧“唐克莱德”中的一句歌词。——第 81 页。
- 89 根据维也纳会议（1814—1815 年）的决议，莱茵河两岸的土地划入普鲁士版图。此外，还给普鲁士国王的称号添上了莱茵大公的头衔。1815 年 4 月 5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为庆贺这个地区并入普鲁士而发表了一篇宣言，允诺在莱茵省和全国实行代议制。——第 87 页。
- 90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在伦敦举行的示威游行，由于军队和特别警察的干涉而被破坏了。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向议会呈递第三次请愿书，要求议会通过人民宪章。
- 1848 年 5 月 15 日，巴黎工人的革命发动被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了。
- 1848 年 6 月 25 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中。
- 1848 年 8 月 6 日，米兰为镇压了意大利北部民族解放运动的奥地利军队所占领。
- 1848 年 11 月 1 日，维也纳为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所占领。——第 89 页。
- 91 1848 年 7 月 25 日，在库斯托查（意大利北部）附近，奥地利军队在拉德茨基的指挥下击败了皮蒙特军队。——第 92 页。
- 92 见“‘模范国家’比利时”和“模范的立宪国家”两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67—370 和 518—520 页）。——第 98 页。
- 93 哀杰克斯是莎士比亚的“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的人物，一个粗鲁矜夸的军人形象。——第 99 页。
- 94 宗得崩德——见注 8。——第 103 页。
- 95 巴尔托洛医生是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尔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也是罗西尼和莫扎特的同名歌剧中的角色。——第 111 页。
- 96 1848 年 12 月 5 日，国王颁布了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命令。内阁在对

- 该命令的补充说明中谴责议会不服从 11 月 8 日发布的将议会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的命令,说什么采取这个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代表的辩论自由,使之不受首都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恐怖行动的影响”。——第 117 页。
- 97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 1848 年 5 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就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第 118 页。
- 98 1848 年 12 月 5 日在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同时,还颁布了钦定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实行两院制,第一议院因年龄和财产资格的限制变成了享有特权的“贵族院”;根据 1848 年 12 月 6 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有资格参加选举第二议院议员的两极选举。按照宪法,国王享有广泛的权力,能够直接指示修改宪法条文,这就便利了反革命势力的进一步进攻。——第 118 页。
- 99 约卜西之歌——见注 84。——第 118 页。
- 100 普鲁士亲王(人民切齿痛恨的反动宫廷权奸的头目)于 1848 年三月革命时逃往英国;但是在康普豪森内阁的支持下他在 1848 年 6 月 4 日又回到了柏林。康普豪森 6 月 6 日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会议上,企图把这次胆怯的逃跑说成是增长见识的旅行。——第 119 页。
- 101 摘自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一诗。——第 119 页。
- 102 指 1848 年 9 月 15 日委任接近宫廷权奸的弗兰格尔将军为勃兰登堡军区(柏林属这个军区管辖)的总司令。勃兰登堡侯国是普鲁士最早的中心地区,在中世纪由康尔马尔克和涅马尔克两部分组成;马尔克(Marken)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第 119 页。
- 10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以及在其他文章中讽刺康普豪森,称他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暗指当时一本名著的副标题:卡·罗泰克的“从历史认识的萌芽时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供有思考力的历史之友参考”1813—1818 年夫赖堡和君士坦士版(K. Rotteck. 《Allgemei-

neGeschicht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ß bis auf unsere Zeiten; für denkende Geschichtfreunde». Freiburg und Konstanz. 1813—1818)。——第 120 页。

- 104 见注 39。——第 120 页。
- 105 见“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12—113 页）。——第 120 页。
- 106 第二届联合会议是在康普豪森内阁时期于 1848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这一为了保持“法统”而召集的等级机关，通过了普鲁士国民议会选举条例，并同意政府发行在 1847 年遭到联合议会否决的公债。在此以后，议会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被解散。——第 120 页。
- 107 指在青年时代经营过黄油和粮食生意的康普豪森和从做羊毛生意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的汉泽曼。——第 128 页。
- 108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身强力壮但性情乖张的小伙子。见霍布斯“论公民”（《De Cive》）一书序言，该书第一版于 1642 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第 130 页。
- 109 马克思在这里引证普鲁士国王多次虚伪许下的在全国实施宪法和代议制的诺言。1815 年 5 月 22 日的命令答应成立“人民代议机关”——在普鲁士成立省等级会议，组织全普鲁士的代议机关并实施宪法。根据 1820 年 1 月 17 日颁布的公债法，国家发行公债的决定在征得等级代表机关（省议会）同意之后方能生效。但这些在资产阶级反抗运动的压力下所许的诺言只是纸上空谈。结果根据 1823 年 6 月 6 日的法令成立了具有有限谏议权的省等级会议（省议会）。但是，财政困难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47 年 2 月 3 日颁布了召开联合议会——由普鲁士各省议会代表组成的等级机关——的诏书。曾经否决政府公债的联合议会很快就被解散了。1848 年 4 月 8 日的选举法（由于普鲁士三月革命的结果而颁布的）规定召开一个“同国王协商”以制定宪法的议会。这个选举法所规定的两级选举制，保证了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官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第 131 页。

- 110 摘自汉泽曼于 1847 年 6 月 8 日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见“第一届普鲁士议会”1847 年柏林版第 7 部分第 55 页（《Preußens Erster Reichstag》. Th. 7, Berlin, 1847, S. 55）。——第 134 页。
- 111 指于 1821 年在克韦德林堡出版的希尔德布兰特的小说“库诺·冯·施莱根施坦，亦名预言家之梦”。——第 134 页。
- 112 黑和白——普鲁士国旗的颜色。——第 135 页。
- 113 关于特别警察见注 40。——第 138 页。
- 114 由于 1830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通过的 1831 年比利时资产阶级贵族宪法，给选民规定了高额的财产资格限制，从而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第 140 页。
- 115 海外贸易公司 (Seehandlung) 1772 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904 年正式成为普鲁士的国家银行。——第 141 页。
- 116 关于取消贵族、军官、僧侣和教师过去享受的所谓等级税免纳权的法案，是汉泽曼于 1848 年 7 月 12 日向普鲁士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取消土地税免纳权的法案，是于 1848 年 7 月 21 日提出的。——第 142 页。
- 117 弗拉·迪亚沃洛 (魔鬼大哥) 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的著名强盗米凯尔·皮茨的绰号，是奥伯的同名歌剧中的人物。——第 142 页。
- 118 见“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和“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三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23—125、325—331 和 360—366 页）。——第 143 页。
- 119 指“保护财产和保障一切阶级的福利联盟”的领导人于 1818 年 8 月 18 日左柏林召开的容克代表大会，大会将这个联盟改名为“保障地主利益联盟”；这个代表大会获得了容克议会的称号。——第 144 页。

- 120 1848年7月31日在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个小城市施魏德尼茨（波兰称作：斯维德尼察），反对反革命军官压制市民自卫团的抗议游行被镇压了。施魏德尼茨事件在全德国引起了反应。——第144页。
- 121 1848年8月9日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了经议员舒尔茨修正过的议员施泰因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军务大臣发出指示，敦促对立宪制度怀有不满情绪的军官“履行荣誉的天职”，自动提出辞呈。陆军大臣施莱根施坦不顾议会决议，不肯发出这样的指示。因此，施泰因于9月7日在国民议会的会议上重新提出自己的提案，提案表决的结果，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被迫辞职；在继任的普富尔内阁期间，指示终于缓慢地发出了，但这个指示只是一纸空文。1848年9月17日弗兰格尔将军发布了一道军令，这道军令证明了普鲁士军阀公开进攻革命成果的意图。军令指示要保障“社会安宁”，威胁“反对法制的分子”，并且号召士兵团结在军官和国王的周围。——第144页。
- 122 这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7年4月11日联合议会开幕时发表的御前演说中的话。国王在这篇演说中声明，他绝不同意实施他称之为“写满字的纸片”的宪法。——第145页。
- 123 1814年钦定的路易十八立宪宪章第十四条宣称：“国王是国家的元首”。——第146页。
- 124 “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约翰”提出的一个文件。大宪章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的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作了一些让步；而对基本的居民群众即农奴，这个中世纪的等级宪章并未给予任何权利。——第146页。
- 125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十七世纪到1903年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第147页。
- 126 “瑞士信使”（《Schweizer Bote》）是1798年创刊的“持论公正和消息灵通的瑞士信使”（《Der aufrichtige und wohlerrfahrene Schweizer

Bote》)的简称,1804年起在阿劳(阿劳州)出版。

“巴塞州人民报”(《Basellandschaftliches Volksblatt》)是瑞士自由派报纸,1835年在巴塞州创刊。——第149页。

- 127 见“逮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第150页。
- 128 1848年8月9日至30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谓里斯康土审判案,是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的政府为了迫害民主派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控诉的理由是,从法国回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于1848年3月29日同驻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里斯康土小村的一队士兵发生了冲突。——第152页。
- 129 科伦工人联合会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盟员安·哥特沙克于1848年4月13日创立的。联合会起初约有会员三百人,到5月初就增至五千人,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手工业者。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各行各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ln》),而从1848年10月26日起则是“自由、博爱、劳动”报(《Freiheit, Brüderlichkeit, Arbeit》)。联合会在城市中有许多分会。在哥特沙克被捕后,莫尔于7月6日当选为主席,到科伦九月事变以前,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以后由于有被捕的危险,不得不逃往国外。10月16日,马克思应工人的请求,暂代联合会主席职务。2月28日沙佩尔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到1849年5月底。

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哥特沙克、安内克、沙佩尔、莫尔、列斯纳、严森、勒泽尔、诺特荣克、贝多尔夫)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工人联合会在初期是处于哥特沙克的影响下。哥特沙克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忽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任务的意义,实施抵制全德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间接选举的宗派主义策略,在选举时反对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哥特沙克的词句非常左而斗争的方法却非常温和,如以工人的名义向政府和市政府呈递请愿书,只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支持有手工业者偏见的落后工人的

许多要求等。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策略一开始就遭到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路线的许多会员的反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在6月底开始有了转变。从1848年秋天起，科伦工人联合会在农民中也展开了大规模的鼓动工作。联合会的会员在科伦郊区组织了民主团体和工人联合会，散发了革命文件，其中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联合会同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其他一些工人联合会保持有紧密的联系。

1848年冬，哥特沙克和他的追随者展开了激烈斗争，企图分裂科伦工人联合会。从1849年1月起，他们在自己所办的“自由、劳动”报（《Freiheit, Arbeit》）上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进行猛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诽谤。但是，这种分裂活动没有得到大多数会员的支持。

为了巩固联合会，马克思、沙佩尔以及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于1849年1、2月间对联合会进行了改组。2月25日通过了新的会章，会章宣布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4月间，工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联合会的会议上讨论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人在革命进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政策的失望，——所有这一切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在1849年春实际提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脱离了关系，但是在反对即将来临的反革命的斗争中，并不拒绝和他们采取共同的行动。4月16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决定退出德国各民主团体联合会，加入以莱比锡为中心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1849年5月6日，召开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但是，德国当时的局势（反革命的进攻，警察迫害的加剧）妨碍了科伦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的活动。自从“新莱茵报”停刊和马克思、沙佩尔以及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离开科伦以后，该会就日益失去了政治性质而逐渐变为一般的工人教育团体。——第152页。

130 指“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ln》），该刊于1848年4月出版至10月份止；1848年7月以前主编是安·哥

特沙克,在7月至9月期间是约·莫尔。这个刊物介绍了科伦工人联合会以及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1848年10月24日,承印该刊的印刷厂厂主阿·布罗克尔-埃维列尔茨被提起诉讼。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在该刊第12期上刊载了“医生哥特沙克和安内克被捕”的文章,在第13期上又刊载了“科伦的逮捕事件”的文章;说什么这两篇文章侮辱了宪兵和检察长茨魏费尔 的尊严。法庭判决印刷厂主以一个月的监禁,如果再出版这个刊物,则要缴纳大量罚金。从10月26日起,科伦工人联合会开始出版新的机关报——“自由、博爱、劳动”报(见注409)。——第153页。

- 131 九月法令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该法令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的人处以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第153页。
- 132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4—1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各城市的八十九个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一切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为此成立了区域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会址设在柏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有弗吕贝尔、劳、克利盖,当选为候补委员的有拜尔霍费尔、许帖和安内克。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软弱和动摇,德国民主运动在通过这个决议以后,仍然是涣散的和无组织的。——第154页。
- 133 “对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的倾向性的政治审判。由科伦陪审法庭于1848年12月21日、22日和23日审理。玛·弗·安内克根据文件、被告供词和审讯速记记录公布。‘新科伦报’出版科出版”(《Der Politische Tendenz-Prozeß gegen Gottschalk, Anneke und Esser. Verhandelt vor dem Assisen-Hofe zu Köln am 21., 22. und 23. Dezember 1848. Herausgegeben nach den Akten, nach Mittheilungen der Angeklagten und nach stenographischer Aufzeichnung d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en von M. F. Anneke.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r Neuen

K Fölnischen Zeitung》)。本文中的全部引文都是马克思从这本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伦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 für Bürger, Bauern und Soldaten》）是德国革命民主派的报纸，1848年9月10日至1849年6月14日弗·安内克和弗·博伊斯特在科伦出版。该报的任务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在城乡劳动者中以及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第155页。

- 134 指1848年7月4日普鲁士国民议会会议，在这次会上继续讨论了关于设立专门委员会来调查波兹南事件的问题。在会议结束时决定赋予该委员会以无限的权能；这个标志着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失败的决定通过以后，右翼议员违反议会规程，力争表决关于限制该委员会的权限的提案。左翼议员为了表示抗议，离开了会场。右派就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了不许该委员会前往波兹南讯问证人和鉴定人的提议。这样就非法地取消了会议的最初决定。——第157页。

- 135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君主立宪主义者、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人们的机关报。该报在1847年到1850年间出版，1848年10月以前在海得尔堡出版（主编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随后迁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巴登政府的机关报，从1757年起于卡尔斯卢厄出版。——第157页。

- 136 关于科伦三个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工人业主联合会——的合并问题，见注35。——第160页。
- 137 关于拉提博尔、勃罗姆堡和闵斯德各地方法院的决定以及柏林高级法庭的决定的报道载于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第163页。
- 138 “德意志改良报，立宪德国的政治性报纸”（《Die Deutsche Reform, politische Zeitung für das constitutionelle Deutschland》）是1848—1851年间在柏林出版的一家德国日报，君主立宪主义集团的机关报。——

第 163 页。

- 139 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第 164 页。
- 140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由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开会一事——见注 1。——第 166 页。
- 141 “野蛮的狩猎”——德国神话故事中有这样一种传说：每逢夜间，死者的亡灵在“野蛮的猎人”的率领下，发出恐怖的叫喊声，在空中疾驰。碰见了这些亡灵的人就得永远跟它们一起漂泊流浪。——第 166 页。
- 142 1848 年 12 月，奥地利反革命政府在强制公债问题上遭到了帝国国会的反抗，于是就求助于银行。但是，政府只是在以没收银行全部现金储备相威胁后才得到了借款。——第 167 页。
- 143 引自席勒的“欢乐颂”一诗。——第 173 页。
- 144 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为了防止人民运动的发展，在 1846 年当选以后，随即出面倡导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特赦部分政治犯，废除书报预检制度，等等）。在罗马人民起义以后，庇护九世于 1848 年 11 月 24 日逃往那不勒斯王国境内的加埃塔要塞。——第 173 页。
- 145 山岳党是聚集在“改革报”（《La Réforme》），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周围、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

“国民报”派联合了以阿尔曼·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同它有联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依靠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在四十年代，这一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e National》）的周围；该报自 1830 年至 1851 年在巴黎出版。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反映了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情绪，他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防止革命和保持奥尔良王朝的手段。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是奥迪隆·巴罗。

正统主义者是 1830 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

的拥护者。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靠山的当权的奥尔良王朝的斗争中，一部分正统派往往采取社会蛊惑的手段，把自己装扮成保护劳动者免受资产阶级剥削者奴役的好人。——第 174 页。

- 146 “告我所宠爱的柏林人”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柏林人民起义方酣时于 1848 年 3 月 19 日早晨颁布的文告。

“告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48 年 3 月 21 日颁布的文告。——第 186 页。

- 147 弗里德里希斯海茵是柏林的一个公墓，这里埋葬着在街垒战中牺牲的 1848 年 3 月 18 日起义的参加者。——第 187 页。

- 148 执行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命的陆军少校维登布鲁赫在 1848 年 4 月 8 日递交丹麦政府的一份照会中说，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丹麦的这两个公国，而是为了反对“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分子”。普鲁士政府竭力回避正式承认这个有损它的名誉的文件。——第 187 页。

- 149 指弗·恩格斯的文章“战争的喜剧”、“和丹麦的休战”（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8—40、289—292 和 455—459 页。——第 188 页。

- 150 在 1848 年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爆发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起义。由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的干涉，开始了反对丹麦的军事行动；但是很快就真相大白，普鲁士政府并不打算捍卫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1848 年 8 月 26 日于马尔摩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休战协定，这个协定把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化为乌有，并且实际上保存了丹麦在这两个公国的统治。1849 年 3 月底，普鲁士和丹麦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一直继续到 1850 年，结果丹麦获胜。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第 188 页。

- 151 根据普鲁士将军普富尔的命令，参加 1848 年波兹南起义的被俘人员都被剃成光头，并用硝酸银在他们手上和耳朵上打上烙印。——第 190

页。

- 152 指 1848 年 5 月 15 日残酷镇压那不勒斯人民起义的西西里两岛的国王斐迪南二世。见恩格斯的“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21—24 页）。——第 190 页。
- 153 文迪施格雷茨指挥下的军队于 1848 年 6 月镇压了布拉格起义，11 月 1 日扑灭了维也纳起义，并在 1848 年 12 月开始进军反对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占领了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和其他城市。——第 190 页。
- 154 同革命的法国作战的奥普联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在 1792 年 7 月 25 日的宣言中威胁法国人民，说要把巴黎从地球上消灭掉。——第 192 页。
- 155 关于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发挥的关于奥地利帝国内各斯拉夫民族的命运的观点，参看本卷说明第 XIX—XXI 页。——第 193 页。
- 156 指 1846 年 2 月的加里西亚事件，当时在波兰土地上爆发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克拉科夫的起义者暂时取得了胜利。同时在加里西亚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阴险地利用了被压迫的乌克兰农民对波兰小贵族的仇视，于是在一些地方成功地驱使起义的农民去反对波兰的起义队伍。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第 196 页。
- 157 卢西人是资产阶级人种志学家和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柯维纳的乌克兰居民的称呼，流行于十九世纪。这些地方的居民被用暴力同全体乌克兰人民分割开来；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乌克兰人民才最终重新统一了。——第 196 页。
- 158 见“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71—411 页）。——第 197 页。
- 159 指 732 年在普瓦提埃战役中法兰克人对阿拉伯人的胜利。——第 199 页。

- 160 1241年，在西里西亚的瓦尔施塔特（波兰称作：多勃勒地区）附近发生了会战，结果蒙古人战胜了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但是，蒙古人没有利用这次胜利就从西里西亚进攻匈牙利去了。——第199页。
- 161 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召开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会上暴露了哈布斯堡帝国压迫下的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两种倾向的斗争。包括代表大会领导人（帕拉茨基、沙法里克）在内的右派即温和自由派，企图用保存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国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左派即民主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极力主张与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采取联合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并且积极参加了布拉格起义的那部分代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留在布拉格的温和自由派的代表于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不定期延期。
- 1848年6月在阿格拉姆（萨格勒布）举行了南方斯拉夫民族代表会议。——第200页。
- 162 引自科苏特1848年11月9日在匈牙利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见1848年11月11日“公报”（《Közlöny》）。——第206页。
- 163 黑色和黄色是奥地利国旗的颜色。——第207页。
- 164 关于法国刑法典（Code pénal）第三七〇条——属于诽谤章——见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审讯中的发言（本卷第279—280页）。——第208页。
- 165 这里是指瑞士各州和欧洲各国订立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约。这种条约从十五世纪中叶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纪中叶。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中，瑞士的雇佣兵曾充当君主反革命势力的工具。——第209页。
- 166 “喧声报”（《Le Charivari》）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于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该报对政府进行了辛辣的攻讦；在1848年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和卡芬雅克的专政。——第210页。
- 167 “进化报”（《Die Evolution》）是革命民主派的周报，是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1848年至1849年由约·菲·贝克尔任主编，在俾

- 尔(伯尔尼州)出版;1848年12月1日,该报以“革命报”(《Die Revolution》)的名称试行出版。——第212页。
- 168 恩格斯没有续写这篇文章,因为他在1849年1月中已返回科伦。——第213页。
- 169 全名是“普鲁士君主立宪拥护者同盟”,成立于1848年6月,地方设有分支机构。这是一些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组织。“普鲁士同盟”支持政府的反革命政策。因此民主刊物根据它的活动把它叫做“告密社”。——第214页。
- 170 “市民联合会”(《Bürgervereine》)是三月革命后在普鲁士产生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组织,其任务是在君主立宪范围内维护“法制”和“秩序”,以及同“无政府状态”即同革命民主运动作斗争。——第215页。
- 171 1848年12月5日钦定宪法的最后条款和召开议院会议的命令都规定,在最后批准宪法和对宪法宣誓以前,由议院对宪法条文进行修改。——第215页。
- 172 原文中用的是双关语:《wühlen》和《heulen》,指《Wühler》和《Heuler》。《Wühler》(“煽动者”)是1848—1849年期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送给民主共和派的绰号,而后者则把自己的对手称为《Heuler》(“抱怨派”)。——第220页。
- 173 Code civil——拿破仑民法典,1804年通过,曾在法国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后,这个法典在该省境内继续有效。——第224页。
- 174 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处死刑;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被驱逐出境。
在法国,波旁王朝第一次被推翻是在1792年,第二次是在1830年。在比利时,拿骚国王威廉1830年被推翻。——第227页。
- 175 1839年1月21日普鲁士(代表关税同盟)和荷兰签订了通商条约。条约上规定的荷兰糖的入口税很低,这给普鲁士制糖工业带来了严重的

危害，同时也使德国各大城市的商业遭到损失。——第 228 页。

- 176 指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第 231 页。
- 177 普什塔——匈牙利草原，位于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多瑙河沿岸的一个盆地里。——第 233 页。
- 178 席尔达——城市名称。该城居民——席尔达人是十六世纪末流传在德国民间的同名故事（《Schildbürger》）里所描写的人物，他们是庸人的无知和愚蠢的象征。——第 234 页。
- 179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1848 年在柏林出版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第 234 页。
- 180 1848 年 4 月 8 日的选举法规定了“普鲁士宪法协商会议”的选举程序。选举在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然而，普选权是有限制的，即受间接的（两级的）的选举制的限制。1848 年 12 月 6 日继钦定宪法之后颁布的法令，仅仅给了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以选举权（见注 287）。——第 234 页。
- 181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八章。——第 236 页。
- 182 1848 年 2 月 24 日——法国人民在这一天推翻了法国路易-菲利浦王朝。
1848 年 3 月 18 日——普鲁士革命在这一天开始。在柏林发生了街垒战。——第 239 页。
- 183 引自歌德的小说“威廉·马斯特的修业时代”第 5 卷第 16 章，即描述米尼昂的诗篇。——第 241 页。
- 184 关于抱怨派见注 172。——第 244 页。
- 185 指执行权委员会——见注 80。——第 249 页。
- 186 歌德“漂泊者的夜歌”。——第 258 页。
- 187 梯利——三十年战争时期天主教同盟统帅。1631 年 5 月 20 日他在攻占了马格德堡以后，让他的士兵洗劫该城。城市几乎全被士兵烧毁，变

- 成了废墟。三万市民惨遭杀害。——第 260 页。
- 188 普鲁士政府在 1849 年 1 月 23 日的向驻德意志各邦的普鲁士外交官员的通告中,提出了恢复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构——联邦议会的计划。这个议会是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强加于德国人民的反动的封建机构。——第 260 页。
- 189 “新莱茵报”审判案是在 1849 年 2 月 7 日举行的。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的有“新莱茵报”总编辑卡·马克思、编辑弗·恩格斯、发行负责人 (Gerant) 海·科尔夫。他们被控的罪名是,他们在“新莱茵报”1848 年 7 月 5 日第 35 号上发表的一篇标题为“逮捕”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90—193 页)中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的宪兵。虽然法庭从 7 月 6 日起就开始侦讯,但是首次开庭审讯规定在 12 月 20 日才进行,后来又延期。在 2 月 7 日的审判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律师是施奈德第二,科尔夫的辩护律师是哈根。当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时,“出席旁听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审讯记录中这样写道。——第 262 页。
- 190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而召集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称为协商派 (Vereinbarer)。——第 271 页。
- 191 在 1848 年 7 月 18 日“新莱茵报”第 48 号上发表了一篇杜塞尔多夫通讯。这篇通讯尖锐地批评了检察长施纳泽反对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的演说。——第 276 页。
- 192 马克思指的“新莱茵报”就尤·符尔夫 (1848 年 7 月 10 日第 40 号)、法肯海恩 (1848 年 7 月 13 日第 43 号)和约瑟夫·沃尔夫 (1848 年 8 月 1 日第 62 号)等人被捕事件而进行的揭露。检察长黑克尔对后一篇通讯提出了反驳(载于“新莱茵报”1848 年 8 月 3 日第 64 号)。“新莱茵报”编辑部针对他的反驳写了一篇短评:“黑克尔先生和‘新莱茵报’”(1848 年 8 月 4 日第 65 号)。——第 277 页。
- 193 见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203 页)。——第 282 页。

- 194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周围的反动党羽（格拉赫弟兄、拉多维茨和其他等人）。——第 283 页。
- 195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在 1849 年 2 月 8 日举行的。卡·马克思、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他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曾于 1848 年 11 月 18 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本卷第 39 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第 286 页。
- 196 关于“野蛮的狩猎”见注 141。——第 297 页。
- 197 关于 Habeas Corpus A kte 见注 36。
国民议会在 1848 年 10 月 13 日通过的市民自卫团法使民众武装完全依附于政府。然而，即使这种形式的民众武装在反革命看来也是一种危险，所以在 1848 年 11 月 12 日弗兰格尔的军队开进柏林后，民众武装就被解除了。——第 298 页。
- 198 关于施泰因提议的军令见注 121。——第 299 页。
- 199 翁鲁“新编普鲁士历史概论”1849 年马格德堡版（Unruh. 《Skizzen aus Preußens neuester Geschichte》.M agdeburg, 1849）。——第 300 页。
- 200 宾夕法尼亚监狱是个设有单身牢房的监狱。第一所这样的监狱，1791 年修建于费拉得尔菲亚城（美国夕法尼亚州）。单独监禁在十九世纪在欧洲非常流行。1844 年在德国修建的有名的柏林莫阿毕特区监狱和其他一些监狱就是这种类型的监狱。——第 309 页。
- 201 指 1849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举行的对“新莱茵报”编辑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讯。——第 310 页。
- 202 指发表在 1849 年 2 月 3、4、9 和 10 日“科伦日报”第 29、30、34 和 35 号上的列·许金的“政治对话”。瓦格纳是对话人之一，他对乌里宁教授说：“你总是有点佯装摩菲斯特斐勒司。”——第 310 页。
- 203 珈桑德拉是古希腊英雄史诗中的女预言家。——第 312 页

- 204 关于“普鲁士同盟”见注 169。——第 313 页。
- 205 1848 年 11 月 22 日拉萨尔在诺伊斯（在杜塞尔多夫附近）民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呼吁：在必要的情况下应给普鲁士国民议会以武装支援。当天拉萨尔就被捕了。——第 319 页。
- 206 Code d' instruction criminelle 是一部在莱茵省有效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往下马克思引用了这部法典的第三六〇条。——第 320 页。
- 207 关于恩格斯在本文中发挥的关于奥地利帝国内各斯拉夫民族的命运的观点，参看本卷说明第 XIX—XXI 页。——第 322 页。
- 208 《Aufruf an die Slaven. 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ichael Bakunin. Mitglied des Slavenkongresses in Prag》. Koethen, 1848. ——第 323 页。
- 209 见恩格斯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62—676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论波兰”，恩格斯的“路易·勃朗在第其戎宴会上的演说”、“‘满意的’多数派议员”，以及 1848 年 1 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所做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09—412 页、第 423—426 页、第 430—437 页、第 444—459 页）。——第 326 页。
- 210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第 327 页。
- 211 绍克人——居住在斯拉窝尼亚和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人的绰号，他们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第 328 页。
- 212 摩尔拉克人——居住在达尔马威亚的塞尔维亚族，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第 330 页。
- 213 见恩格斯的“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31—653 页）、“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论波兰”的演说、“三个新宪法”、“致‘改良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223—275 页、第 410—412 页、第 528—533 页和第 542—544 页）。——第 334 页。

- 214 斯拉夫菩提树是1848年4月底成立的一个捷克国民协会。布拉格协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沙法里克、加乌奇)的手中,他们在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之后转入反革命阵营,而在各省分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主要是捷克激进的资产阶级代表。——第338页。
- 215 同盟会——1848年3月在捷克出现的民族的,主要是大学生的组织。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在反拿破仑解放战争的影响下产生的德国大学生的组织;这些组织主张统一德国。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中除进步思想外,也广泛流行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第340页。
- 216 瓦特堡纪念大会是德国大学生于1817年10月18日为了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这一表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纪念大会后来形成了反对派大学生反对梅特涅统治的示威游行。——第340页。
- 217 阿·本策尔于1819年就耶拿大学生联合会解散一事而作的歌曲。——第340页。
- 218 等级委员会是1842年在普鲁士建立的。这些委员会是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划分从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各等级委员会组成的联合机关——联合委员会,行使谏议职能。——第343页。
- 219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4年”柏林版第96页(《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44》. Berlin, S. 96)。——第344页。
- 220 文中所引的统计表和统计材料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已根据奥·泰·维尼格尔出版的“第一届普鲁士议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Preubens Erster Reichstag》. Th. 7, Berlin, 1847)加以更正。——第344页。
- 221 卡·阿·康普茨著“普鲁士立法、法学与诉讼程序年鉴”1831年柏林版第37卷第407页(K. A. Kamptz. 《Jahrbücher für die Preußische Gesetzgebung,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echtswervaltung》. Bd. 37, Berlin, 1831, S. 407)。——第346页。

- 222 “普鲁士公法”第二篇第二〇章第三三节（《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zweiter Theil, zwanzigster Titel, § 333）。——第 346 页。
- 223 关于马克思在普鲁士联合议会第二议院选举时期的策略见本卷第 688 页。——第 355 页。
- 224 这一思想包括在恩·德朗克的“国民议会八月七日和八日的会议”一文中，见 1848 年 8 月 13 日“新莱茵报”第 74 号。——第 356 页。
- 225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 1742 年起在布勒斯劳出版；在 1848—1849 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是君主立宪集团的机关报。——第 356 页。
- 226 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 358 页。
- 227 1849 年 2 月 16 日和 17 日，在科伦审理了金克尔案件，他的被控罪名是侮辱驻美因兹的普鲁士警备部队。金克尔被判处一个月的监禁。——第 359 页。
- 228 “改革报”（《La 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自 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从 1847 年 10 月起 1848 年 1 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自 1848 年 2 月 26 日至 1851 年 12 月 2 日在巴黎出版，主编是埃·巴莱斯特。
“民主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自 1848 年 11 月 7 日至 1849 年 6 月 13 日在巴黎出版，主编是沙·德勒克吕兹。——第 360 页。
- 229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 年创刊，1852 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 1844 年 11 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始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乔·哈尼也是编辑之一。自 1843 年至 1850 年该报发表过弗·恩格斯的论文和短

评。——第 360 页。

- 230 指意大利的几家民主报纸——“黎明报”（《L'Alba》），1847 年至 1849 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现代人报”（《Il Contemporaneo》），1846 年至 1849 年在罗马出版，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协和报”（《La Concordia》），1848 年至 1849 年在都灵出版。——第 360 页。
- 231 在“新莱茵报”第 225 号附刊中对这份奥地利的情报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恩格斯在本文的结尾也援引了这份情报。——第 366 页。
- 232 由于 1848 年 11 月 16 日人民起义的胜利和随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在罗马实现了普选制。在普选制的基础上，1849 年 1 月 21 日选出了制宪议会。制宪议会于 2 月 9 日剥夺了罗马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存在到 1849 年 7 月 3 日，因遭到外国干涉的打击而倾覆。——第 369 页。
- 233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 postamts-Zeitung》）是 1619—1866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一家德国报纸，属于享有邮政特权的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诸侯。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该报是中央政权——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第 373 页。
- 234 “往事述评或上届政府的机要档案”（《Revue rétrospective ou Archives secrètes du dernier Gouvernement》）是茹·塔谢罗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汇编，自 1833 至 1838 年按月出版，在 1848 年则不定期出版。在该汇编 1848 年第 3 期上公布了 1840 年、1842 年、1844—1847 年七月王朝外交部的秘密开支的清册，其中记有每年付给基佐政府的密探、“法兰克福总邮报”编辑卡·彼·倍尔利的津贴。——第 373 页。
- 235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 年 4 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 10 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

- 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 373 页。
- 236 1849 年 2 月 20 日“法兰克福总邮报”第 44 号上引用了“德意志改良报”上所刊载的一篇巴黎通讯中的一段。——第 373 页。
- 237 本文中所以引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普鲁士议会开幕时的御前演说的全文,发表在 1849 年 2 月 28 日“新莱茵报”第 233 号特别附刊上。“新莱茵报”在这篇文章后面所刊载的御前演说辞,把这段话改成:“我深感遗憾的是,必须宣布首都及其近郊戒严,以便恢复法定秩序和社会安全。诸位,相应的提案将立即提交给你们审议。”——第 375 页。
- 238 关于九月法令见注 131。——第 375 页。
- 239 白厅是柏林王宫中的一座大厅; 1849 年 2 月 26 日在这里举行了重新召集的普鲁士议会第一次两院联席会议。——第 377 页。
- 240 指普鲁士政府 1849 年 2 月 9 日颁布的关于修改旧的工商业章程的两个命令: 即关于实施工商业谘议 (Gewerbe-*rat*) 制度和关于实施工商业仲裁 (Gewerbegerichte) 制度的命令。——第 379 页。
- 241 Gagging laws (禁口律) —— 这是人们对英国在 1819 年颁布的六个特别法令的称呼, 这些法令限制了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第 379 页。
- 242 “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自 1843 年至 1879 年以该名称在莱比锡出版; 1848 年夏天以前该报所持的是保守方针, 以后则采取自由主义方针。——第 382 页。
- 234 在卢格起草的“德国改良派激进党的选举宣言”(1848 年 4 月)中, 曾宣称全德国民议会的首要任务是“表达事变的理智”。——第 383 页。
- 244 该报(“民主总汇报”)没有出版。——第 383 页。
- 245 “改革报。民主派机关报”(《Die Reform. Organ der demokratischen

- Partei))——是德国一家报纸,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从1848年4月起由阿·卢格和亨·伯·奥本海姆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主编是爱·梅因;从1848年夏季到五十年代初该报在柏林出版。——第383页。
- 246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土地贵族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第386页。
- 247 争夺北美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州的斗争,以美英两国于1846年共同瓜分该州而告终。从此,美国就伸展到了太平洋沿岸。——第386页。
- 248 在1845—1849年间,英国在印度对锡克教徒国家进行了多次掠夺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是整个旁遮普全被东印度公司吞并。——第386页。
- 249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包林这次发言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85—292、450、453页。——第386页。
- 250 Petty sessions (即决法庭)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诉讼程序审理小案件。
Quarter sessions (季度法庭)是治安法官的例庭,每年举行四次。——第391页。
- 251 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同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394页。
- 252 1849年3月4日,暗中操纵年轻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奥地利的宫廷权奸,举行了政变,强使国家接受反民主的新宪法;3月7日,正在

- 克累姆西尔举行会议的帝国议会被解散。——第 397 页。
- 253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7 年 4 月 11 日联合议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所作的声明：他是“未被削弱的王权的继承者，所以也应该使王权不被削弱地传给自己的后嗣”。——第 401 页。
- 254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凡是贴在街头上供大众观看的号召、声明和告示，统称为招贴。这种招贴是政治斗争中的锐利武器，是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工具。——第 401 页。
- 255 黑、红、黄这三种颜色是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象征。——第 402 页。
- 256 路易-菲力浦政府于 1834 年颁布的所谓 *crieurs publics* (报贩) 法，目的在于阻难反政府派的出版物的推销。——第 402 页。
- 257 在 1815 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普鲁士政府力图取消曾在该省实行的法国资产阶级法典，而代之以封建的普鲁士法，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恢复莱茵省贵族的封建特权（长子继承权）、实施普鲁士刑法和婚姻法等的洗律、指令和法令。这些措施在莱茵省引起了坚决的反对，在三月革命以后，终于为 1848 年 4 月 15 日的法令所废除。——第 403 页。
- 258 汉泽曼创办的“立宪报”（《Constitutionelle Zeitung》）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1849 年春在柏林创刊。——第 408 页。
- 259 见注 145。——第 419 页。
- 260 1848 年 3 月 16 日，法国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这种附加税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由于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第 420 页。
- 261 指波旁王朝 1814 年 5 月的第一次复辟和拿破仑第一企图夺回帝位失败（“百日”）后的 1815 年 7 月的第二次复辟。——第 420 页。
- 262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89 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

- 命资产阶级的观点。——第 421 页。
- 263 1848 年 5 月 15 日,由布朗基、巴尔贝斯等人所领导的巴黎工人举行了革命发动,反对资产阶级制宪议会压迫工人的反革命政策,并向它提出了许多要求,其中包括巴尔贝斯提出的向富人征收十亿税款的要求。——第 421 页。
- 264 1849 年 3 月 7 日至 4 月 3 日在布尔日对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这次审判的结果,1849 年 4 月 2 日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十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第 421 页。
- 265 指 1848 年 12 月 29 日“新莱茵报”第 181 号上刊载的“三月同盟文献”一文,该文揭露了法兰克福左派人物中的小资产阶级首领们的真面目,这些人由于采取不彻底的政策,从而帮助了反革命。“新莱茵报”称他们为“我国革命中的吉伦特派”。——第 424 页。
- 266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反动的“天主教联盟”,这个联盟的首脑是极右派的头子拉多维茨,马克思称他为“普鲁士反革命的主脑”(见本卷第 541 页)。——第 424 页。
- 267 暗指罗泰克著的当时一本有名的书的副标题(见注 103)。——第 425 页。
- 268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斐扬派俱乐部,是代表和王权有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以及自由派贵族的利益的。它团结了君主立宪的拥护者。——第 425 页。
- 269 卡尔·福格特是 1848—1849 年“三月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他比“新莱茵报”所预言的更坏,——他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雇佣密探。见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1860 年)。——第 425 页。
- 270 引自哥·奥·毕尔格勒的叙事诗“列诺尔”。——第 427 页。
- 271 暗指沙皇军队对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镇压。——第 427 页。

- 272 帝国法庭是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德国的最高诉讼机关，由于它处理案件时极端拖拉和缓慢以及其成员的贪赃枉法，成了大家谈笑讥讽的话柄。随着所谓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消灭，帝国法庭也于1806年不复存在了。——第428页。
- 273 在1848年4月底5月初镇压波兹南起义的时候，普鲁士军队在米洛斯拉弗附近吃了败仗，并在弗勒申（弗热斯尼亚）附近枪杀了波兰的起义者（见本卷第188—189页）。
所谓普鲁士军队的“胜利”，是恩格斯对普鲁士军队残酷镇压安哈尔特（1849年3月）、美因兹（1848年5月）的人民运动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48年9月）的起义的讽刺反语。——第428页。
- 274 指巴黎工人1848年六月起义一周年。——第430页。
- 275 康普豪森曾经是1842—1843年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的股东之一。——第430页。
- 276 弗里德里希斯海茵见注147。——第431页。
- 277 省等级会议（省议会）在普鲁士于1823年设立，由四个等级（诸侯、贵族、城市和村镇）的代表组成。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的一切诡计，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省议会由国王召集，其职权范围仅限于地方经济和本省的管理问题。省议会拥有非常有限的谏议职权，即有权对政府提交它们讨论的各种法案表示自己的意见。1843年，国王以在普鲁士实行统一的立法为理由，提交莱茵省议会讨论一个新的刑法草案，以代替莱茵省的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法国刑法典。第七届莱茵省议会（1843年）否决了这个法案，宣称莱茵省的现行立法完全符合莱茵省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第432页。
- 278 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7年2月3日关于召集联合议会的诏书（特许状）。——第432页。
- 279 乌凯马尔克是勃兰登堡省（属普鲁士）的北部地区，是反动的普鲁士寇克的堡垒。——第434页。
- 280 神圣的埃尔曼达德见注6。——第434页。

- 281 指维也纳和会（1814—1815年），在这次会议上，欧洲反动派的首领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悍然不顾各国人民恢复统一和独立自主的利益，重新绘制了欧洲的地图，以便使各正统王朝复辟。——第 435 页。
- 282 由各省议会代表组成的所谓联合委员会，是为讨论新刑法草案而于 1848 年 1 月召集的。普鲁士政府召集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想借此造成准备进行改革的假象，来平息日益增长的社会骚动。委员会的活动为 3 月初在德国展开的革命发动所打断。——第 435 页。
- 283 指普鲁士国王 1821 年 3 月 6 日发布的命令，该命令规定有关叛国罪的普鲁士刑法在莱茵省生效。——第 436 页。
- 284 1848 年 12 月 5 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反革命政府解散了普鲁士国民议会，公布了所谓的钦定宪法并指定于 1849 年 2 月 26 日召开两院会议。——第 441 页。
- 285 抱怨派见注 172。——第 444 页。
- 286 在 1814 年 1、2 月出征拿破仑法国的时期，联军中的普鲁士军队在香槟（在奥布河岸巴尔、圣迪济埃、蒙米赖等地附近的战役中）打了许多败仗。
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城下的溃败使普鲁士投降了拿破仑法国。这次溃败表明，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已完全腐朽。——第 445 页。
- 287 1848 年 12 月 6 日关于第二议院选举的选举法令，承认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有选举权；这种含糊的说法使政府有无限的可能来缩小选民的范围。——第 447 页。
- 288 伦敦圣斯蒂凡教堂是韦斯明斯特大寺院的一部分，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下议院的会议就在此举行。
“无双议院”是 1815—1816 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
1848 年 2 月 24 日的议院是法国的众议院，它企图防止革命的扩展和保持君主制，遂举路易-菲力浦的孙子巴黎伯爵以接替路易-

- 菲利浦；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利浦逊位予巴黎伯爵。——第448页。
- 289 1849年3月12日，撒丁国王撕毁了1848年8月9日和奥地利签订的停战协定，3月20日又开始了军事行动。但是在3月23日皮蒙特军队就被击溃了。于是查理-阿尔伯特退位。新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于3月26日同奥地利人签订了停战协定，1849年8月6日缔结了和约。——第453页。
- 290 这是波兰国歌中的一句歌词。——第455页。
- 291 1848年夏天意大利北部发生革命时期，加里波第曾援助过查理-阿尔伯特。但是皮蒙特军队的统帅部一点也不援助加里波第的志愿部队，使它实际上不得不跟奥地利人单独作战；志愿部队被击溃而不得不向瑞士撤退。——第456页。
- 292 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于1884年组织的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出征。起义队伍从瑞士进入萨瓦，但被皮蒙特军队所击溃。——第458页。
- 293 指1849年3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一读通过的禁止俱乐部活动的法令。这个法令剥夺了工人的集合和结社的自由。——第459页。
- 294 1848年2月24日是法国路易-菲利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第459页。
- 295 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人民游击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462页。
- 296 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传说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卫在维纳斯山旁，警告一切要想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第471页。
- 297 指拉多维茨的小册子“德国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8年汉堡版（《Deutschland und Friedrich Wilhelm IV》. Hamburg, 1848）。——第471页。

298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根据他于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所作的讲演而写的。约·魏德迈抄写的标题为“工资”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这部手稿跟“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本文几乎完全一致。1848年初,马克思试图在布鲁塞尔发表这部著作。可是,由于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而未能出版。

这部著作以“新莱茵报”社论的形式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首次发表,标题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由于马克思暂时离开科伦,后来又由于德国政局更加紧张以及“新莱茵报”的停刊,这些文章的刊载遂告中断。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首次发表,就已经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工人中的传播。例如,根据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曾被推荐给科伦和其他城市的工人联合会讨论。

“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曾想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单行本,但是他未能亲自实现这个想法。这部著作的单行本于1880年在布勒斯劳首次出版,马克思未能参与其事。1881年又在同一地方再版。在恩格斯的参加下,这部著作于1884年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并附有恩格斯写的一篇关于该书发表经过的简短序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第一种外文译本是俄文本(根据1880年德文版译出);该译本于1883年在日内瓦出版。

1891年,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这本小册子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订并作序。在这一版本中,恩格斯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以使文章的叙述符合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关于正文的重新校订,恩格斯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所作的一切更改,归纳起来只有一点。凡在原稿上是说工人为取得工资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地方,在现在的本子上都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接着,恩格斯论证了作这种更改的必要性。

所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仍然是不完全的。马克思于1847年12月写的手稿“工资”(见本卷第635—660页)可以作为正文的部分补充。

在本卷中,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的俄译文译自“新莱茵报”。凡恩格斯在1891年的单行本中新作的重要更改,均在脚注中注明。这部著作的章节是按“新莱茵报”发表时的样子划分的。——第473页。

- 299 正如恩格斯在其为 1891 年版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在报纸上尚未载完；在第 269 号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的字样，但这个诺言未能履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侵入匈牙利，德勒斯顿、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和巴登等地举行了起义——使该报本身停止出版”。——第 506 页。
- 300 在 1849 年 4 月 6、7、8、11 和 13 日“新莱茵报”第 265、266、267、269 和 271 各号上，刊载了格·维尔特所写的一系列小品文，嘲笑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1849 年 3 月 28 日所通过的关于选举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的决定。——第 510 页。
- 301 在 1849 年 3 月 23 日的诺瓦拉（意大利北部）会战中，奥地利军队打败了皮蒙特军队。关于这次会战，可参看恩格斯的“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一文（本卷第 458—468 页）。
- 由于匈牙利军队的进攻胜利，1849 年 4 月初奥地利军队被迫撤离佩斯，而把卫戍部队留在布达城的要塞中，对要塞的围攻继续到 5 月 2 日，这时要塞才被匈牙利人占领。
- 所谓埃克森弗尔德的“海战”，是恩格斯对德国海岸炮垒袭击丹麦分舰队以及 1849 年 4 月 5 日在埃克森弗尔德港口（什列斯维希）夺得两艘兵舰一事的讥讽；这个对于同丹麦战争的进程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的事件，曾被普鲁士官方报刊说成普鲁士军队的重大胜利。
- 1849 年 4 月 13 日，所谓的德意志联邦部队攻占了丹麦在杜佩尔村（什列斯维希）的防御工事。——第 510 页。
- 302 禁口律见注 241。——解 510 页。
- 303 见“关于奉 1848 年 12 月 5 日圣谕召开的议院辩论的速记记录。第二议院”1849 年柏林版第 462—465 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urch das Allerhöchste Patent vom 5. Dezember 1848 einberufenen Kammern. Zweite Kammer》. Berlin, 1849, S. 462—465）。——第 510 页。
- 304 1848 年三月革命以后，在波兹南爆发了波兰人反对反动的普鲁士压迫的民族解放起义；参加这个运动的不仅有领导运动的波兰小贵族，还有

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普鲁士政府于 1848 年 3 月作了让步，允诺成立一个委员会在波兹南进行改革；建立波兰军队，任命波兰人担任行政及其他职务，承认波兰语为波兹南的正式语言。然而，1848 年 4 月 14 日颁布的敕令却把波兹南公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波兰，西部归“德国”（不准“改组”）。波兹南起义遭到血腥镇压（1848 年 4—5 月）后，分界线在后来的几个月中越来越向东移动，最后几乎占领了波兹南大公国的全部领土。给波兰人许下的“改组”的诺言也没有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地反对普鲁士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对波兰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镇压（见“对波兰的重新瓜分”、“在波兹南的新政策”、“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等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62—63、110—111、371—431 页）。——第 511 页。

- 305 马铃薯战争是对 1778 至 1779 年普鲁士和萨克森一起同奥地利进行的所谓争夺巴伐利亚继承权的战争的讽刺性称呼，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所谓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因马铃薯而引起的军队的调动和士兵的争吵。——第 512 页。
- 306 “东方日报”（《Zeitung des O sten》）是 1849 年在波兹南出版的民主派的日报，出版者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波兹南民族委员会的委员弗·斯蒂凡斯基。——第 516 页。
- 307 见“六月十五日的协商会议”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92—93 页）。——第 517 页。
- 308 古斯塔夫-阿道夫同盟（于 1832 年创立）是一个为帮助德国天主教地区的基督教团体而建立的宗教组织。曾在科尼斯堡担任牧师的卢普因批评教会的教义而被革职，1846 年被开除出这个同盟。——第 519 页。
- 309 “光明之友”是 1841 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 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基督教会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协会”。——第 519 页。

- 310 引自普鲁士国歌。——第 521 页。
- 311 阿塔·特洛尔是海涅的同名长诗中的主角熊的名字。诗中许多地方，特别是第 7 章，谈的都是厌恶人类的熊对人们嘲笑的憎恨。——第 521 页。
- 312 拉萨尔于 1848 年 11 月 22 日在杜塞尔多夫被捕。他被控的罪名是号召武装反对国家政权（见本卷第 319—321 页）。莱茵省司法机关千方百计地拖延对他的审讯。拉萨尔曾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求他们替他辩护，为了回答这个要求，“新莱茵报”登载了一系列批评司法机关对拉萨尔滥用职权和采取非法行为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加了 3 月 3 日前往总检察官尼科洛维乌斯处抗议拖延对拉萨尔案件的审讯的代表团（关于这件事的报道，登载在 1849 年 3 月 6 日“新莱茵报”第 238 号上）。审讯于 5 月 3—4 日举行；陪审团宣判拉萨尔无罪。关于审判案的报道发表在 1849 年 5 月 8 日“新莱茵报”第 291 号增刊上。——第 531 页。
- 313 1849 年 4 月 27 日，普鲁士政府解散了第二议院。解散的理由是议院赞成 3 月 27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通过的帝国宪法。——第 534 页。
- 314 关于硝酸银见注 151。——第 536 页。
- 315 见“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这一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71—414 页）。——第 536 页。
- 316 煽动者见注 172。——第 540 页。
- 317 雅叙厅是柏林的一所大厅；1849 年 4 月 27 日普鲁士省议会第二议院被解散后，左派议员们曾在这里集会。这次集会被警察驱散了。——第 540 页。
- 318 拉萨尔因诉讼案第一次被关进监狱是在 1848 年 2 月至 8 月。他在 1846 年至 1854 年期间曾担任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的辩护人，他被控告的罪名是，他为了这个案子曾指使人盗窃文件匣。——第 543 页。

- 319 摘自席勒的叙事诗“保证”。——第 549 页。
- 320 巴塞爾曼——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1848 年 11 月 7 日以中央政权全权代表之一的身份前往柏林。回来以后，他于 11 月 18 日向议会报告说，普鲁士政府采取断然措施不无理由，因为据说近来在柏林街头出现了通常在无政府主义骚动以前出现的外表凶恶的人。由此便产生了“巴塞爾曼式的人”这句讽刺话。——第 549 页。
- 321 1848 年 9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爆发了抗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批准和丹麦休战的人民起义。当天，起义就被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镇压下去了。国民议会左派小资产阶级首领们的怯懦行为促使起义遭到失败。——第 550 页。
- 322 1848 年 9 月 26 日，当局慑于科伦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宣布在当地实行戒严“以保护生命和财产”。卫戍司令部下令禁止一切带有“政治和社会目的”的社团的活动，禁止在街头和广场上集会，解散市民自卫团并令其交出武器，成立军事法庭，勒令“新莱茵报”和许多其他民主派报纸停刊。——第 559 页。
- 323 1849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三个团体在科伦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三个团体是：工人联合会、民主联合会以及君主立宪派的“市民联合会”。其中“市民联合会”的代表大会是在科伦近郊多伊茨举行的。——第 560 页。
- 324 1848 年 9 月 25 日，科伦当局用逮捕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的许多领导人的办法挑起了当时已开始在内市构筑街垒的工人的过早的发动。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们曾尽了很大的努力，来阻止科伦工人举行过早的孤立的发动。次日，当局以“保护生命和财产”为由，在科伦实行了戒严。——第 561 页。
- 325 引自海涅的诗歌“妖魔”（《Der W echselbalg》）。——第 571 页。
- 326 根据 1660 年奥利弗和约，从前臣属波兰国王的东普鲁士被划归勃兰登堡选帝侯。——第 571 页。
- 327 指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三国于 1772 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第 572

页。

- 328 指 1795 年普鲁士和法国单独缔结的巴塞尔和约。——第 572 页。
- 329 1788 年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枢密官比硕夫斯威德的倡议，在普鲁士颁布了限制出版权利和信仰自由的敕令。——第 572 页。
- 330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并为 6 月 9 日维也纳最后决议批准的所谓德意志联邦法令尽是些有关宪法改革的模糊不清的诺言，这些诺言始终只是一纸空文。——第 573 页。
- 331 卡尔斯巴德决议是 1819 年 8 月在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会议所制定的一系列反动决议。这些决议规定在德意志各邦都实行书报预检制度，对大学实行最严格的监督，禁止大学生结社，成立迫害有反政府嫌疑的人（所谓“蛊惑家”）的中央侦查委员会。这些警察措施的倡导者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第 573 页。
- 332 Seehandlung——见注 115。——第 573 页。
- 333 “顺民的有限理智”是在德国广泛流传的普鲁士内务大臣冯·罗霍夫的一句话。——第 574 页。
- 334 指所谓“莱宁预言”（《Vaticinium Lehninense》）。这是一篇拉丁文史诗，产生于十七世纪末，但被认为是出自十三世纪莱宁修道院一修士的手笔。这部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讲述了统治勃兰登堡的王朝的罪恶，并预言了该王朝的灭亡。——第 574 页。
- 335 力图复活反动的封建理想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43 年颁布了恢复天鹅勋章的命令。天鹅勋章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骑士勋章，创于 1443 年，废于宗教改革时代。但是普鲁士国王的这种策划没有实现。——第 574 页。
- 336 见注 122。——第 574 页。
- 337 桑苏西宫是波茨坦的一座宫殿，普鲁士国王的行宫之一。——第 575 页。

- 338 1849年5月3日在德勒斯顿爆发的起义,于5月8日几乎完全被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为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奠下了始基。——第576页。
- 339 1849年5月初,在莱茵省、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等地爆发了维护同年3月27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起义,因为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德意志邦拒绝承认这部宪法。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但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首领们所领导的这次起义具有孤立和自发的性质,因而于1849年7月中旬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关于恩格斯曾亲自参加的这些起义的性质和经过可参看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76页。
- 340 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对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于1849年4月派遣了一个远征军团前往意大利。1849年4月30日法国军队被逐出罗马。——第576页。
- 341 马克思指三个反动君主——普鲁士国王、俄国沙皇和奥地利皇帝之间的密切关系。——第578页。
- 342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多数议员,不顾国王颁布的将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址迁往勃兰登堡的命令而继续在柏林开会,这些议员于1848年11月15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所驱散。
第二议院于1849年4月27日根据国王批准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报告书被解散。——第578页。
- 343 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在1849年5月起义时由德勒斯顿逃亡到科尼施泰因要塞躲藏起来。
“住在慕尼黑的帝国之马克西”即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某些议员曾推举他为德意志皇帝的候选人。——第578页。
- 344 阿尔古阿西尔是西班牙的警官。本文中的这段插话摘自塞万提斯的“惩恶扬善故事集”(“狗的谈话”)。——第592页。

- 345 《Ca ira》（“一切顺利”）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首革命歌曲。——第 595 页。
- 346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八章。——第 595 页。
- 347 指科伦陪审法庭在 1849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的审讯中宣判“新莱茵报”编辑和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委员无罪一事。——第 600 页。
- 348 见“许泽尔”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9—20 页）。——第 601 页。
- 349 见卡·马克思“普鲁士国王答国民议会代表团”一文（同上，第 509 页）。——第 601 页。
- 350 见卡·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同上，第 540—543 页）。——第 602 页。
- 351 见卡·马克思“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一文（同上，第 521—526 页）。——第 602 页。
- 352 塞克列入——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的匈牙利人。——第 609 页。
- 353 关于耶拿战役见注 286。
普鲁士要塞马格德堡和尤斯特林 1806 年 11 月向拿破仑军队不战而降。——第 616 页。
- 354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是民主派报纸，从 1848 年开始出版，1850 年停刊，1849 年 4 月 1 日以前在达姆斯塔德出版，4 月 1 日以后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9 年 10 月 1 日以前该报的主编是奥·吕宁，10 月 1 日以后主编是奥·吕宁、格·君特和约·魏德迈。——第 623 页。
- 355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是德国民主派报纸，1849 年 5 月 25 日至 1850 年 7 月 21 日由海·贝克尔在科伦出版。该报在“新莱茵报”停刊后紧接着开始出版，它企图以“新莱茵报”的继承者自居；该报编辑部声明，对“新莱茵报”的订户今后将改送“西德意志

报”。——第 623 页。

- 356 本文是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停刊后移居德国西南部期间写的。刊载于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报纸“城乡信使”(《Bote für Stadt und Land》)上。恩格斯写的第二页文章没有发表,因为那篇文章“以过分‘刺激’而遭到反对”(见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624 页。
- 357 鉴于法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事变即将到来,1849 年 6 月 2 日左右马克思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代表德国革命党同法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系。——第 624 页。
- 358 指普鲁士将军波伊克尔。1849 年 5 月 10 日以前,他在所谓的帝国政府中担任陆军大臣,后来指挥过镇压普法尔茨和巴登两地起义的帝国军队的一个军团。——第 625 页。
- 359 见注 145。——第 627 页。
- 360 指二十五人委员会(巴黎民主社会党选举委员会的一个机构)内部的革命派。这一派由工人俱乐部和秘密团体的活动家组成。民主社会党委员会在巴黎领导山岳党参加了 1849 年 5 月 13 日举行的法国立法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第 627 页。
- 361 艺术工艺学校是巴黎的一所学校。——第 628 页。
- 362 指“宪法之友民主联合会”——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国民报”派分子在 1849 年 5 月 13 日法国立法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时期成立的。——第 628 页。
- 363 赖德律-洛兰在 1849 年 6 月 11 日的立法议会上宣称:山岳党决心保护宪法,必要时用武力保护。——第 628 页。
- 364 指对里昂工人起义的血腥镇压,这次起义是在 1849 年 6 月 13 日巴黎事变的影响下而于 1849 年 6 月 15 日爆发的。——第 629 页。
- 365 由于 1848 年 9 月 26 日科伦实行戒严和“新莱茵报”暂时停刊以后在经济方面和组织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方面对报

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所有的全部现金都贡献了出来，这样，他实际上就成了该报的所有者。——第 630 页。

- 366 六月十三日事变之后，巴黎宣布戒严，并且开始了对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迫害。于是法国当局在 1849 年 7 月 19 日通知马克思说，已经下令把他从巴黎驱逐到摩尔比安（布列塔尼省的一个有害健康的沼泽地带）。由于马克思的抗议，驱逐令没有立即执行。——第 630 页。

- 367 “工资”是卡·马克思的手稿，这篇手稿同他的未完成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本卷第 473—506 页）有直接的联系，也是对该著作的补充。

“工资”这篇手稿过去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库中，直到 1924 年才用俄文在“社会主义经济”杂志上第一次发表，1925 年用原文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杂志上发表。从找到的手稿封面上写的字（“1847 年 12 月于布鲁塞尔”），从注明“已经论述过”这句简要的概述以及手稿的论述形式和内容本身来看，我们有根据这样推测：“工资”是马克思为 1847 年 12 月下旬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会议上的讲演的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所写的预备提纲。这种推测还为下面的事实所证实，即马克思在写好手稿的时候，就已经着手准备 1848 年 1 月 9 日他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在手稿上加的注证明了这一点）。

在“工资”这篇手稿中，以及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谈到工人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而在像马克思后期的经济著作中，谈的都是出卖劳动力。——第 635 页。

- 368 关于工作日长短和织布工人人数的资料，是马克思从卡莱尔的“宪章运动”一书中引来的。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五十万织布工每个在手织机旁工作十五小时，但是他们却通常不得一饱”。（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 31）——第 636 页。

- 369 包林的演说收入威·阿特金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1840 年伦敦版第 36—38 页（W. Aikinso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London, 1840, pp. 36—38)。——第 636 页。
- 370 包林在下院的演说中所说的这段话, 1848 年 1 月 9 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也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53 页)。——第 636 页。
- 371 马克思指的是卡莱尔就英国济贫法发表的下述意见:“如果使穷人成为不幸者, 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死亡。这就是消灭鼠患的普通办法: 堵塞住仓库的大小缝隙, 发出连续不断的猫叫声或警号, 使捕鼠器随时开动, 于是你们的这一群《chargeable labourers》(成为社会累赘的穷光蛋) 便会绝迹, 便能根除。更快的方法是砒霜, 这也许是更人道的方方法……”托·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 年伦敦版第 17 页(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 17)。——第 636 页。
- 372 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 年爱丁堡版第 319 页(J. R. M' Culloc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 1825, p. 319)。——第 637 页。
- 373 约·威德“中等阶级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 伦敦第 3 版第 125 页(J. Wad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3rd. ed., London, 1835, p. 125)。——第 637 页。
- 374 马克思指的是约·威德的著作中的下面这一段话:“所使用的劳动的数量(the quantity of employment) 在每一个工业部门中都不是固定的。它可以随着季节的更换、时尚的变化或生意的好坏而有所变动。”(见前引约·威德的著作第 252 页)——第 638 页。
- 375 指计件工资(见前引约·威德的著作第 267 页)。——第 638 页。
- 376 Trucks system——实物工资制。拜比吉关于这种工资制写道:“凡是工人领产品工资或是被迫从雇主店铺买东西的地方, 对工人们来说, 都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 结果就造成很大的贫困。”“在萧条期间, 在不减少名义工资的情况下, 用提高自己店铺里的商品价格的方法来降低实际支付的工资。这种办法对雇主来说, 太有诱惑力了, 他实难以抵制。”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本质”1832 年伦敦第 2 版第 304 页

- (Ch.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2nd. ed., London, 1832, p. 304)。——第 639 页。
- 377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34、35页 (A.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Economie industrielle》. T. I, Bruxelles, 1836, pp. 34, 35)。——第 639 页。
- 378 佩·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369、370页 (P. Rossi. 《Cours d' 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 pp. 369, 370)。——第 639 页。
- 379 安·舍尔比利埃“富人或穷人”1840年巴黎一日内瓦版第103—104、105、109页 (A. Cherbuliez. 《Riche ou Pauvre》. Paris—Genève, 1840, pp. 103—104, 105, 109)。——第 640 页。
- 380 约·弗·布雷“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1839年里子版第152、153页 (J. F. Bray. 《Labour' s Wrongs and Labour' s Remedy》. Leeds, 1839, pp. 152, 153)。——第 641 页。
391 见注 375。——第 644 页。
- 382 马克思引证的是他从卡莱尔的“宪章运动”一书摘录出来的一个材料：“爱尔兰约有七百万工人居民，根据统计材料，其中三分之一每年有三十个星期缺乏足够的即使是劣等的马铃薯。”(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 25) ——第 645 页。
- 383 指的是 1813—1815 年期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战争。——第 646 页。
- 384 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和“蒲鲁东”这两篇文章，是 1848 年 12 月初居留瑞士期间写成的；这两篇文章的手稿还保存着。——第 661 页。
- 385 指定于 1848 年 12 月 10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所引起的法国革命民主派内部的斗争。关于山岳党人见注 145。——第 661 页。
- 386 “人民报”(《Le peuple》)是法国报纸，蒲鲁东派的机关报，1848—1850

- 年间在巴黎出版；最初该报的名称是“人民代表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自 1848 年 9 月至 1849 年 6 月 13 日改称“人民报”；主编是比·约·蒲鲁东。——第 661 页。
- 387 所谓“纯粹的”（或称三色）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这个党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对巴黎革命无产阶级的镇压。——第 662 页。
- 388 指执行权委员会——见注 80。——第 662 页。
- 389 “真正的共和国”（La vraie République）是法国的政治和艺术性的日报，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该报从 1848 年 3 月 26 日起到 8 月 21 日被查封为止以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1849 年 3 月 29 日至 6 月 13 日以“真正的共和国报”这个名称继续出版；巴尔贝斯、托烈、比埃尔·勒鲁和乔治·桑参加了该报编辑部。——第 663 页。
- 390 “1848 年的人民之友”（《L' Ami du Peuple en 1848》）是法国革命民主派的报纸，1848 年 2 月 27 日至 5 月 14 日在巴黎出版，由弗·拉斯拜尔任主编。——第 666 页。
- 391 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 年巴黎版（P. J. Proudhon. 《Qu' 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Paris, 1840）。——第 668 页。
- 392 指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P. j.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第 669 页。
- 393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 of Offices（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或交换所）是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所创立的；1832 年，曾在伦敦创办过这种市场的罗·欧文领导了这一运动；在这些市场上，劳动产品是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的。这些企图在商

- 品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的乌托邦作法很快就失败了。——第 669 页。
- 394 引自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二十三章。——第 669 页。
- 395 K. Marx.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et Bruxelles, 184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页)。——第 670 页。
- 396 关于蒲鲁东的这篇演说见“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55—359 页)。——第 671 页。
- 379 见注 72。——第 675 页。
- 398 根据恩格斯的这份申请书,伯尔尼联邦议会于 1848 年 9 月 9 日给予他避难的权利。——第 676 页。
- 399 根据帝国司法大臣的要求,科伦检察机关以恩格斯曾于 1848 年 9 月间在科伦民众大会上的演说为理由对他提出控诉。关于逮捕恩格斯的命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600 页。——第 676 页。
- 400 人民委员会是 1848 年 11 月 13 日在科伦召开的抗议把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的民众大会上选举出来的。被选入委员会的有马克思以及博伊斯特、诺特荣克、魏尔、施奈德尔第二等人。委员会的任务是争取科伦市政委员会方面对国民议会的支持以及要求发还 9 月间被没收的科伦市民自卫团的武器。如果市政委员会拒绝满足这些要求,则应当撤换市政当局。人民委员会还着手改编后备军,使其脱离政府与军事当局的控制,同时还企图在工人中组织一支志愿部队。这些措施都由一个与新成立的后备军委员会有密切联系的特别委员会来领导执行。此外,人民委员会还在附近的乡村地区进行了许多工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拒绝纳税。——第 678 页。
- 401 指在莱茵省通行的法兰西刑法典(Code pénal)中的两条:关于反抗国家政权的代表的第二〇九条和关于煽动叛乱的第二一七条。——第 678 页。

- 402 帝国政府据以控告马克思、科尔夫等人诽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的理由是：(1) 1848年8—9月、12月以及1849年1月“新莱茵报”上未署名发表的格·维尔特的一组小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2) 1848年9月6日“新莱茵报”第95号上登载的一篇揭露利希诺夫斯基公爵的竞选阴谋的布勒斯劳通讯；(3) 1848年9月14日“新莱茵报”第102号上登载的一篇法兰克福通讯，其中揭露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施泰德曼所提出的关于与丹麦休战问题表决结果的假报告；(4) 1848年9月23日“新莱茵报”第110号所发表的科伦民众大会的决议，决议斥责那些投票赞成与丹麦休战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背叛人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97页）。——第680页。
- 403 原定于1848年12月20日审理的“新莱茵报”审判案宣布延期（见本卷第685页），推迟到1849年2月17日举行（见本卷第262—285页和注189）。——第680页。
- 404 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民主民族联合会分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48年12月9—11日在伯尔尼举行。——第681页。
- 405 指1848年8月23日至9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是由许多工人团体倡议召开的。在斯蒂凡·波尔恩影响下制定的代表大会纲领，向工人们提出了争取实现一系列狭隘职业要求的任务，从而使他们远离革命斗争。德意志工人中央委员会设在莱比锡。和波尔恩一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还有施温尼格尔和基克。——第681页。
- 406 “博爱报。全德工人通讯”（《Die Verbrüderung. Correspondenzblatt aller deutschen Arbeiter》）——德意志工人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1848年10月至1850年6月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期；1849年5月以前该杂志由斯·波尔恩主编。——第681页。
- 40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以审讯通知没有及时（十天以前）送给被告为理由：要求审讯延期举行。——第685页。

- 408 在“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见注 130)停刊后,“自由、博爱、劳动”报(《Freiheit, Brüderlichkeit, Arbeit》)便成为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它从 1848 年 10 月 26 日起开始在科伦出版,每周两次。发行人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彼·格·勒泽尔,主编是弗·普林茨。1848 年 12 月底,哥特沙克对报纸事务的干预使得该报停刊。1849 年 1 月 14 日起开始出版“自由、劳动”报(《Freiheit, Arbeit》,发行人是布罗克尔-埃维列尔茨。该报主编普林茨属哥特沙克派,执行分裂科伦工人联合会的路线。普林茨不服从 1 月 15 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任命的由沙佩尔、勒泽尔与赖夫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因此委员会在 1 月 29 日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不承认“自由、劳动”报是联合会的机关报,同时,决定恢复出版“自由、博爱、劳动”报,并任命克·约·埃塞尔为编辑。“自由、博爱、劳动”报于 2 月 8 日复刊,一直出版到 1849 年年中。“自由、劳动”报继续出版到 1849 年 6 月 17 日;它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诽谤。——第 687 页。
- 409 哥特沙克 1849 年 1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写了一篇声明,1 月 18 日发表于“自由、劳动”报上。在这篇声明中,他为自己的“自愿流亡”辩护;尽管陪审法庭已经宣判他无罪(见注 423),但他的很多同胞仍然认为他是有罪的。他声明:他只有按照“当今国内最高审判官”的召唤或是他的同胞们的召唤才能回国。对这个声明的评价见科伦工人联合会第一支部的决议(见本卷第 699—701 页)。——第 687 页。
- 410 根据 1848 年 12 月 5 日的命令,定于 1 月 22 日选举复选人,1849 年 2 月 5 日选举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议员。——第 688 页。
- 411 指“逮捕”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90—193 页)。——第 689 页。
- 412 关于法庭审讯的简短报道发表于 1849 年 2 月 14 日“新莱茵报”第 221 号上。其中所引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见本卷第 262—285 页。——第 689 页。
- 413 指参加过科伦九月事变并于 1848 年 11 月被选入人民委员会(见注 400)的阿达姆斯基中尉和尼特哈克中尉。他们慑于被捕而逃往比利

时，但是，在比利时仍遭逮捕并被押送到法国。在他们自愿回到德国以后，于12月14日被交付军事法庭惩处。关于阿达姆斯基，据悉，军事法庭于1849年5月29日取消了他的军衔并判处九个月的要塞监禁。——第691页。

- 414 在1849年2月15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根据恩格斯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决议，任命一个由沙佩尔、勒泽尔和赖夫组成的委员会去同一个民主团体联系，以便组织一次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的宴会。——第693页。
- 415 1849年2月27日“科伦日报”登载了一篇报道2月24日宴会的通讯。在简讯中特别提到：“在许多发言者中，格拉德巴赫议员势如雷霆的发言特别突出，他猛烈攻击了霍亨索伦家族、勃兰登堡伯爵以及其他的人。”——第693页。
- 416 指一批流亡到伯桑松（法国）的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后来这批人在维利希领导下组成所谓伯桑松连队，参加了1849年的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第694页。
- 417 见注128。——第694页。
- 418 指在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很受欢迎的一首法国爱国歌曲“吉伦特党人”（《Les Girondins》）；这首歌也以“誓死保卫祖国”（《Mourir pour la patrie》）这个叠句而出名的。——第694页。
- 419 见注264。——第695页。
- 420 指“自由、博爱、劳动”报——见注408。——第696页。
- 421 见注405。——第697页。
- 422 这个决议批评了哥特沙克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立场。哥特沙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1848年7月，哥特沙克同安内克和克·约·埃塞尔一起被捕，接着他们被以“煽动武装起义反对王权”的罪名被交付法庭审判。12月21日至23日举行了审判。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陪审员不得不宣判被告无罪。哥特

沙克被释放后积极进行了分裂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本决议于 1849 年 4 月 24 日经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批准。——第 699 页。

- 423 关于哥特沙克对科伦工人联合会机关报（“自由、博爱、劳动”报）事务的干涉见注 408。——第 700 页。
- 424 据报道（1849 年 5 月 10 日“德意志总汇报”，1849 年 5 月 12 日“特利尔日报”），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 1849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如期举行。——第 703 页。
- 425 见注 402。——第 707 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48年11月—1849年8月)

1848

- 11月 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几位编辑由于有被逮捕的危险，离开了科伦，因此，该报的编辑工作几乎全部落到马克思的肩上。同时马克思还积极参加了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担任该会主席，并参加了民主协会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工作，动员人民群众起来积极反抗反革命的进攻。
- 11月7日左右 恩格斯(当时在瑞士)由洛桑到纽沙特尔。
- 11月7日 恩格斯寄给马克思一篇关于纽沙特尔共和国的文章，标题是“昔日的公国”，发表在11月11日“新莱茵报”上。
- 11月8日 由于普鲁士正在策划反革命政变，马克思写了“柏林的危机”一文，发表在11月9日“新莱茵报”上。
- 11月9日左右 恩格斯由纽沙特尔到伯尔尼。
- 11月9日 恩格斯写“新的代议机构。——瑞士运动的成绩”一文。发表在11月15日“新莱茵报”上。
- 11月11日—13日 马克思写关于“柏林的反革命”的一组文章，发表在11月12日(增刊)和14日“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号召人民群众用拒绝纳税的办法来回答反革命的行动。他

认为这是人民对政府施加有组织的革命压力的手段。

- 11月13日 在科伦民众大会上选出了人民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该会委员。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和武装群众以反抗征税，反对正在普鲁士策划的政变。
- 马克思参加了科伦民主协会的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刚从维也纳打来的关于罗伯特·勃鲁姆被处死刑的电报，这个消息在会场上引起了极大的愤慨。
- 11月14日 法院侦查员就“侮辱”检察官黑克尔一事对马克思进行侦讯。人民群众齐集在法院前面，表示对马克思的同情。审讯结束后，人民陪送马克思到埃塞尔大厅，他在那里感谢人们对他的同情和支持。
- 马克思和施奈德尔第二代表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向莱茵省各民主团体呼吁，建议它们组织民众大会和号召居民拒绝纳税。为了讨论以后的措施，区域委员会决定在11月23日召开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呼吁书发表在11月15日“新莱茵报”上。
- 11月15日 马克思写“内阁在被告席上”一文，发表在当天的“新莱茵报”号外上。
- 恩格斯向伯尔尼州司法和警察当局申请准许他在伯尔尼居留。
- 11月17日 “新莱茵报”发表了马克思的“良心的忏悔”一文。
- 马克思出版了一号“新莱茵报”特别附刊，号召居民不向政府缴纳任何捐税。从11月19日到12月17日该报每号都刊有“打倒捐税!!!”的号召。
- 11月18日 马克思写“艾希曼的命令”一文，发表在11月19日“新莱茵报”上。
- 马克思、沙佩尔、施奈德尔第二代表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发表第二个呼吁书，号召各地居民用一切方法反抗强行征税，组织武装队伍，建立安全委员

会这种人民的权力机关。呼吁书发表在 11 月 19 日“新莱茵报”上。

- 11 月 20 日 马克思和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其他两名委员——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接到传票，要他们在 11 月 21 日到法院侦查员那里去受传讯。他们被控的罪名是“公开号召叛乱”，因为他们曾呼吁拒绝纳税。
-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再次发表呼吁书，通报他们被法庭传讯，并警告莱茵省的民主主义者不要过早举行发动。呼吁书发表在 11 月 21 日“新莱茵报”上。
- 11 月 21 日 法院侦查员就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号召人民拒绝纳税一事传讯马克思。
- 科伦地方法院审判庭决定把恩格斯和科伦九月事件其他参加者（瓦赫特尔、毕尔格尔斯等）的案件延期到他们亲自出庭时进行审理。
- 11 月 22 日 马克思写“法兰克福议会”一文，发表在 11 月 23 日“新莱茵报”上。
- 11 月 23 日 马克思参加了莱茵省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工作。会上讨论了有关拒绝纳税运动的问题。大会特别重视民主主义者在农村的工作，认为必须吸引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大会批准了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决议，并向代表们发出相应的指示。
- “新莱茵报”发表了恩格斯的“联邦法院的选举”一文。
- 11 月 24 日 马克思写“德利加尔斯基——立法者、公民和共产主义者”和“对‘新莱茵报’提出的三个诉讼案”两篇文章，发表在 11 月 26 日“新莱茵报”上。
- 恩格斯将“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及“联邦委员会委员剪影”两篇文章寄往科伦，它们分别发表在 11

月 26 日和 29 日“新莱茵报”上。

- 11 月 29 日 马克思写“意大利的革命运动”一文，发表在 11 月 30 日“新莱茵报”上。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新莱茵报”写关于蒲鲁东、关于匈牙利事件以及关于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文章。
- 12 月初 恩格斯写“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及“蒲鲁东”两篇文章，都没有发表。
- 12 月 2 日左右 马克思因“新莱茵报”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再次被法院侦查员传讯，这些文章包括：格·维尔特所写的发表时没有署名的一组小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斯基的生平事迹”，来自布勒斯劳的关于利希诺夫斯基在选举前的阴谋的报道，来自法兰克福的揭露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施泰德曼的假报告报道，以及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 1848 年 9 月 20 日科伦民众大会的决议。
- 12 月 6 日 由于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马克思写“反革命的第二阶段”一文，发表在 12 月 7 日“新莱茵报”号外上。恩格斯写“国民院”一文，发表在 12 月 10 日“新莱茵报”上。
- 12 月 8 日 洛桑工人联合会委派“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老战士”恩格斯为代表，出席 12 月 9 日在伯尔尼召开的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
- 12 月 9 日 恩格斯得到在伯尔尼居留的许可证。
- 12 月 9 日—29 日 马克思以“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为题写了一组论文。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总结了三月革命，说明了 1848 年底德国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揭露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背叛作用。这组文章分别发表在 12 月 10、15、16 和 31 日“新莱茵报”上。

- 12月19日 “新莱茵报”登载了征求1849年第一季度订户的通知，其中强调指出，“新莱茵报”不仅是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而且也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
- 12月20日 陪审法庭原定于12月20日审讯“新莱茵报”总编辑马克思、发行负责人科尔夫和编辑恩格斯——他们因该报7月5日发表了“逮捕”一文而被控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宪兵——因手续不周而延期。
- 12月21日 马克思因11月26日“新莱茵报”发表了“德利加尔斯基——立法者、公民和共产主义者”一文而被法院侦查员传讯。
- 12月21日—22日 马克思写“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一文，连续发表在12月22日和23日“新莱茵报”上。
- 12月24日 “新莱茵报”发表马克思的“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一文。
- 12月31日 马克思写“革命运动”一文，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发展，分析了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并强调指出这个革命应该对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发生的影响。文章发表在1849年1月1日“新莱茵报”上。

1849

- 1月4日 马克思因科伦市政委员会发行工人手册（城市在业工人守则）一事写“资产阶级的文件”一文，发表在1月5日“新莱茵报”上。
- 1月8日 马克思写“新年贺词”一文，发表在1月9日“新莱茵报”上。
- 1月11日 恩格斯写“瑞士报刊”一文，发表在1月17日“新莱茵报”上。

-
- 1月13日 “新莱茵报”刊载恩格斯的“匈牙利的斗争”一文。
- 1月15日 马克思参加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马克思在自己的发言中说明了,为什么工人应该在本届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选举中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
- 1月中旬 恩格斯由瑞士回到科伦,重新全力投入了“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
- 1月20日—21日 马克思写“孟德斯鸠第五十六”这篇论战性文章,揭露了“科伦日报”在选举前许诺的用钦定宪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蛊惑性诺言。马克思号召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只选举那些坚决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代表。文章连续发表在1月21日和22日“新莱茵报”上。
- 1月21日 恩格斯写“普鲁士逮捕科苏特的命令”一文,发表在1月28日“新莱茵报”上。
- 1月25日—27日 马克思写“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一文,抨击普鲁士自由派,发表在1月26日和28日“新莱茵报”上。
- 1月26日 恩格斯因科伦九月事件被法院侦查员传讯。传讯结果宣布不再对恩格斯提出任何控诉。
- 1月29日 马克思参加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联合会的机关报“自由、博爱、劳动”的决议,以此与哥特沙克宗派集团的机关报“自由、劳动”相对抗。
- 1月30日 马克思写“‘科伦日报’论选举”一文,证明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必须为民主共和国共同进行斗争。文章发表在2月1日“新莱茵报”上。
- 2月左右 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特派代表约瑟夫·莫尔来到德国,在“新莱茵报”报社举行了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改组共

产主义者同盟的问题。

- 2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编辑部会见了路过科伦的工人兄弟会的领导人斯蒂凡·波尔恩。
- 2月3日 马克思写“康普豪森”一文,发表在2月4日“新莱茵报”上。
- 2月4日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大会宣告,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经常为会员举办关于社会问题的义务讲座。为了建立一个更巩固的、有固定的章程和机构的工人组织,大会通过关于改组工人联合会的决议。
- 2月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新莱茵报”被控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宪兵(在该报1848年7月5日发表的“逮捕”一文中)而受审,他们在法庭上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次审讯当众揭露普鲁士政府实行反革命政变的罪行。陪审法庭宣判马克思、恩格斯及该报发行负责人科尔夫无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庭上的发言发表在2月14日“新莱茵报”上。
- 2月8日 马克思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因为他、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草拟了1848年11月18日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而被控告“煽动叛乱”。马克思在他的发言中证明,人民有权用革命来回答王权的反革命行为。全体被告都被宣判无罪。马克思在法庭上的发言发表在2月25和27日“新莱茵报”上。
- 2月10日 马克思写“‘科伦日报’的分工”一文,发表在2月11日“新莱茵报”上。
马克思写以“拉萨尔”为题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2月11日“新莱茵报”上。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拉萨尔案件的文章。
- 2月1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工人联合会在缪尔海姆(莱茵

- 省)举办的民主宴会。马克思发表了讲话,谈到德国工人参加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革命斗争的情况。恩格斯在讲话中对匈牙利的革命战士表示敬意。工人联合会会员鲁卡斯提议,为像马克思一样早在二月革命很久以前就在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的民主主义者干杯。
- 2月14日—15日 恩格斯写“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连续发表在2月15日和16日“新莱茵报”上。
- 2月15日 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建议举行宴会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恩格斯的建议被采纳了。
- 2月16日—21日 马克思写“博德尔施文克及其伙伴治理下的普鲁士财政”和“再论旧普鲁士的财政”两文,分别发表在2月17日和23日“新莱茵报”上。
- 2月17日 恩格斯写“‘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一文,发表在2月18日“新莱茵报”上。
- 2月2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的宴会。恩格斯提议为正在进行斗争的意大利人,为罗马共和国干杯。
- 2月28日 “新莱茵报”发行科出版了关于2月7日和8日审判经过情形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全文的单行本,标题是“两个政治审判案”。
- 3月2日—3日 科伦卫戍部队两名下级军官来到马克思的寓所,他们威胁马克思,要他说出“新莱茵报”上刊登的关于乌滕霍芬上尉的短评的作者是谁。马克思断然拒绝这一要求。3月3日他就此事向科伦卫戍司令提出严重抗议。
- 3月7日 “新莱茵报”发表社论“经济状况”,分析了1848年前夕英国经济的发展,阐述了1848年革命对工商业状况的影响。

-
- 3月10日—15日 马克思写“三月同盟”及“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两文，分别在3月11日和17日发表。
- 3月11日 在科伦居尔岑尼希大厅的初选人大会上，马克思当选为负责同第二议院议员保持经常联系的委员会的委员。会议通过了致第二议院议员书，要求他们努力争取解除柏林的戒严状态和结束军刀专政。
- 3月13日—23日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的几篇社论中尖锐地抨击了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关于俱乐部法和集会法，招贴法和出版法的草案，这些法案一旦实施，1848年三月革命时期所争得的民主自由就会化为乌有。
- 3月16日 恩格斯写“第二议院的奏折草案”一文，发表在当天的“新莱茵报”特别附刊上。此后，恩格斯还写了许多批评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辩论的文章。
- 3月18日 在马克思所写的一篇短评中宣布，“新莱茵报”将要为之举行周年纪念的不是柏林的三月革命，而是巴黎工人1848年6月25日的起义。短评发表在3月18日“新莱茵报”增刊上。
- 3月19日 为纪念柏林巷战一周年在科伦居尔岑尼希大厅举行了盛大宴会，在宴会上，恩格斯提议为巴黎六月武装起义者干杯。
- 3月25日 恩格斯写“柏林关于奏折问题的辩论”一文，发表在3月30日“新莱茵报”上。
- 3月27日 恩格斯写“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一文，发表在3月28日“新莱茵报”上。
- 3月29日 普鲁士内务大臣建议把马克思逐出科伦，莱茵省总督艾希曼虽然也表示赞同这个措施，但又担心它会在城内引起骚动，因此他建议等待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机，把马克思不仅逐出科伦，而且逐出普鲁士。

- 3月30日—4月3日 恩格斯以“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为题写了三篇文章，分析了皮蒙特和奥地利的战争的进程，指出只有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全民总起义才能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统治。文章分别发表在3月31日、4月1日和4日“新莱茵报”上。
- 4月5日—11日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他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是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所做的演讲写成的。他力求用通俗的形式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证明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
- 4月11日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决议，把工资问题列为各分会在晚会上进行讨论的项目之一，并指定“新莱茵报”发表的马克思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为学习文件。
- 4月14日 马克思和沙佩尔、威·沃尔弗、安内克一起退出莱茵省各民主团体区域委员会。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虽然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关系，但并不拒绝在反对反革命进攻的斗争中同后者一致行动。他们提出联合各工人联合会并在这个基础上着手建立独立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任务。这一声明发表在4月15日“新莱茵报”上。
- 4月15日—5月8日左右 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城市去。他访问了不来梅、汉堡、比雷菲尔德、哈姆，会见了许多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了解了当地的革命情况，并设法为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筹集资金。在马克思外出期间，该报由恩格斯主持。
- 4月16日 在马克思及其战友的影响下，科伦工人联合会在大会上一致决定，退出德国民主协会总会，加入工人联合会总会，工人联合会总会中央委员会设在莱比锡。为了更紧密地团结各工人联合会，大会决定在科伦召开

- 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 4月17日 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推选马克思参加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代表大会定于5月6日召开。
- 4月19—23日 恩格斯写关于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辩论的两篇文章：“柏林第二议院四月十三日会议”和“关于招贴法的辩论”。文章分别发表在4月20、22和27日的“新莱茵报”上。
- 4月20日 “新莱茵报”发表声明：由于马克思离开了科伦，他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暂停刊登。德国政治形势的尖锐化和“新莱茵报”的停刊使马克思未能把这一著作全部发表。
- 4月23日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员大会批准由马克思、沙佩尔、威·沃尔弗、安内克、埃塞尔和奥托组成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
- 4月28日 恩格斯写“第二议院的解散”和“波兹南”两文，发表在4月29日“新莱茵报”上。
- 4月29日 科伦工人联合会的“自由、博爱、劳动”报公布了联合会第一分会的决议，谴责哥特沙克对工人联合会的态度和地对马克思的敌意的攻击。
- 4月30日 恩格斯写“柏林的反革命策划”一文，发表在5月1日“新莱茵报”上。
- 5月上半月 “新莱茵报”报道了萨克森、莱茵省、威斯特伐里亚、普法尔茨、巴登人民起义的经过情形。
- 5月4日—6日 “新莱茵报”发表了恩格斯的“莱茵各城市代表大会”和“他们要戒严”两篇文章。恩格斯在文章中警告科伦工人说：政府企图在5月6日各党派举行代表大会（其中

也有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时挑起混乱,以便制造借口来实行戒严。恩格斯号召工人不要上当局的当,不要在条件对他们不利时发动斗争。

- 5月7日 恩格斯写一篇阐述萨克森、普法尔茨和莱茵普鲁士革命新高涨以及匈牙利革命斗争的文章,标题是“普鲁士军队和人民革命起义”,发表在5月8日“新莱茵报”上。
- 5月9日 马克思访问德国各城市回到科伦后写“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一文,发表在5月10日“新莱茵报”上。
恩格斯写“反革命的进攻和革命的发展”一文,发表在5月10日“新莱茵报”上。
- 5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制定保证莱茵省起义获得胜利的行动计划。
- 5月10日 因爱北斐特发生起义,恩格斯奔赴佐林根,又从佐林根同革命工人队伍一起前往爱北斐特。
- 5月11日 恩格斯到达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委派他领导构筑防御工事的工作,并视察城内全部街垒和炮兵。恩格斯要求安全委员会把工人武装起来,向资产阶级强行征税以便保证武装部队的给养。
普鲁士政府下令驱逐马克思出普鲁士,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迫使“新莱茵报”停刊。
- 5月14—15日 爱北斐特资产阶级害怕恩格斯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力图逮捕他,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在资产阶级这种压力下,建议恩格斯离开该城。委员会的行为引起了工人的愤慨。他们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保证“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他”。
- 5月15日 恩格斯清醒地估计了局势,为了避免引起起义者阵营的分裂,就离开爱北斐特回到科伦。
- 5月16日 马克思接到驱逐他出普鲁士的命令。

-
- 5月17日左右 由于恩格斯参加了爱北斐特起义,当局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
- 5月17日 “新莱茵报”详细报道了爱北斐特事件。该报感谢爱北斐特工人对该报编辑恩格斯的同情,并且向他们保证,在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决战一旦到来,恩格斯便会像“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刻出现在战斗岗位上,那时,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
逮捕令使恩格斯不得不离开科伦,他便到爆发了革命起义的德国西南部去。
- 5月19日左右 马克思用订户的报费和自己的钱,以及他变卖自己的快速印刷机的钱偿付“新莱茵报”欠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纸商、职员、记者及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债款。
- 5月19日 由于马克思被逐出普鲁士,而且恩格斯和其他编辑又遭到迫害,“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和恩格斯的文章“匈牙利”。该报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 5月19日—20日 “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这里他们敦促国民议会左派议员领导德国西南部的武装起义,把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军召到法兰克福来,并将全德国国民议会置于起义人民和起义军队的影响之下。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议员的支持。
- 5月20日或2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巴登。在曼海姆、路易港和卡尔斯卢厄,他们力图说服运动的领导者,使他们相信必须把巴登革命军派往法兰克福,使起义具有全德的性质。领导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拒绝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建议。

- 5月23日—24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往普法尔茨。他们先到斯拜尔,后来又到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凯则尔斯劳顿。鉴于起义是在保卫帝国宪法的口号下进行的,而领导起义的又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以任何形式正式参加对运动的领导。
- 5月29日 科伦违警法庭就马克思、德朝克、维尔特等人被控诽谤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一案宣判被告无罪。他们被控告的原因是,1848年9月14日“新莱茵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议员施泰德曼所作的关于同丹麦休战问题表决结果的假报告。
- 5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往宾根。在途中,他们因被怀疑参加起义而被黑森兵士逮捕,并押到达姆斯塔德,从那里又押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克福获释后又前往宾根。
- 5月31日 马克思代表“新莱茵报”全体编辑写一声明,表明他们同“西德意志报”毫无共同之处。声明发表在6月2日“新德意志报”上和其他德国报纸上。
- 6月2日左右 马克思预料法国将发生决定性的革命事件,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以便代表德国革命党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取得联系。
- 恩格斯前往凯则尔斯劳顿,打算最初以政治流亡者的身分在那里先住一个时期,如果斗争一旦爆发,就立即“在这个运动中走上只有‘新莱茵报’才能走上的那个岗位,即士兵的岗位。”
-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建议恩格斯担任各种民政的和军事的职务。但是恩格斯都一一加以拒绝了,只同意为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出版的“城乡信使”报写几篇文章。

-
- 6月2日 恩格斯写“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一文,发表在6月3日“城乡信使”报上。由于编辑部认为恩格斯的第二篇文章太“刺激”了,恩格斯把文章索回,并且拒绝再为该报撰稿。
- 6月3日左右 马克思到达巴黎。
- 6月3日以后 马克思恢复并扩大了他同各俱乐部领导人、各秘密工人组织领导人以及法国民主主义者代表们的联系。
- 6月6日 普鲁士政府下令通缉恩格斯。
- 6月7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巴黎的革命形势很紧张,并且请求恩格斯经常告诉他关于德国的情况。
- 6月13日—7月11日 恩格斯经纽施塔特前往欧芬巴赫,去参加巴登—普法尔茨军队,即维利希指挥的志愿部队。他直接参加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的革命战斗。当时恩格斯是维利希的参谋,同他一起制定作战计划,并指挥完成特别复杂和危险的战斗任务。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一次是拉施塔特城下的大会战。
- 6月21日 马克思写“六月十三日”一文,评述巴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起义的失败。文章发表在6月29日德国民主派报纸“人民之友”上。
- 7月12日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恩格斯曾参加作战的那支部队最后转移到瑞士境内。
- 7月19日 马克思接到法国当局的通知,其中说法国当局已经下令把他从巴黎驱逐到摩尔比安—布列塔尼的一块有碍健康的沼地去。
- 7月24日 恩格斯到达斐维(窝州)。
- 7月25日 恩格斯写信给在巴黎的马克思夫人,对马克思的遭遇感到不安,因为听说他被逮捕了;恩格斯在信中还告诉

她自己参加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的军事行动的经过。

- 7月27日左右 “新闻报”登载了关于“新莱茵报”破查封以及“新莱茵报”编辑以后活动的不正确报道。马克思在给该报编辑的公开信中批驳了这种报道。这封信发表在7月30日“新闻报”上。
- 8月1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得到恩格斯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他建议恩格斯写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历史，并告诉恩格斯他正在商谈关于在柏林出版一种政治经济杂志的事。
- 8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在斐维逗留一个月后转赴洛桑。
- 8月23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他将从巴黎被驱逐到布列塔尼沼地去。因此，他决定流亡伦敦。他建议恩格斯也到伦敦去，以便在那里一起出版杂志。
- 8月24日 马克思离巴黎赴伦敦。

人名索引

三 画

卫尔, 巴托洛缪斯·约瑟夫 (Weyl, Bartholoäus Joseph)——德国法学家, 1848 年为科伦的民主协会会员、安全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 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 (1848 年 10 月)。——第 693、695 页。

四 画

巴希 (Bassy)——瑞士记者, 原籍意大利, 自由主义报纸“瑞士”的编辑。——第 210 页。

巴罗, 奥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 年 2 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的首领,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10 月领导依靠反革命君主派集团的内阁。——第 174、244、245、247—249、459、469、470、522、569 页。

巴魏, 沙尔·维克多 (Bavay, Charles Victor 1801—1875)——比利时法官; 1844 年起任布鲁塞尔总检察官。——第 265 页。

巴塞, 哥特弗利德 (Basse, Gottfried 1778—1825)——克韦德林堡 (普鲁士) 的发行商和图书商, 以出版通俗书籍, 其中包括所谓盗侠小说而出名。——第 56 页。

巴尔曼, 莫里斯 (Barman, Morris 1808—

1878)——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国民院议员 (1848—1857)。——第 111 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民主主义者, 政论家,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 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第一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1872 年在海牙会议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 323、326、329、337、338、340—342 页。

巴塔里尼, 卡洛 (Battaglini, Carlo 1812—1888)——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律师, 德森州出席国民院议员 (1848—1851)。——第 111 页。

巴斯蒂德, 茹尔 (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之一 (1836—1846); 曾任外交部长 (1848 年 5—12 月)。——第 52、96 页。

巴尔贝斯, 阿尔芒 (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1848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因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被判无期徒刑, 1854 年因大赦被释放。——第 421、663 页。

巴塞尔曼,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 (Basser-

- 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巴登议会议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17、119、398、549页。
- 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W elden, Franz Ludwig 1782—1853)——男爵,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加向革命的意大利进军;在镇压了1848年十月起义后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9年4—5月指挥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军队。——第129、357、611、612页。
- 韦森堡,约翰·菲力浦(W essenberg, Johann W hilipp 1773—1858)——男爵,奥地利国家活过家,首相(1848年7—11月)。——第81—84页。
-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W 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自由派政论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78—83、397、549页。
- 韦森东克,胡果(W esendonck, Hugo)——杜塞尔多夫的普鲁士律师,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第518页。
- 韦耶尔斯(W eyers)——杜塞尔多夫的德国工人;1848年因进行革命宣传被捕受审。——第319、321、543、545、557页。
- 丰克(Funk)——德国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会员。——第693页。
- 丰克,亚历山大·路德维希(Funk, Alexander Ludwig 1806—1871)——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10、40、76页。
-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Emil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断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在革命期间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曾任立法议会代表(1850—1851),1850年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23页。
- 卞肯多尔夫,康士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Бенкендорф,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17—1858)——伯爵,沙皇军队上校,后是将军,外交家。——第171页。
- 比硕夫斯威德,约翰·鲁道夫(Bischofs-werder, Johann Rudolf 1741—1803)——普鲁士将军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时期对普鲁士内外政策有很大影响。——第572页。
-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W 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公爵,奥地利元帅;1848年指挥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起义;1848—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13、49、80、81、83、84、92、129、190、194、204、205、209、216、233、336、337、341、362—365、367、390、397、454、581、594、606、608、610页。
- 戈尔盖,阿尔都尔(Görgey, Arthur 1818—1916)——1848—1849年为匈牙利革命军事活动家,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阴谋破坏革命战争。——第563、609—612页。
- 毛伦布勒歇尔,彼得·威廉(Maurenbre-

- cher, Peter Wilhelm 1777—1861)——普鲁士官吏,曾任杜塞尔多夫邮政总局局长(1817—1850)。——第 67 页。
- 方通,费里克斯·彼得罗维奇(Фортон, Феликс Петрович 生于 1801 年)——沙皇俄国外交官,1848 年为俄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顾问。——第 171 页。
-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 Jacques 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雅各宾党人的右翼领袖。——第 193 页。
- 孔代,路易·昂利·约瑟夫(Condé, Louis Henri Joseph 1756—1830)——法兰西亲王,十八世纪革命初期从法国流亡出外,服务于侨民军团,返回法国后以前被没收的财产得到了赔偿,其中一部他以遗嘱赠给爱妃菲雪尔。——第 423 页。
-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Wilhelm-Ferdinand 1735—1806)。——第 192 页。
-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威廉(Karl-Friedrich-August-Wilhelm 1804—1873)——自 1823 年起为不伦瑞克公爵,1830 年 9 月初被推翻,流亡国外;企图靠欧洲各国的帮助重新执政,四十至五十年代与流亡民主主义分子保持有联系,出版过“德意志伦敦报”。——第 458 页。
- 尤尔,安德鲁(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第 639 页。
- 邓宾斯基,亨利克(Dembniński, Henryk 1791—1864)——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 年起义的参加者,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匈牙利革命军的领导人之一。——第 455、610、611 页。

五 画

- 弗雷,莱米鸠斯·艾米尔(Frey, Remigius Emil 1803—1889)——瑞士法学家,国民院议员(1848—1851)。——第 101 页。
- 弗雷-埃罗泽,弗里德里希(Frey-Hérosé, Friedrich 1801—1873)——瑞士军官,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反宗得崩德战争(1847)的参加者,1848 年为联邦院议员,国民院议员;1854 年和 1860 年任瑞士联邦主席。——第 74、77 页。
- 弗兰茨·卡尔(Franz Karl 1802—1878)——奥地利大公,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之父。——第 83 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 400、569、585、606 页。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 470 页。
-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将军,普鲁士反动军阀的主要代表之一;1848 年 11 月参加柏林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第 19、20、49、64、119、145、188、223、259、284、299、313、376、377、408、430、431、578 页。
- 弗兰西尼,斯蒂凡诺(Franscini, Stefano 1796—1857)——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

- 动家,经济学家,激进主义者;原籍意大利;1848年为联邦院议员,国民院议员。——第74—76、114页。
- 弗洛特韦尔,爱德华·亨利希(Flottwell, Eduard Heinrich 1786—1865)——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44—1846),波兹南的总督,后为威斯特伐里亚的总督,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347、349、353、354、370—372页。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开始活动时是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170、623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 1657—1713)——普鲁士国王(1710—1713)。——第571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350、428、572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620—1688)——勃兰登堡选帝侯(1640—1688)。——第571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第571、572、589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29、30、572—574、589、616、617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8、29—32、51、85、94—96、236、293、294、299、300、350、401—403、405、406、411、412、415、431、471、534、549、550、560、562、563、569、571、574、575、578—581、586—589、601、616—618页。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August II 1797—1854)——萨克森国王(1836—1854)。——第578页。
-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 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雅各宾党人,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的反革命政变。——第193页。
- 卡拉姆,昂利·弗洛里安(Calame, Henri-Florian 1807—1863)——瑞士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反动分子,1848—1863年为大会议员。——第8页。
- 卡佩特——见路易十六。
-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观点和四十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相近,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的资产阶级,后来倾向托利党,1848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636页。
- 卡洛斯,唐(Carlos, Don 1788—1855)——西班牙王位的僭望者,1833—1840年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夺取王位并恢复封建僧侣集团的无限权力。——第184、203、229页。
- 卡尔大公——见弗兰茨·卡尔。
- 卡斯滕斯(Carstens)——见列斯纳,弗里德里希。
- 卡斯托蒂,让·雅克(Castoldi, Jean Jar-

- ques 1804—1871)——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激进主义者;国民院议员(1848—1851)。——第109页。
- 卡贝马顿,威廉(Kalbermatten, Wilhelm 1793—1875)——瑞士将军,反动分子,1844年在瓦里斯州领导反革命政变。——第111页。
- 卡芬雅克,高德弗鲁阿(Cavaignac, Godfrey 1801—1845)——德国政论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为秘密的共和主义的人民之友社领导人之一,路易·欧仁·卡芬雅克之兄。——第112页。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以在战争中采取野蛮手段著称;从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第23、91—93、96、174、189、248、459、469、470、540、682—664页。
- 卡罗林王朝(Carolingians)——法兰克王朝(751—843)。——第331页。
-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第641页。
- 布伦纳,约翰·卡尔(Brenner, Johann Karl 1814—1883)——瑞士律师,资产阶级政论家,巴塞尔的“瑞士国民报”创始人和发行人,1848年11月起为联邦法院委员。——第40页。
- 布德堡,安得列依·费多罗维奇(Будберг, Андр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817—1881)——男爵,沙皇俄国外交官,从1848年1月起在法兰克福担任代办职务,后来为驻柏林公使。——第174页。
- 布隆诺夫,菲利浦·伊万诺维奇(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沙皇俄国外交官,四十至五十年代驻伦敦公使,后是大使。——第174页。
- 布朗施奈,路易(Blanchenay, Louis 1800—1881)——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国民院议员(1848—1860)。——第109页。
- 古方蒂,维干德(Guffanti, Wigand)——德国商人,1848年为科伦人民委员会委员。——第693页。
-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olf 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和统帅;为了称霸波罗的海,对丹麦、波兰和俄国发动了战争;曾参加三十年战争,领导新教国家联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成立的新教联盟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第519页。
-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列奥(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派领导人之一;后为进步主义者。——第162—164、355、356、443、447—449、522页。
- 瓦德马尔(Waldemar 1817—1849)——普鲁士亲王。——第429页。
- 瓦赫特尔(Wächt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9月是科伦安全委员会委员。——第695页。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

- 1880)——德国政治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66年以后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23、341、382—384页。
- 卢普,尤利乌斯(Rupp, Julius 1809—1884)——德国牧师,“光明之友”宗教运动的参加者,所谓“自由协会”的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第518—523页。
- 卢卡文纳,朱洛(Rukavina, D n uro 1777—1849)——男爵,奥地利元帅;原籍克罗地亚;1849年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第607页。
- 加格恩,亨利希(Gagern, Heinrich 1799—1880)——男爵,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议长(1848年5—12月),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帝国首相(1848年12月—1849年3月)。——第49、398、549页。
- 加格恩,马克西米利安(Gagern, Maximilien 1810—1889)——男爵,德国官吏,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亨利希·加格恩之弟。——第53页。
-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中,1848年率领义勇军在皮蒙特军队一边奋不顾身地战斗;1849年4—6月为罗马共和国国防的主要组织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而奋斗。——第456页。
- 尼格勒尔,尼克劳斯(Niggeler, Nikolaus 1817—1872)——瑞士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1848年为“伯尔尼报”编辑。——第42、210页。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171、341、517、562、563、569、570、578页。
- 尼科洛维乌斯,格奥尔格·亨利希·弗兰茨(Nicolovius, Georg Heinrich Franz)——普鲁士法官,1848年任莱茵省总检察官。——第69、316、531、532、545页。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的领袖,曾任内政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和首相(1841—1846),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386页。
- 皮泰,本扎曼(Pittet, Benjamin 死于1863年)——瑞士国民院议员(1848—1851)。——第113页。
- 皮奥达,卓万·巴蒂斯特(Pioda, Giovan-Battista 1808—1882)——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原籍意大利;反宗得崩德战争(1847)的参加者;1848—1849年是德森州出席国民院的议员。——第103、111、113—115页。
- 本生,克里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男爵,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家和神学家,接近普鲁士宫廷;提出根据英国精神改革德国新教教会的计划;曾任驻伦敦大使(1842—1854)。——第29页。
- 本格尔,弗兰茨·威廉(Bengel, Franz Wilhelm 约生于1819年)——德国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缪尔海姆(莱茵省)工人联合会主席。——第

692页。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 (Struve, Gustav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新闻记者; 1848年4月和9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革命失败后离开德国;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方一边。——第53、56、60、61、148页。

司徒卢威, 阿马利亚 (Struve, Amalia 死于1862年)——1848—1849年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之妻。——第56页。

汉普敦, 约翰 (Hampden, John 1594—1643)——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代表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第304页。

汉泽曼, 大卫 (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大资本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实施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28、114、120、123、124、133—146、150、157、184、215、217、218、223、275、276、283、284、408、414、415、446页。

包林, 约翰 (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语言学家和文学家, 自由贸易论者; 五十年代他在远东实施英国殖民政策的高级官员。——第386、636、641页。

叶列娜·巴甫洛芙娜 (Елена Павловна 1806—1873)——俄国的大公妃,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夫人。——第172页。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222页。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 (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的领袖之一。——第694页。

六 画

艾希曼 (Eichmann)——旧普鲁士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 1845—1850年任莱茵省总督; 曾任普富尔内阁的内政大臣 (1848年9—10月); 1849年为第一议院议员。——第37、38、44、46、47、284、678页。

艾森曼, 哥特弗利德 (Eisenm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政论家, 医生, 1848年是“德意志人民报”编辑;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 后来属于左派。——第395、425页。

艾希霍恩 (Eichhorn)——普鲁士法官, 1849年任爱北斐特检察官。——第708页。

艾希霍恩, 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 (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宗教、教育、医务大臣 (1840—1848)。——第29、30页。

艾贝迈尔 (Ebermeier)——普鲁士法官。——第321、544页。

米勒, 亨利希·哥特洛普 (Mühler, Heinrich Gottlob 1780—1857)——普鲁士法官, 1832—1844年任司法大臣; 1844年任柏林最高法院庭长。——第163、167页。

米歇尔, 格奥尔格 (Michel, Georg 1804—1867)——瑞士陆军上校,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反宗得崩德战争的参加者, 国民院议员 (1848—1860)。——第

- 106、111、115 页。
- 米尔德, 卡尔·奥古斯特 (Milde, Karl August 1805—1861)——西里西亚的大工厂主, 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 1848 年任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商业大臣 (6—9 月),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长 (5—6 月), 属于右派。——第 134 页。
-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1798—1848)——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的兄弟。——第 172 页。
- 米尔巴赫, 奥托 (Mirbach, Otto)——退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司令; 起义失败后从德国流亡出外。——第 597、598 页。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受审者之一;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94 页。
- 列列韦尔, 约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 1830—1831 年参加波兰起义, 为波兰流亡民主派领袖之一, 1847—1848 年任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第 614 页。
- 列奥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 (1831—1865)。——第 265 页。
- 列奥波特二世 (Leopold II 1797—1870)——托斯卡纳大公 (1824—1859)。——第 453 页。
- 吉尔, 乌尔利希·弗兰茨 (Kyll, Ulrich Franz)——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科伦出席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 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第 529、530 页。
- 吉尔克 (Gierke)——普鲁士官吏, 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农业大臣 (1848 年 6—9 月); 1849 年为第一议院议员。——第 134、162、164 页。
- 吉比奇, 伊万·伊万诺维奇 (Г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俄国将军、元帅, 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沙皇军队总司令。——第 335 页。
- 西姆桑, 马丁·爱德华·西吉兹蒙特 (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1810—1899)——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5 月任该议会议长, 1848 年 11 月为驻柏林的帝国专员;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左派; 六十年代为国会议长, 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398 页。
- 西蒙斯, 路德维希 (Simons, Ludwig 1803—1870)——德国法学家, 反动分子;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 后来担任司法大臣 (1849—1860)。——第 528、529、558、594 页。
- 西姆尼奇, 巴塔扎尔 (Симунчић, Balthasar 1785—1861)——男爵, 奥地利元帅; 原籍塞尔维亚; 1848—1849 年曾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第 365、610 页。
-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 (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 1846 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 共产

- 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8 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 “新科伦报”编辑,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9 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 后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方一边。——第 151、152、154、158、160、281、282、509、687—689、698、702、704 页。
- 安内克, 玛蒂尔达·弗兰契斯卡 (Anneke, Mathilde Franziska 1817—1884)——德国女作家, 1848—1849 年曾为民主报刊撰稿; 弗里德里希·安内克之妻。——第 155 页。
- 毕洛夫-库梅洛夫, 恩斯特·哥特弗利德·格奥尔格 (Bulow-Cummerow, Ernst Gottfried Georg 1775—1851)——德国的反动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言人。——第 345 页。
- 巴尔格尔, 哥特弗利德·奥古斯特 (Burger, Gottfried August 1747—1794)——德国著名诗人。——第 427 页。
- 巴尔格尔,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政论家, “莱茵报”的撰稿人 (1842—1843), 1848 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盟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从 1850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中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成为进步主义者。——第 695 页。
- 圭茨, 克利斯提安 (Götz, Christian 1783—1849)——奥地利将军; 1848—1849 年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第 365、610 页。
- 圭拉奇, 弗兰契斯科·多美尼科 (Guerazzi, Francesco Domenico 1804—1873)——意大利作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第 93 页。
- 达伦, 海尔曼, 奥拉堡男爵 (Dahlen, Hermann, Baron von Orlaburg 1828—1887)——奥地利军官; 参加镇压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第 606、608 页。
- 达克斯雷, 康斯坦丁 (D'Aspre, Constantin 1789—1850)——男爵, 奥地利将军, 参加镇压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第 467 页。
-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古代著名的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第 333 页。
- 托斯卡纳大公——见列奥波特二世。
- 伊丽莎白 (Elisabeth 1801—1873)——普鲁士女王,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王妃。——第 585 页。
- 考斯丘什科, 塔杰乌什 (Kościuszko, Tadeusz 1746—1817)——杰出的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776—1783 年是争取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的参加者; 1794 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第 335 页。
- 乔里奇, 安东 (Чорун, Anton 1795—1864)——奥地利将军; 原籍克罗地亚; 曾参加镇压维也纳 1848 年十月起义和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第 365、610 页。
- 齐格勒, 保尔·卡尔·爱德华 (Ziegler, Paul Karl Eduard 1800—1882)——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反宗崩德战争 (1847) 的参加者, 1848 年为国民议会议员。——第 111 页。
- 尧赫, 弗兰茨 (Jauch, Franz 1807—1867)——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联邦法

院成员(1848—1852)。——第40页。

七 画

- 贝 斯, 米凯莱·朱泽培(Bes, Michele Giuseppe 1794—1855)——1848—1849年与奥军作战的皮蒙特军队的将军。——第467页。
- 贝 克, 约翰·巴普提斯特(Bekk, Johann Baptist 1797—1855)——巴登的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6—1849年任巴登政府内政大臣。——第407页。
- 贝姆, 约瑟夫(Bern, Joseph 1795—1850)——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年参加了维也纳的革命斗争; 匈牙利革命军的领导人之一; 后在土耳其军队服务。——第507、563、609、612页。
- 贝尔格(Berg)——瑞士军官, 1848年为国民院议员。——第107、109—111页。
- 贝尔格, 菲力浦(Berg, Philipp 1815—1866)——普鲁士天主教牧师,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第443、444、446页。
- 贝 克 尔, 约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制刷工人, 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德国和瑞士民主运动, 以瑞士军队军官的身分参加过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指挥巴登民团, 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曾参加第一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 “先驱”杂志的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12页。
- 贝 克 尔, 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

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509、693、695、707页。

贝伦兹, 尤利乌斯(Berends, Julius 生于1817年)——柏林一印刷厂厂主,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议员, 属于左派;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第529页。

贝 利 耶, 泰 奥 菲 尔 (Berlier, Teophile 1761—1844)——伯爵, 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民公会代表; 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后为国务委员会委员。——第266页。

贝诺特, 约瑟夫·列奥纳特(Bernold, Joseph Leonard 1809—1872)——瑞士陆军上校,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为国民院议员。——第101页。

贝尔鸠斯, 卡尔·尤利乌斯(Bergius, Karl Julius 1804—1871)——普鲁士官员, 资产阶级法学家和政论家。——第345页。

贝希托特, 阿尔诺德(Bechtold, Arnold)——出版“新莱茵报”的科伦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第707页。

克拉埃(Krahe)——1848—1849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职业是钟表匠。——第692页。

克 劳 斯, 菲 力 浦 (Krauß, Philipp 1792—1861)——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曾任财政大臣(1848—1851)。——第80页。

克列弗尔(Clever)——普鲁士军官, 1848

院成员(1848—1852)。——第40页。

七 画

- 贝 斯, 米凯莱·朱泽培(Bes, Michele Giuseppe 1794—1855)——1848—1849年与奥军作战的皮蒙特军队的将军。——第467页。
- 贝 克, 约翰·巴普提斯特(Bekk, Johann Baptist 1797—1855)——巴登的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6—1849年任巴登政府内政大臣。——第407页。
- 贝姆, 约瑟夫(Bern, Joseph 1795—1850)——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年参加了维也纳的革命斗争; 匈牙利革命军的领导人之一; 后在土耳其军队服务。——第507、563、609、612页。
- 贝尔格(Berg)——瑞士军官, 1848年为国民院议员。——第107、109—111页。
- 贝尔格, 菲力浦(Berg, Philipp 1815—1866)——普鲁士天主教牧师,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第443、444、446页。
- 贝 克 尔, 约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制刷工人, 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德国和瑞士民主运动, 以瑞士军队军官的身分参加过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指挥巴登民团, 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曾参加第一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 “先驱”杂志的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12页。
- 贝 克 尔, 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

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509、693、695、707页。

贝伦兹, 尤利乌斯(Berends, Julius 生于1817年)——柏林一印刷厂厂主,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第529页。

贝 利 耶, 泰 奥 菲 尔 (Berlier, Teophile 1761—1844)——伯爵, 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民公会代表; 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后为国务委员会委员。——第266页。

贝诺特, 约瑟夫·列奥纳特(Bernold, Joseph Leonard 1809—1872)——瑞士陆军上校,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为国民院议员。——第101页。

贝尔鸠斯, 卡尔·尤利乌斯(Bergius, Karl Julius 1804—1871)——普鲁士官员, 资产阶级法学家和政论家。——第345页。

贝希托特, 阿尔诺德(Bechtold, Arnold)——出版“新莱茵报”的科伦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第707页。

克拉埃(Krahe)——1848—1849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职业是钟表匠。——第692页。

克 劳 斯, 菲 力 浦 (Krauß, Philipp 1792—1861)——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曾任财政大臣(1848—1851)。——第80页。

克列弗尔(Clever)——普鲁士军官, 1848

- 主义者, 律师,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爱北斐特 1849 年 5 月起义时的安全委员会委员; 后流亡美国。——第 597 页。
- 里德马顿, 奥古斯丁 (Riedmatten, Augustin 1796—1867)——瑞士军官; 1844 年曾领导瓦里斯州的反革命政变, 1848—1849 年参加镇压那不勒斯的革命运动, 而且还参加远征西西里岛。——第 111 页。
- 里廷豪森, 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撰稿人, 科伦民主协会会员; 第一国际的成员, 后来 (1864 年前)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 693、695 页。
- 沃尔弗,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职业是教员, 西里西亚一个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 年被囚于普鲁士监狱中; 1846—1847 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从 1848 年 3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70、509、623、695、698、702、704、705 页。
- 沃尔弗, 斐迪南 (Wolff, Ferdinand)——德国政论家, 1846—1847 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离开;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后来放弃了政治活动。——第 623、694、695、705 页。
- 沃尔弗斯, 弗兰茨·安东 (Wolffers, Franz Anton 生于 1813 年)——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 原籍比利时, 1847—1849 年是“科伦日报”撰稿人和编委, 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的奸细。——第 310 页。
- 沃尔格穆特, 路德维希 (Wohlgemuth, Ludwig 1788—1851)——男爵, 奥地利元帅, 参加镇压 1848 年意大利和 1849 年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 611 页。
- 伯克, 奥古斯特 (Böckh, August 1785—1867)——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第 94 页。
- 伯提歇尔, 卡尔·威廉 (Boetticher, Karl Wilhelm 死于 1868 年)——普鲁士官员, 三十年代为普鲁士省总督。——第 184 页。
- 利济斯基 (Lisiecki)——波兹南法官; 原籍波兰;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第 510、511、514、518 页。
- 利希诺夫斯基, 费里克斯 (Lichnowski, Felix 1814—1848)——公爵, 普鲁士军官, 反动分子,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 1848 年 9 月法兰克福起义期间被人民打死。——第 680、707 页。
- 麦迭姆, 巴维尔·伊万诺维奇 (Меден,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伯爵, 沙皇俄国外交官, 驻维也纳公使。——第 171 页。
- 麦克库洛赫, 约翰·拉姆赛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637 页。
- 努根特, 拉伐尔 (Nugent, Laval 1777—1862)——伯爵, 奥地利元帅; 曾参加镇

压意大利和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第 365、606、608 页。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 (1846—1878)。——第 173、369、389、453 页。

劳麦, 弗里德里希 (Raumer, Friedrich 1781—1873)——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 1848 年任帝国驻巴黎大使,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78、96 页。

邦格特 (Bangert)——洛桑工人联合会会员。——第 682 页。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约 1812—187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8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15 日被监禁在狱中; 1849 年 2 月 8 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案的被告之一; 1849 年 2—5 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是伦敦“左”倾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6 年又和马克思接近, 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39、44、307、308、509、543、678、679、687、689、691—693、695、698、702、704 页。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第 222 页。

苏里曼二世 (Suleiman II)——土耳其皇帝 (1687—1691)。——第 332 页。

希尔德布兰特, 约翰·安得列阿斯·卡尔 (Hildebrandt, Johann Andreas Karl 1764—1848)——德国作家, 许多猎奇小说和武侠小说的作者。——第 134

页。

八 画

拉·马尔摩拉, 阿尔丰梭·费勒罗 (La Marmora, Alphonso Ferrero 1804—1878)——意大利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陆军大臣 (1848、1849—1855)。——第 455、456、463 页。

拉沃, 弗兰茨 (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科伦出席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驻瑞士的帝国专员,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巴登临时政府委员,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离开德国。——第 699 页。

拉图尔, 泰奥多尔 (Latour, Theodor 1780—1848)——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君主专制的拥护者; 1848 年是陆军大臣; 1848 年 10 月被维也纳起义者处死。——第 41、606 页。

拉马丁, 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 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 年任外交部长, 是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第 52、173、174、322、323、369、469、577、662—665 页。

拉登堡, 阿达尔伯特 (Ladenberg, Adalbert 1798—1855)——普鲁士反动官僚的代表之一; 曾任宗教、教育、医务大臣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2 月)。——第 29—32、157、215、217、284 页。

拉萨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律师, 1848—1849 年曾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 六十年代初倾向于工人

- 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奠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来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66、68、308、316—321、531—533、543—548、553—557页。
- 拉莫里诺,吉罗拉莫(Ramorino, Gerolamo 1792—1849)——意大利将军,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指挥皮蒙特军队,采取叛变的策略,使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第458、461、464、465、468页。
-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Raspail, Francois 1794—1878)——卓越的法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社会主义者,接近革命无产阶级,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制宪会议员。——第661、663—668页。
- 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年起指挥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军队,1848—1849年残酷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第91、92、102、106、116、209、453—457、459、462—466、468、613页。
- 拉亚契奇,约瑟夫(Рајаџић) Ђ Joseph 1786—1861)——卡尔洛瓦茨的大主教,1848年为塞尔维亚的总主教,1848—1849年曾领导塞尔维亚民族运动的反动派;1849年2月至8月为伏伊伏迪纳的执政者。——第338页。
- 拉多维茨,约瑟夫(Radowitz, Joseph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的领导人之一。——第424、471、541、542、550页。
- 阿蒙(Ammon)——普鲁士官吏,1848—1849年任杜塞尔多夫检察官,1849年为第一议院议员。——第317、318、531、532、544页。
- 阿佩尔,克利斯提安(Appel, Christian 1785—1854)——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第467页。
- 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曾积极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因被民族主义分子拘禁而丧失自由;君主立宪政体的拥护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81页。
- 阿尔贝,米歇尔·比埃尔·阿列克西斯(Hébert, Michel-Pierre Alexis 1799—1887)——法国的法学家和保守派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议会议员(1834—1848);1841年起是王国法庭的首席检察官,曾任司法大臣(1847—1848年2月),1849年为立法会议员。——第265页。
- 阿尔伯(Albert 真名是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 1815—1895)——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663页。
- 阿尔宁-博伊岑堡,阿道夫·亨利希(Arnim-Boytzenburg, Adolf Heinrich 1803—1868)——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内政大臣(1842—1845)和首相(1848年3月19—29日),1849年为第二议院的右派领袖之一。——第415、430、451、518页。

- 阿特金森, 威廉 (Atkinson, William) —— 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反对者, 保护关税论者。——第 636 页。
- 阿尔梅拉斯, 亚历山大·费里克斯 (Almeras, Alexander Felix 1811—1868) —— 瑞士资产阶级政治家, 激进主义者, 国民院议员。——第 109 页。
- 阿基比阿德 (Alcibiades (Ἀλκιβιάδης) 公元前约 451—404) —— 雅典政治活动家和统帅。——第 104、110 页。
- 阿尔文斯累本, 阿尔勃莱希特 (Alvensleben, Albrecht 1794—1858) —— 伯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财政大臣 (1835—1842); 1849 年为第一议院议员。——第 347、349、353、354 页。
- 波克, 詹姆斯·诺克斯 (Polk, James Knox 1795—1849) ——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1845—1849), 属于民主党。——第 182 页。
- 波拿巴 (Bonaparte) —— 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 (Bonaparte) —— 见拿破仑第三。
- 波特曼, 约翰 (Pothmann, Johann 约生于 1823 年) —— 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和后备军的领导人; 起义失败后流亡荷兰。——第 596 页。
- 波旁王朝 (Bourbons) —— 法国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202、227 页。
- 波尔多的亨利 (Heinrich) —— 见尚博尔, 昂利·沙尔。
- 波托茨基家族 (Potocki) —— 波兰一个伯爵家族。——第 195 页。
- 帕托夫, 艾拉兹穆斯·罗伯特 (Patow, Erasmus Robert 1804—1890) —— 男爵, 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康普豪森内阁的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8 年 4—6 月)。——第 143 页。
- 帕拉茨基, 弗兰蒂舍克 (Palacky, František 1798—1876) —— 捷克大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曾任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 实行旨在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第 201、204、337 页。
- 帕麦斯顿, 亨利·约翰 (Palmerston, Henry John 1784—1865) —— 英国国家活动家, 开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 1830 年起是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政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52、55、57、75、171 页。
- 帕斯凯维奇, 伊万·费多罗维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 —— 俄国元帅, 1831 年夏天起, 任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沙皇军队总司令, 1849 年任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沙皇军队总司令。——第 335 页。
- 罗西, 佩勒格里诺, (Rossi, Pellegrino 1787—1848) —— 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他在法国居住很久。——第 639、646、657 页。
- 罗西尼, 卓阿金诺 (Rossini, Gioacchino 1792—1868) —— 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第 81 页。
- 罗尔谢特 (Rohrscheidt) —— 普鲁士官吏, 行政区长官;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 518 页。
-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

- 各宾党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 28、273、694 页。
- 图恩，列奥 (Thun, Leo 1811—1888)——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原籍捷克，弗兰茨-约瑟夫的最亲近顾问之一，曾任宗教和教育大臣（1849—1860）。——第 337 页。
- 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马克西米利安·卡尔 (Thurn und Taxis, Maximilien Karl 1802—1871)——德国的领主王公；1867 年以前他享有管辖德国许多邦的邮政事务机构的世袭特权；是“法兰克福总邮报”的世袭所有者。——第 373 页。
- 佩罗纳·狄·桑-马丁诺，艾托勒 (Perone di San Martino, Ettore 1789—1849)——曾于 1848—1849 年与奥军作战的皮蒙特军队的将军。——第 467 页。
- 佩尔采尔，摩里茨 (Perc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将军，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流亡英国。——第 507、612 页。
- 尚博尔，昂利·沙尔 (Chambord, Henri Charles 1820—1883)——伯爵，波旁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法国王位僭望者，自封亨利五世。——第 310、421、470、569 页。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 (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e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君主主义者；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代表；1848 年 6 月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示威游行。——第 248、249、251、627 页。
- 舍勒尔 (Scherer)——德国律师，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右派。——第 447 页。
-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 (Cherbuliez, Antoine E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信徒，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第 640 页。
- 味吉尔 (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29、412 页。
-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逃出监狱后流亡英国；是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359 页。
- 屈韦特，弗里德里希 (Kühlwetter, Friedrich 1809—1882)——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内政大臣（1848 年 6—9 月）；后来任杜塞尔多夫的行政区长官，威斯特伐里亚省的总督。——第 134、139、144、414 页。
- 奈弗，威廉 (Neff, Wilhelm 1802—1881)——瑞士法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 年为联邦院议员。——第 75 页。
- 林泰伦，威廉 (Rintelen, Wilhelm 死于 1869 年)——普鲁士官吏，曾任司法大臣（1848 年 11 月—1849 年 4 月）；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9 年为第一议院议员。——第 165、166 页。
- 法肯海恩 (Falkenhain)——德国民主主义

者, 1848年为布勒斯劳“德意志”协会主席。——第276页。

芬克, 格奥尔格 (V incke, Georg 1811—1875)——男爵, 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右派领导人之一;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右派。——第426—429、432、451页。

九 画

迪茨, 约翰·威廉 (Dietz, Johann W ilhelm)——从1848年8月30日起印刷“新莱茵报”的科伦印刷厂厂主。——第707页。

迪茨, 弗里德里希 (Diez, Friedrich 1794—1876)——德国哲学家, 罗曼语研究比较法的创始人, “罗曼语语法”的作者。——第525页。

施利克, 弗兰茨·亨利希 (Schlick, Franz Heinrich 1789—1862)——伯爵, 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第362—366、607—612页。

施林克 (Schlink)——普鲁士法官;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 后属于中间派。——第28页。

施梅林, 安东 (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 1848年是帝国内政大臣 (7—12月), 首相和外交大臣 (9—12月)。——第49、53—55、59—62、79—81、83、149页。

施纳泽, 卡尔·尤利乌斯·斐迪南 (Schnaase, Karl Julius Ferdinand 1798—1875)——德国法官, 法学家和艺术史家; 1848年任杜塞尔多夫检察长, 后来

是柏林高级法庭的成员。——第276页。

施泰因, 尤利乌斯 (Stein, Julius 1813—1889)——西里西亚教师, 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第144、145、299、355、356页。

施图普, 亨利希·约瑟夫 (Stupp, Heinrich Joseph)——普鲁士官吏, 教权派;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第215、218、251页。

施梯维, 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 (Stüve, Johann Karl Bertram 1798—1872)——德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曾任汉诺威的内政大臣 (1848—1850)。——第407页。

施万贝克, 欧根·阿列克西斯 (Schwanbeck, Eugen Alexis 1821—1850)——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 1848—1849年为“科伦日报”编委。——第310—314、357、358、362—368页。

施特罗达, 卡尔·阿道夫 (Strotha, Karl Adolf 1786—1870)——普鲁士将军, 反动分子, 第一议院议员, 曾任陆军大臣 (1848年11月—1850年2月)。——第511—514页。

施泰德曼, 卡尔 (Stedmann, Karl 1804—1882)——普鲁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在马尔摩签订停战协定的全权代表, 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帝国专员 (1848年9月—1849年3月);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78、680、707页。

施泰格尔, 雅科布·罗伯特 (Steiger, Jakob Robert 1801—1862)——瑞士资

- 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1849年为国民院议长。——第100、104、107、110、115、148、149页。
- 施皮格尔·博林豪森 (Spiegel-Borlinghausen)——普鲁士官吏，1848年为杜塞尔多夫的行政区长官。——第64、65页。
- 施坦吉尔，约翰 (Stangier, Johann)——阿尔滕基尔欣地区的庄稼人，莱茵省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第531、544、546页。
- 施奈贝尔格，格·(Schneeberger, G)——1848年洛桑工人联合会会员。——第682页。
- 施坦普弗利，雅科布 (Stämpfli, Jakob 1820—1879)——瑞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激进主义者；四十和五十年代是“伯尔尼报”的创办人和编辑。——第42、210页。
- 施托克马尔，克萨维耶 (Stockmar, Xavier 1797—1864)——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第42、211页。
- 施莱根施坦，路德维希·罗特·冯 (Schreckenstein, Ludwig Roth von 1789—1858)——男爵，普鲁士将军，封建贵族的代表，1848年6—9月是陆军大臣。——第134页。
-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 (Schneider II, Karl)——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审判案中的辩护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案的被告；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24、27、39、44、265、268、279、280、288、307、308、543、678、679、689、691、693、699页。
- 查理-阿尔伯特 (Charles-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1831—1849)。——第453、456—459、464页。
- 查理·马尔泰尔 (Charles Martel 约688—741)——法兰克的宫廷大臣，从715年起是法兰克王国的实际执政者。——第199页。
- 查理大帝 (Charles the Great 约742—814)——法国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第328页。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16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15、289、304页。
- 查理五世 (Charles V 1500—1558)——西班牙国王(1516—1556)，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519—1566)。——第14页。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第15页。
- 查尔托雷斯基家族 (Czartoryski)——波兰一个公爵家族。——第195页。
- 哈夫，克·(Haaf, Chr.)——1848年为洛桑工人联合会会员。——第682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宪章运动左派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696页。
- 哈诺夫 (Hanow)——德国官吏；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第143页。
- 哈尔科特，弗里德里希·威廉 (Harkort,

- Friedrich Wilhelm 1793—1880)——普鲁士大工厂主, 1848—1849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中一个中间派的首脑; 后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429页。
-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er)——1273—1806年(中有间断)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朝, 奥地利王朝(从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王朝(1867—1918)。——第194、195、204、453、605页。
- 威德, 约翰(Wade, John 1788—1875)——英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第637页。
- 威灵顿, 阿瑟(Wellington, Arthur 1769—1852)——公爵, 英国统帅, 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1828—1830), 外交大臣(1834年10月—1885年4月)。——第304、468页。
- 威斯特曼(Westermann)——1849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第687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72—1843)——尼德国国王(1815—1840); 1830年以前, 他的政权扩展到了比利时。——第227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 普鲁士国王(1861—1888), 德国皇帝(1871—1888)。——第20、85、119、236、259页。
- 科苏特, 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败后逃出匈牙利。——第193、194、206、232、233、333、358、364、454、507、563、604—607、692、693、695页。
- 科尔夫, 海尔曼(Korff, Hermann)——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于1847年被革除军职;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 后流亡美国。——第150、685、705、707页。
- 科尔图姆, 卡尔·阿尔诺德(Kortum, Karl Arnold 1745—1824)——德国诗人和作家, 以“约卜西之歌”一书而著名。——第79、118页。
- 科西迪耶尔, 马尔克(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组织者之一; 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巴黎警察局长, 制宪议会议员, 1848年6月流亡英国。——第663页。
-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站在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上。——第73、661、663、671页。
- 勃鲁姆, 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记者; 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 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的保卫战, 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枪杀。——第49、84、209、212、362、397、398、507、693页。
- 勃律盖曼, 卡尔·亨利希(Brüggen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自由主义者; 1845—1855年为“科伦日报”主编。——第131、132、224、253、254、310、311、584页。
-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伯爵, 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反革命内阁的首脑(1848年11月—

- 1850年11月)。——第5、6、14、15、17—21、25、30—32、37、38、45、46、48—51、63—65、85、94、120、123、145、166、215、217、218、258、260、298、375、376、408、426、471、508、580页。
- 洛贝尔图斯, 约翰·卡尔(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 1848—1849年革命期间是温和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家, 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中间派左翼领袖; 后来宣传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第6页。
- 洛伊特豪斯(Leuthaus)——普鲁士法官, 1848年为科伦侦查员。——第44页。
- 约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 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87、88页。
-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765—1790)。——第373页。
- 耶尼(Jenni)——瑞士政论家, 激进主义者, 伯尔尼幽默报纸“全景”的编辑。——第211页。
- 耶拉契奇, 约西普(Јелачић, Josip 1801—1859)——伯爵, 奥地利将军, 克罗地亚、达尔马威亚和斯拉窝尼亚总督(1848—1859), 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1848—1849年革命。——第23、49、55、84、92、129、203—205、336、338、362、364、365、377、378、605、606、611、612页。
- 南施蒂尔(Nenstiel)——德国商人,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143页。
- 拜比吉, 查理(Babage, 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639页。
- 若里(Jolly)——1848年为瑞士联邦法院的成员。——第40页。
- 济格瓦特·弥勒, 康斯坦丁(Siegwart-Müller, Constantin 1801—1869)——瑞士国家活动家, 反动分子, 1844年任联邦议会议长, 1845年任宗得崩德军事委员会主席, 宗得崩德失败(1847年)后, 逃亡国外。——第100页。
- 美延多尔夫, 彼得·卡季米罗维奇(Мейендорф, 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1796—1863)——男爵, 沙皇俄国外交官, 曾任驻柏林大使(1839—1850)。——第171页。
- 品德尔, 尤利乌斯·海耳曼(Pinder, Julius Hermann 生于1805年)——普鲁士官吏,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任西里西亚总督,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 1849年为第一议院议员。——第38页。
- 洪贝格尔, 亨利希(Homberger, Heinrich 1806—1851)——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1848年为国民院议员。——第109页。

十 画

- 马拉, 让·保尔(Marat, Jean Paul 1743—1793)——法国政论家,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的领袖之一。——第694页。
- 马利耶, 埃蒂耶纳(Marilley, Etienne 1804—1889)——夫赖堡主教(1846—1879), 夫赖堡(在夫赖堡州)1848年10月24日反民主暴乱的煽动者。——第42页。
- 马克思, 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24、27、39、44、70、

- 150、262、277、286、307、308、509、543、600、603、623、630、670、675、678—680、685—693、698、699、702、704—707页。
- 马尔滕,格·(Malten, G.)——德国反动记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总邮报”编辑。——第373页。
- 马米阿尼,托伦西奥(Mamiani, Torenzio 1799—1885)——伯爵,意大利诗人和政论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曾任教皇领地的内政大臣(1848年5—8月)。——第91页。
- 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民报”编辑;1848年任临时政府委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第23、93、104、174、664页。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的宣传者。——第223、637、646、649页。
- 马尔泰泽,约翰(Maltheser, Johann)——普鲁士警察厅的密探,职业是订书工人。——第154、160、170页。
- 马尔科夫斯基,伊格纳茨(Malkowsky, Ignaz 1784—1854)——奥地利将军;1849年曾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第607—609页。
-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en II 1811—1864)——巴伐利亚国王(1848—1864)。——第578页。
- 埃林堡,克利斯提安·哥特弗利德(Ehrenberg, Christian Gottfried 1795—1876)——德国自然科学家,柏林大学教授。——第94页。
- 埃歇尔,阿尔弗勒德(Escher, Alfred 1819—1882)——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曾任大会议主席(1847);1849年起多次任国民院议长。——第75、103—106、110、114页。
- 埃塞尔(Esser)——普鲁士法官,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第162—164页。
- 埃塞尔,克利斯提安·约瑟夫(Esser, Christian Joseph 约生于1809年)——德国工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1849年为“自由、博爱、劳动”报的编辑。——第151、152、158、159、687、696、698、702、704页。
- 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1848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派。——第163页。
- 埃塞尔第二,斐迪南·约瑟夫(Esser II, Ferdinand Joseph)——普鲁士官吏,教权派,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第163页。
- 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帕尔·安东(Esterhazy von Galantha, Anton 1786—1866)——匈牙利大地主,奥地利外交官,曾任第一届匈牙利政府外交大臣(1848年3—9月)。——第363页。
-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Heydt, August 1801—1874)——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1848年12月—1858年11月曾任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第123、438—440、524、528、594页。

- 海斯, 亨利希 (Heß, Heinrich 1788—1870) —— 奥地利元帅; 曾积极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第 468 页。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 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 18、32、58、119、217、236、327、521、571、595、669 页。
- 海尔克斯 (Herx) —— 科伦工人歌咏团的领导人。——第 694 页。
- 海尔佐克, 卡尔 (Herzog, Karl 1798—1857) —— 瑞士政论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伯尔尼宪法之友”报编辑。——第 210 页。
- 海尔梅斯, 约翰·提摩泰乌斯 (Hermes, Johann Timotheus 1738—1821) —— 德国神学家和作家, 长篇小说“索菲娅从默麦尔到萨克森旅行记”的作者。——第 53 页。
- 格林兄弟, 雅科布和威廉 (Grimm, Jacob 1785—1863, Wilhelm 1786—1859) —— 都是德国哲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 以编著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史诗著名。——第 94 页。
- 格罗特 (Groot) —— 普鲁士法官, 哥特沙克案件的有责任人。——第 154、160、251 页。
- 格鲁希, 艾曼纽尔 (Grouchy, Emmanuel 1766—1847) —— 侯爵, 法国元帅和贵族, 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第 468 页。
- 格拉德巴赫, 安东 (Gladbach, Anton 死于 1873 年)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缪尔海姆 (在莱茵省) 出席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代表, 属于左派, 柏林民主俱乐部主席。——第 692、693 页。
- 格涅兹诺和波兹南的大主教——见普什鲁斯基、莱昂。
- 恩格斯 (Engels) —— 普鲁士上校, 1848—1849 年任科伦卫戍司令。——第 364 页。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传记材料)。——第 7、70、150、279、280、596—599、623、676、677、681、685、689、691—693、695、705、708 页。
- 恩斯特-奥古斯特 (Ernst-August 1771—1851) —— 汉诺威国王 (1837—1851)。——第 578 页。
- 特罗斯特 (Trost) —— 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第 596 页。
- 特德斯科, 维克多 (Tedesco, Victor 1821—1897) —— 比利时律师, 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工人运动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创始人之一; 1847—1848 年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 里斯康士案的被告,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三十年徒刑, 1854 年被释放。——第 694 页。
- 特雷斯科夫, 西吉兹蒙特·奥托 (Treskow, Sigismund Otto) —— 德国商人, 1796 年起在奥文斯克 (波兹南) 置有产业。——第 539 页。
- 留博米尔斯基家族 (Lubomirski) —— 波兰一个公爵家族。——第 195 页。
- 留博米尔斯基, 埃日伊 (Lubomirski, Jerzy 1817—1872) —— 公爵, 波兰贵族, 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参加者, 1849 年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 341 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 法国皇帝

- (1804—1814 和 1815)。——第 15、175、177、268、274、292、333、335、363、403、405、411、433、454、456、468、572、573、589 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8)——亲王,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 23、56、174、207、421、422、425、459、663 页。
-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诗人和剧作家。——第 19、56、79、173、549 页。
- 席斯,约翰·乌尔利希(Schiess, Johann Ulrich 1813—1883)——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曾任瑞士联邦总理(1848—1881)。——第 55 页。
- 泰梅,约多库斯·多纳图斯·胡贝尔图斯(Temme, Jodokus Donatus Hubertus 1798—1881)——德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第 162—165 页。
- 泰奥多罗维奇,库兹曼(Теодоровић, Kusman)——奥地利将军;原籍塞尔维亚;1849 年曾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第 365、607 页。
- 茨魏费尔(Zweiffel)——普鲁士官吏,反动分子,科伦检察长,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第 28、44、46、47、70、71、262、265、270—273、276、279、532、678、685、689 页。
- 爱特尔,茹尔(Eytel, Jules 1817—1873)——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瓦得(窝)州激进党的领袖之一,1848 年为国民议会议员。——第 101、109、110 页。
- 热那亚公爵,斐迪南(Ferdinand 1822—1855)——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之弟,1848—1849 年反对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第 467 页。
- 哥特沙克,安得列阿斯(Gottschalk, Andreas 1815—184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1848 年 4—6 月为科伦工会联合会主席;从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第 151—155、157—161、687、699—701 页。
- 库尔特(Kurth)——德国工人,木匠,1848—1849 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会员。——第 693 页。
- 涅谢尔罗迭,卡尔·瓦西里也维奇(Несельродт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沙皇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第 52、171 页。
- 伦纳德,安得列阿斯(Renard, Andreas 1795—1874)——公爵,西里西亚地主,反动分子,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右派。——第 429、444—446 页。
- 索菲娅(Sophia 1805—1872)——奥地利大公妃,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之母,对反动的宫廷奸党的政策有很大影响。——第 83、171、172、400、606 页。
- 唐纳,卡尔·鲁道夫(Tanner, Karl Rudolf 1794—1849)——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最高法院院长,1848 年为国民议会议员。——第 105、110 页。
- 翁鲁,汉斯·维克多(Unruh, Hans Victor 1806—1886)——普鲁士工程师,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 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中间派领导人之一，10月起任国民议会主席；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以后是进步主义者政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00页。

朗堡，格奥尔格·亨利希 (Ramberg, Georg Heinrich 1786—1855)——男爵，奥地利元帅，曾参加镇压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第611页。

十一画

梅特涅，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171、196、197、313、373、397页。

梅维森，古斯塔夫 (Mevissen, Gustav 1815—1899) 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215页。

梅利奈，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cois 1768—1852)——比利时将军；原籍法国；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名誉主席，里斯康土案的被告之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三十年徒刑，1849年9月被赦免。——第152、694页。

梅尔克 (Maercker)——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曾任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司法大臣 (1848年6—9月)。——第134页。

梅森豪泽，凯撒·温采尔 (Messenhauser, Caesar Wenzel 1813—1848)——奥地利军官和文学家，1848年十月起义时

期，为国民自卫军指挥官和维也纳卫戍司令；反革命军队占领城市后，被枪杀。——第212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 (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时释放；1848年领导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曾指挥革命军；在五十年代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被任命为波兰民族政府的执政，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189、694页。

康普 (Kamp)——波恩—旅社的主人，科伦1849年2月24日民主宴会的参加者。——第694页。

康佩斯，盖尔哈特·约瑟夫 (Compes, Gerhard Joseph 1810—1887)——德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215页。

康普茨，卡尔 (Kamptz, Karl 1769—1849)——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司法大臣 (1832—1842)。——第346页。

康普豪森，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实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普鲁士驻中央政权的使节 (1848年7月—1849年4月)。——第5、29、118—120、124、128、130—133、135、215、217、218、239、258—261、290、296、376、414、429、430、432、445、536、552、558页。

- 康塔多尔, 罗伦兹 (Cantador, Lorenz)——德国商人,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8 年指挥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 1848 年 12 月因号召武装反对皇帝政权被捕, 1849 年 3 月被释放; 流亡美国。——第 308、318—321、543、545、546 页。
- 莫里哀, 让·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 Baptiste 1622—1673)——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 312 页。
- 莫莱特 (Morret)——普鲁士警官, 1848—1849 年为杜塞尔多夫的典狱长。——第 317、318、543 页。
- 莫斯累, 约翰·路德维希 (Mosle, Johann Ludwig 1794—1877)——德国军官, 出席联邦议会的奥登堡代表; 1848 年被派往维也纳的帝国专员。——第 78—84、397 页。
- 梯利, 约翰 (Tilly, Johann 1559—1632)——伯爵,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统帅, 曾指挥天主教联盟军队; 1631 年 5 月他统率的军队向马格德堡发起进攻, 占领后洗劫了该城。——第 260 页。
- 梯岑 (Tietzen)——普鲁士将军, 反动分子。——第 590 页。
- 梯勒, 路德维希·古斯塔夫 (Thile, Ludwig Gustav 1781—1852)——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反动分子; 1849 年任国库大臣。——第 371、372 页。
-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曾任总理 (1836—1840); 1848 年为制宪会议议员, 1849—1851 年为立法会议议员, 奥尔良党人; 曾任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屠杀巴黎公社起义者的刽子手。——第 173、174、249、469、470、522 页。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izot, 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 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了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52、265、373、522、668 页。
- 基斯克尔 (Kisker)——普鲁士法官, 1848 年曾任普富尔内阁的司法大臣, 1849 年为第一议院议员。——第 284 页。
- 基尔希曼, 尤利乌斯 (Kirchmann, Julius 1802—1884)——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 激进主义者;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会议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第 162、164 页。
- 许金, 列文 (Schücking, Levin 1814—1883)——德国作家; 1845—1852 年是“科伦日报”撰稿人, 曾写过许多小品文。——第 310 页。
- 许泽尔, 约翰·汉斯·古斯塔夫·亨利希 (Hüser, Johann Hans Gustav Heinrich 1782—1857)——普鲁士将军, 反动军阀的代表之一, 1844—1849 年任美国兹的卫戍司令。——第 184、600 页。
- 许纳拜恩, 弗·符·(Hühnerbein, F.W.)——德国共产主义者, 职业是裁缝; 1849 年 5 月受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第 596 页。
- 符尔夫, 尤利乌斯 (Wulff, Julius)——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主席,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第 276 页。
- 符尔皮乌斯, 克利斯提安·奥古斯特 (Vulpius, Christian August 1762—1827)——德国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最为著名。——第 56 页。

- 盖伊, 路德维特 (Gai, Liudevít 1809—1872)——克罗地亚记者, 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 年为克罗地亚临时政府委员, 实行旨在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第 201 页。
- 盖格尔, 威廉·阿尔诺德 (Geiger, Wilhelm Arnold)——普鲁士警官, 1848 年任法院侦查员, 后来任科伦警察厅长。——第 155、156 页。
- 密尔顿, 约翰 (Milton, John 1608—1674)——伟大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第 78 页。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19、33、99、111、164 页。
- 雪恩来因, 约翰·鲁卡斯 (Schönlein, Johann Lukas 1798—1864)——德国医生, 柏林大学教授, 君主主义者。——第 94 页。
-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政大臣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1 月), 1849 年为第一议院和第二议院议员, 曾任首相 (1850—1858)。——第 30—32、37、45、49、51、63、87、215、217、218、221、223、229、232、233、376—379、381、405、408、413、437—440、449、450、508、520—522、524、525、535、541、542、546、550、552、558、574、578、580、594 页。
- 勒泽尔, 彼得·格尔哈特 (Röser, Peter Gorhardt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制雪茄烟的工人; 1848—1849 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 “自由、博爱、劳动”报的发行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人之一; 后来倾向拉萨尔派。——第 687、688、694 页。

十二画

- 普赫纳, 安东 (Puchner, Anton 1779—1852)——男爵, 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49 年匈牙利革命。——第 365、607—610 页。
- 普富尔, 恩斯特 (Pfuël, Ernst 1779—1866)——普鲁士将军, 反动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 1832—1848 年任纽沙特尔省长; 1848 年 3 月任柏林卫戍司令; 5 月曾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 1848 年 9—10 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第 7、8、14、19、37、64、143—145、233、284、299、300、415、445 页。
- 普林茨, 弗·(Prinz, W.)——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自由、劳动”报的编辑, 哥特沙克的拥护者。——第 687 页。
- 普斯库亨-格兰佐夫, 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 (Pustkuchen-Glanzow, Johann Friedrich Wilhelm 1793—1834)——德国作家, 仿歌德“威廉·麦斯特”一书改写的许多恶毒而无能的歪诗的作者。——第 357 页。
- 普菲弗尔, 卡济米尔 (Pfyffer, Kasimir 1794—1875)——瑞士律师,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 年为国民院议员。——第 40、102、103 页。
- 普什鲁斯基, 莱昂 (Przyluski, Leon 1789—1865)——曾任格涅兹诺和波兹南的大主教 (1845—1865)。——第 536 页。
- 普路古尔姆, 比埃尔·昂勃鲁阿兹 (Plougoulm, Pierre Ambroise 1796—1863)——法国官吏, 法学家, 议会议员 (1846—1848)。——第 265 页。

-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220 页。
- 斯蒂凡 (Stephan 1817—1867) ——奥地利大公, 1847—1848 年任匈牙利督军。——第 605 页。
- 斯图亚特王朝 (Stuarts) ——曾统治苏格兰 (1371 年起) 和英格兰 (1603—1649 和 1660—1714) 的王朝。——第 202、227 页。
- 斯特拉蒂米洛维奇, 乔治 (Стратимирович, 1822—1908) ——塞尔维亚政治活动家, 奥地利军队的军官; 1848 年为伏伊伏迪纳塞尔维亚自由派领袖; 后来转到反革命阵营方面去了。——第 338 页。
- 黑克尔 (Hecker) ——普鲁士法官, 1848 年任科伦检察官。——第 70、71、155、156、277、282、531、532、675 页。
-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 (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巴登的共和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起义失败后, 流亡瑞士, 后流亡美国,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方一边。——第 53、60、675 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第 202、574、669 页。
- 黑克舍尔, 约翰·古斯塔夫 (Heckscher, Johann Gustav 1797—1865) ——德国法学家; 曾任帝国司法大臣 (1848 年 7—8 月) 和外交大臣 (1848 年 8—9 月); 帝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53、78 页。
- 博宁, 古斯塔夫 (Bonin, Gustav 1797—1878) ——普鲁士贵族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 1848 年任财政大臣 (9 月底—11 月初), 五十年和六十年代任波兹南总督。——第 415 页。
- 博马舍, 比埃尔·奥古斯丹 (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1732—1799) ——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 111、224、532 页。
- 博德尔施文克, 恩斯特 (Bodenschwing, Ernst 1794—1854)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反动分子; 1842 年起任财政大臣, 1845 年至 1848 年 3 月任内政大臣;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右派。——第 29、233、343—347、349、353、354、370、429、449—451 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耳曼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 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进步分子政党的领袖之一, 曾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方式使工人离开革命斗争。——第 451 页。
- 舒尔茨 (Schultz) ——普鲁士法官,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第 144、145 页。
-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793—1875) ——奥地利皇帝 (1835—1848)。——第 605、606 页。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 ——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第 173 页。
- 蒙特尔·冯·多根菲尔德, 安东 (Vetter

- von Doggenfeld, Anton 1803—1882)——匈牙利将军, 1848—1849年是科苏特的战友, 革命失败后从匈牙利流亡出外。——第611页。
- 费希巴赫(Fischbach)——1849年缪尔海姆(在莱茵省)工人联合会举办的民主宴会的参加者。——第692页。
- 凯伦, 约翰·康拉德(Kern, Johann Conrad 1808—1888)——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和外交家; 联邦法院院长。——第40、105、109页。
-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Caesar, Caius Julius 公元前约100—44)——著名的罗马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第333页。
- 富勒尔, 约纳斯(Furrer, Jonas 1805—1861)——瑞士律师,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为联邦代表会议议长, 后来任瑞士联邦主席, 苏黎世市长。——第10、72、73、75、76、105、113、114、116、147、149页。
-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222页。
- 雅科比, 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中左派领导人之一;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 七十年代倾向社会民主党人。——第446、447页。
-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54、103页。
-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696页。
- 敦克尔(Duncker)——普鲁士官吏, 1848年任柏林警察厅长。——第417页。
- 菲雪尔, 索菲(Feuchères, Sophie 1795—1840)——男爵夫人, 路易·昂利·约瑟夫·孔代亲王的爱妃。——第423页。

十三画

- 奥特(Ott)——沃林根(在莱茵省)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第692页。
- 奥托, 卡尔·乌尼巴特(Otto, Karl Wunibald 约生于1809年)——德国化学家, 1848—1849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人之一。——第698、702、702页。
- 奥尔费斯(Offers)——德国法官。——第165页。
- 奥克辛本, 约翰·乌尔利希(Ochsenbein, Johann Ulrich 1811—1891)——瑞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后来是自由派领袖之一, 反宗得崩德战争时期, 任联邦代表会议议长, 联邦政府首脑(1847—1848); 1848年任国民院议长, 并且是联邦院议员。——第10、72—71、147、149、210、211页。
- 奥马尔公爵, 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浦·路易(Aumale, Henri Eugène Philippe Louis, duc d' 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子。——第423页。
-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
- 奥尔良的阿黛拉伊德(A delaide, Eugénie Louise 1777—1847)——法国国王路易

- 菲力浦的姊妹。——第 422 页。
- 奥尔斯特瓦特, 鲁道夫 (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表, 曾任首相和外交大臣 (1848 年 6—9 月)。——第 134、138、415 页。
- 路易-拿破仑 (Louis-Napoléon)——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265、389、398、402、420、422、470、668、670 页。
- 路易十一 (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 (1461—1483)。——第 194 页。
-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 (1774—1792),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刑。——第 14、15 页。
- 路德维希·约瑟夫·安东 (Ludwig Joseph Anton 1784—1864)——奥地利大公。——第 171 页。
- 塔敦-特利格拉弗, 阿道夫 (Thadden-Trieglaff, Adolf 1796—1882)——波美拉尼亚的普鲁士地主, 反动分子; 1847 年为第一届联合会议的成员。——第 432 页。
- 塔谢罗, 茹尔·安都昂 (Taschereau, Jules Antoine 1801—187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民报”编委; 1833—1838 年和 1848 年曾发行“往事述评”; 1848—1849 年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属于右派, 后来成为拿破仑主义者。——第 373 页。
-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 54、439、592 页。
- 蒙钦格尔, 约瑟夫 (Munzinger, Joseph 1791—1855)——瑞士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联邦院议员 (1848—1855), 1851 年任瑞士联邦主席。——第 72、75、147、149 页。
- 詹姆斯二世斯图亚特 (James II Stuart 1633—1701)——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 (1685—1688)。——第 15 页。

十四画

- 维勒 (Wöhler)——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第 693 页。
- 维昂, 弗朗斯瓦 (Veillon, Francois 1793—1859)——瑞士法官, 国民院议员 (1848—1851)。——第 113 页。
- 雅尔特, 格奥尔格 (W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71、623、680、705、707 页。
-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ctor Emanuel II 1820—1878)——萨瓦公爵, 撒丁国王 (1849—1861), 意大利国王 (1861—1878)。——第 467 页。
- 维多利亚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 (1837—1901)。——第 350 页。
- 维登布鲁赫, 路易 (Wildenbruch, Louis 1803—1874)——普鲁士外交官, 曾任驻贝鲁特总领事, 1848 年与丹麦作战时期, 与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团一起被派往哥本哈根。——第 187 页。
- 维特根施坦, 亨利希 (Wittgenstein, Heinrich 1800—1868)——普鲁士官吏, 1848 年任行政区长官 (5—9 月) 和科伦市民自卫团司令。——第 215、251 页。

维尔腾堡亲王, 保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Paul Karl Friedrich August 1785—1852)。——第 172 页。

赫克 (Höcke)——奥地利民主主义者, 维也纳 1848 年十月起义的参加者。——第 507、508 页。

赫希斯特, 恩斯特·海尔曼 (Höchster, Ernst Hermann 约生于 1811 年)——爱北斐特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主席; 起义失败后, 从德国流亡出外; 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 597、598 页。

赫山诺夫斯基, 沃伊采赫 (Chrzanowski, Wojciech 1788—1861)——波兰将军; 1849 年 3 月实际上指挥与奥军作战的皮蒙特军队。——第 462、465 页。

福适, 莱昂 (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主义者, 曾任内政部长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5 月); 后来成为拿破仑主义者。——第 247 页。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1849 年逃离德国;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小册子 (1860) 中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走狗。——第 425、549 页。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28、54、241、258、310、357、358、411 页。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

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1848 年为制宪议会议员。——第 646、656、661、666—672 页。

豪斯曼 (Hausmann)——德国工人, 1849 年 2 月 24 日科伦宴会的参加者。——第 694 页。

十五画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 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 70、623、695、705、707 页。

德律埃, 昂利 (Druey, Henri 1799—1855)——瑞士国家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曾参加制定 1848 年宪法, 联邦院议员, 1850 年任瑞士联邦主席。——第 73、75、76、114 页。

德斯特尔,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 (D'Es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 年 10 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 在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后来流亡瑞士。——第 447、451 页。

德利加斯基 (Drigalski)——普鲁士将军, 普鲁士反动军阀的代表人物; 1848 年为杜塞尔多夫的师长。——第 64—68、160、416、580、581、686 页。

鲁卡斯 (Lukas)——1849 年为缪尔海姆

(在莱茵省)工人联合会会员。——第 692 页。

鲁特尔 (Lutter)——普鲁士官吏, 1848 年任科伦警监。——第 154 页。

鲁维尼, 扎科莫 (Luvini, Giacomo 1795—1862)——瑞士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律师, 激进主义者; 原籍意大利; 1847 年曾参加击溃宗得崩德军队的战争; 1848 年起为德森州出席国民院的议员。——第 101、105—111、115 页。

摩莱, 路易·马蒂约 (Molé, Louis Mathieu 1781—1855)——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分子, 曾任总理 (1836—1837, 1837—1839), 1848 年为制宪会议代表, 1849—1851 年为立法会议代表。——第 522 页。

十六画

赖夫, 威廉·约瑟夫 (Reiff, Wilhelm Joseph 约生于 1822 年)——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后来任工人启蒙联合会书记, 1850 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曾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而受审。——第 687 页。

赖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领袖之一, “改革报”编辑;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 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代表,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 流亡英国。——第 76、173、470、627、628、661—668、693 页。

霍伊姆, 卡尔·格奥尔格·亨利希 (Hoym, Karl Georg Heinrich 1739—1807)——反动的普鲁士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 1770 年起任西里西亚事务大

臣, 实行兼并波兰的政策。——第 538 页。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明显的反民主的倾向。——第 130 页。

霍亨索伦 (Hohenzollern)——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霍亨索伦夫人 (Hohenzollern)——见伊丽莎白。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 (1415—1701), 普鲁士国王 (1701—1918) 和德国皇帝 (1871—1918) 的王朝。——第 237、402、410、411、414、428、432、437、440、536—538、571—575、580、588—590、593 页。

泽特, 奥托·约瑟夫·阿尔诺德 (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普鲁士法官, 1848 年起任科伦检察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控诉人。——第 359—361 页。

泽泰, 克利斯托夫·威廉·亨利希 (Sethe, Christoph Wilhelm Heinrich 1767—1855)——普鲁士法官。——第 48、163 页。

泽肯多尔夫, 奥古斯特·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 (Seckendorff August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1807—1885)——男爵, 普鲁士法学家, 高级法官; 1849 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 429 页。

诺伊豪斯, 卡尔 (Neuhaus, Karl 1796—1849)——瑞士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1 年任联邦代表会议议长, 1848 年为国民院议员。——第 10、73、74、101、211、212 页。

诺特荣克, 彼得 (Nothjung, Peter 约 1823—1866)——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人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 695 页。

穆罕默德四世 (Mehmed IV)——土耳其国王 (1648—1687)。——第 332 页。

璞鼎查, 亨利 (Pottinger, Henry 1789—1856)——英国外交家和军事活动家; 与中国进行鸦片战争 (1842) 时期任英国军队的指挥官, 1843 年任香港总督, 后任马德拉斯总督。——第 385 页。

十八画

魏特林, 威廉 (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卓越活动家, 空想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 职业是裁缝。——第 646 页。

魏德迈, 约瑟夫 (Wei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46—1847 年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 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新德意志报”的主要编辑之一 (1849—1850); 革命失败后, 流亡美国, 站在北方一边, 参加了内战; 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宣传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23 页。

魏茵加特, 约翰·奥古斯特 (Weingart, Johann August 1797—1878)——瑞士政治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国民院议员 (1848—1860); 报纸“湖乡通报”的发行人。——第 212 页。

魏茵哈根, 拿破仑 (Weinhagen, Napoléon)——克列维 (在威斯特伐利亚) 的德国律师。——第 70、71 页。

萨瓦公爵——见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萨拉洛利, 鲍洛 (Solaroli, Paolo 1796—1877)——1848—1849 年与奥军作战的皮蒙特军队的将军。——第 466 页。

期 刊 索 引

一 画

“1848年的人民之友。共和重光第一年”

(L' Ami du Peuple en 1848. An 1-er de la République reconquise)——巴黎出版。——第666页。

二 画

“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Le Peuple.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巴黎出版。——第661、667、668、672页。

“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巴黎出版。——第670、672页。

“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文娛性杂志”(Der Volksfreund. Zeitschrift für Aufklärung und Erheiterung des Volkes)——维也纳出版。——第629页。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三 画

“上西里西亚火车头报”(Oberschlesische Locomotive)——拉提博尔出版。——第507页。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见“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见“自由、博爱、劳动”。

四 画

“日内瓦评论。瑞士报纸”(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第12、41页。

“巴门日报”(Barmer Zeitung)——第417页。

“巴塞尔州人民报”(Baselandschaftliches Volksblatt)——第149页。

五 画

“东方日报”(Zeitung des Osten)——波兹南出版。——第516页。

“民主总汇报”(Allgemeine demokrat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382、383页。

“民主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巴黎出版。——第360、661、663、666页。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伦敦出版。——第360页。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伦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 für Bürger, Bauern und Soldaten)——第155、623、706页。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第157页。

“立宪主义者报”(Constitutionelle Zeitung)——柏林出版。——第408页。

六 画

-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在勒斯劳出版。——第356页。
-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科伦出版。——第623页。
- “自由、劳动”(Freiheit, Arbeit)——科伦出版。——第687、688、699页。
- “自由瑞士人”(Der Freie Schweizer)——伯尔尼出版。——第211页。
- “自由、博爱、劳动”(Freiheit, Brüderlichkeit, Arbeit)——科伦出版。——第687、696—698、701、702页。
- “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巴黎出版。——第360页。
- “全景”(Der Guckkasten)——伯尔尼出版。——第211、212页。
-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报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ziales Leben Deutschlands)纽约出版。——第170页。
- “协和报”(La Concordia)——都灵出版。——第360页。

七 画

- “伯尔尼报”(Berner-Zeitung)——第209—211页。
- “伯尔尼新闻”(Berner Intelligenzblatt)——第209页。
- “伯尔尼宪法之友”(Berner Verfassungs-Freund)——第147、210页。
-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第360、661—663、666、668页。
- “改革报。民主派机关刊物”(Die Reform. Organ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柏林出版。——第382—384页。

- “每周通报”(Wochen- und Adreß-Blatt)——爱尔福特出版。——第417页。
-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第68、165、705页。

八 画

-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52、173、247—249、251、419、421、628、662页。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234—236、239、241—245、377、379、417、519、522、562、618页。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见“瑞士国民报”。“国民评论”(Revue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52页。
-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通报”。
-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第147、309、623页。
-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第373页。
- “往事述评,或上届政府秘密档案”(Revue rétrospective ou Archives secrètes du dernier Gouvernement)——巴黎出版。——第373页。
- “波罗的海报。波罗的海交易所新闻”(Ostsee-Zeitung und Börsennachrichten der Ostsee)——施特廷出版。——第515、516页。
- “的里雅斯特自由港”(Triester Freihafen)——第614页。
- “罗森堡-克罗茨堡电讯”(Rosenberg-Kreuzburge Telegraph)——第416、417页。

九 画

- “总邮报”(Oberpostamts-Zeitung)——见“法兰克福总邮报”。
-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21、27、35、68、131、157、170、214、215、217、253—257、310—315、357、362、365、367、375、376、424、430、454、468、472、507、584、618、624、676、693、708页。
-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ln)——第152、153、160页。
- “柏林阅报室”(Berliner Zeitungshalle)——第382页。
-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第36页。
- “宪法之友”(Verfassungs-Freund)——见“伯尔尼宪法之友”。
- “独立主义者”(Der Unabhängige)——伯尔尼出版。——第212页。
- “革命报”(Die Revolution)——俾尔出版。——第212页。
- “总汇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20、112、585页。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420—421页。
- “洛桑日报. 瑞士报纸”(Gazette de Lausanne et Journal Suisse)——第75页。
- “城乡信使”(Bote für Stadt und Land)——凯则尔苏斯顿出版。——第626页。
- “持论公正和消息灵通的瑞士信使”(Der aufrichtige und wohlverfahrene Schweizer

er Bote)——阿劳出版。——第149页。

十 画

- “真正的共和国. 政治和文学日报”(La vraie République. Journal quotidien,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黎希出版。——第663页。
-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第705页。
- “议会通讯”(Parlaments-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214页。
- “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Constitutionnel neuchâtelois)——第8页。

十一 画

“现代人”(Il Contemporaneo)——罗马出版。——第360页。

十二 画

-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柏林出版。——第36、96、181、182、343、415页。
- “普鲁士立法、法学和司法年鉴”(Jahrbuch für die Preußische Gesetzgebung,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echtsverwaltung)——柏林出版。——第346页。
- “进化. 政治性周刊”(Die Evolution. Ein politisches Wochenblatt)——俾尔出版。——第212页。
- “博爱报. 全德工人通讯”(Die Verbrüderung. Correspondenzblatt aller deutschen Arbeiter)——莱比锡出版。——第681页。
- “湖乡通报”(Der Seeänder Anzeiger)——伯尔尼出版。——第212页。
-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

be)——科伦出版。——第373、430页。

“联邦海尔维第。政治、工业和文学的报纸”(L'Helvétie fédérale. Journal politique, industriel et littéraire)——伯尔尼出版。——第211页。

“喧声报”(Le Charivari)——巴黎出版。——第210页。

十三画

“瑞士”(La Suisse)——伯尔尼出版。——第147、148、210页。

“瑞士报”(Schweizer-Zeitung)——伯尔尼出版。——第211页。

“瑞士信使”(Schweizer Bote)——见“持论公正和消息灵通的瑞士信使”。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巴塞尔出版。——第40、149页。

“瑞士联邦报”(Schweizerische Bundeszeitung)——伯尔尼出版。——第210页。

“瑞士观察家”(Der Schweizerische Beobachter)——伯尔尼出版。——第209页。

“瑞士信使报”(Courrier Suisse)——洛桑出版。——第41页。

“新闻报”(La Presse)——巴黎出版。——第23、630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5、28—34、36、87、214、220、224、229、273、289、306、391、392、410—414、427、428、431、437、471、585、603、618页。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Zeitung)——第105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6、8、13、22—24、26、27、34—36、38、39、42、43—48、50、

51、56、57、60—63、69—72、77、84—86、88、93、95—97、116、117、146、149、150、161、169、170、172、175、180、185、192、207、213、214、216、231、233、246、250—252、257、261、262、271—275、285、306、308、309、315、321、326、327、334、342、354—356、358、361、368、369、372、374、375、381、384、390、393—396、400、406、409、410、415、418、423—425、429—481、440、452、457、468、470、472、506、508—510、514、515、517、530、533、535、536、539、542、543、546、548、551、552、558、559、561、563、565、567、568、570、575、577、581、583—585、587、595、596、599—603、615、618、619、623、630、675、678—680、683—686、689—696、699、704—708页。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623、707页。

“窝州新闻”(Nouvelles Vaudoises)——洛桑出版。——第41、210页。

“奥佩恩区板”(Oppelner Kreisblatt)——第232页。

十四画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蜜蜂”(Die Biene)——伯尔尼出版。——第210页。

十五画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1847—1848在海得尔堡，1848—1850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157、254页。

- “德意志人民报”(Teutsches Volksblatt)
——维尔茨堡出版。——第394、395页。
-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伦敦出版。——第691页。
- “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莱比锡出版。——第382页。
- “德意志改良报,立宪德国的政治性报纸”
(Die Deutsche Reform, politische Zeitung für das constitutionelle Deutschland)
——柏林出版。——第163页。
- “阅报室”(Zeitungs-Halle)——见“柏林阅报室”。
- “黎明报.政治和文学性报纸”(L'Alba. Giornale politico-letterario)
——佛罗伦萨出版。——第360页。

译 后 记

本卷中“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及“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匈牙利的斗争”、“‘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匈牙利”这几篇文章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一书中的译文。